社会与公益

SHE HUI YU GONG YI

聚焦社会建设·助力公益事业

2026

3月（下）

总第194期

ISSN 1674-9758

CN 11-5944/C

社会工作视角下社区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多元激励机制研究

姚楷强

数字技术驱动乡村生态振兴的实践路径

任苗雨

社工站介入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与实践路径研究

张生元　孙媛媛　牛喜霞

六尺巷调解法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运用与启示

章　鹏

“五社联动”背景下的街道社工站建设研究

——以H市T街道社工站为例

孟　伟　乔志龙

如何为社会组织搭建“三位一体”的合规内控体系

李泉铮

多次入选BIBF“精品期刊” | 荣获CASS“最受欢迎期刊” | 荣获“2024数字阅读影响力期刊TOP100”

2026 年 3 月下
总第 194 期

邮发代号：82-579

出刊日期：2026 年 3 月 28 日

联系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225 号（邮编 100010）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邮编 100037）

联系电话：
010-6830 0355/0356
6830 0357/0358
6830 0359/0360
6830 0361（传真）

读者服务部：
010-8398 8206/8208

网址：
www.swchina.org
www.spw.org.cn

投稿邮箱：
shegongren@163.com

Competent Unit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rganizer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China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Director of the Academic Committee of the CASW 中社联学术委员会主任
魏礼群 WEI Liqun

Director of Editorial Board 编委会主任
陈存根 CHEN Cungen

Deputy Director of Editorial Board 编委会副主任
周惠 ZHOU Hui / 康鹏 KANG Peng / 王谦 WANG Qian
赵蓬奇 ZHAO Pengqi / 胡坚 HU Jian / 金莉 JIN Li

President 社长
崔强 CUI Qiang

Editor- in- chief / Chief Editor 总编辑 / 主编
刘正刚 LIU Zhenggang

Deputy Editor- in- chief 副总编辑
孙亚桥 SUN Yaqiao / 田眸 TIAN Mou / 蒋鑫富 JIANG Xinfu

Vice President 副社长
王丽 / 魏三军

Associate Editor 副主编
田文旗 / 姜淑云 / 刘玉霞

President's Assistant 社长助理
刘斌 / 马明月

Council Vice Secretary-general 理事会副秘书长
林平光 / 殷鸿飞 / 尚宝荣

Editorial Office 编辑部
屈思源 / 白润红 / 史策 / 高云天 / 刘倡 / 平萍 / 黄桂华 / 李振鑫
彭一超 / 翟海艳 / 李雪良 / 梁晶晶 / 张力 / 田宇晗

Council Secretariat 《社会与公益》理事会秘书处
刁琼兰 / 万沣毅 / 马贵荣 / 马强 / 王守红 / 王红 / 王坚松 / 王国权 / 王政 / 王保峰 / 王哲
王德立 / 邓富友 / 石恒平 / 布宏雷 / 布朋印 / 卢莎 / 田野 / 田瑞建 / 白浩扬 / 冯军伟
朱红艳 / 任璐 / 刘长鹏 / 刘玉平 / 刘汉良 / 刘建军 / 刘漩 / 闫新勇 / 孙明 / 苏芬芬 / 李永华
李军 / 李迪 / 李建华 / 李梓英 / 李斌 / 杨扬 / 杨同喜 / 杨会民 / 杨雨 / 杨威 / 杨航 / 杨高磊
肖玲 / 吴春华 / 何书一 / 何宗尉 / 谷学亮 / 辛福 / 张冬 / 张汉英 / 张金霞 / 张鼎 / 张燕蕊
陈承 / 陈勇 / 邵佳 / 范娱艳 / 林莹 / 金亮 / 屈玉芬 / 赵建苹 / 赵容榴 / 赵燕成 / 胡刚 / 侯军旺
侯俊勇 / 秦一杰 / 耿庆山 / 柴宏 / 徐志昌 / 高云辉 / 高蕾 / 郭保生 / 郭晓利 / 黄玉海
黄洪松 / 曹耀文 / 联凡 / 蒋红超 / 惠熙玲 / 鲁兵库 / 雷秋枫 / 雷彦敏 / 臧忠燕 / 裴旭峰
裴凯峰 / 廖俊军

Advertisement 广告
《社会与公益》杂志社有限公司
北京仕风文化发展中心

Designer 设计
王熙元 / 武建和

Printing 印刷
北京启航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单位：《社会与公益》杂志社有限公司
发行单位：《社会与公益》杂志社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广告发布登记：京朝字监广登字 20180004 号
定价：40.00 元

声明： 本刊严禁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AI）直接生成论文研究框架、主体内容与核心观点等，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检测（知网 AIGC 检测等）比例超过 20% 的论文作退稿处理。对已刊发论文，一经查实存在违反使用规范的情况，文责自负，本刊概不负责。
本刊转载部分文章的稿酬已按法律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 120 号 1 号楼太丰惠中大厦 1027-1039，邮编：100050
电话：010-65978917，传真：010-65978926，E-mail: wenzhuxie@126.com

本刊数字版合作说明 社工中国网、中国知网、龙源期刊网、博看网。本刊同时进行数字发行，作者如无特别声明，即视为同意授权我刊及我刊合作网站信息网络传播授权。

法律顾问： 北京市百伦律师事务所 刘百军律师

创刊时间：2010 年

社会与公益
SOCIETY & PUBLIC WELFARE

目次 CONTENTS

2026 年 3 月 下
总 第 194 期

基层党建

新形势下加强企业党建工作的挑战与应对策略……姜国红 01
中医药院校党建引领劳动教育的探索与实践……王 鼎 李一凡 程 柯 段枝燕 史丙晨 04
依托塔山红色资源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实践探索……李多彦 07
地域文化与高职院校党建文化融合路径研究——以衢州市南孔文化为例……骆黎阳 10
工匠精神融入高职院校学生党支部党建工作体系研究……辛文宇 王清平 13
红色资源在高校党建品牌建设中的作用机理研究……朱 璐 16
党建引领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路径探索与实践——以中铁十七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例……孟 晓 19
加强信访机关党建工作若干问题的探讨……单建花 22
党建引领下特困人员服务机制的实践探索……范石娴 25
新时代高校学生公寓党建工作的创新路径与实践探索——基于多校联合模式的可行性研究……迟雯雯 28
国有企业党建引领企业文化建设的策略研究……郑高健 31
基层党建与生产经营业务融合发展研究……铁晓蓓 34
五年制高职院校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融合的路径探究——以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为例……是新宇 37
高质量党建引领下供电企业精神文明建设探索……姚维俊 40

案例分享

开放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的探索与实践——以丹东开放大学为例……李继军 43
伟大建党精神融入艺术院校学生党员对党忠诚教育的耦合机理与实践路径研究——以广西艺术学院为例……徐辉强 46
专升本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专业教学的路径探析——以“组织行为学”课程为例……周必仙 49
开放大学学历教育招生困境与对策研究——以昌吉开放大学为例……李 强 耿莉雪 蔡玲霞 52
中外合作办学大学博士生思政教育体系构建策略研究——以宁波诺丁汉大学为例……戴一淼 55
基于实践探索的革命文物藏品档案开发利用研究——以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文物主题思政教育课程为例……
……王 笑 周鑫玥 58
智慧教学场景下财务伦理教育的现实困境与模式转型——以“财务管理”课程为例…… 肖 冰 杨 洁* 任晓聪 61
社会工作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实践路径与创新探索——以深圳市为例……王 璐 李一丹 黄红新 钟 立 杨 恒 64
三类典型场景下高职生防电信网络诈骗治理研究——以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为例……章清蓉 67

党建创新引领高校综合管理高质量发展路径探究——以牡丹江医科大学为例…… 葛　戈　王尊博　陈　瑶 * 70

百家争鸣

数智化时代弘扬科学家精神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马迎光　73
关于特殊人群未成年子女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研究……王豆豆　76
“一站式”学生社区视域下高职院校学生党员主理式培养机制研究……汤兴宇　79
数字化转型视角下红色资源传播的创新路径研究……武　琳　82
新时代文化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李申奥　86
基于大语言模型的对话干预系统在孤独症患儿中的治疗效果研究……林格宇　89
情感劳动对流动家庭抗逆力建构的影响机制研究……宋如清　张银花　92
中国传统家规中为官之德的内涵、主要内容及当代启示……李成萍　95
新时代昌都红色资源赋能干部教育的价值转化机制与路径……马　帅　98
微信融合并发症体验式健康教育在中年高血压患者中的应用研究…… 周燕燕　齐洋洋　王宁宁　孙小丽 * 101
精神障碍群体社会排斥的社会工作干预策略研究……杨国玲 104
医学教育纵向研究数据库在解决社会医学问题中的应用…… 杨超男　曹　娟　程　坤　陈　亚 * 107
如何为社会组织搭建“三位一体”的合规内控体系……李泉铮 110
心理健康教育对公务人员心理素质的提升效果研究……赵　李　滕军燕　鲁　波　赵　恺 114
新时代加强和改进党员教育的思考与路径创新探析……修安然 117
高校领导干部心理健康管理在组织工作中的实施策略……赵攀桥 120
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正念教养模型研究……郭　鋆 123
育儿教育成本对城镇家庭生育行为的家庭经济模型分析……邹　波　邱玉婷　陈婷婷 126

教学研究

基于 OBE 理念的全概率公式启发式教学浅析 ……马鸿燕 129
技工院校专业课程“思创融合”育人模式的实践探究……张利华　吴海峰 133
产教融合驱动下智能控制技术专业课程体系创新与实践路径研究……洪慧慧 136
人工智能赋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探析……蔡　昊　黎　凡 139
地方红色资源融入技工院校思政课教学的实践优势及优化策略研究……林　璐 142

“一体两翼”背景下职业院校煤炭类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探索……刘　刚 145
产教融合背景下“AI+ 思政课”教学模式创新与学生参与度提升策略……马　力 148
基于“岗课赛证”模式下“液压与气动技术”课程的教学改革探索……徐春荣 151
新时代高校学生法律素养培育路径研究……柯友清 154
产教融合视域下“5E”学习模式赋能基础护理技术实践教学的应用探索 ……
……马　瑞　王改琴　折　慧　邵玉娟　樊元利 157
红色文化融入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实践研究……杨怡可 160

社会治理

“五社联动”背景下的街道社工站建设研究——以 H 市 T 街道社工站为例……孟　伟　乔志龙 163
基于网络化治理视角下社会治理的策略分析……付丽娟 166
党建赋能与专业协同的社会工作调适机制研究——以山东省微山县 W 社区为例 ……周子钰 169
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的内涵及路径……马　奥 172
超凡魅力型社区书记的生成与可持续机制研究——基于 R 社区治理实践的个案分析 ……高宪军　马志强 175
新时代发挥思政工作在宿州基层治理的作用……陈　草 178
社会工作视角下社区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多元激励机制研究……姚楷强 181
社会工作介入家政工劳动权益保护的五维策略……徐　佳 184
数字技术驱动乡村生态振兴的实践路径……任苗雨 187
社工站介入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与实践路径研究……张生元　孙媛媛 190
六尺巷调解法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运用与启示……章　鹏 193
党建引领基层网格化治理效能提升路径研究……袁培文 196

思政论坛

课程思政视域下小学英语教育专业学生翻译能力的培养——内涵、原则与路径……秦　军 199
课程思政视域下高校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融合的机制构建……杨　淼 203
“思政铸安，应急启智”安全与应急类专业思政育人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高　飞　滕弋非　齐消寒　张逸龙　赵书茂 206
高职学生孝道观念类型的潜在剖面分析及教育启示…… 陈　盈　梁　燕　沈光银 * 209

“课程思政”融入开放大学“合同法”课程的实践研究……王楠楠 213
传统文化在辅导员思政教育工作中的渗透与育人效果研究……谢晓旭　孙　涛 216
新媒体时代下某 App 对高校思政教育实效性的影响 ……李秉轩 219
基于思政引领的高职生创新创业与就业公司孵化机制研究……冯国峰　谭晓宇　陈尔雷　简俊岭 222
高职院校党建工作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推动作用研究……吴建华 225
滇缅公路蕴含的中国精神融入高校课程思政路径探究……李顺毕 228
英模精神在基层民警思政引领中的价值转化研究……姜妍婷 231
课程思政融入机械技能大赛备赛与训练过程的实践探索……朱佳珺 234

学海探骊

“校校合作共同体”下师范生培养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进路……孙宏伟 237
团体沙盘干预对大学生社交焦虑的疗效及机制：一项混合方法研究……王　婷 240
社会认同与智能手机成瘾对大学生学习方式的影响…… 宋　锐　韩玲玲 * 243
大学生综合素质测评体系构建与完善……王　肖 246
民族地区高职专业群特色发展实施路径探析……蔺　坤　杨庆益　杨蔺皓宇 249
包头市高校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张雅婷 252
职业教育赋能“双碳”目标社会共识建构的角色探讨……陈安琪 255
教育强国视域下应用型高校法治教育研究……夏婷婷　魏贤威　蔺义博 258
新时代妇联开展女性大学生工作的对策研究……孙雅萍　李欢萍　徐天翊　吴一亢 261
微时代高职院校大学生生命教育的现实境遇……许秀静 264
高职护生教育氛围感知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李继乐　佘程宏　刘　跃 267
新时代高校心理育人的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研究…… 鲁玉银 270
以工匠精神培育高职院校学生自信心……陆晓云 273
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困境和路径优化——基于“三全育人”框架的实证分析……
……温蕊旭　胡西塔尔江·吾拉木 276
安身与立命：当代青年大学生生命教育探究……陈雨佳　徐斯雄 279
大数据背景下大学生就业测量工具的开发研究……徐　创　畅　雅　程晓军 282

新形势下加强企业党建工作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姜国红

摘要：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下，新时代企业党建工作作为企业发展的“红色引擎”，其重要性愈发凸显。然而，当前企业党建工作面临着思想认识不到位、与业务融合不紧密、队伍建设滞后、考核机制不完善及外部环境冲击等多重挑战。文章分析新形势下企业党建工作的重要性及挑战，从强化思想引领、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加强党建队伍建设、完善考核评价机制以及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等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结合企业党建实践案例与相关研究成果希望为新形势下加强企业党建工作，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参考。

关键词：新形势；企业党建；应对策略；党建数字化；党业融合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在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就业、科技创新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企业党建工作作为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坚持正确发展方向、凝聚员工力量、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根本保证。新形势下，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既有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外部压力，也有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的内部要求，这些变化既为企业党建工作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使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已有研究表明，新形势下企业党建与高质量发展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强化党建工作能有效破解企业发展瓶颈。所以，研究新形势下企业党建工作的挑战与应对策略，对于加强企业党建工作，推动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形势下加强企业党建工作的重要性

（一）引领企业正确发展方向

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企业面临着诸多发展选择，稍有不慎就可能偏离正确的轨道。企业党建工作能够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穿于企业发展战略制定和日常经营管理的全过程，确保企业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践行社会责任，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实现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1]。例如，在国家大力倡导绿色发展的背景下，党组织能够引导企业加大环保投入，推动产业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引领作用在国有企业中尤为突出，部分民营企业也通过强化党建引领，实现了合规经营与高质量发展的双赢。

（二）凝聚企业发展合力

员工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只有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企业党建工作采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组织各类文化活动等方式，能够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拉近企业与员工之间的距离。党组织可以搭建员工沟通交流的平台，倾听员工的心声，解决员工的实际困难，让员工感受到企业的温暖和关怀，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能够带动广大员工积极投身于企业的生产经营和改革发展中，形成强大的发展合力。相关实践表明，党建工作开展成效显著的企业，员工凝聚力和工作积极性明显高于党建薄弱企业。

（三）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仅体现在技术、资金、人才等方面，还体现在企业的文化、管理和品牌等软实力上。企业党建工作能够为企业软实力的提升提供有力支撑，党组织可以将党的先进理念和优良作风融入企业文化建设中，培育具有企业特色的优秀文化，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2]。除此之外，企业加强党建工作，能够提高企业管理层的决策水平和管理能力，规范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提升企业的品牌形象和社会声誉，从而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尤其是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党建引领下的文化建设，能够有效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助力企业突破发展瓶颈。

（四）助力企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新形势下企业面临市场波动、合规监管、供应链冲击等多重风险，党建工作是企业风险防控体系的“稳定器”。党组织凭借政治敏锐性，能提前研判政策导向与市场风险，例如在国家出台金融监管新政、数据安全法规时，借助专题学习会、政策解读会等形式，帮助企业快速掌握合规要求，避免因政策理解偏差引发经营风险。党组织可以牵头建立“风险防控责任区”，在生产安全、财务审计、供应链管理等关键领域，组织党员带头排查风险隐患，形成“全员参与、党员带头”的风险防控格局。除此之外，面对突发危机如疫情冲击、供应链中断时，党组织能迅速动员党员组建应急团队，协调资源、稳定员工情绪，助力企业快速恢复生产，有效降低风险对企业经营的冲击，这一作用在近年来各类企业应对市场波动和突发危机的实践中得到充分验证。

二、新形势下加强企业党建工作面临的挑战

（一）思想认识层面的挑战

部分企业对党建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存在“重业务、轻党建”的现象，部分企业管理层认为党建工作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只是一种“务虚”的工作，因此在资源投入、人员配备等方面对党建工作不够重视，导致党建工作流于形式。除此之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多元文化的冲击，部分企业员工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想倾向，对党建工作的认同感和参与度不高，给企业党建工作的开展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二）党建与业务融合层面的挑战

党建工作与企业业务工作“两张皮”的现象仍然存在，部分企业党组织在开展工作时，没有充分考虑企业的生产经营实际，缺乏与业务工作的有效衔接，导致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脱节[3]。例如，在制定党建工作计划时，没有结合企业的发展战略和业务目标，开展的党建活动与业务工作无关，无法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部分业务部门对党建工作缺乏理解和支持，认为党建工作会占用业务时间和资源，影响业务工作的开展，从而对党建工作存在抵触情绪，部分企业虽提出“党业融合”理念，但缺乏具体落地举措，导致融合流于口号，未能实现党建与业务的协同赋能。

（三）党建队伍建设层面的挑战

党建队伍素质参差不齐，难以满足新形势下企业党建工作的需求，部分企业党建工作人员缺乏专业的党建知识和业务能力，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理解不深，在开展党建工作时方法简单、形式单一，无法有效吸引员工参与。由于党建工作待遇相对较低、晋升渠道不畅等原因，难以吸引优秀人才加入党建队伍，导致党建队伍人员不稳定，流动性较大。除此之外，部分党建工作人员同时兼任多项工作，精力有限，无法全身心投入到党建工作中，影响了党建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尤其是基层企业党建队伍，普遍存在“兼职化”“非专业化”问题，严重制约党建工作提质增效。

（四）考核评价机制层面的挑战

目前，部分企业党建工作考核评价机制不完善，存在考核指标不科学、考核方式单一、考核结果运用不充分等问题。在考核指标设置上，过于注重形式性指标，如开展活动的次数、党员人数等，而对党建工作的实际效果，如对企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员工满意度等方面的考核不够重视。在考核方式上，主要以听汇报、看资料等方式为主，缺乏实地调研和员工评价，考核结果不够客观公正。在考核结果运用上，没有将考核结果与党建工作人员的绩效、晋升等挂钩，导致考核工作流于形式，无法有效激励党建工作人员积极开展工作，部分企业的党建考核甚至与业务考核脱节，难以发挥考核的导向和激励作用。

（五）外部环境层面的挑战

从国际环境来看，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使用各种手段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试图动摇我国企业员工的理想信念，给企业党建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4]。从国内环境来看，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企业面临着市场竞争加剧、经营压力增大等问题，部分企业为了追求短期经济效益，可能会忽视党建工作的开展。除此之外，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信息传播更加便捷、快速，但也为不良信息的传播提供了渠道，对企业员工的思想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增加了企业党建工作的难度，尤其是短视频、社交平台等新媒体的普及，进一步加大了意识形态引导和不良信息管控的难度。

三、新形势下加强企业党建工作的应对策略

（一）强化思想引领，提高对党建工作的认识

企业管理层要树立正确的党建工作理念，充分认识到党建工作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将党建工作纳入企业发展战略规划中，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加大对党建工作的资源投入，配备充足的党建工作人员，为党建工作的开展提供必要的保障。企业还要加强对企业员工的思想政治教育，采用开展专题讲座、主题党日活动、线上学习等多种形式，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引导员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对党建工作的认同感和参与度，结合企业实际，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企业文化建设相结合，培育具有企业特色的价值理念，让党建工作深入人心。

（二）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实现协同发展

企业要找准党建与业务工作的结合点，党组织要深入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和业务需求，围绕企业

的发展战略和中心工作制定党建工作计划，开展党建活动[5]。例如，在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市场开拓等工作时，党组织可以组织党员开展技术攻关、市场调研等活动，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支持。企业要加强党组织与业务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定期召开党建与业务工作座谈会，交流工作经验，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将党建工作融入企业的决策、执行、监督等各个环节，确保党组织在企业重大决策中发挥政治把关作用。除此之外，企业还需要创新党建工作方式方法，结合企业业务特点和员工需求，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党建活动，如“党建 + 项目建设”“党建 + 安全生产”“党建 + 优质服务”等活动，将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有机融合，提高党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加强党建队伍建设，提升整体素质

企业要加强对党建工作人员的培训，制定系统的培训计划，定期组织党建工作人员参加专业培训，学习党建知识、业务技能和相关法律法规，提高其专业素养和工作能力。企业可以邀请专家学者、优秀党建工作者进行授课，分享工作经验和方法，鼓励党建工作人员自主学习，不断更新知识结构，适应新形势下党建工作的需求。企业还要优化党建队伍结构，拓宽党建人才选拔渠道，吸引优秀的党员干部、业务骨干加入党建队伍，改善党建队伍的年龄、知识和专业结构，建立健全党建工作人员激励机制，提高党建工作人员的待遇，畅通晋升渠道，激发党建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合理安排党建工作人员的工作任务，避免过度兼职，让其能够集中精力开展党建工作。

（四）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增强党建工作动力

企业要科学设置考核指标，根据企业党建工作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建立以党建工作实效为核心的考核指标体系，将党建工作对企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员工满意度、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情况等纳入考核指标中，减少形式性指标的比重，根据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企业特点，制定差异化的考核指标，确保考核指标的科学性和合理性[6]。企业还应创新考核方式，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日常考核与定期考核相结合、上级评价与员工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考核，加强实地调研，深入了解党建工作的实际开展情况，广泛听取员工的意见和建议，确保考核结果的客观公正。与此同时，企业还要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将考核结果与党建工作人员的绩效薪酬、晋升提拔、评先评优等挂钩，对考核优秀的党建工作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对考核不合格的进行约谈和整改，充分发挥考核评价的激励和导向作用，增强党建工作的动力。

（五）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筑牢党建工作防线

针对国际意识形态渗透的挑战，企业党组织要加强对员工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增强员工的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提高员工对西方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渗透的警惕性和抵抗力，利用开展国际形势分析、爱国主义主题活动等方式，引导员工正确认识国际形势，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针对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企业党组织要引导企业树立长远发展眼光，积极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加强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关心员工的工作和生活，帮助员工解决因企业转型升级带来的就业、培训等问题，维护员工的合法权益，保持企业的和谐稳定。针对互联网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企业党组织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开展党建工作，搭建线上党建平台，如党建网站、微信公众号、“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等，发布党建信息、开展线上学习、组织线上活动，扩大党建工作的覆盖面并提升影响力，加强对网络信息的管理和引导，及时发现和处理不良信息，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六）推进党建数字化转型，提升工作智慧效能

企业应顺应数字中国建设要求，以技术赋能破解党建工作瓶颈，构建“三屏联动”的智慧党建平台，利用数据大屏实时呈现党建态势，电脑中屏管控工作过程，手机小屏便捷执行任务，实现党建管理全流程数字化。针对党员分布分散、流动性强的特点，开发线上学习模块，定制“党业融合微课堂”等精准课程，配套直播互动、知识问答等功能，提升学习参与度。将基础党务工作嵌入智慧平台，通过数据自动统计、进度实时追踪，有效破解传统党建流程烦琐、监管滞后等问题，推动党务工作向高效化、规范化方向发展。结合企业业务数字化进程，推动党建数字化与业务数字化深度融合，实现“党建数字化赋能业务高质量发展”。

四、结语

新形势下，加强企业党建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面临着诸多挑战，但只要企业能够充分认识到党建工作的重要性，积极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不断强化思想引领，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加强党建队伍建设，完善考核评价机制，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推进党建数字化转型，就能够克服困难，不断提升企业党建工作的水平，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在未来的发展中，企业党建工作还需不断创新和探索，主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结合企业实际优化党建举措，借鉴行业内优秀党建实践经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企业力量。

参考文献

[1] 刘洋，温清尧 . 新形势下企业党建工作开展创新思考 [J]. 中国金属通报 ,2023(03):135-137.

[2] 李健 . 新形势下加强基层党建工作的思考与探索 [J]. 中国煤炭工业 ,2024(06):56-57.

[3] 马林栋 . 新形势下国有企业基层党（下转 04 页）

中医药院校党建引领劳动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王　鼎　李一凡　程　柯　段枝燕　史丙晨

摘要：中医药院校劳动教育厚植于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理论土壤，扎根于新时代发展实践，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载体，是全面育人的重要路径与依托，在培养本领过硬、素质过强的中医药人才中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全面分析了中医药院校劳动教育的现状，探索将党建引入到中医药院校劳动教育的路径，提出创新“党建＋劳动教育”模式，坚持以党建为根本引领，深度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医药专业特色，更好地培养有扎实专业知识、劳动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新时代中医药人才。

关键词：中医药院校；党建引领；劳动教育

中医药院校劳动教育厚植于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理论土壤，扎根于新时代发展实践，在培养本领过硬、素质过强的中医药人才中具有重要价值。要推动中医药院校劳动教育的持续性发展必须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一方面，党建工作能将党的先进理论与教育实践深度融合，为劳动教育提供思想引领，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深刻领悟中医药事业服务人民的使命。另一方面，以党建为依托开展劳动教育，将专业学习与劳动实践紧密结合。学生在参与中医药种植、炮制、制药等劳动中，不仅巩固专业知识，还能培养实践能力与创新精神，为成长为德才兼备的中医药人才奠定坚实基础，从而更好地回应国家对中医药人才培养的期待，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一、中医药院校劳动教育现状分析

中医药院校劳动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载体，是全面育人的重要路径与依托。自《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发布后，劳动教育被纳入全面发展教育体系，更加受到重视。各地大中小学校陆续开设劳动教育课程，课程内容涵盖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等多个方面。中医药院校在劳动教育领域通过不断地探索与创新，如北京中医药大学注重医学理论与中医临床技能的深度融合，将劳动教育全面融入中医学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了涵盖日常劳动、专业实践和社会实践三大板块的劳动教育模式[1]。张铮等以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为例，对中医药传承创新和劳动教育融合发展的新路径进行探索，确立了中医药传承创新的劳动教育目标，优化了教育架构，制定了劳动教育方案[2]。

（一）劳动理念偏倚

目前，一些中医药院校缺乏与中医专业紧密结合的劳动课程，学生上劳动课局限于扫地、擦桌子、打扫实验室（实训室）等一些传统的体力劳动，这些内容不仅无法满足新时代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需求，还向学生传达了错误的劳动教育观念，难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二）设计不够完善

目前，多数院校的劳动教育课程仍以通识选修课的形式存在，教学实施主要依托在线学习平台。学生仅需选修相关课程并取得至少 1 学分，即可达到基本修读要求。从形式上看，学校确实开设了劳动教育类课程，每位学生也都完成了至少一次学习。然而，线

（上接 03 页）

建工作创新初探 [J]. 新丝路（下旬刊）,2023(02):184-186.

[4] 王祺涛 . 新形势下国有企业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路径探析 [J]. 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 ,2025(02):188-190.

[5] 黄齐梅 . 新形势下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开展现状与思路创新 [J]. 大众文摘 ,2024(11):15-17.

[6] 张怡铭 . 新形势下国有企业党建宣传工作的创新路径探索 [J]. 区域治理 ,2023(35):4-7.

（作者单位：伊春鹿鸣矿业有限公司）

上教学模式往往局限于视频观看、答题等被动学习方式，缺乏动手实践和真实劳动体验，导致学生难以真正理解劳动价值、培养劳动精神。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该类课程缺乏系统性的顶层设计，未能与中医药专业教育有机融合，容易陷入形式化、简单化的困境，尚未构建起“理论教学—实践锻炼—科学评价”三位一体的育人闭环，限制了劳动教育实效的发挥[3]。

（三）师资力量薄弱

劳动教育开展遇到的主要困难就是师资队伍力量薄弱、缺乏专业性强的教师。目前大多数中医药院校劳动教育教师主要是思政课老师、辅导员等，且某些中医药院校在劳动教育实施的过程中缺少统一的组织和管理，劳动教育多由不同学科的教师、不同部门的人员在开展其他活动时顺带进行。即使一些中医药院校已经配备了专职人员，但由于其在开展工作时大多基于个人认知和经验，往往只是机械沿用过去的教育管理模式，未能结合当前的实际需求对原有模式及理论内容进行创新。这导致现有的劳动教育体系长期未能更新，理论与实践内容均缺乏创新性。因此，要切实提升劳动教育质量，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师资队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4]。

（四）实践环节薄弱

对于中医药院校的学生而言，实践是检验理论知识、提升动手能力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然而，目前部分院校的实践基地资源仍较为有限，学生进入社区、医疗机构等场所开展社会实践时，往往面临程序繁琐、审批流程长、名额受限等问题。这些现实条件严重制约了实践活动的覆盖面和参与度，导致大量学生难以获得系统且充分的实操体验。这不仅影响了其专业技能的有效锤炼，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劳动教育体系的顺利推进。

二、中医药院校党建引领劳动教育的路径探索

中医药院校在党建引领劳动教育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和路径。通过党建与劳动教育的深度融合、依托中医药文化资源开展劳动教育、搭建多样化的劳动教育实践平台、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引领劳动教育风尚、加强劳动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与劳动教育制度的完善等路径，中医药院校可以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劳动教育体系，为培养高质量中医药人才提供有力支撑。

（一）党建与劳动教育深度融合

自 2006 年以来，党建引领理念持续深化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其提升至新高度，明确“强化基层导向”的战略部署[5]。通过党建引领与劳动教育相结合，构建“党建＋劳动教育”的中医药特色课程体系，该体系以党建引领为轴心，以“专业实践夯基、思政教育铸魂、文化浸润固本”为支柱，通过制度保障、课程重构、载体创新三个方面，形成具有中医药特色的“党建 + 劳动教育”课程。

该教育模式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将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劳动实践深度融合，通过专业课程改造和文化浸润，既强化学生的专业能力，更培育其勤劳动、担使命的精神品格，为培养新时代中医药人才、服务健康中国战略构建了特色化育人路径，对于培养兼具工匠精神与社会责任感的新时代中医药人才具有深远影响。

（二）依托中医药文化资源开展劳动教育

中医药院校在开展劳动教育时，要充分体现中医药特色，充分利用中医药文化资源。首先，我们要明确中医药院校的特色，思考如何把这些特色融入劳动教育中。例如，可以将李时珍尝百草等名医事迹中的中医药劳动价值观融入思政课，通过草药种植、炮制实践等在专业课程中融入劳动教育，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精神，利用新媒体宣传中医名家的劳动故事，营造崇尚劳动的校园文化，通过这些方法可以把中医药特色与劳动教育相结合，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其次，我们要充分地利用现有的中医药文化资源，设立劳动教育实践基地，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平台。比如，利用药植园让学生参与种植与采收[6]。

（三）搭建多样化的劳动教育实践平台

与其他教育形式相比，劳动教育独树一帜，它直接关联着工作与实际生活的广阔天地，其独特魅力在于能够在更加宽泛且具体的实践环境中，巧妙地融合“内在修养的培育”与“外在技能的锤炼”，实现劳动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的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理论的学习可以指导学生顺利开展实践活动，使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实现自我价值；实践活动为理论学习的开展提供丰富的素材和动力，让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培养勤俭、奋斗、创新、奉献的劳动精神。劳动教育涵盖价值教育和实践教育两个方面，其中实践教育需要依赖空间平台才能实现。中医药院校有着丰富的实践平台资源，应充分应用其校内外资源，搭建多样化的劳动教育实践平台。比如，中药材种植基地、中医药炮制车间、中医药文化体验馆等校内平台，以及制药企业、医疗机构等校外平台。通过组织学生参与实际的生产、研发、医疗等工作，让学生在实践中锻炼能力、提升素质。

（四）推进劳动教育整体格局的构建

劳动教育承担着培育学生正确劳动观、价值观的重要使命，师资队伍的培养尤为重要，既关乎教育方向的政治属性，也决定劳动育人的实际成效，需从政治引领、能力提升、制度保障等多维度协同推进。

劳动教育要取得成效，教育制度的完善也不可或缺。教育制度的制定既是落实“五育并举”的关键举措，更是回应新时代“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核心命题，为大学生成长为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制度支撑。

三、中医药院校党建引领劳动教育的策略建议——以河南中医药大学为例

（一）强化党建引领，明确劳动教育方向

中医药院校应强化党建引领，将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将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劳动教育目标结合。河南中医药大学通过构建“党建 +”新模式，将劳动教育纳入工作中，形成深度结合体系。学校后勤服务中心总党支部联合学生党支部开展“同心育人，劳动先行”主题党日活动；医学院本科生党支部则利用“劳动教育月”的契机，联合医学院思政社团、学生实践团队等，共同开展“践行劳动教育，助力乡村振兴”主题党日活动。学校党委要统筹劳动教育工作，从后勤保障、资金支持、师资队伍建设等多个方面构建多部门协同治理体系，确保劳动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7]。

（二）创新劳动教育模式，打造特色课程与实践平台

中医药院校可以依托学校中医药特色学科专业建设，将生产劳动与教学实习、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创新创业、中医药文化传承有机融合，形成具有高等中医药院校特色的劳动教育模式。河南中医药大学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三全育人”“五育并举”工作理念，注重将劳动教育融入日常教学中，通过开设劳动教育课程，采取线上理论课和线下实践课相结合的方式，为学生提供更深层次的劳动理论教育和实践机会。除此之外，积极组织学生深入参与中药材的种植、采收、炮制及配伍等实践环节，使学生在劳动中深刻理解中医药文化的深厚底蕴，增强对专业传统的认同感与自豪感。

中医药院校应进一步加强中医药相关实验室、教学工坊及校内实践基地的建设，同时拓展与社区、农村、制药企业、康复机构等的合作，共同建设一批稳定、多样、开放的校外劳动实践基地。通过搭建生产劳动、专业实训平台，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元的劳动实践机会，从而有效助力其劳动精神的培育和综合实践能力的提升。

（三）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劳动教育质量

对于中医药院校而言，相较于其他类型的院校劳动教育人才队伍较为缺乏。中医药院校应该从具体情况出发，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河南中医药大学依托“中医诊断学”“方剂学”等课程，发挥课程思政育人功能，挖掘教材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色，融入教学设计，提升学生的医学人文素养，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第一，打造以辅导员、班主任为核心，思政教师、实践导师为支撑的劳动教育团队，实现劳动教育理论课和实践课的完美结合。第二，定期组织安排相应教师进行培训，强化教师的正确认知，纠正错误，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第三，建立合理科学的教师评价体系，对于能力欠缺的教师直接淘汰，防止对学生的指导造成错误，对于优秀的、学生评价高的教师应给予相应奖励，以激发教师的积极性。第四，加强校际交流与合作，分享劳动教育经验，共同提升劳动教育质量。

（四）完善保障体系，确保劳动教育实效

高校劳动教育保障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开展高校劳动教育的前提和基础，对于中医药院校来说也是如此。那么，要确保劳动教育的实效性，就要完善其保障制度。首先，学校党委要高度重视劳动教育工作，将其纳入学校整体发展规划，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劳动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其次，学校应重点支持劳动教育校内外实践基地建设，确保劳动教育的各个方面得到充足的基金支持。最后，对劳动教育开展效果等进行督查与评审，并建立奖惩机制，激励师生积极参与劳动教育实践活动。

四、结论与展望

中医药院校党建引领劳动教育体系的构建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的工程，必须始终坚持以党建为根本引领，深度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医药专业特色，着力培养具有工匠精神、社会责任感和创新意识的新时代中医药人才。学校应统筹全局，明确劳动教育在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定位，将其贯穿于各专业教学全过程。同时，要不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师的劳动素养与育人能力，充分发挥党组织在思想引导、组织保障和机制建设方面的核心作用，真正实现以党建引领劳动教育高质量发展，为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创新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参考文献

[1] 段妍君，朱澳拉，胡永千，等.“五育并举”中医院校劳动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J]. 时珍国医国药，2024,35(01):213-215.

[2] 韩雪，高鹏，崔向清，等. 医学生劳动意识现状与培养路径探索——以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为例 [J]. 中医教育，2023,42(06):65-68.

[3] 杨艳双，林燕，翟双庆，等.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专业劳动教育实践路径探析 [J]. 中医教育，2022,41(04):90-92.

[4] 张铮，秦玖刚，范真. 西医院校建立“中医药传承创新”劳动教育体系的路径研究——以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为例 [J]. 卫生职业教育，2023,41(20):74-76.

[5] 徐敏，陈宝玲，周玉杰，等. 中医院校劳动教育现状及优化路径 [J]. 西部素质教育，2024,10(24):101-104.

[6]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 [N]. 人民日报，2020-03-27(01).

[7] 李巧丽，孙海龙. 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3(01):89.

（作者：王鼎、李一凡、段枝燕、史丙晨，河南中医药大学；程柯，河南农业大学）

依托塔山红色资源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实践探索

李多彦

摘要：党性修养需以党性教育为必修课，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加强党性教育，学习党史是行之有效的途径之一，塔山红色资源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关键内容，具备重大的历史与现实意义。本文研究了如何借助创新“红色+”模式、运用互联网和高校教育等方式，增强党史学习教育成效，将塔山战役遗址、塔山精神等资源融入教育中，让学习内容更加生动，本文研究为新时代党史学习教育搭建了有效通道，旨在借助塔山红色资源的运用，增强党史学习教育的实际成效。

关键词：塔山；红色资源；党性教育；党史学习教育

塔山精神是在1948年辽沈战役中形成的，集中体现了“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勇于牺牲、敢打必胜”的革命精神，是鼓舞和激励后人不断奋斗的重要力量，彰显了共产党人不懈奋斗的崇高品质[1]。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载体，其具有深厚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我们要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发扬优良传统、赓续红色血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时代新风新貌。塔山精神所蕴含的具体历史事实和精神内涵，使塔山红色资源成为连接历史与未来的重要桥梁，是当前党史学习教育中的关键载体。将塔山红色资源融入党史学习教育，需通过走进史实、摆清事实、讲好故事，引导广大党员在鲜活的史实面前去深刻感知、体会塔山红色资源的内涵本质和价值意蕴。

一、塔山红色资源与党史学习教育融合的适配性

（一）塔山红色资源是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效果的特色教材

鉴于塔山战略地位特殊，在解放战争期间，其作为辽沈战役的关键防线，1948年10月10日至15日期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塔山阻击战正式开打，参战将士浴血奋战，成功阻挡了敌军的攻势，为辽沈战役胜利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筑牢根基，塔山精神至今依旧激励着新时代党员干部，是党性教育的关键内容。

利用塔山红色资源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不仅可让学习内容生动且有历史真实感，还可增强教育的感染力与实效性。新时代党员能从塔山战役的胜利经验中获得激励，从中汲取前行的力量，坚定理想信念，传承、弘扬塔山精神，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保持清醒与坚定[2]。只有全面挖掘、合理利用塔山红色资源，才能拓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内容与形式，强化教育深度、增强参与感，让党员更好地体悟中国共产党历经的艰苦卓绝斗争，领略革命先辈的英勇精神与力量。

（二）革命历史的见证与新时代奋进的力量源泉

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奋进发展的力量源泉，塔山红色资源见证了革命历史，具备深远的历史与现实价值。塔山战役是解放战争中的关键一役，其遗址和纪念馆存有大量历史遗迹与实物，如实展现了战斗的惨烈与艰辛，这些红色资源不仅是塔山战役光辉历史的见证者，更承载着革命先烈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作出的巨大牺牲，是党史学习教育中不可替代的重要载体。

塔山红色资源所具有的顽强拼搏与无畏牺牲精神，已成为党和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推动着共产党人坚毅前行。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中，塔山红色资源为党建注入持续精神动力。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稳住战略方向，从塔山红色资源中挖掘智慧和力量，坚定理想信念，强化执政本领，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支撑与行动指引。

二、红色资源的党史学习教育价值

（一）增强认知、深化初心与使命

塔山红色资源留存着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历史记忆，其核心价值在于唤醒新时代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初心与使命感。塔山战役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靠着坚定信念与顽强斗志，成功击退了敌

人的疯狂攻击，坚决守护住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这般百折不回的精神，鲜明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深入学习塔山红色资源，受教育者可更透彻地理解党在革命斗争中经历的重重艰难，以及党一直坚守的初心使命。这种深刻的认知，既能切实强化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还可引领广大人民群众更加坚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新时代的奋进征程中，激励人民坚守初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持续拼搏。

（二）坚定信仰、厚植爱党情怀

塔山红色资源既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关键见证，更是党百年奋斗历程中政治信仰与执政理念的鲜活展现。塔山战役期间，解放军将士面对极端艰苦的条件，不畏艰难、顽强战斗，以实际行动捍卫了党的领导与国家的安全，这种精神已深深融入党的历史血脉，成为新时代激励广大党员坚定信仰、厚植爱党之情的重要力量源头[3]。

受教育者深入钻研塔山红色资源，可更深刻地领会党的政治信仰和执政理念。这些红色资源借助鲜活的历史事件，呈现出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中的坚定信念与不屈斗志，使党史学习教育不单单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更切实地融入党员干部的思想。通过传承发扬塔山精神，进一步加深人民群众对党的认同与归属，增强爱党爱国情怀，巩固党的执政根基，让党永葆生机与战斗力。

（三）借鉴历史、汲取经验教训

党史学习教育将塔山红色资源纳入重要学习内容，其中包含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能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提供珍贵的战略参考与实践借鉴，塔山战役中的每一项决策、每一场战斗，都蕴含着深邃的智慧与战略谋划，通过深入研究这些历史资源，新时代共产党人能更明确地认识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正确路线至关重要，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高效地应对各种复杂挑战。

塔山战役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极端艰难处境下坚韧不拔的斗争意志和高超的战略规划水平，这种精神与经验对当下党和国家建设有着十分关键的现实指导作用。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对各种各样的风险挑战，塔山红色资源所蕴含的历史经验能为我们提供关键的战略指引，深入探究并灵活运用这些经验教训，能够助力党在新的历史征程上持续革新、实现跨越，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始终永葆强大的生命力与战斗力。

三、利用红色资源提升党史学习教育成效路径

（一）创新“红色 +”模式，激活党史学习教育资源

深入挖掘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方能合力谱写历史与人民相互映照的辉煌乐章。塔山的历史遗产，勾勒出时代的轮廓，其形态多样，红色资源在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留下了鲜明的烙印。开展“红色 +”探索行动，将塔山的红色文化财富与党史学习教育内容相融合，凭借其资料丰富和展示直观的特色，助力学习者多角度把握党史精髓。

借助塔山战役遗址等实物红色遗产所见证的历史瞬间，将红色旅游的理念与实际相结合，以党史学习教育为核心理念。各地依托塔山的历史文化底蕴，细致挖掘教育基地的潜力，全面拓展“红色历史遗迹”“革命先辈故居”等特色旅游内容。充分运用物质资源进行开发，细致编排红色旅游特色行程，让塔山战役的历史与革命精神成为旅游体验的灵魂支柱，让游客在游览体验中深化对党史的情感联结。

对于塔山精神等非物质形态的红色资源，重点打造“红色 + 课程”“红色 + 图书”等“红色 +”品牌。编写“塔山精神”系列图书，弘扬塔山战役中的英勇精神；开设“塔山战役与中国革命”专题课程，通过系统教学，帮助受教育者感受塔山精神，回顾革命历史。塔山红色资源的丰富性和历史价值为党史学习教育提供重要内容支撑[4]。“红色 +”模式的有效运用，使党史学习教育的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生动，向受教育者深刻传达中国共产党在塔山战役中展现的伟大精神，增强党史学习教育的实际效果。

（二）依托互联网，开创党史学习教育阵地

在当下，众多新型传播途径广泛运用，我们应借助塔山红色资源的力量，凭借网络平台之力，将党史学习教育与学习、生活及工作各环节紧密结合，使其影响力与渗透力显著增强，形式也更加生动和富有活力。传统的党史学习教育模式略显单一，主要活动包括理论研讨与课堂教学，往往使学习过程变得枯燥。塔山的红色文化资源内涵丰富、形式多样，其特色不仅限于诸如战役遗址、纪念馆等实体形式，此外红色影视及影像资料也展现了其丰富面貌。借助互联网资源，以塔山红色资源为支撑，全力挖掘并运用高效的教育教学新策略尤为必要。

全力借助网络线上这一主阵地，依托“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抖音、快手等平台，搭建塔山战役专题教育模块，将塔山精神的历史背景与实际案例相结合，打造极具吸引力的党史学习教育形式，通过这些平台广泛传播，增强党史学习教育的曝光与影响力，带动更多人参与学习。搭建线上互动式学习平台，凭借塔山战役历史场景以及相关资料，设计虚拟展览、在线互动课程等样式，助力受教育者在互联网空间体验塔山战役的历史氛围，在虚拟场景中再现塔山战役的关键时刻，从而更直观地领会党史重要事件及其背后的精神内涵。

以“内容至上”原则为指引，保障党史学习教育在互联网平台充分发挥功效，塔山红色资源作为党史学习教育重要内容，经精心规划和打造，让其更加契

合受教育者的需求与兴趣，呈现塔山战役的历史意义，扩大党史学习教育的覆盖范围并提升影响程度，使受教育者在全新学习体验中深刻感受塔山精神的磅礴力量。

（三）聚焦高校教育，改进党史学习教育主渠道

高校身为知识传播与人才培养的关键场所，要充分运用塔山红色资源，让党史学习教育“实”“重”“活”起来，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融合，加强塔山精神的传承与弘扬，把塔山红色资源融入理论教学，并与思想政治课程深度融合，通过塔山战役的具体事例，深挖其所蕴含的革命精神和历史经验，助力学生领会党在革命战争中的艰难困苦以及塔山精神的深刻意义，“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运用塔山战役的相关影视资料和历史文献，提升课程的生动性与感染力。

各地高校须总结本地红色资源特点，开设特色课程，以塔山红色资源为依托开发专题教学内容，开设“塔山精神与新时代青年”课程，利用专题讲座、课题研究等形式，引领学生在研习塔山战役历史期间，体会塔山精神在新时代的意义与价值，这类课程既强化了学生的爱党爱国情怀，又能有力支持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依托校园文化建设，让党史学习教育“重”起来，把塔山红色资源元素融入高校校园环境，营造出具有红色文化特色的校园氛围。

借助新型平台，加强对塔山红色资源的高效利用，构建线上线下协同推进的全方位党史学习教育途径，利用虚拟现实（VR）等现代科技手段，再现塔山战役的关键场景，使学生于虚拟体验中体会历史厚重与现实的紧密关联。同时，利用校园广播、网络专栏等途径，全面宣传塔山红色资源和党史学习教育内容，促进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高校需充分挖掘并利用塔山红色资源，借助多种形式和途径，革新党史学习教育模式，让学生在实践中体悟历史、传承精神，把塔山精神转化为自身发展动力，实现党史学习教育既见实效又有长效。

（四）深化基层实践，构建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机制

基层党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落实党史学习教育的“最后一公里”。传统的基层党史学习教育往往存在形式单调、持续性不强、实效性不足等问题，难以充分发挥塔山红色资源的教育作用。将塔山红色资源融入基层党组织建设，建立健全常态化长效化的学习机制，使党史学习教育真正扎根基层、深入人心，成为提升基层党组织战斗力的重要途径[5]。

探索建立基层党组织与塔山红色教育基地的协同育人模式。各级基层党组织可与塔山战役纪念馆、革命遗址等签订共建协议，形成稳定的教育合作关系。定期组织党员前往教育基地开展沉浸式学习，通过实地参观、现场教学、重温入党誓词等方式，让党员在塔山战役发生地亲身感受历史的厚重与精神的力量。建立“党员活动日”制度，将塔山精神学习纳入组织生活常态化内容，通过观看历史影像、开展专题研讨、分享学习体会等形式，使党史学习教育真正成为基层党组织的日常必修课，在潜移默化中强化党员的理想信念和党性修养。

组建一支扎根基层的党史宣讲队伍，是促进党史学习教育纵深推进的关键要素，凭借塔山红色资源，打造由党史研究者、革命后代、基层优秀党员、退役军人等组成的宣讲团队，打造专业性与群众性相契合的宣讲力量，开展针对宣讲员的系统培训，让其充分掌握塔山战役的历史背景、战斗进程、英雄事迹和精神要义，拥有把历史故事讲得扣人心弦的能力。促使宣讲员深入社区、企业、农村等基层一线，将塔山精神送到百姓身旁，积极创新宣讲方式，采用情景党课、红色故事会、互动式教学等方式，强化宣讲的感染力与说服力，让受众在生动讲述中体悟塔山精神的时代意义。倡导基层单位发掘本地区投身塔山战役的英雄人物和感人事迹，打造有地方特色的党史学习教育素材，持续充实资源库内容，构建起互联互通的资源共享网络，拓展塔山红色资源的覆盖广度和影响深度，助力党史学习教育在基层扎根生长、取得实效，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基层治理能力筑牢思想根基、注入精神动力。

四、结语

塔山红色资源为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宝贵的资源支撑。通过对塔山红色资源的深入研究，可以使党史学习教育内容更加丰富多样，实践效果更加显著。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应从这些红色资源中汲取力量，坚定信仰，厚植爱党情怀。未来我们将继续探索党史学习教育的有效路径，激励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前行。

参考文献

[1] 王艳 . 伟大精神引领时代振兴——浅析葫芦岛日报《塔山精神永放光芒》特刊的创新表达 [J]. 记者摇篮 ,2023(12):15-17.

[2] 高燕飞 , 郭金玉 . 传承篇“塔山魂”，一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集结 [J]. 父母必读 ,2024(07):28-31.

[3] 李学斌 , 王梓旭 , 李晓旭 . 传承“塔山精神”，提升青年素养 [J]. 当代电力文化 ,2023(07):34-35.

[4] 许化志 , 蒋志红 . 弘扬塔山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J]. 辽宁教育 ,2021(14):26-28.

[5] 陈妍 , 纪哲 , 李莹 , 等 . 不负初心践使命 接续奋斗谱华章 [N]. 朝阳日报 ,2024-07-02(02).

（作者单位：中共葫芦岛市连山区委党校）

地域文化与高职院校党建文化融合路径研究
——以衢州市南孔文化为例

骆黎阳

摘要：地域文化与高职院校党建文化融合发展，是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时代需要，是提升高职院校党建工作质效的关键举措，也是实现高职院校“德技并修”育人目标的有效路径。文章以衢州市南孔文化为例，探析其与高职院校党建文化融合发展的价值意蕴和逻辑关系，并从加强思想建设、创新组织生活、健全制度体系、搭建平台载体、打造党建品牌、繁荣校园文化等六个方面构建融合路径，为有力推进地域文化与高职院校党建文化融合发展提供实践指引。

关键词：地域文化；衢州市南孔文化；高职院校党建文化；融合发展

一、引言

衢州市南孔文化是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与地方文化相融合的特色文化[1]，具有重要人文价值、时代价值与实践价值[2]。高职院校党建文化是在高职院校党的建设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政党属性、高校特征和文化内涵的文化类型，是高职院校各项事业的思想引领。两者融合发展既是加强新时代高职院校党建工作的关键之举，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地域文化与高职院校党建文化融合发展的价值意蕴

（一）是坚定文化自信，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时代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衢州市南孔文化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干儒家文化，植根于衢州地方实践，具有重要的文化地位、独特的文化价值和丰富的社会内涵。高职院校党建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脉相承，具有特殊的铸魂、引领、凝聚、规范等作用。从文化本质上看，衢州市南孔文化与高职院校党建文化同属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范畴，两者融合发展是践行“两个结合”的生动实践，有助于激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从而引导党员师生坚定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认同、增强思想自觉。

（二）是摆脱现实困境，提升高职院校党建工作质效的关键举措

当前我国高校党建文化建设在发展实践中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也存在思想观念滞后、方式方法单一、育人范围较窄、育人合力不足等问题[3]。地域文化与高职院校特别是地方高职院校有着天然的地缘与情感联结。孔氏南宗在近九百年的时间里，形成了自己的南孔家庙、宗族形态、文化传统与教育方式。衢州市在此基础上，提炼形成“南孔圣地·衢州有礼”文化品牌。古今融合孕育出的衢州市南孔文化是可触、可感、可参与的鲜活教育资源，将其创造性融入高职院校党建文化，能够有效打破传统党建工作的路径依赖，为“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党员教育管理等注入地域特色与蓬勃朝气，推动党建工作从“被动参与”向“主动吸引”转型，切实提升党建工作的针对性、亲和力与感染力。

（三）是坚持立德树人，实现高职院校“德技并修”育人目标的有效路径

高职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目标在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工匠精神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党建文化在高职育人体系中居于核心引领地

位，而地域文化则为党建文化实现价值引领提供了多元载体和有力支撑。衢州市南孔文化中“忠诚爱国”“经世致用”“崇学尚礼”等精神特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职业教育所追求的工匠精神高度契合，将其融入高职院校党建文化共同发展，既是对两者与生俱来的思想政治教育属性的一脉相承，也是南孔文化的精神内涵、人文素养与党建文化的思想引领、价值传导的有机结合，能够使思想政治教育更接地气、更具象化，推动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的深度融合，真正实现“德技并修、全面发展”的育人目标。

三、地域文化与高职院校党建文化融合发展的逻辑关系

（一）文化内核高度契合

一是基础原理和研究方法契合。衢州市南孔文化拥有大量儒家文化中的朴素唯物论、辩证法，与高职院校党建文化中蕴含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具有深厚的渊源和强大共通性[4]，能够帮助党员师生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二是家国情怀与政治认同契合。孔氏南宗虽历经“孔洙让爵”后的地位变迁，但始终爱国，立志报国。社会稳定之时，他们注重教养，体贴民情，致力改善士风、民风；社稷危亡之际，他们殚精竭虑，希图通过努力有补于时[5]。这种将家族命运与国家兴衰紧密相连的意识，与党建文化强调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政治要求内在相通。两者融合发展，有助于筑牢师生党员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的文化根基。三是平民教化与群众路线契合。“孔洙让爵”之后，南孔族人开始以各种形式推动平民教育的发展[6]。这种“面向平民、服务地方”的教育实践，与党的根本宗旨和群众路线，在价值取向上高度一致。两者融合发展，有助于强化高职院校党建工作中服务师生、赋能地方的文化价值导向。

（二）文化功能双向赋能

一是地域文化为高职院校党建文化发展注入动能。衢州市南孔文化传承儒家文化在三衢大地近九百年的历史演变，历经衢州城市改革发展四十余年的生动实践，其文化载体、历史叙事、人物典范等，都能为高职院校党建文化发展提供鲜活的育人素材和丰富的教学场景，使抽象的党建理论、党性原则与具体、可感的地方文化叙事相结合，引导党员师生在理解地方历史文脉中，增进对党建文化的情感认同，在文化浸润中筑牢信仰之基。二是高职院校党建文化为地域文化传承指引方向。地域文化中可能存在与时代发展不适配的成分，需要以先进文化对其进行引导和扬弃。高职院校党建文化所秉持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能够为衢州市南孔文化的现代化阐释与转化，指明正确前进方向，提供根本理论遵循。

（三）文化使命同向同行

无论是地域文化的成风化人，还是党建文化的政治引领，都肩负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重要使命。衢州市南孔文化的重要价值在于其“德才并育”的教育理念与实践，强调“为人与为学、为人与为事的有机统一”。如孔子第 64 孙孔尚遂在任乐清县学训导期间，德才并育，尤为注重品德修养，营造了良好的教风、学风，培育了大批人才[7]。高职院校党建文化的核心任务是确保育人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切实回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性问题，引领高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衢州市南孔文化与高职院校党建文化在“育人”目标上方向一致，两者融合发展，能使双方的文化优势更好作用于学生的成长成才，从而提升学生培养质效。

四、地域文化与高职院校党建文化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

（一）加强思想建设，树立融合发展育人理念

一是深化理论学习与研究。将衢州市南孔文化研究纳入学校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学习和研究计划。组织党员干部、思政课教师、思政辅导员、党务工作者等系统学习南孔文化的历史脉络、核心精神与当代价值，邀请儒学专家、南孔后裔等举办专题讲座。如衢州职业技术学院邀请孔子七十六代嫡长孙为师生作“南孔文化与浙江精神”专题讲座，将南孔文化与立德树人有机融合，切实增强思政育人的实效性。二是开发融合课程与读本。将衢州市南孔文化融入思政教学，鼓励教师充分挖掘南孔文化育人元素，开发诸如“南孔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儒家伦理与职业精神”等特色选修课。编撰《南孔故事汇》《南孔家风与党员品格》等通俗读本或案例集，作为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等教育培训的辅助教材。

（二）创新组织生活，夯实融合发展实践根基

一是打造沉浸式主题党日。将组织生活场所搬到衢州市南孔文化地标，让党员师生在可感可触的现实场景中接受教育熏陶。如在孔氏南宗家庙开展“感悟南孔文化 厚植家国情怀”现场党课，在中国儒学馆组织“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发展”专题研讨等。二是设计多元化活动载体。围绕衢州市南孔文化元素，设计形式多样的组织生活。如举办“南孔经典诵读分享会”，结合《论语》等典籍探讨党员修身之道；组织观看音乐剧《南孔》等优秀文艺作品，研讨传统礼仪的现代价值与党员行为规范。三是开展服务性实践锻炼。组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投身衢州市南孔文化传承的社会实践。如担任南孔家庙义务讲解员、参与“南孔文化进社区”公益宣讲等，在服务奉献中深化对地域文化的理解，切实践行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

（三）健全制度体系，强化融合发展长效保障

一是纳入学校规划考核。高职院校党委应将衢州市南孔文化与党建文化融合工作，纳入学校党建工作总体规划和年度工作要点，明确牵头部门、责任分工与目标任务，设置考核指标，形成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二是完善协同联动机制。建立由组织部、宣传部、马克思主义学院、学工部、团委以及相关教学单位共同参与的校内协同工作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策划重大融合项目。加强与衢州市委宣传部、衢州市南孔文化发展中心等地方单位的联动，建立校地合作长效机制，实现资源共享、项目共推。三是健全资源保障制度。在学校党建工作经费中设立专项经费，支持地域文化与党建文化融合发展的课程开发、活动开展、课题研究、基地建设等。对教师参与相关工作的业绩进行认定，充分激发个体参与文化融合发展的积极性。

（四）搭建平台载体，拓宽融合发展多元渠道

一是打造线下活动阵地。在校内设立“南孔文化与党建文化融合创新工坊”“南孔儒风育新人辅导员工作室”等平台，作为理论研究、课程研讨、成果展示、小型活动的专门场所。二是拓展数字网络载体。依托微信公众号、抖音、B站等用户活跃度高的新媒体平台，推送南孔文化和党建文化融合性的学习资料、微课视频、活动资讯等。基于VR、AR等技术，开发“云游南孔家庙”“沉浸式祭典体验”等虚拟仿真项目，让师生随时随地接受先进文化熏陶。三是共建校外实践基地。加强与孔氏南宗家庙、中国儒学馆等交流合作，共建一批南孔文化与党建文化融合发展的校外实践基地，挂牌设立学校“文化传承实践点”“师生党员教育培训现场教学点”等，为常态化开展现场教学、志愿服务、社会实践提供固定场所。

（五）打造党建品牌，塑造融合发展特色优势

一是培育品牌项目。鼓励各二级学院党组织将衢州市南孔文化内涵，与学院专业特点相结合，共同融入学院“一院一品”项目创建。如师范类学院可打造“南孔先锋”党建品牌；机械类学院可培育“红色儒匠”党建品牌，以品牌创建引领南孔文化与党建文化深度融合。二是设计特色活动。策划举办年度性、有影响力的特色活动。如开展“南孔文化节”系列活动，将其打造为全校性的文化盛事和党建文化建设重要抓手；举行“南孔精英”评选表彰活动，挖掘和宣传在文化传承、服务地方中表现突出的师生党员典型。三是加强成果凝练。及时总结融合实践中的成功案例、有效模式与理论成果，通过申报课题、发表论文、出版著作、举办研讨会、媒体报道等方式进行提炼和推广，不断提升学校党建文化内涵与社会影响力。

（六）繁荣校园文化，营造融合发展浓厚氛围

一是加强文化浸润。将衢州市南孔文化元素融入开学典礼、党员表彰大会等校园仪式中，增强仪式的文化底蕴与教育意义。在校园景观建设中，设立孔子像、有礼墙等可视化南孔文化符号，在图书馆放置“南孔爷爷”文创产品等，持续营造文化融合发展氛围。二是打磨优秀作品。支持师生围绕衢州市南孔文化进行文学创作，如撰写《树南孔新风 立时代之志》等“8090+”新时代理论宣讲作品；编排话剧《孔洙让爵》、创作歌曲《南孔颂》等文艺作品，使师生在理论创作和审美体验中受到感染和教育。三是形成发展合力。强化党建引领，带动工会、共青团等群团组织，马克思主义学院、各二级学院等教学单位，以及学工部、教务处等相关部门，共同参与南孔文化与党建文化融合发展的实践中，从而凝聚起全校强大发展合力。

五、结语

衢州市南孔文化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鲜明的时代价值，将其与高职院校党建文化融合发展，能够提升高职院校党建工作的文化品位与育人实效，也为地域文化的校园传承与时代创新开辟了新路。这一创新之举需在深度、广度与长效机制上持续探索，使地域文化与高职院校党建文化融合发展之路行稳致远，从而真正践行文化育人的使命。

参考文献

[1] 衢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 衢州市南孔文化传承发展条例 [EB/OL].(2024-09-10)[2025-05-04]. https://www.quzhourd.gov.cn/flfg/laws/laws_article/cf8860fa0acf11f0ade400163e020ba7.

[2] 成鸿静 , 王其旗 . 南孔文化的内涵阐释和现代价值探析 [J]. 西部学刊 ,2025(01):112-115.

[3] 秦在东 , 丁琳 . 高校党建文化建设现状及其对策研究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3(03):53-56.

[4] 陈敏 , 鲁力 . 论儒家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J]. 理论学刊 ,2015(01):118-124.

[5] 吴锡标 . 孔氏南宗的文化内涵及其传承机制 [J]. 探索与争鸣 ,2012(11):86-90.

[6] 吴锡标 . 孔氏南宗的平民化及其当代启示 [J]. 探索与争鸣 ,2013(11):74-77.

[7] 桐乡孔氏宗谱 : 时乘公传 [M]. 刻本 .[出版地不详]:[出版者不详], 清光绪三十三年 [1907].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浙江省高职院校党建研究会2025年课题“地域文化与高职院校党建文化融合发展研究——以衢州市南孔文化为例”（2025B36）。

（作者单位：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工匠精神融入高职院校学生党支部党建工作体系研究

辛文宇　王清平

摘要：高职院校学生党支部是党联系广大青年学生的重要桥梁，将党支部工作与工匠精神紧密结合，具有更新更高的立足点。本文围绕高职院校学生党支部党建工作与工匠精神的融合展开论述，以挖掘二者的内在契合点为切入点，剖析二者在理念、目标、实践以及价值观方面的联系，说明工匠精神对党建政治、组织、服务功能所起到的赋能效用。针对当前高职学生党支部党建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搭建“树匠心、提匠艺、立匠新”三维工作体系，对理论学习、技能提升、品牌建设等实施途径进行细化。旨在为增强高职党建育人成效、培育兼具工匠精神与党性修养的学生党员提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工匠精神；学生党支部；高职院校

高职教育肩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核心使命，学生党支部作为落实这一使命的关键所在，党建工作的质量直接影响着高素质人才的培养方向。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对既有精湛技能又有责任担当的人才需求极为迫切，工匠精神中的敬业、精益特质，本就和高职党建培育合格党员的目标高度契合。在开展学生党支部党建工作的过程中，工匠精神作为一种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的价值追求，为高职院校学生党支部党建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1]。但是，一些高职学生党支部依旧存在不少问题，难以跟上时代步伐。因此，探索把工匠精神融入党建中的体系与路径，对提高高职院校党建质量、推动学生成长为产业所需人才意义重大。

一、工匠精神融入高校党建工作的政策导向与时代呼唤

从政策层面来看，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与日俱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等文件明确提出要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而工匠精神作为技能人才的核心素养，自然成为政策落地的重要抓手。近年来，从“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倡导到党建“双创”工作的推进，在政策层面不断释放出“党建引领＋工匠精神培育”的融合信号，要求高职院校将育人与育德、技能与党性紧密结合，这为工匠精神融入学生党支部党建工作提供了清晰的方向指引和有力的政策支撑。从时代背景来看，产业升级浪潮下，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早已超越单纯的技能层面，更看重精益求精的态度、敬业奉献的担当和持续创新的能力。高职学生作为未来产业一线的主力军，其党性修养与职业素养直接关系到行业发展和国家建设。当前，青年学生面临着多元价值观的冲击，部分人存在浮躁功利、急于求成的心态，而工匠精神所倡导的专注坚守、踏实务实，恰好能为党建工作提供鲜活的价值滋养，帮助青年党员在专业成长中坚定信仰，在职业追求中践行初心。这种融合既是响应国家“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召唤，也是顺应时代对高素质复合型人才需求的必然选择。

二、工匠精神与高职院校学生党支部党建工作的内在契合性

（一）在理念层面

工匠精神讲求的“精益求精、专注坚守”，与高职学生党支部党建工作追求“深耕思想、筑牢根基”，从本质上说都是对“内涵扎实”的相同追求。前者不满足于仅掌握技艺的皮毛，而是沉下心研磨每一处细节，拒绝浅尝辄止的浮躁；后者不满足于思想教育仅以形式化方式开展，而是要让理论切实融入党员的认知当中，夯实信仰根基。两者均以“扎实深入”为核心衡量标准，只有经过长久投入才能实现各自核心目标，形成重实效、轻表面的共同理念底蕴。

（二）在目标层面

工匠精神着重于培育契合产业需求的高素质技能

人才，高职学生党支部党建工作的核心是造就可扛起责任的合格党员，看起来侧重点有别，实际上在“育人导向”方面达成了相同的合力。前者既需使学生练出扎实过硬的技艺，还需培育严谨的职业操守；后者一方面要引导学生树立起坚定的理想信念，又要培育主动担当的观念，而这一切最终都朝着“人的全面发展”迈进。不管是借工匠精神打磨职业能力，还是靠党建工作提升思想觉悟，都服务于高职院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根本使命，二者目标高度契合。

（三）在实践层面

工匠精神绝非纸上谈兵，而是在实践中锤炼、在行动中提升，高职学生党支部党建工作也不是单纯的理论宣讲，而是以实践为载体、用行动践初心，二者实践路径天然契合。在高职教育的情境中，党建工作可通过实践活动融入工匠精神，让党员在专业实操当中培育出“专注务实”的特质；党建实践也能从工匠精神中获取“脚踏实地、重细节”的方法支持，使党建工作不脱离实际，紧密贴合学生专业学习与成长日常，避免空泛化倾向。

（四）在价值观层面

工匠精神所强调的敬业、精益、创新和奉献的价值观与学生党支部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通过培养具有工匠精神的学生党员，可以进一步强化党支部的价值观教育，提升学生的道德水准和社会责任感[2]。培育拥有这般工匠精神的学生党员，可使党支部价值观教育摆脱空洞说教，把抽象的要求变成具体的行为准则，切实提高学生道德认知与实践能力，让社会责任感从意识层面落实到日常行动中，让价值观教育真正有温度、见实效。

三、工匠精神在高职院校学生党支部党建工作中的赋能作用

（一）精益求精

工匠精神在高职院校学生党支部党建工作中具有重要的赋能作用，能够提升学生的政治素养、强化政治意识、提升政治能力、强化政治纪律、推动党支部政治功能的发挥，以及培养党员的政治责任感[3]。比如，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可使学生党支部的政治功能摆脱“形式化”的误区，更着重于政治引领的深度与精确性，保证每位党员都能精准把握政治方向、明晰政治责任。这种追求，可助力党支部夯实政治根基，让政治功能真正成为引领党员思想、约束党员言行的关键支撑，而非仅作为流于表面的政治任务。

（二）爱岗敬业

爱岗敬业的工匠精神，可为学生党支部组织功能增添向心力。就学生党员而言，学生党员会把这种精神转化成对于支部工作的责任感，参加组织生活时不再马虎对待，而是积极思索怎样让支部活动更具意义；承担支部事务不再推三阻四，而是用心对待每一项工作，文书整理和活动统筹都力求做到稳妥。践行“责任”与“坚守”，能够让支部组织生活更加规范有序，组织运转更加顺畅高效，还能让党员彼此形成相互促进的良好氛围，防止组织出现松散状况，让党支部切实成为有凝聚力、有号召力的集体，充分发挥组织育人效能。

（三）追求卓越

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可促使学生党支部的服务功能从完成向优质提升，不再停留在提供基础服务层面，而是会主动探究师生的实际需求、产业的真实诉求。比如在服务专业学习时，并非只是简单地组织交流，还会思索怎样整合资源助力党员攻克学习难关；在服务产业对接过程中，并非仅搭建平台，还会深入探究怎样让对接更好地契合行业需求。这种不甘于达标、一心求更好的态度，可使党支部服务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彰显党支部的服务价值。

四、工匠精神融入高职院校学生党支部党建工作的实施路径

（一）“树匠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1. 深学理论固初心

深入学习理论，挖掘党的创新理论与初心的内在联系，把抽象的理论转化成党员可实际感知的思想支撑。应结合工匠精神的“专注”，促使党员探寻理论对坚守初心的指导价值，明晰高职学生党员在专业和职业中践行初心的途径。

在开展学习活动之前，要先梳理党的创新理论中关于初心使命的核心要义，形成适合高职学生党员的重点学习内容。接着结合学生的认知特点，设计出“理论内涵加职业践行”的研讨方向。在学习过程中采用“逐段精读、小组辨析”的模式，让党员主动分享理论理解对初心认知产生怎样的影响。课后通过初心感悟记录，梳理学习过程中的收获，并定期组织心得交流活动，防止出现学过即忘的现象，以此确保理论真正内化为坚守初心的思想自觉。

2. 践行使命育匠心

履行使命就是把初心转变为实际行动，在行动中锤炼精雕细琢的匠心，而不是只喊口号。要把学生党员的使命分解成服务师生、参与支部建设工作、钻研专业知识等具体维度。用工匠精神“较真”的态度来把控行动质量，使每次使命的履行都成为积累匠心的过程，促成使命担当与匠心培育的双向融合[4]。

开展服务之前，需先明晰每类服务的质量标准，如对接师生需求做到“耐心倾听、及时反馈”，参与支部建设时要达成“流程清晰、细节到位”。行动期间指派专人记录过程中的问题和可优化之处，事后开展“复盘会”，剖析怎样改进可让行动更精准。把专

业学习融入使命践行的范围，要求党员在技能训练中秉持“高标准、严要求”，经过不断的行动锤炼，使匠心从意识变为日常习惯。

（二）“提匠艺”，有效提升党务工作能力

1. 精研培训强素养

精研培训针对学生党支部党务工作的实际痛点规划内容，做到按需施教，而非直接套用通用课程。要聚焦党务文书、组织生活设计、党员管理等关键环节，按照工匠精神的“精准”理念打造培训模块，使培训内容与工作需求直接契合，带动党员党务素养从被动接收，迈向主动应用。

先借助问卷、座谈的方式，梳理出支部近半年党务工作存在的难点，如“文书格式不规范”“活动设计吸引力弱”等，随后针对这些痛点开发专门的培训模块。各模块均运用“理论讲解加模拟实操”的模式，比如文书培训时先讲解规范，随后安排党员现场对典型问题文书进行修改，并让党员在 1 个月内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导师追踪指导并反馈改进建议。

2. 互学互鉴提技能

互学互鉴是要打通支部内外交流的屏障，针对党务工作的方法与思路做深度分享，而不是简单排列工作成果。要借助工匠精神的“开放”视野推动经验交流，促使党员把“怎么做”“为何这么做”“如何优化”讲透彻，让交流的过程实现技能互补、思路拓展，防止“闭门造车”导致技能固化。

支部可以开展跨年级和跨专业的党务技能交流活动，预先明确“党员管理流程优化”“组织生活创新思路”等主题，规定分享者按“问题、方法、反思”的内容框架准备。交流过程中设立提问互动环节，激励参与者探寻方法背后的逻辑。开展交流之后，发放技能适配评估表，引导党员结合支部实际状况，判断哪些方法值得借鉴。随后制定调整落地计划，比如借鉴别的支部活动形式时，应按照本支部党员时间安排对流程进行优化。

（三）“立匠新”，不断创新建立党建工作品牌

1. 创新载体塑品牌

创新载体是依据高职学生党员“重专业、近生活”的特点，规划品牌支撑形式，使载体成为品牌价值的具体呈现，而不是追求表面的新奇感。要依据工匠精神的可持续理念，规划载体，保障载体既可以体现出匠心内涵，又能贴合党员的实际需求，使品牌从仅有名称迈向有实质内容、具有广泛影响力 [5]。

先以问卷形式调查党员对党建活动的需求，如“希望结合专业技能”“希望活动形式更灵活”，而后围绕“专业 + 党建”“生活 + 党建”打造活动载体，如“技能练兵党小组”“宿舍党建服务岗”。运行时设立“动态优化机制”，每月收集党员参与活动的反馈信息，对载体细节作调整，如技能党小组可依据行业技术更新对练兵内容作出调整。同时，使载体的视觉标识与核心理念达成统一，借助持续输出让党员体会到品牌价值。

2. 融合产教创特色

产教融合是把校企合作资源充分融入党建品牌核心，使产教元素成为品牌独一无二的标识。不是简单“拉企业参与活动”，要凭借工匠精神的“协同”理念，推动校企党组织联动，找出企业工匠文化、实践资源与党建的结合之处，让品牌既彰显党建属性，又凸显鲜明的高职产教特色，避免同质化。

积极与校企合作单位的党组织对接，订立“党建共建协议”，清晰界定资源共享的方向，例如企业拿出工匠导师、实践项目，党支部提供党员志愿活动及理论学习助力。结合合作内容规划品牌特色模块，如“工匠导师讲初心”“企业项目党员攻坚”，定时安排党员到企业学习工匠文化，参与企业技术难题攻克。构建“产教党建台账”，对资源对接、活动开展、效果反馈等情况进行记录，每季度举行共建会议以优化模块设计，让产教融合不断为品牌注入独特活力。

综上所述，把工匠精神融入高职院校学生党支部的党建工作中，是新时代高职院校党建创新的关键方向。本研究打造的“树匠心、提匠艺、立匠新”体系，既紧扣党建核心要求，又贴合高职教育与工匠精神的特性，为攻克当前党建痛点、提升党建功能提供了有效途径。这样，可以提高高职学生党支部的凝聚力及战斗力，促进党建和育人工作的深度融合，助力培养既有工匠精神又敢于担当的学生党员，为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以及产业人才培养提供有力支撑。

参考文献

[1] 沈迪 . 工匠精神指引下的高职院校学生党支部书记工作探究 [J]. 就业与保障 ,2021(14):145-146.

[2] 安晓玲 , 宋寿剑 . 工匠精神赋能高职院校学生党支部党建品牌建设研究 [J].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4,24(03):31-34.

[3] 潘振宁 . 党建“双创”背景下高职学生党支部建设研究——以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J].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4,27(05):46-51.

[4] 毛泽戬 . 高职学生党建与管理工作协调机制的探究 [J]. 中国军转民 ,2024(12):194-196.

[5] 刘晓杰 , 蒋赟 . 党建引领高职院校学生工匠精神培育的逻辑和路径探析 [J]. 大学 ,2022(31):125-128.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成都市工匠文化研究中心课题立项课题“工匠精神融入高职院校学生党支部党建工作体系机制研究”（2025YB01）。

（作者单位：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红色资源在高校党建品牌建设中的作用机理研究

朱　璐

摘要：《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明确提出“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的要求，为高校党建品牌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红色资源承载着党的奋斗历程、革命精神，湖南作为革命老区，具有丰厚的红色资源与光荣的革命传统，可作为高校党建工作的宝贵财富，为高校党建工作、党建品牌建设注入新鲜活力，打造出具有区域特色和时代感召力的党建品牌。基于此，文章深入研究红色资源在高校党建品牌建设中的作用机理，探索红色资源融入党建品牌建设的实施路径，不断提升高校党建工作质量，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红色资源；高校；党建品牌建设

近年来，我国高校党的建设工作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高等教育与党建工作的融合成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趋势。在高校育人过程中，建设党建品牌不仅能够提高党组织的凝聚力与战斗力，更有助于落实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人才的目标。红色资源是党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中积累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其中蕴含的坚定信念、革命奋斗精神等内核，与高校党建品牌建设追求的价值理念具有高度契合性。因此，高校可深入挖掘红色元素的育人价值，将其融入党建工作中，逐步打造具有鲜明特色、深刻内涵的党建品牌，以不断提升高校党建品牌的影响力。

一、红色资源与党建品牌的概念

（一）红色资源的概念

红色资源是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形成的各类物质与精神形态的总和。红色资源既可以是能够感知、触摸的实体存在，也可表现为蕴含在物质载体中的精神品质、价值追求，因此，可分为物质形态与精神形态两种类型[1]。其中，革命遗迹、革命文物、纪念馆、烈士陵园等都属于物质形态的红色资源，具有直观性。而长征精神、抗战精神以及一些先进人物的奋斗故事、红色理论成果等等，都属于精神形态的红色资源，是引领思想、凝聚力量的关键。

红色资源始终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紧密相连，集中体现了党的初心使命、政治追求、理想信念，体现出鲜明的政治性特征，能够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认同。红色资源也具有历史性特征，承载着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奋斗的历程，引导人们回望历史、深刻感悟初心与使命。与此同时，红色资源蕴含的精神力量与价值也具有教育性，借助红色资源开展爱国主义、理想信念、党性政治教育等，提升学生思想水平，与党建工作育人目标相契合。

（二）党建品牌的概念

高校党建品牌是高校的党建文化的培育成果，是高校党组织根据自身实际，基于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纪律建设等维度，挖掘资源、创新工作方法与服务模式，进而打造形成具有辨识度、影响力的党建工作载体。高校党建品牌建设在品牌建设过程中，创新党组织活动形式、丰富工作内容，增强吸引力，使高校师生党员主动参与工作，增强凝聚力、战斗力，提升党组织活力。高校党建品牌建设需要与高校人才培养、科研工作等紧密结合，将党建工作与业务相融合，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业务发展的作用[2]。此外，高校的一切工作都以育人为最终目标，党建品牌建设通过组织品牌活动传播红色文化、弘扬正能量，使学生受到熏陶和引导，逐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落实高等教育的育人目标。

二、红色资源在高校党建品牌建设中的作用机理

（一）红色资源的政治引领作用

高校党建品牌建设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核心，

需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建设过程中红色资源能够发挥政治引领作用，红色资源中蕴含的坚持党的领导等政治理念，能够为党建品牌建设提供方向指引。高校在打造党建品牌过程中，深入挖掘红色资源中蕴含的政治元素，将政治要求融入品牌理念，如高校在依托当地抗日旧址、烈士故居等资源打造党建品牌时，明确品牌核心为“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确保党建品牌建设始终在红色资源政治引领下开展活动，避免工作方向出现偏差。高校发挥红色资源育人价值，将其融入政治教育中，提升师生党员的政治素养，在党建品牌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强党员的政治能力。如在党建品牌活动中，党员们重温入党誓词，开展政治分享会等，营造红色文化氛围，增强党员政治能力，在高校党建品牌建设过程中传播政治信仰，不断强化党员政治认同，充分发挥红色资源政治引领的作用与价值[3]。

（二）红色资源的实践驱动作用

高校党建品牌建设要想发挥真正作用，需要落实于实践层面，用实践检验品牌成效。红色资源具有较强的实践性，能够对党建品牌建设发挥实践驱动作用，增强党建品牌的实效性，深化品牌建设价值与成果。在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红色资源融入课程教学，推动党建品牌与教学的融合，打造如红色思政课程等品牌。如高校可组织开展红色文化研究性学习活动，引导学生在研究学习过程中加深对红色文化的理解，更加自觉地传承文化基因，提升学生综合素养，将党建品牌作为人才培养的载体。在高校科研工作中，以红色资源为中心开展研究活动，打造红色科研品牌，推动党建品牌建设与科研工作的创新融合。高校党员教师共同组建红色文化研究队伍，开展红色资源研究、保护，以及红色精神传承等课题实践与研究，这些实践活动既能产出科研成果，同时也能发挥党建品牌在科研领域的价值。此外，高校还可以依托红色资源提供各类红色服务，打造红色服务品牌，推动党建品牌与区域发展的深度融合。如高校与某红色教育基地合作打造红色文化宣讲品牌，高校党员学生在基地为参观者提供讲解服务，开展社会服务活动，扩大党建品牌的影响力[4]。

（三）红色资源的思想浸润作用

党建工作一直以思想建设为工作基础，高校党建品牌建设需要具备深厚的精神内涵，从而对师生的思想产生影响和引导，提升品牌效应。红色资源中蕴含的精神内涵能够发挥思想浸润作用，使党建品牌具有精神内核，真正地打动、影响师生。红色资源中包含丰富的革命故事，高校可以通过故事会或展播电影的形式，将红色故事资源融入党建品牌活动，让师生能够在故事中深刻感悟红色精神，体会红色文化内涵，使学生受到思想触动。红色资源的精神内核与高校大学生的情感需求具有较高的契合度，能够引起情感共鸣，如高校打造红色研学活动的党建品牌，学生在实践活动参与中产生情感共鸣，受到思想与情感的启发[5]。党建活动在对学生产生思想影响后，需要将精神引导转化为实际行动，使学生能够将红色精神融入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中，增强思想与行为的一致性。如高校在红色雷锋精神引导下，打造志愿服务党建品牌，组织大学生党员开展支教、社区助老等活动，学生亲身践行红色精神，深化红色精神感悟，有助于实现思想与行动的统一。

（四）红色资源的组织凝聚作用

在党建工作中，组织建设能够发挥保障作用，高校党建品牌建设需要在充分的组织支撑基础上推进，确保其效应的发挥。红色资源中的群众路线等组织经验为组织力量的凝聚提供支持，有助于强化组织支撑力，从而为党建品牌建设提供保障。高校运用红色资源实现党组织活动的创新，传统党组织活动多以会议、学习文件形式开展，较为枯燥，难以调动党员积极性。而红色资源的融入可以将党组织活动转变为红色基地参观、红色知识竞赛等形式，调动党员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增强组织凝聚力和党员的组织归属感。红色资源文化始终强调群众路线的工作理念，基于该理念高校探索打造党建服务品牌，如为生活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资助等，增强师生对党组织的信赖，不断扩大品牌影响力，强化组织向心力[6]。此外，红色资源能够为党建问题的解决提供依据和指导，鼓励党员在党建品牌建设中勇于突破难题、不断钻研奋斗，增强组织战斗力。因此，红色资源具有组织凝聚作用，在高校党建品牌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机理。

三、红色资源在高校党建品牌建设中的应用实施路径

（一）开设红色思政课程，落实人才培养目标

党建工作的根本在于政治建设，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核心。立德树人是当前高校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政治素养培育是重要培养内容，因此，政治建设与人才培养具有契合性。高校在党建品牌建设中通过设计红色思政课程的方式，实现政治建设与红色资源的连接，挖掘红色资源中的育人元素，将其作为政治教育素材，强化学生政治认同感，同时推进党建工作的政治建设，落实人才培养目标。

例如，高校基于政治建设与人才培养要求，优化红色思政课程体系，开设以“红色政治素养”为主题的通识课程，教学中可选取青年毛泽东在橘子洲头写下《沁园春·长沙》“问苍茫大地……”的案例，以及毛泽东同志在韶山开展农民运动等事迹，引导学生理解党的政治决策历程。挖掘湖湘地区的红色资源，以毛主席的事迹为例强化学生的政治认同。同时，课程也应与学生专业相结合，如学前专业教学中可将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第一师范的求学与育人实践作为红色

教育案例，将其融入“教育学原理”等课程中，培养提升学生的政治素养和专业能力。因此，将红色文化融入党建品牌建设过程中，以红色课程为载体促进人才培养与政治建设的共同发展，促进学生全面综合发展。

（二）构建科研协同平台，促进高校科研发展

科学研究是高校的核心职能之一，在红色资源融入高校党建品牌建设的过程中，深入挖掘研究红色文化资源，为科学研究提供新的方向与思路。同时，高校党建品牌建设注重思想建设与理论思想传播，红色资源能够为思想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建立科研协同平台，高校积极整合区域内红色文化资源，对其展开深入研究，增加科研成果产出，同时能够通过科研推动红色文化资源活化，发挥红色资源思想引领作用，与高校科研工作相互赋能，提高师生党员的思想水平，推进高校党建品牌建设[7]。

例如，高校可借助信息技术优势，与秋收起义纪念馆、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等区域内红色资源单位合作，共同构建红色文化数字化科研保护协同平台，以保护红色资源、传播红色思想文化为目标，打造红色党建品牌。高校党员科研团队应用三维建模基础、VR 技术等，构建秋收起义战场、韶山毛泽东同志故居等数字化建模，实现革命文物的三维重建，师生也能够借助 VR 设备走进现场，沉浸式体验革命历程，学习革命思想。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师生参与科研活动，撰写并发表数字化技术支持下红色文化思想传播主题相关的研究论文，为思想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与技术支持。由此，在高校党建品牌建设实践中应用红色资源构建科研协同平台，将高校科学研究工作与党建思想建设衔接，有效发挥红色资源思想引领作用。

（三）构建社会服务基地，落实社会服务职能

高校推进党建品牌建设，需要强大的组织力量作为支撑，通过构建社会服务基地的途径，组织党员参与实践活动有助于激发组织活力。高校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履行社会服务职能，构建社会服务基地有助于高校履行核心职能，为社会提供精准服务。高校党组织可与革命老区的基层党组织进行联动，共同构建社会服务基地，开展服务活动，以强化组织建设，增强组织凝聚力，为党建品牌建设提供强大的组织力量支持。

例如，高校可与某革命老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合构建红色健康服务基地，开展以健康服务、红色教育为主题的品牌活动。高校内临床医学与护理专业的党员大学生为社区党员提供免费体检、健康教育、慢性病管理等服务，组织开展健康讲堂，讲解湖南秋收起义、平江起义中的医疗救护故事，从故事引入并普及健康知识；组织学生深入社区走访老党员，调查党员们的革命经历，以及当前的健康需求，提供健康随访、健康档案建立等服务。在社会服务过程中，党组织的凝聚力得到增强，服务能力得到提升，社会服务的开展扩大了高校党建品牌的影响力。

（四）成立红色文化中心，推动红色文化传承

高校具有文化传承创新的职能，在党建品牌建设过程中挖掘红色资源蕴含的优良文化作风，成立红色文化中心以推动文化传承与创新，同时有助于推进党建作风建设，使党员在工作实践中形成良好的工作作风。如高校成立红色文化传承创新中心，组织开展红色文化主题的艺术创作活动，党员教师带领学生创作红色主题油画、舞蹈，如学生在观看《秋收起义》影视剧后创作相关油画作品，并在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等场馆展出；也有学生开发红色文创产品，如以韶山风景为原型的手绘明信片等，实现对红色文化的创新与传播。

四、结语

在新时期教育背景下，红色资源在高校党建品牌建设中具有重要且独特的作用机理，借助红色资源将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纪律建设等方面，与高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核心职能融合，相互促进，有助于提升高校党建品牌建设的整体质量与成效。具体实践过程中，高校可通过开设红色思政课程、构建科研协同平台、构建社会服务基地、成立红色文化中心等路径，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党的建设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杨巍，冯雅 . 红色资源融入高校党建的路径研究——以浙江“红色根脉强基工程”为例 [J]. 浙江档案 ,2025(04):21-24.

[2] 王伟 . 开封红色资源融入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路径研究 [J].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学报 ,2024,44(04):67-71.

[3] 林慧英 . 新时代高校党建特色品牌创建实践探索和路径研究——以江西为例 [J].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 ,2025(03):31-40.

[4] 荆彦丽，荆立群 . 红色文化融入高校党建品牌建设的实践探索——以山西农业大学农学院为例 [J]. 大学 ,2024(09):192-196.

[5] 陈璐 .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高校党建工作品牌化建设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J]. 品位·经典 ,2024(04):85-87.

[6] 黄志兴，刘健玲，丁小歌 . 浅析红色资源融入大学生党支部建设的价值维度与实践路径 [J]. 改革与开放 ,2023(17):38-43.

[7] 杨玉仁 . 大数据背景下高校党建工作品牌化建设实践研究 [J].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2,22(03):75-80.

（作者单位：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党建引领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路径探索与实践

——以中铁十七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例

孟　晓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面对高质量发展要求，关键在于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思想优势深度融入企业价值链各环节，转化为发展优势、竞争优势和创新优势。本研究以中铁十七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样本，聚焦“深度融合”这一核心命题，系统分析党建与生产经营“两张皮”的现实困境及其根源，探索构建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旨在为新时代国有企业实现党建与业务同频共振、互促共进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范例。

关键词：党建工作；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一、深刻认识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时代价值与内在统一性

（一）融合是坚持党的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相统一的根本体现

党中央明确要求将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对中铁十七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十七局建筑公司”）而言，将党组织研究讨论作为企业重大决策的前置程序（如“三重一大”），确保企业发展战略、重大投资、重要人事安排等始终符合国家大政方针和人民利益，这正是企业作为国家基建主力军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服务国家战略的具体实践和制度保障[1]。

（二）融合是破解发展难题、激发内生动力的关键路径

面对市场竞争与高质量发展的双重挑战，企业凝聚力、执行力、创新力的提升亟须强有力的政治引领与思想保障。只有将党的组织体系、思想政治工作、先锋模范作用深度嵌入项目管理、技术攻关、安全生产、市场开拓等核心业务流程，才能有效破解发展瓶颈，稳定队伍思想，凝聚攻坚合力，将党组织的战斗力转化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三）融合是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与核心动能

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不仅是经济指标的增长，更是发展方式、动力和效率的变革。党建工作的成效，最终要体现在企业效益提升、管理优化、风险可控、员工成长上。推动融合，就是要构建党建目标与经营目标同向聚合、党建责任与经营责任同步压实、党建成效与发展成果同步检验的体制机制，使党建真正成为驱动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红色引擎”。

二、精准把脉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中的现实梗阻

（一）融合的深度和有效性不足

融合的深度和有效性仍存不足，集中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 纲不举、目不张

基层党建工作要取得显著成绩，党委（党工委）必须充分发挥主体责任，对重大问题把关定向，为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起到引领作用。但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有的基层党组织在推进企业体制改革、技术创新和如何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方面主体意识不强，“双向进入、交叉任职”落实不到位；有的基层党组织融入生产经营工作力度不够，存在“两张皮”现象；有的基层党组织对新时代如何加强和改进党建工作的切入点把握不准，基层党的建设层层衰减，责任传递不到位，没能发挥强有力的引领保证作用；有的单位“两个责任”的落实与工作要求有差距，影响到党组织良好形象的塑造，使党委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职责难以完成，影响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不利于建设更强更

好更美十七局目标的实现[2]。

2. 头上热、脚下凉

这方面的主要表现为有的基层单位党员教育管理模式陈旧，不能创新党员教育载体，部分党员学习不主动，精髓要义领会不深刻；有的基层组织对党员教育“规定动作”走过场，“自选动作”频频落空。课题组走访座谈时发现：一些党组织负责人认为，由于建筑企业的特性，党员的组织关系往往因施工任务的不断变化而变动，随之造成了管理困难、沟通不畅等问题，同时受人员频繁变动而导致组织生活缺乏连续性，致使个别党员干部有意无意地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党员党性的弱化、组织教育的脱节、党组织的凝聚作用发挥不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3. 力度不够、执行不规范

公司党委在巡察时发现，有的项目党建工作在开展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通过对比各项目的问题案例和数据以及对党建工作的考核发现，有的基层党组织决策不科学、不严谨，“三重一大”落实不到位，特别是个别单位，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配套制度不完善，未能及时落实集体领导及民主决策制度、党委前置讨论程序、党委会议事规则、党政负责人重大问题决策碰头磋商制度等。制度落实不到位，党组织参与管理的环节选择性缺失，使得基层单位在执行制度的过程中缺少了监督和管理，效率层层衰减。

4. 认识不清、发挥不力

在分析近几年亏损项目暴露的问题时发现，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绝不能离开党建工作的有力引领，绝不能离开党员领导干部个人作用的有效发挥，否则项目乃至企业的发展质量就会方向偏离，效益受损。通过案例分析发现，有的领导干部言行表里不一，成为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有的党员干部把参加组织学习看作负担，理想信念动摇；有的党员干部对职工群众提出的要求推诿扯皮，忘记了党的宗旨。在决策过程中，党性的缺失，使得集体利益不再高于一切，提升内生效率更无从谈起[3]。

（二）建筑行业特性加剧融合的复杂性

建筑行业的固有特性，如项目分散性、人员流动性强、生产周期长、安全风险高、利益相关方多元等，客观上为党建与生产经营的深度融合带来了独特挑战。

1. 组织覆盖与稳定性挑战

项目点多线长面广，党员随项目流动频繁，导致基层党组织设置需要高度灵活，党员教育管理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难以保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现象突出，部分项目临时党支部建设存在“重成立、轻运行”的问题，组织生活质量和效果易打折扣。

2. 价值认同与文化渗透难度大

项目一线人员构成复杂（自有员工、协作队伍、劳务派遣等），思想观念、价值追求多元。党建工作如何有效穿透管理层、技术层、作业层，将党的主张、企业核心价值观和铁道兵精神精准传递并内化为不同群体的共同行动准则，面临较大难度。尤其是在协作队伍中开展有效党建工作，存在制度衔接和认同感培育的壁垒。

3. 风险防控与党建监督的融合难点

工程项目管理涉及大量资金、物资、分包等关键环节，廉洁风险高。如何将党建的监督保障作用更有效地嵌入招投标、物资采购、工程计量、资金支付等业务流程的风险防控点，形成刚性的制度约束和常态化的监督机制，防止“项目上马、干部落马”，是深度融合必须解决的难题[4]。

4. 短期效益压力与长期党建投入的矛盾

项目制管理模式下，项目部往往面临巨大的工期、成本、安全压力，存在“重生产、轻党建”的短期行为倾向，对需要长期投入、润物无声的党建工作资源保障不足，导致融合工作缺乏持续性和深度。

三、党建引领，紧扣中心，推进企业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

中铁十七局建筑公司积极探索，构建了以“党建引领、紧扣中心、赋能发展”为特征的融合实践体系。

（一）打造“先锋引擎”，让党员作用在价值创造中“显性化”

融合路径：将党员责任区、先锋岗、突击队等载体直接“绑定”在生产经营的关键环节和难点任务上。例如：在安全生产一线设立“党员安全岗”，在技术瓶颈处组建“党员攻关组”，在工期紧张时开展“党员劳动竞赛”与“承诺践诺”活动。实践案例：毕节市三县PCR实验室（基因扩增实验室）紧急抢建任务中，项目集群党工委迅速将“组织力”转化为“战斗力”，组建以党员骨干为核心的突击队，将党的组织优势直接作用于项目高效执行，六天圆满完成任务，党建的保障服务作用在急难险重任务中得到最直接检验。

（二）强化“政治导航”，让组织优势在科学决策中“制度化”

融合路径：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集体决策机制嵌入企业治理结构和重大经营管理决策程序。严格落实党委前置研究讨论，确保党工委在项目重大事项（人事、财务、分包、采购）中有效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实践效果：通过党委常委会、总经理办公会找准党建与经营的契合点，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求转化为企业经营策略（如区域经营策划、投标策略细化），提升了决策的科学性和风险防控能力，为规模效益双提升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和组织保证。

（三）筑牢“基础磐石”，让党建工作在业务全流程中“具象化”

融合路径：将党建基础工作深度融入项目“全生

命周期”管理。第一，组织建设“压舱”：依托生产单元（集群部）灵活设置党组织，确保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与生产任务同步延伸、有效对接。第二，思想引领凝神铸魂：将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奋斗者文化、铁道兵精神融入公司文化理念、规章制度和员工行为规范。通过“研、学、讲、宣、训”体系化学习（如结合党史、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学习研讨），引导全员将理想信念转化为坚守安全红线（思想工作融入安全管理）、推动改革创新、提升效率效益的行动自觉。邀请外部专家（如太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授课，为生产经营拓宽视野、链接资源。第三，安全管理“护航”：将安全生产意识培育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内容，通过标准化工地创建、专项督导、思想动员，将党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落实为具体的安全生产行为和管控措施。第四，市场开拓“蹚路”：将对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如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的领会把握转化为公司的市场布局策略（如打造山西、河南、河北“三小时工作圈”），拓展新兴市场。党组织的战略眼光和政治敏锐性驱动了百亿级属地经营圈的形成和区域规模发展。第五，典型选树“赋能”：将评选表彰先进（“两优一先”、先进集体）的过程作为弘扬正能量、推广最佳实践的平台，通过事迹分享会，将先进典型的示范效应传导至施工生产一线，激发全员创效活力。党建工作成为营造“比学赶超”氛围、提升团队士气的有效手段[5]。

（四）构建“数字党建”平台，让融合效能“智慧化”

融合路径：积极拥抱数字化转型浪潮，打造集“学习教育、组织管理、宣传引导、监督预警、考核评价”于一体的智慧党建云平台。

1. 线上学习全覆盖

开发移动端学习 App，整合“学习强国”资源、企业党校课程、行业政策法规、安全操作规程、廉洁警示教育等内容，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掌上学习”，解决项目分散、集中学习难的问题。设置学分制管理，与党员评优、绩效考核挂钩。

2. 组织管理动态化

建立党员电子档案库，动态跟踪党员项目流动轨迹，实现组织关系在线转接、党费在线交纳、“三会一课”线上记录与签到。项目党支部可在线发起活动、召开视频会议，确保组织生活“不断线”。建立党员流动热力图，实时显示全公司党员分布及组织关系状态。在太原地铁项目群建设中，通过系统自动识别党员集中区域，动态调整党支部设置，确保“项目建到哪里、党组织覆盖到哪里”。

3. 宣传引导精准化

利用企业微信公众号、内部网站、项目智慧屏等，精准推送党的创新理论解读、公司重大决策部署、项目进展、先进典型事迹、安全质量警示案例等，营造浓厚氛围，凝聚思想共识。

4. 监督预警智能化

探索将廉洁风险点、安全生产关键环节的监控数据接入平台，设置预警阈值。对异常情况（如招投标流程超时、关键岗位人员未按规定轮岗、安全隐患整改逾期等）进行智能提醒或预警，推动监督关口前移，提升风险防控的精准性和及时性。实践效果：初步实现了党建工作由“线下”向“线上 + 线下”融合转变，提升了党建工作的效率、并扩大了覆盖面穿透力，为在流动性强的建筑行业实现“支部建在连上、作用发挥在云端”提供了技术支撑。

（五）深化“联建共建”机制，让融合资源“社会化”

1. 政企共建促发展

与地方政府部门党组织共建，共同学习政策法规，研讨区域发展规划，及时获取项目信息，争取政策支持，优化营商环境。通过共建活动展示企业形象和实力，为市场开拓奠定良好基础。

2. 企企共建强协同

在独立项目或项目集群中，与业主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主要分包单位的党组织开展共建。建立联席会议、联合主题党日、技术攻关协作等机制，有效沟通信息、协调立场、解决矛盾、凝聚合力，保障项目顺利推进，打造“精品工程、安全工程、廉洁工程”。

3. 社企共建惠民生

项目党支部积极融入驻地社区，联合开展志愿服务、扶贫帮困、文化交流等活动。组织党员技术骨干为社区解决实际困难（如义务维修、科普讲座），既履行了央企社会责任，也增进了与当地群众的感情，为项目施工营造了和谐的外部环境，降低了阻工风险。实践案例：在太原市老旧小区改造工程项目中，项目党支部主动与市重点工程办公室、街道社区党委、周边居民代表建立“党建联盟”，定期召开协调会，及时解决施工扰民、交通疏导等问题，有效化解了潜在矛盾，项目进度和群众满意度均得到提升，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

四、结语

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全面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只有企业的各级党组织切实担负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构建主体明晰、责任明确、有机衔接的责任体系，推动党组织书记履行好第一责任人的责任、班子成员履行好“一岗双责”，努力构建与生产经营实际相协调的党建工作体系，才能不断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国平 . 对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工作深度融合的思考 [J]. 企业改革与管（下转 22 页）

加强信访机关党建工作若干问题的探讨

单建花

摘要：加强信访机关党建工作对于推进信访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深入剖析了信访机关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分别从政治引领的“定盘星”、群众工作的纽带、社会稳定的基石三方面进行了分析。清晰界定党组织在信访工作中的基本任务，具体涵盖强化理论武装筑牢思想根基、完善制度体系压实党建责任链条、推动业务融合深化“党建＋信访”模式、加强队伍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铁军等方面并总结实践成效。文章分析了信访机关党建工作的现存问题与深层原因，并针对信访机关加强党建工作提出了四项基本措施，即坚持不懈抓好党员思想教育、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发挥党员表率作用、强化组织建设，为高质量开展信访工作提供坚实保证。

关键词：信访机关；党建；政治引领；业务融合；作风建设

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沟通的桥梁以及紧密相连的纽带，也是了解社情民意极为重要的窗口。加强信访机关党建工作，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保证信访工作朝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开展、推动工作取得实效、维持社会的稳定局面，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信访机关党组织作为政治机关的核心力量，其地位和作用举足轻重。基于此，本文对信访机关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进行深入分析，明确其基本任务，分析存在的问题和产生的原因，并结合实际工作，探讨强化信访机关党建工作的一些基本思路，以期为推动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一、切实把握信访机关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

谈信访机关党建工作，必须对信访机关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有透彻理解和精准把握。结合单位性质和党组织的作用，信访机关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引领的“定盘星”。信访机关党组织作为政治机关的核心力量，它的首要作用是保证信访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把坚持党对信访工作的全面领导作为信访工作的根本保证，清晰地阐明信访工作的政治属性。因此，党组织必须将党的政治建设贯穿信访工作全过程，打造“政治忠诚、能力过硬、堡垒坚强、务实高效、清正廉洁”的模范机关，引导党员干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二是群众工作的纽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要通过信访渠道摸清群众愿望和诉求，找到工作差距和不足，举一反三，加以改进，更好为群众服务。这一极为重要的论述，很好地诠释了信访工作所具有的本质属性——它不仅仅是一项了解民情、集中人民智慧、维护人民利益、凝聚民心的重要工作，而且还是一种接受群众监督、改进工作作风的重要途径。信访机关党组织作为承接“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的主体，其核心的功能便是要搭建起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连心之桥。通过信访渠道，党组织能够深入细致地摸清楚社情民意，并且将党的群众路线进一步具体化、制度化。三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信访

（上接 21 页）

理 ,2021(31):64-65.

[2] 王炳林 . 新时代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基本问题研究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21.

[3] 中建政研智库 . 建筑行业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研究报告 (2023)[R]. 北京 : 中建政研集团 ,2023.

[4] 张弛 . 数字化转型赋能国有企业党建创新的路径探析 [J]. 理论视野 ,2022(10):78-82.

[5] 李强 . 工程项目党建联建共建的实践效能与优化路径——基于大型建筑央企的案例分析 [J]. 建筑经济 ,2023,44(05):15-19.

（作者单位：中铁十七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机关党组织要将此作为座右铭，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通过政治引领、矛盾化解、风险防控、制度转化和法治保障等多维度的功能发挥，努力让自己成为矛盾化解的最前沿阵地，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监测仪”“预警器”“压舱石”的关键作用，巩固社会稳定的基础。

二、进一步明确信访机关党组织的基本任务

根据信访机关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结合《信访工作条例》，可以明确信访机关党组织有以下几方面的基本任务：一是强化理论武装，筑牢干部思想根基。信访机关党组织的首要任务是构建理论武装体系，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转化为各级党员干部的政治自觉。信访机关党组织必须将这一思想纳入理论学习中心组、“三会一课”等制度性学习安排，确保学深悟透、入脑入心。要完善理论学习长效机制，强化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确保信访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二是完善制度体系，压实党建责任链条。信访机关党组织必须严格遵守各种组织生活的各项制度规定，构建闭环管理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要加强对信访工作的领导。”这要求信访机关党组织要健全党建工作制度体系，形成重点工作通报督查机制、党支部书记汇报工作机制等。通过年初制定党建工作要点、每月印发党建工作动态、每季度开展现场督查、年底总结报告等方式，确保责任在每一个层级得到传导、压实。三是推动业务融合，深化“党建 + 信访”模式。信访机关党组织必须深化“党建 + 信访”模式，创新党建考核评价体系，将信访积案化解率、群众满意度等业务指标纳入党建考核，实现党建与业务双促进。发挥党员在重大信访保障等工作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把党员先锋岗设立在矛盾化解的第一线，在风险防控一线组建党员突击队，在服务群众一线开展党员志愿服务。构建“党组谋划、一把手抓总、分管领导主责、业务部门落实、多部门协同”的责任闭环，实现党建与业务同频共振。四是加强队伍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铁军。打造高素质干部队伍是做好党建和业务工作的根本保障。党组织要通过年轻干部基层锻炼计划，让干部在信访窗口、调解一线等岗位历练成长；要实施政治谈话全覆盖工程，及时掌握机关干部的思想动态，对他们遇到的实际困难给予帮助解决；要建立能力提升长效机制，将信访工作与党性教育结合起来，通过以案说法、试盘演练等方式提升干部群众的工作能力。同时，完善激励机制，对在重大信访保障、积案化解中表现突出的党员干部予以表彰，营造担当作为的浓厚氛围[1-2]。

三、信访机关党建工作的实践成效

信访工作首先是政治工作，信访部门首先是政治机关。近年来，各级信访机关牢牢把握政治机关的属性定位，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新时代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将党建工作与信访业务深度融合、同向发力，在强化政治引领、夯实组织基础、锻造过硬队伍、提升治理效能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为履行为民解难、为党分忧的政治责任提供了坚强保障。

（一）强化政治引领，筑牢忠诚根基

各级信访机关始终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通过落实“第一议题”制度、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专题培训研讨等多种形式，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通过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政治机关意识教育等集中性教育活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将政治忠诚融入信访事项办理、矛盾纠纷化解全过程，确保信访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推进。国家信访局党组 5 年来多次开展理论学习研讨，带动全系统形成深学细悟的良好氛围，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实际行动。

（二）夯实组织基础，激活基层动能

各级信访机关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以提升组织功能为核心，持续深化基层党组织建设。通过严格落实支部选举、组织生活等制度，选优配强基层党支部班子，推动“四强”党支部创建走深走实。针对信访高峰期、专项攻坚任务等特殊场景，优化党组织设置模式，推动党组织覆盖与工作专班同步建立，实现党员管理无死角、服务群众零距离。严格执行“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创新学习形式，结合信访案例开展深度研讨，将组织生活与信访实践紧密结合，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三）深化党建与业务融合，提升治理效能

各级信访机关坚持党建与业务两手抓、两促进，健全完善党建引领信访工作的制度机制。在信访问题源头治理、重复信访治理、积案攻坚等重点工作中，成立临时党小组统筹推进，明确党员干部带头责任，推动党员在急难险重任务中担当作为。通过开展“大督查大接访大调研”“领导干部接访下访”等活动，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一线，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实打实解决群众难题，开展治理重复信访、化解信访积案专项工作。建立健全考核评价机制，将党建工作成效与信访业务实绩紧密挂钩，强化结果运用，形成“党建引领业务、业务检验党建”的良性循环。

（四）锻造过硬队伍，树立良好形象

各级信访机关以党建为抓手，着力打造为民务实清廉的信访干部队伍。通过搭建党务与业务干部交流轮岗平台，选派优秀党员赴基层挂职锻炼、参与乡村

振兴等工作，全方位提升干部综合素养。加强纪律作风建设，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持之以恒纠治“四风”，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通过健全激励机制，选树先进典型、表彰优秀党员，营造干事创业、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引导干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对待群众诉求，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传递到群众心坎上，加强党同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3]。

四、加强信访机关党建工作的基本思路

根据信访机关党组织的地位、作用和基本任务，结合实际工作，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强信访机关党建工作：

（一）坚持不懈抓好党员思想教育

抓好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提高党员的政治素养，这是做好信访机关党的建设的根本。信访机关党组织必须将思想教育作为首要任务，通过系统化、常态化的教育机制，从根本上提升党员政治素质。党组织需构建“三位一体”教育体系：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纳入理论学习核心内容，通过专题读书班、集中轮训等形式实现全员覆盖；建立常态化学习机制，如每月开展专题研讨交流，领导班子带头脱稿发言、形成书面材料；强化意识形态阵地建设，严格落实网络舆情监测责任制，确保信访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不断取得实效。创新教育载体，开展案例教学，将信访积案化解中的典型事例转化为生动的教材。通过“走出去”学习先进地区的经验做法，并通过邀请专家授课等方式，持续为信访干部“强短补弱”“蓄电充能”。同时，建立年轻干部基层挂职轮岗锻炼机制，安排新录用干部到信访窗口、调解一线等岗位进行历练，使他们在实践中检验和提升政治素养。

（二）坚持不懈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加强党内监督，严格执行党纪党规，克服消极腐败现象，保持廉洁状态，这是做好信访机关党的建设的保证。党风廉政建设是信访机关党建工作的“压舱石”。党组织需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立体化防控体系。完善权力运行制约机制，对信访事项的受理、办理、督办等关键环节实施全过程监督；建立廉政风险排查制度，做好岗位廉洁风险点排查工作，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推行阳光信访工程，通过信访案件听证会、网上公示等方式增强工作的透明度，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将廉政教育与业务培训相结合，在信访干部培训班的培训内容中设置廉政教育专题。将常态化监督与专项检查相结合，正向激励与反面警示相结合，选树勤廉典型，运用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通过建立干部廉政档案，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4]。

（三）坚持不懈发挥党员表率作用

党员干部的表率作用是信访机关党建工作的“风向标”。信访机关领导班子成员要带头包案接访，对重大疑难信访案件实行“一案一策”包保制；中层干部要发挥桥梁作用，在积案化解、重大信访保障中冲锋在前；以普通党员身份立足岗位创先争优，通过设立“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区”等方式激发其内生动力。党员干部特别是机关领导要带头践行群众路线，实施好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变领导接访日为群众服务日；要带头攻坚克难，通过组建化解信访积案党员突击队，集中力量突破“骨头案”；要通过建立党员干部履职清单，明确责任目标，形成“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的良好局面[5]。

五、坚持不懈强化党的组织建设

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加强机关党务干部队伍建设，这是做好信访机关党的建设的重点。党支部是信访机关党建工作的“神经末梢”，必须做好强基提质工程。一是选优配强党支部书记，建立党支部书记履职清单和述职评议制度。二是完善党支部工作规范，严格落实“三会一课”、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三是创新支部活动载体，通过“主题党日 + 信访业务”“微党课 + 案例分析”等形式增强组织生活的吸引力。同时，要搭建学习交流平台，完善党员上党课机制，定期开展经验分享；搭建实践锻炼平台，组织党员参与信访积案化解、重大信访保障等重点工作；搭建监督评议平台，通过运用党员积分制管理、群众满意度测评等方式对支部工作的成效加以检验。要进一步加大机关党务干部队伍建设的力度，建立起党务干部轮训的相关制度，提升党务干部抓党建和业务融合的能力。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J]. 共产党员 ,2025(20):4.

[2] 李文章 .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做好新时代信访工作 [N]. 学习时报 ,2023-10-04(01).

[3] 舒晓琴 . 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信访工作的重要论述 [EB/OL].(2014-03-05)[2025-12-26].https://news.12371.cn/2014/03/05/ARTI1393970449572378.shtml.

[4] 柳彬潇 . 用心用情做好新时代信访工作 [EB/OL].(2025-10-28)[2025-12-26].https://www.rmlt.com.cn/2025/1028/741744.shtml.

[5] 着力推进机关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 以高质量机关党建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N]. 天津日报 ,2023-11-30(06).

（作者系绍兴市越城区信访局政工师）

党建引领下特困人员服务机制的实践探索

范石娴

摘要：无锡市老龄工作发展促进中心（以下简称“老龄中心”）下设部门特困人员供养部，主要负责接收供养无锡市市本级特困人员，坚持“全心全意服务”的工作宗旨，弘扬“创新务实、敬业奉献、敦仁博爱、勇争一流”的工作精神，以满足特困人员的需求为目标，通过优化基础护理，开展康复、运动、认知、心理疏导等系列服务，建立特困人员社会工作服务专业服务机制，提升特困人群生活质量，彰显生命尊严。老龄中心第一党支部坚持支部建在阵地上，以特困人员供养部为主要服务阵地，严格按照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以支部品牌服务推动党建和业务工作融合发展，重点抓好党支部组织设置、班子建设、组织生活、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活动开展、基础保障等方面的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全面发挥新时代党支部的职责作用，助力特困人员服务取得成效。

关键词：党建；特困人员；老龄中心

一、品牌创建，标准化建设提质增效

老龄中心第一党支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秉持宗旨，推动开展“党建+社会救助”模式，探索融合路径，发挥党员作用，聚焦任务，保障民生，让工作有温度。2020年7月老龄中心第一党支部换届改选，现有正式党员28名。第一党支部以特困人员供养部为服务主阵地，服务200多名中重度残疾对象[1]。结合特困人员残障程度高、智力水平低、社会化程度低等特点，以党建为引领，打造党建品牌“泊爱港湾·筑梦行”，注重能力培养、社会联结、权益维护等核心内容，帮助他们挖掘潜力，增能扬长。党建品牌“泊爱港湾·筑梦行”，围绕“123”开展服务，即“守护一份梦想、搭建两个平台、维护三大权益”。

（一）品牌宗旨，初心守护梦想

以“发挥党员初心引领作用，激励特困人员勇敢逐梦，使党员成为特困人员梦想实现的引路人”为核心目标，切实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及基层党组织的坚强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干部主动深入特困人员群体，全面了解其内心诉求，凭借耐心、爱心与高度的责任感，鼓励他们突破生活困境的束缚，重新点燃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与追求，充分激发其内在潜力，激励他们勇敢追逐梦想，为其梦想之路点亮明灯，并在他们逐梦的过程中发挥引导与帮扶作用，努力成为他们逐梦路上的引领者[2]。

（二）开设筑梦课堂、搭建圆梦舞台

党员担当圆梦领航人，和专业筑梦导师携手，从特困人员自身的特点出发，调整课程内容，同时不断关注他们的成长需求，激励他们追求梦想，实现自身价值，同时注重链接社会资源，为特困人员构建梦想实现的路径，以帮助他们实现梦想。

1. 筑梦课堂的课程体系构建

党员和专业筑梦导师紧密合作，共同支持特困人员实现梦想，通过音乐、绘画、文化、手工、体训、康复六大核心开展分层分类的教学，针对不同年龄、身体状况、兴趣爱好的特困人员分别设计基础入门课程、进阶提升课程和个性化定制课程，例如针对热爱音乐的特困人员开展传授声乐技巧的相关课程；为康复中的特困人员开设“康复+体训”相结合的特色课程，帮助康复特困人员更好地促进身体功能恢复和重塑；针对热爱艺术的部分特困人员，则进一步拓展绘画类课程的深度和广度，增添更多关于绘画流派的知识和创作实践，使特困人员获得更加个性化的发展，等等。党员不仅教知识教技能，同时也注重情感教育，积极参与课程设置，在文化课上讲党史故事、谈传统文化，教育引导特困人员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培塑文化自信[3]。在手工艺术课上引导特困人员敢于接

受挑战、乐观面对困难、开动脑筋、群策群力。党员与专业筑梦导师每月针对特困人员固定开展学习成果、兴趣偏好和身心发展的跟踪回访，并根据回访结果和评估情况灵活调整课程内容和指导方式。

2. 圆梦舞台的职业发展构建

党员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积极与企业、社会组织、学校等机构单位建立合作关系，邀请来自不同领域具有不同背景的人士参与“圆梦舞台”举办的活动，促成与企业的合作，比如承接手工艺品的定制订单，帮助特困人员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收入，为特困人员提供更广阔的自我展示和价值实现平台。与学校合作开展各类文化交流活动，促进特困人员与学生的交流互动，从而加深彼此之间的认识和了解，进而扩大特困人员的社交网络。同时党员与筑梦导师根据特困人员的能力共同合作，帮助他们制定实现个人梦想的计划。比如，为有就业需求的特困人员提供职业培训资源，开展技能培训活动，并为他们推荐合适的就业机会；针对怀有艺术梦想的特困人员，通过与专业艺术机构建立联系，为他们提供持续的培训和展示机会，助力特困人员实现梦想。

（三）保障特困群体权益，助力其深度融入社会、共享发展成果

党员在日常工作中尊重每一位特困人员的人格尊严，保障特困人员在生活、学习、活动等各方面拥有平等权利，通过建立特困人员的意见反馈制度，倾听特困人员的心声和诉求，在活动决策中让特困人员参与其中，增强特困人员的自主意识和平等观念。

为了更好地促进特困人员的社会融入，党员整合社会资源形成资源共享平台，积极对接图书馆、博物馆、公园等，为特困人员提供免费参观机会或优惠使用条件，联系协调医疗机构、康复机构等单位让特困人员得到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康复资源，实现特困人员的社会资源共享。同时带领特困人员感受城市的建设成就，体验城市的巨大变化，组织特困人员参观城市建设成果展览、参加社区运动会、参加公益志愿服务等活动，让特困人员感受社会发展成果、增强社会归属感[4]。

为鼓励特困人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党员组织开展社区宣传活动，走进特困供养机构，让群众更深切了解特困人员的生活现状，挖掘他们的优秀事迹，讲述他们的日常生活，并到社区开展宣传活动，消除社会对特困人员的偏见和歧视。定期开展“开放日”活动，请社区居民志愿者与特困人员开展互动交流，让彼此增进了解，营造互相尊重、包容友善的良好社会风气。同时也联动社会组织和社区，为特困人员搭建多元化参与社会活动的平台，激发特困人员参与社会活动的热情，鼓励特困人员在筑梦课堂、圆梦舞台上培养兴趣爱好并发挥特长。鼓励特困人员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志愿服务等活动，发挥自身的价值和作用，例如组织擅长绘画的特困人员到社区进行文化墙创作，以此增强特困人员的社会参与感[5]。

二、筑梦领航，阵地服务展现新生活力

通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老龄中心第一党支部进一步创新了工作方法，丰富了工作内涵，激发了党员的服务热情和特困人员的内生动力。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既激发了团队活力，也提升了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

（一）“党员 + 专技”

特困部专业技术人员担任筑梦导师，开设绘画、音乐、体育等领域的筑梦课堂，为特困人员掌握技能提供了可能。党员作为圆梦领航人让特困人员走出去，为实现有效社会化提供了路径，现在已经开设了 7 个优秀品质课堂。

1.“随心手愈”工作坊。工作坊开设的手工和绘画课堂，激发了特困人员对生活的热爱、期待，对爱与温暖的渴望。

2.“活力四射”运动馆。在运动馆内开设体训课堂，开展体育训练，丰富了特困人员的业余生活，使他们提高了身体素质，让他们微笑着在阳光下奔跑。

3. 心灵港湾。在特困人员出现心理问题时，由专业社工党员担任的圆梦领航人以个案访谈、面对面交流等形式，帮助他们认识、梳理、管理自己的情绪和行为。

4.“心随律动”音乐吧。音乐吧开设的音乐课堂，使特困人员通过歌声寻求快乐，为梦想发声，同时也为他人带去欢乐。

5.“你追我赶”康乐园。康乐园为特困人员提供的康复训练，能助力他们改善身体机能，提高生活自理能力，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

6.“爱心溢动”微礼堂。微礼堂是圆梦领航人链接资源的主平台，通过搭建对外联系的桥梁，社会爱心人士、志愿者团队与特困人员开展交流互动，将爱心传递。

7. 创业工作坊。圆梦领航人打造的圆梦舞台，为特困人员提供培训机会，助力他们学习一技之长，鼓励他们通过不断努力，用自己的双手编织各自美好的梦想，现已经成功开设程程美甲工作室。

（二）“党建 + 团建”

立足中心党总支书记项目开展情况，一支部把红色管理引入支部管理，构建了党建引领下的团队建设，引导团队成员从初级层次 6 项能力到中级 10 项能力，再向高级 14 项能力的进阶式培训体系提升，有效提升了团队的合力[6]。全体党员同志齐心协力守护特困人员的生命健康，把温情服务、精细服务渗透到服务的每个环节中，把做好服务作为入党初心的试金石、经受组织考验的实战场，充分体现了对党忠诚、听党指挥的坚定决心和身先士卒、担当作为的责任意识。

（三）“共建 + 共学”

一支部与多个党支部开展合作，联建共建，充分利用党建共建平台，聚焦特困人员，优势互补，相互促进，构筑“红色服务圈”。中共无锡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第一支部、建行无锡分行住房金融业务部党支部及小企业业务部党支部多次与一支部开展联建活动，以“理论学习”和“牵手活动”相结合的形式，积极引导党员参与特困人员服务，用爱心传递党组织的关怀。同时，共建双方通过深入交流达成共识，始终围绕“为最弱势群体谋幸福”这一主题，通过携手画清廉、点亮微心愿等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强化党员的党性修养和志愿服务意识，将党建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强大动力，为党建业务融合工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三、党建引领，红色服务促进融合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对民政工作的重要指示中提到“聚焦特殊群体”，特困人员是典型的特殊群体，让他们拥有有质量的生活，得到有温度的照顾，获得被关注、尊重和体面的人生，是我们的目标。老龄中心第一党支部立足“泊爱港湾·筑梦行”品牌建设，坚持党建与管理、党建与团建深度融合，促进党建和业务工作双提升。

（一）为特困人员成长“赋能”

在筑梦课堂和圆梦舞台搭建的基础上，支部党建活动实施项目化运作。党员融合医护康教等专业团队，坚持全人理念、全过程服务、全方位介入，打造以“文化 +”为特殊群体赋能项目，该项目被评为无锡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优胜项目，由支部党员撰写的项目论文在国家级杂志《社会福利》上公开发表。“随心手愈”绘画组的成员们从最初的涂色、画线条、临摹，到后来的自我创作、开办画展、制作绘画台历，探索出了一条艺术疗愈之路。每一幅绘画作品都是特困人员的个性表达，艺术创作满足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期待。他们还在无锡市市民中心举办了“锡望”画展，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认可，相关内容还登上了“学习强国”平台。音乐课程丰富了特困人员的精神生活，陶冶了他们的情操，帮助他们进行情绪疏导。基于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机构内特困人员的心理问题，党员和社工组织开展小组活动“音声乐语欢乐吧”，通过音乐欣赏、乐器演奏、歌声抒情、互动减压等方式，帮助他们疏导不良情绪，正视情绪管理，建立心理支持系统，通过音乐表达自我。《音乐触心弦 共谱奏鸣曲——基于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福利机构特困人员心理增能小组社会工作案例》被评为 2020—2021 年度第一批江苏省优秀工作案例三等奖。

（二）为特困人员生命“赋彩”

通过“党员带动群众”，激活“红色细胞”，实现特困人员平等、共享、参与权益维护。圆梦领航人和特困部筑梦导师一起为特困人员圆梦，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和使命。开展“闻香识秋 丰味十足”活动，党员陪伴特困人员院内赏秋，品尝桂花糕、糖芋头；通过组织开展制作中秋花灯、布置花灯游园会、排演联欢会等中秋系列活动，使特困人员体验民俗文化；与特困人员一对一结对乘坐地铁，感受城市发展脉搏，领略城市建设美景。利用业余时间，关注特殊人群，开展周末茶歇活动，聆听成年孤儿的心声，引导他们积极、乐观地生活。围绕“泊爱港湾·筑梦行”党建品牌，全体党员为丰富特困部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开展周末闲暇时光“陪伴计划”，通过活动进一步拉近支部与部门、党员与服务对象之间的距离 [7]。

（三）为党建标准化建设“赋韵”

换届以来，支部开展筑梦课堂 60 次，党员阵地服务 430 人次，党员参与率达 100%。通过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和阵地服务活动，积极引导党员在工作中勤于奉献、敢于担当、争当表率。在党员评议中，有 39 人被评为“优秀”等次，3 名党员获评市民政局优秀党员，1 名党员获评市民政局优秀党务工作者，1 名党员荣获“无锡最美战‘疫’先锋”称号。老龄中心第一党支部本着互相交流、共同进步提高的原则，由党员担任圆梦领航人和特困部筑梦导师一起开拓创新，始终将帮助特困人员实现梦想作为奋斗目标，让社会看到残疾人士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风貌。

未来老龄中心第一党支部会以现有的服务项目作为核心，不断延伸服务的范围和半径，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提升，积极主动地回应“群众关切”，坚持以特困人员为中心，让特困人员居有所安、养有所乐，重新焕发对生命的热爱。

参考文献

[1] 耿建扩，陈元秋，张洁 . 党建引领的乡村蝶变之路 [J]. 党课参考 ,2020(09):6.

[2] 李树荣 . 党建领航社会组织 彰显活力共绘画卷 [J]. 乡镇论坛 ,2023(31):14-15.

[3] 金晶，汪翔宇 . 党建引领赋能城市社区养老服务“微共同体”建设 [J]. 城市开发 ,2024(11):116-118.

[4] 梁淑双 . 以党建引领协同提升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人才综合素质 [J]. 人才资源开发 ,2021(04):46-47.

[5] 孙小杰 . 乡村振兴背景下“党建 +”乡村治理模式的实践与探索 [J]. 产业与科技论坛 , 2024,23(22):242-244.

[6] 崔征 .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 [J]. 共产党员 , 2024(07):28-29.

[7] 黄石松 . 养老服务联合体的实践探索与路径优化 [J]. 前线 ,2024(04):79-81.

（作者单位：无锡市老龄工作发展促进中心）

新时代高校学生公寓党建工作的创新路径与实践探索

——基于多校联合模式的可行性研究

迟雯雯

摘要：高校学生公寓作为学生生活与思想交流的核心场所，是党建工作向基层延伸的重要阵地。本文立足于成都大学与华东理工大学的实践经验，并结合红色文化传承的深远意义与数字化党建的时代需求，提出了“机制创新 + 文化育人 + 技术驱动”三位一体的公寓党建模式。该模式旨在解决当前公寓党建工作中普遍存在的受重视程度不足、工作机制僵化、资源配置匮乏等问题，力求探索出一条既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又具有广泛推广价值的学生公寓党建新路径，为新时代高校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参考与理论支撑。

关键词：公寓党建；高校；实践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基层党支部在服务群众方面应发挥直接且关键的作用，强调要将服务群众的工作落到实处[1]。具体而言，对学生公寓落实党建工作是高校基层党建工作的关键组成部分，这不仅是推进党组织建设、提升党组织凝聚力、增强战斗力的有效手段，更是推进落实“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这一“三全育人”教育理念的核心推进抓手，依靠公寓党建工作的持续深入开展，可以更好地把党的方针政策送到每一位学生身旁，切实增强育人工作的实际效果并扩大覆盖面，从而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坚实基础。

当前，学生公寓已逐步演变为思想政治教育、优良学风营造及构建平安和谐校园环境的核心阵地。在这一领域内，传统的班级党建工作模式因其固有的局限性，往往难以全面触及学生日常生活的各个具体场景，导致在生活层面的思政教育和学风建设存在一定的空白与不足。所以探索契合学生公寓特点的新型党建模式，破解基层党建“最后一公里”难题，显得尤为迫切。

一、实践案例与可行性验证

（一）成都大学“一站式”学生社区党建协同育人模式

成都大学创新构建了“一站式、三聚合、五协同”的学生公寓党建与育人深度融合机制[2]，形成了以学生公寓党员服务总站为核心，辅以 16 个分站全面覆盖的网格化服务体系。通过“党建 + 专业”的双轮驱动模式，各学院紧密结合自身学科特色，打造出一系列差异化的服务品牌。

学业发展协同：机械工程学院率先成立了“尚学苑”党支部，积极开展包括四六级模拟考试、专业课答疑在内的多项学业帮扶活动，累计服务学生超过 2000 人次，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学习成绩。

文明建设协同：商学院组建 64 期积极分子督导队，实施教学楼大厅文明劝导与课堂出勤检查，覆盖全院 85% 班级，课堂迟到率下降 42%[3]。

社区治理协同：设立“党员法律宣讲团”“义务维修队”等 16 支各具特色的服务队伍，在 2023 年成功解决了包括公寓设施报修、矛盾纠纷调解在内的各类问题共计 387 件，极大地提升了社区治理的效率和效果。

覆盖广度：截至 2024 年，学校已建成 1 个总站、16 个分站以及 10 个党员活动室，实现了对全校 19 栋学生公寓的 100% 全覆盖，确保了党建与育人服务的无死角、全方位渗透。

参与深度：2023 年，学校组织开展了“橙园微课”“党建社区建设”等系列活动共计 132 场，学生党员的参与率高达 91.3%，普通学生的活动触达率也显著提升至 67%，充分调动了广大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热情。

治理效能：通过“党员示范寝室”评选（2023 年申报 293 间，最终评定 50 间），带动公寓卫生优秀率从 58% 提升至 82%，违规电器使用率下降 74%[4]。

品牌影响：该创新模式荣获四川省“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 A 级高校称号，相关经验和做法被《人民日报》专题报道，被誉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典范”，

在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华东理工大学“领航班”党员先锋培育模式

华东理工大学秉持“1 到 100 到 N”的典型育人模式[5]，精心策划并实施了一系列精准培养措施。首先，从学生党员和楼层长代表中严格选拔出 100 名优秀学子，组建了名为“领航班”的精英团队。具体培养方案如下。

理论学习：学校创新性地开展了“红色剧本杀”和“党史 AR 实景课”等一系列富有吸引力和教育意义的特色活动，2023 年参与这些活动的学生覆盖了全校 86% 的寝室，影响力广泛。

实践拓展：学校积极组织“领航班”学员前往中共四大纪念馆、上海医药集团等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红色教育基地进行实地参访。此外，学校还鼓励学员参与志愿讲解服务，年均服务时长高达 2000 小时，充分展现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

社会服务：学校与企业紧密合作，共同建立了“党员导师制”。截至 2024 年，他们累计解决了社区治理难题 73 项，其中包括老旧小区电梯加装协商等复杂问题，为社区和谐发展作出了显著贡献。

示范效应：学员毕业后基层就业率达 78%，较党员高 32 个百分点。

品牌影响：系列活动得到了新华网、《中国青年报》等 30 余家权威媒体的高度关注和广泛报道，Vlog 作品全网点击量突破 100 万次，极大地提升了活动的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量化指标：学生党员的满意度从 62% 大幅提升至 91%，同时，普通学生对活动的触达率也从 18% 显著增加至 65%，有效扩大了活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进一步巩固了活动成效。

二、学生公寓党建现状与现存问题

（一）党建现状

以某学生公寓为例，根据表 1 可以得出，截至 2025 年 1 月 1 日，公寓内涉及多个学院的党建相关情况，呈现出一些明显特点和趋势。从学院的分布情况来看，涵盖了化工学院、理学院、轻纺学院、机电学院、计控学院以及材料学院，涉及不同的学科领域，在公寓内构成了一个多元化的学生群体，为跨学院党建协同育人提供了天然条件。

从学生政治身份构成的角度看，群众以及共青团员的占比相对偏大。统计结果显示，群众累计有 856 人，而共青团员达到 1292 人，这一数据反映出学生群体范围和基础青年力量的规模十分可观。积极分子 246 人说明有一部分学生已表现出向党组织靠近的意愿，并且呈现出一定申请入党的积极性。预备党员与中共党员，各自为 55 人和 46 人，表明已成功培育出一定数量的党员，为党建工作的后续深化打下了稳固基础。

表 1　某学生公寓党建情况调查统计

		群众	共青团员	积极分子	预备党员	中共党员	总计
化工学院	大一	139	98	—	—	—	237
	大二	98	143	1	—	—	242
	大三	68	183	—	—	—	251
	大四	22	167	—	9	4	202
	共计	327	591	1	9	4	932
理学院	大一	106	106	1	—	—	213
	大二	68	97	72	—	—	237
	大四	16	106	110	18	17	267
	共计	190	309	183	18	17	717
轻纺学院	大一	74	38	—	—	—	112
	大二	33	51	3	—	—	87
	大三	2	5	—	2	—	9
	大四	23	57	6	5	8	99
	共计	132	151	9	7	8	307
机电学院	大一	31	12	—	—	—	43
	大二	16	20	6	—	—	42
	大三	8	32	1	5	1	47
	大四	16	28	2	11	8	65
	共计	71	92	9	16	9	197
计控学院	大二	71	81	42	—	—	194
	大三	1	1	—	—	—	2
	共计	72	82	42	—	—	196
材料学院	大一	53	36	—	—	—	89
	大四	11	31	2	5	8	57
	共计	64	67	2	5	8	146
总计		856	1292	246	55	46	2495

该公寓的党建工作已打下一定基础，学生政治身份的分布状况显著体现了党建工作在不同学院和年级的推进成效，为了进一步推动党建工作质量与效果的提高，还有必要进一步挖掘并激励学生的入党积极性，并在此基础上，强化党员的培养与发展工作，以推动党建工作持续深入且全面拓展。

（二）现有问题

1. 机制建设滞后，长效性不足

就目前而言，最为凸显的问题是顶层设计存在缺失，具体呈现出校级层面没有专门的制度文件用以指导公寓党建工作，这种制度性的空缺直接造成相关工作在开展之际缺少必要的规范和持续保障。

操作运行模式方面也呈现出短期化倾向，现今普遍采用的“周期式”管理模式，一般只看重短期的成果，却无视了系统性推进以及长远规划，这种管理模式没有就党建工作长期发展进行深入思考，难以形成常态化的工作机制，对于党建工作持续性和稳定性方面造成影响。

就公寓支部、院系党组织与后勤部门的协同配合而言，出现了权责划分不明晰的问题，各部门之间的职责界定模糊，在信息共享以及资源调配阶段也存在诸多阻碍，各项工作无法形成有力的协同合力，进而影响到整体党建工作的成效。

2. 资源配置失衡，基础保障薄弱

当前，大量公寓楼的党建活动室配备数量明显短缺，存在“一栋楼仅配备一间活动室”的情形，这造成日常会议、学习这类党建活动难以有效开展，无法

契合师生实际需求，阻碍了党建工作的正常开展。

在现有的财务管理体制范畴内，学校年度预算中未把公寓党建专项经费纳入，相关活动开展主要借助临时拨款或学生自己筹集资金，这种不稳定的经费来源模式，不仅对活动规模以及效果形成限制，同样妨碍了品牌化党建项目的培育与进步。

公寓党建指导工作大多是由辅导员兼任处理，专职党务人员未配备到位，针对指导人员的系统性培训机制尚未构建，导致队伍在稳定性以及专业性方面有缺陷，这些问题对党建工作深入高效推进形成了阻碍。

3. 活动形式单一，育人实效受限

现如今活动主要把精力放在“三会一课”的理论学习上，尚未充分结合公寓生活的具体场景去打造特色互动活动，这种现象引起了“直接把教室里党课内容照搬到寝室”的情况，欠缺针对性与新颖创意，不太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与共鸣。此外，尚未形成一套卓有成效的学生需求调研机制，引发活动主题与大学生普遍关注的就业指导、心理健康等现实问题严重脱节现象，这种脱节让活动难以匹配学生的实际需求，削弱了活动的吸引力与实效性。

三、创新路径：三位一体模式构建

（一）机制创新：打造“校—院—公寓”三层互动架构

为了确保学生公寓党支部工作的规范化与高效性，笔者拟定了《学生公寓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该条例对党支部各项职责及具体操作流程进行了规定，目的是明确各成员的责任划分，保障各项任务的高效执行。借助这一制度的建立，旨在为学生公寓的党建工作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确保各项工作有条不紊、有据可依，进而全面提升党支部的工作效率与管理质量。

学生工作部（学生处）负责全面策划与布局学生事务，可以实现高效管理与协作，保障全局方向的正确性与资源的最优配置。各二级学院遵循学生工作部（学生处）的宏观指导，具体执行项目的落实与推进，确保各项措施得以扎实生效。此外，辅导员与学生党员密切配合，共同推进各项任务，形成上下互动、协同管理的运作模式，确保各项工作精准执行，发挥最大效能。

为激发各方积极性与创造力，采纳“五星宿舍”体系，通过精确合理的评价标准，对公寓党建工作的成效进行量化评定。把公寓党建成效纳入学院绩效评估体系，不仅能增强学院对公寓党建的重视，还能通过联动经费的扶持，为表现突出的学院和公寓提供物质奖励与保障，促进正向循环，推动“校—院—公寓”三层互动架构的持续优化与提升。

（二）文化育人：红色基因与社区共建相融共生

在物理空间层面，推行“共享党建空间”改革，将公寓公共区域改造为可移动式党建文化角，配置智能党建终端设备，形成“固定活动室 + 流动文化点”的立体化空间格局。通过开发虚拟党建社区平台，实现线上组织生活、云端党课的常态化运作，突破实体空间限制。在文化育人层面，打造“红色文化浸润工程”，在公寓走廊设置党史文化长廊，在宿舍门厅创设党建读书角，将红色基因融入生活场景。

构建“专项基金 + 项目孵化”双轨制支持体系。推动学校设立公寓党建专项预算科目，按照生均标准划拨基础经费；同时建立党建创新项目路演机制，通过校企党建共建、校友文化基金等渠道拓宽资金来源。重点培育“红色家书诵读”“党员成长档案”等文化育人品牌项目，形成具有公寓特色的党建 IP 矩阵。

实施“专职化 + 专业化”提升计划。建立公寓党建指导员准入制度，选拔具有党务工作背景的专职教师驻楼办公；开发“文化育人能力提升”培训课程体系，重点加强传统文化素养、新媒体传播技能等模块培训。创新“学生党员导师制”，选拔优秀学生党员组建公寓文化宣讲团，形成师生协同的育人共同体。通过构建文化浸润式党建生态，切实将公寓打造成为新时代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前沿阵地。

（三）技术驱动：推进数字化党建平台建设

依靠创建“云端党校”学习平台，可有效借助信息技术的优势，整合各式各样的党课视频资料，内容涵盖党的理论、历史、政策等诸多范畴，平台同样配备了线上评测系统，协助学员检验与巩固学习所得，专门划分出交流讨论区，激励学员彼此交流想法、碰撞灵感，构建良好的学习氛围。

在涉及党员管理的范畴，构建并开展运行党员积分管理系统，该系统详细记录入党积极分子在社区内平时的表现状况，比如参与志愿服务、助力调解邻里矛盾等情形，采用科学的量化标准，系统可客观、公正地反馈他们的综合素养与实际表现，为党员培养发展与日常管理工作提供了有力后盾。

四、结语

未来，我们将大力采用元宇宙等前沿技术，着重打造一个多层次、可互动的虚拟党建空间，该空间不光能突破实体场地的限制，更可为党员搭建崭新的学习交流平台。同时，积极探索“线上 + 线下”相配合的教育方法，让两者相互补充、协同发力：线上借助虚拟空间的丰富资源，扩大党建教育的覆盖面并提升便捷性；线下加大实体活动的深度体验力度，增强党建教育的实效性与感染力，共同扩大党建教育的覆盖范围并提升互动成效和实践功效。此外，将进一步总结成都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高校的实践经验，推动多校联合共建，共享党建资源、共研创新路径，为新时代公寓党建工作赋予新的活力与创新发展力，助力高校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下转 31 页）

国有企业党建引领企业文化建设的策略研究

郑高健

摘要：国有企业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实基础，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加强党建工作可以使国有企业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但是目前国有企业的党建和企业文化建设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对企业的党建工作和企业文化的发展都造成了很大的阻碍，使得党建工作和企业文化的价值很难发挥出来。本文基于党建引领企业文化建设的内在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策略，旨在为国有企业以党建为引领，推动企业文化高水平建设，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国有企业；党建引领；企业文化建设

党建工作蕴含的精神与文化理念和企业文化存在共通之处，都具有时代和创新的特质。只有坚持党的统一领导，才能让企业在国际化的竞争中发挥出更强的整体实力，才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新时代的发展中体现出来，让国有企业的发展方向和运营管理制度变得更清晰、更规范，让国有企业更好地承担起自己的政治和社会责任。通过党建工作的引导，让企业的党员和普通员工在企业文化的熏陶下，切实地增强战斗力和思想政治意识，这样才能为国有企业党建与企业文化建设的深度融合提供重要支撑。

一、国有企业党建引领企业文化建设的内在逻辑

（一）政治属性决定文化方向

国有企业的性质决定了其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就决定了国有企业文化建设必须坚持党的政治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国有企业是党领导下的经济组织。而且企业文化是企业成员共同追求的价值取向与行为规范，它直接影响着企业的未来走向。所以只有明确了政治导向，才能保证企业文化始终围绕着国家战略部署和企业改革发展的目标进行，才不会让企业文化建设偏离轨道，让企业文化真正成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与此同时，党的政治建设也需要国有企业坚守初心，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到企业文化中去，引导企业树立正确的管理思想，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责任，使企业和社会得到协调发展。

（二）组织优势凝聚文化合力

中国共产党组织体系严密，组织动员能力强，这为企业文化协作提供了可靠保证和实践范式。国有企业党组织从中央到地方、从集团到基层，形成了上下

（上接 30 页）

参考文献

[1] 张荣臣 . 党课 | 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精选党课 30 讲第 24 讲 [EB/OL].(2019-04-11)[2026-04-13].https://www.12371.gov.cn/web/article/14383064842103398 40/web/content_14383064842103398 40.html.

[2]成都大学机关党委学工部党支部.学生公寓党建初显成效[EB/OL].(2021-01-19)[2026-03-09].https://yurenhao.sizhengwang.cn/a/cddxjgdwxgbdzb/210119/761697.shtml.

[3] 成都大学商学院 .“两体三型”育人特色党支部系列活动：学业育人，引领学风——商学院党员服务站文明督导取得显著成效 [EB/OL].(2024-10-30)[2026-03-09].https://bs.cdu.edu.cn/info/1044/11148.htm.

[4] 成都大学学生处 . 成都大学 2023 年党建先锋进社区“党员示范寝室”校级评选结果公示 [EB/OL].(2023-12-11)[2026-03-09].https://xsc.cdu.edu.cn/info/1015/10434.htm.

[5] 华东理工大学 .“1 到 100 到 N”——党建引领下时代新人典型育人模式 [EB/OL].(2023-11-17)[2026-04-13].https://dxs.moe.gov.cn/zx/a/fdy_gxyrgzyj_whyr/231117/1863553.shtml.

（作者系齐齐哈尔大学助教）

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架构，能将党的要求、公司的发展战略有效地传达到每位员工。在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党组织要充分发挥引领作用，通过组织开展各种思想教育、文化建设等活动，对员工进行引导、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党员领导干部要积极践行企业核心价值观，以身作则，影响、激励员工积极参与公司文化建设，形成自上而下、全员参与的文化模式。另外，党组织的组织优势还表现为：将公司内各个部门、各个层次的资源进行整合协调，打破部门壁垒，将文化建设的力量进行整合，保证企业文化建设工作的有序、高效。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员工的个人发展能够同企业的发展目标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激发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责任感，形成强有力的企业文化合作氛围[1]。

（三）价值引领塑造文化品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有企业文化的核心内涵具有高度一致性。在党建引领下，通过价值观的深度融入，可塑造具有红色基因的企业精神品质，为企业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国有企业党组织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整个企业文化建设之中，引导企业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企业文化的实质是企业的精神、道德和行为准则，在价值观的指引下，能够推动企业建立起爱与承诺、诚实守信、营造诚信与责任的文化氛围。比如，党对诚信的要求，要求党员要有政治上的诚实，有诚信的权利，诚实正直，把这种要求融入企业文化中，就能促使企业建立起诚信文化体系，规范员工的行为，防止诚信风险。与此同时，党的工作所提倡的创新精神和拼搏精神，可以激发员工的创业意识，促使企业勇于进取，形成一种创新严谨的文化品格，为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四）使命驱动强化文化担当

中国共产党以实现中国人民幸福、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为己任，国有企业作为党执政的重要支柱，肩负着与党的使命高度契合的使命。以使命为驱动，增强企业文化责任感，丰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文化内涵。国有企业党组织一直强调企业的使命与责任，引导他们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在民族发展中的重要性和作用，把自己的发展同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联系在一起。该使命要融入企业文化中，让企业树立起国家伟大的理想，担负起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服务国家战略的重任，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繁荣。企业文化中的责任精神不仅仅是对国家、对社会所承担的责任，更是对员工、对环境所承担的责任[2]。在党的领导下，公司要增强使命感，把社会责任的思想融入生产经营的每一个方面，推动形成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理念，让企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达到统一，进一步丰富公司文化的内涵，夯实公司文化的根基。

二、国有企业党建引领企业文化建设的策略

（一）创新党建工作模式

创新党建工作模式是提升党建引领企业文化建设效能的关键举措。强化党建引领是国有企业党建模式创新的先导，国有企业党组织应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结合企业实际，创新思想教育的方式方法，改变传统单一的理论宣讲模式，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专题学习、研讨交流、知识竞赛等活动，增强思想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利用企业内网、微信公众号、“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等平台，获取关于党的理论知识，推动对企业发展的政治解读和对员工思想的动态分析，随时随地对员工进行引导，将党的思想融入组织发展和个人价值实现的实践中去。同时，对党的组织形式进行创新，通过优化党组织设置，把党组织建设深入到业务一线、项目现场，把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深度融合起来。还应创新党组织活动形式，开展“党建 + 文化”主题活动，把企业文化与“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结合起来，增强组织活动的吸引力、感染力。

要推动数字化党建工作方式的创新，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支持下，智能化党建平台应运而生，实现党建工作的数字化、智能化。利用智慧党建平台，可以在线上开展组织生活、文化宣传、员工互动等活动，提升党建工作的效能，拓宽企业文化的传播范围，增强企业文化建设的效果并扩大覆盖范围[3]。借助大数据技术，可捕捉党员学习路径等核心数据，对党员组织生活承诺与企业文化实践进行精准总结，经智能分析形成可视化报告，实现党建组织架构由经验判断到精准衡量的转变。在党员教育方面，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开发个性化学习内容，满足不同岗位、不同层次党员的学习需要，破解传统教育一刀切的难题。

在党建与企业文化的融合方面，智慧党建平台可以专门开辟企业文化展示区，用短视频、图形主题等生动的方式将企业的发展历程、先进典型行动等内容进行生动地展示，让员工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企业文化的魅力。另外，这个平台也可以提供一个互动的网上社区，让员工可以更方便地交换意见和想法。党组织可以对员工的思想动态及时了解，对员工的需要作出准确的反应，让党组织思想引领作用与企业文化建设形成良性共振，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促进党建与企业文化深度融合

推进党建与企业文化的深度融合，是实现党建与企业文化深度交融的核心途径。在宣传、践行核心价值观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作用，保证企业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通过展示价值观、开展主题实践活动等方式，引导员工认识并践行价值观，使其成为凝聚员工思想、规范员工行为的重要向导。

推动体制机制一体化，把党建工作纳入企业治理体系，健全制度和机制，加强党建工作，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在企业章程中明确党组织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职责定位，并把企业文化建设的成效纳入党建工作的评价体系之中，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机制。在人力资源管理、生产经营管理以及绩效考核等方面，把企业文化建设融入整个企业管理之中[4]。同时，推动活动载体的整合，将党建工作与公司文化活动整合起来，开展各种主题活动。比如，建立党员责任区、党员示范岗、党员突击队等，结合公司文化先进典型的评选，把学习党建知识融入公司文化知识的传播中，让党建活动与公司文化活动互相促进，并对其进行改进，建设同频共振、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三）建立长效机制

建立长效机制，是国有企业党建引领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保障。首先，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要明确党组织对企业文化建设的领导责任，成立由党组织领导、各部门参加的领导小组，对企业文化的全面建设进行协调。制定公司文化建设的中期规划和年度工作规划，明确工作目标、任务分工、实施步骤及安全保障措施，保证公司文化的健康发展。

其次，应该建立健全考核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估指标体系，把党建文化建设纳入党员管理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明确考核标准、考核方式。对党建文化进行定期考评，对党建文化建设的进展情况进行记录，发现存在的问题，及时督促相关部门及员工落实整改措施。将考核结果与薪酬分配、业绩考核及员工晋升挂钩，激励组织及员工积极参与公司文化建设。

最后，建立健全保障机制，加大对党建工作的投入力度，保障必要的经费、人员、场地等资源需求。加强团队建设，加强企业文化建设，选拔和培养一批懂党建和文化建设的复合型人才。建立健全党建工作监督检查机制，定期对党建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保证各项工作顺利进行。与此同时，还应建立健全反馈改进机制，为员工提供反馈信息，并对员工在党建和文化建设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进行及时收集，使工作活动持续优化，提升企业文化的质量与水平。

（四）强化队伍建设支撑

加强队伍建设，是加强党建工作队伍建设的有力保障。一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选优配强党组织领导班子，选拔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群众威信高的党员干部担任党组织负责人，从而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引领企业文化建设。同时，严格党员培养标准，推动党员发展，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培训，提高党员的政治素养和业务水平，让党员成为践行公司文化、推动公司发展的楷模。二是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建立专业团队，建立企业文化，明晰团队责任，强化员工专业训练，提升员工文化策划、宣传及活动组织能力[5]。鼓励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投身到企业文化建设队伍中来，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三是加强员工队伍的建设，为员工提供全方位的文化培训，增强员工对公司文化的认同感。通过技能培训、职业道德培训等方式，让员工的工作能力和专业技能得到提升，让他们把自己的发展同企业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觉地践行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形成强大的协作关系，推动企业的发展。同时，要建立完善的员工激励机制，表彰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个人或集体，充分肯定员工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三、结论

综上所述，国有企业党建引领企业文化建设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二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逻辑，党的政治属性决定了企业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党的组织优势凝聚了企业文化建设的强大合力，党的价值引领塑造了企业文化的精神品格，党的使命驱动强化了企业文化的责任担当。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对党建工作方式进行创新，在思想管理上进行创新，提高党建工作效能，推进组织结构与数字化转型，推进党建工作与企业文化的深度融合，实现价值取向、制度机制、活动方式的有机结合。同时，建立健全公司治理机制、评价机制和保障机制等，坚持党建引领企业文化建设，提高党的领导力，引领企业文化建设。

未来，国有企业要进一步提高党建工作对企业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探讨如何将党建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结合起来的新方法、新方式、新途径，解决好融合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使党建工作的领导作用和企业文化的凝聚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下的企业文化建设为国有企业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从而更好地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夏婧瑄 . 国有企业党建引领企业文化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J]. 中外企业文化 ,2025(09):213-215.

[2] 毛颖 . 国企党建融入企业文化建设的路径 [J]. 现代企业文化 ,2025(25):1-3.

[3] 金帅 . 国有企业党建品牌建设与企业文化建设的路径研究 [J]. 中外企业文化 ,2025(08):175-177.

[4] 郑兆洋 . 党建引领与企业文化建设的融合路径与实践对策 [J]. 现代企业文化 ,2025(24):1-3.

[5] 寇东晶 . 新时代党建引领国有企业文化建设实践路径 [J]. 现代企业文化 ,2025(23):19-21.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工程装备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基层党建与生产经营业务融合发展研究

铁晓蓓

摘要：新时代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基层党建与生产经营的深度融合需深入解构其内在逻辑与实践价值。当前部分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与中心任务间仍存在“融合不深”的机制梗阻，这就要求在实践中梳理党建引领的逻辑脉络，创新运行机制并探索可操作路径，进而推动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优势。研究过程中构建起“政治引领—机制协同—融合驱动”的逻辑框架，同步设计组织体系协同、管理体系嵌入、动力激发与文化融合、监督与保障等运行机制，并提出数字化赋能等前沿实践路径。相关研究成果能够为国有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提供理论支撑与行动指南，进而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持续强化党建引领作用。

关键词：基层党建；生产经营融合；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一、引言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本质要求，更是国有企业的“根”与“魂”，构成其独特政治优势。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中坚力量，在新时代肩负深化改革、提升竞争力、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重大使命。推进基层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是国有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与战略要求。通过这一融合，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可转化为生产一线的组织力、创新力与执行力，党建工作的“软指标”也能转化为安全生产与管理优化的“硬实力”，为国有企业长远健康发展筑牢根基。

本研究结合系统性理论分析与实践经验提炼，聚焦基层党建引领生产经营业务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创新运行机制及可复制实践路径进行阐释。政治引领层面，要强化党组织对企业全局的掌控作用，保障企业发展始终遵循正确政治方向，这是促进融合不断深化的基础；机制协同层面，需构建科学的制度体系破解融合中的体制性障碍，为融合工作整体推进提供关键支撑；融合驱动层面，要推动党建工作成果转化为企业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品牌建设的内生动力，持续为生产经营提质增效注入活力。

二、基层党建与生产经营业务融合发展的逻辑基础

（一）党建与生产经营的辩证统一关系

党建与生产经营并非相互割裂的平行范畴，而是深度依存、协同共进的辩证统一体。党建工作构成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政治根基，既为企业发展锚定正确方向，也为改革进程凝聚关键力量。生产经营作为企业的核心主业与中心任务，同时是检验党建成效的实践标尺与最终落点[1]，二者共同支撑国有企业政治功能与经济功能的有机融合。

高质量党建依托思想引领强化共识，借组织保障夯实根基，凭文化塑造凝聚合力，为生产经营筑牢组织基础、注入精神动力，助力企业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保持战略定力与高效执行力。生产经营的高效推进与竞争力提升，又能反向印证党建工作的有效性与生命力，推动政治效益与经济效益形成良性循环。这种深层次互动不仅支撑国有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更彰显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显著优势。

（二）融合发展的时代逻辑

新时代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需将党的建设全面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在此过程中推动党建实现从“组织形式嵌入”到“价值理念驱动”的深层转变。这种融合绝非简单的机构增设，而是要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与群众优势，实实在在转化为企业参与市场竞争不可或缺的创新动能、竞争实力与可持续发展支撑。构建并推广“党建生产力”话语体系，能够清晰地阐释党建在企业价值创造中的作用，将党组织的组织力、引领力内化为企业发展的竞争力。这一实践的时代逻辑，在于保障国有企业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守稳

正确政治方向、激发强劲内生发展动力，最终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与社会责任的有效履行。

（三）基层党建引领作用的逻辑机理

基层党建对生产经营的引领，需通过政治引领力、组织动员力与制度保障力协同支撑。其中，政治引领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为核心，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企业战略目标、发展规划深度结合，保障重大决策与技术创新的政治正确性及战略方向，助力企业行稳致远。

组织动员层面，基层党组织通过“支部建在一线”“党员冲在一线”等创新实践[2]，将组织优势转化为一线执行力。党员在关键岗位、急难险重任务及技术攻关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既强化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3]，又激发团队协作与创新活力，呈现“一个支部一座堡垒，一名党员一面旗帜”的生动局面。

机制创新则推动党建要求与标准嵌入企业管理制度，形成制度约束、过程监督、结果考核的有机闭环，为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筑牢长效根基，确保融合落地生根。

三、基层党建与生产经营业务融合发展的运行机制构建

（一）组织体系协同机制

组织体系协同是党建引领直达一线的基础机制支撑，构建“党委统领—支部驱动—党员示范”三级协同体系[4]，可形成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组织链条。其推动党建组织体系与生产组织体系深度融合、功能嵌入，破除传统组织壁垒的同时，创新“支部建在项目上”“党员冲在一线”组织模式。在重大工程项目与关键生产环节设立临时党支部、组建党员攻坚队，确保党的领导与党组织活动直接覆盖生产经营最末端、最前沿。这种组织层面的无缝对接与功能耦合，可将党组织政治优势转化为一线团队高效执行力与强大战斗力，保障企业战略意图精准传导、高效落地。

（二）管理体系嵌入机制

管理体系嵌入是破解党建与经营“两张皮”现象的关键机制，可有效推动二者目标同向、考核同轨。具体实施时，需将党建工作的目标设定、责任划分、考核标准等要素，有机融入企业战略规划制定、年度计划编排与经营指标体系构建全过程。实践中可依托“党建项目化管理”与“清单化推进”制度，将党建重点任务转化为具象化业务项目，同步明确可量化、可追溯的指标，确保党建工作与企业中心工作在部署上呼应、落实中协同、考核上一致，最终实现责任同向、考核同评。这一路径能将党建工作“软任务”转化为生产经营中可量化、可考核的“硬指标”，切实破解党建与业务工作“各说各话”的困境。

（三）动力激发与文化融合机制

围绕“信仰引领、文化塑形、激励导向”搭建党建动力系统，持续激活员工创新热情与协作活力。以“共产党员示范区”“党员责任区”为实践抓手，推动党员政治信仰与先锋本色转化为全体员工的职业操守和价值共识，进而培育“比学赶帮超”的良好氛围。这种深层次文化融合既强化企业凝聚力与员工归属感，也塑造积极向上的活力企业文化，为生产经营注入持久精神支撑与强劲内生动力。还需建立以党建绩效为主要考量的激励机制，将党建成果与员工职业发展、评优评先直接挂钩，为党建效能长效释放提供制度性保障。

（四）监督与保障机制

监督与保障机制为融合发展行稳致远提供长效支撑，核心是构建权责清晰、运转规范的监督体系。强化党委对企业重大决策的政治监督与审议职能[5]，确保重大经营决策始终契合党的方针政策与国家法律法规。搭建制度约束、过程监督、结果考核相衔接的严密闭环，对融合工作全过程开展动态监控。配套建立动态评估与持续改进机制，定期审视并优化党建与生产经营融合的制度标准、流程规范，确保各项要求落地见效，推动融合发展常态化、制度化。深化基层党组织书记双向考核，既考核党建工作成效，也考核经营业绩表现，切实压实融合工作责任。

四、基层党建与生产经营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

（一）党建引领生产一线的实践探索

实践中推动党建工作优势向生产一线效能转化，需重点推行党员干部进班组、带班制度，依托以点带面的实践让融合理念深度落地。常态化组建“党员突击队”，同步设立“党员先锋岗”与“党员责任区”，将党建组织优势与党员先锋精神转化为一线攻坚克难、保障安全生产的动力。党组织活动设计需要精准对接生产经营难点与痛点，确保党建优势高效转化为生产经营的实际经济效益与安全效益。鼓励党员在技术创新、节能降耗、质量改进中发挥带头作用，在此基础上推动党建工作全面融入精益化生产各环节，实现党建与生产深度协同。

（二）数字化赋能路径

以信息化平台与智能技术驱动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是企业提升治理效能的创新方向。智慧党建系统作为关键支撑，能够实时采集党建数据与经营指标，通过智能分析输出联动可视化结果。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应用，大幅提升党建工作管理评估的精准度与科学性，例如通过数据分析锁定党建薄弱环节，提前研判经营管理潜在风险。这类数字化融合实践能将党建工作要求无缝嵌入公司治理与生产经营各环节[6]，既能实现党建活动组织精准化与过程实时监督，又可科学评估实施效果，为企业提升现代化治理效能与精益化管理水平提供有力支撑。

（三）创新驱动与品牌建设路径

创新为企业发展提供关键动能，党建工作应紧扣这一导向构建“党建+创新”双轮驱动格局。实践层面可聚焦“党建+创新”示范工程培育，借助项目化运作促使党建品牌与企业文化在价值理念衔接、发展目标对齐上实现深度耦合。依托“党建创新工作室”“党员技术攻关小组”等载体，可将党建工作的政治引领力有效转化为技术革新、管理优化、商业模式创新的内生动力。该机制可引导党员与骨干员工围绕生产经营中的关键技术瓶颈、管理难点等开展创新实践，结合创新与创效的深度融合[7]，推动党建成果向企业发展成果高效转化，助力企业显著提升自主创效能力与市场品牌影响力，使党建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具象化的品牌价值。

（四）制度化与长效化路径

党建与生产经营融合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需以制度化建设与长效化机制为支撑。这一过程的关键是完善党建与生产经营融合的制度标准与流程规范，将实践中经检验有效的经验与模式固化为制度，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框架，其内容需涵盖融合工作的细化标准、考核实施细则及责任追究办法。

动态评估与持续改进机制的构建亦不可或缺。通过定期审视制度适应性与执行效能并优化调整，能够有效维系制度生命力。依托制度全贯通打造科学稳定且具备可操作性的制度体系，可最终为国有企业长远健康发展提供坚实制度支撑与持久规范保障[8]。

五、推动基层党建与生产经营融合发展的策略建议

基层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作为系统工程，需要多维度策略支撑并形成协同推进合力。政治引领与顶层设计层面，要将党建全面嵌入企业治理各环节，持续强化党委政治功能与领导效能，企业党委须系统谋划党的方针政策与企业发展战略的深度对接，制定融合推进的路线图与时间表，推动政策导向与战略实施同向发力，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市场竞争优势，同时清晰界定各级党组织在融合过程中的权责边界与具体任务。机制创新是破解“两张皮”难题的关键路径，需构建常态化协同机制与激励约束机制，促成党建与经营工作同频共振、深度耦合，可建立党建与业务双向考核评价体系，将党建“软指标”转化为约束干部职工行为的“硬指标”，把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成效、党组织攻坚克难实绩纳入绩效考核范畴，同步建立定期会商与信息共享机制，确保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在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无缝衔接，让党建真正成为企业“看得见的生产力”。

人才队伍建设是融合发展的基础支撑，构建党员干部培训与经营能力协同提升体系，形成融合发展的人才与智力保障。依托人才成长成才深度融合机制，重点培育政治过硬、业务精通、作风优良的复合型人才：面向党务工作者开展经营管理知识培训，强化其服务中心工作能力；针对经营管理骨干深化党性教育与理论武装，提升其政治站位。这种双向赋能不仅显著增强干部队伍执行力，更能为企业持续创新与高质量发展注入稳定人才支撑。

数字党建作为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路径，须整合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推动党建与经营管理全流程数字化协同。结合线上线下融合模式搭建智慧党建平台，实现党建活动精准组织、过程实时监督与效果科学评估。数字化手段可精准分析党员思想动态、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决策效率，最终提升企业现代化治理效能与精益化管理水平。

六、结语

基层党建是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根本保障，也是企业持续成长的内生动力。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既是对中央精神的贯彻落实，也是国有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路径。这种融合的本质，体现在组织形态创新、价值理念融合与动力系统重塑上，要求国有企业在公司治理各环节全程嵌入党的领导，进而形成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国有企业需在机制创新、数字赋能、制度固化等关键领域深化探索，把党建政治优势切实转化为企业发展优势与市场竞争优势，为企业迈向世界一流提供支撑，助力企业行稳致远、续写发展辉煌。

参考文献

[1] 赵庆 . 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J]. 国企 ,2024(04):38-40.

[2] 李禄松 , 金光旭 , 孙兆申 , 等 . 发挥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优势引领和保障一流企业建设 [J]. 石油组织人事 ,2021(09):24-26.

[3] 张洪瑞 . 新时代推进国企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实践研究 [J]. 现代国企研究 ,2022(07):40-43.

[4] 董瑞 . 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引领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J]. 企业文化 ,2025(11):31-133

[5] 刘伟伟 .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问题研究 [J]. 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 ,2024(02):167-169.

[6] 程勇军 . 深入研究完善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机制 [J].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文摘版）社会科学 ,2024(04):145-148.

[7] 罗启莲 . 党建创新与生产经营工作深度融合研究 [J]. 现代企业文化 ,2024(09):116-118.

[8] 寿健 .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与实践 [J]. 珠江水运 ,2024(24):151-154.

（作者系葛洲坝易普力广西威奇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政工师）

五年制高职校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融合的路径探究
——以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为例

是新宇

摘要：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党建与业务工作融合是高职院校党建工作的生命力所在。五年制高职要以党建为抓手，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本文通过分析目前高职校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融合中存在的思想认识、工作机制、考核激励等方面的突出问题，指出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融合的重要性，并以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为例，从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党业融合理念，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党业融合制度机制，聚焦发展目标、增强党业融合实效等三个方面探讨融合路径。

关键词：五年制高职院校；党建工作；业务工作；融合路径

近年来，高等职业院校严格遵循《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相关要求，将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有机结合。五年制高职校承担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任务，必须将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办学治校始终，并以基层党建的创新实践作为核心引擎，驱动学校各项事业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当前，五年制高职校在推进党建与业务融合方面已开展多种尝试，并积累了一定经验。但通过调研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及其他高职校后，发现在党建与事业推进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思想认识上“重业务、轻党建”、党建与业务脱节的“两张皮”现象还存在，两者融合的机制建设也有待进一步加强。

一、五年制高职校党建与业务之间的关系

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相互依托、相互促进。没有业务支撑，党建容易“空泛化”；没有党建引领，业务容易“迷失方向”。

（一）党建为业务工作提供政治引领和思想保证

五年制高职校的党员教师既肩负着教育教学、学术研究等职责，更应在实际工作中体现先进性，将思想政治引导融入业务实践，一方面确保业务发展不偏离正确的方向和价值观；另一方面借助其凝聚人心、干事创业的作用，推动教学、科研等业务顺利完成。

学院及教研室的各项业务活动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应坚定不移地遵循党的领导，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只有将党建工作做实做细，才能为业务工作的稳步推进提供坚实支撑。加强党建工作，有助于调动党员教师的积极性，促使他们在本职岗位上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提升业务工作的实效。

（二）业务工作为党建提供实践载体和效果检验

五年制高职校推进党建工作，核心目标是增强党员教师的思想政治素养与教育教学能力[1]。因此，党建工作必须与业务工作发挥协同效应，才能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若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相互脱节，其针对性和实际意义就会减弱。业务工作是党建工作的重要载体，党建工作应紧密围绕人才培养、专业建设、课程改革等主业展开，并贯穿于业务全过程。

党建通过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纪律建设等，为业务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环境、提供攻坚克难的战斗力。基层党支部应当将业务要素融入党建活动中，针对教师在教育教学、科学研究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展开研讨，使党建工作更贴近实际、更具活力。通过将党建贯穿于业务实践，充分发挥其在教学、育人、科研等方面的引领作用，同时为教师开展业务工作提供学习交流的平台，进而提升党建工作的实际成效。

二、五年制高职校党建与业务融合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办好教育的根本保证。”作为落实教育任务的各级学校，必须将党的教育方针

贯穿于课程设计、教学实施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要着力促进党建工作与教育教学相结合，不断巩固党在教育领域的领导核心地位，切实增强育人工作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一）有助于增强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

立足五年制高职教育的功能定位，要精准厘清党建工作与业务的内在联系：党建为学校发展筑牢根基，业务为办学实践明确目标。五年制高职院校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切实凸显党委在把握发展方向、谋划全局工作、科学制定决策、锻造过硬队伍、推动工作落地等方面的核心作用。党建工作的政治引领作用，引导高职院校坚持正确方向、实现行稳致远。

（二）有助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党建工作的有效开展，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支撑，能助力营造优良的校园学习氛围。通过将党建工作与教育教学工作进行有机结合，能够确保党的思想政治引领作用覆盖学生成长发展的每一阶段。借助多样化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切实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和理论认知水平，进一步厚植学生的爱国情怀，强化其社会担当意识。

（三）有助于夯实人才培养的质量根基

五年制高职校通过完善党组织体系，提升学校治理效能，实现科学决策和高效管理。加强党员教师培养，增强业务能力，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深化产教融合，推动校企合作，为学生搭建更多实践和就业通道，助力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能够促进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工作的协同并进，赋能学校高质量发展。

三、五年制高职校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融合的路径

推动党建与业务工作的融合，是根治基层工作中“两张皮”痼疾的根本之策。此举不仅能有效激发基层党组织的创新活力，更能激发广大党员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

（一）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党业融合理念

五年制高职校贯彻党的领导，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充分发挥学校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将党的领导全面贯穿于学校工作的各领域和全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学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2] 作为最佳融合领域和最具实效的实践路径，思想政治工作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强化理论武装和思想引领，能够有效提升全体党员教师对党建与业务协同发展重要性的认识，切实树立“围绕业务抓党建、抓好党建促业务”的工作理念，确保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要求全面落实于人才培养、专业建设、教学改革等核心业务环节。

同时，应着力培育基层党组织的“党建 +”融合发展理念，引导各党支部立足专业特色和岗位实际，积极探索党建工作创新模式。通过构建“党建 + 专业建设”“党建 + 科技创新”“党建 + 人才培养”“党建 + 社会服务”等特色载体，将党建工作嵌入项目管理的全链条，既立足党建本质要求，又聚焦融合发展实效；既着力破解“重业务、轻党建”的倾向性问题，又切实解决党建与业务“两张皮”的现实困境。最终实现党建目标与业务目标的有机统一，构建党建与业务协同发展的“一盘棋”格局，为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和有力的组织支撑。

（二）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党业融合制度机制

1. 构建“12345”党建体系

高职院校要实现党建与业务工作高质量融合发展，必须建立健全党建治理体系，完善制度保障机制。这一过程需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通过科学的顶层设计，创新党组织建设模式和工作体系[3]。

以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为例，该校构建了“一体两翼三引擎四联动五融合”的党建工作体系：坚持党委主体核心作用，筑牢党建根基；强化党支部两翼支撑，推进党建业务互融互促；驱动“强项目、立标杆、抓考评”三大引擎；构建“党委带动、支部推动、党员促动、党群互动”四维联动机制；实现党建与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教学改革、教师队伍、产教协同的深度融合。该校建立了“333”党建工作机制：实施“党委领航工程、党支部堡垒工程、党员先锋工程”三大工程；开展“创新支部工作法提质增效、规范支部标准提能增技、推动支部品牌提亮增色”三项行动；落实“‘一支一品’抓基层组织提升、‘一支一业’抓重点项目攻坚、‘一人一单’抓党员作用发挥”三个抓手。这一机制创新为党建与业务融合提供了制度保障和实践路径。

2. 创新党支部工作方法

党的基层组织是整个党的组织体系的基础和根基，要“使基层组织真正成为而不是在口头上成为党组织的基本细胞”[4]。高职院校党建要以推动中心工作为着力点，重点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常州刘国钧高职校党委下设 7 个基层党支部，通过创新工作方法实现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的实践突破。

艺体联合党支部创新实施“三区三同”工作法，按照“党支部建在专业上，党小组驻在责任区里，党员身在项目中”的组织原则，将支部党员划分为德育引航责任区、“艺成”文化责任区、体育健康责任区三个责任区。每个责任区围绕班级管理、专业建设、教学大赛等具体业务工作，落实“目标同向、步调同频、作风同正”的工作要求，实现党建与业务的有机统一。软件数据学院党支部推行“三进三有”工作法，通过党支部“牵头进”双优建设、支委委员“带头进”项

目建设、以普通党员身份“自觉进”任务承接的三级联动机制，确保党建工作“有方向”、组织“有力量”、党员“有信心”，形成了党建促业务、业务强党建的良性循环。智能制造学院党支部创建“123”特色工作法，构建了包括一个“匠心”党支部书记工作室、“中德职业教育产教联盟、航天创胜产业学院”两个产教平台、“教学、技能、育人”三类党员先锋的党建工作体系，实现了党建工作与专业发展的深度融合。

（三）聚焦发展目标，增强党业融合实效

1. 党建融入专业建设

学校党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着力在学深悟透、融会贯通上下功夫。党员教师积极融入办学实践，以党建推进专业发展[5]。

智能制造学院党支部选拔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突出的党员教师，组建“专业高质量建设党员先锋团队”。基于“底层共享、中层分立、高层互选、顶层拓展”的课程体系设计理念，先锋团队对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课程进行系统性重构，与区域智能制造领军企业合作，共同开发体现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的配套专业教学资源。将企业典型生产案例、技术标准转化为教学项目，开发活页式教材、虚拟仿真实训系统等数字化资源，实现“课堂—车间”无缝衔接；推行“双导师制”，由企业工程师与校内党员教师共同指导学生实训，确保技能培养与岗位需求精准对接。学院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已成为数字化智能化高水平专业群，实现了人才培养质量与产业服务能力的双提升。

2. 党建融入课程教学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践行“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教育战略要求。

数字经济学院党支部联合学校思政教研室组建“课程思政工作坊”，着力破解专业课程教学中的两大难题：一是如何将专业知识讲得通俗易懂、生动有趣；二是如何自然融入思政教育元素。通过开展思政教师专题讲座、组织集体备课等形式，系统挖掘专业课程中的思政元素。与当地头部企业合作开发教材，将企业真实项目转化为教学案例，在知识传授中嵌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施校企双元协同教学，将思政目标融入项目化教学，形成“专业知识 + 思政元素 + 实践能力”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多轮教学实践表明，改革后的课程吸引力显著增强，学生学习兴趣和职业素养同步提高，也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3. 党建融入师资队伍建设

学校创新构建“代际传承、三维联动”师资队伍建设模式，通过党建引领、名师带动、青师成长三个维度协同推进教师专业发展。

校党委打造师德师风建设“三堂课”：以校史文化厚植理想信念的“基础课”，通过讲述爱国实业家刘国钧的事迹、设立师德建设月、评选十佳师德标兵、建立预警机制等，筑牢教师思想根基；以“四大赛事”锤炼强能笃行的“必修课”，让教师在技能大赛、教学大赛等层层竞技中磨砺本领；开展“学习身边榜样”等活动，上好争先创优的“进阶课”，用典型的力量激发情感共鸣。

实施“名师领队”工程，各党支部组建由教学名师、德育导师、技能大师领衔的项目团队，建立“核心引领、辐射扩散”的团队建设模式，推行“引领—成长—提升”进阶培养机制，形成“名师导教、带徒传技、共研共生”的工作格局。同时，重点推进“双培养”机制：把党员培养成教育教学骨干，把骨干教师发展成党员，通过每月定期的党建学习与业务交流，促进党建工作与教育教学、人才培养的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党员在教改创新、立德树人、技能竞赛等领域的先锋模范作用。

新形势下，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是五年制高职校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举措，也是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通过党业融合，能够将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转化为推动业务发展的强大动力，为学校稳健前行提供坚实保障。

参考文献

[1] 梅亚萍 . 新时代职业院校党建工作引领思政工作的困境与对策 [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0(19):10-14.

[2]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6-12-08(01).

[3] 李刚 . 新时代高校教师党支部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的实现路径研究 [J]. 高教学刊 ,2020(20):60-62.

[4] 列宁全集 : 第 10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58: 345.

[5] 高敬 . 天津高职院校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的探索与实践 [J]. 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1,14(02):6-8.

（作者系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高级讲师）

高质量党建引领下供电企业精神文明建设探索

姚维俊

摘要：企业文化建设是推动供电企业持续进步的核心要素与精神支撑，必须紧扣供电主营业务，系统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为供电企业实现高效运营、协调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注入精神动能、提供智力资源和思想保障。因此需要充分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推动供电企业整体进步，强化员工职业素养培育，着力打造专业化人才梯队，将党组织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与供电主营业务有机融合，确保供电企业各项事业稳步、协调、高效推进。

关键词：高质量党建；供电企业；精神文明建设

对于供电企业而言，党的建设工作涵盖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等多个方面。高质量党建工作可以促成企业发展，能够在观念、思路等方面对企业的发展给予指导，让企业的前进能够同党保持一致并符合党对电力产业发展提出的各项要求。党建工作还能够为企业内部竞争提供强大优势，有利于保证企业内职工的稳定，提高组织凝聚力。精神文明建设是企业发展过程中生命力的基本保障，是企业体现“以人为本”宗旨的必要途径。对电力企业而言，精神文明建设是与其自身业务紧密相连的，是企业文化、价值观的表达。同样，搞好企业精神文明建设可以显著提高供电公司员工的整体素质和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因此对供电公司而言，维护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健康，做好党的建设及精神文明建设都是非常重要的。

一、供电企业党建和精神文明建设双向开展中的问题

（一）工作思路不够创新

在一些地方，电力企业党组织依旧沿袭以往思维方式，党建工作的作用和力量未充分发挥出来，在精神文化建设方面也缺乏成效，缺乏适应电力行业发展所需的持续发展态势，具体表现为党的领导与企业文化建设未能紧密融合于电力的运行实践，与现实脱离程度较大。已经开展的党务工作以及企业文化建设形式较为单一，内容较为枯燥，致使电力企业内部管理工作发生问题[1]。

（二）活动形式单一

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电力行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电力企业必须突破传统思维桎梏，持续深化企业文化建设，方能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然而现实情况是，部分电力企业的党建工作存在形式主义倾向，文化建设成效不够显著，加之教育培训内容缺乏新意，整体工作流程僵化呆板，创新动力不足，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企业党组织作用的发挥和文化建设的实际效果。

（三）企业文化传承途径有待探索

电力公司文化内向性传输路径不清晰。一方面，一些电力企业没有对他们企业的具体精神文化、核心精神文化和文化传输的途径、方法进行明确、合理描述和规划，因而在文化内涵上出现模糊性问题，一些进入公司的新员工也对这个问题表示不理解。另一方面，一些电力企业对于企业的文化内向性传输，没有采取长效而有针对性的行动或计划。一些所谓的“企业内向文化活动”往往只是一些表面的行动，缺乏内核与覆盖面，不深入员工的内心，不触动员工心灵，没有引起共鸣。这种文化内向性传输途径的模糊性，是电力企业面临的企业文化构建难题的关键因素。时间的推移与积累，会使这一模糊的行为淡化和丧失企业文化。随着新老员工在企业工作时间和从业经历的拉开，会让双方在企业文化内涵的理解上差异越来越大，这就会降低企业整体内部的组织向心力、工作激情与创造力。

二、高质量党建引领下的供电企业精神文明建设路径

（一）强化政治建设，把准发展方向

牢牢把握国有企业的政治属性，自觉把讲政治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融入实践。一是理论武装走深走实。把握“及时跟进学”和“深入研讨学”要求，规范落实党委会“第一议题”，建立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上下联学、专题解读”机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二是党组织作用有效发挥。坚持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动态修订公司党委工作规则和“三重一大”决策实施细则，指导基层单位修订章程，推动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发挥制度化、具体化。三是责任机制持续完善。坚持“大党建”理念，修订党建工作绩效考核评价办法，深化落实上级公司“三述一考”党建责任落实机制，建立“一述四评”述职评议模式，打通责任落实的“最后一公里”。

（二）突出强基固本，赋能企业发展

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持续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在推动公司发展中发挥党建独特优势。一是不断夯实基层基础。逐级制定党委、党支部责任清单和任务清单，推动各级党组织规范化履责、差异化落实。常态化开展基础管理“飞行检查”，动态修订典型问题案例库，以查促改提升标准化建设水平。二是增强融入融合成效。打造“两融”党建品牌，运用“揭榜挂帅”机制推进党建年度重点任务，实施覆盖各专业的“党建 +”工程，常态开展“党员身边无违章”系列活动，切实提升党建与生产经营融入融合水平。三是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加强共产党员服务队建设，建立“实体化运作、柔性化管理”工作机制，助力城区老旧小区改造、迎峰度夏保供等重点任务。在日常服务的基础上，考虑增设“服务残疾儿童康复中心”专项服务，通过日常关爱、认领“微心愿”、设备安全义诊等方式提供志愿服务[2]。

（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由于不同思想的影响，有的工作人员很有可能陷入思想固化或蜕化的问题当中。长此以往，除了带来消极腐败作风，还严重妨碍了企业的稳定及发展。因此，十分有必要强化党员干部廉政建设工作。例如完善信访举报机制。在运营实践中，保障信息畅通，营造良好的监督氛围，向外公开举报电话；坚持实施领导干部接待日制度，制定科学的接访值班时间表，确保有领导干部电话接听及走访群众。

在实际工作中，为了提高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开创良好的发展环境，对人员的管理需要更加严格，同时要关注他们的思想导向。电力公司需要关注员工的思考方式，从而提高团队的整体实力，这是实现党组织的改革、创新和加强企业科学管理能力的关键。在企业的领导者方面，需要解决知识水平不足的问题，保持党员的清正廉洁，降低科学管理的难度，增强党组织的改革意识，建设高水平的队伍，推动反腐倡廉建设，搭建党员的教育体系，并借此来保障电力公司的稳固性[3]。

（四）坚持文化引领，彰显企业价值

抓住党和政府关注要点、社会民生热点，发挥公司资源优势，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展现企业务实作为。一是加强思想文化建设。联合顶尖高校打造思政教育基地，开展党组织结对共建，构建“理论指导 + 实践验证”的校企合作样板，将高校智力资源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聚焦行业痛点申报高质量研究课题，争创国家级优秀成果，以理论突破引领实践创新，形成“研究—应用—迭代”的良性循环。启动文化赋能专项项目，选取基层单位（如三新公司、供电所）作为试点，将抽象文化理念转化为服务标准与工作流程，实现“文化软实力”向“发展硬实力”转化。二是创新融入文明实践。围绕地方发展需求打造特色服务品牌（如“电暖流”），建设标杆性服务中心，争创系统内党建标杆，形成“一品牌一特色一标杆”的创建格局。结合地域特点构建“1+N”阵地体系（如“1+3”模式），以城区中心基地为核心，辐射常规点、特色点、乡村点，实现文明实践全覆盖。三是全周期培育选树。建立“日常挖掘 + 专项评选”机制，覆盖管理、服务、技术等多领域，培育多元化典型矩阵。通过纪实文学、专题报道等形式讲好典型故事，结合线上平台与线下展厅打造“可听可看可学”的示范窗口，扩大典型影响力。推动典型力量下沉基层，选派优秀党员担任驻村党支部书记、设立服务联系点，建设“电力爱心超市”等公益载体，将典型效应转化为乡村振兴、民生服务的实际成效[4]。

（五）完善党建工作制度

众所周知，只有经过有效的规章制度的完善以及有序运营模式的设定，相关的制度才能够得到有效贯彻。电力公司需要注重发展业务活动，同时加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从而使得有关生产与管理活动的有效结合更为深入人心，以此来促进该单位发展进步的稳定，有效地发挥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实际运行方面，可开展定期化的制度研讨会，使其保障公司内部的思想碰撞，不断更新党建内容，进一步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从而符合电力单位长期发展要求。

建立党组织和党员工作责任制度，使每一个不同级别的组织都有固定的人员进行具体的管理。利用签订责任书、开展年度考核的方式来加强责任落实，从而使党建工作得到扎实开展。对党建工作进行开拓性的尝试，在企业中具体开展互联网党建工作，通过线上学习，诸如网络平台对党员进行教育培训、集体行动，从而使党建工作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等多种方式，从而使领导干部的榜样带动作用得到

最大限度的体现。将党建工作融入公司生产、安全、客户服务等方面，用高质量的党建工作指导企业的发展。

（六）加强工作作风创新

企业党建工作的核心应该是作风建设，并需要将作风建设工作同企业发展工作联系起来，提高党的工作效能与质量。一是要树立联系职工、为职工服务的意识。领导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保障企业职工的权益。走进职工群众，了解群众的真实想法，进而满足群众的需求。二是要强化党员的培养教育，提高党员综合素质。三是要严格执行党内工作考核制度，奖优罚劣[5]。

（七）筑牢枢纽阵地，构建一站式服务“暖空间”

公司应该聚焦供电服务、便民服务和特色服务融合，打造“电暖流”城市服务中心，作为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枢纽阵地。在服务功能与覆盖范围上，市区“电暖流”城市服务中心，以营业厅、超级充电站、党员服务队队部等为载体，面向营业用户、户外劳动者、新能源车主等群体，24 小时提供服务。县区“电暖流”城市服务中心则可以加强与工会、妇联、文旅、教育等单位合作，在营业服务、志愿服务基础上嵌入特色服务，更好响应“地方需求”。

（八）深耕文明实践，着力培育文明新风

在推进城市文明建设过程中，我们着力深化各类文明创建活动，包括文明单位评选、文明科室打造、文明班组培育、文明职工表彰、文明窗口优化等系列工作，确保文明理念渗透到每个角落，实现文明建设无盲区。同时，广泛动员干部职工投身文明城市创建实践，同步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中心的筹建与运营工作；组织广大职工对供电线路进行安全体检，为用户提供换装计量设备的服务，积极开展“我为人民献爱心”等各类公益活动。共产党员服务队的热情和活力，描绘了五彩缤纷、斑斓多姿的文明图画，引领广大群众由“被动执行志愿者工作任务”向“主动承担志愿者工作任务”转变。在志愿服务队伍建设中，培育了一批有潜力的志愿者精英骨干，他们是党员服务队骨干力量，是青年志愿者的优秀示范者。着力优化完善各项内外服务项目，搭建好各类服务平台，创造出更多更加有效的志愿服务实践机会，扩大宣传实效，提升品牌影响力。

（九）创新特色阵地，打造企业外延服务的“真情角”

充分利用企业文化阵地、服务阵地和乡村振兴点等各类资源，统筹打造“小而精、专而美”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特色阵地。一是将新时代文明实践与企业文化发展相结合，建设职工文艺工作室、电力相关博物馆，并面向公众开放，提供文艺创作、纠纷协调和电力文化参观等特色服务；二是将新时代文明实践与充电站建设相结合，在具备条件的充电站同步建设“司机之家”“共享书吧”等便民设施，既服务充电车主，也为新就业群体、户外劳动者等提供歇脚点和便民服务；三是将新时代文明实践与乡村振兴工作相结合，积极发挥驻村“第一书记”在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如泰州供电公司，先后在兴化联镇村、泰兴根思村、靖江惠圣村等地建设“电力爱心超市”“电动农机具服务中心”“全民共享直播间”等，组织引导村民参与公共服务、环境整治和农产品推广，共同建设和美乡村。

三、结语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精神文明建设，这对于企业长期发展而言影响巨大。基于此，在实现电力公司提高建设能力、改善运行效益的目标时，需要我们重视思想政治体系的建设，在推动党的领导及思想道德建设的整合落实上发挥作用，通过健全组织机制等方式，实现电力公司稳步发展。

参考文献

[1] 高振，袁星 . 供电企业党建与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路径 [J]. 数字化用户 ,2022,28(34):154-156.

[2] 林琳 . 供电企业精神文明建设与企业文化的融合策略 [J]. 数码设计（上）,2020,9(11):124.

[3] 段向东 . 党建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在供电企业中的开展 [J]. 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 ,2019(16):137.

[4] 杨策策，刘利广 . 供电企业党建与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研究 [J]. 百科论坛电子杂志 ,2019(12):453.

[5] 李会凯 . 供电企业党建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创新 [J]. 百科论坛电子杂志 ,2020(12):1041.

（作者单位：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泰州供电分公司）

开放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的探索与实践
——以丹东开放大学为例

李继军

摘要：本文以丹东开放大学为例，探讨开放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与成效。通过分析丹东开放大学在社区老年教育体系建设、数字化资源整合、公益送教活动、智慧助老服务等方面的具体实践，总结其在推动全民终身学习和构建学习型社会中的经验。研究发现，丹东开放大学通过构建“两级管理、四级办学”网络、开发特色课程、整合社会资源、创新服务模式，有效促进了开放教育与社区教育的深度融合，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发展模式。文章最后提出进一步优化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终身教育体系的完善提供参考。

关键词：开放教育；社区教育；融合发展；终身学习；丹东开放大学

一、丹东开放大学社区教育融合发展的实践探索

（一）构建完善的社区教育体系

丹东开放大学在丹东市政府的支持下，建立了覆盖城乡的社区教育网络体系。根据《丹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丹政办发〔2021〕17号），丹东市构建了“两级管理、四级办学”的社区教育体系，包括1个市级社区教育指导中心、6个县（市、区）级社区教育指导中心、1个市级老年大学、6个县（市、区）级老年大学、45个街镇社区学校和405个社区分校。截至2024年，丹东市内三区和东港市已实现社区村级学习网络全覆盖，凤城市和宽甸满族自治县也通过建立社区学习点逐步完善体系建设。

这一体系充分发挥了开放大学的系统优势，实现了教育资源的纵向贯通和横向联动。市级开放大学负责统筹规划和业务指导，县区级分校承担区域协调职能，街镇社区学校和社区分校直接面向居民提供服务，形成了层级分明、职责清晰的管理架构。同时，丹东开放大学积极推动体系内各单位的协同合作，如组织各县（市、区）老年大学申报辽宁老年大学县（区）学院，助力全省社区教育一体化发展。

（二）开发特色课程资源

课程资源是教育融合的核心内容。丹东开放大学坚持“立足社区、服务社区”的理念，采取引进与开发并重的方式，构建了多元化的社区教育课程体系。学校向全市征集优质微课程资源103节，自主开发面授课45节、网络微课程50节，内容涵盖公民素养、职业技能、生活休闲、健康养生、文明文化和地方特色等方面[1]。

针对老年人的特殊需求，丹东开放大学开发了系列特色课程：为弘扬地方红色文化，开发了抗美援朝精神专题课程；为传承党的优良传统，开发了党课系列课程；为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开发了智慧助老系列课程；为保护老年人财产安全，开发了理财安全系列课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学校成立的家庭教育教研小组开发的“学家庭教育，做智慧家长”系列微课程，其中7节被教育部社区教育研究培训中心评为优质课程资源，相关课程也被辽宁省社区教育指导中心收录。

这些课程充分考虑了不同群体的学习需求和接受能力，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例如，智慧助老课程针对老年人日常生活场景，设计了手机基本操作、微信使用、生活缴费等内容，并专门开设防范网络诈骗课程，帮助老年人增强安全意识。课程形式的多样性也是丹东实践的特色，既有面授课程便于互动交流，也有网络课程满足灵活学习需求，还有实践活动增强学习体验。

（三）创新服务模式

丹东开放大学在社区教育服务模式上不断创新，形成了多种特色做法：

公益送教活动：学校持续8年开展公益送教进社

区项目，累计送教 364 次，受众近 2 万人次。2024 年与元宝区妇联合作开展“百堂讲座进社区活动”，办活了社区家长学校。送教队伍由老、中、青三代教师组成，课程质量和服务范围逐年提升 [2]。

智慧助老服务：针对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学校建立了“智慧助老服务站”，选拔计算机专业教师和青年教师组成志愿服务队，深入社区提供一对一辅导。开发的智慧助老系列课程包含线下面授课 20 节和线上微课 13 节，内容涵盖智慧出行、智慧医疗等实用场景。

数字化学习社区建设：丹东开放大学在全市 27 个社区开展数字化学习社区建设，共享省级数字化学习资源 4000 个。在元宝区重点推进数字化社区建设，实现七道街道 10 个社区数字化学习全覆盖。学校还收集社区学习反馈，不断优化资源供给。

终身学习活动推广：学校每年组织开展“百姓学习之星”和“终身学习品牌项目”评选，成功推荐全国和省级学习之星 21 人、品牌项目 15 个。2024 年参与辽宁省“阅读新时代助力新突破”读书活动，推荐典型案例和优秀作品 63 个，其中 19 个获奖。

这些创新服务模式体现了丹东开放大学“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理念，通过送教上门、数字赋能、典型引领等方式，有效扩大了社区教育覆盖面，提升了服务质量和效果 [3]。

（四）加强队伍建设

人才队伍是教育融合的关键支撑。丹东开放大学通过多种途径加强社区教育队伍建设：

专家团队建设：2023 年确定市级社区教育专家 22 人、讲师团成员 129 人。2024 年推荐 5 人被评为辽宁省社区教育专家，13 人被评为辽宁省社区教育骨干教师。同时，将 133 名教师纳入国家老年大学师资库。

志愿者队伍培育：学校整合社会资源，组建了由高校教师、行业专家、社区工作者等组成的志愿者队伍，参与课程开发、教学辅导等活动。特别是在智慧助老服务中，志愿者发挥了重要作用。

管理人员培训：定期组织社区教育管理人员培训，提升其规划协调、资源整合和组织实施能力。学校还建立了社区教育负责人制度，每个社区分校配备专人负责教育工作。

通过专兼结合、多元参与的方式，丹东开放大学打造了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区教育队伍，为工作开展提供了人才保障 [4]。

（五）创新老年教育模式

2019 年，丹东市教育局依托丹东开放大学成立丹东市老年开放大学，积极探索老年教育新模式。老年开放大学分为南北两个校区，总建筑面积近 4000 平方米，学校投入 60 余万元对校舍进行装修改造，配备古筝、电子琴、钢琴等教学设备。

在专业设置上，从最初的 11 个专业扩展到 19 个专业，包括英语口语、朗诵、摄影、国画、书法、声乐、电子琴、古筝、太极拳、茶文化等，年招收学员近 500 人次。学校注重规范化办学和人性化管理，每个班级配备班主任，通过班委会协助开展教学服务。在教学方面，选拔校内骨干教师和引进专业人才担任专职教师，同时聘请知名专业人士担任兼职教师，形成专兼结合的专业化队伍。

为丰富学习体验，学校设置“第二课堂”，组织户外摄影、春日写生、黄金大道走秀、新春送福、文艺汇演等活动。同时，引导老年学员参与社会服务，与各社区开展文化惠民、重阳节、包粽子、送春联等活动 50 余次，发挥了老年群体的正能量。2024 年 9 月，丹东市老年开放大学获批成为辽宁老年大学丹东分部，标志着其办学水平得到了上级部门的认可 [5]。

二、丹东开放大学社区教育融合发展的成效分析

（一）体系构建成效

丹东开放大学建立的“两级管理、四级办学”社区教育网络，实现了市、县（市、区）、街镇、社区（村）四级全覆盖。截至 2024 年，全市共培育 2 个省级优秀社区教育院校、6 个省级老年教育实践基地、10 个省级社区（老年）教育学习示范中心、18 个市级示范学习中心和 17 个市级示范培训基地。这一体系打破了教育资源条块分割的局面，实现了开放大学系统与社区组织的有效衔接，为居民提供了便捷的学习支持服务。

（二）服务供给成效

通过资源整合与模式创新，丹东开放大学显著提升了社区教育服务供给能力。2024 年上半年完成公益送教 86 次，参与学习 4000 余人次；数字化学习社区扩大至第四批 26 个社区；推荐 22 个典型案例和 41 个优秀作品参加省级读书活动。老年大学专业从 11 个增加到 19 个，学员近 500 人次。这些数据表明，融合发展的社区教育能够更好地满足居民多样化学习需求 [6]。

（三）社会影响成效

丹东开放大学的社区教育工作获得了广泛社会认可。学校多次被辽宁省社区教育指导中心评为“优秀组织单位”；2023 年丹东市社区教育指导中心被评为新闻报道先进单位；“智暖桑榆乐享科技之光”案例和“智慧医疗微课堂”系列微课被教育部评为优质课程资源全国推广。社区教育活动被《辽宁日报》、人民网等媒体报道，营造了良好的终身学习氛围。

（四）典型个案分析

“智暖桑榆乐享科技之光”智慧助老项目是丹东开放大学社区教育的成功案例。该项目通过需求调研、课程开发、志愿服务等方式，帮助老年人掌握智能技术应用。主要做法包括：深入社区调研老年人学习需求；开发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课程体系；组建“智慧助老服务站”提供一对一辅导；开展“美好生活”公益讲堂等。

项目成效显著：提高了老年人对智能产品的接受度和使用率；建立了长效服务机制；扩大了社会影响力，形成了敬老爱老的良好氛围。这一案例体现了开放大学资源与社区需求的有效对接，展示了教育融合的实际价值[7]。

三、开放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基于丹东开放大学的实践经验，为进一步推动开放教育与社区教育深度融合，提出以下建议：

（一）强化政府统筹，完善协同机制

加强顶层设计：地方政府应将社区教育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定促进开放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的专项政策。可借鉴丹东经验，出台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开放大学在社区教育中的职责定位。

建立协调机构：成立由政府牵头，教育、民政、财政等部门参与的社区教育委员会，统筹资源分配和工作协调。丹东市社区教育指导中心的经验表明，跨部门协作对整合资源至关重要。可推行“社区教育联席会议”制度，邀请社区代表、居民代表参与决策，确保需求导向。

加大经费投入：建立以财政投入为主、社会资本参与的多元筹资机制。设立社区教育专项经费，并纳入财政预算，确保工作持续开展。

（二）深化资源整合，优化服务供给

共建共享资源：开放大学应充分发挥数字化资源中心作用，与社区组织共同建设课程资源库。可借鉴丹东“家庭教育微课程”开发模式，针对不同群体需求开发特色课程。推行“菜单式”服务模式，编制资源目录和服务清单，供社区按需选择。

推进数字化建设：加快智慧教育平台建设，实现“互联网 + 社区教育”融合发展。丹东数字化学习社区的做法值得推广，可进一步扩大覆盖面，提升服务质量。

创新服务模式：结合居民实际需求，开展送教上门、流动课堂、线上辅导等灵活多样的服务。推广“点单 + 配送”服务模式，居民点单、社区报单、开放大学派单[8]。

（三）加强队伍建设，提升专业水平

培养专业人才：建立社区教育人才培养体系，通过专业培训、实践锻炼等方式提升队伍素质。丹东的社区教育专家和讲师团制度可进一步完善和推广。

健全激励机制：制定社区教育工作者职称评定和表彰奖励办法，增强职业吸引力。解决丹东实践中反映的成人教育工作人员职称评定问题。

扩大志愿者队伍：动员高校师生、行业专家、退休人员等参与社区教育，形成多元参与的志愿服务体系。

（四）完善评价体系，促进质量提升

建立质量标准：制定社区教育机构建设、课程开发、教学服务等方面的标准规范，保障教育质量。

加强督导评估：定期开展社区教育工作评估，将居民满意度作为重要指标。丹东对社区学校的考核办法可进一步优化完善。

推进学分认证：探索“学分银行”制度，实现社区教育学习成果的积累与转换。可参考国内外先进经验，开展试点工作。

四、结语

丹东开放大学的实践表明，开放教育与社区教育的融合发展是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有效路径。通过体系构建、资源开发、模式创新和队伍建设，能够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更好地满足居民多样化学习需求。特别是在老龄化社会背景下，社区老年教育的创新发展对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未来，开放大学应进一步明确在终身教育体系中的定位，深化与社区组织的协同合作，创新教育服务模式，为学习型社会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丹东开放大学的经验为其他地区提供了有益借鉴，但各地还需结合自身实际，探索特色发展路径，共同推动我国终身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 廖长生 . 开放大学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实践——以温岭学院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为例 [J]. 知识窗 (教师版),2024(09):86-88.

[2] 施苏苏 . 开放大学培植社区教育资源“耦合共同体”的可为与将为 [J]. 成人教育 ,2022,42(07):65-70.

[3] 刘玉芝 , 杜昕鑫 . 终身学习视域下开放大学开展社区老年教育的实践与路径——以盘锦康桥社区老年教育为例 [J]. 辽宁开放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5 (01):33-36.

[4] 刘玉芝 , 杜昕鑫 . 终身学习视域下开放大学开展社区老年教育的实践与路径——以盘锦康桥社区老年教育为例 [J]. 辽宁开放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5(01):33-36.

[5] 王慧 , 张湘云 , 刘利珍 . 开放大学实施社区家庭教育发展的路径研究 [J]. 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 ,2025,8(02):72-75.

[6] 武云霞 . 开放大学开展社区教育的探索——以石家庄开放大学为例 [J].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2,34(06):47-51.

[7] 梅洁 . 共同富裕视角下开放大学服务县域社区教育的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 [J]. 江西开放大学学报 ,2025,27(01):32-40.

[8] 王少华 . 开放大学发展社区教育解析 [J]. 中国成人教育 ,2020(22):66-70.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辽宁开放大学 2025 年开放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开放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的探索与实践——以丹东开放大学为例”(KFJG2025-06)。

(作者单位：丹东开放大学)

伟大建党精神融入艺术院校学生党员对党忠诚教育的耦合机理与实践路径研究
——以广西艺术学院为例

徐辉强

摘要：对艺术院校学生党员开展对党忠诚教育，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固本强基之举，也是保持党和人民事业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艺术教育创新转型加速的背景下，加强艺术院校学生党员对党忠诚教育面临教学内容供需错位、专业特色融合流于表面等困境与挑战。构建伟大建党精神与艺术院校学生党员对党忠诚教育的深度耦合机制及创新实践路径，对于破解当前高校对党忠诚教育难题、提升新时代党员教育的实效性、提高优秀艺术人才培养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伟大建党精神；艺术院校；学生党员；对党忠诚教育；路径

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艺术教育创新转型加速的双重背景下，加强对艺术院校学生党员的对党忠诚教育面临诸多困境与挑战：传统单向灌输式教育与艺术院校学生群体特质不相适应，导致理论教育难以入脑入心；伟大建党精神这一宝贵精神富矿，尚未与艺术教育规律深度融合，未能形成常态化教育机制。因此，深入探讨构建伟大建党精神与艺术院校学生党员对党忠诚教育的深度耦合机制，探索科学可行的创新实践路径，对于破解当前高校对党忠诚教育瓶颈、提升新时代党员教育实效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加强艺术院校学生党员对党忠诚教育的意义

对党忠诚是党章对党员的基本要求，是共产党人最基本的政治品格和政治担当。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以来，始终将对党忠诚摆在党员教育的突出位置，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首次明确把“对党忠诚”放在了显著位置[1]。党的十一大之后，历次修订并通过的党章均将“对党忠诚”作为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固定下来，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共产党人忠诚观。对党忠诚教育作为党性教育的“心学”的核心内容，是筑牢党员党性教育的奠基工程。艺术院校学生党员作为学生群体中的先进分子和骨干力量，加强对其对党忠诚教育，既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固本强基之举，也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一）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必然要求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精神为内核的价值体系，突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2]。艺术院校是培育杰出文艺人才、孕育优秀文艺作品的摇篮，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迈向繁荣、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社会共识的进程中，肩负着重大且独特的使命，必须切实担当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时代重任。加强对艺术院校学生党员的对党忠诚教育，不仅能够帮助他们夯实艺术生涯坚实信仰的基石，使其在艺术探索中保持正确方向，更能引导未来文艺工作者始终沿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引领我国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

（二）应对意识形态领域复杂挑战的现实需要

高校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始终是西方敌对势力实施渗透、分化、颠覆图谋的重点目标。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建设，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筑牢高校思想阵地防线。艺术院校因其学科专业的创新性与开放性，学生普遍对新鲜潮流、多元文化具有较强的接纳力，但这种特质也使其在面对美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时，易因认知不足、防备不强而陷入被动。同时，大学生党员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面临各种错误思潮的冲击，理想信念一旦动摇，危害深远。因此，强化艺术院校学生党员的对党忠诚教育，才能进一步筑牢其理想信

念根基，增强政治定力，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

（三）加强艺术院校学生党员对党忠诚教育是培养“德艺双馨”高质量艺术人才的根本保证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3]，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重要使命。文艺作品要实现铸魂育人的目标，文艺创作者首先要完成自我塑造、提升自身素养。新时代背景下，艺术院校肩负着为国家培养政治素养高、专业技能强的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的重要职责。加强艺术院校学生党员对党忠诚教育，通过传承红色基因筑牢思想根基，强化政治认同，才能引导学生党员在提升专业技艺的同时，锤炼高尚道德情操，实现“立德”与“修艺”有机统一，为培养“德艺双馨”的高质量艺术人才提供根本保证。

二、艺术院校学生党员对党忠诚教育的现状及困境

（一）艺术院校开展对党忠诚教育的现状特点

为深入掌握艺术院校对党忠诚教育的开展现状，笔者以广西艺术学院学生党员为调查对象，发放调查问卷 12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793 份，调查结果显示，当前艺术院校对党忠诚教育整体推进有序，但在教育内容、教育形式、实践效能转化等方面仍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具体呈现以下特点：

1. 对党忠诚教育内容与学生实际需求存在偏差。问卷数据分析显示，在“您认为所在单位当前对党忠诚教育课程内容是否系统化、有深度”这一问题中，大部分学生党员认为对党忠诚教育内容较为系统（其中，68.35% 学生党员认为非常系统，29.63% 认为比较系统）。但在“您对哪些教育内容比较缺乏兴趣”问题中，有 52.96% 的学生对党史理论学习缺乏兴趣，53.47% 的学生对政策文件解读不感兴趣。这一数据反映出，对党忠诚教育内容过于偏重理论阐释，未充分结合艺术院校学生的专业背景和兴趣特点，与学生的实际学习需求脱节，导致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不足。

2. 对党忠诚教育形式与学校专业结合不够充分。在“您认为当前对党忠诚教育方法是否具有艺术专业”问题中，44.26% 的学生认为非常突出，42.62% 认为比较突出，但仍有 11.85% 认为一般，1.26% 认为较缺乏。在“您希望增加哪些艺术形式融入对党忠诚教育”问题中，78.18% 的学生希望增加艺术展演形式，74.15% 希望增加红色主题创作形式。这表明，当前艺术院校虽已尝试将艺术元素融入对党忠诚教育，但现有教育形式仍未能充分发挥艺术专业的独特优势，教育效果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二）艺术院校开展对党忠诚教育的主要困境

1. 教学内容供需错位，削弱了教育吸引力。当前，艺术院校对党忠诚教育在“供给”与“需求”方面有着明显的结构性矛盾。教育内容主要侧重于理论阐释与政策解读，却很少对艺术专业学生的独特思维特点加以精心编排。学生对传统党史理论、政策文件的学习形式兴趣不大，更喜欢借助艺术实践、创作展演等直观方式深刻领会政治理论。这种供需失衡，让部分学生把党忠诚教育课程当作“不得不完成的任务”，很难激发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

2. 专业特色融合流于表面，限制教育成效。虽然多数艺术院校开始尝试把艺术元素融入教育过程，可融合方式往往不是很顺利、治理得比较生硬、礼节很重。政策解读常以单向灌输的方式开展，没有利用戏剧编排、音乐创作等艺术形式，不能让学生实现“沉浸式”学习。这种浅层次的融合，没有把艺术专业在情感表达和价值传递方面的独特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还削弱了教育内容的感染力与渗透力。

三、伟大建党精神融入艺术院校学生党员对党忠诚教育的内在价值

（一）伟大建党精神融入的内在耦合性

伟大建党精神和大学生党员对党忠诚教育之间有着天然的内在耦合点，这种耦合体现在价值导向、文化内涵和实践特质上，这给两者的深度融合提供了逻辑基础和现实可能。

1. 价值导向的同一性。伟大建党精神强调“不负人民”的根本立场，文艺事业作为党的事业的重要部分，党的文艺方针始终强调“文艺为人民服务”。对艺术院校的学生党员开展对党忠诚教育，主要目标是培养出能为社会主义服务、深深扎根于人民之中的文艺工作者。在艺术院校的实践沃土中，伟大建党精神与对党忠诚教育的融合，呈现出一种鲜明的源流关系：伟大建党精神如同深邃的理论源头，不断滋养对党忠诚教育的实践长河。而艺术创作，是伟大建党精神外化于行的生动实践载体，人民性，则是两者共同坚守的价值基石。

2. 文化内涵的共振性。从历史方面来讲，伟大建党精神是根植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的，忠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代先哲们对其推崇备至[4]，这与中国传统儒家人伦精神一脉相承，像“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以及“不怕牺牲、英勇斗争”都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一部分。艺术院校传承着中华美育精神，借着传统戏曲韵味与现代艺术创新，来诠释“人民性”基因。大学生党员以红色题材创作，传承其内涵并赋予新内涵。从时代方面讲，伟大建党精神能与时俱进，内涵也不断丰富起来。艺术院校教育正紧跟时代步伐，借由“科技 + 艺术”的创新表达，获取新的传播载体，大学生党员也不断借助数字技术，广泛传播红色文化。

（二）伟大建党精神融入的价值意蕴

将伟大建党精神融入艺术院校学生党员对党忠诚教育，不仅是理论逻辑的延伸，更具有深远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意义。

1. 筑牢意识形态根基的政治自觉。在面对美西方通过历史虚无主义影视作品等艺术形式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时，加强对大学生党员的思想武装具有重大战略意义，通过开展伟大建党精神教育能强化大学生党员的政治定力，能筑牢抵御美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防火墙”，确保文艺创作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

2. 创新思政教育的实践范式。通过“艺术 + 思政”融合课程，把建党精神的内涵品格和对党忠诚教育渗透到专业教学中，以艺术化表达转化为具象的情感链接，激发受教育者主体自觉，引导学生从“被动受教育者”转为“主动传播者”，有效破解“两张皮”难题，实现思政教育与艺术实践的有机统一。

3. 传承红色基因的活态载体。借助艺术院校的专业优势，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资源，将建党精神转化为音乐、美术、雕塑、戏剧、数字媒体等现代艺术形式，积极构建校园红色文化生态，营造“沉浸式”对党忠诚教育氛围，使红色文化成为艺术院校的精神标识，推动红色文化在创新中传承。

四、伟大建党精神融入艺术院校学生党员对党忠诚教育的实践探索——以广西艺术学院为例

（一）深挖红色资源，以艺术创作铸牢对党忠诚的政治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党忠诚，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有条件的而是无条件的，必须体现到对党的信仰的忠诚上，必须体现到对党组织的忠诚上，必须体现到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忠诚上。”[5] 广西艺术学院在对党忠诚教育情景课研发过程中，深刻把握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以艺术作品为载体，拓展教育功能将红色资源转化为对党忠诚教育的鲜活教材。师生在创作过程中，深入解读红色文化，深刻领悟脱贫攻坚精神以及共产党人对党忠诚的内涵，进一步增强对党的政治认同和价值认同，以艺术语言生动诠释“不负人民”的深刻意蕴。

（二）弘扬红色文化，以艺术展演激发对党忠诚的情感共鸣

广西艺术学院聚焦英雄人物事迹，深入研发对党忠诚教育舞台情景课，打造了大型民族歌剧《拔哥》、话剧《邓小平与李明瑞》、话剧《少年黄大年》等红色艺术作品，生动展现了共产党人对党忠诚的高尚品质。以大型民族歌剧《拔哥》为例，该剧以韦拔群同志为原型，通过歌剧这一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刻画了其散尽家财为革命、对党无限忠诚的革命故事。创作者和表演者通过艺术创作与表演，深入体验红色艺术作品的精神内涵，实现从“体验教育”到“自我教育”的升华，使观众在感人至深的英雄事迹和极具感染力的艺术呈现中，如临其境、深受触动，汲取中国共产党人的强大精神力量。

（三）传承红色基因，以艺术课堂深化对党忠诚的文化认同

广西艺术学院以“红色艺术”为切入点，借助“课程思政”建设契机，推动艺术专业课与对党忠诚教育情景课深度融合，打通大学生党员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和艺术教育三大阵地。通过开展“红色艺术进课堂”活动，党员骨干教师将红色艺术元素融入专业课教学，构建起知识、技能与价值培育彼此交融、相互促进的教学体系，达成三者有机统一的教育目标。学校将《沂蒙山》演出作为对党忠诚教育情景课的重要内容，组织学生党员、预备党员、发展对象和积极分子集中观看，引发强烈共鸣，有效提升了大学生党员教育的质量和效果，增强了思政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吸引更多优秀青年学生向党组织靠拢。

五、结语

加强艺术院校学生党员对党忠诚教育，是夯实理想信念根基、补足精神之钙的有力举措。当前，艺术院校对党忠诚教育虽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面临教学内容供需错位、专业特色融合不深等困境。伟大建党精神作为新时代党员教育的精神旗帜，将其融入艺术院校学生党员对党忠诚教育，既能为教育工作注入丰富内涵、明确前进方向，又能充分发挥艺术专业优势，破解教育困境、提升教育实效。未来，艺术院校应持续深化实践探索，进一步挖掘与对党忠诚教育的耦合点，不断创新融合路径、丰富教育形式，推动伟大建党精神在艺术创作、艺术展演、艺术课堂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唯有如此，才能培育出政治立场坚定、艺术技艺精湛、道德情操高尚的“德艺双馨”的优秀艺术人才，让红色基因在艺术领域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注入持久动力。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21.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N]. 人民日报 ,2024-10-29(01).

[3] 习近平 .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22.

[4] 唐棣宣 .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党忠诚的重要论述及其重大意义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2(06):83-95.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 第 3 卷 [M]. 北京 : 外文出版社 ,2017.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广西艺术学院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课题“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融入艺术院校大学生党员对党忠诚教育研究”（DYSZ20240206）。

（作者系广西艺术学院讲师）

专升本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专业教学的路径探析
——以“组织行为学”课程为例

周必仙

摘要：本文以“组织行为学”课程为例，深入探讨了如何在专升本教育中有效融合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学，以期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未来的职业发展能力。为了全面评估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学的融合效果并推动其持续改进与优化，要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对融合路径进行持续改进与优化、加强交流与合作、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精神和实践能力、建立激励机制并关注学生的学习成效和反馈意见。本文通过案例分析、文献研究、问卷调查等方法，提出了更新教学理念、优化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加强实践教学、改进评价机制等具体的融合路径，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为专升本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专升本教育；创新创业教育；组织行为学

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的不断改革，专升本教育在培养学生专业能力的同时，越来越注重创新创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是培养学生具备创新思维、创业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重要途径，对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创新创业教育通过引导学生关注前沿动态，使他们能够及时洞察市场变化和技术发展趋势。学生将通过课程学习和实践项目，深入了解新兴领域和技术的特点和应用场景，从而培养出对创新创业机会的敏锐洞察力。

一、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专业课的教学特点和教学现状

（一）创新创业教育的教学特点

“组织行为学”课程是研究组织中人的心理和行为表现及其规律的课程，具有理论性强、实践性强、应用性强等特点。“组织行为学”课程教学的特点在于其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教学的目标在于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通过系统化的教学和实践训练，学生不仅能够获得扎实的专业基础，还能够拓宽专业视野，提升实践技能。

（二）创新创业教育的教学现状

尽管课程设置已经融入创新创业元素，但这些元素的质量和内容的深度与广度却参差不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育的效果。这种情况是由于课程设计缺乏对创新创业教育的深入理解和实践经验，缺乏有效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导致学生无法真正掌握创新创业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当前专升本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教师团队普遍缺乏实战经验，这严重制约了教育质量的提升。创新创业教育不仅要求教师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更需要他们具备实践经验，能够引导学生从实践中学习和掌握创新创业的技能。目前大多数教师都缺乏这样的实践经验，这无疑成了专升本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一大瓶颈。根据数据调查结果，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专业教学中的困难主要包括教学方式与资源有限，学生缺乏兴趣，缺少具有创新创业教育的师资队伍，学生实践经验较少，未能很好地将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相结合，学院对于创新创业教育方面的支持有限，未能凸显应用型本科的需求[1]。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专业课教育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导致教学效果不理想，缺乏有丰富经验的教师，缺乏相应的实践平台和资源，课程内容枯燥乏味，学生参与度不高，凸显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需求的不足。

二、创新创业教育融入“组织行为学”课程教学路径

（一）更新教学理念

教师应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将创新创业教育作

为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业能力。根据调查结果，72.5% 的学生认为学院教学层面将创新创业理念贯穿于整个课程体系，67.5% 的学生认为应该增加关于创新创业教育的选修课程，85% 的学生认为课程设计时要注意课程内容的实用性和前瞻性，72.5% 课程设计时要注意课程间的联系，形成完整的课程体系。立足问卷调查数据，教师应该立足社会发展需求，培养创新型人才。学院要根据应用型本科教学要求，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将创新创业的课程理念融入教学计划当中，根据学生发展需求开设相应的专业基础课程、选修素养课程、实践课程等，设立专项经费培养创新创业教师队伍，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培养创新思维，增强学生创业能力，为学生毕业适应市场需求、增加就业渠道、自主创业等提供前瞻性的服务，把创新型人才送入社会，为学院培养目标的实现、教学理念的转变、社会经济的发展贡献力量 [2]。

（二）优化教学内容

结合创新创业教育的需求，对“组织行为学”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整合和优化，引入创业案例、创新理论等内容，丰富课程的内涵。根据问卷数据调查结果，82.5% 的学生认为学校缺乏相应的平台和资源，87.5% 的学生认为专业课程融入创新创业教育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导致教学效果不理想，67.5% 的学生认为缺乏相应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75% 的学生认为课程内容枯燥乏味，参与度不高。立足问卷调查结果，需要有针对性地优化教学内容，根据学生的需求调整教学内容，培养优秀教师，调整课程内容，围绕学生兴趣，营造创新氛围，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将国家的创新创业的相关理论政策嵌入教学过程中，给学生埋下创新创业的种子 [3]。

（三）改革教学方法

采用问题导向、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据问卷调查，85% 的学生认为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专业教学应选用案例分析法，75% 的学生认为应采用角色扮演法，70% 的学生认为应该采用小组讨论法，70% 的学生认为应该采用讲座与研讨相结合的方式。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对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至关重要。传统的填鸭式教学已经无法满足现代教育的需求，我们需要采用更加先进和有效的教学方法。例如，问题导向、项目驱动、在线教育、虚拟实验、角色扮演、小组讨论等，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加灵活和多样化的学习方式，满足他们个性化的学习需求。

（四）加强实践教学

学院需要将创新创业理念融入专业教学中，通过案例分析、项目实践等方式，帮助学生更好地将所学应用于实际创业中。开展跨学科的创新创业课程和活动，鼓励学生从多个角度和领域思考和创新，培养他们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根据问卷调查数据，75% 的学生认为应该进行校企合作，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和创新创业机会，75% 的学生认为需提供专家指导，为创新创业融入专业教学提供专业指导。根据调查创新创业教育应如何与专业教学相结合，以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的数据结果，90% 的学生认为需提供更多跨学科、实践性的教学项目和活动，以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结合课程实际，实践教学过程中可以采用模拟创业形式进行启发式教学，采用实地考察进行参与式教学，采用案例分析和项目实践进行讨论式教学等，提升学生创新创造思维。另外，加强与企业和行业的合作，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习和实践机会 [4]。

（五）改进评价体系

构建完善的评估和反馈机制，通过对教学过程和学生表现的定期评估，我们可以了解融合的效果，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收集学生和教师的反馈意见，对教学方法和课程内容进行持续的改进和优化。调查数据显示，82.5% 的学生认为应遵守科学性、全面性、可操作性、持续改进性的评价体系建立的原则，92.5% 的学生认为应建立完善的评价体系，包含课程设置评价、教学方法评价、实践教学评价、学生表现评价、教师素质评价等，82.5% 的学生认为应选择合适的评价方法，有定量评价、定性评价、综合评价等，70% 的学生认为应引入专家评价，给出专业性的意见。由此，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专业教学的评价路径应结合专家意见，运用定性和定量分析、全方位评价的方式，建立课程设置评价、教学方法评价、实践教学评价、学生表现评价、教师素质评价等“组织行为学”课程评价体系，突出创新创业教育的育人实效。

三、专升本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专业教育的实施策略

（一）完善课程体系，促进教学改革

将创新创业教育与“组织行为学”课程有机结合，构建完善的课程体系，确保教学内容的系统性和连贯性。针对专升本学生的需求和特点，我们需要改革传统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具体而言，可以增加一些创新创业相关的课程，如创新思维训练、创业基础等，营造学生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引入一些行业前沿技术和发展趋势，让学生了解行业动态，激发他们的创新思维；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如案例分析、小组讨论、实践操作等，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养成良好的创新习惯。立足学院目前转型之际，彰显应用型本科特性，优化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是实现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学融合的核心。将专业课程中融入创新创业的元素，比如设置专门的创新创业课程，或者在现有的课程中加入创业案例的分析与讨论。鼓励学生参与创业实践活动，如创业计划大赛、创业实习等，

从而培养他们的创新创业思维和实践能力[5]。

（二）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创新团队

师资力量的整合与提升是实现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学融合的重要保障。引进具有创新创业经验的教师，为学生提供宝贵的创业指导，将自己的创业经验融入教学中，使教学更加贴近实际。加强对现有教师的培训，提升他们的创新创业教育能力。此外，建立跨学科的教师团队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同学科的教师可以相互学习、相互启发，共同推动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学的融合。鼓励教师参与产学研合作项目，增强他们的实践能力和行业认知，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去了解和接触前沿的科技发展和行业动态。这样的教师团队不仅能够提供全面的、跨学科的教学，还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加真实、深入的创新创业实践指导。加强对教师的培训和引进，打造一支具备创新创业精神和能力的教师团队，为课程的顺利实施提供有力保障。优秀的师资队伍是创新创业教育的关键，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创新创业素质和能力。结合学院实际，可以引进一些具有丰富创业经验和成功案例的专家学者参与实践教学；鼓励教师参加一些创新创业相关的培训和研讨会，以提高他们的专业素养和教学水平；建立激励机制，如评选优秀教师、设立项目奖金等，鼓励更多的教师参与创新创业教育。

（三）深化校企合作，搭建实践平台

实践活动是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环节。通过与企业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开展实践教学和项目开发，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创业资源。第一，进行校企合作，可以与企业、创业团队等合作，共同开展一些创新创业项目，可以依靠企业平台为学生进行创新创业项目的推进，整合学院和企业资源，为学生创新创业搭建平台，让有创业欲望的学生提前进行创业实践，为后续创新创业做铺垫。第二，立足就业平台，拓展企业渠道，利用学院访企拓岗促就业的同时，可以与更多的企业进行创新创业教育渠道的拓展，为学生提供创新创业实践教育基地，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资源，提前尝试创新创业的过程，为以后的职业发展提前做好规划，扩大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辐射范围。第三，组织创新创业比赛，如“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等。

（四）激励学生参与，完善成果展示

提高学生参与度和成果展示是创新创业教育的核心。第一，学院层面多元化成果展示。结合网络新媒体技术、学院公告栏设置专区、学院发展史公告栏以及学生大型活动开展前期的实际情况，鼓励学生通过报告、海报、视频等多种形式展示自己的创新创业成果。第二，教学科目设置成果展示环节。在专业课期末或学期中设置专门的成果展示环节，让学生有机会展示自己的创新创业项目或作品，提高学生创新热情，通过专业课班级辐射到整个学院，打造学院创新创业教育“品牌”。第三，建立创新创业激励机制。对在创新创业实践中表现突出的学生，在学院重大活动（新生入学典礼、学院文艺晚会、学院教学科研活动等）进行公开表彰和奖励，并让表彰学生进行获奖感言，树立创新创业榜样，激发更多学生的参与热情，提升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为学院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专业课教育打下坚实基础。

（五）建立评价机制，突出融合效果

为了深入分析和评估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学的融合效果，并提出持续改进与优化的建议，必须建立一套全面而科学的评估体系。综合考虑多个维度，包括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教学质量以及产学研合作成果等，以确保评估结果全面、准确且客观。在评估的基础上，致力于对融合路径进行持续改进与优化。针对评估结果中暴露出的问题和不足，调整课程设置，优化教学方法，并加强师资力量的建设。增加与创新创业相关的课程内容，引入更多的实践环节和案例分析，以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改进教学方法，采用更多元化的教学方式，如翻转课堂、在线学习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为了确保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专业教学的效果，可以通过课程考核、实践活动成果等方式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评估；可以邀请行业专家对学校的创新创业教育进行评价，以了解教育的质量和水平；可以根据社会反馈和学生就业情况来评估创新创业教育的效果。通过这些评估方法，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改进和优化。

参考文献

[1] 宋楠楠 . 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 [J]. 教育教学论坛 ,2018(40):236-237.

[2] 邵月花 . 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效融合路径研究 [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6(10):76-79.

[3] 纪常鲲 , 纪常虹 , 陈艳明 , 等 .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的研究与实践 [J].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2016,36(11):148-149.

[4] 王正 . 数智时代背景下劳动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融合模式构建研究——以高职旅游院校为例 [C]// 重庆市继续教育学会 , 重庆市继续教育学会专升本行业专业委员会 . 智能教学创新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专升本高质量发展专题).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2025:96-99.

[5] 谢红 .“互联网 +”背景下提高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的探索 [J]. 现代职业教育 ,2018(33):75-77.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3 年云南民族大学校级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云南民族大学 2023 教学研究项目”（2023JG-085）。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呈贡校区）

开放大学学历教育招生困境与对策研究
——以昌吉开放大学为例

李　强　耿莉雪　蔡玲霞

摘要：开放大学是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载体。在高等教育普及化与教育市场多元化背景下，地方开放大学普遍面临招生规模萎缩、生源结构失衡等问题。本研究以昌吉开放大学办学体系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学历教育招生现状，发现存在社会认可度不高、招生宣传不足、教学服务有待提升、外部竞争加剧等困境。为此，提出强化品牌建设、创新招生宣传、优化专业设置、提升教学服务水平、加强外部合作等对策，为摆脱招生困境、探索可持续发展路径提供理论支撑，助力区域终身教育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开放大学；学历教育；招生困境；对策研究

一、昌吉开放大学学历教育招生现状

（一）招生规模呈稳中有降的走向

地方开放大学因其“扎根地方、服务大众和新型高等学校”特色办学定位以及体系办学的特殊办学形式，形成了不同于普通高校的招生模式，即“面向社会、分级管理、体系招生”[1]。昌吉开放大学作为新疆开放大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区域终身教育体系构建和学习型社会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近年来，与新疆开放大学办学体系同类分校相比，昌吉开放大学学历教育招生呈现结构性疲软：整体规模增长动能不足，招生总量维持低位徘徊。

（二）生源结构不合理

研究组对近三年的学历教育生源情况进行了分析，发布调查问卷，昌吉开放大学的生源以成人学员为主，其中 30~40 岁年龄占比 42.68%，高中毕业生占比 0.69%；19~25 岁应届毕业生占比 15.58%，高中学历升专科占比 27.1%，专科学历升本科占比 47.52%，可见生源年龄结构偏大，主要集中在在职工作人员，应届高中、专科毕业生等潜在生源对开放大学的认可度较低。

（三）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存在脱节

学校目前开设有本科专业 23 个、专科专业 44 个，专业主要涵盖文学、机械、土木、行政等方面。现有开设的专业无法满足昌吉地区尤其是准东经济开发区的企业对人才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同时学校的专业建设相对滞后，导致招生工作生源吸引力不足。

二、昌吉开放大学学历教育招生困境的原因分析

（一）社会认可度不高

全面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开放大学被时代赋予了新的使命和任务。但长期以来，很多受众对开放大学的总体影响仍停留在其前身广播电视大学的“函授教育”上，对开放大学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的终身教育特点了解不多。许多潜在生源在选择学历提升途径时，更倾向选择非脱产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自学考试等方式。

（二）招生宣传力度不足

发放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开放大学的招生宣传力度存在明显不足。受访者通过朋友推荐获取信息占比 79.76%，而通过官方网站宣传占比 29%，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占比 24.02%，显示出开放大学学生群体人际传播的核心作用，虽然学校通过官方媒体、微信公众号等形式发布了招生宣传广告，但宣传效果和覆盖面明显不足，也无法及时、准确地将宣传信息传递给潜在生源。

（三）教学质量和服务水平仍有待提升

发放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昌吉开放大学在核心优势方面，教学质量（综合得分 4.19）、学习资源丰富性（70.09%）及课程合理性（64.5%）成为三大竞争力支柱，但课程多样性不足（57.55% 受访者期待网络与新媒体等新兴专业）与教学支持缺口（62% 需求集中的学习指导服务）制约了服务延展性。教学质量是学校发展的生命线，服务水平也是吸引生源的关键因素。

（四）外部竞争压力加剧

高等教育市场竞争愈发激烈，其他类型高校如高职院校等不断扩招且发展特色专业，吸引了大量学生，分流了开放大学的潜在生源。昌吉地区的职业院校升级本科大学对开放教育招生影响非常大；部分私立办学机构为吸引生源，进行违规招生和虚假宣传，也影

响了开放大学招生工作的正常开展。

三、开放大学学历教育招生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品牌建设，提升社会认可度

1. 突出办学特色，强化品牌辨识度

第一，优化学习生态：依托“线上＋线下”融合教学模式，推出“时时可学、处处可学——允许工学交替、分阶段完成学业”，适配在职、兼职等学习者群体的弹性学习机制、“单科课程开放——允许学习者根据自身需求跨专业选择单门课程学习”“学分银行——允许学习者跨专业、跨阶段累积学分，实现学习成果可转换”等特色举措，满足不同群体的碎片化学习需求。

第二，聚焦区域需求。主动对接地方产业升级转型的需求，深化产教融合发展，与地方政府联合开设“靶向式”产业人才定制班，如乡村振兴电商运营班、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班，定向培养基层急需人才[2]；联合区域龙头企业开发“岗位适配型”实践课程，如建筑工程施工实训模块、中医药学养生健康模块，将教学内容与地方产业链关键环节、岗位核心能力要求深度绑定，形成“入学即对接产业需求、毕业即具备岗位胜任力”的特色培养闭环。

第三，拓展社会服务场景。依托学校教学资源，联动社区服务中心、老干部活动中心等基层阵地，构建“全龄段、多场景”的终身学习服务网络。面向青年群体开设“青年夜校”，如短视频制作、生活美妆等实用课程；为家长群体打造“家庭教育大讲堂”，如亲子沟通技巧、青少年心理辅导等主题；为老年群体推出“老年大学”，涵盖智能手机应用、书画摄影等兴趣课程及“老年研学游”项目。结合本地文化资源设计红色教育、非遗体验等线路，让学校深度融入区域居民的学习生活场景，成为群众身边的“终身学习加油站”。

2. 深耕教学质量，筑牢品牌根基

第一，师资建设层面：努力建设同时具备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能力的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一方面引进具有行业高级职称的技术骨干担任兼职教师，另一方面鼓励校内教师取得本专业非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包括行业特许的资格证书、省级以上专业资格或专业技能考评员资格证书等；建立“学科带头人＋青年教师导师制”，通过示范课、课题共研等方式提升团队整体水平。

第二，教学改革层面：按岗位核心能力拆解课程为“核心理论＋岗位技能＋跨学科拓展”三大模块，同步打造“虚实融合”实训生态，引入虚拟仿真、VR实景教学技术搭建“云端实训室”，破解传统实训受场地、设备、安全限制的难题，如在机械制造专业搭建VR机床操作场景，让学生随时随地开展沉浸式实操；创新“以问题为导向”的课堂模式，课中围绕“真实案例研讨”开展辩论、方案设计等互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强化分析与实践能力的双向提升。

第三，质量监控层面：构建“学生反馈—校内督导—办学体系联动”三维联动评估体系，形成全链条质量保障闭环。学生端动态感知：通过课程平台实时收集课堂满意度，每学期开展学生问卷调查，收集学生对教学、班主任支持服务的反馈意见，同时开展毕业生满意度调查，追踪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满意程度数据，反向校验教学与市场需求的匹配度。校内督导监督：实行教学督导“随机听课＋专项督查”制度，建立“同行互评＋学生评教＋督导反馈”的教师考核机制，推动教学质量螺旋式上升。办学体系联动：推动办学体系各县市分校协同发力，建立“问题共商＋经验交流＋师资共享”机制，确保全体系办学质量齐头并进，避免区域失衡。

（二）创新招生宣传方式，扩大宣传覆盖面

1. 打造全渠道宣传矩阵，实现“线上渗透＋线下触达”双轮驱动

第一，线上精准引流。在昌吉主流媒体《昌吉日报》微信公众号、微时代传媒微信公众号发布招生宣传广告；升级学校官网、微信公众号，以方便学生可以通过使用“微信扫码—在线报名”的方式在线报名；宣传的重点在强化移动网络招生系统可靠性基础上，突出系统方便使用的特点及其带来的便利性等特征，以及快捷、安全、方便的精细化招生模式[3]；在微信视频号、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推出学历教育招生宣传系列视频，解析弹性学习机制、学位、学籍等政策，发布微纪录片，记录优秀学员、学位获得者、百姓学习之星等边工作边学习的真实经历；运营“抖音云校”直播平台，定期开展本地开学典礼、毕业典礼、学生活动等直播，安排教师现场答疑。第二，线下深度触达。联动基层阵地打造“嵌入式宣传”场景。在社区服务中心设置“开放大学服务角”，摆放招生简章、播放宣传短片，定期开展“学习体验日”现场演示线上学习操作、解读学费补贴政策；与地方企业合作，开展“定制化宣讲会”，落实好工会“求学圆梦”行动。

2. 优化分层宣传内容，让特色优势与群体需求精准对接

第一，分群体定制内容包。针对在职人员，用时间轴展示“每晚1小时，学制两年半，满足毕业条件即可拿证”的可行性，附企业员工通过学习实现岗位晋升的案例；针对乡村振兴工作者，聚焦“实用技能＋本地适配”，宣传一村一名大学生学历教育帮扶政策；针对老年群体，强调“零门槛＋兴趣导向”，用大字体介绍“智能手机课、书法课”的上课方式，附社区老年学员的学习剪影。第二，升级宣传载体质感。打造“沉浸式、轻量化、解惑型”的招生信息传递矩阵，制作“真实故事＋政策解码”双段式宣传视频：以纪

录片手法呈现学员的鲜活场景，也可用 MG 动画拆解政策亮点，比如用“学分银行存钱—兑换学历证书”的比喻解释学分累积，用“课程进度条自主拖动”的动画演示弹性学习，让抽象政策变得可感可知 [4]。

（三）优化专业设置，适应市场需求

1. 深化市场调研，精准锚定专业方向

构建“政产学研”信息共享平台，定期联合地方人社部门及重点产业园区开展专题研讨，分析区域支柱产业升级方向和新兴领域人才缺口，形成需求清单。结合新疆开放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设置，动态调整专业布局，新增与区域特色产业匹配的新兴专业。

2. 强化专业内涵建设，构建动态发展生态

以“质量为核、需求为导”推动专业提质增效。集中资源打造与区域核心产业绑定的特色产业，如和准东开发区深度匹配的采矿工程、热力工程技术专业。建立专业评估指标体系，从“招生热度、就业质量、产业匹配度”三个维度定期评估，对连续三个学期招生不足的专业，实行“限招—停招—转型”梯度调整，确保专业结构始终与市场需求适配。

（四）提升教学服务水平，增强学生满意度

一是加强学生管理。建立“一生一档”，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指导和支持，帮助学生制订学习计划，动态解决学习动力不足、时间分配不合理等问题。搭建“线上 + 线下”沟通桥梁，线上通过班级群开展学习交流活动，线下为学员提供学习场所、设备维护、应急打印等便民服务。建立“意见快速响应机制”，对线上、线下反馈的疑问实行及时答复，由专人跟进，加强与学生的沟通和交流，及时了解学生的需求和意见，不断改进学生管理工作。

二是完善学习支持服务。将《新疆开放大学办学体系办学质量评价办法》质量因子纳入班主任考核，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激发班主任动力，积极投身教学支持服务工作，常态化开展数据分析，为教学和学生服务工作的开展、改进、提升提供数据支撑。打造“全场景 + 高效率”保障网络，系统讲解操作流程，帮助学员更好地了解学习过程中的各项内容，提升学习便利性与服务质量。将“学生满意度”转化为“口碑传播力”，通过全流程、高品质的服务体验，让现有学员成为最鲜活的“招生代言人”[5]。

（五）加强与外部合作，拓展招生渠道

一是与中学合作。深耕生源培育，强化品牌渗透。定制化宣传与体验活动，结合中学特点，开展“开放大学体验日”活动，邀请中学生直观感受开放大学的教学特色。联动家长群体，深化信任纽带，邀请家长和中学生来学校参加“家庭大讲堂”等活动，向家长解读开放大学的学历效力、终身学习价值等，消除“非全日制学历”的认知误区，增强家庭对开放大学的认可度。

二是与企业合作。聚焦需求匹配，构建“招生—培养—就业”闭环。加强与人社部门、当地企业的合作，开展企业员工培训项目，为企业量身定制人才培养方案，阐述好弹性学习方式，满足企业对人才的个性化需求，同时争取由企业承担部分学费，吸引员工报名。联合企业工会落实好“求学圆梦”工作，积极动员企业员工参加创新创业大赛、奖学金和优秀毕业生等评优评先活动，提高企业员工报名积极性。定期与企业召开人才培养研讨会，结合岗位需求变化，动态调整招生专业，形成“企业需求—招生导向—培养输出”的正向循环。

三是与社区合作。网格化服务覆盖，在社区设立“开放大学服务站”，结合社区居民特点，提供个性化咨询，为宝妈推荐“线上 + 周末”弹性学习的学前教育专业；为退休人员开设“老年大学 + 学历提升”融合课程，推荐报读书法、国画等本科专业；为青年提供“兴趣班 + 新媒体制作”课程，推荐报读网络与新媒体本科专业。将开放大学招生信息纳入社区政务服务窗口、惠民政策宣传，针对社区内的特殊群体，推出学费减免、助学补贴等政策，降低学习门槛，提升招生的普惠性。

四、结语

开放大学学历教育招生面临着社会认可度不高、招生宣传力度不足、教学质量和服务水平有待提升、外部竞争压力加剧等困境。针对这些问题，学校应加强品牌建设，提升社会认可度；创新招生宣传方式，扩大宣传覆盖面；提升教学服务水平，增强学生满意度；优化专业设置，适应市场需求；加强与外部合作，拓展招生渠道。通过以上对策的实施，以期改善昌吉开放大学的招生状况，推动其学历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的高素质人才。

参考文献

[1] 陈翀 .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开放大学招生工作研究 [J]. 大学 ,2024(01):30-33.

[2] 陈丽希 , 董巧凤 .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开放大学招生策略研究——以宁德开放大学招生工作为例 [J]. 才智 ,2024(28):157-160.

[3] 潘焦萍 . 移动网络招生系统学生用户抵触行为研究——基于开放大学办学体系学生数据 [J]. 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01):3-10.

[4] 陈思敏 . 新媒体时代开放大学招生宣传策略研究 [J]. 广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22,33(04):43-47.

[5] 乐艺 . 基层办学单位质量现状分析与思考——以南京开放大学开放教育体系为例 [J]. 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21(04):26-31.

（作者单位：昌吉开放大学）

中外合作办学大学博士生思政教育体系构建策略研究
——以宁波诺丁汉大学为例

戴一淼

摘要：随着全球高等教育合作不断深化，中外合作办学博士生在跨文化学习中对价值认同、使命担当的需求日益凸显，但现实中仍存在育人目标定位模糊、课程内容供给不足、师资力量薄弱、协同育人机制缺位等突出问题。基于此，本文以立德树人为核心，结合宁波诺丁汉大学博士生培养实践，提出明确特色育人目标、优化融合教育体系、构建协同育人机制“三位一体”的系统化路径策略，并特别探讨了辅导员在博士生思政教育体系中的角色与作用，以期为中外合作办学高校完善博士生思政教育体系、提升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外合作办学；博士生；思政教育；体系构建；协同育人

在全球化与教育合作加速的背景下，中外合作办学已成为我国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对研究生教育工作高度重视，强调研究生教育要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需要，培养造就德才兼备的高水平高层次人才。近年来，中外合作大学和办学项目不断涌现，思政教育是中外合作大学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途径，它能引导学生厚植爱国主义情怀，立志听党话、跟党走，培养学生的爱国情、强国志和报国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通过思政教育，学生能够深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和文化意识，形成积极向上的价值追求，培育出具有良好政治素养、崇高社会责任感和国际视野的高素质人才，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实现伟大中国梦提供人才保障[1]37。

博士生思想政治教育事关国家战略需求和文化自信。在中外合作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下，当前主要存在博士生思政教育目标指向不明确、课程思政衔接不流畅、师资队伍结构单一、协同育人机制不健全等诸多短板。虽然国内已有针对博士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研究，并提出如中外融贯课程、导师双聘等多元化路径，但对博士生思政教育整体架构的研究仍不足，对博士生辅导员在博士生非学术支持、思政教育具体实践等方面的问题涉及甚少。本文以中外合作办大学中博士生思想政治教育架构为主线，以宁波诺丁汉大学博士生培养为实践样本，通过概述现状、剖析问题、提出整体建构路径的系统性研究，以期为相关高校进一步构建育人路径、提升内涵、夯实培养质量提供有益探索。

宁波诺丁汉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高校。自建校以来，学校坚持国际化办学，以家国情怀、全球视野、创新精神、社会能力为人才培养目标，持续丰富学校在博士生培养上的品牌特色。学校积极拓展高层次国际化交流途径，资助博士生参加国际科研合作及国际顶级学术会议；深化“产研学”协同培养模式，与国内外优秀企业、科研院所开展联合培养实践平台，着力提高博士生发现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重视将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有机结合，鼓励博士生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有所作为；注重培养博士生的学术与人文素养，努力营造理解、友善、开放的校园学术文化。近三年来，宁波诺丁汉大学博士毕业生就业率为100%，毕业生分布在国内外著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行业内龙头企业等岗位，表明学校在以思想价值引领提升专业能力的研究生培养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效。

一、中外合作办学博士生思政教育体系构建的必要性

中外合作办学高校的博士生源结构比较多元，与国内普通高校存在显著差异，来源除了我国高校的毕业生，也不乏自高中、本科阶段开始在海外就读的学生。

这种具有多样化背景的学生多处于国际环境和本土环境的相互影响之中，在他们的价值取向、文化认同和学术规范的形成过程中，持续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也面临更为复杂的适应与挑战。博士生教育和培养作为高等教育的最高阶段，是高校学术声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博士生是国家未来竞争力的要素之一。从现实出发，重视博士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必然的，然而，仅依靠传统的思政课程教育已经很难满足他们关切全球、立足前沿的现实需求。

另外，中外合作大学在管理机制、课程体系与教学理念等方面与传统国内大学存在一定的差异，也容易导致育人过程的过度“国际化”，造成育人衔接方面的困难，从而使整个价值教育的引导功能弱化。因此，构建一套符合中外合作办学特色的思政教育体系，不仅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博士生树立坚定学术追求和社会担当的必然要求，也是培养博士生具有坚定学术理想、承担家国社会责任的必要措施，更是保证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础。特别是在如今国际关系复杂多变，关键技术竞争全面展开的宏观格局下，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家国情怀和科研素养，对实现我国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外合作大学博士生思政教育现状与问题分析

（一）教育目标定位模糊

在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下，博士生培养往往采用外方院校的培养模式，导致学生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对跨文化环境和国家战略需求的深入研判，使思政教育目标趋于概念化和同质化。具体而言，当前培养体系虽普遍强调“国际视野”，却未能清晰界定学生在全球学术规范与本土价值认同之间应具备的价值立场、历史观念和公共责任感；同时，思政教育与专业培养在目标设定上相互脱节，多由不同部门分别制定评价指标，缺乏协同整合的共同维度。目标定位不清削弱了思政育人与专业教育共同发展，易造成学生重学术轻责任的意识，也给课程设计、考核评价和资源配置带来困扰，亟须在理念和制度层面加快完成系统全面梳理与共识建构[1]39。因此，有必要从理念共识与制度设计两方面加快推进系统性梳理与整合，构建真正贯通中西、融汇价值塑造与学术创新的博士生培养目标体系。

（二）课程内容供给不足

在中外合作大学博士阶段的思政教育体系中，在内容供给方面存在明显的双重不足：一方面，思政教育的本土化程度有待深化，尚未形成与博士生科研实践和日常生活紧密结合的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另一方面，国际视野的融入仍较为薄弱，当前主要由学工部和研究生院承担的思政教育，多停留在日常宣讲层面，缺乏深层次的跨文化价值对话。此外，现有教育形式也较为单一，专题研讨、实地调研和跨文化实践等活动占比较低。内容供给的滞后使思政教育难以与博士生的研究兴趣、职业规划及国际交流实践形成有效链接，价值引领功能因而被弱化，迫切需要在教材建设、资源共享与教学方式上进行系统创新，实现高层次人才全面发展目标[2]。

（三）课程思政师资队伍力量薄弱与辅导员角色边缘化

中外合作大学中博士生导师构成呈现中外教师合作的国际化特点。以宁波诺丁汉大学为例，学校为每位博士生定制复合型指导小组，融合英国、中国及马来西亚校区的学术力量，并依据课题方向引入产业界专家参与指导。同时，聘任校外专家为第二、第三导师，拓宽专业视域，增强多学科交叉指导能力。但就博士生思政教育而言，师资队伍仍存在短板，即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厚和国际学术前沿知识及专业功底强的“双融性”导师匮乏，且外籍师资多缺乏来华生活经历，对中国政治体系还缺乏真正理解，导致难以有效衔接博士生思政教育和专业培养；同时，从博士生自身来看，博士生的学习生活模式与本科生、一年制硕士生相异，博士生和辅导员之间的沟通机制不够完善。部分中外合作大学没有配备博士生辅导员，对一部分博士生而言，“是否需要辅导员”成为一个问题。以宁波诺丁汉大学为例，在日常工作中辅导员更多承担了博士生的入学引导、信息中转和档案管理等事务性工作，在其思想价值引领和学术伦理培育方面的作用仍有待进一步发掘，也整体影响了博士生阶段的思政教育效果。

（四）多部门协同育人机制缺位

中外合作大学的办学机制和国内传统大学存在一定区别，其中跨文化、跨体制特点决定了目前博士生思政教育需要依托多主体、多层次的共同机制。在实践中，由于缺少顶层设计和制度化的沟通平台，长此以往，中外合作办学被动陷入科研追赶与价值培养脱节的循环，思政教育的渗透力和可信度显著下降[3]。宁波诺丁汉大学在实施博士生思政教育的过程中，也面临协同育人机制的缺失以及队伍建设的困境。从具体落实情况来看，学校研究生院、学院、学工部存在信息“隔离”和职能“碎片化”的问题，导致多部门在思政教育上衔接不畅；此外，在当前的办学考核体系中，思政工作对博士生的培养与发展评价作用欠缺，与博士生的“学术关切”渐行渐远。在现行的博士生评价体系中，特别是在博士生求职就业过程中，论文数量、质量（核心期刊、SCI 数量）等因素具有更强的效用。因此，多主体协同发力的博士生思政教育机制建设、思政队伍建设与多部门协同配合势在必行，这对于提升思政工作实效性与质量有重要的作用。

三、中外合作大学博士生思政教育体系核心构建策略

（一）明确特色育人目标

找准特色化育人目标是有效衔接中外合办博士生思政的重要前提。宁波诺丁汉大学结合博士生培养实际情况，从家国情怀、全球胜任力、学术诚信三方面，落实思政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特色化育人目标。家国情怀指向引导博士生将学术志向与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紧密结合，在选题、转化、对外合作等方面主动对接国家需求，发出中国声音。全球胜任力指向引导博士生正确认识和理解国际科研规范、不同国家文化语境，提升博士生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融通协作的能力，在全球治理、国际合作等竞争领域提出体现中国智慧的解决方案。学术诚信指向贯穿于各项思政建设的全过程。学术诚信要引导博士生具有科学家精神，坚守科学道德，尊重知识产权，遵循科研规范，维护学术诚信、保持自律，自觉接受学术监督，维护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同时，实现这三个维度的目标也离不开具体可行的细化的培养要求，有机贯穿在课程建设、导师指导、科学研究、社会实践、学术评价中，并建立相关的制度安排。只有将这些要求从纸面转化为可感知的学习体验，博士生才能在多元文化交汇的环境中保持价值定力，进一步成长为根植中国大地、通晓国际规则、恪守科研道德的卓越创新人才[4]。

（二）优化融合博士生思政教育体系

构建健全的博士生思政培养体系是推进中外合作办学博士生思政教育深入发展的关键。学校在理论引领、专业拓展、国际视野、研究实践四个维度开展博士生思政教育，形成纵向贯通、横向互补的矩阵结构。首先，学校将思政教育融入博士生的学习过程，通过开设讲座和讨论等方式，由思政教师和辅导员将党的理论、国家需求等内容穿插其中，引导学生通过讨论，思考如何服务社会。其次，学校鼓励跨专业交流，不同专业的老师与学生一起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等热门话题，让学生在制度对比、理念碰撞中加深对我国立场的理解，提升跨文化、跨专业的表达能力。再次，学校在设置案例研讨时，更多围绕国内外重大工程、真实国际科技合作等场景，加强学生国家责任和国际视野的结合。最后，学校通过建立动态更新机制，定期邀请产业界、政策界、媒体界代表进入课堂，补充最新案例与实践信息，使课程内容贴近科技发展和国际形势，确保思政元素比例得当、表达方式符合多元文化接受习惯[5]。

（三）构建多部门协同育人机制

建立协同育人机制是确保中外合作办学博士生思政教育工作持续推进的重要保障。宁波诺丁汉大学通过研究生院、学生工作部和各学院建立了责权明确的合作机制。第一，发展“研究生院—学工部—学院”协同机制。研究生院统筹博士生培养工作全局，拓展博士生学习成长的渠道，例如利用宁波市博士联谊会“明州大讲堂”和宁波市研究生学术节等平台，扩大博士生的学术视角，促进博士生增强社会责任感。学工部牵头制定《博士生辅导员工作手册》，明确博士生辅导员在思政教育、非学术性工作支持、跨文化沟通和心理辅导等方面的责任范围。学院则负责博士生的具体学科教学、科研、评价等相关工作。第二，完善常态化的沟通与支持机制。学校建立定期联席会议制度，每两周一次讨论学生的学业和日常动态，由辅导员、导师和各部门行政团队组成，实现信息共享，提高管理效率。第三，促进非学术性支持和思政教育一体化。鼓励辅导员、导师、行政支持团队参与博士生社会实践活动，对学生在非正式环境和对话空间里进行潜移默化地引导，借助企业走访、生活沙龙等活动，提升思政教育的亲和力与影响力。同时，通过数字化工具设立博士生发展档案，记录个人在党团活动、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的情况，并且把表现纳入评奖评优考核。

四、结语

中外合作大学博士生思想政治教育关乎国家高层次人才发展战略，也关系高校国际化水平和文化自信建设。本文从形势需要和问题实际出发，在目标重建、体系融合以及协同机制等三个层面给出对策建议，以期为相关教育实践提供方法参照。今后，中外合作大学还需进一步加大学校政策和资源支持力度，健全多元评价机制，促进多部门协同，使思政教育真正贯穿博士生学习生活、科研和社会服务，培养更多兼具国际视野、创新意识和时代担当的高层次人才，为人类进步事业努力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卢其鸿 . 教育数字化下中外合作办学中融入思政教育策略研究 [J]. 电脑校园 ,2025(29):37-39.

[2] 李丹 , 苏展鹏 . 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下对大学生思政教育研究和实践 [J].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文摘版) 教育 ,2022(11):3.

[3] 范晓丽 , 陈慧荣 , 孔杰 , 等 . 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思政育人体系构建研究——以西北工业大学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工程学院为例 [J].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3(03):52-59.

[4] 龚斌 , 李雅侠 . “4+0” 中外合作办学视域下课程思政策略探究 [J]. 大学 ,2024(30):1-2.

[5] 刘畅 .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双创 + 思政 “双融合” 教育探析 [J]. 新教育时代电子杂志 (教师版),2020(32):151-152.

（作者单位：宁波诺丁汉大学）

基于实践探索的革命文物藏品档案开发利用研究

——以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文物主题思政教育课程为例

王　笑　周鑫玥

摘要：革命文物藏品档案系统完整地收藏了革命文物的历史信息、物质特征等信息，生动展现了革命先烈的优良品质和崇高精神，具有政治导向性、历史原真性、教育感染性和技术可塑性，在思政教育中具有重要价值。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深挖革命文物藏品档案的教育价值，开发“革命文物故事开讲啦”文物主题思政教育课程，以深入浅出、趣味互动的方式讲好雨花英烈的故事，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为新时代革命文物教育功能的拓展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革命文物；思政教育；开发应用

一、革命文物藏品档案的概述

（一）革命文物藏品档案的含义

学界一直以来对革命文物藏品档案没有权威的界定标准。革命文物和藏品档案是两个概念，但又存在着一定的交集。革命文物主要是指见证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独立和争取人民自由的英勇斗争，见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荣历史，并经认定登记的实物遗存[1]。文物藏品的征集、鉴定、入藏、编目、保管、保护、利用和研究等工作，以及其他相关事项，都会形成历史记录。这些记录的形式有文字、图表、照片、拓片、摹本、电子文件等[2]。由此可界定革命文物藏品档案是指以实物革命文物为核心，系统化记录文献集合。

（二）革命文物藏品档案的特性

革命文物藏品档案真实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图景，建立起红色基因代际传承的实物纽带，具有政治导向性、历史原真性、教育感染性、技术可塑性等特性。

1. 政治导向性

革命文物藏品档案的独特性在于其承载的意识形态属性，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物化载体。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在发展目标中提出革命文物资源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具有独特作用。要充分发挥革命文物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的重要作用。以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为例，通过谢士炎烈士的入党申请书档案还原了革命者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信仰抉择的过程。这种特性要求档案的记录、阐释与应用必须符合党的历史观、国家文化战略与政治伦理规范。

2. 历史原真性

革命文物是历史事件的直接见证者，保留着最原始的物质形态和完整的语境信息。革命文物藏品档案通过文字、照片、三维建模等方式，详细记录文物的材质、磨损情况、文字笔迹等不可逆的历史信息，确保其原真性。如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馆藏的卢志英烈士的西装，档案通过文字、照片、建立三维数字模型等方式，还原了隐蔽战线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展现了共产党人英勇斗争的精神。历史原真性作为革命文物藏品档案的根基，实质是通过科学化、标准化的记录体系，为找寻历史真相提供了线索，其价值在于为构建民族集体记忆提供不可替代的物证支持。

3. 教育感染性

作为革命精神的物化载体，革命文物藏品档案以直观可感的形态将抽象历史叙事转化为具体现实体验。相较于抽象的文字资料，文物实物更加生动直观，反映历史细节。心理学的具身认知理论认为，人的认知心智是在大脑、身体与环境的交互中形成的[3]。学生在积累了一定知识的前提下，通过观看、触摸等感官刺激，在文物课堂营造的氛围环境中，对革命文物承

载的抽象精神概念产生更具象化的认知，实现“穿越时空”的情感共鸣。如贺瑞麟烈士的《死前日记》，通过文字内容和书写字迹的变化，可感知烈士当时的内心波动，从而使被教育者深受感染，体悟革命者的崇高思想境界和革命年代艰苦奋斗的作风。

4. 技术可塑性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数字化技术为档案开发带来新契机，可将纸质档案转化为数字形式，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更有利于传播和社会教育，为教育课程开发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革命文物中，以纸质、布质、木质为主的物品占比较大，相较于以青铜器、陶器等精美的手工艺品为主的历史文物，大多是日常生活用品，数据采集高效、制作工艺相对简单、复制成本相对低廉。这种可塑性使革命文物更易实现大规模数字化活化。以敦煌石窟数字化为代表的文物数字化工作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为革命文物数字化工作提供了思路 [4]。

二、革命文物藏品档案在思政教育中的价值

革命文物虽是近代以来留下的实物见证，但它承载的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文物以其可知可感的物质性，超越了传统文本教材，是思政教育的生动教材。

（一）讲好红色故事的重要历史依据

从政策层面看，全国文物工作会议确立的“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为革命文物藏品档案在思政教育中的运用指明了方向。从文物特性来讲，革命文物藏品档案承载着真实的历史记忆，其中记录的细节信息，为红色故事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史实支撑，赋予故事权威性。思政教育内容要贴近生活、贴合实际，革命文物档案正好以其生动的历史细节，满足这一需求。从教育规律看，融入革命文物档案素材的思政教育，红色故事凭借革命文物档案的加持，更易引发情感共鸣，帮助学生在故事中汲取精神力量，实现思政教育目标 。

（二）丰富青少年思政教育形式

《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全面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江苏省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实施方案》中提到，充分发掘地方红色文化等资源，把英雄模范的先进事迹等引入课堂，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和历史融入各学段各门思政课。《南京市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条例》规定应当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廉政教育、国防教育等基地建设，传承红色基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省级市级层面，都高度重视青少年思政教育建设。革命文物作为红色资源的实物形式，借助藏品档案开展情景教学、故事演绎，模拟文物修复等活动，打破传统课堂局限，使思政教育更具吸引力与感染力 [5]。

三、革命文物藏品档案在文物主题思政教育课程中的开发利用

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根据推进“大思政课”建设和红色文化资源利用相关要求，遵循青少年认知规律，创新课程形式，深度挖掘革命文物所承载的雨花英烈事迹与精神，以 5 位雨花台烈士的相关文物藏品档案为基础，精心打造“革命文物故事开讲啦”思政教育课程，生动展示革命文物藏品档案的利用价值。

（一）革命文物藏品档案融入文物主题思政教育课程的优势

1. 制度优势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 年）的意见》提出要拓展革命文物利用途径。2025 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明确鼓励文物利用研究，为革命文物活化利用提供法律支持。江苏省和南京市也相继出台《江苏省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条例》《南京市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条例》，对革命文物等红色资源的保护利用作出具体规定，确保其真实性和完整性，并为教育应用提供制度保障。这些政策法规从国家到地方构建了完整的保护利用体系，为革命文物融入思政教育课程提供了政策依据和实施路径，有效避免了资源浪费，推动红色文化传承发展。

2. 平台优势

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是利用革命文物藏品档案开展大思政教育的重要平台。纪念馆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首批“大思政课”实践教育基地，通过构建文物史料征集保护体系、特色鲜明的展陈展示体系、精准高效的教育教学体系以及效果导向的宣传引导体系，全面展现了雨花英烈的事迹与精神，具有利用革命文物藏品档案的优势。自 2018 年以来，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与全市 18 所中小学、2 个区教育局和名师工作室签订共建协议，定期开展馆校合作课程，受众累计近 10 万人次。

3. 内容优势

从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成立以来，持续深入开展文物史料征集工作。2016 年启动了“红星计划”文物史料征集工作，内容包括“让文物回家”“让文物活化”“让精神弘扬”“让基因传承”。截至 2024 年底，馆藏文物 1163 件 / 套，藏品 6123 件 / 套，一级文物 19 件 / 套，二级文物 109 件 / 套。文物库房配备现代化、智能化保管设施。2022 年开展数字化档案建设，建成雨花英烈档案全文数据库，包含英烈档案、专题研究、精品文物资料等方面的信息，并建立了文物三维模型，在数据库中可全方位查看，为后续开发利用提供了真实

可靠的一手资料。

（二）课程设计

1. 精准定位

一是对教学对象的精准定位。本课程针对小学三到六年级的学生开展教学，充分考虑该年龄段以具象思维为主的特点，采用直观生动的教学方式。通过对革命文物实体感知和情境化叙事，将抽象的革命精神转化为可触摸的学习体验。二是教学目标的精准定位。首先是政治启蒙，通过文物档案承载的革命事迹，帮助学生建立从具体到抽象的认知链条；其次是价值塑造，通过文物故事培育学生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最后是能力培养，通过观察文物细节、推演文物修复过程等活动，提升历史想象力、批判性思维与团队协作能力。

2. 内容贴切

梳理内容遵循两个原则。一是认知适配性原则，优先选择与学生日常生活经验相关的革命文物，比如邓中夏烈士的小学手抄课本，通过分析其字迹、内容和标注方法，展现革命先烈严谨的治学态度，使同学们树立勤学善思的态度与报效家国的责任意识，实现从“小切口”见大精神的教学效果。这类文物具有天然的吸引力，使学生在“日用而不觉”的具身认知中，建立革命传统与个体经验的关联。二是遵循叙事赋能原则。选取情节生动的文物素材，比如纪实文学《和爸爸一起坐牢的日子》，以儿童视角讲述狱中故事，通过平实的语言和真实经历引发共情。此类文物能够依托人物曲折的命运、关键冲突等引发共情，在故事化的历史还原中实现革命精神的具象化。

3. 形式丰富

课程突破传统讲授模式，通过情景再现、问题驱动、实践探索等丰富课程形式。第一，情景再现法。教师通过角色扮演，运用第一人称叙事，通过服装道具和多媒体营造沉浸式历史场景。例如教师扮演卢志英烈士的儿子卢大容，以儿童的口吻讲述《和爸爸一起坐牢的日子》这部纪实文学的内容，辅以背景图片和音乐渲染情绪。第二，问题驱动法。以讲述贺瑞麟烈士的《死前日记》的相关课程为例，教师采用阶梯式问题驱动模式，如“文物损坏类型识别－修复材料特性分析－修复工序逻辑推演”，通过“设问引导－假设验证－操作反馈”的认知闭环，使学生在自主探究中完成知识的习得，让学生在修复实践中体悟文物保护的历史责任。

（三）课程实施

系列课程一共设计了 5 节课程（见表 1），每节课 10 分钟左右，支持菜单化定制。结合中小学开学第一课、入队入团仪式、少先队建队日、队会课等重要思政教育节点，实现以课程深化仪式、以仪式赋能课程。

在课程引入环节，老师介绍了牺牲在雨花台的革命烈士的总体情况以及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丰富的馆藏情况。

表 1　系列课程具体内容表

序号	课程主题	核心文物	教学方法	互动功能设计
1	张应春烈士的银制奖章	3D 打印的银质奖章	从当代女性武术视频引入，对比历史与当下；学生传阅 3D 奖章，观察纹理细节。	触摸文物复刻品，讨论“奖章背后的精神”。
2	侯绍裘烈士的印章	3D 打印的篆刻印章	以印章为线索讲述革命事迹；与纪念馆打卡章产生关联，激发参与兴趣。	盖章打卡活动，收集文创作品。
3	贺瑞麟烈士的《死前日记》	高清图片展示日记内页	问题驱动式教学：分析文物损坏类型→推演修复方法→模拟操作流程。	小组合作完成“修复方案”设计。
4	卢志英烈士与儿子的狱中故事	纪实文学《和爸爸一起坐牢的日子》	教师角色扮演（卢大容），第一人称叙事；配合视频、音频营造沉浸式历史场景。	情景问答，分享“假如我在狱中”的感想。
5	丁香烈士的照片	丁香烈士照片复制件	线索探究式教学：学生分组拼凑烈士生平轨迹（结合课前征集的自拍照对比）。	小组竞赛完成“生平拼图”，评选出最佳推理学生。

课程最后，概括总结每节课的知识要点，用革命文物串联起雨花英烈的革命精神，提炼关键词，方便学生记忆。最后提出希望，激励学生传承好英烈精神，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四）课程效果

根据多所合作学校的反馈，“革命文物故事开讲啦”课程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遵循教学规律，化抽象为具象，知识掌握度高。通过 3D 打印复刻文物、角色扮演情景再现等形式，让学生能够直观感知文物细节与历史场景。据合作学校反馈，80% 以上的学生在课后提问中能准确复述文物背后的英烈事迹，并能提炼“爱国”“奋斗”等核心精神关键词。这种化抽象为具象的教学设计，有效解决了传统思政课“理论灌输”的痛点，深化了学生对红色文化的理解。

增强教学互动，化被动为主动，学生参与度高。在关于《死前日记》的教学中，85% 的学生主动参与文物修复推演，反馈显示课程“有趣且代入感强”。通过布置小组任务、文创奖励等趣味形式，让学生在互动中深化价值认同，实现知识学习与素养培养的融合。

用活文物档案，化静态为动态，拓展利用途径。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通过馆校合作机制，将静态文物档案转化为动态教育资源。通过课程实践，学生从被动听课转为主动传播，部分学生成为志愿讲解员，形成红色基因传承的良性循环。这一模式既推进了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也为革命文物教育功能拓展提供了示范样本。

四、结语

革命文物藏品档案是纪念馆的红色家底，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将继续夯实红色家底，广泛开展征集、整理和入档工作。同时，用好用活丰富的党史资源，挖掘革命文物藏品档案资源的当代价值，创新教学模式、提升教学质效，开发更多鲜活的社会教育课程，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提供更多可复制的经验。

（下转 61 页）

智慧教学场景下财务伦理教育的现实困境与模式转型
——以“财务管理”课程为例

肖　冰　杨　洁*　任晓聪

摘要：在数智化技术深度融合的智慧教学场景中，传统财务伦理教育面临技术工具理性与伦理价值判断的结构性冲突、教学内容滞后于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伦理挑战、标准化评价体系与伦理实践需求脱节等三重现实困境。为摆脱以上教学困境，本研究提出“技术—伦理”双维驱动的混合教学模式，整合SPOC平台、VR/AR沉浸式教学及区块链决策追踪技术，构建虚实融合的伦理实践平台；同时建立阶梯递进式多元评价体系，通过柯氏四级评估模型和校企社协同机制，实现从伦理认知到行为转化的全链条培养，试图为智慧教学场景下的财务伦理教育创新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智慧教学；财务管理；伦理教育

一、研究意义

会计伦理作为一种应用伦理，核心在于阐述人与商业伦理、判断、道德价值及其在会计中的应用[1]。“财务管理”课程作为会计学、金融学、管理学等交叉领域的核心课程，其核心任务是培养学生具有企业资金规划、风险管控以及价值创造能力。当前，数智化浪潮正在以空前的速度重塑会计行业的价值范式，“财务管理”课程的教学场景也正在加速向智慧化转型，因此，如何在智慧教学场景中重构财务伦理教育体系、平衡技术理性与伦理价值成为培养新型会计人才的重要命题。本文将以“财务管理”课程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旨在深入分析伦理教育在技术融合中的多重困境，探索适应数智化需求的教学模式转型路径，试图为重构数智时代的财会人才培养体系、推进财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二、智慧教学场景下财务伦理教育的现实困境

（一）技术赋能与伦理教育偏离

随着智慧教育场景的深度发展，技术赋能正在逐渐重构财务伦理教育的底层逻辑与价值范式，虚拟仿真技术和实时数据分析技术等新兴技术手段正在逐渐渗透进财务伦理教育的方方面面，学生的技术实操能力以及在复杂财务情境中的紧急处理能力显著提高。但需要警惕的是，学生在熟练使用技术工具追求标准答案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形成了“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定式，忽视了伦理决策中的灰色地带与动态博弈，而这在真实复杂的财务情境中是不可完全避免的。在真实财务伦理困境中，许多伦理问题需要综合考虑政策法规、各方利益等多方因素，长期受二元思维定势影响的学生难以在这种复杂情境中权衡利弊，作出合理的判断与决策。此外，在算法驱动下知识转化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教

（上接60页）

参考文献

[1] 国家文物局印发《关于报送革命文物名录的通知》[EB/OL].(2018-10-18)[2025-11-10].http://www.ncha.gov.cn/art/2018/10/18/art_722_152209.html.

[2] 国家文物局.文物藏品档案规范[EB/OL].(2009-02-16)[2025-11-10].http://www.ncha.gov.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2108050950236836298.pdf.

[3] 周纹辰，张华.具身认知视角下青少年负性情绪调节产品设计研究[J].设计，2025,38(05):1-4.

[4] 毛一涵，李刚.革命纪念馆视角下革命文物档案理论研究[J].档案与建设，2024(04):67-72.

[5] 吴素卿.浅谈如何搞好革命文物藏品档案的管理与利用[J].兰台内外，2024(10):37-39.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2025年度雨花台红色文化研究院青年项目资助课题“江苏红色资源融入中小学‘大思政课’建设路径研究”（24YHTQN02）。

（作者单位：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

师对学生价值观的引导作用正在被淡化，学生更加注重如何通过技术工具实现一系列量化指标，而对于财务伦理决策的社会意义与长远效应却缺乏进一步的思考[2]。

智慧教学场景强调效率、精准度和可量化的显性成果，而财务伦理教育则注重批判性思维、责任意识和道德判断力的培养，这种技术理性与伦理教育的结构性冲突正是导致教学工具革新下价值偏离现象的重要原因。当教学评价体系以平台活跃度、任务完成率等数据指标为基准时，伦理教育的隐性价值被系统性忽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常集中于如何提高学生的量化指标，缺乏对学生价值观的深入引导，这导致伦理教育在教学中逐渐处于边缘地位[3]。此外，技术工具的快速迭代迫使教师将大量精力消耗于工具适配，“财务管理”课程中伦理议题的讨论空间被严重压缩。长此以往，工具理性对价值内核的遮蔽将形成“效率优先”与“价值失语”的认知错位，使得学生在学习中过度关注技术工具的使用和效率的提升，忽视财务伦理教育所蕴含的核心价值，在未来的财务工作中无法正确运用所学的伦理知识指导实践，最终可能导致财务伦理教育丧失对职业实践的价值引领功能。

（二）内容供给与能力需求失衡

当前财务伦理教育正面临内容供给与智慧教学需求失衡的困境。纵观“财务管理”课程内容，伦理模块仍沿用传统教材中的例如安达信倒闭、世通公司财务丑闻等经典案例，不可否认这些案例在以往教学中发挥过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在数字经济时代，随着大数据技术引发的隐私权争议、算法决策中的公平性困境、区块链应用中的责任归属问题等新型伦理挑战的出现，以上案例将难以起到真正的教学作用。这种知识更新的迟滞效应，导致伦理教育与企业真实决策场景产生认知时差，学生既缺乏对数据主权、算法规训等新型伦理风险的解构能力，更难以形成价值权衡的决策框架。

在教学方式上，目前财务伦理课程多采用线性知识灌输模式，教师单方面将抽象的伦理说教传递给学生，既缺乏适应碎片化学习的模块化重构，也未能有效整合数字化教学工具，削弱了学生的课堂参与意愿，更阻碍了其伦理认知向决策能力的转化进程。

此外，教师队伍的能力结构失衡同样加剧了财务伦理教学困境。智慧教学场景对教师综合教学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然而许多教师精于量化模型构建，却疏于伦理哲学的系统训练，缺乏对伦理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分析的能力；擅长数据运算推导，缺乏跨学科认知框架，难以将财务知识与其他学科知识相融合，这使得伦理教学多局限于表面的是非判断，而未涉及权力结构、制度盲区及文化情境的深层解构。这种浅层供给的教学形态使得学生难以获得系统深入的财务伦理知识和思维训练，难以成长为具备数智化时代所需的财务知识、伦理知识以及综合决策能力等技能的复合型财务人才，这与智慧教学场景下人才培养的目标严重背道而驰（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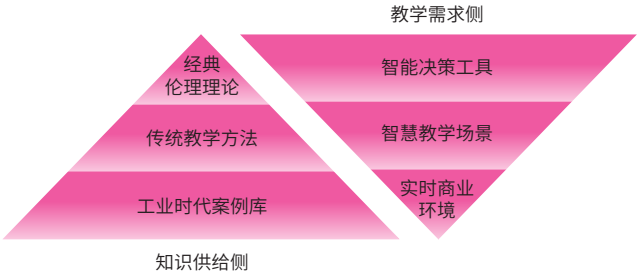


图 1 财务伦理教学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结构性错位

（三）评价体系与教育效果脱节

当前智慧教学系统的标准化评价模型普遍运用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通过对学生知识的获取效率和技能的掌握熟练程度来评判其学习效果的优劣。在该评价体系中，学生能够在测试中熟练、迅速地选择“正确答案”，但若让其置身于利益交织、权责模糊、信息失衡等错综复杂的现实商业场景中，他们的批判性思考、风险预判和伦理决策能力则显露出明显短板[4]，这严重偏离了财务伦理教育的核心目标。

智慧教学平台往往通过“合规操作次数”“风险提示响应率”等行为标签构建学生伦理画像，将“合规操作”与“伦理自觉”画上等号，将伦理决策粗略地等同于技术参数而忽视情景化的伦理判断，这种量化评估方式正在逐渐削弱财务伦理教育的实践意义：学生为了获取高分会选择做出程序正确但伦理存疑的策略性选择，甚至会通过主动规避系统未明确标注的灰色地带获得理想分数，形成功利主义学习倾向。这割裂了伦理认知与价值内化的有机联系，使财务伦理教育拘泥于表面而削弱实质效果，长此以往将严重损害财务领域健康，影响财务领域可持续的发展态势。

三、智慧教学场景下财务伦理教育模式转型的路径探索

（一）创新“技术赋能＋伦理嵌入”的混合教学模式

在智慧教学场景中，构建“技术赋能＋伦理融合”双维驱动的混合教学模式是培养复合型财务管理人才的关键路径之一，对于提升学生在复杂商业环境中的道德判断水平和职业操守具有重要意义。

从技术赋能角度，教师可以依托 SPOC 平台构建“线上＋线下”的一体化教学模式。在线上，利用微课视频全方位为学生展现财务伦理的理论框架，供学生能够随时学习财务伦理知识，另外大量收录国内外财务伦理相关的经典案例，供学生能够在案例分析中得到对抽象财务伦理知识的具象理解；在线下，组织学生成立讨论小组，围绕线上所学的理论与案例相互展开深入的讨论与交流，这种讨论过程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使学生们的思想得到碰撞，激发其批判性思维，

团队协作能力也在此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增强。此外，教师还可以利用 VR 和 AR 技术模拟沉浸式财务伦理体验场景，例如企业财务舞弊、数据隐私泄露等，让学生在身临其境中直观地感受伦理冲突，增强其在实际工作中识别和应对财务伦理风险的能力。为更加精准地把握不同学生之间的学习需求差异，实现个性化教学路径规划，教师还可以在教学过程中设计“伦理决策链”板块，在预算编制、投融资决策等环节增加伦理评估，通过 AI 算法生成能够直观呈现学生在财务伦理认知和决策方面薄弱环节的伦理盲点热力图。

在伦理嵌入角度，开发“伦理决策沙盘”模拟系统，通过整合区块链技术记录学生在模拟情境中决策过程的所有关键节点及其行为依据，通过可视化图谱呈现不同选择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同时，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为财务伦理教育提供大量的数据支撑和实践素材，使学生的财务伦理素养得到全方位提升，夯实其财务职业生涯可持续发展的根基。

（二）打造“虚实融合＋情境重构”的伦理实践平台

通过打造“虚实融合＋情境重构”的财务伦理实践平台，传统财务教学场景的静态局限将被一举打破，学生能够在该平台中直面复杂资本市场中的种种真实伦理冲突。教师可以借助虚拟仿真引擎搭建三维立体的教学场景，使学生完整体验从企业违规事件发生到监管体系响应的动态闭环流程，并且能够通过扮演企业中的不同角色与交互操作，深入了解企业财务活动的各个节点和其中可能存在的道德陷阱与伦理风险 [5]。

情境驱动的决策机制是该伦理实践平台实现实践转化的关键支撑。通过数字孪生技术构建企业运营的虚拟镜像，教师可实时调整税务政策、融资环境等外部参数，观察学生团队在利益最大化与社会责任之间的策略选择。

（三）建立“阶梯递进＋多元主体”的伦理评价体系

在智慧教学场景中，伦理评价需突破传统考试的单维度模式，遵循认知发展规律构建基于柯氏评估模型的阶梯式评价体系，该体系能够有效整合不同层次的评价指标，为财务伦理教育提供一个科学的评估框架。在初级阶段，教师可通过智能题库对学生有关会计职业道德规范、利益相关者理论等财务伦理知识的掌握程度进行测评；在中级阶段，教师可通过情境模拟评分系统观察学生在虚拟情境中的伦理判断能力，对其逻辑严谨性、方案可行性进行多维度量化；在高级阶段，教师可通过项目制学习评估学生在团队协作中表现出的价值倡导、风险预见等软技能，从责任意识、批判思维等维度生成动态成长档案，对学生在实际工作中处理商业贿赂、盈余管理等问题的行为一致性进行实时追踪。

伦理评价体系的革新还需突破传统教师单维评价的局限性，建立“教师＋企业导师＋第三方机构”的多元化主体评价体系。教师可依托 LSTM 神经网络构建动态语义分析系统，对课堂讨论文本进行伦理关键词提取并捕捉语境关联性，生成伦理认知发展曲线，并借助交互式可视化面板实时呈现个体与群体的认知演进轨迹，为教师开展精准化伦理干预提供数据支持；企业导师可采用 360 度全景评估框架，建立包含客户满意度、合规决策频次、利益相关者保护行为等指标的职业操守评价矩阵，结合多维度评分数据构建伦理决策能力雷达图，从而精准识别学生的职业价值观偏差；第三方机构可基于 ISO 37001 反贿赂管理体系标准，开发虚拟仿真审计引擎，通过蒙特卡洛模拟量化伦理风险暴露值，对虚拟仿真实验中的决策数据进行独立审计，实现伦理教学评价与社会需求的精准对接。

四、结论

智慧教学场景中财务伦理教育的困境存在的根源来自技术理性与教育人文性的深层冲突，其突破的关键在于坚持以动态平衡为原则，构建技术赋能与伦理嵌入共生的教育生态：通过混合教学模式使知识传递与价值培育实现有机融合、依托虚实融合的伦理实践平台弥合财务伦理理论与实践的断层、利用阶梯式伦理评价体系贯穿财务伦理技能与素养的双重培养过程，从而能够推动财务伦理教育从工具适配跃迁至价值引领。这不仅能够显著提升财务伦理教育的质量，更能为培养兼具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的新型会计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应持续关注伦理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制度协同与风险防控机制，保障财务伦理教育在数智化转型过程中的正确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 高海燕 . 大数据背景下会计伦理问题的思考 [J]. 财会学习 ,2021(16):93-95.

[2] 汲昌霖 , 冯雨薇 . 人工智能视域下的会计教育转型与人才培养模式优化研究 [J].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23(09):68-72.

[3] 强群莉，田妍，张亚新 . 新时代中国伦理思想破解智能财务伦理困境 [J]. 会计之友 ,2025(02):130-135.

[4] 董红星 . 组织伦理视角下的会计文化建设思考 [J]. 财会通讯 ,2018(01):122-124.

[5] 刘勤 , 杨寅 . 智能财务的体系架构、实现路径和应用趋势探讨 [J]. 管理会计研究 ,2018,1(01):84-90,96.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3 年度深圳大学教学改革研究一般项目“新时代背景下‘财务报表分析’课程设计初探”（JG2023117）；2025 年度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课题“数字经济包容性改善农民工就业脆弱性的实现机制与优化策略”（2025lslqnkt-015）。

（作者：肖冰，深圳大学博士研究生；通信作者杨洁，山东建筑大学硕士研究生；任晓聪，辽宁大学博士研究生）

社会工作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实践路径与创新探索
——以深圳市为例

王　璐　李一丹　黄红新　钟　立　杨　恒

摘要：当前，深圳市已经初步建立起政府主导、多方协作的未成年保护体系，社会工作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采用个案研究法，聚焦深圳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社会工作实践，深入探讨了社会工作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实践现状、发展困境，并基于协同治理视角，提出健全联动机制、构建信息平台、整合资源网络、促进文化融合、构建知识体系等创新策略，以期为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提质增效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范例。

关键词：未成年人保护；社会工作；协同治理；深圳经验

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深刻变革，使得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单一主体、碎片化的未成年人保护模式已无法满足新时代未成年人的多元需求，积极探索适应新时代特点的未成年人保护模式成为当务之急。深圳市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依托“先行先试”的制度性优势，一直致力于本土未成年人保护模式的积极探索和实践。面对未成年人群体规模庞大、结构多元、流动性强的特点，深圳市积极引入社会工作的专业力量，初步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多方协同参与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效，但在实践推进的过程中，仍面临诸多亟待破解的现实困境。

一、深圳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制度环境与发展现状

（一）政策法规体系的建立健全

近年来，我国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法律法规持续健全。《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构成了保护未成年人的总体框架[1]。深圳市认真落实国家有关立法要求，结合当地实际先后出台实施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建设指南》《未成年人临时监护工作规范》等地方性法规、文件。这些文件和政策细化了相关措施，拓展了相关工作网络，为保护未成年人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撑。

（二）社会工作服务的深度嵌入

社会工作者在社会工作服务中充当重要角色，提供直接服务，在政策倡导、沟通和联系资源、协商合作等方面发挥作用。预防干预、保护儿童等多样化服务，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在预防层面，通过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开展反欺凌项目等方式，促进未成年人提升自我防范、自我保护的能力，降低意外伤害和心理问题发生率，创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在家庭支持层面，为家长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促进家庭成员良性互动，在家庭危机时介入及时、有效支持，维护家庭良好运行，保障未成年人权益；在学校合作层面，通过开办心理辅导室、协助调解学生之间的矛盾等方式，促进学生心理韧性和社会交往能力的提升，提升校内安全度；在儿童保护层面，积极应对紧急救助需求，维护儿童权益，提供困难儿童综合性关爱服务，建立儿童保护网络，使儿童在关爱中成长发展[2]。综合的介入形态突出了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和综合性，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局面，可以对青少年儿童的成长发展产生积极、深远的良性影响。

二、深圳市社会工作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的实践路径

深圳市社会工作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实践中，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成型的实践路径，包括从风险预防到权益保障、从个体服务到系统联动等多个方面[3]。

（一）风险评估：构建预防性保护机制

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预防是最好的保护。预防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识别和分析潜在的风险因素，即风险评估。被识别出的风险因素，可以为后续的干预

提供预警信息和干预方向。以深圳市未成年人保护实践中的家庭监护风险评估为例，它由专业社会工作者负责实施，采用访谈、观察、问卷调查、心理测评等多种方式，对未成年人及其所处的环境进行深入调查和统计分析，形成评估结果，确认是否存在可能导致未成年人遭受伤害的风险因素以及风险程度如何。不同的评估结果，会触发不同的干预措施。通过干预的实施，进一步筑牢预防性保护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可能遭受的伤害。

（二）专业服务：提供综合性支持体系

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未成年人所面临的问题呈现出多元化、复合型的特点。这为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介入提供了发挥的空间。以个案管理服务为例，社工针对遭受家暴且经济困难的有网瘾的未成年人，可以发挥“枢纽”功能，整合多方资源，提供包括心理辅导、学业支持、社会救助、法律援助、潜能训练等在内的综合性服务，形成对未成年人的全方位支持。

（三）多方协同：建立联动式保护网络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复杂性，要求建立多部门协作机制。在深圳市的未成年人保护实践中，社工充当协调者，在多方协同的机制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具体体现为：与执法部门协作，保障了儿童的安全与权益；与医疗机构合作，使儿童的健康得到适当照顾；与学校及教育机构协作，以保障儿童的受教育权；与民政部门、妇联、社区组织及志愿者组织开展合作，使儿童的基本物质和服务需求得到满足。透过多方协同，保护未成年人的立体式、联动式网络得以全面建立。

（四）资源整合：构建支持性服务体系

面对现实资源分散的窘境，社会工作者能充分利用资源链接者的专业优势，利用资源库建构、资源合作平台搭建以及服务创新等手段，将分散的社会力量整合为有组织的资源支持网络。在深圳市的未成年人保护实践中，社会工作者发挥团体合作的专业优势，把慈善机构、企业、志愿者组织等社会力量，汇聚为支持未成年人的联动网络。社会工作者能够精准掌握并甄别社区各类可以利用的资源，并结合未成年人的具体需求，有针对性地设计和实施干预措施。资源的整合，既增强了保护工作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又提升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韧性和可持续性。

（五）社会倡导：传播未成年人保护理念

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传播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理念，凝聚社会共识尤其重要。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社会倡导发挥关键作用。以深圳市的未成年人保护实践为例，作为专业人员的社会工作者能够准确理解包括儿童权利、儿童最佳利益原则以及各方在未成年人保护中的责任和义务等在内的未成年人保护理念。在此基础上，利用其在社区中的服务网络和资源，通过各种创新、易懂的宣传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倡导类的活动，更容易获得社区居民的参与、理解和认可，凝聚社会大众的共识，促进整个社会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持续关注和改善。

三、深圳市社会工作在未成年人保护实践中的困境

虽然深圳市社会工作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取得了长足进展，社会工作介入也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但实践层面的诸多深层次困境与障碍[4]，仍制约着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成效的进一步提升。

（一）协同机制：部门共识不足与联动障碍

“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在跨部门的实践操作中尚未有效落实。在未成年人保护实践中，各部门的职责分工、协作流程、权责边界等在法律和政策层面不够明晰，这导致在处理一些复杂个案时常会出现职责交叉或空白的情况。此外，不同职能部门在实际工作中，会囿于其自身工作目标、绩效标准和工作资源的限制，对事务有不同的优先级排序，致使儿童的最佳长远利益在部分个案中，未能成为各部门共同且首要的考量基点。

（二）信息共享：数据壁垒与沟通不畅

“信息孤岛”现象严重制约了各部门之间的协作效率和服务精准度。当前，统一的未成年人保护信息共享平台和数据交换标准尚未形成，民政、教育、公安、司法、卫健、妇联、团委等部门各自所掌握的与未成年人相关的信息，往往不能在需要协作的部门之间及时、完整、有效地流动。传统的电话、公文、临时会议等日常沟通渠道，效率较低。当有紧急个案需要处理时，信息传递的延迟，可能导致错失最佳干预时机。

（三）资源分配：流动儿童福利保障不足

深圳市作为一个移民城市，流动人口占比约70%，而与户籍政策挂钩的一系列医疗、教育、救助等福利成为大多数流动困境儿童可望而不可即的“天上月”。以龙岗区为例，每年介入的困境儿童个案平均为100宗，其中有80%以上是流动困境儿童。困境儿童个案由于其复杂性、长期性和变动性，在不同阶段需要整合不同的资源进行救助，而现有的福利体系和资源整合机制难以满足这些需求。这种因户籍身份导致的“福利鸿沟”，使得社会工作者在为流动困境儿童链接资源时常常感到力不从心。

（四）文化适应：本土化实践与知识体系缺失

社会工作在深圳市的未成年人保护实践中，还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是本土文化融入不足与自主知识体系缺失。以服务中的理论指导为例，目前仍主要依赖、借鉴西方的社会工作理论，深圳本土的移民文化、岭南文化、家族观念等文化特色和理念，未能在服务中得到深度理解和有效融合[5]。在知识体系方面，我国未成年人保护领域也尚未建立基于本土实践的自主知识体系，现有的专业术语、评估工具、干预模式多直接沿用国外的相关内容，对中国国情、深圳特色的方法提炼、理论创新不足。

（五）机制建设：个案跟进与服务连续性不足

根据《深圳市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工作指引（试行）》，对于安全困境儿童（主要指面临监护缺失、监护不当、监护侵害风险的儿童）的个案跟进与管理，是当前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之一。这类个案通常案情复杂，涉及法律、心理、社会等多层面问题，干预周期长，且需要多部门深度协同。然而，现有的个案管理机制难以满足其需求，缺乏强制性的、标准化的跨部门个案会商与跟进流程，动态评估与跟进机制不完善，导致服务容易出现“空白区”。

四、完善深圳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对策建议

（一）健全多部门联动机制

建议在区级层面实质化运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联席会议，由区领导或指定权威部门牵头，明确各核心成员单位的参与责任[6]。会议应定期召开，重点研判辖区未成年人保护形势、协商解决重大疑难个案，并建立紧急个案临时动议机制。制定精细化协作指南，详细列明不同类型未成年人保护事件的触发条件、主责部门与协办部门、具体协作流程等，使其成为各部门协同行动的操作手册。在机制设计中，明确社工在多部门联动中的专业角色定位，保障其在个案会商、服务计划制定与执行中的话语权和参与空间。

（二）构建信息共享平台

依托深圳市已有的政务数据资源，推动建设深圳市未成年人保护信息平台。该平台应以民政部门为统一归口，按照权限共享、安全可控的原则，整合各部门掌握的困境未成年人基础数据、服务记录和风险信息，形成动态更新的“一人一档”电子档案。打破部门间数据壁垒，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和交换接口，确保相关职能部门在授权范围内能够及时查询、录入、更新相关信息。完善日常沟通渠道，配套完善市、区、街道三级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即时通信网络，用于日常信息通报、工作协调、紧急联络。

（三）创新资源整合模式

由民政部门主导，社工机构积极参与，共同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深圳市困境儿童救助资源库。广泛吸纳企业、基金会、慈善组织、专业服务机构等提供的各类资源，实现资源的集中展示、快速查询和智能匹配。设立全市统一的未成年人保护服务热线，并与资源库联动，建立快速响应流程。探索建立突破户籍限制的福利供给制度，鼓励深圳市利用特区立法权或政策创新优势，探索逐步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对非户籍常住人口的覆盖范围，推动设立针对流动困境儿童的专项救助基金。

（四）促进本土化实践创新

推动未成年人保护服务与本土文化深度融合。一方面，鼓励和支持社工在服务设计中充分考虑深圳市的移民文化、社区特点、家庭观念等本土元素，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服务项目。系统总结提炼本土实践经验，构建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保护知识体系。另一方面，实务界应加强与学术界的合作，借助行动研究等工具，对深圳市社会工作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实践经验和案例进行模型提炼和成效验证，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出适用于中国情境的未成年人保护理论模型和实务工具。

（五）完善个案管理体系

针对目前个案管理中困境儿童分级标准不明晰、责任机制不健全、未成年人保护社工能力有待提升的现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个案管理体系：第一，依据《深圳市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工作指引（试行）》，进一步细化困境儿童分级标准，建立分级管理制度。第二，优化个案管理系统平台的功能模块，实现对困境儿童个案管理的动态评估、服务协作、信息共享和责任追踪，确保个案管理服务全流程可管理和监测。第三，针对未成年人保护社工的能力弱项，通过理论学习、案例研讨等形式，提升其个案管理能力。

五、结语

社会工作在深圳市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实践历程，证明了社会工作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和功能。面对新形势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面临的全新挑战，社会工作需要以协同机制完善、信息共享畅通、资源整合深化、本土化实践创新及个案管理精细化为抓手，不断创新和优化未成年人保护实践路径和策略，才能为全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贡献可借鉴的“深圳经验”。

参考文献

[1] 姚建龙，公长伟．未成年人保护中的国家亲权理念研究——以新未成年人保护法为重点 [J]. 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21(01):12-19.

[2] 苏祺彦君．社工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角色研究——基于广州市“青年地带”实践经验 [D].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21.

[3] 李丹丹．社会工作参与基层未成年人保护的实践研究 [J].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文摘版）社会科学，2025(04):78-81.

[4] 史立梅，吴蓉．我国监护困境未成年人保护案件处理程序的问题及完善 [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4,43(04):130-140.

[5] 孟博．人情与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研究——以 S 县未成年人保护项目为例 [D]. 柳州：广西科技大学，2021.

[6] 郑柔．做好新时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几点建议 [J]. 中国民政，2022(08):35.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3 年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师资项目“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师（王璐）”（ZLJS20230314）。

（下转 67 页）

三类典型场景下高职生防电信网络诈骗治理研究

——以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章清蓉

摘要：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高职生群体对网络依赖度越来越高。高职生群体因社交需求旺盛、消费观念开放且风险防范能力不足，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发受害人群。本文以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十个真实诈骗受害案例为研究样本，区分出社交平台诈骗、游戏交易诈骗、利诱型诈骗三类典型场景。通过剖析不同场景下诈骗分子的话术设计、行为套路及高职生的受骗成因，从学校、平台、社会三维度构建有针对性的电信网络诈骗治理体系，为提升高职生反诈能力、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提供实践路径。

关键词：高职生；电信网络诈骗；典型场景；治理路径；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一、引言

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电信网络诈骗已呈现出场景多元化、话术精准化、手段隐蔽化的特征，对青年群体的财产安全和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威胁。高职生作为职业教育体系的核心群体，正处于价值观成型期，其社交活动多依赖网络平台，游戏娱乐、线上消费等行为频繁，且对新型诈骗手段的识别能力较弱，使得该群体成为诈骗分子重点攻击的目标[1]。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作为以信息技术类专业为特色的高职院校，其学生的网络使用频率和深度远超其他院校专业群体，相关诈骗受害案例更具代表性。本文基于该校近年发生的真实案例，聚焦三类高发典型场景，深入分析高职生受骗的深层逻辑，探索系统性治理方案，对提升高职校园反诈工作实效具有重要现实意义[2]。

二、高职生电信网络诈骗受害高发的三类典型场景及特征

（一）社交平台诈骗：身份伪装与场景误导的双重陷阱

社交平台是高职生获取信息、维系人际关系的主要载体，也成为诈骗分子实施犯罪的重要渠道。此类诈骗以“身份伪装”为核心，通过复制熟人信息、营造真实场景等方式降低受害者警惕，再以“紧急求助”“福利诱惑”等名义实施诈骗，典型案例包括微博冒充朋友代买机票诈骗、小红书低价会员诈骗、QQ网购游戏账号诈骗等。从场景特征来看，一是身份仿冒具有高度迷惑性。诈骗分子会精准复制受害者熟人的昵称、头像等关键信息，如2024级某学生遭遇的诈骗中，诈骗账号昵称与其在韩国的朋友高度一致，且能结合“朋友在国外”的已知事实，编造“国际漫游关闭只能用微博联系”的合理理由，形成场景闭环。二是沟通渠道的跨平台转移。为规避平台监管，诈骗分子通常会将沟通从原社交平台转移至无担保的私人渠道，如QQ网购游戏账号诈骗中，卖家全程在QQ沟通交易，脱离了具备监管功能的正规交易平台。三是福利诱惑直击心理弱点。针对高职生消费能力有限的特点，诈骗分子以“低价福利”为诱饵，如小红书上“55元开通QQ音乐年会员”的广告，远低于平台官方188元的价格，精准刺激高职生的贪利心理[3]。

（二）游戏交易诈骗：脱离监管与连环套路的叠加风险

高职生是游戏消费的主力群体，游戏道具、账号

（上接66页）

（作者：王璐，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博士研究生、深圳市温馨社工服务中心总干事、高级社会工作师、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师；李一丹，深圳市温馨社工服务中心督导、深圳市未成年救助保护中心项目负责人；黄红新，深圳市温馨社工服务中心督导、高级社会工作师；钟立，深圳市温馨社工服务中心副总干事、高级社会工作师；杨恒，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的交易需求旺盛，而此类交易的虚拟性和非标准化，为诈骗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游戏交易诈骗主要表现为线下交易、虚假中介、连环充值等形式，涉案案例占比达 40%，包括游戏道具线下交易保证金诈骗、CS 游戏装备转账失联诈骗、游戏账号买卖诈骗等。多数受害者为追求交易便捷或规避平台手续费，选择微信、银行卡等私下交易方式，如 2023 级通一学生在抖音评论区联系卖家后，直接通过银行转账 1300 元购买 CS 装备，转账后立即被拉黑。诈骗分子会伪造“第三方中介平台”增强可信度，如 2023 级一学生出售游戏账号时，轻信买家推荐的“中介平台”，完成账号交付后发现平台失效，账号被转移。诈骗分子会通过“小额退款建立信任—制造危机—追加充值”的套路逐步诱导，如 2025 级一学生在闲鱼购买游戏账号时，先收到 2000 元退款降低警惕，随后被以“银行卡冻结”“充值解冻”为由诈骗 35000 余元，损失金额远超初始交易金额 [4]。

（三）利诱型诈骗：情感捆绑与利益诱惑的双重驱动

利诱型诈骗以“情感需求”或“利益回报”为突破口，通过构建虚假情感关系、营造高回报假象等方式，诱导高职生主动转账，典型案例包括帮女友“冲业绩”网贷诈骗、浏览不良网站诱导转账诈骗、交友平台充值返利诈骗等。此类诈骗的隐蔽性超强，受害者往往在“人情”或“利益”的驱动下丧失判断力。诈骗分子利用高职生重感情的特点，以帮朋友“冲业绩”“规避法律风险”等名义进行道德绑架，如 2023 级一学生为帮女友“冲业绩”，轻信“平安汇”网贷平台的“余额验证”要求，向同学借钱存入银行卡后被转走 4000 元。诈骗分子通过小额充值解锁权限、群内虚假返利截图等方式，营造盈利假象，如 2025 级某学生在交友平台中，从 30 元小额充值开始，逐步被诱导转账至 25000 余元，直至无法联系对方才察觉受骗。此外，此类诈骗常伴随不良信息传播，如浏览不良网站后被诱导转账的案例中，诈骗分子以“防范钓鱼执法”为由制造恐慌，突破受害者的心理防线 [5]。

三、三类典型场景下高职生受骗的深层成因分析

（一）个体层面：风险认知不足与行为习惯失范

高职生的年龄多在 18~22 岁之间，心智尚未完全成熟，风险判断能力和自我约束能力较弱，形成了明显的认知和行为短板。在风险认知方面：一是对诈骗手段的识别能力不足，对“陌生链接不可点”“私下转账无保障”等基础反诈知识掌握不牢固，如多名学生轻信虚假转账截图、点击陌生支付链接，未通过银行 App 或别的官方渠道核实信息；二是对虚拟空间的风险认知模糊，将社交平台、游戏平台等同于交易平台，忽视其缺乏资质审核和资金担保的缺陷，如在抖音、QQ 等社交平台进行游戏装备、账号交易，丧失风险预警意识。在行为习惯方面：首先是交易行为不规范，存在“图便捷、贪便宜”的心理，主动选择线下交易或非正规渠道，如购买低价会员、游戏账号，脱离淘宝、闲鱼等正规平台，直接与陌生人私下交易；其次是个人信息保护意识淡薄，随意向陌生人提供银行卡号、身份证号、手机验证码等关键信息，如购买游戏账号时向卖家提供全套身份信息，导致银行卡密码被破解；最后是应急处理能力不足，遭遇疑似诈骗时未及时联系学校、家长或警方，反而轻信诈骗分子的“解冻”“验证”说辞，导致损失扩大。

（二）学校层面：反诈教育存在针对性与实效性短板

学校作为高职生教育管理的主体，在反诈教育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但从案例反馈来看，现有教育工作仍存在明显不足。教育内容缺乏场景化设计，多以通用反诈知识宣讲为主，未结合高职生高发的社交平台、游戏交易等场景开展针对性教学，导致学生对身边的诈骗风险认识不足。教育方式单一固化，多采用主题班会、专题讲座等传统形式，互动性和体验性不足，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部分班级仅通过口头讲解案例，未组织模拟演练或案例研讨，学生印象不深刻。教育覆盖存在盲区，对新生、特定专业学生的精准教育不足。如 2025 级新生在军训期间遭遇游戏账号诈骗，反映出新生入学教育中的反诈内容未及时跟进；通信工程设计与监理、市场营销等专业学生涉案率较高，未结合专业特点开展针对性教育。家校协同机制不健全，部分案例中家长对学生的线上交易行为不知情，直到学生被骗后才知晓，学校与家长的反诈信息传递不及时，未能形成教育合力。

（三）平台与社会层面：监管漏洞与环境误导的双重影响

网络平台的监管缺陷和社会环境的不良导向，为电信网络诈骗的发生提供了外部条件。在平台监管方面，社交平台、游戏平台对诈骗信息的识别和拦截能力不足，如抖音评论区的“售卖游戏装备”信息、小红书的“低价会员”广告长期存在，未被及时清理；部分平台的身份核验机制不完善，诈骗分子可轻易注册仿冒账号，且跨平台沟通难以被监管，如从闲鱼转移至钉钉沟通交易，规避了平台的交易监管。此外，正规交易平台的担保功能宣传不足，许多学生不了解闲鱼、淘宝的资金托管机制，主动选择私下交易。在社会层面，不良网络信息传播加剧风险，不良网站、陌生群聊中的虚假信息诱导学生误入诈骗陷阱，如学生因点击陌生群聊推送的网址，进入虚假交友平台被骗。非正规网贷平台、虚假中介平台监管缺失，“平安汇”等非法网贷平台未被有效排查，为诈骗分子提供了作案工具。反诈宣传的社会协同不足，警方、社区与学校的联动不够紧密，反诈信息未能精准触达高职生群体，如部分案例中警方通过交易监测发现异常后才联

系学生，未能提前预警。

四、三类典型场景下高职生防电信网络诈骗的治理路径构建

（一）学校主导：构建场景化、精准化的反诈教育体系

学校应立足高职生特点，将反诈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提升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打造场景化教育内容，围绕社交平台、游戏交易、利诱型三类高发场景，编写案例手册，将本校真实案例转化为教学素材。如针对社交平台诈骗，开展“仿冒账号识别”“跨平台沟通风险”针对游戏交易诈骗，解析“线下交易陷阱”“虚假中介识别”套路；针对利诱型诈骗，剖析“情感捆绑”“充值返利”骗局，让学生直观感受诈骗流程。创新教育方式方法，采用“案例研讨 + 模拟演练 + 线上互动”的多元模式。组织学生开展诈骗案例情景剧表演，模拟“代买机票”“游戏交易”等场景的应对流程；利用 VR 技术构建虚拟诈骗场景，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习应对技巧；通过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推送“反诈小课堂”，解读最新诈骗手段。实施精准化教育管理，建立“新生入学教育 + 专业特色教育 + 重点学生关注”的分层体系。新生入学时开展反诈专题培训，签订《个人信息保护承诺书》；针对信息技术类、市场营销类等涉案率较高的专业，将反诈知识融入网络安全、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相关课程；对有游戏沉迷、频繁线上交易等行为的学生，由班主任进行一对一提醒。健全家校协同机制，定期向家长推送反诈知识和本校案例，提醒家长关注学生的资金往来和线上行为；建立“家长—班主任—辅导员”沟通群，及时通报疑似诈骗线索，形成家校共育合力。

（二）平台协同：强化场景监管与风险预警能力

针对三类典型场景优化监管机制，筑牢技术防线。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对社交平台的“低价福利”“代买代办”等关键词进行监测，对游戏平台的“线下交易”“中介平台”等信息进行过滤；完善账号注册审核机制，对昵称、头像高度相似的账号进行预警，要求实名认证并与熟人关系链绑定，防范仿冒账号。在社交平台、游戏平台显眼位置提示“私下交易有风险”，引导用户使用官方担保交易渠道；如闲鱼平台可强化“账号交易保”服务，对游戏账号、虚拟道具交易进行权属核验和资金托管，降低交易风险。建立跨平台风险预警机制，针对“跨平台沟通”这一诈骗常用手段，联合微信、QQ、抖音、闲鱼等多平台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对用户从交易平台转移至私人渠道的行为进行弹窗预警，提示“脱离官方渠道交易可能遭遇诈骗”。完善用户教育与维权渠道，在平台内设置“反诈中心”专栏，推送场景化反诈知识；简化维权流程，为受骗用户提供交易记录导出、诈骗线索举报等便捷服务，协助警方调查。

（三）社会联动：构建全链条反诈治理格局

需整合警方、社区、学校等多方资源，形成社会协同治理合力。强化警方与学校的联动预警，警方定期向学校通报区域内高职生诈骗高发态势和新型手段，学校协助警方开展“反诈进校园”活动，如组织民警结合本校案例开展专题讲座；建立“警—校”快速响应机制，学生遭遇诈骗后可通过校园报警电话快速报案，警方第一时间介入调查，最大限度挽回损失。净化网络环境，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清理不良网站、陌生群聊中的虚假信息和非法链接；加强对非正规网贷平台、虚假中介平台的排查与打击，从源头遏制诈骗工具的传播。提升社会反诈宣传实效，社区通过宣传栏、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推送高职生诈骗案例；银行网点对学生群体的大额转账、频繁转账行为进行提醒，核实交易真实性；运营商通过短信向高职生推送场景化反诈提示，如“收到代买请求请通过电话核实，陌生链接请勿点击”。

五、结论

社交平台诈骗、游戏交易诈骗、利诱型诈骗是高职生电信网络诈骗受害的高发场景，其发生源于高职生个体风险认知不足、学校教育实效不强、平台监管存在漏洞、社会协同不够紧密等多重因素。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的案例表明，治理对于高职生群体的电信网络诈骗需突破“单一宣传”的传统模式，构建“学校主导、平台协同、社会联动”的三维体系：学校需打造场景化精准教育体系，平台需强化技术监管与风险预警，社会需形成全链条治理合力。唯有多方协同、精准施策，才能切实提升高职生的反诈能力，筑牢校园财产安全防线，为高职生的健康成长营造安全的网络环境。

参考文献

[1] 汪洋，杨丽清，周亦宁. 高职院校新型电信诈骗防范策略研究 [J]. 法制博览 ,2025(05):145-147.

[2] 陈智，周利平，肖宁. 云南省高职院校防范网络电信诈骗长效机制建设研究 [J]. 法制博览 ,2024(12):15-17.

[3] 丁晖. 高职院校电信诈骗的问题及防范对策研究 [J]. 法制博览 ,2024(04):144-147.

[4] 郑杰，陈俊波，朱景多，等. 高职院校电信诈骗防范体系构建研究——基于多元主体系统理论 [J].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3,23(01):16-20.

[5] 何静，郎彬彬. 高职学生遭遇电信诈骗案例分析——基于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视角 [J]. 法制博览 ,2023(05):5-8.

（作者单位：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党建创新引领高校综合管理高质量发展路径探究
——以牡丹江医科大学为例

葛　戈　王尊博　陈　瑶*

摘要：在高校日常管理工作始终以党建工作为核心。从高校教育顶层设计来看，思想政治建设是高校综合管理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党建工作创新将因此成为高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强调了党建创新的重要性。本文结合牡丹江医科大学实际情况，从高校综合管理的维度出发，对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党建创新的引领作用进行探讨分析，明确党建创新工作的重要意义，为高校综合管理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思路，在健全完善高校管理制度的基础上提升其党建创新工作水平，更好地发挥党建功能作用，提升高校管理水平和创新发展能力。

关键词：党建创新；高校综合管理；高质量发展

在国家高速发展的同时，高等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提供了大量高素质的优秀人才，而高校管理水平也成为影响人才培养质量、国家发展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高校的综合管理难度不断提升，其综合管理水平也将对高校高质量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因此，高校需要充分认识到党建创新的重要意义，积极推进创新工作，全面体现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实现广大师生的思想统一与协调一致，共同推进高校创新发展[1]。本文以牡丹江医科大学为例，在分析创新工作内容的基础上，指出了党建引领的作用，为党建创新提供科学指导，也为高校高质量发展提供积极助力。

一、党建创新引领综合管理的工作内容

（一）创新党建与业务融合机制，驱动管理效能提升

牡丹江医科大学在探索“党建＋业务”发展路径的过程中，以党建为抓手，把党建作为各项业务开展的指南，从而确保教学、科研、医疗、管理工作的开展富有成效。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学校先后设立了“党员先锋岗”“党员责任区”等，既为党员教师推进教学改革提供了重要的辅助工具，也为这些时代奉献者提升教学质量筑牢了实践根基。在科研这一特殊领域，组建党员科研攻坚克难，将焦点放在前沿医学领域，以此作为地方疾病防治需求的一把钥匙，通过诊断、治疗聚焦于联合科研医疗，将科研落实到位。

（二）构建智慧党建平台，赋能管理智能化升级

信息技术的运用是当代党员工作与学习的重要基础。对此，牡丹江医科大学打造智慧党建平台，促使党员教育管理、组织生活、党务公开等各个板块形成富有严密逻辑的工具流，促进党员干部全面发展确保管理工作落实到位。在党员教育管理模块，通过开展线上党课、主题党日活动，将党员的工作与学习整合到一个平台上，打破时空局限，确保党员参与学习发挥实效；研发适合于党员的思政课程，主要是依托大数据自动监测党员行为轨迹，将教学内容与党员思想提升相互整合，为个性化培训工作的开展提供引导方向。智慧党建与学校综合管理高度集成，打通业务数据流与党建信息流，通过大数据为学校决策提供方向，为提升高效的系统化决策夯实根基。

（三）强化党建引领文化建设，营造和谐管理氛围

校园文化建设是高校党建工作开展的重要手段之一。牡丹江医科大学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组织开展了红色文化主题教育、党建文化长廊建设等一系列活动，将革命精神、爱国精神、社会责任感深度凝练，为新时代“四有”好老师师风建设赋予了重要的精神内涵。在一系列党建和校园文化建设工作的推进过程中，牡丹江医科大学校园展现出积极的发展态势，教

师专注于科研与教育创新，学生兢兢业业求学奋进，成为新时代牡丹江医科大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二、党建创新引领高校综合管理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体现

高校作为我国高端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其教育教学管理水平将直接决定人才培养水平。因此，牡丹江医科大学不断平衡协调文化科学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确保大学生的健康发展，有效地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人才需求。具体到综合管理创新领域，牡丹江医科大学充分认识到党建创新的引领作用，实现了综合管理的高质量发展，主要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高校“三全育人”的客观要求

基于全新的发展环境，牡丹江医科大学综合管理始终坚持“三全育人”工作理念，实现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科学协调。而基于党建创新引领的综合管理创新则以“思政创新、教学改革、协同育人”为工作出发点，兼顾思想、管理等不同维度的科学管理。与传统管理理念相比，基于党建创新引领的新型综合管理模式实现了高校人才培养的差异性发展，为牡丹江医科大学管理创新提供了科学指导，也为牡丹江医科大学综合管理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具体而言，在思政创新方面，牡丹江医科大学结合时代特点和学生需求，丰富思政教育内容和形式，增强感染力与实效性。在教学改革上，推动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提升育人效果。协同育人则需加强学校、家庭、社会联动，形成育人合力。通过这些举措，牡丹江医科大学充分发挥党建创新引领作用，让“三全育人”理念贯穿高校综合管理全过程，助力高校培养出更多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2]。

（二）高校“立德树人”的重要保障

校园文化环境和学生的思想意识存在复杂关联。信息时代下，大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多元和丰富，多元文化的交织渗透对大学生的价值观念产生巨大影响。这不仅使大学生的思想意识呈现出显著的个体差异，同时也导致高校校园文化环境日益复杂，进一步加大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难度，对大学生的健康发展和思政教育的实效落地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基于党建创新引领的综合管理创新将有效提升高校人才的管理能力和知识水平，推动高校德育创新。基于此，牡丹江医科大学充分发挥了党建创新的引领作用，以党建活动为载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校园文化建设。通过开展主题党日、红色文化讲座等活动，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三）大学生端正学习态度的基本前提

高校传统的人才培养机制主要强调大学生专业理论知识的传授和学习，以学生专业知识体系的培养为主要任务，满足社会发展对高素质专业人才的需求。在创新发展过程中，社会人才需求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对高校人才培养目标产生了显著影响，同时也使部分大学生对自身未来发展缺乏明确规划。牡丹江医科大学利用互联网、自媒体等多元化信息平台，积极培育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发展观，使其明确学习目标、掌握学习内容、优化学习方法。特别是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部分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所下降，高校人才培养无法有效满足社会需求的问题凸显。牡丹江医科大学基于党建创新引领的综合管理创新，既是对学生学习目标、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的科学指引，也从思想意识层面为大学生发展提供了方向，明确了大学生的历史使命和职责，为大学生形成正确的发展理念、积极响应高校人才培养政策，以及高校综合管理工作的科学开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实现了大学生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统一。

三、党建创新引领高校综合管理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一）建立差异化管理制度体系

在招生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高校综合管理的难度随之上升，对管理者的认知水平和工作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牡丹江医科大学管理人员充分认识到学生思想意识的个体差异，树立科学的管理理念，打造“求同存异”的管理体系，针对学生个体差异开展多元化指导工作，有效协调意识冲突实现学生健康成长，避免影响高校综合管理工作质量。此外，牡丹江医科大学在创新综合管理模式时也充分考虑了大学生个体差异问题，制定了差异性的教育管理措施，有效保证了管理制度的适用性，实现了党建创新引领与综合管理创新的融合发展。牡丹江医科大学依据学生的专业背景、兴趣爱好、发展目标等维度划分不同群体，为每个群体量身定制管理方案。比如，针对学术型学生，提供更多科研资源与学术指导；针对实践型学生，搭建校企合作实践平台。同时，牡丹江医科大学建立动态反馈机制，定期收集学生与管理人员的意见，对差异化管理措施进行调整和优化。通过这种动态管理，既能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又能将党建元素融入日常管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使党建创新与综合管理创新相互促进、协同共进[3]。

（二）转变传统主客体管理理念

党的先进性与科学性既为党建创新引领提供必要支持，也是高校综合管理创新的发展基础。基于党建创新引领的综合管理创新将显著加快高校管理改革速度，从思想层面确保管理者、大学生的协调一致。牡丹江医科大学管理人员的认知统一，为党建创新引领作用的实现提供了必要支持。以“党员学习小组”为代表的创新形式显著提升了党员的行为积极性并发挥其模范带头作用，引导管理队伍形成科学认识，在统

一思想的基础上推进创新工作，实现良好的创新成效。此外，牡丹江医科大学充分重视大学生的主体作用，正确认识大学生个体差异的客观现实，发挥党建创新引领作用实现思想统一，为综合管理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引导大学生科学发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水平，培养学生自律理念和科学发展观，加强自我学习，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社会发展的要求。

（三）完善综合管理组织架构体系

在高校创新发展过程中，综合管理呈现出系统化发展趋势。但是受限于传统的组织架构，牡丹江医科大学综合管理表现出比较突出的局限性问题，难以实现全面有效的管理成效。为此，牡丹江医科大学充分发挥党建创新引领作用，以“高效及时”为目标开展管理创新工作，进一步优化改进组织架构提升管理水平。具体应做好以下工作：首先，构建扁平化的新型管理体系，合理削减管理机构和岗位，克服层层审批这种传统管理模式的局限性，在降低管理成本的同时提升管理效率。其次，推动组织架构多元化发展。多元化的内涵是基于传统管理组织架构的多主体协同，发挥各级党组织、党员学习小组的职能作用，在彼此协同的基础上提升管理效率和质量[4]。与此同时，组织架构的创新也要充分体现教师、学生等党员主体的积极作用，在丰富管理力量的同时完善管理体系，在推动高校综合管理创新同时提升管理效率和质量，为高校科学发展提供有效保障。最后，实现管理模式的体系化创新。体系化的核心为监督机制，发挥“党内监督”“党外监督”等工作机制的参考价值，合理优化组织架构提高高校综合管理水平。基于党建创新引领的综合管理创新需要充分发挥不同主体的优势作用，牡丹江医科大学构建起多主体协同体系对传统管理模式进行优化改进，有效解决现存问题构建起高效的管理机制并充分发挥其先进性作用，全面提升高校综合管理水平。

（四）创新高校综合管理模式

基于党建创新引领的综合管理模式，能够显著提升高校综合管理水平。而党的先进理念和思想是推动高校管理创新的核心关键，能够对高校综合管理体系形成有效补充和完善，实现管理措施的多元化发展，在平衡协调不同管理方法的基础上构建起更加合理、高效的管理机制，进而提升高校管理水平。牡丹江医科大学的管理创新途径包括：一是以党员为创新主体，发挥其示范作用引导大学生群体形成科学发展观，培养其自律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传统的综合管理模式未能充分认识到学生的主体地位，导致学生对管理工作缺乏主动参与和配合的积极性，影响了管理工作的高效开展。面对全新的社会发展形势，高校综合管理创新需要充分认识到大学生党员的主体作用，培养学生党员良好的自我管理能力，并对其他学生形成引导作用，培养其他学生的自律意识从而实现共同发展。二是创新管理体系，发挥线上媒介的优势作用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管理体系。基于现代互联网技术、信息技术在信息传播领域表现出的巨大优势，线上平台成为高校综合管理创新的重要举措。线上党建平台的建设发展可以极大地提升信息传播效率和效果，有效提升大学生对先进思想、优秀事迹的认知水平和学习的主动性，并为其提供灵活自由的学习途径，从而实现更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以线上平台为途径开展党史、党章学习活动，引导广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思想信念和价值观念，为党建创新工作的科学开展创造有利环境，构建起线上、线下协调统一的管理体系，有效增强党建创新引领作用，实现党建创新引领作用与高校综合管理的科学融合[5]。

四、结语

在现阶段高校综合管理创新领域，党建创新表现出巨大的引领作用，能够充分发挥党的先进性与科学性优势，推动高校综合管理的科学创新，有效克服传统管理模式的缺陷和不足，确保大学生群体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与正确性，为高校综合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党建创新引领有利于大学生的科学发展，确保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思想信念和价值观念，构建起多元协同管理体系，为高校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保障。

参考文献

[1] 毕作庆 . 高校院（系）党建引领治理机制与进路 [J]. 大学 ,2025(09):164-167.

[2] 杜璐 . 新时代高校党建“双创”引领学生管理工作路径 [J]. 中国军转民 ,2025(04):108-110.

[3] 李洁 , 赵瑞晔 . 党建引领下的高校管理服务融合创新研究 [J]. 社会与公益 ,2025(04):13-15.

[4] 周鑫 , 种宇宏 . 高校“党建 + 学生管理”互动模式 [J]. 中国军转民 ,2024(16):214-215.

[5] 刘妍 . 推进新时代高校基层党建与业务相融合 [J]. 办公室业务 ,2024(14):181-183.

（作者：葛戈，牡丹江医科大学研究实习员；王尊博，牡丹江医科大学讲师；通信作者陈瑶，牡丹江医科大学研究实习员）

数智化时代弘扬科学家精神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

马迎光

摘要：科学家精神蕴含丰富多样的德育因子和弥足珍贵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天然地具有育人功能。数智化时代正深刻影响着传统的教育方式与学习体验，重塑着信息传播系统和信息接收方式，对弘扬科学家精神提出了新的要求。主要表现为离身化信息传输方式、浅表化信息接收方式、娱乐化信息阅读方式等问题，影响着科学家精神的传播与弘扬。科学家精神的传播与弘扬，需要正视数智化时代变革带来的新挑战，积极回应时代发展新要求，深入探究弘扬科学家精神的新变化、新趋势、新模式。

关键词：数智化时代；科学家精神；思想政治教育；具身化；离身化

一、引言

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研实践过程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它不仅为助力科研攻关提供精神支撑，而且为培育时代新人提供精神源泉。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先后印发《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明确提出要大力弘扬以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为内核的科学家精神，并将其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当今时代，数智化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深刻重塑着人类社会，驱动着生产方式、思维模式与教育形式的深刻变革。由此看来，弘扬科学家精神不仅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现实需求，也是强化价值引领的必然要求。因此，深入探究数智化时代弘扬科学家精神的价值意蕴，剖析现实困境并系统构建切实有效的实践进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二、数智化时代弘扬科学家精神的价值意蕴

（一）提升科学素养

数智化时代，科学素养的提升是一个多维度的过程，主要包括辩证思维、创新思维、系统思维以及数字思维。辩证思维能够提升人们的信息甄别力和判断力，培养辩证思维，使人们能够透过事物的表面现象，深入地洞察其内在的本质，从而形成对世界更加深入和全面的理解。创新思维是提高创新能力和科研攻关能力的重要思维方式，是突破常规、探索真理之路的必然要求。系统思维是全面地看待问题，动态把握事情内部之间的联系与发展规律，从而全面地理解复杂问题。数智化时代背景下，科学素养的提升还需要具备将数智化与智能化相结合的思维方式，即数智思维，通过大数据赋能信息决策进而提升工作效率[1]。

（二）塑造理想信念

科学家精神既包含了对科学价值的追寻，也包含了对人文精神的关怀。科学价值包含了社会价值及自然价值，科学的社会价值即科学如何服务社会发展，这既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同时也被科学家的价值观念影响；科学的自然价值即对于科学本身价值的认知，主要体现在科学家如何探索和解答宇宙的奥秘，离不开科学家对于科学工作的价值信念。由此看来，科学家精神对于理想信念的塑造至关重要。正所谓“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这句话一方面强调了科学精神的纯粹性和普遍性，另一方面也强调了科学家精神的情感归属。科学家精神是一代代科学家融入个人的价值和情感，致力于将科学成果服务于祖国发展，实现理想与科学事业的高度融合。

（三）引领核心价值

科学家精神的形成是科研工作者在科研实践中的积累和沉淀，它是一代又一代科研工作者在投身科研攻关的过程中逐渐凝练和升华的一种集体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是对科学事业的热衷，更是对家国情感的深厚体验[2]。爱国精神和奉献精神共同构成了科学家精神的主旋律，成为新时代中国科学家追求的核心价值和自觉行动。数智化时代，科学家精神的弘扬不仅关乎国家的科技发展，更关乎社会的核心价值引领。科学家精神犹如一盏明灯，在鱼龙混杂的信息洪流中指

引着人们辨识真伪，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加强核心价值引领。

三、数智化时代弘扬科学家精神的现实困境

（一）离身化信息传输方式，阻碍科学家精神传播

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为身体在物理空间上的“不在场”提供了“在场”条件，而这种在场则是信息空间意义上的，“身体与技术皆以数据化的方式达到完美融合时，身体的物质界限就被数字技术所破除，身体就会‘消融’在数据化的网络当中”。这种身体的“在场”虽然并非身体的亲身参与，但由于数据无法完全表征身体，这就使得真实的自我与数据所产生的“数据自我”之间形成割裂状态，又表现为一种“数据化离身”[3]。离身化信息传输方式通过电子设备和网络进行信息传递，虽然可以极大地降低信息传输的成本，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学家精神的传播与弘扬。第一，离身化信息传输方式减少了传授双方的互动和交流，信息的传递者把信息传递出去之后传播过程即被视为结束，信息的接收者的状态和效果如何无法进行及时反馈。第二，离身化的信息传输方式无法为接收者带来沉浸式的体验和精神的感知。正如记忆研究者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一书中所言，信息的传递以及记忆的形成通过社会的操练和仪式来完成。离身化的信息传输方式，无法保证信息接收者身体的“在场”，阻碍科学家精神传播。第三，离身化信息传输方式使得人们更加依赖于电子设备和网络，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4]。

（二）浅表化信息接收方式，淡化科学家精神价值

移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基于移动终端的阅读也在时空维度上体现出新特点，即阅读地点的移动性和阅读时间的碎片化，阅读不可避免地从慢阅读走向快阅读，从深阅读转向浅阅读。在由移动互联技术及移动终端所建构的“流动的世界”中，浅阅读已无处不在。“移动互联时代的浅阅读绝不仅仅指具有绝对负面效应的浅表化阅读，而是更多地体现为现代社会一种基于个人需求的自由选择。”[5]由此可见，浅阅读实质上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浅表化的信息接收方式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一种基于信息读取的自主选择。科学家精神内涵的传播与弘扬需要通过长时间的思考、实践和体验来内化和吸收，而在数智化背景下，浅表化的信息接收方式，如快速阅读、碎片化学习等，无法提供足够的深度和背景知识，甚至造成对信息的断章取义和误解，导致了对科学家精神价值的淡化，削弱了科学家精神的传播和影响力。此外，数智化时代下信息同质化现象严重，在算法推动的加持下，进一步对用户形成“信息茧房”效应，科学家精神容易被忽视，科学家精神价值被淡化[6]。

（三）娱乐化信息生产方式，消解科学家精神内涵

娱乐化的信息生产方式将娱乐作为最高价值标准，从内在的思维方式到外在的行为方式，正在逐渐消解科学家精神的内涵。娱乐化的信息生产方式正在影响着现代人的生活，并成为人们信息获取的主要方式。“娱乐化”可以快速融入青少年日常生活的“特性”使得其对青少年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影响得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一个由浅入深的演变过程。娱乐化内容也会对认知认同、情感认同和实践认同产生渗透，其通过转移注意力认同、迷失情感认同和否定实践认同，最终实现对青少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影响和改造。在数智化时代，娱乐化信息生产方式盛行，“注意力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使得大众媒体和网络平台更倾向于制作和传播轻松、娱乐性质的内容，以吸引用户的注意力并提高点击率。这种趋势导致了严肃、深度的科学话题和科学家精神内涵被边缘化，甚至被消解[7]。而与科学相关的内容往往因缺乏对科学探索过程和科学家精神的深入展现，使得公众对科学的理解、科学家精神的认同停留在表面，难以触及科学的真谛和科学家精神的实质。

四、数智化时代弘扬科学家精神的实践进路

（一）数字实践：具身化的科学家精神感知

“在具身认知理论看来，公共精神不仅基于身体、源于身体，而且由身体塑造，强调公共精神培育需要通过身体的积极参与。”由此看来，精神的培养与提升，需要身体的在场，这也就意味着身体要主动参与，而非被动参与。身体的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系统的生成与感知往往能够充分带动感知觉系统，进而形成对科学家精神的具体、全面、实在的感知。

数智化时代，人与人通过网络即可实现实时连接，大幅提升了信息的传输效率[8]。然而，信息的有效传递往往需要参与者亲身的在场，这对科学家精神感知与学习的具身化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当看到的是，数智时代的个体虽置身于特定的时空背景之中，但也并非束手无策，数字化传播技术的蓬勃发展使得数据的流动与共享变得切实可行，充分调动参与者的身体感官。借助虚拟现实技术、增强现实技术、可穿戴设备等多元化形式，构建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呈现方式，极大丰富科学家精神的传播载体，显著提升对科学家精神的感知度和互动性。例如，在科学馆举办的科学家知识竞答活动等借助科技的形式让大众亲身参与科学探索过程，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和感受科学家精神。此外，还需要不断推动科学家精神相关作品的生产。一方面，鼓励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分

享相关故事和经验，以真实案例激发公众对科学家精神的兴趣和认同；另一方面，通过选树一批弘扬科学家精神的先进工作者、先进媒体单位等，激发宣传者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由此看来，数智化时代，弘扬科学家精神需要更多的“数字实践”，增强科学家精神的具身体验，使学习者在实践中感悟科学家的探索精神、创新精神和奉献精神。

（二）数字空间：系统化的科学家精神教育

“中国科学家精神的形成，是在历史发展中长期积淀、不断演化的结果，铭刻着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发展阶段和特定发展需求的时代烙印。”[9] 精神特质的形成往往具有社会历史性，并与时代发展相适应。优秀的精神特质之间往往是互通的，科学家精神与爱国主义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具有共同的精神特质，蕴含着丰富的育人资源。没有崇高的理想和明确的价值观支撑，科学研究、发现和创造所承载的社会责任感、奉献精神、团队合作精神以及对国家的忠诚都将无法体现。因此，科学家应当将科学研究与国家需求相结合，将个人价值的实现与国家发展的大潮相融合，将对科学的探索与国家科技事业的振兴相结合。

伴随着信息传输形式的变化，科学家精神的弘扬正面临着碎片化、浅显化、同质化等问题。面对如此情形，科学家精神往往容易变成“他者”的形象。例如，在网络舆论中，一些网民在面对专家的建议时往往以娱乐、戏谑的方式进行回应，使其价值和地位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因此，以系统化的方式进行科学家精神的弘扬显得尤为重要。需将科学家精神教育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可以通过开设线上课程，探讨科学家精神的内涵；通过数字技术实现沉浸式体验，切实感悟科学家精神与工匠精神；举办“科学家精神我践行”“科学家知识我知道”等线上活动，通过亲身参与和深度实践探索和领悟科学家精神的重要性[10]。

（三）数字传播：主流化的科学家精神传播

科学家精神是一代代科研工作者接续奋斗形成的优良品质，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其内涵随着时代发展逐渐丰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的时代，科学家精神主要体现在国防军事领域、工业发展领域；当下，国家间的博弈日益激烈，国家科技发展面临着关键技术“卡脖子”的难题，科学家精神突出体现为在高新技术领域创新突破、在教育领域不断深耕。

然而，就媒体实践层面来看，科学家精神的传播仍面临着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方面，科学家精神的传播面临着媒体缺位现状，这就要求新型主流媒体以主体性角色参与其中。在当下，新型主流媒体承担着建构主体性角色、引领主流价值观、参与社会治理的作用。因此，科学家精神的传播需要借助主流媒体的力量，从而实现主流化。另一方面，科学家精神的传播需要与时代发展相适应，不断融入科技元素与时代特征，不断宣传新时代涌现出的科学家，实现科学家从“幕后”到“台前”的场域转换，以此激发公众对科学的兴趣和对科学家的尊重。

五、结语

科学家精神是指中国科学家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文化条件下，作为科学实践活动主体呈现出的道德品质，包括爱国精神、创新精神、求实精神、奉献精神、协同精神、育人精神等。然而，当前对科学家精神的弘扬面临着数智技术重塑的传播生态与认知习惯的挑战。面对数智化时代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弘扬科学家精神必须主动适应技术变革，创新方法载体，在“数字实践－数字空间－数字传播”的协同推进中，有效化解困境，筑牢价值根基，进而在全社会营造崇尚科学、热爱科学、尊重科学家的浓厚氛围，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中华民族复兴伟业注入深沉而持久的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1] 何玉芳，龚凌雁．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视域下的科学家精神 [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06):58-68.

[2] 汪长明．科学家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进路 [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32(09):53-64.

[3] 强月新，胡青山．主流化、平台化、智能化：新型主流媒体的演进逻辑与实践进路 [J]. 新闻大学，2024(08):30-42,118.

[4] 董卓宁，于鹏飞．网络“泛娱乐化”消解青少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主要方式、内在机理和应对策略 [J]. 思想教育研究，2024(06):98-104.

[5] 冯永刚，乔新慧．公共精神培育的具身化转向 [J]. 教育研究与实验，2024(03):41-49.

[6]刘铮.具身的离身化：“身联网”与虚拟身体的建构 [J].自然辩证法研究,2023,39(11):75-80,139.

[7] 高国金，吴斐，高梦丹，等．基于涉农高校院士群体的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研究 [J]. 智慧农业导刊，2025,5(24):155-159.

[8] 潘建红，杨珊珊．数字化转型下科技社团弘扬科学家精神的机制优化 [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25,41(12):128-134.

[9] 张鑫，李华晶，秦雅萍．教育家精神与科学家精神的双元协同演化研究 [J]. 中国林业教育，2025,43(06):37-45.

[10] 张晓亮，梅馨怡，于美．科学家精神浸润研究生培养过程的方式与效果探析 [J]. 教育教学论坛，2025(46):1-4.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关于特殊人群未成年子女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研究

王豆豆

摘要：随着社会对特殊人群未成年子女生存发展权益的关注度不断提升，我国在制度构建与救助实践层面均收获显著成果。从权益保障缺失到逐步建立救济体系，这一转变勾勒出该群体社会救助工作的演进脉络。由于特殊的家庭环境，一些特殊人群未成年子女面临心理困境，甚至影响到学业。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加强特殊人群未成年子女心理健康教育迫在眉睫。基于此，我们立足实际工作，围绕该群体心理健康教育议题开展实地走访调研，深入倾听孩子们的真实诉求，系统剖析其心理症结与外在表现，探索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策略，助力这个群体走出心理阴霾，重获健康心态。

关键词：特殊人群；未成年子女；心理健康

一、问卷调查

（一）调查背景

由于长期缺乏父母的照顾与引导，不少特殊人群未成年子女陷入心理困境，滋生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甚至产生厌学倾向，进而放弃学业[1]。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儿童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2020年）结果显示，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省市中，年龄在14周岁以下的儿童人口为2.5亿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7.95%。在这2.5亿儿童中，特殊人群未成年子女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情况特殊，生存环境复杂，需要家庭、社会、国家的特别关注[2-3]。

特殊人群未成年子女群体具有显著特殊性，其生存境遇与常规事实孤儿存在本质差异。这类儿童虽未被法律认定为孤儿，却因父母涉案接受改造而陷入事实无人抚养状态——既无法获得双亲的日常照料，又缺乏系统性的社会支持网络，在多重维度上面临发展困境。该群体的发展困境呈现复合型特征：物质层面，家庭经济来源断裂导致贫困风险激增，部分儿童被迫中断学业；社会层面，因父母身份引发的标签化歧视使其被主流群体边缘化；心理层面，家庭结构解体带来的角色认同危机与群体疏离感，直接导致其自尊水平下降与自我认知模糊。这种发展困境实质上是家庭功能缺失、教育资源断层与社会环境排斥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构建特殊人群未成年子女支持体系已超越个体救助范畴，成为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这要求我们突破传统救助模式，建立涵盖物质保障、教育支持、心理干预与社会融入的复合型帮扶机制，在保障其生存权的同时，促进其社会功能与发展能力的同步提升。这种转型不仅是对儿童权利的尊重，更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4-5]。

（二）调查目的

本文以特殊人群未成年子女这一危困群体的生存困境为研究视角，运用文献综述法、观察法、问卷调查法等方法，并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和域外有益经验，分析当前特殊人群未成年子女的心理问题与外在表现，提出针对困境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心理健康教育策略，为提高困境儿童的救助水平、完善我国儿童福利制度提供些许参考。

（三）调研方法

1. 文献综述法

本研究在确定研究主题之后，系统梳理了三类学术文献：其一，聚焦特殊家庭未成年子女的生存质量与发展障碍的研究；其二，解析心理社会干预技术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实践效能；其三，考察青少年心理社会能力发展指标及其影响因素。

2. 观察法

调研期间对特殊人群未成年子女在自然场景下开展为期8周的参与式观察，重点记录三方面内容：（1）日常行为模式：包括作息规律、课堂互动、休闲选择等显性特征；（2）非言语表达：通过微表情分析、语音特征识别、空间距离测量等技术捕捉隐性心理状态；

（3）情境反应模式：观察个体在不同社会场景中的行为适应性。观察数据采用“事件采样－情境标注－心理推论”三级编码体系，结合每周的深度访谈进行数据三角验证，有效提升了研究资料的生态效度。

3. 访谈法

研究构建了差异化访谈体系：（1）针对 10 名目标儿童实施半结构化访谈，围绕个人发展轨迹、家庭互动模式、社会支持感知三个维度设计主题模块；（2）对儿童救助机构的工作人员开展关键信息人访谈，重点获取服务对象的救助历程与干预效果评估；（3）与“爱心妈妈”群体进行焦点小组讨论，挖掘代际沟通中的情感互动特征。所有访谈均遵循知情同意原则，采用录音转写与主题分析技术，通过 NVivo 软件实现“现象描述－类别归纳－理论建构”的三级编码，最终形成包含 21 个核心主题的质性数据库。访谈名单见表 1 和表 2。

表 1　工作人员及爱心妈妈访谈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岁）	职务	学历
1	王 ××	女	41	负责人	本科
2	吕 ××	男	29	工作人员	本科
3	耶 ××	男	28	工作人员	本科
4	贾 ××	女	48	爱心妈妈	小学
5	原 ××	女	46	爱心妈妈	小学
6	郑 ××	女	51	爱心妈妈	小学

表 2　访谈儿童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岁）	年级	家庭情况
1	A	女	10	小学五年级	父亲接受改造
2	B	男	8	小学三年级	母亲接受改造
3	C	男	12	初一	父亲接受改造
4	D	女	16	高二	母亲接受改造
5	E	女	9	小学四年级	父亲接受改造
6	F	女	13	初二	父亲接受改造
7	G	女	9	小学四年级	父亲接受改造
8	H	女	7	小学二年级	母亲接受改造
9	I	男	14	初三	母亲接受改造
10	J	男	9	小学四年级	母亲接受改造

4. 问卷调查法

心理健康诊断测验（MHT）根据铃木清等人编制的“不安倾向诊断测验”修订，测验信效度高。根据焦虑情绪所指向的对象和由焦虑情绪而产生的行为两个方面，涉及 A 学习焦虑、B 对人焦虑、C 孤独倾向、D 自责倾向、E 过敏倾向、F 身体症状、G 恐怖倾向、H 冲动倾向等 8 个内容量表及 1 个效度量表 [6]。10 名儿童各维度分值见图 1。

二、调研结果

（一）学业适应障碍与焦虑情绪

家庭结构异变对未成年子女学业发展产生双重冲击：其一，父母改造引发的心理创伤直接削弱学习动机，导致注意力分散与学业投入度下降；其二，家庭教育功能缺失造成学习方法指导缺位，加之祖辈监护者教育能力有限，难以提供有效的学业支持。经济约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困境，课外辅导资源的缺失使知识漏洞难以弥补，学科偏废现象尤为突出。这种复合型压力源导致该群体普遍出现考试焦虑、课堂参与度降低等学业适应问题，形成“创伤－缺失－困境”的恶性循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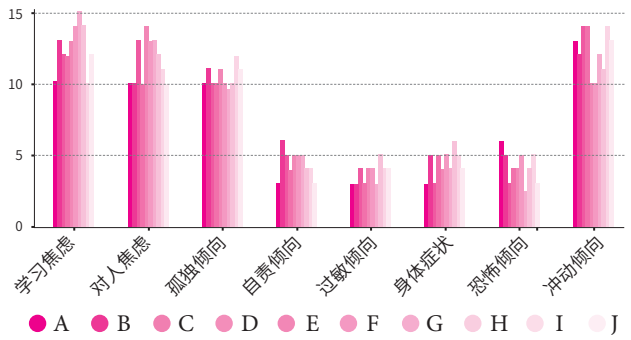


图 1 各维度分值

（二）同辈融入障碍与社交退缩

父母角色突然缺位引发的身份认同危机，通过社会比较机制转化为深度自卑感。调查显示，78.6% 的受访儿童存在“标签化恐惧”，表现为刻意回避集体活动、减少非必要社交。这种防御性隔离行为虽属自我保护，却导致社会支持网络断裂，进一步强化了“异常者”的自我认知。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社交退缩呈现年龄差异化特征：青春期前期儿童更多表现为被动孤立，而到了青春期后期，则出现主动边缘化倾向。

（三）人格发展偏差与交往困境

长期亲子分离导致情感依恋断裂，代养者的教育方式偏差（如过度保护或放任不管）加剧了情绪调节障碍。临床观察发现，该群体情绪波动幅度是普通儿童的 2.3 倍，具体表现为：情绪表达极端化（突然暴怒或长时间沉默）、攻击性行为增多、共情能力下降。这种人格特征导致其在同伴互动中频繁遭遇排斥，形成“性格偏差－社交受挫－行为固化”的恶性循环。特别需要关注的是，12.7% 的受访儿童表现出反社会行为倾向，提示需加强早期心理干预。

（四）情绪调节失效与行为失控

神经心理学研究表明，该群体前额叶皮层发育滞后率达普通儿童的 1.8 倍，直接导致情绪抑制能力不足。父母缺位引发的持续应激状态，使皮质醇水平长期处于高位，进一步削弱了情绪调节的生理基础。寄养环境的不稳定性加剧了这种脆弱性：63.4% 的寄养儿童存在情绪压抑现象，表现为过度顺从或突然情绪爆发。这种“情绪积压－瞬间释放”的模式，既是对不稳定环境的适应性反应，也构成了潜在的行为失控风险。

三、总结和建议

（一）自我价值重构与心理赋能

自信体系构建是促进该群体心理健康的核心要素。发展心理学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对青少年认知发展具有显著预测作用。当前研究对象普遍存在自我认知偏差，具体表现为：37.6% 的受访者存在“污名化内化”现象，将父母涉案与自我价值进行不当关联；28.9% 的个体出现“替代性羞耻”，通过过度自责来缓解认知冲突。这种病理性自我认知的形成，源于家庭系统突变引发的社会比较失衡，以及代养环境中正向反馈的缺失。

社会工作介入应遵循“优势视角”理论，通过三阶干预模型实现改变：第一阶段采用叙事治疗技术，帮助服务对象重构自我认知框架；第二阶段实施行为激活策略，通过成功体验积累增强自我效能感；第三阶段建立社会支持联盟，巩固积极身份认同。特别需要关注的是，12~15 岁年龄段的认知重构效果最佳，提示需把握关键发展窗口期 [7]。

（二）家庭系统修复与功能重建

家庭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对儿童社会情感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数据显示，父母涉案后家庭功能评分下降，主要表现在情感支持、教育指导和边界维护三个维度。这种系统损伤导致儿童出现“情感性饥饿”，具体表现为过度寻求关注和关系依赖。

干预策略需构建“双轨支持机制”：其一，建立标准化探视制度，通过结构化亲子互动改善情感联结，实验证明每月 2 次、每次 90 分钟的探视可使亲子信任度提升；其二，开发代养者能力建设项目，重点培训积极倾听、情绪共情和规则设定三项核心技能。

（三）朋辈网络构建与社会融入

同伴关系作为儿童社会化的“第二课堂”，其质量直接影响社会技能发展。该群体的同伴接纳度仅为普通儿童的一半，主要障碍包括社交退缩、沟通障碍和冲突处理不当。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指出，10~14 岁是同伴文化形成的关键期，此阶段的积极互动可使社会认知能力提升 2.3 倍 [8]。

社会工作实践应采用“阶梯式融入”方案：基础层开展社交技能训练，重点教授非言语沟通（占 55% 课时）和冲突解决策略（占 30% 课时）；进阶层组织结构化团体活动，通过合作任务促进关系建立；巩固层创建同伴支持小组，形成持续性互助网络。

（四）社区生态优化与支持体系

社区作为儿童发展的微系统，其资源供给能力直接影响服务效果。当前社区支持存在三大缺陷：隐私保护机制缺失、资源匹配效率低下、专业服务供给不足。

构建“精准化－响应式”社区支持体系需把握三个要点：其一，建立儿童信息动态管理系统，采用区块链技术确保数据安全；其二，开发需求评估矩阵，从生存保障、发展支持、危机干预三个维度进行精准画像；其三，培育社区志愿者队伍，重点发展“邻里守护者”（提供日常关照）和“成长伙伴”（提供学业支持）两类角色 [9]。

四、结语

通过对研究对象展开调查，发现特殊人群未成年子女目前面临着学业适应障碍与焦虑情绪、同辈融入障碍与社交退缩、人格发展偏差与交往困境、情绪调节失效与行为失控等问题。解决上述问题绝非单一主体的责任，需要个人、家庭、学校、社会、国家的共同努力，并尽可能使特殊人群未成年子女发挥个体主观能动性，实现自我价值重构与心理赋能。家庭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同样对个体心理改造必不可少。社会支持机构可以通过举办团体心理辅导活动，更自然地融入个体心理的构建。随着普惠发展型儿童福利时代的来临，相信特殊人群未成年子女会在平等的发展环境中重拾自信、健康成长，并为社会和谐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参考文献

[1] 洪林丽 . 个案工作介入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心理社会能力提升研究 [D]. 哈尔滨 :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2022.

[2] 李明 . 个案工作介入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社会融入研究 [D]. 咸阳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2.

[3] 张洪 . 个案工作介入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心理健康问题研究 [D]. 芜湖 : 安徽工程大学 ,2022.

[4] 惠萱子 , 牛银萍 , 王一鸣 , 等 . 西峡县偏远地区学龄期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态调查及影响因素 [J]. 临床心身疾病杂志 ,2023,29(03):123-126.

[5] 全亮 , 唐政委 . 法律缺失视角下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对策研究 [J]. 青少年犯罪问题 ,2023(03):143-160.

[6] 赵元功 . 福利制度理论下困境儿童生存现状及救助研究 [D]. 南昌 : 江西农业大学 ,2018.

[7] 陶安龙 , 贺子芩 . 服刑在押人员未成年子女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分析——以陕西回归儿童救助中心为例 [J]. 才智 ,2017(20):273-274.

[8] 刘华强 . 在押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问题及介入研究述评 [J].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18,17(20):33-35.

[9] 范斌 , 童雪红 .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社会救助——基于儿童权利的视角 [J]. 学习与实践 ,2017(08):106-112.

（作者系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医学康养学院硕士研究生、助教）

“一站式”学生社区视域下高职院校学生党员主理式培养机制研究

汤兴宇

摘要：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培养长期面临工学交替导致教育时空断层、党建实践与专业技能割裂、学生主体性在行政化管理中弱化等困境。本文立足高职教育类型特征，在“一站式”学生社区视域下，引入组织治理“主理人”概念，提出学生党员“主理式”培养新范式。该模式通过制度化授权赋能，推动学生党员从“活动参与者”转变为社区公共事务“议题主理者”。研究构建了时间全周期衔接、功能技政融合、角色阶梯晋升、平台数智支撑的四重嵌套动态生成模型，阐释了以“治理转化率”为核心的增值评价体系。实践证明，这一机制能消解党建与业务二元对立，提升学生党员政治判断力、执行力与职业素养，为高职党建工作提供可复制的实践范式。

关键词：高职院校；学生党员；主理式培养；“一站式”学生社区；技政融合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并强调职业教育在服务国家战略和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中的关键作用[1]。高职院校学生党员作为未来的“大国工匠”储备力量与青年先锋，其成长质量直接关系到“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然而，受制于高职教育特有的“2 + 1”工学交替学制（两年在校学习，一年顶岗实习）及高强度的实践教学安排，学生党员在校园与企业、学习与工作场景之间呈现出高频流动的“候鸟式”特征。这种流动性导致传统以班级支部为载体、以理论灌输为主要形式的党建模式面临严峻挑战：教育链条在时空上断裂，组织生活在形式上虚化，党建培养与职业技能在逻辑上割裂[2]。

在此背景下，教育部大力推进“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通过物理空间的集聚与育人资源的下沉，为重构党员培养机制提供了新的契机。然而，空间的物理重组并不必然带来育人效能的提升。现有实践中，学生党员在社区治理中仍多扮演“辅导员助理”或“行政执行末梢”的被动角色，缺乏实质性的议题设置权与治理决策权，导致其政治主体性与职业能动性难以被激活，陷入“人在社区，心在局外”的悬浮状态[3]。因此，迫切需要超越传统的管理主义思维，构建一种契合高职类型特征的“主理式”培养机制，使学生党员在社区这一微观治理单元中实现政治素养与职业能力的同构共生。

一、高职学生党员培养的现实图景与结构性张力

（一）时空维度的结构性张力：工学交替背景下的培养连续性挑战

在高职教育普遍推行工学结合、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制度背景下，学生党员培养在时间与空间层面呈现出一定的结构性张力。现有研究普遍指出，高职学制相对紧凑，学生党员从积极分子培养、预备期考察到转正的全过程，往往与专业学习后期的企业实习阶段高度重叠[4]。

从制度安排看，学生在校学习阶段与离校实习阶段在组织载体、管理方式和育人环境上存在明显差异。这种阶段性转换，使学生党员在实习期间需要同时适应企业生产节奏与学校组织生活要求，客观上对党员教育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一些研究将此概括为高职学生党员培养中“教育场域转换频繁、组织连接成本上升”的普遍现象。

（二）功能维度的协同不足：党建目标与专业实践的关联张力

从功能运行层面看，既有文献多从“党建与业务融合”的角度指出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培养在一定程度上仍面临党建活动与专业实践关联度不足的问题。在实践中，学生党员参与的组织生活与日常管理事务，多集中于会议组织、志愿服务和秩序维护等通用性事务，其内容与专业技能训练之间的内在衔接仍有拓展空间。

与此同时，高职教育强调技术技能训练的系统性

与实践性，而党员教育更注重价值引领与政治素养培育。当二者缺乏有效的情境融合机制时，学生在不同育人场域中容易形成相对分离的角色体验，即在专业学习中侧重“技能要求”，在组织生活中侧重“政治要求”，二者尚未完全转化为相互支撑的成长动力。

（三）主体维度的参与张力：“一站式”学生社区中的角色实现问题

“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强调学生参与治理与协同育人，但在具体运行过程中，不同学校在学生党员主体作用发挥方面仍呈现出差异化探索路径。部分研究指出，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学生党员的参与形式仍以协助执行和事务支持为主，其在公共议题讨论、规则协商和治理方案形成中的参与深度有待进一步提升[5]。

从治理结构看，当学生党员主要承担程序性事务而较少参与决策性环节时，其政治身份与治理角色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功能张力。这种现象并非个体能力不足，而更多反映了社区治理权责配置与学生成长阶段之间的匹配问题，也为后续探索更具主体性的党员培养路径提供了现实切入点。

二、“主理式”培养的理论逻辑与模型构建

针对上述困境，本文提出“主理式”培养范式。该范式主张打破传统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式管理，在坚持党组织政治引领的前提下，通过制度化授权，将社区治理的“指挥棒”部分交还给学生党员，重塑其身份逻辑与行动逻辑。

（一）核心概念：从“代理执行”到“责任主理”

“主理”一词源于现代组织治理，强调在特定授权范围内，主体对某一具体事务拥有持续的议题设置权、资源协调权及结果责任[6]。

在高职党建语境下，“主理式”培养是指：以“一站式”学生社区为核心实践载体，将社区中的网格治理、学风建设、技能服务等公共事务转化为学生党员的培养任务；通过构建“权责对等”的契约关系，使学生党员以“主理人”身份全流程参与事务的规划、实施、协调与评估。其本质是治理权的适度下沉与教育场景的生产性重构。

（二）架构设计：四重嵌套的动态生成模型

为了支撑“主理式”理念的落地，本研究构建了“时间—功能—角色—平台”四重嵌套模型，实现育人系统的闭环运行。

1. 时间嵌套：政治生命周期与职业成长周期的结构性对齐

针对高职学制短、流动性强的特点，建立分段式主理机制，确保教育链条不断线。

大一阶段（认知唤醒期 / 积极分子）：对应职业探索期。主理任务侧重“基础服务”（如文明导习岗、宿舍文化建设）。目标是建立社区归属感，端正入党动机。

大二阶段（实战深化期 / 发展对象及预备党员）：对应专业技能提升期。主理任务侧重“复杂治理”。学生需担任“楼层长”或特定项目（如反诈宣传、学业帮扶）主理人，在解决实际矛盾中锤炼党性与执行力。

大三阶段（职业引航期 / 正式党员）：对应顶岗实习期。主理任务侧重“经验反哺”。通过“云端主理”机制，担任“职业生涯情报员”或“驻企联络员”，实现“离校不离党，流动不流失”。

2. 功能嵌套：以“技政融合”为核心的场景重构

这是本模型最具高职特色的创新点。所谓“技政融合”，是指将党性锻炼嵌入到专业技能的应用场景中，实现“红”与“专”的有机融合。

工科集群主理：依托机电、信息等专业优势，设立“工匠坊”。党员主理人不再只是收缴违规电器，而是开展“电器解剖课”与义务维修，以技术权威强化政治权威。

文管集群主理：依托法律、管理专业优势，设立“社区议事厅”。党员主理人负责社区公约起草、矛盾调解与权益维护，锻炼法治思维与群众工作能力。

艺术集群主理：依托设计、传媒专业优势，设立“美育工作室”。主理社区空间美化、红色文创开发与新媒体运营，提升主流价值观的视觉传播力。

3. 角色嵌套：阶梯式胜任力晋升路径

构建“志愿者—项目负责人—社区合伙人”的动态晋升阶梯。

初级主理人（执行层）：参与既定任务，执行具体指令。

中级主理人（管理层）：负责单一维度的任务组织（如策划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高级主理人（决策层）：拥有特定议题的完整治理权。需主动界定问题、设计方案、协调辅导员与后勤部门资源，并对最终治理成效负责。

4. 平台嵌套：数智驱动的精准治理底座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一站式”学生社区数字治理平台。

议题触发系统：建立数字化“红黑榜”。当网格数据（如卫生分、晚归记录、投诉信息）触发生态红线时，系统自动生成“待治理议题”并智能派单。

成长画像系统：全过程记录主理人的响应速度、处理过程、群众满意度等数据，生成可视化的“党员能力雷达图”，为考核评价提供客观依据。

（三）运行机制：基于“闭环治理”的实施路径

理论的落地需要坚实的运行机制支撑。本研究设计了包含“动态授权—敏捷响应—风险熔断”的完整运行链条。

1. 动态授权与任务认领机制

改变过去“指派式”的任务分配方式，实行“揭榜挂帅”制。

社区党工委定期发布“治理需求清单”（如某区域噪声大、考证通过率低），或由大数据系统触发预警。学生党员根据自身专业特长和岗位职责认领任务。对于高难度议题（如心理危机干预辅助），实行“导师 + 主理人”双负责制，辅导员作为指导导师，学生党员作为执行主理人，确保权责边界清晰。

2. 敏捷响应与协同处置机制

建立“137”快速响应法则：简单议题 1 小时内响应接单，一般议题 3 天内形成解决方案，复杂议题 7 天内完成阶段性处置。

在处置过程中，主理人拥有“资源调用权”。例如，针对宿舍矛盾调解，主理人有权申请使用社区谈心室，有权邀请心理老师介入协助。这种机制倒逼学生党员跳出“等靠要”思维，主动整合资源解决问题。

3. 风险阻断与人工复核机制

为了防止学生党员因经验不足导致治理失当，建立“风险熔断阀”。在涉及意识形态安全、心理危机、法律纠纷等高风险领域，设置人工复核节点。一旦事态超出学生主理人的能力范畴，系统自动触发熔断，转由辅导员或职能部门接管，体现“放手不放任”的培养原则。

三、实践成效与典型场景深描

（一）场景一：公共安全治理——从“行政收缴”到“技术科普”

传统痛点：辅导员突击收缴违规电器，引发师生对立，且屡禁不止。

主理实践：授权机电学院学生党员担任“安全主理人”。他们并未简单没收，而是利用专业知识，在社区开展“违规电器拆解秀”。现场演示劣质“热得快”在通电后的温升曲线与漏电风险，用数据和实验说话。同时，建立“义务维修站”，帮助同学解决插座损坏等正当用电需求。

成效分析：将冷硬的行政管理转化为有温度的技术服务。学生党员在维护安全的同时巩固了专业知识，实现了“技政融合”，社区违规用电率下降 40%。

（二）场景二：实习期“云端主理”——从“失联断层”到“双向引航”

传统痛点：顶岗实习党员管理松散，仅靠提交思想汇报维持联系。

主理实践：设立“云端主理人”岗位。实习党员担任社区的“职场情报员”。他们结合所在企业的真实情况，在线上平台发布“实习避坑指南”“企业用人偏好分析”“行业前沿技术动态”等第一手资讯。同时，参与线上的评优评先议事会，对低年级入党积极分子进行职业观辅导。

成效分析：变“离校劣势”为“信息优势”。解决了实习党员教育悬浮问题，同时也为校内学生提供了宝贵的职业指导，构建了“校企党建共同体”。

四、评价改革：基于“治理转化率”的增值评价

传统的党员评价往往陷入“唯材料论”或“唯票数论”。本研究提出以“治理转化率”为核心，构建“五星主理”增值评价体系，确立“不看出身看变化，不看口号看实绩”的评价导向。

（一）核心指标：治理转化率

该指标重点考察学生党员介入治理后，问题状态的边际改善程度，具体从转化成效、难度权重、响应时效三个维度综合考量：转化成效：看党员负责的“黑榜”网格（问题区域）有多少成功转化为“红榜”或“达标网格”。难度权重：根据治理议题的复杂程度赋予权重。例如，化解一起严重的宿舍人际冲突，其权重高于常规的卫生清扫。响应时效：若党员在问题萌芽期（潜伏期）即主动介入解决，给予高分；若在矛盾爆发后被动处理，则得分较低。

（二）试错包容与成长档案

建立“容错机制”。对于在主理过程中因探索创新而导致的非原则性失误，不搞“一票否决”，而是引导学生进行复盘分析，将失败案例转化为教育资源。同时，系统自动生成《学生党员主理成长档案》，记录其解决的每一个难题、组织的每一次活动，作为其评奖评优及向用人单位推荐的重要依据。

五、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表明，“主理式”学生党员培养并非对传统模式的简单修补，而是一种面向高职院校复杂育人情境的机制性重构。

第一，它通过“时间—功能—角色—平台”的四重嵌套，成功解决了工学交替背景下党建工作时空断层与功能割裂的结构性难题。特别是“技政融合”路径的探索，为高职院校落实“立德树人”找到了专业与思政的结合点。

第二，它通过制度化授权与赋能，重塑了学生党员的主体性。学生党员从形式化参与走向真实治理，从被动接受走向主动承担，其政治素养、群众工作能力与职业核心能力在解决复杂问题的过程中实现了同步提升。

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高职院校应进一步探索 AI 赋能的“精准思政”。例如，利用机器学习分析社区治理数据，自动生成更精准的党员成长画像，并智能推荐适合其能力特征的治理岗位。此外，如何进一步打通校企合作企业的党建资源，构建“校区 + 园区”的双元制社区党建共同体，将是下一阶段研究的重点方向。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 : 人
（下转 82 页）

数字化转型视角下红色资源传播的创新路径研究

武　琳

摘要：红色资源承载党的革命历史与精神内核，其传播成效关乎主流意识形态传承与社会凝聚力构建。当前，在数字化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传统传播模式因形式单一、互动不足、覆盖面有限而难以适应时代需求。本文基于数字化转型视角，通过剖析传播现状与困境，结合新媒体规律与技术赋能潜力，探索融合数字技术创新传播形式、拓展传播渠道、增强受众互动的有效路径，旨在推动红色资源传播的数字化升级，提升其传播力、影响力与感染力，为新时代红色文化传承与主流价值弘扬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数字化；红色资源；创新传播

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以百年实践为纸、以人民奋斗为笔书写的历史长卷，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历史性和教育性。它的形成是一个伴随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而逐步发展、丰富和完善的历史过程，是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积淀、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淬炼、在时代发展中升华的结果，承载着党的光辉历史、优良传统和伟大精神的各种物质形态与非物质形态资源总和，具体内容见表 1。

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政治遗产的具象化，兼具历史凭证、精神图腾、教育工具三重属性，服务于意识形态建设、文化自信培育与国家认同强化。其保护与利用被纳入国家政策，是“红色基因”代际传递的关键支撑 [1]。

表 1　红色资源的物质及非物质表现形式

类型	代表形式	具体内容	现代延伸
物质形式	历史遗址	中共一大会址、井冈山、延安、西柏坡革命旧址等	脱贫攻坚示范村、航天发射基地等新时代标志性工程
	革命文物	武器、旗帜、书信、文件、生活用品等实物	
	纪念设施	革命博物馆、纪念馆、纪念碑，如人民英雄纪念碑	
	建设成就地标	大庆油田、红旗渠、“两弹一星”研制基地等	
非物质形式	革命精神谱系	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自力更生、协同攻坚）等事迹	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新时代精神
	文学创作	革命歌曲（如《黄河大合唱》）、文学作品（《红岩》）、影视戏剧、英雄（刘胡兰、黄继光等）事迹作品	
	党的优良传统	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作风	

一、红色资源的当代价值研究

传承红色资源是延续历史记忆、弘扬革命精神、凝聚民族共识的重要途径，对于国家发展、文化自信和价值观建设具有深远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弘扬革命文化，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这一战略部署凸显了红色

（上接 81 页）

民出版社 ,2022.

[2] 姜庆华 , 吴玉剑 , 姜佳奇 . 高职院校“一站式”学生社区运行机制研究 [J]. 教育与职业 ,2023(20):73-77.

[3] 刘宏达 , 韩续冰 .“一站式”学生社区 :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末端设计及其功能实现 [J]. 高校辅导员 ,2023(03):7-13.

[4] 李石 , 张希坤 . 新思政观引领下的学生党员培养模式研究 [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20,36(06):123-127.

[5] 李敏 , 张可 . 新时代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协同育人研究 [J]. 北京教育 (德育),2022(12):20-27.

[6] 王幸 . 高校学生党员培养考核路径探新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4(02):44-46.

（作者系长沙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文化传承在新时代的重要地位[2]。

（一）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红色资源承载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是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通过传播红色资源，可以传承“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伟大革命精神。通过红色教育，能够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激励当代人特别是青少年铭记历史、坚定理想信念，增强社会责任感，树牢民族自豪感和使命感。

（二）增强文化自信，凝聚民族认同

红色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核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通过挖掘和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资源有助于构建中国人的文化身份认同，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3]。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红色资源能够成为抵御历史虚无主义、抵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武器。

1. 助力爱国主义教育，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红色资源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传承红色资源能确保历史不被遗忘，通过参观革命遗址、学习红色故事、观看红色影视作品等形式，可以让人们尤其是青少年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更深刻理解“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从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历史认同感和民族使命感。

2. 推动文旅融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红色旅游是红色资源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红色资源丰富的地区（如革命老区）可通过“红色旅游”激活经济潜力，将历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近年来，红色旅游成为热门文旅产业，不仅带动了革命老区的经济发展，还促进了乡村振兴和文化振兴。例如，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地通过红色文旅融合模式，既保护了历史遗产，又带动了就业和产业升级，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3. 提供精神动力，助力现代化建设

红色精神中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开拓创新等品质，对当代社会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红色资源能够为全社会提供精神动力，激励人们攻坚克难、勇毅前行。

4. 服务党的建设，永葆政治本色

红色资源是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的生动课堂。通过实地参观、情景教学等方式，深化对党的初心使命的理解，警示党员干部保持清正廉洁、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历史镜鉴。

红色资源的传播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时代的需要。在新时代背景下，应进一步挖掘红色资源的价值，创新传播手段，使其成为凝聚人心、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通过讲好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薪火相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不竭动力。

二、红色资源传统传播模式及薄弱点

红色资源传统传播模式依托线下场景与传统媒介构建起文化传递体系，在时代的发展中逐渐显现出一定局限性，具体分析如下：

（一）红色资源传统传播模式的主要形式

一是场馆陈列与参观教育模式：建立革命纪念馆、博物馆、烈士陵园、故居旧址等场馆，通过实物、图片、文字、雕塑、沙盘等静态展陈方式，辅以讲解员现场解说。其特点是直观、具象，能够营造历史现场感，强调庄重性和教育性，是覆盖面最广、最基础的模式[4]。

二是媒体宣传报道模式：利用报纸、杂志、电视等传统主流媒体，在重要纪念日、重大活动前后，集中刊播新闻报道、专题片、纪录片、理论文章、回忆录、文学作品等。其特点是覆盖面广，时效性强，通过典型塑造和宏大叙事传递主流价值观，具有权威性和引导性。

三是学校教育与理论灌输模式：将红色历史、革命精神纳入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历史课教材和教学大纲，通过课堂讲授、主题班会、团队活动、阅读指定书目、观看教育影片等方式进行系统化教育。其特点是体系化、强制性、持续性，面向青少年群体，旨在培养政治认同和价值观念。

四是报告会、讲座与主题活动模式：组织英模事迹报告会、专家学者讲座、理论研讨会，以及在特定节日组织主题纪念活动。其特点是仪式感强，具有群体动员和情感激发作用，侧重思想引领和氛围营造。

五是文艺作品演绎模式：创作和传播以红色历史为题材的小说、诗歌、戏剧、电影、电视剧、歌曲、舞蹈、绘画、雕塑等文艺作品。其特点是形象生动，情感感染力强，易于引发共鸣，寓教于乐，传播范围广。

（二）传统传播模式的不足之处

1. 单向灌输，互动性、参与性不足

传统模式多以“我说你听”“我展你看”的单向信息输出为主（如讲解、授课、报道、展陈）。受众处于被动接受状态，缺乏深度参与、互动讨论和个性化体验的机会。其结果就是容易导致受众兴趣减弱，理解停留在表面，难以内化为深刻的认知和情感认同，尤其对年轻一代吸引力下降。

2. 内容形式相对固化，同质化倾向明显

叙事方式往往模式化、宏大化，侧重历史事件和领袖人物的宏观叙述，对普通个体的经历、细节、情感挖掘不够。不同场馆、媒体、教材的内容和形式容易雷同，缺乏特色和新意。传播内容显得刻板、说教，缺乏新鲜感和吸引力，难以满足受众多元化、深层次的精神需求，导致审美疲劳和传播效力递减。

3. 与当代生活关联度不高，现实感召力有待提升

有时过于强调历史背景和特定时期的斗争，未能充分挖掘红色精神内核（如理想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开拓创新等）与当代社会发展、个人成长、现实问题的深刻联系和时代价值，容易让受众（尤其是年轻人）产生距离感，认为红色故事是“过去时”，与自身生活关联不大，难以激发强烈的现实共鸣和实践动力[5]。

4. 传播渠道相对单一，对新媒体利用不充分

过度依赖传统场馆、主流媒体和学校教育等线下或单向渠道，对于社交媒体、短视频、网络直播、数字博物馆、沉浸式体验等新兴传播技术和平台的运用不够广泛、深入和创新，难以有效触达习惯于数字生活、信息获取碎片化的年轻网民群体，传播覆盖面存在盲区，传播时效性和影响力受限。

5. 受众细分不够，缺乏精准性和个性化

传统传播常采用“大水漫灌”方式，对不同年龄、职业、知识背景、兴趣点的受众群体缺乏精细区分和针对性传播策略，传播内容难以精准匹配不同群体的接受习惯和理解水平，导致部分内容对某些群体过于浅显或过于深奥，传播效果打折扣。

6. 资源整合与协同效应不足

不同地区、不同部门（文旅、宣传、教育等）管理的红色资源在规划、内容开发、传播推广上可能存在各自为政的情况，缺乏有效的统筹协调和资源共享机制，导致资源重复建设或利用不充分，难以形成跨区域、跨媒介的传播合力，整体效能未能实现最大化。

红色资源的传统传播模式在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方面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面对信息时代、社会转型和代际更替带来的挑战，其不足之处日益凸显。只有正视短板，在保护与创新、严肃性与趣味性、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找到平衡，才能让红色文化真正“活”在当下，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力量之源。要提升红色资源传播的吸引力、感染力、渗透力和持久影响力，必须与时俱进，在坚守正确历史观和政治方向的前提下，大力推动传播理念、内容、形式、方法、渠道和机制的创新。特别要注重增强互动性、故事性、时代感，拥抱新媒体技术，实现分众化、精准化传播，深化情感共鸣，加强资源整合，使红色历史真正“活”起来，让红色精神更好地融入时代血脉，焕发出新的强大生命力[6]。

三、数字化转型视域下红色资源传播的创新路径

红色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是实现其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教育价值的关键环节，需要在尊重历史原真性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技、文化创意和社会需求，探索可持续的路径。红色资源数字化传播模式的创新可从技术应用、内容呈现、传播渠道等多维度突破。

（一）技术融合创新：用前沿科技激活红色资源

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沉浸式体验技术与区块链技术深度融合，为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开辟了全新路径。

沉浸式体验技术成为打开红色历史大门的“金钥匙”，通过 VR/AR 技术，革命历史场景被生动还原。以飞夺泸定桥为例，使用 VR 设备，用户仿佛置身于 1935 年那个惊心动魄的时刻，耳边是湍急的大渡河水咆哮声，眼前是战士冒着枪林弹雨攀爬铁索的壮烈画面；重走长征路，能切身感受雪山草地的艰难险阻，增强对革命先辈坚韧精神的理解。三维建模技术对革命文物进行 1∶1 数字复刻，烈士手稿上的墨迹纹理、老物件岁月留下的斑驳痕迹，都能通过 360° 旋转查看，让每一处细节都纤毫毕现。AI 语音交互开发的“红色虚拟讲解员”，则像一位知识渊博的向导，用户只要提出“这封书信背后有什么故事”“这场战役历史意义是什么”等问题，便能即时获得专业、详尽的解答，实现与历史的深度对话。

区块链技术则为红色文化资源筑牢信任基石。将珍贵的红色文献等资源上链存证，利用区块链不可篡改、可追溯的特性，为数字内容盖上“时间戳”和“身份证”，有效杜绝伪造与篡改行为，确保每一段历史记录、每一份革命文物数字化成果的真实性。同时，清晰的资源溯源体系，也大幅提升了红色文化传播的公信力，让红色精神的传承更加坚实可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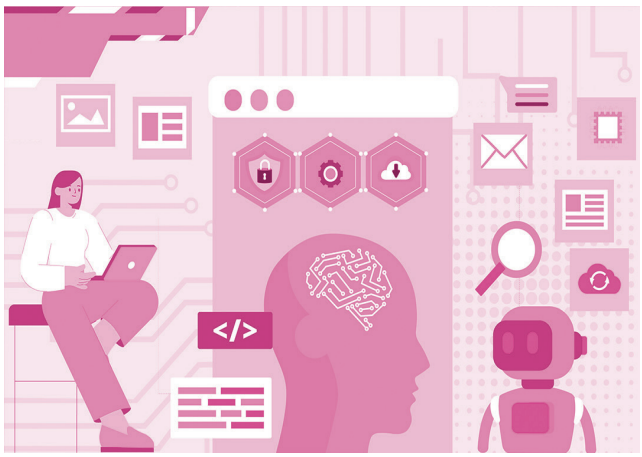
沉浸式体验技术与区块链技术相辅相成，既让人们以更直观、更真实的方式感悟红色文化，又为红色文化资源的长久保存与可信传播保驾护航，让红色基因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二）内容生产与传播创新：从单向输出到互动参与

在新媒体时代，红色文化传播正以创新的姿态突破传统边界，通过轻量化内容生产、数字化创意产品开发与用户共创模式，构建起更具吸引力与参与感的传播生态，让红色精神在年轻群体中引发共鸣[7]。

轻量化、年轻化的内容生产策略打破了红色文化传播的固有框架。将厚重的红色故事拆解为微纪录片，以精练的叙事节奏、鲜活的画面语言直击人心；融入动画特效、趣味表情包，让历史人物与事件“活”起来，搭配弹幕互动功能，激发观众实时讨论与情感共鸣。在抖音、B 站等年轻用户聚集的平台，这种轻松又不失深度的内容形式，有效降低了传播门槛。创建有交互功能的移动端网页可以进一步增强体验感，用户化身革命战士，在“是否冒险突围”“如何分配物资”等关键抉择中，沉浸式感受历史进程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让红色教育从单向灌输转变为双向互动。

红色主题数字藏品的开发为红色资源传播注入新动能。革命旧址数字门票等藏品，不仅承载着珍贵的



历史记忆，更借助区块链技术赋予其稀缺性与唯一性。用户收藏、分享藏品的过程，实则是对红色文化的二次传播，而藏品附带的拓展知识包，如旧址建造背景、书信背后的感人故事等，让每一次交互都成为深入了解历史的契机，将文化传承与数字消费有机结合。

UGC（用户生成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模式可以充分激活民间红色资源的潜力。通过发起类似“我家的红色记忆”等线上征集活动，鼓励用户挖掘家族中的革命史料、老照片，讲述祖辈的红色故事。这些承载着个人情感与家族记忆的内容，经官方审核后纳入数字资源库，与权威历史资料相互补充，构建起立体化的红色文化图谱。这种模式打破了传统“专业生产者主导”的内容生态，赋予用户更多创作和传播的主动权，用户既是红色文化的消费者，更成为传播者与创造者，形成“人人参与、人人传承”的生动局面。这些创新实践让红色文化真正走进年轻人的生活，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

（三）传播模式创新：构建全场景传播网络

跨平台矩阵联动：在“学习强国”等政务平台搭建“红色数字展厅”，侧重权威内容传播；在社交平台（微信、微博）推出“红色关键词挑战”，如用户发布含“长征”“延安”等词的内容，可触发相关历史知识卡片。与短视频平台合作开发“红色滤镜”，用户拍摄视频时自动叠加历史场景特效（如老照片滤镜+语音解说），降低传播参与门槛。

线下场景数字化延伸：在革命纪念馆、旧址设置智能导览设备，扫码即可通过手机 AR 查看“历史场景与现实场景叠加”的画面；在城市公共空间（地铁、商圈）设置互动大屏，用户触摸后可浏览红色历史故事，实现“碎片化时间”的红色传播[8]。

动态更新资源库：定期收集新发现的红色史料、民间口述历史，通过数字化手段补充至数据库，确保内容的时效性和丰富性；结合大数据分析用户浏览偏好，优化内容推荐算法，如高频搜索“抗战英雄”则优先推送相关人物故事。

（四）跨界融合创新：联动多领域拓展传播边界

文旅融合：数字技术赋能红色旅游，推出“红色数字地图”，整合各地革命遗址的数字导览、历史故事音频，用户旅游前可通过地图“云预览”，在旅游中扫码获取实时讲解，旅游后生成个性化“红色足迹”纪念海报，形成“线上种草—线下体验—线上分享”的闭环。

教育融合：打造沉浸式课堂，与学校合作开发红色数字教材，通过 3D 动画演示历史事件（如五四运动场景），配套互动习题；在高校开设“红色 VR 实验室”，学生可分组“扮演”历史人物进行情景模拟，提升教育参与感。

红色资源的数字化传播，本质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时代转译。在数字化转型浪潮席卷全球的当下，红色资源传播已突破传统路径的局限，以技术为舟、以创新为帆，驶入更广阔的发展蓝海。然而，这一创新征程仍需持续探索：既要在技术应用中坚守红色文化内核，避免形式大于内容的异化；也要深化跨领域协同，构建“技术+内容+传播”的生态闭环。唯有将技术创新植根于价值传承，方能使红色文化从“云端”落地“心间”，为凝聚社会共识、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提供可持续动能，最终在数字中国建设中绽放永恒的精神之光。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 用好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 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 [J]. 新长征 ,2021(11):4-9.

[2] 习近平 .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N]. 人民日报 ,2022-10-26(01).

[3] 施镱 , 张文 . 红色文化的数字化传播研究 [J].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17(24):135-136.

[4] 汤春梅 , 陈鹏联 . 新媒体语境下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播现状及路径选择 [J]. 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1):77-81.

[5] 刘黎 , 郑海燕 . 红色文化数字化传播创新策略研究 [J]. 传媒 ,2022(20):80-83.

[6] 郭金雨 . 让革命文物“活”起来 让红色资源“动”起来——以陈云纪念馆为例 [J]. 中国纪念馆研究 ,2019(02):59-62.

[7] 付安玲 , 肖朝霞 . 大数据时代红色文化的数字化变革与实现路径 [J]. 红色文化学刊 ,2022(01):73-80.

[8] 许丽 . 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保护与创新发展路径 [J]. 人民论坛 ,2021(01):139-141.

（作者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

新时代文化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李申奥

摘要：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在新时代的背景下，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引领和促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当前，人的精神文明建设、人的全面发展理念普及的过程中呈现出一些发展困境，家庭教育理念有待转变，公共文化服务需要完善。从理论层面阐明新时代文化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逻辑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关键支撑，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重要动力，在此基础上结合时代背景探索文化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路径，有助于以人的全面发展推进国家、社会的发展。

关键词：文化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实践路径

文化作为国家与民族的精神命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建设中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我国已迈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基于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发展和教育事业等作出了全方位、系统性的阐述，强调文化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促进作用，对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当前社会中“唯分数论”“唯学历论”等错误思潮依然存在，这种功利化教育的倾向本质上背离了人的全面发展目标，不论是对于个人还是民族国家，都将产生不良的影响。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本文将从理论层面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关系，在新时代背景下探讨文化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路径。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关键支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2]。人的全面发展主要包括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充分发展、人的才能的多方面发展、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人的主体性的全方位发展，以及人的社会关系的多角度发展等，集中表现为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的全面发展[3]。从这个定义看，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了极高的自由程度，这对“土壤环境”提出了一定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关键支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价值引领作用，确立全面发展的目标导向；精神滋养作用，丰富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提高人的能动性；环境保障作用，构建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

（一）价值引领作用：确立全面发展的目标导向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明：“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4]劳动异化理论深刻揭示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工具化，即劳动产品与劳动者对立、劳动活动本身与劳动者对立、人与自己的“类本质”对立、人与人对立，这些因素从根本上束缚了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指引了“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方向。社会主义的发展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反对人的工具化倾向，强调人才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价值导向，其本质是“人的解放”，在这一价值引领下我国始终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促进个体在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劳动技能、审美能力、个性发展等多方面协同发展。同时社会主义文化中的平等、和谐等理念不断促进社会进步，逐

步消除职业偏见、地域偏见等，让人们都有更平等更充分的发展机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美好生活。

（二）精神滋养作用：丰富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提高人的能动性

精神的富足和个性的解放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体现和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对人的精神世界和个性发展起着重要滋养作用。首先，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和科普工作的广泛开展，科学知识和科学思维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不断提升，因而个体的自由程度不断提高，这极大地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其次，在文学、音乐、影视、游戏等领域的发展创新中，人的审美能力、创造力和个性人格均得到了培养和发展，避免了“人只懂理性而缺乏感性”的片面发展，这也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和价值所在。最后，社会主义文化体现了人类最先进的价值追求，蕴含着优秀的精神和理念，指引着社会发展，滋养着个人成长。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丰富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提高人的能动性，对人的全面发展起着重要的精神滋养作用。

（三）环境保障作用：构建有利于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致力于营造优质和包容的社会生态，有效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影响下，人民能够自觉反对职业歧视、性别歧视等落后思想，“行行出状元”的价值观念真正在社会深入人心，只要是能够为国家和社会的建设作出贡献，都应该受到应有的尊重。通过制度文化建设，让个体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可以用于生活、学习、社交、发展兴趣爱好，实现个体的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能够促进社会资源的均等化，例如图书馆开设数量增加，博物馆免费开放，让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群体都能获得文化滋养，从而更好地实现个体的发展。

二、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重要动力

文化并不是独立于人类的抽象存在，它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社会和自身的实践活动中逐渐产生、积累和沉淀的产物。人的实践活动是文化产生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动力。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逐步发展到现代社会，社会形态的更替包含着文化形态的更替，每一次变革都促进了人的发展和解放，而人的发展又提高了实践水平，实践活动的深化会打破旧有文化的局限，催生新的文化形态。在新时代背景下，人的全面发展促进文化创新具体表现为：全面发展的人是文化创新的重要主体；人的社会关系完善推动文化传播与共享；人的精神境界提升引领文化价值升华。

（一）全面发展的人是文化创新的重要主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5] 当个体突破了“片面发展”的局限，掌握多领域的知识，具有科学的思维和创造力，才能更加能动地从事实践活动，更好地实现文化创新。从时间上看，文化的发展和创新是需要个体的一定的“非劳动时间”，即个体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发展程度和自由程度越高的人，其“非劳动时间”是更加充裕的，他们可以支配更多时间在学习、娱乐、社交、创作等方面，从而可以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在文化创作创新上。从人的个性方面看，个性自由发展的人才能摆脱“同质化”创作，形成多样化的文化表达。不同地域、经历、个性的人能够基于自身的情感创造出不同的文化作品，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文化的多样性。从文化本身看，文化创新包含诸多维度，全面发展的人具有更高的认知能力、创造能力和审美能力，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创造性从事文化创造创新实践，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二）人的社会关系完善推动文化传播与共享

人的全面发展内在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的丰富性为文化元素的流动、交融提供了载体与动力，进而推动文化的传播和共享。个体的社会关系包括亲人、朋友、同学、同事等。社会关系越广，就越能打破文化传播的壁垒。如果个体的社交范围能够接触到不同的地域、职业、群体的人，不同文化元素的传播就更加迅速，各种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知识技能的流动更加频繁。社会关系的深度关系着文化传播的接受度，信任度越高的社会关系，文化传播越容易被接受。社会关系的活跃度加快文化传播的效率，例如各种讨论、社交活动会让不同文化元素反复出现、加强印象，逐渐形成共同的文化记忆。

（三）人的精神境界提升引领文化价值升华

具有高尚、丰富的精神境界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体现。人的精神境界与文化价值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文化价值是人类精神活动的外化，而人的精神境界又是文化价值的内在载体与推动力量。人的精神境界提升引领文化价值升华，当个体或群体的精神境界向更高的层次提升时，必然会带动文化价值向更深刻的领域深化。当个体精神境界上升至道德高度，文化价值则体现出“真善美”，以责任心、正义感为重要内容，例如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的视死如归，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家国情怀。当个体的精神汇聚成群体共识，转化为社会普遍的价值追求，文化价值体系便会进一步升级。

三、当代实践：通过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始终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价值追求，我国进行了一系列文化实践，

推动二者协同发展，重要的实践路径包括“德智体美劳”五育融合的教育改革、“文化惠民”工程的普及等等。要以文化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通过引领思想、培育素质、滋养精神等多维方式，构建人民群众满意、与时俱进的文化实践体系，将人的全面发展贯穿到文化实践中去。这一实践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理论，又结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发展模式。

（一）通过思想引领筑牢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根基

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价值观念和科学理论，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价值导向。只有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才能筑牢精神文明的发展高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表达，新时代的文化实践要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家庭教育等各个领域。例如，在公共场所中，将主流文化价值导向的标语、图画展示在公众面前，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宣传传播社会主义文化；在居民社区设置“先进人物榜”，开展“文明户”评选，以优秀榜样激励民众提高道德素质；在学校教育中开展“思政课”，通过各种“接地气”的方式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学生的道德准则，进而外化为行为准则，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随着时代发展，网络已成为新的文化舆论传播重地，这要求相关部门善于运用各种新载体，通过抖音、B 站、微博等网络平台，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帮助人们理解社会发展规律，增强对国家发展方向的认同，从而明确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系。

（二）通过素质提升拓展人的全面发展的能力边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注重通过教育、科普、文化活动等，提升人的科学文化素养、创新能力和审美水平，为全面发展奠定能力基础。人的全面发展要求“德智体美劳”各方面的均衡发展，为此构建“全链条式”教育体系是必然要求，必须推动实现基础教育均衡化、高等教育深度化、职业教育实用化，同时注重发展终身教育。

大力开展普惠化的科普与文化活动，让优质的文化资源惠及基层人民群众，这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践中的重要环节。例如，免费开放博物馆、科技馆，在农村增设更多“乡村书屋”，让广大群众能够了解前沿科技，品读文化经典，提升科学思维和素养，开阔文化视野。

（三）通过精神滋养丰富人的全面发展的情感世界

“人的精神文化需求本来就是多方面的，包括求知需要、娱乐需要、审美需要、道德需要和信仰需要。”人要满足自身多元化的精神需求，这就对各种文化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通过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吸收借鉴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不断创造时代精品，为人们提供精神滋养和情感共鸣，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促进人们的心理健康与个性发展。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新时代要通过“非遗走进校园”“传统节日振兴工程”等文化实践，阐发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命力，让其成为滋养心灵的源泉。例如，通过重阳节敬老活动传承中华孝道文化，在古诗词朗诵活动中感受千年前古人的悲欢离合，通过这些文化实践让人们在情感认同中获得精神归属感，丰富精神世界。

聚焦时代议题，体现时代精神，创作时代主题文艺作品，用艺术语言讲好中国故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6] 文艺工作者要善于把握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在文艺创作上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创作出高质量、多样化的文化艺术作品。例如，近年来涌现出了《觉醒年代》《长津湖》等影视作品，讲述中国人民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浴血奋斗，激发民族自豪感，体现民族精神，引导人们在感悟时代脉搏中树立远大理想，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

四、结语

总而言之，新时代文化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外部环境和社会生态；另一方面，人的发展程度越高、越全面自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发展就更加有动力，文化发展呈现出多样化、内涵化、进步性。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要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导向，在实践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发展，以文化滋养人的发展，促进二者的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 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52.

[2] 习近平 .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1.

[3]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编写组 .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M].2 版 .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147.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

[5] 习近平 . 之江新语 [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150.

[6] 习近平 .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5.

（作者系嘉兴大学硕士研究生）

基于大语言模型的对话干预系统在孤独症患儿中的治疗效果研究

林格宇

摘要：目的：探究基于大语言模型的对话干预系统对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的干预效果。方法：以 2024 年 10 月至 2025 年 4 月杭州某三级甲等医院接诊的 16 例孤独症患儿为本次探索性研究的对象，采用随机数字分组法分为两组，对照组接受常规康复训练，观察组在常规康复训练基础上给予孤独症儿童对话干预系统主导的社交对话训练。对比两组儿童社交对话改善程度、ATEC 评分。结果：干预后，观察组儿童在对话总字数、总时长、有效回应平均间隔时间、AI 评分方面的改善均优于对照组（$p < 0.05$）；干预前后，观察组儿童 ATEC 评分差值大于对照组（$p < 0.05$）。结论：基于大语言模型的对话干预系统在孤独症患儿的社交对话训练中展现出显著效果，能够有效改善其临床症状、促进语言能力发展，并提升社交互动水平。

关键词：孤独症；大语言模型；社交对话训练；疗效分析

孤独症谱系障碍（ASD）是一种复杂的神经发育障碍，以社交沟通缺陷、重复刻板行为及兴趣狭窄为核心特征，其临床表现具有高度异质性，从轻度社交困难到重度功能受损不等 [1]。调查统计，目前我国孤独症发病率高于 1%，全国约有 240 万名孤独症儿童 [2]。而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在 2023 年 8 岁以下儿童孤独症的患病率达到了 1/36[3]。已有研究发现，孤独症儿童所呈现出的社交沟通方面的缺陷，很大程度上是由患儿语言障碍导致的。相当比例的孤独症患儿在早期即出现语言发育迟缓的现象，这种情况会显著阻碍其与他人的有效互动。部分孤独症患儿能够进行即时或延迟的模仿性语言表达，但这些语言缺乏自发性和互动性，难以支持真正的社交对话 [4]。因此，孤独症儿童社交语言能力的发展及康复干预逐渐受到重视。

近年来，随着美国人工智能研究机构 OpenAI 研发的 ChatGPT 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广泛关注，如今大语言模型技术已具备赋能各行业发展的潜力。这为孤独症的社交对话干预提供了新的可能。传统的针对特殊儿童的诊疗干预模式存在一定局限性，往往难以充分考虑个体差异性，也过度依赖专业人员的临床经验判断。目前，国内外已有许多文献围绕 AI 技术在特殊儿童干预领域的应用情况与所具备的价值展开了探讨[5]。有研究发现，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打造的言语疾病干预系统，可借助个性化且交互性强的训练方式，切实弥补传统干预手段存在的短板，其可以通过语音识别、及时反馈和趣味化设计，激发患儿的语言表达动机，提高患儿社交交流能力 [6]。

基于大语言模型和 VB-MAPP 研发的孤独症儿童对话干预系统中设计了 5 个社交对话主题：食物、动物、玩具、家庭、颜色，这些主题按认知难度递增排列。该系统以轮流对话的形式对孤独症儿童的社交对话进行干预 [7]。问题形式会被限定在“什么”“谁”和“哪里”这三个可以通过具体视觉图像呈现的领域中，以帮助孤独症儿童更易回答。同时系统排除了“为什么”“怎么做”和“什么时候”这些需要更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抽象概括能力和时间感知能力的问题，避免患儿因产生挫败感导致参与度下降 [8]。

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探讨孤独症儿童对话干预系统对孤独症患儿社交对话能力的干预效果，以期为临床康复实践提供更加科学、有效的干预方案。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选取 2024 年 10 月至 2025 年 4 月在杭州某三级甲等医院就诊的孤独症患儿 16 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分组标准分为对照组（n=8），平均年龄（7.03±1.00）岁和观察组（n=8），平均年龄（7.22±0.97）岁，两组一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纳入标准：（1）符合第 5 册《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中关于孤独症的临床诊断标准 [9]；（2）患儿家属均知情同意；（3）临床资料完整；（4）年龄在 5~10 岁；（5）具有一定言语交流能力，研究全过程配合度

良好。排除标准：（1）合并听觉、视觉障碍；（2）存在遗传代谢性疾病;（3）合并严重脏器功能异常;（4）合并认知功能障碍及智力障碍；（5）曾接受过系统的、长期（＞6个月）且与本次干预方法类似的治疗。

（二）干预方法

1. 对照组

接受常规康复训练干预。（1）语言认知功能训练：使用传统康复干预方式，开展由康复治疗师主导的一对一语言认知功能训练。使用图片和实物作为教具，帮助患儿直观理解和表达语言；通过设置特定情景、模拟购物等日常生活场景，让患儿模拟对话，提高语言应用能力。（2）感觉统合训练：利用平衡木、滑梯、蹦床、滚筒、独木桥、按摩球等器材设计训练项目，为儿童提供前庭觉、本体觉、触觉、视觉、听觉及嗅觉等多方面的感觉输入。通过提高儿童前庭感觉和本体感觉，促进大脑与肢体功能的整合与协调。

2. 观察组

在对照组常规干预方案的基础上，增加在家庭环境下运用孤独症儿童对话干预系统进行社交对话的干预训练。干预为每周5天，时长为每天1小时，持续1个月，共计20个训练日，由家长记录训练日期。对话主题涵盖食物、动物、玩具、家庭、颜色五大日常生活核心场景。在干预前准备阶段，需要在孤独症儿童对话干预系统中录入儿童的个人信息和兴趣偏好等个性化信息，系统将据此生成适配的对话内容。儿童首先从系统提供的虚拟形象库中自主选择交互对象（如卡通狮子），虚拟形象将通过问候语引导儿童进入主题对话，采用开放式提问模式，预留充足响应等待时间以适应孤独症患儿常见的应答延迟特征。当儿童未作出有效回应时，系统将根据预设的对话约束条件自动生成延续性语句，确保社交互动的流畅性。

（三）观察指标

所有受试者的孤独症病情和社交对话方面的观察效果，由以下2项评估进行评定：

1. 孤独症社交对话评估

干预前后，使用孤独症儿童对话干预系统的评估模块对两组受试者进行干预前后的社交对话能力测评。评估过程与干预过程类似，选取食物、动物和玩具三个核心主题作为评估内容，每个主题进行时长约3分钟的标准化对话测试，整体评估时间严格控制在10分钟以内。系统自动采集以下关键指标：回应率、总字数、总说话时长、有效单次说话平均可识别字数、单次说话平均时长、有效回应平均时间间隔。孤独症儿童对话干预系统将基于上述多维指标，采用10分制评分标准对受试者的社交对话能力进行综合量化评估。

2. 病情控制情况

干预前后，使用孤独症疗效评定量表（ATEC）评估患儿病情控制情况,包括语言交流、社交能力、感知觉、行为4个维度，共77个条目，每个条目0~2或0~3分。总分为各条目评分之和，量表总分与症状严重程度呈正相关，即总分越高表明患儿临床症状越显著[10]。

（四）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使用SPSS 26.0统计学软件进行计算和分析，组间、组内比较分别用独立样本t检验、配对样本t检验，并对经正态检验后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bar{x}$ ±s）表示。$p < 0.05$则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一）两组患儿干预前后社交对话评估对比

干预前，两组患儿社交对话评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干预后，两组总字数、总说话时长、有效回应平均时间间隔及AI评分均有所改善，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p < 0.05$）。两组患儿干预前后社交对话评估比较见表1。

（二）两组患儿干预前后病情改善情况对比

干预前，两组患儿社交对话评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干预后，观察组ATEC评分差值高于对照组（$p < 0.05$）。两组患儿干预前后ATEC评估比较见表2。

表2　比较两组干预前后ATEC评估情况（$\bar{x}$ ±s）

组别	干预前	干预后	差值
观察组	43.21 ± 20.55	38.74 ± 21.41	4.47 ± 5.60
对照组	33.67 ± 10.01	32.89 ± 10.11	0.78 ± 4.91
T值	1.81	1.071	2.13
P值	0.082	0.294	0.04

三、讨论

孤独症谱系障碍核心症状为社会交往障碍、言语与非言语沟通缺陷，以及刻板重复的行为模式和兴趣范围狭窄。现有研究表明，该疾病的发病机制具有多因素性，涉及遗传、免疫异常及神经生化改变等多种病理生理学机制共同作用[11]，主要通过康复训练进行干预。早期强化干预对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来说非常重要，现有干预模式对治疗师专业资质和训练环境有着严格要求。目前我国孤独症康复服务资源呈现供需失衡状态，专业干预机构数量不足、区域分布不均、专业水准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因素制约了孤独症儿童获得规范化康复干预的机会[12]。综上所述，当前亟须建立并推广一种可持续性强、干预强度充足且能实现个性化定制的孤独症儿童康复干预新模式。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自然语言处理方面展现出卓越的性能表现[13]，其突出的文本生成质量、语义理解深度、知识检索效率以及逻辑推理能力，为教育领域的智能化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和创新可能，具有极大的应用潜力和价值[14]。

本研究采用基于大语言模型技术研发的孤独症儿

表 1　比较两组干预前后社交对话情况（$\bar{x}$ ±s）

组别	总字数		总说话时长		有效回应平均时间间隔		AI 评分	
观察组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45.80 ± 26.23	76.50 ± 32.83※	27.24 ± 11.40	49.26 ± 15.72※	1.67 ± 0.87	0.66 ± 0.43※	3.83 ± 1.86	4.92 ± 1.47※
对照组	38.86 ± 28.26	40.33 ± 29.09	18.48 ± 11.58	21.73 ± 13.50	2.30 ± 0.74	1.62 ± 0.58	3.29 ± 0.65	3.38 ± 1.01
T 值	0.493	2.242	1.515	3.690	–1.53	–3.786	0.78	2.326
P 值	0.630	0.043	0.152	0.002	0.148	0.002	0.456	0.037

注：※ 与同组干预前相比 $p < 0.05$。

童对话干预系统，对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进行社交对话训练，该系统的核心优势为：（1）支持个性化对话，分析儿童的语言特征、兴趣偏好，可生成符合个体情况的对话内容；（2）设备简单，降低了传统干预对专业设备、时间和场地的要求，可在家庭、学校或社区等多场景实施；（3）对非专业人士（如家长）友好，能有效延伸专业干预的时空边界，实现治疗师指导下的高频率家庭训练，显著提升干预密度。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干预后的有效回应平均时间间隔优于对照组（$p < 0.05$），说明在一般干预的基础上增加应用孤独症儿童对话干预系统的训练，对孤独症儿童社交对话中回应速度的改善作用，优于单纯的康复训练治疗。分析其原因，可能为孤独症儿童对话干预系统提供了结构化的对话流程，即固定问答顺序、明确的主题、确定的回合交替，给予了孤独症儿童明确的指示，调动孤独症儿童更快速地进入社交对话的状态[15]。研究中还发现，观察组干预后说话时长与总字数也明显优于对照组（$p < 0.05$），说明在一般干预的基础上增加应用孤独症儿童对话干预系统的训练，对增加孤独症儿童表达性语言内容有一定帮助。分析原因，可能为孤独症儿童对话干预系统通过主题化对话（如食物、动物等）引入新词汇，儿童在重复使用中掌握更多表达方式。每轮对话有明确的交流主题、具体的对话内容，排除如“为什么”“怎么样”和“什么时候”这些抽象的问题，同时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特性，在干预过程中会根据准备阶段输入的喜好信息与儿童当下的回应个性化地调整对话内容，给予使用者即时反馈，激发孤独症儿童表达的意愿，引导孤独症儿童进行持续对话，为儿童提供更多学习和模仿社交沟通技能的机会，促进其社交对话能力的提高。

通过比较两组干预前后的 ATEC 评分结果，发现观察组患儿在结束干预后孤独症病情改善情况较对照组更优，这说明增加孤独症儿童对话干预系统进行的社交对话干预，对改善患儿症状有一定的价值。

综上所述，基于大语言模型的孤独症儿童对话干预系统，在孤独症患儿的社交对话训练中展现出显著效果，能够有效改善其临床症状、促进语言能力发展并提升社交互动水平。然而，本研究尚存在一定局限性，包括样本规模相对较小、干预时长有限等因素可能影响结果的普适性。后续研究可通过扩大样本量、延长干预周期等方式进一步验证和优化该干预方案。总体来看，孤独症儿童对话干预系统作为一种创新的数字干预手段，在孤独症康复领域具有广阔的临床应用前景。

参考文献

[1]HIROTA T,KING B H.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 Review[J].JAMA,2023,329(02):157-168.

[2] 五彩鹿孤独症研究院 . 中国孤独症教育康复行业发展状况报告 : 第 5 部［R］. 北京 :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24.

[3]CHRISTENSEN D L,MAENNER M J,BILDER D,et al.Preval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mong children aged 4 years-early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monitoring network,seven sites,United States,2010,2012,and 2014[J].MMWR Surveill Summ,2019,68(02):1-19.

[4]SIMMS M D,JIN X M.Autism,Language Disorder,and Social(Pragmatic)Communication Disorder:DSM-V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es[J].Pediatrics in Review,2015,36(08):355-362.

[5] 王振洲 , 张杨 . 近 20 年国际人工智能赋能特殊儿童诊断及干预研究的可视化分析 [J]. 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 ,2024,30(04):404-415.

[6] 缑梦帆 , 和俊杰 . 针刺联合计算机言语疾病矫治训练治疗儿童孤独症疗效观察 [J]. 新乡医学院学报 ,2024,41(01):26-31.

[7] 支振锋 . 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信息内容治理 [J]. 政法论坛 ,2023,41(04):34-48.

[8]DENG C,LAI S,ZHOU C,et aL.ASD-Chat:An innovative dialogue intervention system for children with autism based on llm and vb-mapp[J/OL].arXiv preprint,2024.https:// doi.org/10.48550/arXiv.2409.01867.

[9] 美国精神医学学会 . 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 [M].5 版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4 .

[10] 卢建平 , 杨志伟 , 舒明耀 , 等 . 儿童孤独症量表评定的信度、效度分析 [J]. 中国现代医学杂志 ,2004(13):119-121,123.

[11]GENOVESE A,BUTLER M G.The Autism Spectrum:Behavioral,Psychiatric and Genetic Associations[J].Genes(Basel),2023,14(03):677.

[12] 李海 , 赵朔 , 洪琦 , 等 . 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家长的家庭干预培训需求调查 [J]. 中国康复医学杂志 ,2023,38(11):1571-1575.

（下转 92 页）

情感劳动对流动家庭抗逆力建构的影响机制研究

宋如清　张银花

摘要：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流动家庭遭受着户籍制度限制、社会融入阻碍等外部压力，这些外部压力给家庭系统稳定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且将这些外部压力内化为家庭内部的情感困境。本文针对流动家庭的情感劳动展开研究，旨在探究出它同家庭抗逆力之间的影响机制，通过研究我们得知，表层表演虽然能够在短时间内保持家庭表面上的和谐，但长期的假装会引发情绪耗尽，从而降低家庭之间的交流品质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深层表演借助家庭共同意义的创建，可以优化家庭凝聚力，加强家庭的长期适应能力。情感劳动的效果受到时间因素、空间因素、社会支持系统的影响，本研究不仅丰富了情感劳动研究领域对家庭的研究，同样也为流动家庭的研究提供了基于家庭抗逆力的视角，在进一步完善流动家庭支持路径、优化社会工作的微观干预层面，也具备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情感劳动；流动家庭；家庭抗逆力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城乡人口流动呈现出规模扩大化、流动长期化的显著特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截至 2020 年，全国流动人口数量已达 3.76 亿人[1]，流动家庭规模也相应增大。当下，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户籍制度限制、经济压力和社会融入障碍等多种因素共同成为流动家庭面临的压力来源，对家庭系统稳定性和发展性提出严峻考验（盛亦男，2013）[2]。然而，流动家庭所承受的外部压迫并非仅仅停留在表面，这些压迫往往会被内化为家庭内部的情感问题，促使家庭成员进行情绪调节和管理。家庭成员为应对内外环境压力而开展的持续性情绪管理与规范表达，即为家庭场域中的情感劳动。

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的概念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提出，她将其定义为一种情绪的管控，以便于在公众面前展示出合理的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并认为情绪劳动是可以出售的，具有交换价值（Hochschild，1983）[3]6-7。在情感劳动的理论框架中，表层表演（surface acting）和深层表演（deep acting）是两个重要的方面，这两种情感劳动策略对个体心理资源消耗以及情感体验有着明显的差别，从而会对流动家庭的抗逆力带来不一样的影响，对于流动家庭而言，选择什么样的情感劳动策略，如何组合这些策略，会直接决定家庭在应对城市适应压力时的韧性表现和适应结果。

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城乡迁移背景下，流动家庭开展的二重维度情感劳动策略，对家庭抗逆力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已有研究大多聚焦经济资本、社会政策支持对流动家庭的作用，而忽视了家庭内部情感互动的能动价值。所以从理论层面来看，本研究要开拓情感劳动理论应用的新疆域，将其从工作场域拓展到家庭场域，深入探索情感对家庭抗逆力的作用，为社会工作微观干预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助力流动家庭提升整体抗逆能力。

（上接 91 页）

[13] 赵朝阳，朱贵波，王金桥 .ChatGPT 给语言大模型带来的启示和多模态大模型新的发展思路 [J]. 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 ,2023,7(03):26-35.

[14] 肖君，白庆春，陈沫，等 .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在线学习场景与实施路径 [J].电化教育研究 ,2023,44(09):57-63,99.

[15] 项学浩 . 结构化游戏对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表达性语言能力的干预研究 [D]. 重庆 : 西南大学 ,2021.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2024 年校级科研课题“基于大语言模型的孤独症儿童语言干预应用研究”（XKYJB2024-02）。

（作者单位：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二、情感劳动二重维度对流动家庭抗逆力的差异化影响

霍克希尔德提出的情感劳动理论，尤其是其对表层表演和深层表演的区分，为理解流动家庭的情感管理实践提供了重要理论视角。这种区分既揭示了情感劳动的复杂性，也为探究流动家庭应对压力的多元策略提供了关键分析工具。

（一）表层表演：短期适应与潜在侵蚀

表层表演是指个体通过调整外在情绪表现以符合社会或家庭期待，但内心感受却维持原状的行为策略（Hochschild，1983）[3]37。在流动家庭的特定场域中，这种情感劳动形式往往由外部结构性压力与家庭内部情感期待相互作用所引发，在短期内，表层表演可以暂时缓解家庭紧张氛围，在事件发生初期为成员们提供心理缓冲，从而维持家庭表面和谐与基本生活秩序，但久而久之，这种做法却会侵蚀家庭抗逆力。

表层表演的策略就是压抑真实的情感，用虚假的情绪代替（林枫，2024）[4]，虽然初衷是希望维持家庭的和睦，但是长期的压抑将会消耗个体的心理资源，造成情感疲惫，情绪不稳定。长此以往，表层表演会严重影响家庭成员之间深层次的交流与信任，而且如果家庭长期接受表面乐观的信息，当遭遇重大危机的时候，往往缺乏真实的应对能力，最后无法实现家庭抗逆力的提升与发展。

（二）深层表演：内在调适与持续潜能

与表层表演截然不同，深层表演是通过认知重构来达到情感表达与内在体验一致性的另一种情感劳动策略，虽然内在调适需要耗费一定的精力和心理成本，但因为其是建立在真实情感转化的基础上，因此不会对家庭成员的心理健康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深层表演在流动家庭中运行，依赖于社会价值观内化与家庭情感积累两个环节。社会价值观内化指的是流动家庭成员把社会期望、文化观念变成自己的信念，然后把它融入家庭认同当中，这样就促使家庭成员从内心深处接纳并认识所遇到的麻烦，从而为积极解决家庭难题奠定根基。家庭情感积累则表示家庭成员在共同应对问题的时候，经过真诚交流，分享情感，慢慢产生情感共鸣和团结意识，不过这种积累不是立竿见影的，它的优势会随着家庭互动次数增多而一直加强，最终达成家庭情感资源的再生循环。

通过以上方式，深层表演能为流动家庭注入持续的积极潜能：一方面，它通过促进家庭间的真实连接与深度理解，增强家庭内部的信任与支持；另一方面，通过实现情感表达的真实性与内在的一致性，为流动家庭构建坚实的心理基础与情感基础，进而提升整个家庭的内在韧性与适应力。

三、情感劳动影响流动家庭抗逆力的动态机制

情感劳动对流动家庭抗逆力的影响不是单一线性的，而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包含表层表演和深层表演两种不同的路径，它们分别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影响着家庭内部环境和应对能力（王上，2021）[5]，实际上，这两种路径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交织在一起，动态地调节着彼此的效果，而且这种调节还受时间、空间和社会支持系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一）表层表演对家庭抗逆力的侵蚀路径

表层表演作为一种外在的情绪管理策略，其对流动家庭抗逆力的影响呈现出渐进式的侵蚀特征。这种侵蚀过程首先体现在个体层面的情绪消耗。其一，当家庭成员长期采用伪装情绪的方式应对生活压力时，会产生持续的心理负担。其二，家庭内外的频繁角色转换也将加速成员的心理能量耗竭，加重维持情绪导致的负担。随着时间推移，个体层面的情绪消耗还会逐步扩散到家庭关系层面。情绪耗竭的家庭成员既可能减少与家人的情感交流，也可能因小事爆发激烈情绪，而这些都会破坏家庭的良好情感氛围。

长期来看，家庭关系质量的下降最终会影响到家庭的整体功能，并形成“沟通不畅—问题解决能力降低—表层表演的需求增加”的恶性循环。除此之外，流动家庭的特殊处境也会放大表层表演的负面影响：城乡之间的迁徙使得流动家庭处于不稳定生活状态，这间接导致情绪管理的难度增加；同时，结构性排斥使得流动家庭在遭遇压力时难以获得外部支持，因而更加依赖家庭内部情感资源。当情感资源因表层表演而持续消耗时，家庭的整体功能就会受到严重削弱，表层表演对家庭抗逆力的侵蚀作用也随之凸显。

（二）深层表演对家庭抗逆力的培育路径

深层表演作为内在的情感调适过程，对流动家庭抗逆力的培育作用体现在认知、互动、功能三个核心层面。

在认知层面，深层表演能够促进家庭成员形成共享的价值体系。流动家庭在面对城市生活的挑战时，能够通过共同建构“家庭奋斗叙事”来理解自身处境，从而起到鼓舞作用。这种意义重构不仅减轻了负面情绪的影响，更创造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精神纽带，当全家人都认同这一价值观时，就能形成共同面对逆境的心理基础。

在互动层面，深层表演有助于塑造高质量的家庭情感交流形式，这是因为真诚的情感表达能够让家庭成员清楚地知晓彼此的需求与状况。父母把工作压力坦白说出来，就能教会孩子怎样健康地应对负面情绪，而且能够适时开展家庭责任方面的教育。这种健康的互动模式可以增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默契，当遇到难题的时候，大家会自然而然地相互扶持，而不是刻意避开或者假装无事发生。

在功能层面，深层表演会促使家庭发展出更好的问题解决策略。开放的情感交流是流动家庭解决问题的良好基础，家庭成员可以马上察觉问题并一同找寻解决办法。在做出重要决定的时候，全家可以共同商

讨各自担心的事情和期盼，从而得到对整个家庭最有利的结果。这样的参与式决策既提升了解决问题的质量，又加强了家庭成员对决策结果的接受程度。

对于流动家庭而言，深层表演具有的特殊价值在于，它能将挑战和困境转化为家庭发展的新机遇叙事。这种积极认知可以帮助家庭在动荡的环境里维持稳定的感觉，甚至从中得到成长的动力（梅笑，2020）[6]。而且深层表演形成的情感资本是有积累效果的，长此以往家庭成员彼此间的了解和信任就越来越深，整个家庭的抗逆能力也会随之变强，深层表演的培育目的就能达成。

（三）情感劳动机制的动态调节与情境适应

在实际生活中，表层表演和深层表演并非割裂的，流动家庭会同时使用这两种方式，它们所产生的效果相互交织，这对情感劳动与家庭抗逆力间的作用机制造成影响。研究显示，这些产生的影响与时间、空间和社会支持系统等多种因素有关，因此情感劳动机制也对此进行了动态调节和情境适应。

从时间维度来看，情感劳动二重维度的使用有着阶段性的特点，在家庭遭遇急性压力的时候，短暂的表层表演或许会起到保护作用，让家庭表面上看起来比较和谐。但随着时间流逝，如果一直依靠表层表演而没有发展出深层表演的能力，家庭的适应能力就会慢慢衰退，甚至受损。与此相反，那些能在过渡期之后转而采用深层表演的家庭，将会表现出更长久的适应力，这种适应力会对家庭在城市中的生活带来优势。从整体上看，这种动态平衡的把握，是流动家庭在城市化过程中保持韧性的重要因素，它会影响流动家庭是否能持续发展。

从空间维度来看，不同生活场域对情感劳动的需求也不相同。在对外交往中，流动人口也许会更有必要借助表层表演去应对潜在的歧视或者排挤，而在家庭内部，深层表演则更利于创建健康的家庭关系。这种差异使得家庭成员须具备情感劳动的转换能力，可以在不同的场合下灵活改变自己的情绪治理策略，从而做到效益最大化，面对不同情况时的情绪灵活转换，是流动家庭在城市生活中维持功能的关键保障因素，也会成为其更好地发展的有利之处。

从社会支持维度来看，拥有社区支持、同辈网络等外部资源的家庭，对表层表演的依赖更低，因为外部的支持可以减少家庭内部的情感负担，孤立无援的家庭会迫使他们更多地依赖内部的情感资源，这也提示我们在面对流动家庭的时候，既需要关注内部的情感能力，也要关注外部的支持网络。

流动家庭情感劳动实践是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其对家庭抗逆力的影响，是表层表演侵蚀路径和深层表演培育路径在不同时间、空间和外部支持条件下的动态平衡与策略选择的结果，需要认识这些因素的相互影响，对于把握流动家庭抗逆力的形成机制和发展规律具有重要意义，也能为培育流动家庭抗逆力提供新的视角。

四、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情感劳动双重视角下的影响流动家庭抗逆力建构机制的详细分析，本研究发现，表层表演和深层表演对于家庭抗逆力建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且具有不同的动态作用过程。研究表明，情感劳动不仅是流动家庭应对城市生活压力的重要策略，更是决定其能否实现良性发展的关键因素。

表层表演可帮助流动家庭暂时维持表面平静，但长期使用会造成家庭情感损耗；深层表演能有效培育流动家庭抗逆力，通过增进家庭成员间的真诚感情联结、构建共同意义，推动家庭抗逆力持续提升。因此，在为流动家庭提供支持时，需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的支持体系，从宏观社会环境、中观社区支持网络、微观家庭自身能力三个层面发力，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尽管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研究样本的数量及代表性仍然有待提升，研究方法也有待进一步完善，但仍得出了具备一定代表性与参考价值的研究结果。流动家庭作为城市化进程中重要的参与主体，其抗逆能力与情感健康不仅影响着家庭成员的个体发展，更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值得学界、政府及社会各界持续关注。笔者期望本研究结论能引发社会各界对流动家庭的多重视角关注，在宏观层面完善支持政策的同时，重视家庭内部情感的重要作用；也希望流动家庭能获得更多关注情感健康的公共服务，全社会能共同为流动家庭营造更加友好、包容的发展氛围。

参考文献

[1] 中国政府网 .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 [EB/OL].(2021-05-11)[2025-04-25].https://www.gov.cn/guoqing/2021-05/13/content_5606149.htm.

[2] 盛亦男 . 中国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 [J]. 人口研究 ,2013,37(04):66-79.

[3]HOCHSCHILD A.The Managed Heart: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M].Berkel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

[4] 林枫 . 乡村小学女教师情绪劳动对其离职意愿的影响研究 [D]. 岳阳 : 湖南理工学院 ,2024.

[5] 王上 . 情绪劳动对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的影响与机制 [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1,36(04):66-77,90.

[6] 梅笑 . 情感劳动中的积极体验：深层表演、象征性秩序与劳动自主性 [J]. 社会 ,2020,40(02):111-136.

（作者：宋如清，内蒙古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张银花，内蒙古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中国传统家规中为官之德的内涵、主要内容及当代启示

李成萍

摘要：中国传统的为官之德在中国传统家规中得以集中体现。中国传统家规中的为官之德，是指商朝到明清期间家庭家族对家庭家族中为官的成员在从政德行方面的规定。纵览中国传统家规，其中所蕴含的为官思想和理念，可凝练为重廉、尽忠、爱民三个方面，既是对家庭家族成员的从政约束，更是中华政治智慧的结晶。在新时代，要以中国传统家规中的为官之德为依托，积极继承和弘扬其中的精华部分，剔除其中的糟粕部分，进而为涵养当代领导干部为官之德提供有益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中国传统家规；为官之德；当代启示

为官之德是中国传统家规中的重要关注点。在过去，中国传统家规中的为官之德为家庭家族中为官的成员提供了约束和指引。今天，我们要善于萃取中国传统家规中为官之德所蕴含的智慧，以推动其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中国传统家规中为官之德的内涵

中国传统家规又称为中国传统家训，是商朝到明清期间家庭家族对家庭家族成员行为所做的规定，有成文和不成文两种形式[1]。根据《说文解字》中的释义，“官”“吏事君也”[2]305，也就是说“官”是在朝廷供职、为君主效力的官员。“德”“升也”[2]37。换言之，德是一种内在品质或能力，能够使人不断提升和完善自己。“官德”一词由“官”和“德”组合而成。因此，官德指的是在朝廷供职、为君主效力的官员应该具备的品质或能力，并能够使官员不断提升和完善自我。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习近平总书记对官德作出了新的概括，他指出：“所谓官德，也就是从政道德，是为官当政者从政德行的综合反映，包括思想政治和品德作风等方面的素养。”[3]36 不难发现，官德侧重于强调作为“官”这一身份应该具备的道德品质。“为官之德”相较于“官德”多了“为”和“之”两个字。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为”的释义之一是“做”[4]1377，“之”作为助词时，“用法跟‘的’相当”[4]1710。因此，“为官之德”意为做官的德，也就是做官应该具备的一种品德或能力，其侧重于实践践行。

总体而言，尽管“官德”和“为官之德”各有侧重点，但其核心内涵高度一致，所指对象也完全相同。因此，可以概括出中国传统家规中的为官之德，是指从商朝到明清期间家庭家族对家庭家族中为官的成员在从政德行方面的具体规定。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传统家规中的为官之德以两种形式呈现：一是通过书信、楹联、诗、匾额等文本载体明示；二是通过壁画雕刻、日用器物、建筑等物化媒介潜移默化地传递教化。

二、中国传统家规中为官之德的主要内容

纵观中国传统家规，其对为官之德的规训尤为彰明，主要内容可以凝结为重廉、尽忠、爱民三个方面。

（一）中国传统家规强调为官之德要重廉

孔宅照壁所绘的“豸贪”图像，以具象符号承载孔氏家族“重廉”的为官之训。东汉时期，官至太尉的杨震秉承清廉作风，为后世子孙留下了“四知拒金”的遗产，受其影响，后世子孙皆恪守“清白吏”的叮嘱。裴氏家族中，曹魏时期的尚书令裴潜身体力行践行廉洁，北朝时期的裴侠给子孙留下了“凡贪官污吏者，死后禁入祖茔”的家规。可见，为官要清廉的家规早已被裴氏后裔代代相承。无独有偶，北宋时期的包拯，曾严厉地训示后代“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并要求将此家训刻在石块上，以警示后世子孙中的为官者要守廉。在客家土楼上镌刻着“在官无傥来一金”的楹联，时时刻刻告诫后世子孙做官不得非分获得一文钱。作为客家家规的继承和发展，林氏家规中明确记载道“廉洁奉公，是居官良法”。陶氏家族在繁衍生息的过程中，为后世子孙留下了《浔阳陶氏宗谱》，其中

为后人所熟知的“陶母退鱼”“守廉洁”等佳话，时时告诫陶氏子孙为官不可不廉。北宋时期的范仲淹在《告诸子及弟侄》中告诫子孙“清心做官，莫营私利”，教诲殷殷，如他所言“谦恭尚廉洁”。北宋时期的司马光在家规《温公家范·母》中以母亲的口吻遗教后人中的为官者要清廉自守。郑氏家族在发展中给郑氏子孙留下了一百八十六条《郑氏规范》，其中有三条是郑氏家族专门为出仕为官的子孙制定的家规。譬如，在第八十六条就提到“既仕，须奉公勤政，毋踏贪黩”。郑氏廉训，铮铮如铁，由此可见。北宋儒学世家吕祖谦在《官箴》中将“清”视为为官之法的三件事之一，“清”指的就是为官要做到清廉。明清时期的顾炎武主张“贵廉洁、贱贪污”，他在《亭林诗文集·与公肃甥书》中提到“以激浊扬清”整肃吏治，根本在于“养廉”。康熙年间的张廷玉在所著的家训《澄怀园语》中写道“居官清廉乃分内之事”“为官第一要廉”。片言居要，张廷玉对廉洁的重视，由此足见。

上述典型案例，仅管中窥豹，然足以揭示中国传统家规中所强调的重廉理念是为官之德的核心要义之一。

（二）中国传统家规倡导为官之德要尽忠

中国传统家规倡导为官之德要尽忠，并分别回答了向“谁”尽忠及如何尽忠两个问题。

关于向“谁”尽忠。《孔氏祖训箴规》的制定者孔尚贤在袭爵之初立下了“上不负国恩”的志向。寥寥数字如淬火青锋，将对国家的忠注入了孔氏家族的族魂。客家家规将“忠信”刻进土家楹联，其中的“忠”指的就是要为国尽忠尽责。晚清时期的张之洞在《续辈诗》中写道“仁厚遵家法，忠良报国恩”。张之洞的主张昭然可见：不论是为官还是为民都要报效国家做忠良。朱熹在晚年留给后世子孙的《朱子家训》中写道“臣之所贵者，忠也”“为官心存国君，岂计身家”，点明了要对君主和国家尽忠。清道光年间，胡林翼的父亲在胡林翼初入仕途时，就鞭策他“赤心事上，忧国如家”。入仕后胡林翼更是以“吾辈做官如仆人看家”自省警人。胡氏家族对“忠”的理解，其意自明。

关于如何尽忠。明代时期的陈继儒在撰写的《安得长者言》这部家训著作中，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任事者，当置身利害之外”的劝训之言，用诚恳的箴言道尽了为国效力要忠于使命、超然私利之本色。通观南宋时期胡铨所著的《芗城胡氏家规十条》，容易发现“忠”乃家规精魂。其中明训：“凡有隶籍者，无论绾一半通”“以佐圣明，是之谓忠”。胡铨临终前更遗训子孙“立身忠孝门，传清白家规”。胡氏家族主张的“仕则忠”理念，由此获得了有力的印证。林则徐在家书《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中，谆嘱后世子孙“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诸葛亮亦垂训子孙“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二者虽代远时移，但以身许国、竭忠尽智之志，实乃异口同声。

简言之，中国传统家规中的为官之德回答了尽忠的对象是封建制度之下的君主、国家，指明了尽忠就是要做到“置身利害之外”、忠诚履职、以身许国。

（三）中国传统家规主张为官之德要爱民

明代时期的袁了凡为后人留下了《了凡四训》，其中袁了凡告诫其子袁俨“大人之学，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值得称道的是，袁俨也不负父亲的期望，做到了“劳瘁呕血，犹亲如民”。门风世继，袁氏家族的家规中所主张的爱民是为官之德，堪称是袁氏家规的生动注脚。王渔洋在撰写的《手镜》箴言五十条中写道“居官以得民心为主”，他“洁己爱民”的理念，由此昭示。乾隆年间的郑板桥在为官期间创作了“雅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的诗句，在其辞官回乡时，百姓遮道挽留、画像以祀是郑板桥为官爱民的最好注脚。丁宝桢在《丁文诚公家信》中将自己为官做人的理念铁诚后嗣，他嘱教道“不可妄取民间一钱”，做官要爱民养民。他在致子丁林常的书信中，更是明言出仕乃“志在君民”。丁宝桢以言行诠释了爱民是仕宦者报效国家的第一要务这一箴言。宋朝时期吕祖谦的伯祖父吕本中在《舍人官箴》中向后世子孙阐述了当官者应惠泽百姓的理念，他垂训后人“当官处事……求其所以使民省力”。宋代的理学大家程颐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的千古官箴，铮铮之言将为官要“以民为本”的理念彰显得淋漓尽致。明清时期的顾炎武虽终身未出仕做官，却立下了“拯斯民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的誓言。他勉励自己的三个外甥要“时刻不忘百姓，敢于自托于鲁儒”。北宋时期的范仲淹一生跌宕，却为后世子孙留下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为官铁律。五代十国时期的钱镠，根据自身的躬行实践，精辟地总结出了“民为邦本”的鲜活家训，历经淬炼的真知灼见为子孙后代为官从政铸就了宝贵的精神基业。

一言以蔽之，中国传统家规视爱民为为官之要德，将其视为为官从政的根本准则。

三、中国传统家规中为官之德的当代启示

从内容上看，中国传统家规中为官之德包括精华和糟粕两个部分。在新时代，我们要结合时代特点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一）结合时代特点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家规中为官之德的精华部分

虽然时过境迁，但不可否认，中国传统家规中所倡导的为官之德——重廉、尽忠、爱民，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

一是关于重廉。重廉是中国传统家规中为官之德的重要关注点。其中所强调的“廉于自律”“廉洁奉公”“以俭养廉，以俭助廉”等理念，不仅深刻体现

了中国传统的为官之德，更为当今领导干部涵养为官之德提供了宝贵借鉴。

回溯历史，可以看到，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始终高度重视党内的廉洁问题。历史上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反“四风”等历史事件，是我们党正本清源的真抓实干。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持续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等，则是我们党在新时代重廉的真实写照。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廉洁是对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要求，是官德的重要内容”[3]37。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要“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其中“干净”就是廉洁[5]。综上所述，廉洁是新时代领导干部为官的永恒底色。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时代廉洁所规范的对象已经从中国传统家规中主要针对的“为官者”“仕途者”等拓展到了全体党员。在传承方式上，廉洁不仅通过家规等柔性约束得到了延续,更实现了制度化的发展。其主要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规定》等法规的制定和实施。

二是关于尽忠。“尽忠”是中国传统家规中为官之德的重要方面。今天，“尽忠”所指的对象早已随着时代发展而升华，其践行方式也更为丰富和具体。

从“尽忠”所指的对象上来看，中国传统家规中“尽忠”所指的对象是君主和国家。在新时代，“尽忠”所指的对象是党和人民。这里的党指的是党的组织和原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对党尽忠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6]应关注的是，对党忠诚也意味着要对人民忠诚。因为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一分子，就是要忠诚于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谋福利。

从“尽忠”的方式上来看，中国传统家规主张“尽忠”的方式是“置身利害之外”，这对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对党忠诚，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有条件的而是无条件的”[7]，这与中国传统家规中强调的超脱个人得失一脉相承，但更实现了质的飞跃：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并以实干践行忠诚。

三是关于爱民。爱民历来是中国传统家规中为官之德的重要基石。今天，这一理念穿越时空，仍然是衡量为政者德的关键标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为民’是官德的核心”。纵观历史，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历程中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永恒宗旨。在人类社会制度的演变过程中，“为人民服务”也成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

总之，中国传统家规中为官之德所主张的“重廉”“尽忠”“爱民”等理念，可谓是历久弥新的智慧结晶，新时代提升领导干部的为官之德可以从中获得镜鉴和启示。

（二）剔除中国传统家规中为官之德的糟粕部分

审视中国传统家规中的为官之德，不难发现，其中包含着一些封建糟粕。因此，当下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善于对中国传统家规中为官之德所包含的糟粕进行批判性的扬弃。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中国传统家规中为官之德所强调的“重廉”，所约束的对象只是家庭家族中的为官者，对家庭家族中非为官者及社会中其他成员的约束作用是有限的。第二，中国传统家规中为官之德所提倡的“尽忠”，其指的对象是封建制度之下的君主、国家。因此，难以规避后来民本思想之染。第三，中国传统家规中为官之德所主张的“爱民”，深受腐朽封建制度的影响，存在等级贵贱之分。此外，中国传统家规中所关注的“爱民”为官之德，如“泛爱众”“济世救民”等理念具有理想化色彩。

总而言之，中国传统家规中的为官之德，既深受封建制度的影响，也深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影响。以史为鉴，在新时代我们要对中国传统家规中为官之德的糟粕部分进行扬弃，以推动新时代为官之德的发展。

四、结语

一言以蔽之，在新时代，我们要辩证地看待中国传统家规中的为官之德。继承和弘扬其中的精华部分，剔除其中的糟粕部分，并在此基础上，为新时代的为官之德注入新的内涵。

参考文献

[1] 李成萍 . 中国传统家规的内涵、特点及当代启示 [J]. 大众文摘 ,2024(10):94-96.

[2] 许慎 . 说文解字 [M]. 北京 : 中华书局 2013(07): 305,37.

[3]习近平.用权讲官德交往有原则[J].求是, 2004(19): 36-37.

[4] 新编现代汉语词典编委会 . 新编现代汉语大词典 [M].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3(05):1377,1710.

[5] 习近平 : 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EB/OL].(2019-01-15)[2025-08-28].https://www.12371.cn/2019/01/15/ARTI1547562750669417.shtml.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M]. 北京 :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769.

[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 第 2 卷 [M]. 北京 : 外文出版社 ,2017:189.

（作者系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新时代昌都红色资源赋能干部教育的价值转化机制与路径

马　帅

摘要：红色资源是我们党波澜壮阔革命历程的见证和宝贵精神财富。“红色昌都”拥有丰富的革命历史资源和光荣传统，是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被誉为西藏的“革命老区”。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干部教育面临锤炼干部政治品格和理想信念、提升实践能力以担当发展稳定重任的双重需求。应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将昌都丰富的红色资源转化为新时代干部教育的生动教材和精神动力，达到铸魂补钙、凝心聚力的作用，不断提高干部队伍的政治素养、党性修养和执政本领，实现红色基因在雪域高原的创新传承与时代价值转化。

关键词：红色资源；干部教育；价值转化；昌都；边疆民族地区

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伟大精神及其物质载体的总和，涵盖无形的革命精神财富和有形的革命遗址、文物史料等载体[1]。这一概念既强调红色资源的历史生成语境和精神——物质双重属性，也凸显其现实开发利用价值，为红色资源赋能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点[2]。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党和国家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要求我们“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因此，充分挖掘红色资源蕴含的精神内涵并运用于教育实践，是新时代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途径和重大使命[3]。

昌都是西藏和平解放的开篇地，地处川滇藏结合部，拥有极为丰富的革命历史资源和光荣传统，被誉为西藏的“革命老区”。昌都现存近 60 处重要革命遗址，包括战役遗址、烈士陵园、革命旧址和纪念设施等，承载着各族儿女跟党走、谋解放的红色记忆和精神血脉。例如，岗托十八军军营旧址记录了军民生死与共的动人故事，芒康“十五勇士纪念馆”铭刻了藏族青年支援解放的英勇事迹，生动诠释了军民团结一家亲的民族团结精神和各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主义精神。作为昌都红色文化精髓的“老西藏精神”，集中体现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优良作风，成为新时代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初心使命的生动教材。总之，昌都红色资源所承载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民族团结进步精神具有超越时空的教育价值，对于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具有独特作用。

一、红色资源赋能干部教育的时代需求与转型背景

新时代干部教育呈现政治要求更严、能力要求更高、方式要求更新的新特征，需要在供给侧推进系统改革创新[4]。政治上，必须把坚定理想信念摆在首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用常态化长效化的理论武装教育引导干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绝对忠诚。能力上，要培养干部练就“八项本领”“五大能力”，特别是胜任边疆复杂局面的专业素养和实战本领，改变过去偏重理论灌输的倾向，强化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训练，做到学用结合、知行合一。培训方式上，要顺应“80 后”“90 后”干部终身学习和多元化发展的特点，运用案例教学、情境模拟、网络课堂等多样化手段提高吸引力和实效性。

对于西藏这样的边疆民族地区，干部教育还肩负着特殊的政治使命和社会责任。一方面，要突出对党忠诚和民族团结教育。反分裂斗争形势复杂严峻，达赖集团等分裂势力持续干扰，破坏西藏地区稳定，各级干部必须在政治上绝对可靠，旗帜鲜明地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这需要加强党性锻炼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使各族干部把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转化为行动自觉。例如，昌都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干部培训主线，把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内容纳入党校课堂和党性实践，引导干部牢固树立“三个离

不开”“五个认同”思想[5]。另一方面，要弘扬实干作风和群众观点。西藏自然条件艰苦、发展基础薄弱，需要干部发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主动到基层和艰苦地区经受锻炼、增长才干。在新时代“数字西藏”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课题下，还应增加现代治理技能、科技文化知识和民族宗教政策法规等培训内容，提升干部适应边疆复杂环境的能力。可见，新时代边疆干部教育既要对标中央要求锻造政治忠诚，又要紧贴本地实际增强能力本领，实现政治过硬与本领高强相统一。红色资源作为承载革命精神和治边智慧的宝贵财富，是联结上述两大需求的重要纽带，充分用好红色资源将更有效赋能新时代边疆干部教育。

二、昌都红色资源融入干部教育的实践现状与挑战

近年来，昌都市依托自身丰富的革命历史资源，将红色元素融入干部教育培训，取得了一定成效。通过修缮革命遗址、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现场教学点，构筑了干部党性教育的生动课堂，如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江达县岗托十八军营旧址等已成为常态化教学基地。各级党校将昌都解放史、“十八军进藏精神”“两路”精神等纳入干部培训必修课，并组织学员赴现场聆听革命后代讲述和体验情景教学，使干部深刻认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西藏。

但总体而言，昌都红色资源赋能干部教育仍存在开发利用不深、形式手段单一等突出问题，有待进一步改进提高[6]。一是资源挖掘深度不足，目前多停留于浅层参观瞻仰，对红色资源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的深度解读不够，难以触及干部思想灵魂。二是教学方式比较单一，主要采用集中参观和聆听讲解，互动体验不足，现代信息技术在红色教学中的运用不够，难以适应年轻干部的学习需求。三是师资和教材力量薄弱，本地既懂党史又通晓藏汉双语的教师匮乏，高质量的昌都红色教育教材和案例库尚未建立，教学缺乏本土特色和生动性。四是制度保障和长效机制不完善，红色教育融入常态化培训缺乏硬性制度，一些单位存在“一阵风”现象；红色教育基地共建共用机制不健全，基地维护管理和经费保障不足，高海拔偏远等客观因素也影响了现场教学的经常开展。五是区域协同开发不够，昌都各县（区）红色资源统筹整合不足，与毗邻的四川、云南等地缺乏联合开发和合作平台，跨区域红色研学线路尚未打通，红色教育辐射带动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三、红色资源价值转化的理论机制：政治引领、文化转化与实践嵌入

针对上述问题，有必要从理论上探究红色资源向干部教育价值转化的内在机制。所以，红色资源赋能干部教育可以从政治引领、文化转化、实践嵌入三个维度来实现价值转化。

首先，政治引领侧重以红色资源铸魂引志。坚持党对红色教育的领导，把准政治方向，防范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突出理想信念教育，用革命先辈坚守信仰、不怕牺牲的事迹和庄重的红色仪式激发干部的信仰力量，使红色精神内化为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达到补钙壮骨、固本培元的效果。

其次，文化转化强调以红色文化润心铸魂。深入研究红色历史并凝练革命精神话语，将昌都十八军进藏等红色故事提炼出具有时代感召力的主题，纳入干部教育理论体系。系统开发红色教材课程，编写昌都革命斗争史读本、红色故事汇编等本土教材，并将昌都解放史、“红色精神谱系”等设置为系列教学模块，丰富党性教育内容。创新传播方式，利用文艺创作和融媒体手段讲好红色故事，如创作红色题材歌曲、舞台剧，制作革命历史情景微视频等，让红色价值观春风化雨般融入干部群众思想。通过文化载体的潜移默化，引导干部将红色基因内化为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

最后，实践嵌入旨在以红色资源强技赋能。将红色教育贯穿干部培养全过程，使学员在干中学、学中干，通过实践锻炼把信念转化为行动、把精神转化为能力。一方面，嵌入现场教学，采取沉浸式、体验式方法增强党性锻炼。例如沿昌都“十八军进藏路线”设计情景教学，让干部徒步重走进藏路，在艰苦环境中体悟革命先辈之精神；又如在革命旧址组织学员角色扮演，再现历史场景，借鉴云南红河州的经验可有效激发学员共鸣[7]。另一方面，嵌入岗位历练，推动学用结合。如在党性教育专题培训中安排学员赴基层艰苦地区挂职锻炼、“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在实践中磨炼作风、增长才干；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让学员以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检验学习成效。与此同时，健全长效机制，将各级党组织开展红色教育情况纳入党建考核，在干部任职培训必修课程中明确党史和革命传统教育学时，建立党校与红色教育基地共建共享机制，实现资源共享、师资互派、课程联动，保证红色教育常态化开展。通过政治引领、文化转化、实践嵌入有机结合，红色资源蕴含的信仰之魂和精神之钙才能全面转化为新时代干部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源泉。

四、昌都红色资源赋能干部教育的创新实践路径

（一）打造沉浸式教学场域，深化现场体验教学

充分利用昌都众多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开展情景模拟教学，如在“昌都战役”旧址组织学员分角色重演历史片段，使其切身感受革命艰辛；复原岗托十八军军营旧址的部分场景，设置负重行军等体验项目，锤炼学员意志品质。运用 VR/AR 等数字技术增强沉浸感，如制作昌都解放战役 VR 影片、开发红色研学数

字课程，让年轻干部随时随地沉浸学习。通过从“看一看”升级到“演一演”“做一做”，激发学员情感共鸣和理想信念。

（二）构建红色研修课程体系，系统融入党校教学

围绕干部党性教育目标模块化设计课程，将理想信念、爱国主义、民族团结、作风担当等红色教育内容系列化纳入培训课程。组织本地党史专家编写《昌都革命史纲要》《红色故事选编》等特色教材，并开发多媒体课件方便教学。创新教学方法，运用启发式研讨式教学和翻转课堂、情景模拟等手段，提高学员参与度和自主思考能力。加强“双语”师资培养，选派优秀青年教师赴内地干部学院进修，邀请老党员和党校专家联合授课，提升红色教育教学水平并扩大覆盖面。通过完善课程、教材、师资体系，实现红色资源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三）推动区域协同开发，打造红色教育联盟

加强与毗邻川滇革命老区的合作，联合开发跨区域红色研学线路，如将红军长征过康藏与昌都解放战役串联为专题教学路线；共建红色教育联盟，推进教材开发、师资培训、基地互认等资源共享，提升区域红色教育的影响力。统筹市县红色资源，建立昌都红色教育信息平台，发布研学线路和课程清单，便利各单位按需选用；定期举办县际联学共建活动，如沿“十八军进藏路线”组织联学，增强各族干部认同和视野。通过市域整合与跨区域合作，形成“大红色教育圈”，以更大格局提升昌都及周边红色教育质效。

（四）深化红色资源综合开发，实现教育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

树立“大红色”观念，将红色教育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一是发展红色研学旅游，在确保庄严氛围的前提下向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开放干部红色教育基地，设计“走进昌都红色热土”等研学线路，既对学生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又带动交通食宿等服务业发展[8]。二是服务乡村振兴，将红色资源开发与新农村建设融合推进，在红色遗址所在乡村优先完善基础设施和特色产业，发展红色乡村游，让农牧民分享旅游收益。鼓励革命烈士故乡打造红色文化村，聘用本地群众担任基地讲解员和管理员，既提供就业又增强他们对红色历史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三是繁荣红色文化创作，支持文艺工作者深入挖掘昌都红色题材，创作小说、影视、歌曲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将昌都解放、平叛、建设等历史故事搬上荧幕和舞台，通过大众传媒传播红色记忆，营造全社会传承红色基因的浓厚氛围。这不仅潜移默化教育了干部群众，在创作过程中整理的史料和涌现的人才也为干部教育提供了鲜活教材和师资储备。通过综合开发利用，红色资源价值得到全面释放，既赋能干部教育，也助推地方发展，实现以教育促发展、以发展强教育的良性循环。

五、结语

西藏昌都蕴藏的丰富红色资源，浸润着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各族人民争取解放和建设新生的光辉史诗，是新时代培养高素质干部队伍的不竭动力源泉。站在新的历史征程上，昌都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和干部教育方针，积极探索红色资源赋能干部教育的有效路径。从科学界定红色资源内涵、深刻把握干部教育新需求入手，昌都初步构建了政治引领、文化转化、实践嵌入相结合的价值转化机制，并以沉浸式教学、课程体系建设、区域协同开发等创新举措不断丰富实践成果。事实证明，只要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以红色文化为滋养、以实践锻炼为途径，红色资源就能在干部教育中焕发出强大的时代光芒，转化为干部对党忠诚、为民担当的赤诚情怀和过硬本领。这既是对革命先辈的最好告慰，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随着政策保障日益完善和实践经验不断积累，红色资源在新时代干部教育中的价值转化必将迈上新台阶，在雪域高原赓续红色血脉、培养时代新人，谱写出新的篇章。

参考文献

[1] 胡松，杨宇光，朱小理．“红色资源”的界定及其转化的必然性 [J].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9(05):73-76.

[2] 李贤海，李文瑞．“红色资源”概念界定的思考 [J]. 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2(03):19-23.

[3] 葛辉彰，刘大虎．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国防教育的透视与反思 [J]. 教育教学论坛，2025(06):41-44.

[4] 张宜军．依托红色资源提升党员干部教育实效的路径探析 [J].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5,24(03):9-15.

[5] 毛燕群．红色资源融入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的创新路径 [J]. 黄金时代，2025(23):72-74.

[6] 丁翠翠，图登克珠．西藏红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表征与影响因素 [J]. 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8(01):189-196.

[7] 石晶，谢军．新时代红色资源融入党性教育的多重逻辑及实践遵循 [J].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24,17(03):106-113.

[8] 石志丹．青年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中红色文化资源开发与运用分析 [J]. 现代商贸工业，2024,45(13):167-169.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委党校校级青年课题“昌都红色资源赋能新时代干部教育：价值转化路径与创新实践研究”。

（作者单位：中共昌都市委党校）

微信融合并发症体验式健康教育在中年高血压患者中的应用研究

周燕燕　齐洋洋　王宁宁　孙小丽 *

摘要：全球公共健康领域正面临高血压的严峻挑战，我国高血压发病率呈逐年攀升态势，本研究探究微信融合并发症体验式健康教育对中年高血压患者治疗态度与信念及自我管理水平的作用效果。运用便利抽样的方式，选取 2024 年 6 月—8 月在新疆克拉玛依市某三甲医院的 88 名患者进行研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44 名。健康宣教后，观察组患者在治疗态度与信念、自我管理水平方面的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同时，观察组患者的血压水平低于对照组（P＜0.01）。微信融合并发症体验式健康教育有效改善患者的治疗态度与信念，规范其自我管理行为，有效控制血压水平，进而改善疾病的预后情况。

关键词：中年；高血压；微信；并发症体验式；健康教育

相关数据统计，全球范围内约有 10 亿的成年人被高血压问题困扰，这一数据几乎占到全球成年人口的四分之一，并且，高血压患病人数仍呈上升趋势 [1-2]。如今，高血压已成为全世界公共健康领域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高血压在中国的发病率逐年攀升，在目前慢性病中发病率最高 [3]。中年群体作为家庭的核心支柱，肩负着家庭与社会赋予的重要责任。然而现实中，中年群体不仅面临工作任务繁重、加班常态化的职场压力，生活中还常存在吸烟饮酒、频繁熬夜等不良生活习惯，体重超重、长期焦虑等问题突出，导致中年人群患高血压的风险加大，且呈现出发病年龄日趋年轻化及发病率不断攀升的态势。鉴于此，针对中年高血压患者开展防治工作显得尤为关键。目前，国内高血压健康宣教一般以讲座、出院指导、广播、视频、制作宣传栏、发放宣教手册、随访等方式为主，花费大量的财力和人力，但取得的效果不佳。众多研究显示，积极有效的健康宣教，可以让高血压人群重视自身健康，增强其治疗态度与信念，提高自我管理行为，对于病情的稳定与改善具有积极意义 [4]。因此，本文主要讨论微信融合并发症体验式健康教育对中年高血压患者治疗态度与信念以及自我管理行为所产生的影响。

一、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运用便利抽样的方式，选取 2024 年 6 月—8 月在新疆克拉玛依市某三甲医院的 88 名患者进行研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44 名。

1. 纳入标准

符合高血压诊断标准；年龄：45~59 岁；生活可自理，行走功能正常；能正常运用微信软件。

2. 排除标准

已出现心脑肾眼等并发症的高血压人群；有精神病史的人群；有认知障碍的人群。

对照组包含男性 30 人、女性 14 人，年龄处于 45 至 59 岁区间，平均（52.15±1.26）岁；婚姻状况中已婚 36 人，离异或丧偶 8 人；从教育经历来看，初中及以下教育经历 11 人，中专或高中教育经历 10 人，大专教育经历 15 人，本科及以上教育经历 8 人；职业中公职人员 10 人，工人 20 人，其他职业 14 人；家庭月平均收入：小于 4000 元 12 人，4000~6000 元 15 人，大于 6000 元 17 人；有医保 34 人，自费 10 人；吸烟 21 人，不吸烟 23 人；饮酒 20 人，不饮酒 24 人；服药种类：1 种 36 人，2 种及以上 8 人；病程：1~10（5.33±0.61）年；并发症个数：没有并发症 23 人，1~2 个 13 人，≥3 个 8 人。

观察组中男 29 人、女 15 人，年龄范围在 45 至 58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52.18±1.33）岁；婚姻状况中已婚 37 人，离异或丧偶 7 人；教育经历方面：初中及以下教育经历 10 人，中专或高中教育经历 11 人，大专教育经历 16 人，本科及以上教育经历 7 人；职业中公职人员 10 人，工人 21 人，其他职业 13 人；家庭月平均收入：小于 4000 元 13 人，4000~6000 元 15 人，大于 6000 元 16 人；有医保 35 人，自费 9 人；吸烟 22 人，

不吸烟 22 人；饮酒 21 人，不饮酒 23 人；服药种类：1 种 35 人，2 种及以上 9 人；病程：1~10（5.29±0.63）年；并发症个数：没有并发症 22 人，1~2 个 14 人，≥3 个 8 人。两组资料经统计分析 $p > 0.05$。

（二）方法

本研究方法已通过医院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审核与同意，伦理编号：YL-2024-94。

对照组运用常规健康宣教：患者分别在干预前、干预 1 个月后、2 个月后、3 个月后接受高血压健康宣教，心内科医师以口头宣讲的方式进行。健康教育内容安排如下：干预前讲述高血压的发生机制和高血压的危害及并发症；干预 1 个月后给患者及家属讲述高血压用药、运动及饮食方面的知识；干预后第 2 个月介绍血压计使用要点及家庭血压监测要点；干预后第 3 个月传授高血压自我管理的相关知识。

观察组：在常规健康教育基础之上，开展基于微信平台融合并发症体验式健康教育模式。

1. 微信健康教育内容

成立微信宣教团队：团队人员包括医师 2 人、护士长 1 人及护士 6 人，团队人员具有良好的表达与沟通协调能力，项目启动前须进行统一培训，完成分工并明确职责。搭建微信交流平台：在研究开展前期，指导患者加入预先建立的高血压健康教育微信交流群。内容整理与推送：安排 6 名护士广泛查阅最新指南、文献及书籍，梳理汇总出高血压的健康宣教知识，交由专家审核后确定宣教内容。由管理员通过微信群每周定时推送，患者可以在群内学习相关知识并积极发表观点。同时，管理员每周统计患者提出的问题。医护互动指导：医护人员在微信群内及时为患者答疑解惑，温馨提示患者按时用药、定期测量血压、低盐低脂健康饮食，保持戒烟限酒、适量开展运动锻炼的健康生活方式，患者可以在群内分享自我健康管理的方法及感受。

2. 并发症体验式宣教内容

由于高血压的并发症较多，本研究通过查阅最新文献并综合考量人财物等方面，最终确定三个体验项目：体验模拟冠心病症状；体验模拟脑卒中偏瘫症状；体验模拟高血压致视物模糊的症状。

3. 并发症体验式宣教实施方法

体验前由项目研究者向患者讲解体验的目的、意义及穿戴体验工具的注意事项，并询问患者身体有无出现发热、腹泻及呕吐等不适症状，如身体有不适，提醒实验者等康复之后再进行体验活动。高血压并发症模拟体验工具的使用方法具体如下：体验模拟冠心病症状：要求患者穿戴模拟冠心病症状的马甲，为了模拟冠心病症状胸部及背部的压迫感，根据患者体型尽量拉紧马甲的紧束带，并在患者胸部位置放一个两公斤左右的盐袋或水袋。体验模拟脑卒中偏瘫症状：让患者穿上偏瘫体验服，缓慢行走保持直线至少 12 米，随后再徒手开矿泉水一瓶，体验脑卒中偏瘫引起的行走不便及肢体活动受限。体验模拟高血压致视物模糊的症状：让患者戴上特制的磨砂眼镜，指定其阅读至少 5 行文字或者用手机给其他人发消息，从而感受视物模糊所带来的不方便与不舒适。每位患者体验完成后，体验工具严格按要求进行清洁和消毒，检查无误后，再为下一位患者进行体验，预防交叉感染。研究对象每次仅体验一个项目，每周进行一次，分三次完成全部体验 [5]。完成体验项目后与患者进行交流，记录患者对体验项目的感受与反馈。

（三）观察指标

1. 治疗态度与信念

在健康教育实施前后，运用高血压治疗态度与信念评价量表对两组患者的治疗态度与信念进行评估。此量表共包含 21 个条目，采用 5 分制计分规则，具体为“完全赞同”计 1 分、“赞同”计 2 分、“不确定”计 3 分、“不赞同”计 4 分、“完全不赞同”计 5 分，量表总分范围在 21~105 分之间，得分越高则表明患者的治疗态度与信念水平越高。该量表整体的 Cronbach’s α 系数达到 0.804，重测信度系数为 0.922，显示出该量表具备良好的信度与效度 [6]。

2. 自我管理行为

在健康教育实施前后，运用高血压患者自我管理行为测评表来评估患者的自我管理行为状况。此测评表涵盖 31 个条目，采用 5 分制计分规则，具体为“从不”对应 1 分、“很少”对应 2 分、“有时”对应 3 分、“经常”对应 4 分、“总是”对应 5 分，量表总分范围在 31 ~155 分之间。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14，测评得分越高，则表明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水平越强 [7]。

3. 血压

在健康教育前与健康教育后，应用指定的血压计（型号：欧姆龙 U720）对患者的收缩压与舒张压进行测定。

（四）统计学方法

运用 SPSS 25.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 标准差表示，组间差值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P < 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一）治疗态度与信念比较

两组中年高血压患者治疗态度与信念比较，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态度与信念比较（分，$\bar{x} \pm S$）

组别	n	干预前	干预 3 个月后
对照组	44	65.98 ± 13.99	75.75 ± 13.42
观察组	44	63.95 ± 16.15	83.59 ± 15.66
t 值		0.628	–2.522
P 值		0.532	0.014

（二）自我管理行为比较

两组中年高血压患者自我管理行为比较，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自我管理行为比较（分，$\bar{x}$ ±S）

组别	n	干预前	干预 3 个月后
对照组	44	106.61 ± 19.29	113.43 ± 16.07
观察组	44	105.39 ± 23.41	125.25 ± 17.09
t 值		0.268	–3.342
P 值		0.789	0.001

（三）血压水平比较

两组中年高血压患者血压水平比较，见表 3。

表 3　两组患者血压水平比较（mmHg，$\bar{x}$ ±S）

组别	n	收缩压		舒张压	
		干预前	干预 3 个月后	干预前	干预 3 个月后
对照组	44	158.07 ± 5.98	148.91 ± 5.55	93.07 ± 5.98	85.91 ± 5.55
观察组	44	158.91 ± 5.50	140.77 ± 6.37	94.07 ± 5.61	82.07 ± 5.54
t 值		–0.686	6.390	–0.809	3.249
P 值		0.494	0.000	0.421	0.002

三、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历经 3 个月的健康教育干预后，观察组在治疗态度与信念、自我管理行为方面的得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05），同时收缩压与舒张压水平均低于对照组（P ＜ 0.01）。结果显示，微信融合并发症体验式健康教育可以增强患者的自我管理行为、转变其治疗态度与信念，并有助于降低血压水平，进而实现对病情的有效控制。

深入剖析其原因可能在于：传统常规的健康宣教一般是制作宣传栏普及健康知识，给患者发放宣传手册，口头讲解高血压用药、饮食、运动等方面的相关知识。常规宣教模式患者是被动接受知识，参与积极性不高，他们接受的知识比较零散、容易遗忘，而且患者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和指定的场所学习高血压相关知识，难以让患者将所学知识运用于生活中。健康教育的方法存在较大局限性，最终导致教育效果不尽如人意。因此，亟须探索一种不受时间和空间约束的全新的健康宣教模式 [8-9]。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水平的不断革新，互联网及人工智能技术在现代医疗服务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临床护理服务中，开始运用 QQ、微信及钉钉等平台对患者开展远程健康管理、健康宣教以及出院后随访等工作，收获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微信是大众普遍认可的社交媒介，具有便捷、高效的优点，可以打破时间和空间局限性，通过微信群交流的方式掌握患者的病情，对患者提出的问题进行及时解答，普及健康知识，长期对患者实施护理干预，监测其病情，有利于血压水平的控制 [10]。

研究显示，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水平与其依从性行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控制血压水平的重要因素是合理饮食、适量运动、正确用药及定时监测血压等。同时，患者的治疗态度与信念和服药依从性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本研究创新性地采用微信结合并发症体验式健康宣教模式，目的是增强患者的自我健康管理意识。其一，建立高血压健康教育微信群，可以在微信群中定时发布高血压自我管理的相关知识，方便患者在群内开展沟通交流，有疑问可以随时咨询。其二，通过让患者体验高血压的三种并发症活动，使患者深刻认识到高血压引发并发症的严重后果，深刻感受到疾病可能带来的严重威胁，打消侥幸心理，进而意识到严格遵循医嘱用药、保持健康饮食以及进行适当运动的重要性。通过线上线下有机结合的方式，有效改善患者的治疗态度与信念，规范其自我管理行为，指导患者开展健康的生活方式，最终达到控制血压水平的目的。

总之，微信融合并发症体验式健康宣教模式，在增强患者的治疗态度与信念、规范其自我管理行为以及降低患者收缩压和舒张压等方面具有显著效果。未来可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增加样本量，开展多中心的调查研究，以期取得较好的研究结果。

参考文献

[1]ZHOU B,BENTHAM J,CESARE M D,et al.Worldwide trends in blood pressure from 1975 to 2015: a pooled analysis of 1479 population-based measurement studies with 19.1 million participants[J].The Lancet,2017,389(10064):37-55.

[2]O'BRIEN E.The Lancet Commission on Hypertension: addressing the global burden of raised blood pressure on current and future generations[J].Journal of Clinical Hypertension,2017,19(06):564-568.

[3] 王增武 , 王文 . 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 (2018 年修订版) 解读 [J]. 中国心血管病研究 ,2019,17(03):193-197.

[4] 徐婷玲 , 李靓 , 冯佳雨 , 等 . 基于重要性与可及性的高血压防控措施重要性——绩效分析决策模型构建 [J]. 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 ,2022,30(10):726-730.

[5] 练素英 . 线上线下融合式健康教育对中年高血压患者的干预效果研究 [D]. 福州 : 福建医科大学 ,2021.

[6] 唐红英 , 李敏 , 江敏 , 等 . 高血压治疗态度与信念评价量表的研制及信效度评价 [J]. 中华高血压杂志 ,2011,19(09):861-866.

[7] 赵秋利 , 刘晓 . 高血压病人自我管理行为测评量表的编制及信度效度检验 [J].中国护理管理 ,2012,12(11):26-31.

[8] 张珍 , 刘永艳 , 郁万慧 . 线上线下融合式健康教育对中年高血压患者依从性、健康行为及满意度的影响 [J]. 齐鲁护理杂志 ,2023,29(09):100-103.

[9] 谢小红 , 刘丹 , 熊慧 . 全程健康教育模式在 2 型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中的应用 [J]. 齐鲁护理杂志 ,2022,28(07):54-57.

[10] 马天骄 , 李秀丽 . 健康教育结合微信平台延续性护理对高血压患者的影响观察 [J]. 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电子杂志 ,2023,11(32):86-88.

（下转 104 页）

精神障碍群体社会排斥的社会工作干预策略研究

杨国玲

摘要：精神障碍群体的社会排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该群体面临的社会排斥类型主要有社会关系排斥、市场排斥、自我排斥等。社会工作致力于增进社会公平与福祉，通过开展有效的干预，可以创建包容性环境，提升精神障碍群体的自我效能感。本文主要阐述了精神障碍群体面临的社会排斥类型，分析了精神障碍群体社会排斥的社会工作干预意义，并从完善心理社会支持体系、构建生活技能训练模块、注重组织系统与资源整合、利用数字技术赋能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干预策略，进而为相关人员提供参考。

关键词：社会工作；精神障碍群体；社会排斥；干预

精神障碍群体社会排斥的社会工作干预具有多维度的现实意义，可以帮助服务对象重构自我认同，提升社会功能恢复能力，并重构家庭互动模式，缓解照顾者压力，降低社会治理成本。社会工作干预中，应积极建立健全心理社会支持体系。开发生活技能训练模块，并注重组织系统与资源整合，搭建社区资源共享平台，开发过渡性就业岗位，建立企业—社工—康复者三方协作机制。此外，社会工作干预中还应注重数字技术赋能，开发人工智能陪伴机器人，建立区块链信用档案，并利用大数据应用平台绘制社会排斥风险日历图，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构建包容多元的精神健康友好型社会。

一、精神障碍群体面临的社会排斥类型与根源

（一）市场排斥

市场排斥是精神障碍群体面临的社会排斥的核心维度之一，主要本质是经济系统中结构不平等与个体能力否定的双重作用，其中资本主导的市场体系，将精神障碍视为高风险变量，通过排斥降低潜在损失。市场排斥中，将患者限制在低技能低收入岗位，阻断晋升通道；一些商家针对特殊群体抬高生活必需品价格，一些房产中介拒绝为其提供租房服务；网约车司机接单后得知病情会取消订单，这些表现都是市场排斥，这种排斥剥夺了患者的经济独立机会，通过制度性歧视，强化了其社会边缘化地位。

（二）自我关系排斥

否定自我效能感的丧失，使患者接受社会赋予的病人标签，会放弃原有的社会角色，比如疏远亲友。长期遭受否定后产生习得性无助，为保护自我，切断情感感知。自我关心排斥实际上是社会排斥的内在化结果，精神障碍群体会主动回避可能引发评价的场景，如拒绝求职、逃避社交活动[1]。根源主要是将社会偏见转化为自我批判，认为患病是道德失败或者经历多次住院治疗，形成对权威系统的恐惧和不信任；在人际互动模式中重要他人的消极期待，通过言语或非言语行为传递，削弱患者的自信心[2]。

（三）文化与符号排斥

文化与符号排斥是精神障碍群体面临的最隐蔽且深刻的社会排斥形式之一，这种排斥塑造了公众对精神障碍者的深刻印象，在日常话语中，人们会使用“神经病”“变态”等词汇作为侮辱性隐喻，将精神疾病等同于人格缺陷。一些影视作品，将精神障碍者塑造为暴力实施者，忽视其更多是受害者的事实。在文化与符号

（上接 103 页）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3 年新疆第二医学院科研基金项目“微信融合并发症体验式健康教育在中年高血压患者中的应用研究”（QK202303）；2025 年新疆第二医学院校级培育学科项目“护理学”（XKP202503）。

（作者：周燕燕，新疆第二医学院讲师；王宁宁，新疆第二医学院讲师：齐洋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克拉玛依医院心血管内科主管护师；通信作者孙小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克拉玛依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护师）

排斥中，一些新闻标题突出精神病患者肇事肇祸，没有及时报道康复者回归社会的正面案例，面对不可预测的精神症状，通过制造他者边界来缓解集体焦虑。

二、精神障碍群体社会排斥的社会工作干预意义

（一）促进个体赋能

精神障碍者常因疾病标签贴上危险、无能等刻板印象，社会工作干预通过提供心理咨询、教育咨询等方式，可以帮助精神障碍者更深入地了解自己，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和潜力；积极倡导去病理化视角，帮助服务对象重构自我认同，可以提高其自信心，使其更加自信地面对生活和社会。社会工作干预积极通过个案管理、心理辅导等方法，可以使个体重新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减少因长期排斥导致的自我污名化，促进自我接纳；针对有子女的个体社会工作干预，可以提供亲子教育、儿童心理辅导，避免排斥影响下一代。社会工作干预聚焦于生活技能、就业衔接等内容，通过艺术治疗、同伴支持小组等活动，可以使个体在安全环境下表达情感，使精神障碍者提高与他人沟通能力，进而更好地适应工作环境。社会工作干预的有效开展，可以打破障碍群体无能标签，增强个体独立生活能力，并及时提供创伤疗愈、正念解压等服务，缓解因排斥引发的焦虑、抑郁，降低复发风险。此社会工作干预可协助精神障碍者，找回失去的社会角色和归属感，通过宣传教育、倡导政策改革等方式，可确保其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待遇。

（二）家庭的支持性修复

精神障碍群体面临的社会排斥是制度性歧视与日常活动中的污名化共同作用的结果，长期照顾压力会导致家庭关系紧张、沟通模式僵化等，社会工作干预可以通过家庭治疗技术帮助成员识别并修复高情绪表达等风险因素，建立以共情为基础的支持系统[3]。社会工作者通过提供家庭治疗资源链接等，可以减轻照顾者的身心负荷，并积极开展家庭技能培训，提高患者居家康复的自我效能感，减少对社会化服务的依赖。社会工作干预协助家庭重新定义照顾者角色，从被动承担转为主动规划，可以以家庭为媒介传播去专业化的疾病知识，干预引导家庭从过度保护转向适度支持，鼓励成员之间建立平台沟通机制，组织家族倡导者参与公共教育，用真实故事消解社会公众偏见[4]。

（三）推动社会进步与文明发展

社会工作干预即通过个案管理、心理教育等方式，可以帮助精神障碍者重建自我，利用认知行为疗法可以纠正其被标签化的负面认知，增强抗逆性，而且通过职业康复项目，可以帮助患者恢复劳动能力，实现经济独立。社会工作者介入能分流精神科医院的长期住院需求，通过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等替代性服务，可以促使医院释放医疗资源，通过预防性干预将被动救治转化为主动健康，减轻医疗体系负担。社会工作组织公众科普活动，可以推动邻里参与式观察，逐步消解危险人群的误解；通过强调去机构化运动，倡导权力为本的服务，进一步体现对少数群体尊严的尊重。社会工作干预的本质是对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冷漠，社工主导的社区维稳干预，可以通过社会协作，解决弱势群体问题；当精神患者以志愿者、手工艺者等新身份参与社区事务时，可以发现其隐性技能，激活社会资本。

三、精神障碍群体社会排斥的社会工作干预策略

（一）构建完善的心理社会支持体系

社会工作干预中应建立生物—心理—社会三维评估模型，基于全面评估设定短期、长期目标，识别患者症状控制、就业能力、家庭关系等核心需求，针对急性患者提供医疗衔接服务，稳定期侧重职业技能重建，同时运用优势视角理论通过继续治疗，帮助患者重构自我认同，引入正念疗法、艺术治疗等非药物干预，提升情绪调节与社会功能。心理社会知识体系构建过程中，还应进一步协助获取医疗、住房补贴等信息和服务，构建去标签化的社区融合生态，及时响应复发风险或紧急困境；设立心灵驿站等半开放场所，提供日间照料、手工作坊等过渡性就业场景，并组建康复者志愿者联盟，参与社区环保、老年关怀等公益活动，重塑社会角色。此外，社会工作者应建立个案管理机制，通过个人生态系统计划评估个体的需求，开展基于优势视角的认知行为干预，关注患者重塑自我认同。

（二）重视生活技能训练

精神障碍群体社会排斥的社会工作干预中，应通过生活技能训练，打破该群体自我封闭社区排斥的恶性循环现象，社会工作者应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技能分类体系，重构基础设施能力，通过作息规划、财务预算等训练，帮助精神障碍群体建立稳定生活节律，针对易受诈骗群体采用情景模拟教学，培养其不轻信、多核实的安全准则。社会工作者应设计阶梯式社交技能训练，让精神障碍群体从角色扮演到真实场景进行模拟，如通过一对一模拟商店购物等，增强社会适应能力。在生活技能训练中还应开发社区生存技能清单，积极衔接手工制作基础性职业技能培训与求职面试模拟，引导该群体参与社区便民服务，比如分发宣传册，组织康复者代表分享会消除居民偏见，进而通过一系列的措施，确保技能训练的连贯性，促使精神障碍者通过能力重建，赋权个体突破社会排斥链。社会工作者应建立多学科评估团队，通过生理、心理、社会模式识别患者核心需求，针对高风险群体实施 24 小时危机干预；在技能重构、技能重建中应开发综合实验室项目，通过公交出行、超市购物的场景，结合 VR 技术缓解现实社交焦虑，在家庭重构方面设计家庭治疗、工作坊破除病耻感导致的家庭隔离。

（三）强调组织协同与资源整合

积极构建以组织系统为核心，资源整合为支撑的系统性路径，可以将精神障碍群体置于家庭、社区、社会政策多层系统中，识别各系统中的互动障碍，通过跨系统干预，打破排斥循环。社会工作干预中，应积极创建精神健康友好社区认证标准，包括物理环境改造，积极搭建社区资源共享平台，促使企业社会责任有效对接，并强化个体层面的自我效能感，促进群体间信任网络建设。在组织协同实践中，应推动地方政府出台反歧视就业条例，将精神障碍者纳入残疾人保护体系，明确企业按比例雇佣义务，建立医院、社区康复中心和日间照料站的分级转介机制，避免出院即断联。社会工作干预应注重多元主体的资源整合，反对大型封闭病院模式，积极推动分散式公寓住宿、独立居家等形式，与企业共建过渡性就业基地，提供包装、客服等岗位，可以与企业合作开发过渡性职业，设置简化流程弹性工时的入门级工作环境。复合型团队应定期接受反歧视培训，孵化患者自组织通过线上社群提供情感支持，尤其是在当前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可以创建微信群，方便随时提问请教，发布活动通知，在信息资源联通中积极制作短视频、漫画手册，用通俗语言解释疾病，并收集成功就业、创业典型案例，将其制作成宣传材料，供用人单位参考[5]。

（四）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干预

当前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为破解精神障碍群体社会排斥问题提供了新的干预路径。社会工作可以利用人工智能陪伴机器人进行情绪识别，训练机器学习算法基于历史案例数据预测个体入院风险和社会功能退化趋势，提前进入家庭关系调节、职业康复衔接等关键环节。相关人员可以开发精神障碍群体数字档案系统，整合社交媒体行为模式、医院诊疗记录等内容，进而识别潜在排斥风险，运用地理信息系统绘制区域资源热力图，动态监测就业歧视高发区等，为政策操作提供空间证据；还可以利用区块链技术建立信用档案，进而实现可验证的成就记录，并开发情绪识别工具，通过语音语调、文本语义分析，实时捕捉服务对象心理状态变化，触发危机干预机制。在当前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社会工作干预中应充分运用虚拟现实技术创建虚拟职场环境，通过模拟面试、团队协作等高压情景，帮助患者逐步适应社会规则，降低现实交往焦虑；利用数字化技术，搭建在线学习平台，整合微课视频、交互式课程，针对注意力缺陷、执行功能障碍设计定制化课程，并开发智能引擎匹配，实现服务需求与资源精准的有效对接。

（五）注重文化结构与意义重建

精神障碍群体面临的社会排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社会工作干预应从文化解构与意义重建入手，打破污名化叙事，即通过小组工作访、社区动态等形式，引导精神障碍者及其家属、医护人员共同解构病态、危险等标签化语言，可以邀请学者讲解精神病学史，充分挖掘本土文化中关于差异的包容性资源，积极对抗生物医学模式的单一解释霸权。社会工作干预中应积极发起重新定义正常的社会运动，积极培训精神障碍者成为故事讲述者，通过短视频、播客等媒介自主发声，用第一人称叙事解构他者视角。在意义重构中，应构建主体性认同与社会连接，应用艺术治疗、叙事疗法，帮助个体将疾病经历转化为生存智慧；可以组织生命线编织活动，鼓励参与者用不同颜色毛线标记人生低谷与转折点，在物理空间中具象化自我成长轨迹。社会工作者应开展团队辅助课程，构建生命意义工作坊，通过创建精神障碍者合作社，建立平等合作关系，打破受助者角色。相关部门应持续加强对社工的精神医学常识培训、高危情境处置演练，利用远程咨询 App 突破地理限制，利用数据分析工具精准定位高风险人群，通过共享电子病历提高效率。

四、结语

当前精神障碍群体社会排斥主要包含社会关系排斥、文化与符号排斥、自我排斥等，社会工作干预可以帮助精神障碍群体建立积极的自我认同，进一步构建包容性生态系统。具体的干预中，相关人员可以基于全面评估设定短期、长期目标，协助获取医疗管理、住房补贴等信息和服务，并开展日常生活自理、使用公共交通等实用训练；还可以邀请康复者讲述真实故事，增进公众了解。此外，社会工作干预中，应与企业合作开发过渡性职业，积极推广精神健康友好型职场认证标准，并创建微信群或论坛，方便随时提问请教发布活动通知，充分利用技术赋能，开发 AI 陪伴机器人，构建虚拟现实暴露治疗空间；绘制社会排斥风险热力图，建立动态监测预警系统等，进而通过一系列措施，实现精准化服务。

参考文献

[1] 高万红，师艺萌．家庭增能：促进农村精神障碍者社会融入的行动研究 [J]. 社会建设，2024,11(02):41-63.

[2] 姚进忠，陈梦琴．精神障碍患者复原力提升的社会工作干预研究 [J]. 残疾人研究，2023(03):66-78.

[3] 黄啟洋，冯婷．虚拟现实康复小组干预长期住院精神障碍患者自我效能感的研究 [J]. 社会福利，2023(06):44-51.

[4] 严云鹤，邱好．认知行为疗法在精神障碍患者中的个案应用 [J]. 中国社会工作，2021(09):26-30.

[5] 何晓红，刘新．精神障碍患者风险化解的社会工作干预研究——基于个案管理视角 [J]. 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21,42(03):21-26.

（作者单位：合肥市肥东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医学教育纵向研究数据库在解决社会医学问题中的应用

杨超男　曹　娟　程　坤　陈　亚*

摘要：医学教育纵向研究数据库既为社会医学研究提供完备的数据支持，有利于对长远走势加以剖析，也有力地推动不同学科融合的钻研进程。本文充分阐述了医学教育纵向研究数据库助力解决社会医学问题的重要意义，分析了其在实际运用时存在的诸多问题，如数据品质鱼龙混杂、数据共享同隐私保障矛盾明显、对数据分析的能力缺乏等，并对这些难点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方案。通过理论论述和大量实例相结合的方式，详尽分析该数据库在社会医学领域的应用情况和未来的走向，希望可以为改善数据库应用、改良社会医学问题的处理成效提供有用的借鉴，大力推动社会医学的研究和发展。

关键词：医学教育纵向研究数据库；社会医学问题；应用策略

社会医学属于交叉学科，主要关注人群健康和社会因素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致力于攻克健康不公平、慢性病防治、公共卫生体系优化等一系列复杂而重要的社会医学难题。在数字化时代，数据成为推动各领域发展的关键动力之一，医学教育纵向研究数据库汇集了从医学生踏入校园直至职业生涯发展的大量信息，包含个人基本状况、学业成绩、临床表现、职业发展路径等诸多方面。这些丰富数据如同一座蕴含巨大财富的宝库，为人们深入理解社会医学现象、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不过，将医学教育纵向研究数据库融入到解决社会医学问题的过程中，必定会遇到许多问题。仔细分析这些难题并找到真正可行的解决办法，对于最大限度发挥数据库潜力，推动社会医学向前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医学教育纵向研究数据库在社会医学问题解决中的意义

（一）提供全面数据支持

医学教育纵向研究数据库所涵盖的数据范围非常广，从医学生入学时的基本情况，如年龄、性别、家庭背景等，一直到在校期间的学习成绩、参与课程的情况、实验操作技能评定，再到进入临床实习阶段如何处理病例、与病人的交流方式，甚至毕业后选择从事的职业、工作表现等信息都存留其中。这些数据给社会医学研究提供了丰富又细致的素材。在研究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人群健康差别时，数据库里关于家庭背景方面的数据、医学生成长环境的信息以及他们在医疗过程中遇到的病人群体特征等资料相互联系起来，便于研究者从诸多角度剖析健康水平不等的原因。分析上述数据后，可以显示社会经济地位怎样通过影响教育机会、医疗资源获取情况、生活方式等因素，最终造成不同人健康状况存在很大差别。

（二）助力长期趋势分析

医学教育纵向研究数据库具有的独特之处明显体现其长时间跨度的数据记录特点，从医学生迈入校内开始一直延续到其完整的职业生涯。在这一过程中，数据库不断跟踪并且详细记录各种相关的信息。在医学生培养期内，数据库仔细收录其表现情况，涉及到各阶段的课程考试分数、动手操作实验室的能力等方面。比如，他们接触的临床案例种类，如何对患者进行诊断及治疗实践这样的临床实习内容，而在毕业后同样也记录下工作时遇到的情况。这种长时间、全方位的数据积累可以使研究者养成一种宝贵的能力，即可以对社会医学有关指标实施长久且动态的观察。凭借这些数据，研究者能够非常清楚地了解到不同阶段医学教育及实践对于从业者产生的影响，也能看到这些从业者在各自职业生涯里对社会医疗服务作出的贡献如何发生改变。通过动态分析，还可以了解社会医学领域的发展走向，从而为制定出科学有效的政策和干预手段提供有力支持[1]。

（三）促进多学科融合研究

医学教育纵向研究数据库包含医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这些学科的数据，各种学科数据的汇集形成一个理想的跨学科研究平台，冲破传统学科壁垒，

不同学科间的视角得以交流碰撞。在探究医患关系这一社会医学热门话题时，医学专业知识能帮助其认识医疗过程中的技术部分和病人的身体需求。在教育学方面的内容，包括医学生的交流技能训练成果等信息，有益于分析改善医学生和病人的交流水平。社会学角度涉及社会文化要素、社会阶层差别给医患互动带来的影响。其中的心理学知识可以用来探讨病人和医护人员的心理状况怎样影响医患关系。整合这些不同学科的数据和观点，研究者可以从多个角度去探究医患关系的本质，给出更为全面、有效的改善办法。这种多学科交融的研究方式既充实社会医学的研究手段和理论架构，又为解决社会医学问题带来新的思路，促使社会医学理论和实践持续向前迈进。

二、医学教育纵向研究数据库在解决社会医学问题中面临的挑战

（一）数据质量参差不齐

由于医学教育纵向研究数据库所收集的数据工作涉及众多不同机构与人员，加之时间跨度长，因此数据质量方面的问题突出。数据录入开始时，各个机构或许采用不一样的记录标准与格式，造成数据的一致性很差。随着时间推移，有些数据也许会因为存储介质老化或者系统升级等缘由而出现丢失或者损坏。对于某些重要的信息，医学生在特定临床操作里的详细表现记录等关键内容，也许会因为早期记录不完整或者后期保护不善而消失。而且，数据录入人员的专业水平和责任心也会影响到数据的准确性。因为存在人为失误，如数据录入错误或者小数点的位置点错等事情经常发生，这样的数据质量问题极大地影响数据分析结果的可信度，根据不准确或者不完整的信息得出的结论可能会对社会医学方面的问题作出错误判断或者决策，从而导致资源浪费和政策错误[2]。

（二）数据共享与隐私保护的矛盾日益凸显

在社会医学研究中，若想得到更为全面、精确的研究成果，常常需要多个机构之间展开数据共享。医学教育纵向研究数据库包含许多牵涉到个人隐私的敏感信息、患者详细的病历资料、医学生的家庭住址、联系方式等。这些信息如果被泄露出去，会给个人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隐私遭到侵犯，身份被盗用等危险可能发生。制定隐私保护法规以及伦理准则，目的在于保证个人信息的安全。在实际操作时，这些规定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数据的共享范围，各机构对于数据共享的审批程序和安全标准存在差别，使数据跨机构共享时受限[3]。

（三）数据分析能力不足

医学教育纵向研究数据库里有很多复杂数据，然而，数据分析技术与专业人才的储备却比较落后。很多社会医学研究者有很强的专业知识，但数据挖掘、统计分析等技术方面有所欠缺，他们也许精通传统的研究方法，但对于新的大数据分析工具和算法不太清楚，不能从大量数据中找出有用的信息，而且针对医学教育纵向研究数据库特点的数据分析方法和工具也不完善。这个数据库的数据结构比较复杂，里面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数据，目前，市面上常见的数据分析工具，在面对这种特殊的、复杂的数据时，常常感到无能为力。而且，数据的纵向性和关联性也让分析变得困难，必须专门设计出合适的算法和模型才能从中找到隐藏的规律。由于缺少有效的分析方法和工具，很多有用的数据被闲置，不能成为真正解决社会医学问题的信息。

三、医学教育纵向研究数据库在社会医学问题解决中的应用策略

（一）建立数据质量管控体系

对数据生产全过程中实施严密监督与持续改良，从而保证数据品质符合预先规定的水准有利于解决社会医学问题。故而应立足于数据规划、收集、录入、储存、利用等环节，通过制定明确的数据品质标准，创建有效的审核体系，并且执行及时的修正步骤，便可以全方位提升数据的精确性、完备性和统一性。

区域医疗协作网络在整合区域内医学教育纵向研究数据库时，可以依据质量管理理论，制定细致的数据质量标准手册。该手册针对各类数据的录入格式、取值范围、逻辑关系等做出详细规定，如患者出生日期应按“年 / 月 / 日”格式录入，疾病诊断名称要符合国际通用的医学术语标准。而且，组建由医学专家、信息技术人员以及数据管理人员构成的数据质量审核小组。在数据录入期间，审核小组会对新录入的数据实行即时在线审核。一旦察觉到不符合标准的数据，会立刻反馈给录入人员予以修正。针对历史数据，定时安排专门清理与修正工作，凭借数据比对、逻辑校验等手段，找出存在毛病的数据并加以处理。以某地为例，经过多年努力，该地数据库数据质量得以明显改善，依靠这些高质量数据展开的社会医学研究，在制定疾病预防策略，合理分配医疗资源等方面产生了重要作用，给当地居民的健康福祉提供有力保证。通过对准确的疾病发病数据以及医疗资源分布数据加以分析，合理调整基层医疗机构的科室设置和人员配备，从而提升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与有效性[4]。

（二）平衡数据共享与隐私保护

借助一系列技术手段，包含加密技术、匿名化处理、访问控制等，有助于解决数据泄露问题，在保障个人隐私的前提下达成数据安全共享的目的。加密技术会对数据执行加密处理，即便数据在传输或者存储时被非法取得，没有得到许可的人也不能解读其中的内容，匿名化处理会把数据里有关个人标识的信息加以替换或者删除。如此，数据就无法直接或者间接地识别出个人的身份，访问控制技术会严格约束对数据的访问权限，只有

得到许可的用户才可以在限定范围内访问并利用数据。

某医疗研究联盟想开展一项有关全球罕见病流行病学的研究，涉及到多国的医疗机构和研究机构的数据共享，要做到数据共享和隐私保护之间的平衡。该联盟采取先进的差分隐私技术，对医学教育纵向研究数据库里的患者数据执行匿名化处理。在数据共享前，研究人员会对原始数据加以扰动，通过添加噪声等方式，使共享数据保留总体统计特征，却不能识别出任何具体的个人信息。而且，创建起依靠区块链技术的访问控制平台，凭借区块链去中心化和不可篡改的特性，保证数据访问的安全性和可追查性。只有通过联盟严格审核并授权的研究人员，才能通过该平台获取经过匿名化处理的数据。在使用期间，系统会随时记录所有的操作行为。如此一来，这个联盟便达成了跨机构、跨国界的共享数据的目的，推进罕见病研究领域的国际合作进程，研究所得成果为罕见病的早期诊断、治疗方案改良以及全球医疗资源协调分配提供关键依据，从而改善罕见病患者的生活状况。

（三）加强数据分析能力建设

人的知识和技能水平可通过系统化的教育培训和大量的实践锻炼得以提升。就医学教育纵向研究数据库的数据分析而言，展开专业培训，培养复合型人才，推动技术创新，从而全面提升整体的数据分析水平。通过培训，让研究者学会先进的数据分析工具和方法，培育既懂得医学又擅长数据分析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可以更好地领悟数据背后所蕴含的医学意义。而提倡技术创新，则能研发出更符合数据库特点的分析算法和工具，进而提升数据分析的效率和精准度[5]。

某学校医学院与计算机学院合作开展跨学科协同育人项目，一起开设“医学大数据分析”研究生专业课程，力求培育出既有医学根基又具备现代数据分析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这些课程融合诸多领域优质资源，包含外科学二、内科学、临床实践、妇产科学、儿科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实务、眼耳鼻喉口腔科学、医患沟通、形势与政策、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等课程内容，形成系统而实用的知识架构，并对学生的（下转 110 页）

表 1　河北省某医学高校学生成绩

课程 / 环节 成绩 [类别] [学分]		[19030 2202] 外科学二	[19030 2204] 临床实践	[19030 3201] 妇产科学	[19030 5201] 儿科学	[19030 6206]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实务	[19050 3203] 眼耳鼻喉口腔科学	[19061 2209] 医患沟通	[19070 1207] 形势与政策Ⅳ	[1910 01204]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4	[21030 1201] 内科学	[21030 1202] 急救医学	[22070 120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总成绩	平均成绩	学分绩点	平均学分绩点
		[必修 3.0]	[必修 3.0]	[必修 4.0]	[必修 4.0]	[必修 3.0]	[必修 2.0]	[必修 1.0]	[必修 2.0]	[必修 0.5]	[必修 6.0]	[必修 2.0]	[必修 3.0]				
1	200320101003	88.00	97.00	88.00	92.00	86.00	89.00	84.00	99.00	98.00	86.00	94.00	92.00	1093	91.08	134.70	4.02
2	220320110001	81.00	93.00	66.00	74.00	71.00	70.00	76.00	93.00	93.00	67.00	88.00	80.00	952	79.33	88.65	2.65
3	220320110002	73.00	97.00	67.00	83.00	77.00	89.00	78.00	95.00	93.00	77.00	80.00	88.00	997	83.08	104.45	3.12
4	220320110003	85.00	93.00	83.00	87.00	84.00	93.00	85.00	100.00	98.00	86.00	94.00	92.00	1080	90.00	129.10	3.85
5	220320110005	92.00	93.00	91.00	94.00	85.00	92.00	87.00	95.00	98.00	94.00	96.00	94.00	1111	92.58	142.30	4.25
6	220320110006	88.00	93.00	82.00	84.00	85.00	89.00	82.00	93.00	97.00	86.00	90.00	90.00	1059	88.25	124.75	3.72
7	220320110007	86.00	97.00	90.00	89.00	91.00	92.00	85.00	99.00	98.00	89.00	84.00	94.00	1094	91.17	136.30	4.07
8	220320110008	85.00	95.00	77.00	89.00	87.00	93.00	80.00	99.00	98.00	87.00	99.00	92.00	1081	90.08	129.90	3.88
9	220320110009	88.00	93.00	88.00	89.00	87.00	92.00	87.00	96.00	93.00	89.00	98.00	92.00	1092	91.00	135.25	4.04
10	220320110010	89.00	93.00	90.00	93.00	89.00	87.00	88.00	95.00	95.00	87.00	97.00	94.00	1097	91.42	136.75	4.08
11	220320110011	81.00	95.00	65.00	75.00	67.00	62.00	61.00	63.00	95.00	79.00	60.00	72.00	875	72.92	78.25	2.34
12	220320110012	88.00	95.00	82.00	87.00	90.00	93.00	85.00	99.00	98.00	85.00	99.00	90.00	1091	90.92	131.60	3.93
13	220320110013	83.00	95.00	84.00	87.00	83.00	87.00	87.00	95.00	98.00	79.00	84.00	91.00	1053	87.75	120.70	3.60
14	220320110014	79.00	95.00	70.00	71.00	66.00	89.00	80.00	94.00	98.00	72.00	91.00	96.00	1001	83.42	100.60	3.00
15	220320110015	78.00	93.00	62.00	83.00	69.00	78.00	69.00	93.00	83.00	67.00	65.00	90.00	930	77.50	87.95	2.63
16	220320110016	88.00	93.00	82.00	85.00	81.00	85.00	83.00	98.00	93.00	81.00	84.00	91.00	1044	87.00	120.15	3.59
17	220320110017	82.00	93.00	60.00	85.00	75.00	79.00	67.00	95.00	93.00	79.00	63.00	73.00	944	78.67	93.55	2.79
18	220320110018	66.00	93.00	65.00	88.00	81.00	91.00	85.00	98.00	97.00	70.00	91.00	92.00	1017	84.75	104.65	3.12
19	220320110019	70.00	93.00	60.00	84.00	73.00	86.00	79.00	62.00	83.00	60.00	70.00	82.00	902	75.17	77.15	2.30
20	220320110020	84.00	97.00	71.00	85.00	75.00	92.00	79.00	93.00	95.00	77.00	91.00	95.00	1034	86.17	114.25	3.41
21	220320110021	86.00	95.00	81.00	79.00	82.00	89.00	82.00	98.00	92.00	73.00	88.00	92.00	1037	86.42	114.60	3.42
22	220320110022	80.00	95.00	67.00	77.00	79.00	89.00	77.00	96.00	93.00	70.00	80.00	72.00	975	81.25	95.25	2.84
23	220320110023	82.00	93.00	81.00	85.00	81.00	86.00	81.00	93.00	95.00	78.00	86.00	87.00	1028	85.67	114.45	3.42
24	220320110024	85.00	97.00	86.00	91.00	88.00	94.00	82.00	95.00	98.00	87.00	95.00	92.00	1090	90.83	134.00	4.00
25	220320110025	85.00	93.00	73.00	91.00	77.00	80.00	73.00	98.00	93.00	76.00	77.00	81.00	997	83.08	107.45	3.21
26	220320110026	85.00	95.00	84.00	93.00	85.00	90.00	83.00	94.00	92.00	86.00	90.00	94.00	1071	89.25	130.30	3.89
27	220320110027	71.00	95.00	71.00	85.00	74.00	89.00	84.00	95.00	92.00	60.00	84.00	91.00	991	82.58	96.80	2.89
28	220320110028	78.00	93.00	63.00	86.00	68.00	69.00	77.00	95.00	93.00	63.00	66.00	79.00	930	77.50	83.65	2.50
29	220320110029	81.00	93.00	84.00	88.00	83.00	83.00	77.00	98.00	98.00	63.00	72.00	78.00	998	83.17	102.80	3.07
课程 / 环节平均成绩		82.31	94.31	76.31	85.48	79.97	86.10	80.10	93.66	94.48	77.69	84.69	87.79				

如何为社会组织搭建“三位一体”的合规内控体系

李泉铮

摘要：本文从法律顾问的视角切入，提出并详尽阐释了“三位一体”合规内控体系的构建办法。此体系将外部法律法规作为最低要求、组织章程作为核心要素、内部管理制度作为关键举措，三者相互依托、动态协同，意在助力社会组织以系统且前瞻的方式管理风险，提高公信力和治理效能。文章结合 COSO 框架与中国实践情况，提出了“五阶段”搭建的方法理论（诊断、设计、执行、内化、维护），还剖析了常见的挑战和应对办法。最后表明，法律顾问的角色应从传统的服务提供者转型为“体系架构师”和“战略伙伴”，推动社会组织达成从“被动合规”到“文化自觉”的治理升级。

关键词：三位一体；合规内控体系；社会组织；风险防控；治理现代化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断推进的今天，中国社会组织正处于从“数量增长”迈向“质量提升”的关键转型阶段。社会公众、捐赠方以及政府对其合规运作与内部管控水平的期望正逐步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共同织就了严密的监管体系，而多起舆论事件也进一步表明，公信力是社会组织生存发展的根本所在。

然而在实践中，大多数社会组织的合规建设仍处于“碎片化”“应激式”的被动状态，主要依赖个人经验进行操作，尚未建立系统化的运行机制。传统的

（上接 109 页）

成绩进行记录（见表 1）。教学内容针对医学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算法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医学影像处理等前沿话题，促使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高校依靠大型医疗机构和科研机构创建起实践教学基地，为医学生参与医学教育纵向研究数据库分析项目提供支持。

四、结语

医学教育纵向研究数据库属于社会医学领域的关键资源，蕴含着推动社会医学发展、优化大众健康状况的巨大潜力。但是，在应用这一数据库的时候碰上的一些问题，如数据品质、数据共享、隐私保护以及数据分析能力等，都阻碍其发挥更大作用。创建完善的数据品质管控体系，可以为数据库的可靠应用打下根基，协调好数据共享和隐私保护之间的关系，就能打破数据流通的壁垒，促使不同机构展开协同研究。

参考文献

[1] 陈漫，肖飞，黎子华，等. 医学教育纵向研究数据库构建研究 [J]. 中华医学教育杂志，2020,40(03):4.

[2] 范定容，王倩倩，沈奥，等. 从 ChatGPT 到 Sora: 人工智能在医学教育中的应用潜力与挑战 [J]. 中国医学教育技术，2025,39(01):33-40.

[3] 刘红文，李翠云，黄智高，等. 以实证为本：纺织服装高等教育纵向研究数据库构建 [J]. 丝绸，2021,58(05):76-85.

[4] 刘璐，耿彧，白涛，等.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医学教学模式的可视化分析 [J]. 中国医学教育技术，2025,39(01):136-143.

[5] 张丽艳，黄丽霞，楼亨通. 基于 CiteSpace 的国内人工智能与医学教育融合热点的可视化分析 [J]. 临床医学工程，2025,32(02):225-228.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河北省教育厅课题“构建医学教育纵向研究数据库的研究”（ZC2025239）。

（作者：杨超男、曹娟，邢台医学院教师；程坤，邢台医学院副教授；通信作者陈亚，邢台医学院副教授）

法律顾问服务往往侧重于事后争议的解决，难以事先搭建有效的风险“防控屏障”。

针对这一现状，本研究提出构建“三位一体”合规内控体系，其重点在于将外部法律规范、组织自身章程与内部管理流程深度融合，促使法律顾问的角色从“争议解决者”转变为“风险预防者”与“治理支持者”。这一体系与角色的转变，对提升社会组织规范化运作能力、营造社会领域依法治理的良好环境，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三位一体”合规内控体系的理论框架与核心要素

“三位一体”体系是一个有机、动态且层层细化的逻辑整体，其理论根基是现代组织治理与内部控制理论（如 COSO 框架）。本文将剖析该体系的三个核心维度及其内在联系，为法律顾问的实务操作奠定基础。

（一）第一维度：法律法规——体系的“底线”与“边界”

法律法规是整个体系的根基和外部约束，为组织划定了行为的最低边界。此维度对应 COSO 框架中的“控制环境”，设定了内部控制的基调[1]。内容构成是一个多层次的法律规范集合。根本法与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障结社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非营利法人的定义、成立条件及剩余财产处置的“近似原则”；主体性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规范慈善组织全链条活动；《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等是各类组织登记管理的操作依据；配套监管法规包括财税法规（如免税资格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从多侧面规制运营行为，具有强制性和普适性，功能在于设定最低标准的合规要求。法律顾问的核心任务之一，是确保组织所有活动始终处于这条“安全航道”之内。

（二）第二维度：组织章程——体系的“灵魂”与“总纲”

章程是组织内部的“宪法”，是连接外部法律与内部制度的桥梁[2]。它将法律的一般性规定转化为本组织的个性化纲领文件，是 COSO“控制环境”的具体化体现。治理结构：明确会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执行机构的产生方式、职责权限和制衡机制，是“善治”的框架。资产管理与处置：明确财产来源、使用原则及解散时剩余财产的处置（必须遵循“近似原则”）。

其作用与特性应具有承上启下和权威性。然而，许多组织的章程存在“模板化”问题，与实际运作存在“两张皮”现象，削弱了体系的有效性。法律顾问的价值在于帮助制定一部真正“活”的章程。

（三）第三维度：内部管理制度——体系的“血肉”与“抓手”

内部管理制度是将章程规定细化而成的具体操作规程，是体系运行的“操作系统”和“施工图”。它直接对应 COSO 框架的“控制活动”和“信息与沟通”要素。内容通常可分为四类，治理类制度：如《理事会议事规则》《利益冲突回避制度》，确保决策规范、透明；业务类制度：如《项目管理办法》《募捐管理规范》，管控核心业务风险与效能；资源类制度：如《财务管理制度》《人力资源制度》，保障人、财、物等资源的合法高效运用；专项类制度：如《信息安全政策》《危机预案》，应对特定领域风险。

其作用与特性具有极高的实操性和必要的灵活性。法律顾问的创造性体现在设计出既严谨又高效、能被业务部门真正接受和执行的制度流程。

（四）三者的互动关系：动态的有机统一体

三个维度构成一个动态循环、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法律法规是章程制定的根本依据，章程是所有内部制度的“母法”，形成自上而下的约束与指导，这一路径确保组织操作不偏离法律底线和初心使命；内部制度的有效执行是保障章程与法律得到贯彻的根本途径[3]。执行中发现的新问题可反馈至理事会，作为优化章程或战略的依据，实现体系自我进化。

法律顾问是体系的“架构师”与“连接器”，其价值在于深刻理解法律（第一维），将其精神注入章程（第二维），并将其转化为可操作的内部规则（第三维），同时嵌入监督与反馈机制，驱动组织走向善治。

二、“三位一体”体系的搭建步骤与法律顾问的实务操作

构建“三位一体”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法律顾问需采用结构化方法，引导组织循序渐进地完成从诊断、设计、施工到内化、维护的全过程。

（一）第一阶段

尽职调查与全面风险评估，此阶段是体系构建的基石，旨在全面“扫描”组织现状，识别风险盲区。方法：采用“文件审阅 + 人员访谈 + 问卷调研”的组合方式进行穿透式摸底。

1. 治理结构

理事会是否实质运作？决策机制是否清晰？是否存在“一言堂”或虚化现象？

2. 业务合规

募捐资质与活动是否合法？项目管理和资金使用是否规范？

3. 财务内控

报销审批流程是否健全？公益财产与私人财产是否严格隔离？

4. 专项风险

是否涉及跨境活动、个人信息处理、重大公众活动等高风险领域?

5. 交付成果

形成《法律与内控风险评估报告》，清晰列明风险点、风险等级及初步改进建议，为下一阶段提供精准“靶向”。

（二）第二阶段

顶层设计与框架搭建，基于诊断报告，与理事会和管理层达成共识，设计体系的整体架构。

1. 章程修订论证

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等，判断现行章程是否与法律冲突或关键条款缺失(如理事任期、利益冲突原则、剩余财产处置)，并提出修订草案。

2. 制度体系规划

绘制《制度体系蓝图》，明确需要制定或修订的核心制度清单及其优先级(如优先制定《利益冲突政策》《财务管理制度》)。

3. 关键原则

确保顶层设计既符合法律强制性规定，又充分体现组织的独特使命、规模和业务特点，避免“千篇一律”。

（三）第三阶段

核心制度起草与修订，此阶段是法律顾问专业价值的集中体现，即将蓝图转化为可执行的文本。

1.《利益冲突政策》的制定，是构建公信力的基石。应采用“列举 + 概括”方式，涵盖经济利益、关联关系、双重职务等任何可能影响独立判断的情形；规定理事、高管及关键员工在入职、任期、利益变化时提交《利益冲突披露声明表》；明确由理事会或专门委员会评议披露事项，认定存在实质冲突的必须严格回避并记录；后果与档案管理：设定对隐瞒不报行为的处理措施，所有披露文件作为机密档案保存。

2.《募捐与捐赠管理制度》的制定，守护生命线。资质与方案前置审核，需公开募捐的，须事先确认资质并审批方案。信息保护与“冷静期”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可为网络小额捐赠探索设立“24 小时冷静期”以提升信任度。对特殊捐赠要审慎处理，非货币捐赠须经价值评估和理事会审批；谢绝附有不可接受条件的捐赠。专项基金特殊规制要明确其设立标准、管理费、资金使用权限和信息披露责任，防止失控。

3.《项目合作协议范本》的制定，管控合作风险知识产权归属，明确约定项目成果归组织所有或双方共有，确保组织拥有永久无偿使用权。分期付款与验收是设计与里程碑挂钩的付款条款，验收标准应尽可能量化、客观；合规与审计是要保留对合作方资金使用进行审计的权利，费用由责任方承担。单方终止权，约定合作方出现严重违法违规、欺诈等情形时，组织有权立即终止协议。

（四）第四阶段

培训、试运行与嵌入，制度的价值在于执行，此阶段旨在让制度“活”起来。

分层精准培训，对理事会，聚焦信义义务与决策风险，通过案例强化其责任意识。对管理层与员工，聚焦业务流程，采用工作坊形式进行场景化、演练式培训；对志愿者，聚焦行为边界与保密要求，通过《志愿者手册》进行培训。试点运行与反馈，选择 1~2 个代表性项目或部门进行为期 1~3 个月的试运行。收集一线反馈，分析是理解问题还是流程问题，并对制度进行微调优化，减少全面推行阻力。文化嵌入，将合规要求从“硬约束”转化为“软文化”，如张贴流程图、分享成功避险案例，并将关键制度执行情况纳入部门及个人的年度绩效考核，与激励机制挂钩。

（五）第五阶段

持续监督与动态更新，体系需持续维护，以适应内外部变化。

常态化监督机制，明确监事（会）负有独立审查体系运行的职责，有权调阅文件、约谈人员并提交评估报告。建立年度合规内部自查制度，使用《年度合规内控自查清单》（简表）由各部门填写，由管理层汇总后提交理事会审阅，使合规状况“显形化”。动态更新响应机制，法律顾问提供定期《法律合规简报》，提示新规要点及应对建议[4]。在核心制度中明确规定定期复审机制（如每 3 年），系统性评估后决定是否修订，从制度上保证体系的自我进化能力。通过这五个阶段，法律顾问为社会组织构建了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活系统。

三、常见挑战与对策

在推动“三位一体”体系构建与落地的过程中，法律顾问常面临理念、资源与执行层面的挑战。预见这些挑战并准备相应对策，是成功实施的关键。

挑战一：理事会重视不足，资源投入有限，更加关注项目与募捐成果，视合规体系建设为“成本中心”而非“价值投资”，导致支持不足。

对策：应量化风险，转变视角，用“风险语言”和“金融语言”沟通，通过展示同类组织因合规漏洞受罚（如资格取消、捐赠骤减）的真实案例，将抽象合规转化为可量化的财务与声誉风险，阐明“合规保障捐赠”的逻辑。从风险最高、最紧迫的领域（如利益冲突政策、财务流程）入手，先用有限资源做出“样板工程”，展示成效（如效率提升、风险堵截），以事实争取理事会的后续支持。

挑战二：制度“水土不服”，与业务脱节，过于理想化或法条化，流程烦琐，未考虑社会组织人手紧张等实际，导致被束之高阁或遭到抵制。

对策：应与关键岗位的一线人员深入沟通，沉浸式了解其真实工作流程。流程嵌入，而非叠加，目标应是优化而非增加负担。例如，将合同审批集成到现有 OA 系统，将信息披露分解到部门日常职责中，让合规成为业务开展的“助推器”。倡导“与其完美，不如可用”的迭代思维。

挑战三：制度执行乏力，流于形式，虽有完善文本，但执行随意性大，使体系沦为“纸上工程”。

对策：将制度要求转化为简便工具（如《合同审查要点清单》《项目合规自查表》），降低操作难度、减少主观臆断空间。明确责任与纳入考核，将关键制度执行情况（如信息披露及时性、流程遵守度）纳入部门及个人年度绩效考核，与绩效奖金、评优晋升挂钩，赋予制度刚性约束力。培育“合规文化”，通过持续宣传、培训和表彰（如分享“成功避险”案例），让员工认识到合规对保护组织、捐赠人及自身的重要性，实现从“要我合规”到“我要合规”的文化自觉[5]。

四、结论与展望

打造“三位一体”合规内控体系，是中国社会组织面对监管日益严格、增强公信力、实现长久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关键基础。这一体系通过将外部要求（法律法规）、价值导向（章程）与内部操作（制度）有机结合，能够全面、前瞻性地防范风险，为使命达成提供保障，有效弥补传统法律服务“零散化”与“被动应对”的不足。法律顾问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合同审核者与争议解决者，扩展为体系架构师、风险分析师、变革推动者以及战略合作伙伴。这种提升增强了法律服务的附加价值及其在治理中的战略性地位。成败不仅取决于法律专业能力，还取决于项目管理、沟通协调与流程设计的综合水平。

体系的成功构建与实施依赖于从尽职调查与风险评估，到顶层设计，再到制度起草、培训嵌入，最后到持续监督的过程。这五个环节形成完整闭环，确保体系从书面走向实践并保持活力。未来，“三位一体”体系的发展及对法律顾问的要求将呈现三大趋势：第一，法律科技的深度整合。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例如用于自动化法规追踪与合规预警、智能化合同审查；区块链打造不可篡改的捐赠与项目执行溯源链条，大幅提升透明度与公信力。法律顾问需积极学习运用这些工具，提高服务效率与精准性。第二，体系有效性评价标准的确立。未来行业可能发展出类似企业内控的成熟度模型或认证体系，用于评估社会组织治理水平的等级（如基础合规级、系统管理级、战略优化级），为法律顾问服务提供新方向，也为捐赠人选择资助对象提供依据。第三，从“合规”迈向“善治”的升华。体系的最终目标不仅是规避风险，更是助力组织实现“善治”的最佳状态，更高的战略清晰度、决策科学性、运营效率与资源效益。法律顾问未来的角色是帮助客户将合规体系转化为竞争优势与品牌资产，吸引更多优质资金与人才，扩大社会影响力。这意味着法律顾问须具备更广阔的视野，理解社会组织领域的生态运行机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战略伙伴。

综上所述，为社会组织构建“三位一体”合规内控体系，既是法律顾问面临的挑战，更是其专业价值的重大飞跃。它要求法律顾问以更广阔的视野、综合的能力，深度参与中国公民社会建设进程，助力社会组织不仅做得“对”，更能做得“好”，从而实现其崇高的社会使命。

参考文献

[1] 金锦萍 . 非营利法人治理结构研究 [M].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2] 刘志云 . 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理论、实务与案例 [M].3 版 .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3] 韩小凤 , 苗红培 . 我国社会组织的公共性困境及其治理 [J]. 探索 ,2016(06):6.

[4] 张清 , 武艳 . 社会组织的软法治理研究 [M]. 北京 : 法律出版社 ,2015.

[5] 徐永光 . 公益向右，商业向左：社会企业与社会影响力投资 [M].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7.

（作者单位：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

心理健康教育对公务人员心理素质的提升效果研究

赵　李　滕军燕　鲁　波　赵　恺

摘要：目的：探讨系统性心理健康教育对公务人员心理素质及工作效率的干预效果。方法：于2023年6月至2024年6月，选取河南省直单位1073名公务人员为研究对象，实施为期一年的综合性心理健康教育干预。采用国际通用的SF-36健康调查量表（包含生理机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一般健康状况、精力、社会功能、情感职能、精神健康这八个维度）及自编的工作效率自评量表（评估工作完成效率、工作满意度及应对压力能力），在干预前后分别进行测评，比较心理素质与工作效率的变化。结果：干预后，公务人员在SF-36量表各维度得分及工作效率自评量表各项得分均较干预前显著提高（P<0.05）。结论：系统化、多维度的心理健康教育可有效提升公务人员的整体心理素质，缓解工作压力带来的负面身心影响，显著促进工作效率与职业满意度。建议在公务员队伍中制度化、常态化推广心理健康教育，以增强队伍心理韧性，提升公共服务效能。

关键词：心理健康教育；公务人员；心理素质；工作效率；干预效果

心理健康是个体全面健康的关键基础，深刻影响其认知功能、情绪状态、行为模式及社会适应能力，并与生活质量及工作绩效紧密关联。公务人员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及公共服务供给的关键执行者，其职责包含繁杂的行政事务、政策执行及公共管理，且需应对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日益多元的公众诉求及较高的社会期待。长时间处于高压、高负荷且充满挑战的工作状态，让该群体成为焦虑、抑郁、职业倦怠等心理健康问题的高风险人群[1]，这些心理困扰若得不到及时疏导与干预，不仅损害个体身心健康及职业发展，还可能降低其决策质量、服务热情以及执行效率，对政府公信力、公共管理效能以及社会治理水平产生潜在负面作用[2-3]。探索并实施有效策略以提升公务人员的心理韧性、情绪调节能力及综合心理素质，已成为新时代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紧迫课题。

近年来，心理健康教育作为一种兼具预防性与发展性的干预方式，在提升个体压力应对技能、优化情绪管理的策略、提高心理弹性以及改善社会功能等诸多方面，已被证明有着十分突出的效果[4]。其通常通过系统化的知识普及、技能培训以及体验式活动，帮助个体科学认识心理现象，主动地调适心理状态，构建积极的心理防御机制与支持系统[5]。将系统性的心理健康教育引入公务员群体，不仅可直接减轻他们的工作压力与心理负担，提升主观幸福感以及工作满意度，还能通过提高他们自我认知、沟通协作以及问题解决等核心能力，间接推动公共服务质量的优化以及组织绩效的提升[6]。本研究通过对大规模公务员样本开展为期一年的综合性心理健康教育干预，运用标准化量表客观评估干预前后他们心理素质健康状况以及工作效率的变化，以科学验证此类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并且为构建科学、长效的公务员心理健康支持体系提供实证依据与实践参考。

一、资料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为自身前后对照的干预性研究，时间跨度为2023年6月至2024年6月。研究对象来源于河南省直机关单位，通过公开招募与单位推荐相结合的方式，最终纳入符合标准的公务人员共计1073名。

纳入标准：（1）在职在编公务员；（2）年龄20~60周岁；（3）知情同意并自愿全程参与本研究；（4）无严重器质性疾病或临床诊断的精神疾病史；（5）具备独立完成研究问卷的理解与填写能力。

排除标准：（1）干预开始前3个月内经历重大负性生活事件（如亲属亡故、重大疾病、婚姻变故等）者；

（2）患有严重躯体疾病（如心、肝、肾衰竭，恶性肿瘤等）或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等）者;（3）因故无法完成全部干预课程或前后两次测评者。

样本特征：最终参与全程研究的 1073 名公务人员中，男性 709 人（66.07%），女性 364 人（33.93%）；年龄分布：20~30 岁 324 人（30.20%），31~40 岁 397 人（37.00%），41~50 岁 156 人（14.54%），51~60 岁 196 人（18.27%）。样本涵盖不同年龄阶段与性别，具有一定代表性。

（二）干预方法

1. 干预内容

研究设计并实施了一套系统化、模块化的综合性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其核心内容涵盖以下六个方面：

（1）科学压力管理与心理韧性培养：针对公务员普遍存在的压力问题，引入压力感知量表（PSS）进行定期评估，并运用生物反馈技术进行直观教学，帮助个体识别压力信号及主要压力源。在此基础上，提供包含工作边界设定、目标分解、渐进式肌肉放松、正念减压等内容的个性化压力管理方案。组织定期户外拓展、团队熔炼、艺术表达等团体活动，让个体在互动过程中释放情绪，提高社会支持与心理韧性。

（2）情绪智力提升与调节训练：着重培养公务员识别、理解、表达以及调控情绪的能力。通过情绪日记、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途径，加深对自身和他人情绪的认知，系统传授情绪调节技巧，涉及认知重评、正念冥想、腹式呼吸法等，举办专题工作坊，模拟应对公众质疑、紧急事务、内部冲突等高情绪唤醒情境，提高在压力下的情绪稳定性与理性决策能力。

（3）高效沟通与人际关系优化：着重改善工作场景中的沟通效果。培训内容包括非暴力沟通、积极倾听、有效反馈、冲突调解以及谈判策略等。通过真实案例剖析以及跨部门协作模拟练习，提高公务员在会议主持、公文撰写、公众演讲、团队协作及沟通能力等方面的技能，营造和谐高效的工作氛围。

（4）时间管理与工作效能提升：鉴于公务员工作任务繁杂的特性，引入科学的时间管理工具及方法，如时间“四象限”法、SMART 原则以及番茄工作法等。引导参与者剖析个人时间使用模式，识别“时间陷阱”，学会设定优先级、合理规划并高效执行。构建周期性的计划—复盘机制，推动工作习惯优化以及个人效能持续提升。

（5）自我认知深化及职业生涯规划：通过职业兴趣量表、MBTI 性格类型指标等标准化心理测评及价值观澄清工作坊，帮助公务员系统探寻自身性格特质、能力优势、职业锚以及核心价值。结合资深公务员的经验分享和生涯规划辅导，引领参与者把自我认知与组织发展相融合，制定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提升职业认同感与内驱力。

（6）心理健康知识普及与心理急救技能培训：系统讲解心理健康基础知识，覆盖常见心理问题的识别，如焦虑、抑郁、耗竭的早期信号等，以及心理健康维护的策略和心理韧性培养的要素等，引入基础心理急救的概念与技能，让公务员拥有初步识别同事心理危机的能力，并且可提供初步支持，引导其寻求专业帮助，从而在单位内部营造关注心理健康的互助文化氛围。

2. 干预形式

采用多元化、交互式的混合学习模式，以增强参与度与学习效果。包括：

传统形式：定期举办专家专题讲座、互动式小组研讨、案例分析与工作坊。

现代技术应用：搭建在线学习平台，提供课程视频、阅读材料与自我测评工具；引入虚拟现实（VR）技术模拟高压工作场景进行脱敏与应对训练。

文化活动营造：组织开展“心理健康宣传月”、心理健康知识竞赛、主题征文等活动，营造全员关注心理健康的组织氛围，减少对心理问题的污名化。

（三）观察指标

1. 心理健康状况：采用中文版 SF-36 健康调查简表进行评估。该量表信效度良好，涵盖生理机能（PF）、生理职能（RP）、躯体疼痛（BP）、一般健康状况（GH）、精力（VT）、社会功能（SF）、情感职能（RE）和精神健康（MH）八个维度，得分越高表明健康状况越好。

2. 工作效率自评：采用研究者根据公务员工作特点编制的《工作效率自评量表》，包含“工作完成效率”“工作满意度”和“应对压力能力”三个维度，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得分越高代表自我感知的工作效率越高。

（四）统计学方法

使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1.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比较干预前后各项得分的差异。以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一）干预前后 SF-36 量表各维度得分比较

如表 1 所示，经过一年的心理健康教育干预后，公务人员在 SF-36 量表所有八个维度的得分均较干预前显著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在生理职能（RP）、精力（VT）、情感职能（RE）和精神健康（MH）等与心理状态直接相关的维度上，得分提升幅度尤为明显。

（二）干预前后工作效率自评得分比较

如表 2 所示，干预后，公务人员在《工作效率自评量表》的三个维度得分均显著高于干预前（P<0.001）。表明参与者自我感知的工作效率、工作满意度及在压力情境下的应对能力均得到有效提升。

表 1　干预前后公务人员 SF-36 量表各维度得分比较（分，x±s，n=1073）

时间	生理机能 (PF)	生理职能 (RP)	躯体疼痛 (BP)	一般健康状况 (GH)	精力 (VT)	社会功能 (SF)	情感职能 (RE)	精神健康 (MH)
干预前	77.67 ± 24.70	65.31 ± 41.43	71.14 ± 25.11	64.27 ± 19.68	65.06 ± 21.20	79.86 ± 21.31	67.94 ± 41.35	61.29 ± 21.08
干预后	89.01 ± 15.73	81.99 ± 31.65	80.40 ± 19.79	66.03 ± 20.87	71.15 ± 18.09	84.60 ± 18.15	77.04 ± 25.45	75.23 ± 16.69
t 值	14.666	12.725	11.630	2.740	9.003	6.972	7.041	20.848
P 值	<0.001	<0.001	<0.001	0.006	<0.001	<0.001	<0.001	<0.001

表 2　干预前后公务人员工作效率自评得分比较（分，x±s， n=1073）

时间	工作完成效率	工作满意度	应对压力能力
干预前	78.34 ± 12.56	75.67 ± 14.56	68.23 ± 20.12
干预后	87.65 ± 10.23	85.43 ± 11.32	79.88 ± 16.78
t 值	12.437	10.895	11.026
P 值	<0.001	<0.001	<0.001

三、讨论

在当前社会治理复杂性增加、公共服务要求提高的背景下，公务员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工作效能已成为影响政府运行效率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关键因素 [7]。本研究针对千余名河南省直公务员开展为期一年的系统性心理健康教育干预，并从主观和客观两个维度对干预效果进行了综合评估，最终结果验证该干预措施在提升公务员心理素质以及工作效率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本研究发现，干预之后公务员 SF-36 量表各个维度得分都有了明显提升，这样的结果可以从干预内容的多靶点效应来进行解释：其一，与生理健康相关的维度，也就是 PF、RP、BP 这些方面得到改善，主要是因为压力管理模块里直接应用了放松训练，如冥想以及呼吸法等，有效地降低了交感神经长期处于过度兴奋的状态，缓解了肌肉紧张以及躯体化症状；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促使公务员形成规律的作息并且进行适度运动，提升了基础体能。其二，一般健康状况及精力有所提升，这反映了整体健康认知的改变及能量管理能力的提高。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让公务员可以从身心整合的角度去看待健康，而正念、时间管理等技巧有助于减少精神内耗，让精力分配更加高效。其三，社会功能、情感职能与精神健康有了较大改善，这是干预的核心成果。沟通技巧训练直接优化了人际关系质量；情绪调节技能增强了应对情感波动的能力；自我认知与生涯规划提高了职业认同以及意义感；心理韧性培养与心理健康知识共同构建起更强大的内在心理防御体系，降低了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发生的风险。

心理健康状况的改善直接促成了工作场域的积极转变。工作效率自评得分有明显提高，这显示出心理资本的提升对工作表现起到了有效促进作用。展开来说，清晰的自我认知以及职业规划提高了工作内驱力和目标感；高效的时间管理直接优化了工作流程和产出；改善的情绪管理与沟通技巧减少了人际摩擦，提升了团队协作的顺畅程度；提高压力应对能力让公务员面对挑战时能保持更稳定的绩效表现。这印证了“健康员工即高效员工”的组织行为学观点，心理素质的提升是工作效能提升的关键心理基础 [8]。

本研究具有实践意义，为公务员系统大规模且制度化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实证支持。把心理健康教育从传统被动的“问题干预”模式，转变为积极的、预防与发展并重的“素质提升”模式，是一项更具前瞻性与建设性的管理策略。这不仅是保障公务员队伍长期身心健康与稳定的需要，也是提升政府组织活力、创新力与执行力的内在要求。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其一，采用自身前后对照设计，虽可有效说明干预的关联性，但后续研究需设立平行对照组，以增强因果推断力度；其二，部分评估指标依赖自评，可能存在社会期许偏差，未来可结合客观绩效数据、同事评价以及生理指标进行多源验证；其三，干预效果的长期持续性有待跟踪研究。

四、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系统性、多维度的心理健康教育可有效提升公务员群体的综合心理素质，对其身心健康水平有着明显改善作用，还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促进其工作效率、满意度以及压力应对能力的提高。建议各级政府部门把公务员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常规培训体系以及干部培养规划，构建长效机制。通过持续性的心理资本投资，打造一支心理素质过硬、专业能力精湛且服务效能卓越的现代化公务员队伍，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参考文献

[1] 熊艳 . 积极心理学视野下公务员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构建路径研究 [J]. 发展 ,2022(01):81-83.

[2] 樊晓雪 , 赵景会 . 基层公务员心理弹性对职业倦怠的影响研究 [J]. 辽宁青年 ,2023(06):257-259.

[3] 孙旭丽 . 基层公务员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分析 [J]. 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 ,2020,41(23):2992-2994.

[4] 肖维 , 张慧 , 孙璐 . 我国公务员心理健康状况研究进展 [J]. 心理月刊 ,2022(18):238-240.

[5] 郑红渠 . 浅谈公务员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 [J]. 心理月刊 ,2019(15):63,183.

[6] 欧阳玉妃 . 基层公务员心理健康状况及对策分析——以宜春市袁州区为例 [J]. 人文之
（下转 117 页）

新时代加强和改进党员教育的思考与路径创新探析

修安然

摘要：党员教育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基础工程和长期战略任务，是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保证，是党战胜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关键密码。新时代，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员教育必须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着力解决突出问题，提升针对性和有效性。本文从现状、目标和路径三个方面对党员教育展开思考与探析。文章旨在深刻认识党员教育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通过把握新时代对党员教育的要求，创新党员教育提质增效的方式方法，为新时代党员教育提供思路借鉴。

关键词：党员教育；教育体系；从严治党；党员队伍建设

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和党的活动的主体，党员队伍的素质能力直接关系到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从五方面对进一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作出了系统部署，“健全固本培元、凝心铸魂的教育体系”是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加强党员教育这一重要举措既回应了新时代党员队伍建设面临的思想挑战与能力考验，也为筑牢党员理想信念根基、统一全党思想意志行动提供了方向，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实践指导性。

一、现状审视——深刻认识加强党员教育的重要性

（一）党员教育的战略地位和历史经验

党员教育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对工人阶级的宣传教育“一分钟也不忽略”，强调了理论教育的重要性。从历史维度看，我们党始终以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引领事业发展，通过教育筑牢党员信仰之基，确保全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保持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中国共产党历来注重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实践，武装党员头脑，夯实党性修养思想基础，以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多数党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知尚缺乏系统性与深度。在此背景下，党将提升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扩大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列为党的建设工作的核心任务。在长期实践中，党通过创办理论刊物、强化干部理论教育等多元途径，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为党的思想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回溯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在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党始终能够依据形势与发展，持续开展学习教育，通过不断推进自我净化和完善，切实保障自身始终作为坚强领导核心引领事业发展。在发展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也部署实施党内集中教育，推动党的建设向纵深发展[1]，比如，“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党纪学习教育和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等[2]。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先后开展一系列集中学习教育，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教育引导全党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3]

（二）党员教育的现实意义

党员教育是筑牢思想防线的“压舱石”。党员教

（上接 116 页）

友 ,2019(22):45.

[7] 张西超 . 员工帮助计划: 中国经典案例集 [M]. 北京 :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20.

[8]LUTHANS F,YOUSSEF C M,AVOLIO B J.Psychological capital: Developing the human competitive edge[M].Cambridg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作者单位：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

育作为党的建设的基础性工程，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核心指引，帮助党员坚定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新时代背景下，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与繁重的改革发展使命，强化党员教育更具战略必要性。党员教育能帮助党员廓清思想迷雾、坚定理想信念，有效抵御各种错误思潮侵蚀，为党员明辨是非、坚守底线提供思想根基，确保在政治立场上不偏航。通过教育引导党员坚守初心使命，确保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党的事业发展提供坚强思想保证。

党员教育是提升履职能力的“充电桩”。如今是科技创新飞速发展的时代，党员需要不断地学习、更新知识结构，以适应新时代的工作要求。通过针对性培训，让党员掌握新时代治国理政所需的专业知识、群众工作方法，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科技创新等一线更好地担当作为。例如，在数字经济领域，党员需要了解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才能更好地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教育，提升党员履职本领，使党员能够在复杂的工作环境中高效协作、开拓创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服务群众、攻坚克难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党员教育是凝聚组织合力的“黏合剂”。党员教育承载着破解现实难题、赋能事业发展的关键作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加强党员教育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应对风险挑战、完成中心任务至关重要。通过教育强化党员的身份意识与组织观念，推动全党上下拧成一股绳，以统一行动攻克发展难关、服务民生需求，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队伍支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起磅礴力量，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二、目标引领——把握新时代对党员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新时代背景下，国内国际环境愈发错综复杂，各类风险挑战交织叠加，这也对党员教育提出了新要求。

（一）政治要求：将党的政治建设置于根本性位置毫不动摇

党的十九大首次把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强调“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4]。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讲政治贯穿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是凝聚全党意志、统一全党行动、确保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保证。对于党员个体而言，讲政治体现为坚定的政治立场、鲜明的政治态度与自觉的政治担当。在党员教育这一过程中，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理想信念、提高政治能力，实现全党团结统一、行动一致。

（二）能力要求：提升党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履职本领和专业化能力

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来看，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并非天然形成，而是需要通过持续的教育引导、系统的理论武装与严格的实践锤炼逐步培育，这一过程既是党的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党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干部能力的培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进一步指出，“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鲜明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大力选拔政治过硬、敢于担当、锐意改革、实绩突出、清正廉洁的干部，着力解决干部乱作为、不作为、不敢为、不善为问题”。这明确了干部培养选拔的价值取向与实践准则，通过科学选人用人机制，激励干部在干事创业中找准成长路径，对构建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干部成长与事业发展深度契合具有关键指导意义。

（三）纪律要求：从根本上筑牢党员干部纪律意识

党员干部代表着党的形象，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必须恪守的行为规范与行动准则。党的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一环，为新时代对党员教育提出的纪律要求提供坚强保障。加强纪律教育可以增强党员干部自律意识，使每一位党员都能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提高其担当作为的自觉性。要做实做细经常性纪律教育，特别是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在推进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地的实践中，既要切实履行自身岗位职责，又要保障言行的一致性。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发挥求真务实的作风，不搞“面子工程”，稳扎稳打地为人民做实事。

三、路径创新探析——党员教育提质增效的方式方法

（一）强化“根本性”教育：筑牢信仰之基

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理论上明晰，政治上才会更加坚定。通过系统化的理论学习，引导党员深刻领会其核心要义与精神实质，将理论自觉转化为政治自觉，为坚定政治信仰、站稳政治立场奠定坚实思想基础，确保党员在政治上始终保持坚定与清醒。持续加强深入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推动理论学习与中心工作深度结合，引导党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实现理论素养与实践能力同步提升，深刻理解党将自我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毅力。

强化政治训练，提高党员党性修养。新征程上，要抓住党性教育这个根本，对党员开展思想引导。通过教育引导党员精准把握政治形势、深刻领会政治内涵、坚决落实政治要求，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向常态化、制度化方向发展。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四史”教育，注重抓常抓长，加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教育培训。

用党史国史滋养党员心灵，以点带面，既注重发挥“关键少数”的示范引领作用，又着力扩大“绝大多数”的覆盖成效，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学习从“知晓”向“认同”再向“践行”深化。

加强党规党纪学习教育。将党章作为必修课，常态化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将党规党纪学习纳入党员教育培训必修课程，引导党员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党的纪律不仅是对党员行为的规范，更是对党员思想的引导，配套考核评价与督促检查，确保学习入脑入心，推动党员自觉将纪律规矩转化为行为准则。以党纪学习教育为契机，引导党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党的纪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把增强党性、严守纪律、砥砺作风贯通起来。

守好网络意识形态主阵地。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即时性与传播力，既为思想文化交流提供了便捷渠道，也让不同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碰撞交锋更趋直接激烈，各类风险在网络空间散播明显。要立足多元视角、整合各类资源，充分发挥互联网在工作开展中的支撑作用，通过优化宣传教育模式，以创新性的传播方式与宣传内容，引导党员坚定理想信念，为意识形态安全构建坚实保障防线。

（二）深化“时代性”教育：把准前行之舵

把握中心任务，开展“热点”培训。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研究时政热点，提炼理论精髓，引导党员干部正确理解政策方向。围绕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科技自立自强等国家战略开展专题培训。持续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落实保障机制，以确保党中央各项指令得到坚决执行、令行禁止。要加强党员干部的政治意识，及时开展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学习教育，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及时解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国内外发展形势，使党员胸怀“国之大者”，深刻理解国家发展面临的战略机遇与挑战，在复杂形势中保持正确方向[5]。

发挥榜样引领作用，讲好先进典型故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点赞多名党的好干部，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向他们学习。强化英模精神的时代价值与示范效应，从机制层面优化英模人物宣传学习体系，将榜样事迹深度融入党员教育全过程，通过系统梳理先进典型的精神内核与感人事迹，以理论阐释、场景还原、实践感悟等多元形式，推动先进事迹从“事迹呈现”向“精神传承”转化。同时，充分发挥先进模范在理想信念引领、价值观念塑造、行为规范示范等方面的标杆作用，以榜样的感染力唤醒党员干部的责任意识与使命担当，激发其争当先锋、奋发进取的内生动力。以党员教育为牵引，辐射带动社会层面形成崇尚英雄、缅怀先烈、见贤思齐、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生命力。

（三）优化“针对性”教育：提升履职之能

以数智技术提升党员教育精准性。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为党的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数智技术能够更好地感知党员诉求，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针对领导干部、基层党员、青年党员、流动党员等不同群体，设计差异化教育内容。现在几乎人人都有智能设备，可以随时随地利用闲余时间进行学习，这种更为便捷、有针对性的教育方式，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党员的学习效率。同时，利用网络平台进行党课直播、互动问答等，形成线上与线下联动的教学模式，增强党员教育效果。

按需施教提升党员教育针对性。结合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岗位党员的实际需求，聚焦专业能力短板，开展针对性和实用性的能力培训。依托红色教育资源、传统文化资源等进行现场式教学，实地案例教学等。还可以把培训课堂拓展到工作一线、把一线实践融入培训课堂，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把学习成效转化为立足岗位抓改革促发展的实际行动。

四、结论

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党员教育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战略任务，全党应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扎实做好党员教育这项“铸魂”工程，切实提升党员教育质效，确保我们党在复杂形势下始终保持蓬勃生机与活力。坚持守正创新、精准施教，不断激发党员的内生动力，使每一名党员都成为一面鲜红的旗帜，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起磅礴力量。

参考文献

[1] 谢春涛 . 加强理论武装筑牢作风建设的思想根基 [J]. 前进 ,2025(06):8.

[2] 王明春 . 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引领力的内涵样态、形成机理与提升路径 [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25(04):18-26.

[3] 习近平 . 筑牢理想信念根基 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留下无悔的奋斗足迹 [N]. 人民日报 ,2022-03-02(01).

[4] 习近平 .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N]. 人民日报 ,2017-10-28(01).

[5] 高鹏 . 新时代加强和改进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思考与探索 [J]. 教育教学论坛 ,2018(47):144-145.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吉林省行政学院）校级课题“健全全面从严治党的教育体系研究”（2025LL14）。

（作者单位：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吉林省行政学院〉）

高校领导干部心理健康管理在组织工作中的实施策略

赵攀桥

摘要：在高校深化改革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领导干部面临的工作环境日益复杂，承担的压力持续增大。心理健康作为干部核心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其决策水平、领导效能、团队凝聚力和个人职业可持续发展。当前，高校在领导干部心理健康管理领域仍存在系统性不足、干预措施针对性不强等问题。本文在分析现状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心理健康管理对于提升工作效率、促进干部长远发展、优化组织文化的重要性，并据此从组织工作的层面，提出了构建系统性管理体系、实施常态化专业培训、优化工作环境与支持系统、强化团队协作与文化建设等实施策略，旨在为提升高校领导干部心理韧性、激发组织活力、保障高等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高校领导干部；心理健康管理；组织工作；领导效能；实施策略

伴随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深入推进，高校领导干部肩负的改革发展任务愈发繁重，面临的决策环境日趋复杂，承受的心理压力也相应增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不仅要保持健康的身体，更要保持健康的心理。”心理健康不仅是领导干部个人福祉的体现，更是其有效履职、科学决策、引领团队的重要基础。因此，将心理健康管理科学、系统地纳入高校组织工作体系，提升领导干部心理资本与压力应对能力，已成为新时代加强高校干部队伍建设、提升治理效能的紧迫课题。

一、高校领导干部心理健康管理的重要性

高校治理结构不断细化之际，领导干部在资源统筹与复杂协调中承受的心理负荷持续累积，压力沿着决策链条与组织关系扩散，使心理状态逐步转化为影响治理质量的关键变量，将心理健康纳入干部管理体系，往往以组织运行需求为依托，使个体调适与制度运转形成衔接，心理支持由事务性安排转入结构性嵌入[1]。心理状态在信息筛选与风险判断中持续发挥作用，在稳定性增强之际，决策边界更趋清晰，应对节奏更为均衡，治理行为保持连续。反之，在压力积聚未被及时调适时，认知偏差与情绪干扰易在关键环节放大，进而影响组织运行稳定，由此延伸，心理健康管理逐步转化为支撑干部履职与组织协同的重要基础。

二、高校领导干部心理健康管理的现状分析

（一）管理体系零散化与运行链条断裂

高校领导干部心理健康管理虽已进入部分组织视野，但在实际运行中仍未形成统一制度框架，相关事项分散于干部考察、教育培训、工会关怀与日常谈心等不同模块，表面上看似有所覆盖，实则缺少贯通机制，信息采集、状态判断与后续处置之间难以形成连续闭环。干部心理状态多在特定时间节点被简要了解，诸如年度考核、民主测评或专项谈话结束后便中断记录，缺少对任职周期内压力变化、情绪波动与适应状态的持续追踪，致使管理视角停留于截面识别，难以生成纵向判断。更深一层看，现有心理信息尚未与干部选拔任用、岗位适配、任务分配建立稳定联动，测评材料、访谈反馈与履职观察彼此割裂，组织部门虽掌握一定情况，却较难将其转化为精准研判依据，由此带来的直接结果，不是信息完全缺失，而是信息存在却难以进入决策链条，心理健康管理仍处于辅助位置，尚未真正嵌入干部工作体系。

（二）服务供给粗放化与情境适配不足

目前不少高校围绕干部心理健康所提供的服务，仍以集中讲座、常规宣传和一般性咨询为主，内容更偏重理念普及与知识介绍，对高校领导干部所处的复杂管理环境回应不足[2]。干部面对的压力并非单一情绪困扰，而是决策责任、人际协调、目标考核、舆情应对和突发事务交织形成的复合负荷，若服务内容不

能贴近此类场景，培训再多也容易停留于听过、知道，却难以转化为履职中的实际调适能力；另一层不足体现在服务分类不够细，不同岗位、不同任职阶段、不同任务密度下的干部，其压力来源与认知负荷并不相同，但现实供给多采用统一模板，缺少分层设计与个体区分，比如长期承担综合协调任务的干部，更易出现持续性心理耗竭，处于岗位转换期的干部则往往面临角色适应与能力证明的双重压力。若服务系统无法针对这些差异作出回应，资源投入即便持续增加，也难以形成真正贴合工作情境的支持效果。

（三）组织支持弱化与管理嵌入不足

心理健康管理能否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织支持是否稳定存在，就当前情况看，一些高校虽已开始关注干部心理状态，但相关工作仍带有较强阶段性和事务性特征，更多依赖个别领导重视、临时活动安排或专项项目推动，缺乏常态化承接机制。与此同时干部在表达心理压力和寻求帮助时仍存在顾虑，一方面，组织环境中对“能扛事”“稳得住”的期待较强，部分干部担心坦露压力会影响评价；另一方面，现有谈心谈话更多聚焦工作表现与纪律要求，对情绪耗竭、决策疲劳、角色冲突等心理信号关注不够，致使不少问题难以及时显现。长期如此，组织支持便难以沉淀为稳定能力，心理健康管理也难以从“有人做”转向“系统做”。

（四）文化认知滞后与心理议题边缘化

从更深层面看，高校领导干部心理健康管理推进缓慢，还与组织文化中的认知惯性有关，部分单位对心理健康的理解仍停留在个体调节层面，认为其更多属于私人情绪管理，而非组织治理的一部分，因而相关议题在日常管理中缺乏正当表达空间[3]。干部即便感受到持续压力，也倾向于自我消化，较少主动讨论心理状态，更少将其与履职能力、团队协同和组织韧性联系起来。文化层面的边缘化还表现为，心理关怀虽偶有体现，却未形成稳定价值导向，比如任务完成后重工作复盘、轻情绪修复，强调结果产出较多，关注心理恢复较少。久而久之，组织内部便难以形成理解压力、回应压力、共同缓冲压力的氛围，缺乏文化承载，制度安排与服务措施就容易停留在外部推动层面，难以转化为干部普遍接受、组织自觉维护的内生机制。

三、高校领导干部的心理健康在组织部门工作中的实施策略

（一）制度维度：构建全周期管理闭环

高校领导干部心理健康管理要真正落到组织工作层面，关键不在于临时增加几项活动，而在于把心理健康纳入干部管理链条，使其与选育管用各环节形成稳定衔接。组织部门在制度设计中，往往倾向于把心理健康管理放入干部日常监督、谈心谈话、年度考核和岗位调整等常规流程之中，使相关工作由零散安排转入持续运行状态，这样处理后心理状态不再只是个人感受层面的隐性信息，而会逐步进入组织识别、分析与支持的工作范围。

具体推进时，可依托干部履职周期建立心理素质动态档案，档案内容不宜停留在单次测评结果，还要结合任职阶段、岗位压力源、突发任务经历、谈话反馈、培训参与情况等信息进行动态补充，使干部心理状态呈现出时间轴上的变化轨迹。对于承担重大改革任务、长期高负荷运转或处于岗位转换期的干部，组织部门通常会结合节点性评估开展专项研判，使心理波动、职业倦怠、决策疲劳等风险信号尽早显现，避免问题积压到影响履职之后才被动处理。

闭环构建还需要明晰运行程序，较为稳妥的做法是把识别、评估、干预、反馈、复盘几个环节串联起来，形成可执行的流程规范。比如，在年度考核或专项任务结束后，将常规谈话与心理状态了解结合展开，对工作强度、情绪耗竭感、团队冲突感知等内容进行简要采集，再依据结果决定是否进入进一步评估或支持环节。

（二）服务维度：推动供给精细化与情境化

制度建立以后，服务供给能否贴近干部实际，往往决定心理健康管理有没有真正触达问题核心，高校领导干部面对的压力并不单一，既有来自目标考核、事务协调与决策责任的持续负荷，也有来自舆情应对、突发事件处理与组织关系平衡的即时冲击[4]。基于这一特点，组织部门在服务设计中更适宜采用分层分类方式，把普适性支持与情境化干预结合起来，使服务内容与干部实际任务形成对应，而不是停留在一般性知识普及层面。

在常规服务层面，可围绕压力识别、情绪调节、睡眠管理、时间配置、冲突沟通等主题设置模块化课程，使干部获得基础性心理调适工具。进一步推进时，服务内容要尽量贴合组织工作场景，比如围绕干部考察期压力、年度目标冲刺期疲劳、重大事项协调中的情绪控制、批评反馈场景中的认知调节等开展专题训练，让干部能够把所学内容迁移到履职实践中。比如在高压会议情境模拟中，组织部门可安排心理教师与组织工作骨干共同设计案例，让干部练习信息过载条件下的表达控制、情绪稳定与优先级判断，这类训练比单纯讲授更容易生成实际作用。

个体差异同样需要被纳入服务逻辑，不同干部的心理承受阈值、应对风格和压力来源并不一致，服务供给若长期维持同一模板，往往难以取得稳定效果。较多采用的做法，是在基础课程之外设置个别辅导、团体辅导与专题咨询等多种方式，对长期处于高压岗位、情绪波动明显或出现明显疲惫感的干部给予更有

针对性的支持，与此同时可结合任务合理性评估，对任务密度、时间压缩程度和角色叠加状况进行分析，让服务供给与工作安排联动展开。

（三）组织维度：强化支持机制与能力建设

心理健康管理若只停留在个体辅导层面，往往难以应对干部工作中由组织结构、权责分配和团队关系带来的持续性压力，基于此，组织部门在推进相关工作时，需要把支持机制建设放到更突出的位置，使干部在履职过程中能够获得来自组织系统的稳定承接，这里的重点不只是“有人负责”，更在于形成职责明确、响应及时、信息流动顺畅的支持网络，使心理健康工作真正嵌入组织部门日常运行。

较为关键的一环，是把心理健康内容融入干部谈心谈话、岗前提醒、任职回访与重大任务后复盘等工作场景，过去不少谈话偏重工作表现与廉政要求，对干部心理感受、情绪波动和压力来源关注不够，导致一些隐性问题长期悬置。如今更适宜的做法，是在不削弱组织工作严肃性的前提下，增加对心理负荷、角色冲突、团队支持感等内容的了解，使谈话从单向问询转向双向识别，这样既有助于组织掌握干部真实状态，也能让干部感受到组织支持并非空泛口号，而是可被感知的管理温度。

围绕能力建设展开，心理关怀型领导力培训具有较强现实意义，高校领导干部本身既是心理健康管理对象，也是团队氛围塑造的重要影响者，其管理方式会直接作用于下属的压力感受与协作状态，因而组织部门可将情绪识别、支持性沟通、冲突缓释、非指责性反馈等内容纳入干部培训体系，使领导干部在开展日常管理时更懂得如何传递稳定预期、减轻不必要的焦虑扩散[5]。进一步延伸到团队层面，还可结合团队心理资本开发，围绕信任建立、目标共识、韧性培育与协同分工组织专题活动，使团队在面对高负荷任务时具备更强的互助能力。

（四）文化维度：营造持续性心理支持氛围

制度、服务和组织机制逐步完善之后，心理健康管理能否长期稳定运行，还取决于组织文化是否给予足够承载，若心理议题始终被视为个人脆弱或能力不足的象征，干部即便承受明显压力，也往往倾向于自我压抑，不愿表达真实状态，组织部门前期建立的诸多措施就可能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因而，文化维度的建设并非附加项，而是决定管理体系能否持续运转的重要基础。

文化塑造并不是集中开展几次宣传就能完成，它更依赖于日常管理语境的持续调整，组织部门可借助干部例会、专题学习、谈心交流和培训反馈等场景，逐步传递“关注心理健康属于组织关怀的一部分”这一导向，使心理支持从隐性议题转入可被正当讨论的工作内容。表达方式也要注意专业边界，既不能把心理健康泛化为情绪安慰，也不能将其神秘化、标签化，而要强调心理状态与履职表现、团队运行、组织韧性之间的现实关联，这样处理后干部会更容易接受相关安排，也更愿意在压力积累初期主动寻求支持。

持续性氛围还需要依托可感知的互动机制来巩固。组织部门可结合小范围经验分享、任务复盘交流、团体减压活动和非正式沟通时段，逐步增强干部之间的理解与信任，让心理支持由组织单向供给转向团队共同生成。比如在重大专项任务结束后，不仅复盘工作得失，也适度讨论压力来源、协同感受与情绪恢复路径，使干部意识到高压之后的心理修复同样属于组织运行的一部分。时间拉长后，关怀、理解与支持会慢慢沉淀为组织共识，干部在面对复杂局面时也更容易维持稳定心态，由此构建起兼具制度约束、服务支撑、组织承接与文化润泽的心理健康管理体系。

四、总结

高校领导干部的心理健康管理，既是提升工作效率的核心关键，更是保障组织部门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石。通过构建科学完善的心理健康管理体系、常态化开展心理健康培训、优化工作环境与压力疏导机制、加强团队协作建设等举措，能够有效缓解干部的心理压力，促进其身心健康。上述策略的落地实施，不仅有助于提升干部工作绩效与职业幸福感，增强团队凝聚力，更能推动积极向上的组织文化建设。今后，高校组织部门应进一步深化心理健康管理工作、扩大服务覆盖范围，在保障干部高效履职的同时，持续维护其良好心理状态，实现工作效能与身心健康协同提升，为高校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与组织保障。

参考文献

[1] 高旭，何蓓，周家豪．多维合力：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资源服务社会的行动路径 [J]. 江西开放大学学报，2024,26(04):66-71.

[2] 关颖雄．新时代加强高校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思考 [J]. 领导科学论坛，2022(06):34-38.

[3] 林斌斌．高校领导干部政治素质考察路径研究 [J]. 办公室业务，2024(22):169-171.

[4] 朴雪涛，陈浩捷．高校领导干部循证决策能力：结构功能及提升路径 [J]. 黑龙江高教研究，2024(03):52-57.

[5] 张增国，郎芳，尹训宝．高校纪检监察干部社会支持、情绪调节策略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J]. 潍坊学院学报，2023,23(05):71-76.

（作者单位：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正念教养模型研究

郭　鋆

摘要：家庭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立足文化之根，探索中西融合的家庭教养范式是全球化背景下促进家庭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正念教养是一种有影响力的西方家庭教育理论，关注父母如何进行有效教养。通过将正念教养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构建包含倾听（基础维）、情绪感知（能力维）、自我调节（实践维）、接纳（态度维）、理解（情感维）的正念教养五维模型，结合正念教育的实践成效，促进正念教养理论的本土化适应，为中国家庭教育提供兼具文化根基与科学实操性的参考方案。

关键词：正念教养；传统文化；家庭教育；文化融合

家庭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重要场合强调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国家层面先后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等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和法规，形成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合力，引导广大家庭把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由此可见，想要培养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就必须高度重视家庭教育。目前我国家庭教育研究方兴未艾，各种家长培训项目层出不穷，正念教养作为一种新兴的家庭教育理论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相关干预实践已证实其改善亲子互动、缓解教养压力的积极作用。

正念（Mindfulness）源于佛教禅修，是指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集中注意力，有意识地、不予评判地专注当下[1]。近年来，正念成为西方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研究热点。正念教养（Mindfulness parenting）是将正念理念和技能应用于家庭教养情境中的一种教养范式，其核心价值在于打破育儿过程中自动化、习惯性的反应模式，培养父母内在觉察与接纳，促进父母与孩子良性互动，提升整体教养效能感。西方许多国家相继成立了正念协会、正念培训中心等机构推动开展正念教育活动和项目。在我国，正念教育的研究和推广主要由协会、团体、学校、社区等机构进行，但目前尚未形成大规模的教育格局[2]。正念教养理论兴起于西方社会，关于该理论的本土化研究和实践相对匮乏，符合中国国情的正念教养模型还有待完善，已有研究证实正念教养干预在我国家长中具有可行性，但本土化适配仍需深化。本文旨在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正念教养模型相结合，提出便于中国父母理解和操作的家庭教养模型，为构建和谐的中国家庭教育关系，为正念教养理论的中国化实践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南。

一、正念教养理论模型

（一）正念教养三因素模型

正念教养三因素模型由卡巴金等人于2013年提出，具体包含自主权、同理心和接纳三要素。自主权是指父母给予子女自我决定的权力，尊重其意愿和行动自由。同理心既包括父母对孩子的共情，能够从孩子的角度理解对方，也包括对家长自身情绪、心态的理解和觉察。接纳是指父母能够坦然接受、理性面对目前亲子关系的真实状态。三个要素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一个稳定的正念教养三角模型。

（二）正念教养五维度模型

Duncan等人于2009年提出正念教养五维度模型，将正念理念转化为一套在亲子关系中可实践的内在技能和态度，帮助父母有针对性地练习和提升。该模型主要包括全神贯注地倾听、对自身和孩子的不评判接纳、察觉自身与孩子的情绪状态、自我调节、对自身和孩子的慈悲[3]。

上述正念教养模型在西方社会具有较大影响力，其实践效果也获得多项研究的支持，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正念教养模型根植于西方理论，其实践研究也多

在西方社会文化环境中展开。中国父母面临着独特的养育压力，如激烈的教育资源竞争、“鸡娃”焦虑、代际育儿冲突等，这种压力易引发父母应激反应，进而影响教养行为与亲子互动质量。纯西方的理论模型未必能精准回应这些特定情境。另外，西方正念教养理论中的一些术语，例如自动化反应倾向、描述性观察等，晦涩难懂，也容易让部分中国家长产生心理距离。因此，将西方正念教养模型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其“中国化”，不仅是本土化适配过程，更是一次跨文化层面的深度融合与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正念理论模型提供深厚的文化根基，提升中国家长的认同感与接纳度，同时西方模型的科学框架也促进传统文化的教养智慧实现系统性、现代化和国际普及化，这种融合也能更好地适配中国家长的教养需求，提升正念教养干预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二、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正念教养五维模型

本文以西方主要正念教养模型为框架基础，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内涵阐释，提出包含倾听（基础维）、情绪感知（能力维）、自我调节（实践维）、接纳（态度维）、理解（情感维）的五维模型，为中国家庭教育提供兼具文化根基与实操性的实践路径。上述五个维度共同构成了一个动态衔接、相辅相成、循环增益的有机整体，具体以倾听为基础，以情绪感知和自我调节为关键过程，以接纳为根本态度，最终达成深度的理解，而理解又反过来巩固和提升所有维度。五个维度环环相扣，形成一个从内在反思到外在实践的完整闭环，促进塑造健康和谐、互敬互爱的中国家庭关系，为缓解父母教养压力、改善亲子互动提供实践指引。

（一）基础维：倾听

在正念教养理论中，专注倾听是基础维度，倾听为父母提供了真实又多样的信息来源。儒家思想同样重视倾听的作用，把它看成创建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论语·季氏》里孔子提出了“君子有九思”，其中“听思聪”要求听者集中注意力，理解说话者的真实含义[4]。这说明在与孩子沟通时，父母要全神贯注，努力去弄懂孩子话语背后的情绪、需求和动机，而不是敷衍应付。《庄子·人间世》里有对倾听最高境界的论述：“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5]，这就要求父母从“听之以耳”，到“听之以心”，最终实现“听之以气”。听之以气要求聆听时，听者放下自己的偏见、预期和评判。父母想要做到真正的倾听，需要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孩子当下的表达方面，在关注言语内容的同时，还要留心说话语气、脸部神情和身体动作等非言语表现，这种倾听方式超越了单纯的“听到”，而是真正理解孩子内心的需求与意图，这一进程不仅可以提升家庭教育沟通质量，还能让孩子感觉到尊重与体谅，增强相互信任，进而减少亲子互动失调，缓解教养压力。

（二）能力维：情绪感知

情绪感知属于核心能力维度，父母应当具备察觉、识别、理解孩子和自身的情绪状态的能力。情绪作为家庭教育互动的重要承载，父母情绪感知能力的高低对其育儿行为的适应性与有效性存在直接影响。父母要关注自己的情绪变化，如果消极情绪长期积压而未得到疏导，当孩子的行为未符合期望时，父母可能会出现强烈的愤怒情绪，并对孩子采取过度的管教做法，进而加剧亲子矛盾，增加教养压力。

源于传统文化的“儒道互补”情感模式有助于改善现代父母的情绪感知能力。该模式提倡通过儒家以理性认知为主的道德情感和道家以感性体验为主的审美情感，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情感类型相互配合，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情感对主体的心理调适作用[6]。换言之，当不满、愤怒、悲伤等心理应激情绪即将爆发时，父母先运用道家“虚静”的思想，让自己平复下来，认识到强烈情绪的存在，然后再采用儒家“仁礼”的观点，本着仁爱之心，用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道理、事例等对孩子的错误行为进行积极引导，这种情绪调适方式能有效减少父母应激反应，提升教养行为的适应性。

（三）实践维：自我调节

自我调节属于正念教养的实践维度，父母在家庭教育中，要根据孩子的状态和场景，灵活调节自身情绪、认知水平和行为方式。最为重要的是，当消极情绪被触发时，父母能够按下“暂停”键，减少下意识、习惯性地消极应付，理性地控制和调整自己的情绪，从而避免家庭教育矛盾升级，这也是缓解父母教养压力、改善亲子互动的关键环节。

在孩子不同的成长期，家庭会面临不同挑战，因此家长需要通过自我调节维护心理健康，保持情绪稳定。中华传统文化中拥有丰富的“长期修心”（自我调节）实践方法。中医情志学说提出以情胜情、移情易性的理论观点[7]。以情胜情是根据五行相克理论，用一种情绪去调节另一种情绪。例如喜胜悲，即火克金，以高兴的事来战胜悲伤；移情易性通过转移注意力来改变导致负面情绪的心境。中庸思想是儒家进行情绪调控的重要策略。当希望与现实冲突引发情绪问题时，儒家主张通过内外协调，在外部环境中寻求“中节”，使个体的内在情绪得到适宜、恰当的表达与实现，最终实现“致中和”的情绪调节终极目标。上述传统文化中的自我调节思想可为现代中国家庭提供具体可操作的情绪调节方法，帮助其缓解教养压力，提升正念教养水平。

（四）态度维：接纳

接纳构成正念教养的态度维度。家长应当坦然面对、无条件接纳孩子的个性特点与发展节奏，同时鼓励孩子认识自我、提升自我和实现自我。需要强调的是，

接纳并非放任自流，放弃管教，而是客观真实地面对教养过程中问题，避免不合理期望，立足自身实际，对问题给予积极应对。

接纳观点在孔子的教育理念中同样有所体现，例如“有教无类”强调平等接纳所有学生，“诲人不倦”明确耐心指导的重要性，“因材施教”则是对个体差异的坦然接受和积极调整。孔子以接纳为起点、循循善诱、个性化培养的教育智慧对于现代父母依然具有借鉴意义，这种接纳态度能帮助父母降低不合理的教养期望，减少因期望落差引发的教养压力，更好地接纳孩子的个体差异。

（五）情感维：理解

理解是情感核心维度，包括对孩子的共情关怀与对自身的自我同情两个层面，其核心是“同心共感”的情感倾向与行为导向。从儒家的角度，互相理解的道德基础是仁爱之心。从爱父母、爱周围的人再到爱天地万物，这是一个自然且可行的情感推广过程。在家庭关系中，父母对孩子的怜爱、呵护源于天然情感流露，慈爱之心应当始终处于亲子关系的核心，不应因为孩子的失败、叛逆、懒惰等而减弱。为避免管教对孩子情感的伤害，父母可参考儒家的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满足自己需求的同时，考虑他人可能具有同样的需求。例如父母在沟通时，应当维护孩子的自尊心。总之，在家庭教育过程中，家长要以慈爱为本，互相理解，既要积极管教引导，又要懂得适当放手，宽容以待，这种情感联结能增强亲子积极互动，缓解教养压力，提升家庭教养的整体效能感。

三、正念教养五维模型对中国家庭教育建设的启发

（一）探寻传统与现代平衡的家庭教育之路

在全球化背景下，立足文化根脉，融通中西智慧，是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家庭教育体系的重要路径。正如上文所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正念教养理论在诸多教育理念和方式上存在契合性和相容性，正念教养五维模型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正念教养相结合的一次有益尝试。西方正念理论提供了情绪感知、自我调节等有效的“术”，而中华传统文化则赋予了其深厚的“道”。二者结合为正念教养注入深厚的文化内涵，提升了西方理论在中国家庭中的接受度和可行性，也有利于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传承与发展，同时为正念教养的本土化干预提供了清晰的实践框架，助力其在我国家庭中广泛推广。

（二）推动家庭教育回归初心

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升学压力沉重的现代社会环境下，家长出于望子成龙的期盼，容易出现对学业成绩与升学路径的焦虑情绪。当家长片面追求高分数时，容易忽略孩子的内心感受，引发孩子的逆反心理和学习抵触情绪，从而造成亲子关系紧张和僵化，这种功利化教养导向也会加剧父母的教养压力，降低教养效能感。针对这种情形，正念教养五维模型通过倾听、情绪感知、自主调节等五个维度的相互辅助，为家长提供了易理解、可操作、中国化的实践路径，引导家庭教养回到培育健全人格、实现生命成长的本质。

（三）促进家校共育的文化共同体

融入传统文化的“五维教养模型”改善了纯西方理论模式的水土不服，为家校合作提供了共同的文化观和话语体系。当家长和教师都认同“不加评论的关注当下”“接纳理解”等正念理念时，他们更容易在教育目标与方法上达成共识，改变功利化教育理念，增加当下关注、生命关怀与心灵呵护内容，为真正实现全人教育共同努力。学校可以借鉴此模型，开发校本课程，将正念教养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培养学生的智力与健全人格，同时可依托模型开展家长培训，帮助家长提升正念教养能力，缓解教养压力，形成家校协同育人的良好格局。

四、结语

正念一词本身源于东方，西方学者将其理论化后反哺全球，正念教养五维模型将正念教养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相融合，重新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结合正念教养干预的实践经验与成效助力社会主义和谐、幸福家风建设，也为全球家庭教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1] 乔·卡巴金 . 正念 : 此刻是一枝花 [M]. 王俊兰 , 译 . 北京 :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8.

[2] 谢晶 . 正念应用于教育的必要、可能与实践路径 [J]. 云梦学刊 ,2025,46(06):118-124.

[3] 陈晓 , 周晖 , 王雨吟 . 正念父母心 : 正念教养理论、机制及干预 [J]. 心理科学进展 ,2017,25(06):989-1002.

[4] 刘颖 . 先秦儒家省过思想研究 [D]. 曲阜 : 曲阜师范大学 ,2025.

[5] 郭庆藩 . 庄子集释 [M]. 北京 : 中华书局 ,2013.

[6] 彭彦琴 . 中国传统情感心理学中“儒道互补”的情感模式 [J]. 心理学报 ,2002(05):540-545.

[7] 孔芳 .《内经》情志学说的情绪调节思想探析 [D]. 济南 : 山东师范大学 ,2007.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2 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正念教养模式的本土化研究：理论模型与干预”（2022BJY039）；2025 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红旗渠精神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构建路径研究”（2025XWH195）。

（作者单位：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育儿教育成本对城镇家庭生育行为的家庭经济模型分析

邹　波　邱玉婷　陈婷婷

摘要：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教育成本与生育的相关性，却鲜少从家庭效用最大化视角构建经济模型，忽略了收入差异对成本敏感度的调节作用。本文基于 CFPS 2022 年 2136 个城镇家庭样本构建经济模型，研究发现：城镇家庭生育决策本质是“有限收入下的多目标资源分配”，其生育数量选择不仅受教育成本绝对值影响，还与成本占家庭收支的比重、收入调节能力及其他育儿成本的叠加效应密切相关；分析了城镇家庭生育行为与核心制约因素之间的关系：单位教育成本每上升 10%，生育数量平均下降 1.5%，且低收入家庭敏感度（2.2%）是高收入家庭（0.7%）的 3 倍，家庭收入通过扩大预算边界缓解成本压力，而时间机会成本对生育的影响显著低于教育成本。最后，从教育成本、经济补贴、时间成本三个方面提出缓解城镇家庭生育顾虑的对策。

关键词：育儿教育成本；城镇家庭；生育行为；家庭经济模型

2023 年中国城镇总和生育率降至 0.85，远低于 2.1 的人口更替水平，即使“三孩”政策持续推进，城镇家庭生育意愿仍未明显提升。《中国生育成本报告 2023》显示，城镇家庭养育 1 名子女至 18 岁平均成本达 62.7 万元，其中教育支出占比 48.3%，课后服务、学科培训等隐性成本更成为家庭沉重负担。从家庭经济学视角看，城镇生育行为本质是“数量—质量—消费”的资源分配决策。但是，前城镇家庭面临的教育成本刚性特征已远超传统理论假设——某东部省会城市数据显示，小学阶段家庭年均教育支出 2.8 万元，其中非学费类支出占比超 82%，这种刚性支出直接挤压生育预算。过往研究多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未能区分教育成本的直接效应与收入的调节效应，也缺乏对不同收入家庭的异质性探讨。

一、城镇家庭生育决策的经济模型构建

（一）变量定义

本研究城镇家庭生育决策的经济模型的内生变量选择生育数量、孩子质量两个指标，外生变量选择了单位教育成本、家庭可支配收入、非育儿消费、时间机会成本等指标（见表 1）。

（二）模型假设

家庭为理性决策主体，目标是最大化效用，效用来源为“生育数量（Y）”“孩子质量（Q）”“非育儿消费（X）”；

表 1　城镇家庭生育决策的经济模型变量定义表

序号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符号	定义说明
1	内生变量	生育数量	Y	家庭存活子女数（取值 0~3，符合当前政策背景）
2		孩子质量	Q	以单个子女年均教育支出衡量（单位：万元）
3	外生变量	单位教育成本	C	城镇地区单个子女年均教育成本（含学费、教辅、培训等）
4		家庭可支配收入	I	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单位：万元）
5		非育儿消费	X	家庭用于食品、住房、娱乐等非育儿支出（单位：万元）
6		时间机会成本	T	母亲因育儿放弃工作的收入损失（用母亲年均工资衡量）

教育成本为刚性支出，即 Q 与 C 呈正相关（C 上升时，维持 Q 需更高投入）；

家庭预算约束为“总收入 = 育儿支出 + 非育儿消费”，无借贷行为（符合城镇家庭储蓄偏好）。

（三）效用函数与预算约束

效用函数采用柯布 - 道格拉斯效用函数（符合家庭效用边际递减规律）：

$$U(Y,Q,X)=Y^{\alpha}Q^{\beta}X^{\gamma}$$

其中，$\alpha,\beta,\gamma>0$ 分别为生育数量、孩子质量、非育儿消费的效用弹性，且 $\alpha+\beta+\gamma=1$（效用分配归一化）。

（四）预算约束

育儿总支出包括“教育成本”与“时间机会成本”，其中教育成本为 $C\times Q\times Y$（数量 × 质量 × 单位成本），时间机会成本为 $T\times Y$（数量 × 单位时间成本）。因此，

预算约束方程为：

$$I=CQY+TY+X$$

整理得：

$$X=I-Y(CQ+T)$$

（五）模型求解（效用最大化）

将预算约束代入效用函数，构建拉格朗日函数：

$$L = Y^{\alpha}Q^{\beta}[I - Y(CQ + T)]^{\gamma} + \lambda[I - Y(CQ + T) - X]$$

对 Y 求一阶偏导并令其为 0（效用最大化条件）：

$$\frac{\partial L}{\partial Y} = \alpha Y^{\alpha-1}Q^{\beta}X^{\gamma} - \gamma Y^{\alpha}Q^{\beta}X^{\gamma-1}(CQ + T) = 0$$

化简得生育数量的均衡解：

$$Y^{*} = \frac{\alpha}{\alpha+\gamma} \times \frac{I - X}{CQ + T}$$

（六）模型推论

从均衡解 Y^{*} 可得出以下核心推论：

推论 1：教育成本的直接效应：当 C（单位教育成本）上升时，分母增大，Y^{*} 下降，即教育成本与生育数量呈负相关；

推论 2：收入的调节效应：当 I（家庭收入）上升时，分子增大，Y^{*} 上升，即收入可缓解教育成本对生育的抑制作用；

推论 3：质量—数量替代效应：当家庭追求 Q（孩子质量）提升时，分母中 CQ 项增大，Y^{*} 下降，即家庭会通过减少数量保障质量。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筛选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22）数据，筛选标准为：

家庭户籍为城镇（排除农村家庭，因教育成本结构差异显著）；

家庭有 18 岁以下子女（确保教育支出数据完整）；

剔除收入、教育支出异常值（如收入＞ 100 万元或＜ 1 万元）。

最终有效样本为 2136 个城镇家庭，对主要变量开展描述性统计（见表 2）。

表 2　样本中城镇家庭变量描述表

序号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1	生育数量（Y）	1.18	0.45	0	3
2	单位教育成本（C，万元）	2.82	1.21	0.5	8.6
3	家庭可支配收入（I，万元）	15.36	8.24	1.2	98.5
4	母亲时间机会成本（T，万元）	6.58	3.12	0	28.3
5	父母平均学历（年）	12.8	2.9	6	22

为验证模型推论，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Y = \beta_0 + \beta_1 \ln C + \beta_2 \ln I + \beta_3 \ln T + \beta_4 E + \mu$$

其中，被解释变量 Y 为生育数量；核心解释变量 $\ln C$ 为教育成本对数（缓解异方差）；控制变量包括 $\ln I$（收入对数）、$\ln T$（时间成本对数）、E（父母平均学历）；μ 为随机误差项。

表 3　城镇家庭生育数量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结果表

序号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t 值	$P>$
1	常数项	2.35	0.21	11.19	0.00
2	$\ln C$	−0.15	0.046	−3.28	0.001
3	$\ln I$	0.08	0.032	2.50	0.012
4	$\ln T$	−0.06	0.028	−2.14	0.032
5	E	0.03	0.015	2.00	0.045
6	R^2	0.28	—	—	—
7	N	2136	—	—	—

回归结果验证了模型推论（见表 3）：

教育成本的负效应显著：系数为 -0.15（$P < 0.01$），意味着单位教育成本每上升 10%，城镇家庭生育数量平均下降 1.5%，直接验证推论 1；

收入的调节效应显著：系数为 0.08（$P < 0.05$），说明家庭收入每上升 10%，生育数量平均上升 0.8%，即高收入家庭可通过增加预算缓解教育成本压力，验证推论 2；

父母学历的正向效应：E 系数为 0.03（P ＜ 0.05），可能因高学历父母收入更高，且更重视子女教育，但愿意通过减少数量保障质量（与推论 3 一致）。

异质性分析（按收入分组）

将样本按收入分为三组（低收入：I ＜ 10 万元；中等收入：10≤I<20 万元；高收入：I≥20 万元），分组回归结果如下（见表 4）：

表 4　按家庭收入分组的教育成本对城镇家庭生育数量影响异质性回归结果表

序号	收入组	$\ln C$ 系数	P 值	结论
1	低收入	−0.22	0.00	教育成本每上升 10%，家庭生育数量下降 2.2%（影响最强）
2	中等收入	−0.14	0.002	教育成本每上升 10%，生育数量下降 1.4%（影响中等）
3	高收入	−0.07	0.038	教育成本每上升 10%，生育数量下降 0.7%（影响最弱）

结果表明，教育成本对生育的抑制作用随收入上升而减弱，印证了“预算约束收紧效应”在低收入家庭中更为显著——低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有限，教育成本上升直接挤压生育预算，而高收入家庭可通过储蓄或增加收入抵消成本压力。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城镇家庭生育决策本质是“有限收入下的多目标资源分配”，其生育数量选择不仅受教育成本绝对值影响，还与成本占家庭收支的比重、收入调节能力及

其他育儿成本的叠加效应密切相关。以下结合实证数据与现实场景，对三条核心结论展开分层解析。

1. 单位教育成本与生育数量呈负相关

城镇家庭生育数量与单位教育成本呈显著负相关，教育成本每上升 10%，生育数量便下降 1.5%，这是“教育支出刚性”与“家庭预算弹性不足”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前城镇家庭单位教育支出是“基础学费 + 教辅材料 + 校外培训 + 升学配套支出”的综合成本包：2023 年东部某省会城市数据显示，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家庭年均教育支出约 2.8 万元，其中课后服务（0.6 万元）、学科类培训（1.2 万元）、升学兴趣班（0.5 万元）占比超 82%，且这类支出具有“不可逆性”——若想让子女维持中等教育水平（如考入区域中等偏上初中），即便收入波动，也需维持基本投入，否则会削弱子女升学竞争力 [1]。

这种刚性支出对生育数量的挤压效应，在不同收入家庭中差异明显。年收入低于 10 万元的低收入家庭，对教育成本涨幅的敏感度（下降 2.2%）远高于平均水平。以年收入 9 万元的家庭为例，养育 1 名子女时，单位教育成本 2 万元占收入的 22.2%，剩余 6.7 万元可覆盖基本开支并余 0.3 万元储蓄；若成本上升 10% 至 2.2 万元，支出占比达 24.4%，储蓄基本耗尽且需压缩住房或医疗开支；此时若计划生二孩，叠加成本后支出占比将达 48.9%，远超家庭可承受的“育儿支出上限”（通常为收入 30%），最终会放弃二孩 [2]。

而年收入 ≥20 万元的高收入家庭受影响更小。以年收入 30 万元的家庭为例，教育成本从 5 万元升至 5.5 万元，支出占比仅从 16.7% 升至 18.3%，剩余 24.5 万元足以覆盖多子女养育与其他消费。这印证了“影响生育决策的关键是成本占比而非绝对值”——低收入家庭教育成本占比已近生存支出边界，微小涨幅即突破预算底线，高收入家庭则有充足收入缓冲空间。

2. 家庭收入的调节作用

家庭收入通过“扩大预算边界”与“降低成本敏感度”，双向调节教育成本对生育的抑制作用，最终形成“高收入家庭生育对教育成本的敏感度仅为低收入家庭 1/3”的规律。一方面，高收入家庭可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维持多子女教育投入。如年收入 50 万元的家庭，生育两个子女时，单位教育成本 5 万元的总支出 10 万元（占比 20%）；若成本升至 5.5 万元，总支出 11 万元（占比 22%），只需减少奢侈品、高端旅游等非必要消费即可弥补，无须调整生育数量 [3]。

另一方面，高收入家庭“教育成本转嫁能力”更强。这类家庭依托社会资源与信息优势，可通过选择公立优质学校（无私立学费）、家长自身辅导（替代校外培训）降低负担。调研显示，年收入 40 万元以上家庭中，68% 通过“家长辅导 + 学校课后服务”替代培训，年均节省 1.5 万元 ~2 万元；而低收入家庭因家长时间成本高（多从事体力或服务类工作）、辅导能力有限，92% 需依赖校外培训，无法通过资源替代降低成本，对涨幅更敏感。

3. 时间机会成本与教育成本的影响差异

时间机会成本（母亲育儿收入损失）对生育的抑制作用（系数 -0.06）低于教育成本（系数 -0.15），核心是两者“成本持续性”与“可逆性”的差异。

时间机会成本是“阶段性损失”：母亲通常在子女 3 岁前（托育服务不足阶段）放弃工作，3 岁后多数可重返职场，且部分家庭可通过“祖辈照料”“托育机构”替代母亲时间，降低收入损失。2023 年西部某省会城市数据显示，母亲因育儿放弃工作的平均时长为 2.8 年，年均收入损失 6.58 万元，总损失约 18.4 万元，且这部分损失可通过重返职场后的收入增长逐步弥补 [4]。

（二）建议

为切实缓解城镇家庭生育顾虑，需从教育成本、经济补贴、时间成本三方面精准施策。在降低教育刚性支出上，可将课后服务按生均每年 1200 元纳入地方财政预算，教材费同步覆盖配套练习册与数字教育资源，减少隐性支出；学科类培训实行政府指导价，小学每课时不超 60 元、初中不超 80 元，向低收入家庭发放 2000 元 / 年教育券，可抵扣培训与教辅费用 [5]。

在经济发达地区，可适当提高补贴基数，以应对较高的生活成本；在欠发达地区，补贴标准也能满足家庭基本生育需求 [6]。优化生育经济补贴时，探索按生育数量实施阶梯补贴，二孩家庭年补 1 万元、三孩 2 万元，资金由中央与地方按 6 ∶ 4 分摊，直接打入家庭社保卡；个税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从每月 1000 元提至 2000 元，覆盖范围扩至 1 岁起的学前教育阶段，夫妻可自主选择扣除方式。

缓解时间机会成本方面，2025 年前实现城镇社区每千人口 4.5 个托位，普惠托育机构收费不超过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10%；推广弹性工作制，允许父母每日弹性工作 2 小时，188 天育儿假可按月按周拆分，且不影响全勤奖励，减少收入损失。

四、结语

本文通过家庭经济模型与实证分析，明确了城镇家庭生育行为的核心制约因素：单位教育成本每上升 10%，生育数量平均下降 1.5%，且低收入家庭敏感度（2.2%）是高收入家庭（0.7%）的 3 倍；家庭收入可通过扩大预算边界缓解成本压力，而时间机会成本对生育的影响显著低于教育成本。这些结论为生育支持政策提供了精准方向——需优先降低教育隐性支出、实施阶梯式补贴，同时完善托育服务与弹性工作制。后续可进一步探讨不同区域城镇教育成本差异，让政策更贴合地方实际，切实推动城镇家庭生育意愿向生育行为转化。

（下转 129 页）

基于 OBE 理念的全概率公式启发式教学浅析

马鸿燕

摘要：本文基于成果导向教育（OBE）理念，浅析启发式教学法在全概率公式教学中的应用。在阐释 OBE 理念与启发式教学基本内涵的基础上，结合概率统计课程教学实际与学生认知规律，从公式的情境引入、逻辑推导、实例应用三个环节展开教学设计。通过问题驱动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降低公式抽象程度，帮助学生理解全概率公式的基本思想与适用条件，熟练掌握公式推导与解题步骤，提高运用全概率公式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将 OBE 理念与启发式教学融入课堂教学，有助于突出学生主体地位，强化能力培养，可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及相关数学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关键词：OBE 理念；全概率公式；启发式教学

一、引言

在教育教学不断改革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提升课程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与素养成为教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是高校理工科专业的核心数学公共基础课。在培养学生随机思维、数据分析以及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全概率公式是“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中的一个重要公式，是条件概率的推广和理解贝叶斯公式的重要基础工具。承前启后，是学习贝叶斯公式乃至整个贝叶斯理论体系的基础。对全概率公式的理解以及运用全概率公式解决实际问题是教学过程中的重点与难点，其用于探求如何从已知的简单事件概率推算复杂事件概率，具有分解求和的思想。全概率公式在机器学习、模型预测以及可靠性评估等诸多领域有广泛的应用。然而，传统的全概率公式教学往往侧重推导轻思想、重技巧轻应用、教学方法单一、内容抽象、学生参与度低等问题，导致学生对公式的本质理解不够深入，学习效果不佳且难以运用全概率公式去解决实际问题。

为了解决传统教学中遇到的问题，教育领域不断地研究更有效的教学模式。成果导向教育（Outcome-

（上接 128 页）

参考文献

[1] 熊禹淇 . 家庭教育期望对生育决策的影响 [D]. 沈阳 : 辽宁大学 ,2024.

[2] 梁嘉宁 . 中国家庭生育影响因素研究 [D]. 长春 : 吉林大学 ,2023.

[3] 刘娜 , 李小瑛 , 颜璐 . 中国家庭育儿成本——基于等价尺度福利比较的测度 [J]. 人口与经济 ,2021(01):50-67.

[4] 刘娜 , 谭艳平 , 李小瑛 . 孩童抚育对我国城乡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 CLDS 数据的实证研究 [J]. 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4(04):104-110.

[5] 柳如眉 , 柳清瑞 . 城乡收入增长、养老金与生育水平——基于扩展 OLG 模型的实证检验 [J]. 人口与发展 ,2020,26(03):27-37.

[6] 邹波 , 李超 , 宁飞萍 . 家庭生育成本对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基于广州、深圳家庭 0-3 岁婴幼儿生育成本调查 [J]. 广东经济 ,2025(16):22-24.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2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生育成本与生育抉择：大城市家庭生育成本测算及社会化分担路径研究”（22YJCZH278）；2025 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的广东育龄人口生育支持优化策略”（GD25YSH03）；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 2023 年度课题“广州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2023GZYB57）。

（作者：邹波、邱玉婷，广东金融学院公共管理学院；陈婷婷，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家庭发展部）

Based Education, OBE）作为一种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其教学设计和教学目标是基于学生通过教育教学过程获得的学习成果[1]而设定。OBE教育理念要求教师应先明确学生需要习得哪些能力（如分析、应用等），以此为目标反向设计教学内容、方法与评估体系，确保整个教学过程都紧紧围绕最终的学习成果而开展[2]。启发式教学主张教师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的认知水平通过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引导他们通过自主学习、发现问题以及分析解决问题来学习掌握知识的本质[3]，由此启发式教学的思想与OBE教育理念以学生为本的核心思想契合。

本文将OBE教育理念与启发式教学方法相融合运用于全概率公式的教学设计中。旨在通过一系列循序渐进的启发式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学会将具体问题转化为数学模型，并最终转化成一般公式的再发现过程。同时，基于OBE理念明确具体、可衡量的学习成果，并以此为导向设计教学活动和评估标准，以期实现从“教什么”到“学成什么”的根本转变，有助于改善传统教学的局限性，提升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有效培养学生的数学素养与综合能力。

二、OBE理念与启发式教学

（一）OBE理念

OBE，即成果导向教育，由美国学者Spady等人于20世纪80—90年代系统提出并发展，现已成为国际工程教育认证（如《华盛顿协议》）的核心理念[4]。其核心要义可概括为：

1. 以成果为导向：所有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和教学目标都是基于学生毕业时所需达成的学习成果。学习成果不仅是对知识点的掌握，而且要侧重于可应用的能力和素养。

2. 反向设计：教学设计基于对学习成果的准确定义，以此决定如何客观地评价学生所需的学习成果是否达成，再进一步设计用哪种教育方法能够帮助学生达成学习成果，最后才是组织教学资源与实施[5]。

3. 以学生为中心：关注每个学生的认知水平，强调为其达成所需的学习成果提供适当的学习机会。教师的角色由传统的知识传授者转化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

4. 持续改进：通过持续的评价反馈，了解学生学习成果的达成情况，并以此为依据对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方法进行反思与改进，形成一个闭环的质量提升过程[6]。

（二）启发式教学

启发式教学是教师根据教学目标与学生的认知水平，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其本质在于：

1. 创设情境，激发兴趣：通过设置与学生已有知识经验或现实生活相关联的、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情境，打破认知平衡，引发认知冲突，从而激发其内在的学习动机。

2. 引导探究，主动建构：教师不直接给出答案，而是通过一系列有层次、有梯度的问题（“问题链”），搭建“脚手架”，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合作交流，逐步逼近问题的本质，自主完成知识的建构[7]。

3. 注重过程，启迪思维：教学的重点不在于结论本身，而在于得出结论的思考过程。它致力于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和探究精神。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以OBE理念为指导，侧重培养学生的理解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心理特点，贯彻“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原则，通过师生互动，引导学生经历知识的形成过程，经由自主探究深化理解、完善知识结构、提升认知水平，最终达成教学目标。

三、在全概率公式教学中运用启发式教学的必要性

（一）符合OBE理念的核心要求

OBE理念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以成果为导向，注重能力培养与评价。启发式教学通过问题情境引导学生自主思考、分析与解决问题，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独立学习能力、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它的思想与OBE理念不谋而合。将基于OBE理念的启发式教学法应用于全概率公式教学中，是实现OBE教学目标、提升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

（二）改善传统教学弊端

传统全概率公式教学存在方法单一、内容抽象、参与度低等问题。启发式教学通过引入实际问题案例、创设问题情境、实施互动教学与小组讨论等方式，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参与度，促进学生对全概率公式概念的理解以及运用全概率公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促进学生数学素养与综合能力发展

全概率公式是概率论中重要的理论工具之一，对全概率公式的掌握和应用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启发式教学法强调引导学生自主思考、分析与解决问题来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通过将全概率公式与实际问题相结合，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学以致用，能有效提升学生的数学素养与综合能力。

四、基于OBE理念的全概率公式的启发式教学设计

（一）导入生活化案例，激发学习动机

在教授全概率公式初期，教师可通过引入贴近生活的实际案例，如保险理赔、彩票中奖、疾病筛查等，使学生能够直观感受到全概率公式的实际应用价值，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例1[8]41：保险公司认为某险种的投保人可分为两类：一类为易出事故者，另一类为安全者，统计表明：一个易出事故者在一年内发生事故的概率为0.4，而安

全者在一年内发生事故的概率为 0.1，若假定易出事故者占此险种投保人的比例为 20%，现有一个新的投保人来投此险种，问该投保人在购买保单后一年内将出事故的概率有多大？

分析：问题 1：“我们能否直接求出该投保人在购买保单后一年内将出事故的概率？困难在哪儿？”

引导学生发现：由于投保人有两类：易出事故者和安全者，因此无法直接得出投保人在购买保单后一年内将出事故的概率。

问题 2：“我们是否可以分情况讨论？先考虑他为易出事故者的概率？再考虑他为安全者的概率？”

引导学生用概率论语言描述问题。设 A=“投保人在一年内出事故”，B=“投保人为易出事故者”，$\overline{B}$“投保人为安全者”，则有 $P(B)=0.2$，$P(\overline{B})=0.6$，$P(A|B)=0.4$，$P(A|\overline{B})=0.6$。

问题 3：“B 与 $\overline{B}$ 这两个事件有什么关系？”

引导学生发现虽然该投保人种类不确定，但投保人只有两类：易出事故者和安全者，即 $\Omega=B\cup\overline{B}$，引出划分的概念。

问题 4：“求 $P(A)$，相当于求什么？”

引导学生由 $A=A\Omega=AB\cup A\overline{B}$，根据已知条件 $P(B)=0.2$，$P(\overline{B})=0.6$，$P(A|B)=0.4$，$P(A|\overline{B})=0.6$，由乘法公式和加法公式自然地引出全概率公式：

$$P(A)=P(B)P(\mathrm{A}|B)+P(\overline{B})P(A|\overline{B})$$

例 2[8]46：钥匙掉了，掉在宿舍里、教室里、路上的概率分别为 0.5、0.3、0.2，而掉在上述三处地方被找到的概率分别为 0.8、0.3、0.1，试求找到钥匙的概率？

分析：由于钥匙掉的地方不确定，无法直接求得找到钥匙的概率。引导学生发现钥匙掉的地方只有三种可能。且引导学生用概率论语言描述问题。设 A=“找到钥匙”，B_1“钥匙掉在宿舍里”，B_2“钥匙掉在教室里”，B_3“钥匙掉在路上”，类比例 1 引导学生思考，给出样本空间的划分 $\Omega=B_1\cup B_2\cup B_3$，则有，引导学生思考，根据已知条件 $P(B_1)=0.5$，$P(B_2)=0.3$，$P(B_3)=0.2$，$P(A|B_1)=0.8$，$P(A|B_2)=0.3$，$P(A|B_3)=0.1$，由乘法公式和加法公式自然地引出全概率公式：

$$P(A)=P(B_1)P(A|B_1)+P(B_2)P(A|B_2)+P(B_3)P(A|B_3)$$

上述问题简单贴合实际生活，涵盖全概率公式知识点，推导过程不复杂，学生易于接受，此方式有助于学生将抽象数学概念与实际问题相关联，增强学生的学习动力。

（二）问题情境创设，引导深度思考

在全概率公式的推导与应用环节，教师应创设递进式问题，引导学生逐步深入思考。例如，推导时可提问：“为什么需要将复杂事件进行划分？划分的准则是什么？如何利用划分计算复杂事件概率？”鼓励学生通过讨论理解公式推导逻辑。应用时可问：“实际问题中哪些事件可构成划分？如何运用公式求解？”引导学生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问题情境能有效锻炼学生的逻辑推理和问题解决能力。

（三）互动式教学与小组讨论

1. 课堂提问与讨论：整个教学过程贯穿提问，鼓励学生积极思考与回应。针对有争议或开放性问题，组织学生课堂讨论，激发学生之间的思维碰撞，深化对知识点的理解。例如，讲完案例后可问：“是否有其他解法？”引导学生多角度思考问题，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2. 小组讨论：将学生分组，分配与全概率公式相关的实际应用任务（如特定场景建模）。小组成员协作讨论解决方案，运用公式进行分析并计算。教师巡回指导，及时解答学生的疑问。此过程可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与沟通能力。

3. 成果展示与评价：安排每个小组展示讨论成果，其他小组进行提问和评价。教师进行总结点评，肯定每个小组的优点，指出不足，提出改进建议。此环节可提升学生的表达能力和批判性思维。

五、教案

以伊犁师范大学应用统计学专业“概率论”课程的全概率公式教学为例，授课班级学生数学基础不一，抽象概念理解能力存在差异。

（一）教学目标

1. 理解全概率公式的定义、条件与适用范围，熟练掌握全概率公式的推导过程，掌握运用全概率公式解决常见的概率计算问题。

2. 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引导学生学会从复杂事件概率问题中分析出事件间的关系，构建恰当的概率模型，提高学生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让学生经历从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再运用全概率公式进行分析。

（二）教学过程

1. 生活化案例导入：开课即引入保险理赔案例“例 1[8]41：保险公司认为某险种的投保人可分为两类：一类为易出事故者，另一类为安全者，统计表明：一个易出事故者在一年内发生事故的概率为 0.4，而安全者在一年内发生事故的概率为 0.1，若假定易出事故者占此险种投保人的比例为 20%，现有一个新的投保人来投此险种，问该投保人在购买保单后一年内将出事故的概率有多大？”引发思考，激发兴趣。

2. 问题情境创设：围绕公式推导与应用，提出核心问题。

（1）能否直接求出该投保人在购买保单后一年内将出事故的概率？困难在哪儿？

（2）是否可以分情况讨论？先考虑他为易出事故者的概率？再考虑他为安全者的概率？投保人为易出

事故者与投保人为安全者这两个事件有什么关系？（引导学生提炼已知信息，导出划分的概念）

（3）投保人一年内出事故的概率现在可以怎么计算？（引导学生利用概率的乘法公式与加法公式）

3. 核心概念及思想

定义 1. 设 Ω 为样本空间，$B_1,\cdots,B_n$。若 $B_1,\cdots,B_n$ 互不相容且 $\bigcup_{i=1}^{n}B_i=\Omega$，则称 $B_1,\cdots,B_n$ 为 Ω 的一个划分。

在例 1 中，我们将样本空间根据是否为易出事故者划分为 $\Omega=B\cup\overline{B}$。

定理 1. 设 Ω 为样本空间，$A\subset\Omega$，$B_1,\cdots,B_n$ 为 Ω 的一个划分，且 $P(B_i)>0$，$i=1,\cdots,n$，则 $P(A)=\sum_{i=1}^{n}P(B_1)P(A|B_i)$。

根据例 1 概率的计算，引导学生思考总结，全概率公式用于求解复杂事件的概率，它实际上是由因推果的过程，将整体划分为部分，分类讨论的思想，将一个复杂事件的概率划分为若干个简单事件概率求解的问题。

例 2[8]46：钥匙掉了，掉在宿舍里、教室里、路上的概率分别为 0.5、0.3、0.2，而掉在上述三处地方被找到的概率分别为 0.8、0.3、0.1，试求找到钥匙的概率？

根据全概率公式，类比例 1 分析。

4. 小组讨论：分组完成摸彩模型：“例 3[8]41：设在 n 张彩票中有一张可中奖。求第二个人摸到中奖彩票的概率是多少？”小组讨论，应用公式计算分析。教师巡视指导。

5. 成果展示与评价：各小组展示成果，接受提问与评价。教师进行总结性点评，肯定优点，指明不足与改进方向。

（三）教学评价

1. 过程性评价：记录课堂参与、小组表现、实验质量。对积极贡献、高质量完成任务者给予表扬与加分。

2. 终结性评价：要求学生提交一份运用全概率公式分析实际金融问题的报告。依据问题分析深度、公式应用准确性、结论可靠性等评分。

3. 自我评价与互评：引导学生反思学习得失，评价同伴表现，清晰认知自身状态，为后续学习提供参考。

（四）教学效果

在基于 OBE 理念的启发式教学方法实施后，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与掌握全概率公式的本质，实际应用能力增强。在后续学习中，学生表现出更强的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有提高。此教学效果与相关研究结论[9]一致，说明该教学模式是有效的。

六、结论

将基于 OBE 理念的启发式教学运用于全概率公式教学中，能有效克服传统教学中所遇到的问题，提升教学质量，促进学生的数学素养与综合能力的发展。通过导入实际生活中的案例、创设问题情境、互动合作学习以及多元化评价等方法，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加深对全概率公式本质的理解与应用。通过教学实施，得出基于 OBE 理念的全概率公式启发式教学有明显优势。

参考文献

[1]SPADY W G.Outcome-based education: critical issues and answers[M].Arlington: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 Administrators,1994:1-2,20.

[2] 李志义，朱泓，刘志军．用成果导向教育理念引导高等工程教育教学改革 [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4(02):29-34,70.

[3] 邵瑞珍．教育心理学 [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4] 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工程教育认证标准：2017 版 [S]. 北京，2017.

[5] 顾佩华，胡文龙，林鹏，等．基于“学习产出”（OBE）的工程教育模式——汕头大学的实践与探索 [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4(01):27-37.

[6] 王孙禺，谢喆平，刘继青．从《华盛顿协议》谈工程教育专业建设 [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4(04):6-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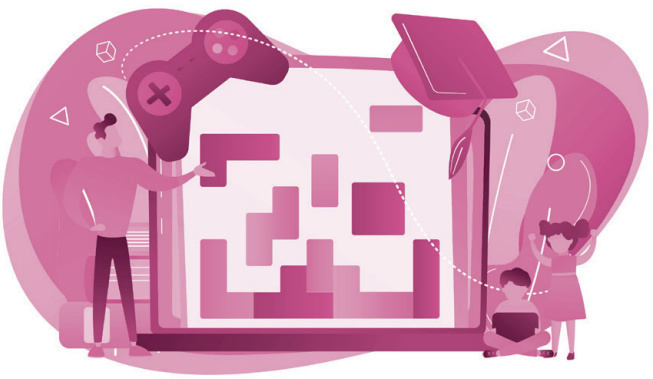
[7] 郑毓信．数学方法论 [M]. 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

[8] 茆诗松，程依明，濮晓龙．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程 [M].3 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9] 石萍，王嘉谋．启发式教学法在大学数学教学中的实践研究 [J]. 科技创新导报，2010(07):162.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3 年伊犁师范大学校级教改项目“‘互联网 + 教育’背景下在线测试在教学中的应用与探究”（YSYB202324）。

（作者系伊犁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讲师）



技工院校专业课程“思创融合”育人模式的实践探究

张利华　吴海峰

摘要：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转型需求，技工院校肩负着培养高素质、创新型技能人才的重任。本文以技工院校中药制药专业课程“中药制剂技术”为载体，探索技工院校专业课程“思创融合”模式的教学实践过程。通过重构课程思创目标，科学设计教学活动、任务驱动、实践深化等路径，建立“学做创”融合教学模式，完善综合评价体系，有效增强了专业教育、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协同育人效果，为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德技并修的高素质人才。

关键词：技工院校；专业课程；思创融合；实践探究

一、引言

2018 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在《关于推进技工院校学生创业创新工作的通知》中提出“着力提高技工院校学生的职业技能水平，促进学生运用所学的职业技能实现创业创新。支持技工院校将创业创新实践课程与专业课程相结合。”该通知为技工院校创新创业教育提供了新思路。2021 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关于深化技工院校改革大力发展技工教育的意见》中提出“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把立德树人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将思政课作为立德树人关键课程，同时加强其他课程思想政治建设，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传授、技能培养融合统一”。可见，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教育理念的革新，以技工院校专业课程为载体，推动专业课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创业教育紧密结合，既能发挥其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又能实现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2025 年，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提升中药质量促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提出“推进中药科技创新，提升中药制造品质，推进中药相关专业教育教学改革，培育造就一批中药领域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本文以“中药制剂技术”为例，探究构建技工院校专业课程“思创融合”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德技并修的高素质中医药人才，既符合社会和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也对于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建设和健康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思创融合的内涵

思创融合中的“思”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在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创”是指创新创业教育，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创业能力、勇于尝试、敢于创新、注重实践的优良精神 [1]，实现个人成长与社会责任的融合统一。本文中“思创融合”即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紧密融入技工院校专业课程教学中，研究“思创融合”的教学实施路径，创新技工院校专业课程“思创融合”的教学实践，构建基于技工院校专业课程的“思创融合”模式，这有利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培养高素质创新型、技能型人才。

以我校中药制药专业课程“中药制剂技术”为载体，进行“思创融合”的教学实施研究，旨在提升学生素质和技能操作水平，激发学生创造力，培养德才兼备的中医药创新型人才。

三、技工院校专业课程“思创融合”育人的重要意义

国家经济转型升级迫切需要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和创新型人才，技工院校肩负着为社会培养技能人才的重任。技工院校的学生大多处于青春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未成熟稳定，学习缺乏自觉性，缺少团队合作意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强，对创新创业的认识和了解不足 [2]，缺乏创新创业意识，普遍就业意识强烈，关注就业前景，对技能训练和实践操作有浓厚兴趣。近年来，技工院校学生的思政教

育以思想政治课为主，部分专业课程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取得了一些成效；多数学校开设创新创业课程或开展创新创业培训，大多脱离了专业课程或专业方向，有些专家学者已开展了针对“专创融合”教育教学的相关研究，但将思政教育、创新创业教育与中药制药专业课程融合协同育人研究得较少，实施“思创融合”育人在“中药制剂技术”课程中的实践研究，对于推进专业课程教学改革、提升教育质量、培养高素质、具备创新精神的技能人才具有重要价值，十分必要。

“中药制剂技术”作为技工院校中药制药专业的核心专业课程，与药品实际生产及临床用药联系紧密，是一门综合性的专业课程。通过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学习，学生熟悉中药剂型的特点、给药途径、生产工艺流程、质量控制等核心内容，了解中药制剂的新辅料、生产工艺、新剂型等发展趋势，为将来从事中药制剂生产、质量检测、药学服务等工作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奠定坚实的基础。

药品作为治疗、预防、诊断疾病的重要工具，其质量直接关系到患者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药品生产是包含多个环节的复杂过程，各环节与成品的质量有着直接的联系，从原辅料配料到中药制剂前处理、制颗粒、填充、包装等，各环节都要严格把控，确保生产过程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同时随着中药现代化和临床需要，中医药需要创新发展，因此药品生产从业人员既要具备专业理论知识和基本操作技能，又要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质量意识，秉持严谨规范、精益求精、团结合作、勇于创新等精神。以“中药制剂技术”为载体，结合专业特色探究“思创融合”育人模式，将思想政治教育润物细无声地融入专业教育中，在潜移默化中熏陶和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业精神，在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和创新能力，增强“专业教育—思政教育—创新创业教育”的协同效应[3]，为中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培养既具备专业知识又有高尚品德的创新型技能人才。

四、技工院校专业课程“思创融合”育人的模式探索

探索“思创融合”育人在“中药制剂技术”中的实践，通过重构思创目标、科学设计教学活动、任务驱动、实践深化等路径，建立“学做创”教学模式和“过程性评价 + 结果性评价 + 成果评价”综合评价体系，形成“目标—实施—评价—优化”的完整育人闭环，具体实践路径如下。

（一）重构专业课程思创目标

专业课程教学是技工院校教育教学活动中的重要环节，核心是将思政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融合在传授专业理论知识、提升专业技能的过程中。在“思创融合”时，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能力培养为导向，结合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及中药制药企业岗位能力需求，以“中国药，健康中国”为主线，将家国情怀、责任担当、工匠精神等思政元素与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深度融合，确定思创目标：遵纪守法、爱岗敬业、吃苦耐劳、严谨规范、精益求精、团队合作、节能环保、开拓创新，引导学生树立爱岗敬业、勇于创新、恪守药品质量的学习、工作态度。

在“中药制剂技术”教学中，遵循学生成长规律和教育规律，科学设计课程内容、教学活动，实现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深度融合。结合课程特点深入梳理、重构课程内容，按“模块—项目—任务”层级编排，以项目引导、任务驱动为主线，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完成学习任务，深入挖掘思创元素，在专业知识的学习、专业技能的训练和实践活动中，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和对中医药学的探索精神，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业动力。

（二）思创元素挖掘与融合

在重构“中药制剂技术”课程思创目标、课程内容的同时，挖掘思创元素与教学内容的契合点，采用任务驱动法、案例法、头脑风暴法等多种教学方法，将“思创融合”目标有效融入教学，使学生自主探究、合作学习，培养独立探索、勇于开拓创新的能力。结合中医药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和国家中医药创新发展战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中医药文化自信，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和职业认同感。如学习中药制剂前处理时引入青蒿素之母屠呦呦，她从中医古籍中获取灵感，带领团队经过数百次实验和改进，创新性地通过乙醚低温萃取法成功提取出治疗疟疾的首选药物——青蒿素，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生动体现了胸怀祖国、敢于担当、团结协作、传承创新、精益求精的精神；学习散剂时，以藿香正气类中成药为例，从唐代孙思邈首创藿香正气散，到与现代制药技术结合研制的藿香正气水、口服液、软胶囊等多种剂型，通过提出问题引导学生深入思考：这几种剂型各有什么特点？生产工艺有哪些不同？生产中需要哪些辅料？使学生深刻领悟创新使千年古方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理解千年古方更新换代、创新发展的意义，知晓其能让患者根据临床需求灵活选择，为人类健康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中药制剂技术”专业技能训练中融入思创元素，让学生将所学专业知识运用到技能操作的同时提升职业素养，培养创新能力。模拟 GMP 车间实训教学，以药品生产的工序确定实训岗位，工学结合，在老师指导下，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接受生产任务后，使用制药设备按标准操作规程完成不同岗位的生产，产品统

一放置在展示区接受师生评价。实训教学中以任务驱动法、示范演示法、小组合作法为主，辅以典型案例，如针对学生错误操作，引入制药安全事故案例启发学生思考规范操作的重要性，强化药品质量意识，培养安全生产责任意识；对于学生物料处置不规范的情况，引入中药制药行业发展信息，如绿色制药理念、中药制剂智能制造技术，使学生了解中药制药产业的发展前景，激发学习动力，启发学生生态文明意识和创新意识。技能实训过程中，将严谨规范、精益求精、团队合作、勇于创新等思创目标具象为每一个操作要求、每一个具体问题的分析处理，如进行“大山楂丸的生产”实训任务时，出现“药丸颜色不一致”“丸重超出重量差异限度”，通过层层深入提出问题：这两个问题会导致什么结果？应该怎样解决？用哪些办法能避免？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中药制剂药物成分均一性问题及对患者用药安全和效果的影响，指导学生分析、查找原因并采用适当的方法解决问题，同时引入大国工匠张冬梅手工制作安宫牛黄丸，三十多年如一日，规范每一个操作流程，视产品质量为生命，“药丸三克，责任千斤”生动诠释了她爱岗敬业、严谨规范、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中药制剂技术”课程将“思创融合”育人贯穿整个教学全过程，实践活动是进一步深化“思创融合”的重要路径。鼓励学生结合专业知识进行自主创新，组织、指导学生参与创新创业项目，如“藿香冰凉贴”、基于药食同源理念的“黄精养胃饼干”“一米药田 半盏药膳”等项目；参加社会实践活动、顶岗实习、职业技能竞赛、“商业精英挑战赛”“互联网 +”等创新创业竞赛，学生团队合作通过查阅文献、市场调研分析、方案策划、筛选配料比例、产品制作、产品推广等一系列环节，加深对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解，开阔视野，拓展知识技能，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创新，提高了团队协作能力和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索精神和开拓创新精神。

通过“中药制剂技术”课堂教学、专业技能实训和实践活动融入思创元素，建立“学做创”教学模式。学生在“学中做”“做中学”“学中创”，一方面深化专业理论知识，提升技能操作水平，实现知行合一。另一方面，学生团结合作共同完成项目，激发创新思维，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技能实训、实践活动中发展专业知识，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深化对价值内涵的理解，提升职业素养。思创融合的“学做创”教学模式，能培养学生爱岗敬业、吃苦耐劳、严谨规范、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开拓创新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现育人与育才相统一[4]。

（三）完善专业课程“思创融合”评价体系

为发挥教学评价的反馈、调控和激励作用，使教学评价具有科学性和有效性，教学团队积极探索“中药制剂技术”课程“思创融合”教学评价体系，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建立“过程性评价 + 结果性评价 + 成果评价”综合评价体系，过程性评价在学生学习活动中进行，动态考核职业素养、技能操作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评价指标包括学习态度、课堂活动积极性、安全意识、操作规范性、制剂质量、团队协作、创新意识等，由教师评、学生评、企业导师评等多个评价主体，确保评价的客观性。结果性评价主要对专业知识、专业技能进行考核，同时对学生的职业素养、创新思维进行综合评价。成果评价主要关注学生职业素养、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和竞赛获奖，激发学生参与积极性。利用大数据分析教学效果，动态调整课程内容与教学策略，形成“评估—反馈—改进”闭环[5]，持续提升思创融合育人实效。

五、结语

本文将“思创融合”理念融入“中药制剂技术”课堂教学、专业技能实训和实践活动，使学生经由学习专业知识、训练操作技能到激发创新思维、提升创业能力的渐进式育人过程，搭建从课堂走向职场、从学习知识迈向创新实践的桥梁，实践表明，学生的职业素养、解决问题能力和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在职业技能竞赛、创新创业竞赛中多次取得优异成绩。下一步，将探索深化校企合作，在教学设计中动态融入企业真实项目，丰富教学资源、优化教学方法等途径提升“思创融合”育人成效。培养具备扎实专业知识、操作技能和创新思维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推动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 刘婷 . 基于“专思创”融合视角下的应用型本科财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究 [J]. 中国管理信息化 ,2024(09):231-234.

[2] 戴晓燕 . 技工院校加强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策略探究 [J]. 中国培训 ,2025(03):67-69.

[3] 陈彦初 , 徐芳 .“课程思政”背景下基于专业课程思创融合的模式探索与实施路径——以《高铁变电所运行与维护》为例 [J]. 才智 ,2025(19):35-38.

[4] 谢晴 . 五年制高职专业课程推进“思创融合”的教学实践研究——以《单片机应用技术》课程为例 [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5,38(19):179-181.

[5] 庄荣 , 明德胜 . 专创融合视域下创新型人才培养探索——基于技工院校数字化设计与制造专业实践 [J]. 汽车维修与保养 ,2025(11):115-116.

（作者单位：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产教融合驱动下智能控制技术专业课程体系创新与实践路径研究

洪慧慧

摘要：伴随产业技术快速发展，高校教育与行业需求脱节问题日益突出，表现为课程设置滞后、校企合作浅层化及教学资源分散，制约学生专业能力与职业适应力的提升。本文以产教适配为切入点，提出企业深度参与的产教科融合模式，通过项目化教学与科研成果反哺课堂，实现智能控制技术专业课程体系创新。构建“技术需求图谱”，将岗位需求、课程内容与科研成果形成闭环衔接，推动理论学习、实践能力与创新思维协同发展。提出“三阶递进”项目化课程设计，涵盖认知、集成与创造三个层次，系统性培养学生从基础到应用及创新的全方位能力。研究表明，该模式有效促进教育与产业深度融合，为人才培养提供可推广、可复制的路径。

关键词：产教融合；智能控制技术；课程体系创新；项目化教学；科研反哺

一、产教失配问题

随着工业技术不断发展，特别是在智能制造以及自动化领域，设备更新迭代周期日益缩短，传统教育模式面临严峻挑战。课程设置滞后、校企合作浅层化、教学资源离散，这些已变成制约学生培养质量的关键瓶颈。具体存在以下问题：

（一）课程设置滞后性

工业技术飞速发展，而传统的教育体系以及课程更新的周期普遍超过两年，学生所学技术常常跟不上时代发展步伐，无法契合企业对于新兴技术的种种需求。多数高校开设的相关专业课程仍局限于传统的理论讲授及基础技能训练，对于行业内最新技术，既没能做到及时跟进，也缺乏较为深入的讲解。例如，智能控制、物联网、大数据分析等前沿技术，在部分院校的课程设置中，存在学生对现代智能制造以及自动化控制的实际应用理解不到位等问题。这种课程内容滞后性直接对学生进入行业后的适应能力以及核心竞争力产生影响[1-2]。

（二）校协作浅层化

尽管多数高校和企业已开展合作，不过合作多集中于讲座、短期实习等形式，合作的深度及广度距离产学研一体化的要求仍有较大差距。企业在课程体系设计及更新方面的参与程度较低，无法深入对教学内容展开共同研发[3]。学术界与工业界信息交流较为薄弱，无法凭借有效的产学研合作推动课程内容创新及技术迭代。企业的技术更新和市场需求不能及时在教学大纲中体现，学生所学知识与技能和实际工作需求间存在明显脱节，进而影响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以及创新能力都产生了影响。

（三）教学资源离散化

当下，诸多院校所配备的实训设备与企业的生产线相比，存在着明显的代差情况，有些设备在技术层面相差了几代。学校里某些设备和企业生产线对照起来，其技术差距很显著，无法契合当下技术发展所提出的各类需求。不同专业范畴内的教学资源也未实现有效整合，像机械、电子、自动化等专业间存在着知识断层、跨专业整合薄弱等问题。这种资源的离散会影响学生理解综合性技术问题，制约学生跨专业思维能力与实际应用能力的发展[4-5]。特别是在涉及智能控制这类多专业融合课程中，学生往往很难从综合性及跨专业角度解决实际问题，也缺乏系统性思维与综合应用能力。

二、产教科融合课程体系设计：面向智能控制技术专业

（一）课程开发机制创新

为有效解决课程体系理论和实践脱节的问题，本文提出全新的课程开发机制，融合“校方主导”“校企共建”“企业主导”三种课程模块，推动课程内容创新，实现与行业技术需求的紧密对接。确切来讲，课程开发的核心要素涵盖如下三种模块：

1. 校方主导课程：理论基础与学科框架的构建

校方主导课程主要是凭借学校自身具备的教学优

势，融合智能控制技术相关基础学科知识，有效对接行业需求的课程模块。这类课程在设计时，重点聚焦理论基础的搭建以及专业框架的构建方面，从而为学生后续开展技术应用筑牢坚实根基。在智能控制技术专业中，通过学校主导的“控制系统理论与设计”课程，可帮助学生掌握控制理论、传感器技术、数字信号处理等一系列核心知识，为后续实际应用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此外，对于智能控制技术中涉及的嵌入式系统、PLC 编程等课程，学校可将基础专业知识和智能控制应用的实际需求相结合，设计兼具学术深度与行业适配性的课程模块 [6]。

2. 校企共建课程：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校企共建课程着重强调学校和企业间的紧密合作，依托双方优势互补，融合企业技术需求与学校教学资源，设计具有实践导向的课程内容。学校可以与华为、长安汽车等企业携手联合开发“智能制造”相关课程，结合企业实际生产线技术需求，引导学生解决实际工程难题 [7]。企业针对课程设计给予实际的项目背景、案例分析以及最新的技术成果等方面支持，学校则依据企业具体需求，提供理论支撑、实验平台以及教学资源等，这种模式帮助学生积累经验，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 企业主导课程：直面企业技术难题的解决方案

企业主导课程聚焦企业技术痛点及实际生产需求，在课程开发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围绕生产环境中的技术难题开展课程设计工作。在这类课程中，学生参与企业技术攻关项目，借助案例研究、技术模拟以及现场学习等多种方式，深入理解智能控制系统在实际生产中的应用场景与创新之处 [8]。

图 1 课程开发机制创新

（二）“三阶递进”项目化课程设计

为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以及创新能力，本文推出了“三阶递进”项目化课程设计模式。此模式依照认知阶、集成阶、创造阶三个不同层次，逐步推进学生技术应用能力与创新思维的培养，确保学生在智能控制技术专业学习中，实现从基础知识掌握到复杂应用实践，再到创新解决方案设计的全方位能力提升。

1. 认知阶：行业技术问题的分析与基础能力的培养

在认知阶段，课程设计助力学生知晓行业技术问题，对其展开初步剖析。学生们借助实际案例，熟悉智能控制技术在各个行业中的应用情形，进而把握智能控制系统的基本构成以及运行机制。此阶段关键之处在于，凭借真实案例的拆解以及讨论，帮助学生构建起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思维框架，从而为后续的集成与创新阶段筑牢稳固的根基。

2. 集成阶：技术集成能力与实际问题的解决

集成阶的课程设计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的集成能力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这个阶段，学生依据已学理论知识参与相对复杂项目，凭借团队协作处理实际生产环节中的各类问题。针对具体项目，学生运用控制理论、自动化技术、数据采集等工具，对生产流程中的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和优化。通过开展具体项目，学生把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相结合，提升复杂工程环境下的综合应用与问题解决能力。

3. 创造阶：技术创新与前瞻性方案的设计

在创造环节，课程设计着重于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引导学生提出新的技术以及新颖的解决方案。此阶段开展的项目往往会牵涉跨专业技术交融以及前沿技术运用。针对这些项目，学生需运用人工智能、数据分析以及控制系统等诸多技术手段，设计出一套智能控制系统，提升对项目质量的预测水平。经由项目，学生能够切身感受到技术创新流程，在真实技术攻关情境下，学会怎样提出具备前瞻性的解决方案，提升应对行业挑战的能力 [9-10]。

（三）项目化课程体系的优势与实践

借助“三阶递进”项目化课程体系，学生经由不同阶段项目实践，系统提升自身能力，这种能力涵盖从基础理论层面到复杂应用，直至创新方案领域。项目化课程一方面强化了学生的实际动手操作能力，另一方面增强了他们的创新意识以及团队协作能力。

项目化课程体系能够完全融入产教科融合模式中，对接企业实际需求，确保课程知识与行业发展趋势保持同步。在项目实践活动中，学生一方面提升自身技术能力，另一方面和企业展开紧密合作，培养自身职业素养以及创新能力。借助产教深度融合之下的项目化课程，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智能控制领域快速发展，成长为具备高水平技术能力及创新思维的专业人才。

三、产教融合实施路径：提升智能控制技术专业教育质量

（一）企业深度参与机制

在产教融合推进过程中，企业深度参与至关重要。传统的教育体系与行业需求脱节的背景下，企业的参与能够有效地填补存在的教育空白，保证学生把所学专业理论知识运用于实际生产环节，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以及创新能力。为达成这一目标，本文提出“三师课堂”实施流程，通过企业技术专家、企业管理人员与学术专家三方协作，保证课程内容兼具前沿性与实践性。

1. 技术专家：课程内容的前沿性保障

企业技术专家的参与能够让教学内容时刻与行业

的最新发展相契合。技术专家参与课堂教学，分享最新的技术应用、设备调试、故障排查方法等实战经验。例如，在智能控制技术高精度控制过程中，企业技术专家能够凭借实际案例，讲解生产过程中的精度问题该怎么去解决，实时数据采集与处理问题的解决方法。这些内容直观反映行业最新需求，确保学生在学习期间接触真实的技术挑战和对应解决方案。

2. 管理人员：课程设计与实施的实际需求对接

企业管理人员在课程设计以及实施环节中的作用是不能被忽视的。管理人员帮助教育者充分了解企业内部的管理流程、技术应用场景及用人需求，让课程内容和企业需求更贴合。通过这种合作，课程不仅局限于技术层面的教学，还能引导学生了解企业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如何制定管理决策，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企业管理人员参与“智能制造与产线优化”课程，能够帮助学生更透彻地理解智能生产流程以及管理策略优化，为学生日后工作赋予跨学科的管理思维。

3. 学术专家：课程的理论性与系统性保障

高校教师在整个过程中始终发挥着关键作用。作为学术专家，承担着保障课程科学性、系统性的职责，负责设计出结构完整的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具体而言，首先保障学生掌握智能控制技术的基础理论，像自动控制理论、信号处理、嵌入式系统等，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技术背后的理论支撑。学术专家为学生提供学术指导，与企业专家、管理专家协同协作，构建起契合行业实际需求的课程体系以及项目化的教学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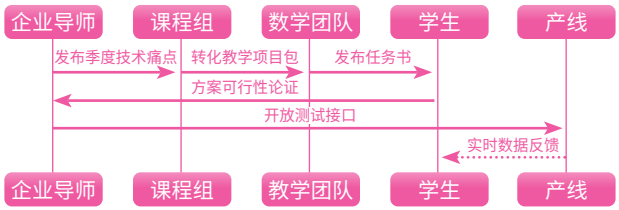


图 2 “三师课堂”实施流程

借助这一机制的实施，学生能够在课堂上直接接触企业的真实案例，学习最新的技术运用方式以及管理手段，由此培育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最终达成从“学术”层面向“实践”层面的有效转变。

（二）科教融通载体建设

科教融通载体是推动科研成果向教学内容实现转化的重要平台。它最为关键的作用就在于破除科研与教学之间的壁垒，以科研项目为支撑，让科研成果能够精准应用到课程设计以及实践教学当中。这样一来，既能提升学生的创新思维，又能通过项目实践让学生更好地掌握先进技术与实际操作能力。

1. 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

在科教融通框架下，教师承接来自企业的各类技术难题，把科研成果转化成可供学生在实践环节去学习以及着手解决的实训项目。开展这一实训项目的时候，学生们会去剖析企业实际所面临的问题，参与技术方案设计与优化，了解如何通过精密控制技术提升生产设备的稳定性与精准度。

2. 项目实践中的技术创新

学生参与这些科研项目时，既能在实际操作中锤炼技术技能，又能培养创新能力。例如，在“精密传动系统误差补偿”项目中，学生们通过分析传动系统的误差源，设计误差补偿算法，优化控制方案，最终降低生产过程中的废品率。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不仅能掌握自动化控制、信号处理等技术，还能参与技术创新应用，获得创新思维启发。此外，优化后的技术方案可进一步转化为技术专利，为企业带来技术与市场双重优势。

3. 科技项目与产业需求的对接

通过打造科教融通载体，学校可依托自身科研优势，为企业提供技术解决方案，同时让学生更为深刻地领会产业需求，通过实际项目探索解决技术难题。在智能控制技术领域，“机器视觉系统优化”项目结合工业机器人在精密制造中的应用需求，通过课程实践引导学生参与机器视觉算法优化、图像识别与处理等技术环节，为未来工作积累经验。

（三）企业需求驱动下的课程创新

在科教融通背景下，将企业实际的技术需求融入课程创新至关重要。学校须主动对接企业，结合行业发展态势与技术演进，调整更新课程内容。当前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技术已广泛渗透到智能控制系统中，学校需及时更新相关课程，增设机器学习算法、深度学习技术等内容，确保学生掌握前沿技术。此外，学校可定期举办技术讲座与学术论坛，邀请企业技术专家与学术专家来探讨智能控制技术的发展趋势，帮助学生了解行业未来走向。

四、推广价值与启示

实施产教融合的课程体系，可推动企业深度参与到教育过程，提升技术人才培养质量，同时促进企业技术应用与创新。采用“技术需求图谱”替代传统学科逻辑，确保课程内容的前沿性，实现教育体系与行业技术发展的同步。此外，建立“企业问题—教学项目—科研成果”的转化闭环，强化科研与教学的互动，提升教育服务产业的能力。

参考文献

[1] 穆婵 .“三教”改革背景下经管类跨专业场景化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J]. 科教导刊 , 2024(10):8-10.

[2] 贾琳 , 马浏轩 , 张宝岩 .“五育”融合视域下跨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以机械设计基础课程为例 [J]. 造纸装备及材料 ,2023,52(12):176-178.

（下转 139 页）

人工智能赋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探析

蔡　昊　黎　凡

摘要：人工智能是当今时代的尖端科技，它所具有的多学科交叉应用价值已经被证实。因此，让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教育，尤其是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是非常必要的。目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正面临着严峻的形势，迫切需要利用人工智能来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水平。但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教学中的运用还存在着许多限制，使得它的潜在价值没有被完全挖掘出来。如何更好地发挥人工智能的优势，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是当前教育技术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对人工智能在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的重要性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对目前所遇到的技术瓶颈与实现障碍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以期为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水平、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导。

关键词：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人工智能；教育赋能

在高等教育领域，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具有隐蔽性、动态性及复杂性的特点，而传统的心理健康教育和服务又存在覆盖面小、精准度差的问题。随着人工智能的应用与推广，利用基于自然语言处理和多模态数据融合的智能系统，使建立智能的全时全域、个性适配、循证优化的心理育人体系成为可能，为在实践层面上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育人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人工智能赋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

（一）促进大学生改善心理健康状况

目前，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与社会环境、社会交往、学业负担等多方面因素密切相关，焦虑和抑郁等心理疾病的发病率不断上升。基于此，大学应以人工智能为基础，在保障个人隐私的基础上，构建具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干预系统。采用智能测评技术，辨识大学生的心理特点，进行个性化的心理健康教育，注重对大学生心理弹性、压力应对能力、价值判断能力的培养。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干预方式，可以帮助学生养成稳定的心理品质，使其在面临各种挑战时仍能保持良好的应对能力，从而达到“人的全面发展”。

（二）促进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创新

传统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大多采用线下面授讲座、个体咨询和团体辅导的形式，这些都存在着固定时间和空间局限性以及资源分配的不平衡问题。引入人工智能，建立基于大数据分析和知识图谱以及生成式 AI 的人工智能心理服务平台，把所有相关的技术加入学校的教育流程当中去，把原有的教学教育转变为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教学教育，比如基于多模态数据融合的智能诊断系统可以实时捕捉学生的行为、语言、生理等信号，形成学生的心理画像，让教育者准确把握[1]。利用 VR 技术，搭建沉浸式的心理训练场景，突破原有教育场景物理空间的限制，丰富了学校教育

（上接 138 页）

[3] 陈赛艳，陈坤，易俊材，等．跨专业课程群建设的探索与实践——以设计类课程为例 [J]. 绿色包装，2024(01):50-53.

[4] 李敏．浅析跨专业课程融合建设对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的影响 [J]. 大众文摘，2023(51):169-171.

[5] 赵小瑭．高校跨专业“数字工匠”培养的课程体系构建研究 [J].2024(03):232-234.

[6] 陈俊杰，谢聪娇，周艳青．跨专业人工智能课程多层次教学改革探究 [J]. 高教学刊，2023, 9(33):129-132.

[7] 侯祥朝．跨学科工程管理专业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 [J]. 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4,45(02):297-302.

[8] 曹海英，元元．新工科背景下跨学科跨专业一流选修课程建设研究 [J]. 山西青年，2023(24):64-66.

[9] 魏伟明．职业教育应用数学课程跨专业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 [J]. 南方职业教育学刊，2024,14(06):51-57.

[10] 徐廷霞，杨阳．道路与桥梁工程专业的职业本科人才培养研究 [J]. 教育教学论坛，2024(25):181-184.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重庆市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锂智集控领域跨学科融合教学模式的创新探索与实践应用”（Z2241066H）。

（作者单位：重庆电子科技职业大学）

教学的内容形式，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同时结合技术赋能，改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服务方式和评价体系，推动高校心理育人的现代化建设。

（三）满足学生个性化咨询与辅导需求

大学生心理问题存在异质性特点，对其开展的心理健康教育应体现出个性化的、精准的特点[2]。利用人工智能，通过自然语言处理 (NLP) 和深度学习的方式对学生咨询的文本信息、声音信息、面部表情信息等多模态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得出其真实存在的心理需求以及所处的情绪状态，并给出个性化的干预方案[3]。例如，学生智能咨询系统基于学生的历史咨询记录和当下的咨询情况，进行合理的咨询干预，既可以通过认知行为疗法（CBT）或者正念疗法等方式提供相关内容，还可以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推荐更多的个性化咨询服务，为学生提供更人性化、更及时、更安全保密的心理支持。

二、人工智能赋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挑战

（一）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

利用人工智能辅助开展高校心理健康教育，需要依靠学生的大量心理数据信息采集和分析，其中包含学生的行为记录、咨询内容、生理指标等一些较为敏感的信息。但是目前数据存储、传输的数据加密方式不够完善，容易出现被窃取篡改的情况；并且有些智能系统在数据共享上并没有严格设置权限，会造成学生隐私信息的外泄；虽然现在有通过匿名化处理来降低隐私直接泄露的风险，但是通过其他来源的数据交叉关联也能破解隐私，这更增加了隐私泄露的风险。现今针对 AI 教育使用没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予以规范，相关的数据主权归属与安全责任的分担还缺少具体的实施细则。

（二）技术尚待进一步优化

现今 AI 技术尚不能全面适用于心理健康领域，在心理咨询语义层面的解析能力有限，容易造成咨询结果发生错误判断和咨询干预建议有误等问题。虽然多模态数据融合技术可以将行为和生理信号结合起来，但是跨模态关联分析难以实现高精度的风险预警，这与采集的数据质量、算法复杂度有很大的关系。人工智能系统的可解释性较差，不能够使教育者清楚地明白人工智能是怎么作出决策，这会引起人们对人工智能可靠性的怀疑。人工智能技术迭代速度快于教育场域文本的发展更新速度，由于高校设备及资源有限性导致多数学校无法及时将算法模型更新到教务、教学软件上。

（三）专业人才缺口相对较大

如何将人工智能运用到高校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中，存在着明显的人才资源不足问题。目前，具有一定的心理学知识和人工智能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十分缺乏。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对从业人员的观察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理论功底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样的交叉学科人才匮乏的现状，直接制约着人工智能与心理健康教育的深入融合。研究表明，目前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普遍存在着信息技术运用能力欠缺的问题，同时也存在着对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心理素质培养欠缺问题。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我国大学还没有构建起一套有效的跨领域融合机制，致使相关领域的人才供给不能满足智能化教育发展的需要。这就需要重新制定人才培养计划，构建交叉学科的课程体系，加速培养“科技与教育”相结合的职业人才。

三、人工智能赋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路径

（一）人工智能在心理健康监测中的运用

利用多模态数据融合和机器学习算法建立人工智能动态化、精准化心理健康监测体系，为高校心理危机预防提供技术支持。在数据采集上，通过智能穿戴设备（如智能手环、智能手表）获取学生的心率变异性、睡眠各阶段比例、皮肤电反应等生理指标；通过校园一卡通对学校的饭卡消费次数、图书馆出入频次以及运动场馆使用情况进行记录，了解学生的行为习惯及社交活跃程度；通过线上学习平台获得学生的作业提交时长、测验答对比例、论坛发帖数量等信息，了解学生的学习效率及学业压力情况。多个数据源提取得到的数据经过处理后的数据集合，即为包含生理、行为、认知三个维度的高密度数据集。以基于深度学习的特征提取模型为例，该模型以 CNN-LSTM 混合结构提取大规模海量数据中的异常模式，通过对某高校 200 名被试两天内的社交媒体文本信息进行处理、分析，利用词频分布、情感极性和语义网络来描述，挖掘抑郁、焦虑等负向情绪的预警信息；同时结合生物信号处理方法，开展心率变异性（HRV）、皮肤电导（EDA）数据时频域特征的统计分析，通过峰值、波谷等量化信息表征心理状态的压力反应情况，并对其进行动态跟踪[4]。

风险预警系统通过对学生的心理画像与个体数据相比较并与同类群中的基线数据做横向比对分析，在连续三天睡眠时间不足 6 小时或社交活动降低 50% 等预警指标触发预警后，会自动将风险级别划分为 1 级（低风险），采用机器推送形式，推送心理自助式调解资源；触发 2 级（中风险）预警会及时将警情推送至辅导员处，由辅导员对其进行关注、教导和引导，对该类风险的学生予以预防性监护；触发 3 级（高风险）预警则会立即通过系统在后台联动校医院的心理科专家进行研判和评估。把量化作为尺度加以分类分级预警，让每个岗位教育工作者对于化解风险有个明确顺序，避免需要而应试、无效干预，有效实现既少又精的目标[5]。研究数据显示，在使用 AI 监测融合多源数据下的识别准确率为传统量表评估的 1.23 倍左右，并可提前 7~14 天识别出潜在危机问题并上报。

（二）人工智能在心理健康服务中的运用

人工智能驱动的心理健康服务模式利用个性化的

资源匹配以及智能交互技术重新定义传统咨询的时空边界、咨询效能。在咨询辅助方面，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基于深度学习的咨询文本语义分析是使用词向量嵌入和依存句法分析确定的问题类型（例如学业压力、人际关系冲突）和情绪程度（按照焦虑、抑郁的程度赋值），并将咨询的核心问题点从咨询文本中挖掘出来并实时反馈给咨询师作为实时干预依据。对某一咨询学生的某一咨询文本，通过词向量嵌入技术和依存句法分析得到此文本问题的词语指代及依存句法结构，通过机器视觉及语义比对，得到其对应的情绪值或衡量标准，能够客观呈现和描述咨询情境。而生成式 AI 则是基于 Transformer 架构的预训练模型，在训练时结合学生的历次咨询信息和问题类型、介入反应和结果反馈的信息制定专属学生的心理训练方案，包括正念冥想音频脚本、CBT 工作表、情绪调节呼吸指南等内容。同时，依靠动态调整算法不断提高方案与具体学生的匹配度。智能辅导机器人通过多轮对话管理框架，综合运用情感计算，获取用户情绪状态，借助预先设计好的共情话术库和动态响应产生机制模拟真人咨询师的共情能力，基于 24 小时匿名的心理辅导支持，解决学生求援时长不足以及咨询服务门槛较高的问题，适用于不愿做线下咨询的学生群体。

基于用户画像的推荐系统收集用户的行为数据（在线课程学习情况、心理测查结果）、情景数据（时间轴，如考期与季节）和偏好的数据（是否愿意尝试艺术疗法），然后应用协同过滤、内容推荐的方法，将心理科普文章、自助工具（比如情绪日记 App）、线下活动信息（比如团体辅导工作坊）推送，提高了服务的可获得性和针对性。结合 VR 和 AI 创设沉浸式心理干预场景，通过建模技术构建虚拟场景，例如构建社交焦虑的相关场景（上课发言场景、聚会场景），通过眼动追踪与生理信号同步调整难度等级，进行递增式训练；或者通过生物反馈技术将心率、皮肤电导等身体参数转换成可以在可视化的屏幕上实时反馈出来的图像来指导学生用呼吸方法调整自己的状态。比如 AI 赋能下的心理健康咨询服务，咨询覆盖人数达到传统的 137%，学生满意率达到 90%，较以往有极大提高，而且智能解决自动化流程与优质资源结合，可以让专业人员减少达 35%，使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方式更具规模，也更加精细化。

（三）人工智能在心理问题预防中的运用

人工智能为心理疾病的防治提供可能，学校可建立多维度的信息（心理测验、网上行为轨迹）相结合的智能化预警系统，并建立起动态的心理测评模型，利用机器学习方法对历史数据深度挖掘，以寻找精神卫生的风险因素实现预警功能。技术实施上，通过特征工程从大量的数据中找出学生的主要智力指标，并运用时序分析的方式对学生心理情况进行动态跟踪：以整合学习的思想为基础，对预测模型不断地优化，提高对人的不同心智特点的适应度；为保证模型的实时性，针对学生群体的心理变化特性周期性地对模型进行再培训。建立了网络环境下的大学生产生的心理健康的预警模型，并为大学生心理教育工作的开展奠定理论基础，促进大学生由“被动”转向“积极”。通过对算法模型的优化，不断提高对复杂的心智行为的分辨度，为精神卫生的保护体系建立技术支持。

利用人工智能建立的心理状况预报系统，可以把分析的结果转换成可视化的报表，使教育者能够直观地了解学生的心理状况。通过对学生的心理状况进行实时监控，构建了一个动态的预警机制，一旦发现有异常的心理指标，就会自动启动多层次的警报，提醒有关人员注意。教育主管部门可根据学生的学习成绩与预警信息，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策略。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智能分类的方法，通过对学生进行心理测评，对其进行分组，并提供与之相对应的心理干预资源。为了进一步完善防范机制，大学可以建立在线沟通平台，组织有相近心理特点的大学生参加小组讨论，通过对讨论内容的分析，发现共同的问题，并提出个性化的心理调节意见。该研究将从数据监控到精确干预进行闭环管理，为建立多层面精神卫生保护网提供技术支持。

四、结语

人工智能赋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既是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破除传统心理服务体系困局的有效途径。本研究立足于从理论到实践的分析考察，阐述 AI 在心理监测、服务供给、风险预防三个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指出其中利用动态画像、精准干预与优化重构等方式实现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重构的逻辑；同时分析了其中技术赋能过程中的现实困境，并指出现实中存在的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如何平衡问题，使得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从以往的经验驱动走向数据—证据双轮驱动，让 AI 更好地发挥作用，在重视技术和教育本质的融合的同时，更好地发挥其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长期赋能作用，成为培养更多有心理韧性和社会适应力的新时代新人的重要支点。

参考文献

[1] 李谷静 .AIGC 赋能下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创新路径探析 [J]. 才智 ,2025(18):97-100.

[2] 王讯 . 新媒体赋能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路径研究 [J]. 新闻研究导刊 ,2025,16(05):104-108.

[3] 孙志颖 , 高亚楠 , 孙春燕 , 等 . 人工智能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增进作用研究 [J]. 电脑采购 ,2024(42):200-202.

[4] 付皓珺 . 人工智能背景下理工类院校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养的新路径 [J]. 才智 ,2025(17):69-72.

[5] 王祉晴 . 人工智能驱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J]. 锦州医科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4,22(06):70-74.

（作者单位：航天工程大学）

地方红色资源融入技工院校思政课教学的实践优势及优化策略研究

林　璐

摘要：地方红色资源是技工院校思政课的重要精神滋养与教学素材，将其有效融入教学，对铸魂育人、提升技能人才综合素养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地方红色资源融入技工院校思政课教学面临资源挖掘转化适配性不足、教学融合设计创新性欠缺、师资素养支撑薄弱、育人机制保障缺失等现实难点。本文立足技工院校办学特色与学生认知特点，从核心价值阐释、实践基础与有利条件、优化策略构建三个维度展开研究，提出资源开发整合、教学路径创新、师资队伍赋能、长效机制完善等针对性策略，为推动地方红色资源与技工院校思政课深度融合、提升教学实效性提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地方红色资源；技工院校；思政课教学；融合难点；突破策略

红色资源是赓续红色血脉、开展思政教育的宝贵财富，地方红色资源以其鲜明地域特色和鲜活实践内涵，为技工院校思政课注入独特活力。作为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的核心阵地，技工院校肩负着“德技并修、育匠铸魂”使命，将地方红色资源融入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当前，技工院校思政课存在内容与职业场景衔接不紧、育人感染力不足等问题，地方红色资源的融入价值尚未充分释放。本文立足技工院校办学定位与学生群体特点，系统探究地方红色资源融入思政课的核心价值、实践基础与有利条件，构建科学有效的优化策略，为提升思政课教学实效性、培养兼具职业素养与家国情怀的新时代技能人才提供有力支撑。

一、地方红色资源融入技工院校思政课的核心价值

（一）铸魂育人的精神滋养价值

地方红色资源凝结着特定地域的革命记忆与精神内核，是技工院校思政课铸魂育人的优质素材。从本地革命遗址的沧桑印记到英雄人物的感人事迹，红色资源以具象化、场景化的呈现方式，将抽象的理想信念、爱国主义精神转化为可感知的教育载体。技工院校学生正处于价值观塑造关键期，面对多元文化冲击与功利化思潮影响，通过沉浸式学习地方红色历史，能直观体悟“不怕牺牲、艰苦奋斗、忠诚担当”的红色精神，摒弃浮躁化、功利化的价值倾向。这种精神滋养并非生硬灌输，而是在情感共鸣中实现思想升华，引导学生将红色基因内化为坚定的理想信念，转化为立足岗位、奉献社会的行动自觉，助力其成长为兼具家国情怀与高尚品德的时代新人。

（二）技能人才的素养提升价值

技工院校以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为核心目标，地方红色资源的融入为技能人才综合素养提升提供了重要路径。红色资源中蕴含的工匠精神、责任担当与协作意识，与技工教育“德技并修”的培养理念高度契合。挖掘地方红色资源中的工匠故事，如革命时期军工生产中的技术攻坚案例、建设年代行业标兵的钻研事迹，能引导学生树立“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职业追求。同时，红色资源传递的爱岗敬业、诚实守信、攻坚克难等品质，可有效弥补技工院校学生职业素养培养的短板[1]。通过将红色精神与职业场景深度结合，让学生在掌握专业技能的同时，能深刻理解职业的社会价值，养成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与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成长为既懂技术又有情怀的复合型技能人才，增强职场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思政课程的内涵拓展价值

地方红色资源的融入为技工院校思政课摆脱传统教学困境、拓展内涵边界提供了有效支撑。传统思政课常因内容抽象、形式单一、脱离学生实际而吸引力不足，地方红色资源则立足地域历史文化，将宏大革命叙事转化为贴近学生生活的身边案例，让思政课内容更具亲和力与针对性。例如，组织学生走进本地红色纪念馆开展现场教学，围绕地方红色事件设计主题

研讨、实践调研等活动，推动思政课从课堂延伸到社会，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体验的有机融合。这种融合不仅丰富了思政课的教学内容与形式，更推动课程从“知识传授”向“价值引领 + 能力培养”转型，既强化了思政教育的思想性与政治性，又增强了课程的实践性与趣味性，有效破解教学同质化难题，提升思政课的吸引力与实效性。

（四）地方文化的传承创新价值

地方红色资源是地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融入技工院校思政课兼具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双重价值。技工院校学生多为本地生源或计划在当地就业，对家乡文化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思政课成为传承地方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系统学习地方红色历史、解读红色文化内涵，让学生能深入了解家乡的精神底蕴与发展脉络，增强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主动成为地方红色文化的传承者[2]。同时，教学中鼓励学生结合专业技能对红色文化进行创新性表达，如利用新媒体技术制作红色主题短视频、通过文创设计将红色元素与实用产品结合、以情景剧演绎红色故事等，实现红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这种传承与创新不仅让地方红色文化在青年一代中赓续绵延，更能借助技能人才的实践能力，让红色文化融入生产生活，为地方文化繁荣与区域精神文明建设注入持久动力。

二、地方红色资源融入技工院校思政课的实践基础与有利条件

（一）资源供给的丰富性与适配潜力

地方红色资源存量丰厚、类型多元，涵盖革命遗址、工业遗产、英雄事迹、行业标兵奋斗历程等多个维度，为技工院校思政课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教学素材库。这些资源不仅承载着爱国主义、艰苦奋斗等核心精神，更蕴含着与技工教育“技能导向、职业聚焦”特质高度契合的技术攻坚、工匠精神、协作担当等元素，为资源与教学的精准适配奠定了天然基础。例如，军工企业红色历史可与机械制造专业对接，地方建设者的技术革新故事可融入电工电子教学，通过针对性开发转化，能形成适配不同专业的模块化教学内容[3]。同时，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为资源呈现形式创新提供了支撑，VR/AR 场景还原、红色技能主题短视频、职业情境模拟剧本等数字化载体，可将传统文字、图片资源转化为具象化、互动性强的教学素材，精准匹配技工院校学生实践化、具象化的学习偏好，大幅提升资源的吸引力与适配性，为深度融合创造了广阔空间。

（二）教学融合的创新空间与实践路径

思政课教学改革推进的大背景，为红色资源融入提供了丰富的创新可能。现代教学方法的普及，让项目式教学、情境教学等与红色资源的结合具备了实践基础，可通过设计“红色工匠技术攻坚”等主题项目，实现红色精神与技能训练的有机融合。线下实践场景的拓展，为红色资源融入提供了多元载体，院校可与本地红色场馆、党史机构共建教学基地，开展沉浸式研学、志愿服务等活动，打破课堂边界。同时，技工院校学生对家乡文化的天然亲近感，让结合地方红色故事的教学内容更易引发情感共鸣，通过前期理论铺垫、中期引导探究、后期反思升华的完整设计，能让红色资源真正走进学生内心，为教学融合的深度推进筑牢基础。

（三）师资队伍的成长基础与赋能可能

技工院校思政课教师具备扎实的理论教学功底，为红色资源融入提供了核心支撑。教师群体对思政教育的价值认同度高，具备主动探索红色资源育人价值的积极性，且跨学科合作的意愿日益增强。通过系统的专项培训，邀请党史专家、行业工匠授课，可快速提升教师对红色资源历史背景、精神内核的解读能力；借助跨学科教研共建，思政教师与专业教师结对合作，能有效弥补跨学科整合与实践教学设计的短板。红色资源实践研修基地的建立，为教师提供了实地走访、收集鲜活案例的平台，助力教学内容脱离空洞说教，同时，教学交流展示活动的开展，能促进优秀融合教学经验的分享传播，持续提升师资队伍的融合教学能力。

（四）育人机制的构建基础与保障支撑

多方协同育人的共识，为机制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院校与地方文旅部门、红色场馆、行业企业等主体存在强烈的合作意愿，可通过签订长期合作协议，构建资源共享、师资互聘、实践共建的协同育人格局。教学评价体系的改革趋势，推动评价标准从单一理论考核向多元化、过程化转变，为建立红色资源融入效果的专项评价指标创造了条件，可通过课堂表现、实践报告、红色文化作品等多维度衡量教学成效。院校对思政教育的重视，为专项经费的设立提供了保障，可专项用于资源开发、数字化载体创新、师资培训等工作。同时，督导反馈与资源管理机制的逐步完善，能确保红色资源融入教学的常态化、规范化推进，为融合育人提供稳定支撑。

三、地方红色资源融入技工院校思政课的突破策略

（一）构建资源开发与整合体系

聚焦技工教育“技能导向、职业聚焦”特质，搭建地方红色资源精准开发与系统整合体系。联合地方党史研究机构、文旅部门开展专项调研，全面梳理红色遗址、英雄事迹、工业遗产等资源，建立分类分级的红色资源数据库。深度挖掘资源与专业教学的契合点，如将军工企业红色历史与机械制造专业对接、将地方建设者奋斗故事与电工电子专业融合，开发适配

不同专业的模块化教学素材。创新资源呈现形式，运用 VR/AR 技术还原红色场景、制作技能主题红色短视频、设计职业情境模拟剧本，打造数字化、互动性的资源载体[4]。建立资源动态更新机制，结合时代发展与行业变革，持续补充新时代产业工匠、技能标兵等红色新素材，实现红色资源与技工教育的精准适配。

（二）创新教学融合与实施路径

打破传统教学模式局限，构建“理论 + 实践 + 职业”三位一体的融合教学路径。课堂教学中采用项目式、情境式教学方法，以红色任务驱动学习，如围绕“红色工匠的技术攻坚”设计专业实践项目，让学生在技能训练中感悟红色精神。拓展线下实践场景，与地方红色场馆共建教学基地，开展“红色研学 + 技能实践”活动，如组织学生参与红色遗址修复志愿服务、用专业技能助力红色文化传播。推动跨学科融合，将红色资源融入职业道德、就业指导等课程，设计“红色职业素养”主题模块，通过案例研讨、角色扮演等形式，强化红色精神与职业发展的关联。利用新媒体平台搭建线上学习空间，推送红色技能微课、开展线上红色技能竞赛，实现线上线下协同育人，提升教学感染力与实效性。

（三）强化师资队伍建设与赋能

构建“理论提升 + 技能培训 + 实践研修”的全方位师资培育体系，着力提升教师红色资源与思政课融合教学的核心能力。定期组织思政教师参与地方红色资源专题培训，邀请党史专家、红色文化研究者、行业资深工匠授课，系统讲解地方红色历史脉络、精神内核及时代价值，帮助教师精准把握资源与思政教育、职业素养培育的契合点。开展跨学科教研共建活动，组织思政课教师与机械、电工、汽车等专业教师结对合作，共同挖掘红色资源与专业教学的融合点，联合设计教学方案、开发教学素材，提升教师的跨学科整合能力。建立红色资源实践研修基地，定期组织教师实地走访红色遗址、红色企业，访谈老党员、老工匠，收集鲜活的教学案例与实践素材，避免教学内容脱离实际。搭建教学交流展示平台，举办融合教学示范课、说课比赛、优秀案例分享会等活动，为教师提供相互学习、借鉴提升的渠道，推广先进教学方法与经验。完善教师考核激励机制，将红色资源融入教学的能力、成效纳入教师考核评价体系，对在融合教学中表现突出的教师给予表彰奖励，激励教师主动探索创新，打造一支兼具扎实思政素养、专业教学能力与红色文化解读能力的复合型师资队伍。

（四）完善长效机制与保障措施

建立健全系统性保障机制，为地方红色资源融入技工院校思政课提供持久、稳定的支撑。构建“院校 + 地方 + 企业”协同育人机制，院校主动与地方文旅部门、红色场馆、党史研究机构、行业企业签订长期合作协议，明确资源共享、师资互聘、实践共建、课题研究等合作内容，打破资源壁垒，形成优势互补的育人合力。例如与红色场馆合作开发定制化研学课程，组织学生开展沉浸式教学；与企业联合开展“红色工匠进校园”活动，邀请企业技术骨干分享践行红色精神的职业经历，强化理论与实践的衔接。优化评价考核机制，建立多元化、过程化的评价体系，改变传统以理论知识考核为主的模式，将学生的红色精神认同、职业素养提升、实践参与情况、红色文化传播贡献等纳入评价指标，采用课堂表现、实践报告、职业行为观察、红色文化作品创作等多种评价方式，全面衡量融合教学效果[5]。设立专项保障经费，纳入院校年度预算，专门用于红色资源开发、数字化教学载体创新、师资培训、实践活动开展、教学基地建设等工作。建立督导反馈与动态调整机制，成立由思政专家、专业教师、行业代表组成的专项督导组，定期检查评估教学情况，收集师生反馈意见并优化调整；完善资源管理机制，明确责任主体与流程，专人负责资源库的维护更新，确保资源库规范常态化运行。

四、结语

地方红色资源为技工院校思政课注入独特活力，是培育德技并修技能人才的重要支撑。本文围绕融合价值、实践基础、有利条件与优化策略的研究，为实践推进提供了有效指引。未来，需进一步深化红色资源与职业教育的精准契合，推动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让红色基因深度融入技能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新时代工匠培育筑牢思想根基。

参考文献

[1] 孙碧艳，李卫东 . 新时代湖南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职思政课的实践困境与突破路径探究 [J]. 艺术科技 ,2025,38(01):196-198.

[2] 陈琴 . 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实践探索——以皖东地区为例 [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5,43(05):163-166.

[3] 秦燕春 . 数字化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的挑战、策略与效果研究 [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5,38(11):178-180.

[4] 张弢 .“大思政课”视域下陇南红色文化资源在地方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中的应用 [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25(20):54-58.

[5] 夏艳梅 . 立德树人 : 将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思政课一体化教学 [J]. 武汉商学院学报 ,2025,39(04):94-96.

（作者单位：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

“一体两翼”背景下职业院校煤炭类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探索

刘　刚

摘要：全面推进“一体两翼”建设是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举措，更是新时期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高职院校煤炭类专业作为服务国家能源战略人才培养重要支撑，其课程思政建设存在思政元素挖掘不深、育人模式脱离行业实践、学生职业认同感不强等现实问题。本文立足煤炭类专业育人实际，紧扣“一体两翼”建设要求，将产教融合资源与课程思政建设有机融合，探索构建“课程思政+产教融合”双向驱动育人模式。通过深挖行业思政资源、创新多元教学方式等方式，摆脱传统育人困境，强化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的协同效应，助力学生树立能源报国理想，培养兼具精湛技艺与高尚品德的高技能人才，切实落实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职业教育使命。

关键词：职业教育；一体两翼；思政元素；课程思政；产教融合

高校的使命在于立德树人，强化课程思政建设，是实现育人使命的根本保障，课程思政作为一种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课程教学有机融合的教育形式[1]，旨在增强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助力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目前，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课程思政的价值和意义愈发明确，研究思路和角度也日益完善[2-4]。与此同时，随着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在新时代“一体两翼”建设背景下，在产教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引导下，对毕业生的思想道德水平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专业课程建设必须紧跟时代发展步伐，持续完善与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切实将立德树人这一教育的根本任务落到实处。

高职院校煤炭类专业是一门理论性与实践性非常强的专业，具有明显的行业特色，传统的课程思政往往脱离实践、远离岗位，行业、企业元素挖掘不深入，思政育人没有融入实践教育，导致理论与实践不能相辅相成，影响学生对专业的感知和认同，导致学生学习信心不足、学习效果较差、岗位认同感不强。鉴于此，基于煤炭类专业实际，积极推进“一体两翼”建设背景下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深入探索煤炭类专业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路径，将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入专业课程教学，为煤炭行业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供坚实保障。

一、“一体两翼”背景下课程思政建设的时代意义与价值体现

全面推进“一体两翼”建设是新时期发展职业教育的重要举措[5]，以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为根基，以打造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为具体举措，充分融合政、行、校、企等多方资源，聚焦区域和行业产业特色，产教深度交融，汇聚产教优势资源，创新人才培养、供给模式，形成带动区域发展和行业进步的良好格局，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支撑和平台保障。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作为开展“一体两翼”建设的核心内涵，将极大地推动校企双方在技术服务、基地共建、师资培训等众多方面开展深度合作，以互利共赢为目的，携手打造校企合作命运共同体，实现同心同向、互利共赢。

在众多校企深度合作中，必将以人才精准供给为纽带，扎实开展专业、基地、师资等联培共建工作，汇聚各方资源，形成双元育人合力，推动产教融合工作走深走实，校企协同育人质量也将是“一体两翼”建设成效的关键体现，因此如何培养符合行业发展要求的技术技能人才尤为重要。煤炭行业作为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保障，目前正处在绿色转型与智能化升级的关键期，急需“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德才兼备的技术技能人才。在此背景下，强化课程思政建设，深挖煤炭行业思政元素，以校园文化、企业文化、行业文化为引领，弘扬“工匠精神、劳模精神”，能够

引导学生树立“能源报国”理想，在掌握专业技能的同时，提高对行业使命的认知，增强服务国家能源战略的责任感，让广大有志青年甘愿扎根煤海，奉献青春力量。因此，基于“一体两翼”建设背景下开展课程思政教育，既满足现代职业教育发展要求，强化校企衔接，提升了人才培养质量，同时提升了学生对专业、行业、岗位的认同感和使命感，为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与人才支撑，德技并存、软硬兼修，提升大学生文化自信，激发学生学习内驱力，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实现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协同并进，彰显职业教育在服务产业、赋能国家能源安全战略中的独特作用。

二、职业院校煤炭类专业课程思政育人现状和问题分析

目前，课程思政育人工作已成为教育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大家广泛重视并取得了显著的育人成效[6-8]，但煤炭行业的工作环境、工作岗位的特殊性，导致煤炭类专业课程思政工作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一方面是思政元素挖掘深度欠缺、广度不够，相关案例未能与学生产生共鸣，脱离学生生活与行业实际，不能改善学生对煤矿行业新的认知，赋能提升作用不明显。另一方面是思政元素呈现方式缺乏温度，且多以教师讲授为主，无法引发学生情感共鸣。

针对“00后”新时代大学生的品格特性，未能充分发挥校企合作资源优势，有效结合煤炭类专业工作环境复杂、条件艰苦等情况，导致育人效果不佳，学生对煤炭行业岗位认识不清、职业认同感不强、能力信心不足、企业文化不认同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分析研究新时代煤炭类专业发展现状与需求，明晰产教融合因素与思政教育融合方面存在的问题，发挥产教融合优势资源以及思政教育在价值观引领与道德培育、文化传承与职业素养提升等方面的功效，培养更多符合新时代煤炭行业发展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

三、“一体两翼”背景下煤炭类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路径探索

在“一体两翼”发展框架下，针对当前高职院校煤炭类专业课程思政教学存在的现实问题，需重新梳理产教融合因素与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环节及内在契合点，探索具有针对性的教学改革路径。

（一）深挖思政资源，结合校企优势资源，明确思政元素融入点

立足煤炭类专业实际，深度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根据德育为先的课程思政育人目标，以“共同体”和“联合体”等平台建设项目为依托，从国家能源战略、重大工程建设项目、重大科研成果、先进事迹等维度出发，深度挖掘其中蕴含的工匠精神、科学精神与价值理念等思政元素，形成煤矿类专业思政元素素材库。思政元素紧密对接合作企业与合作项目，立足“专业对接产业、课程对接岗位、教学过程对接生产过程”的产教深度融合要求，把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程教学全过程。

发挥思政元素育人效应，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劳模精神”，引导学生树立精益求精的职业态度和爱岗敬业的职业精神，帮助学生清晰认识现代煤炭行业发展现状，了解行业地位，增强其专业的认同感，激发学习内驱动力，同时帮助其制定基于行业发展的个人职业生涯规划，在传授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对家国情怀与责任精神，实现育人效果全面提升，打破传统“煤黑子”固有形象，点亮新时代“煤亮子”特色品牌。

（二）探索多元教学方式，提升学生学习热情

教法是决定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在新时代“产教融合，双元育人”模式的带动下，将课堂带到项目现场或实训基地，让学生在“做中学、学中做”，理论紧密联系实际，进而将传统教学中深奥难懂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具体的操作标准、操作方法，有效克服了高职院校学生“底子差”，理论知识理解不到位的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改善授课效果。

依托产教融合的优势资源，采用更多项目式、工单式、案例式教学方式，让学生多“练手”，老师少“练嘴”，实现了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任务。深入矿区，师傅带徒弟式的教学模式，让学生解除了教室的固有束缚，让他们真切地感受到学以致用的实质内涵，通过对企业文化、行业及岗位的全方位了解，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在师傅言传身教的影响下，也增强了对学生“工匠精神”的培养，对全面提高学生“知行合一、精益求精、敢于创新”的职业精神，强化学生的综合职业素养具有重要的帮助。

充分依托校企合作单位在订单班培养、顶岗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科研孵化、就业供需对接等方面的合作项目，构建“认识实习—实践锻炼—顶岗实习”贯通式的校企实践活动体系。以实习就业一站通机制为支撑，不断完善师资锻炼与人才培养的“全链条”服务保障，构建覆盖大学生从实习到就业的“一条龙”服务机制。通过贯通新生认识实习、老生实践锻炼、毕业生就业指导的育人全过程，实现“新生筑基、老生强技、毕业即就业”的一体化育人目标，从而进一步增强学生对煤炭类专业的认同感。

（三）深挖和完善教学资源，丰富课堂教学内容

发挥课程思政的育人功效，深挖专业课知识点与思政元素的契合点，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思政元素融入教学环节，促进教学内容与生产实践的无缝对接，坚持文化聚焦，以“校企行”共同的文化认同为引领，充分发挥行业、专业的文化特色，大力弘扬“工匠精神”

与“劳模精神”，将企业文化引入课堂，将课堂搬进工厂车间，引入行业大师与能工巧匠，塑造学生的专业情怀，提升学生的行业认同感，以高度的文化融合促进产学研用的全面贯通，保证产教深度融合，发挥文化引领与促进作用。

专职教师作为教育工作的主体，可以充分利用“产教融合、双元育人”的优势资源，依靠自身扎实的理论基础，结合行业现状，通过科研创新等方式，加强对外交流，在获取行业认知与思考、掌握行业发展趋势的同时，结合自身教学实际，在“匹配性”的教学内容基础上多一些思考，为开展“超前性”教学提供思路与素材支撑，对帮助学生了解行业发展趋势，培养适应技术进步和创新精神等综合职业素养具有重要的帮助。

四、打造“课程思政”+“产教融合”双向驱动课程思政育人模式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职业教育不仅要注重“谋业”，帮助学生掌握专业技能，实现就业目标，更要关注“人本”，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要突出课程思政建设的核心地位，发挥“政、行、企、校”协同育人的功效，培养出既有扎实专业知识，又具备高尚思想道德和崇高职业素养的新时代职业人才。

（一）组建多元思政团队，提升课程思政育人水平

组建专业教师 + 思政教师 + 企业导师思政团队，提升课程思政能力。打造具有多学科背景、多学科融合且能够得到企业一线工作标准的队伍，实现理论知识讲授、职业素养提升和人文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三方共同助力学生学习成长。

（二）梳理专业课知识体系，深度融入思政元素

构建煤炭类专业课课程思政元素素材库，对标专业课知识体系，以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目标，发挥思政育人使命，依托“一体两翼”建设平台，发挥产教融合优势资源，深挖煤炭行业思政元素，形成“课程内涵思政，思政提升课程”的典型示范，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形成校企协同育人共同体。

（三）创新双驱动育人模式

融合企业优势资源，激发“双元育人”实效，提升思政育人效果。依靠企业“第二课堂”、企业导师入课堂的方式，实现了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和全方位育人，使思政育人深入学生内心，激发学生探索课程思政的能动性，提升育人效果。

（四）建立三方反馈机制，优化考核标准

建立授课教师、用人单位和学生三方的评价及反馈机制，从多个维度了解课程思政育人效果，在“教—学—用”整个育人过程中，持续开展同行专家评课程质量、学生评教学效果、企业评育人质量、持续优化课程思政育人方法的活动，不断提升课程思政育人效果，同时将思政表现纳入学生的综合考核体系，激励学生积极参与思政学习。

五、结语

将课程思政与“一体两翼”建设融会贯通符合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核心内涵，可推动现代职业教育在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方面走深走实，以校园文化、企业文化、行业文化为引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弘扬“工匠精神、劳模精神”，激发双元育人活力，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崇高使命。“一体两翼”背景下，“课程思政”+“产教融合”双驱动育人模式是推进现代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途径，为专业人才培养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思路，注入了新的活力，对提升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也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何红娟 .“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建构策略 [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17(33):60-64.

[2] 马萱 .“双高计划”背景下课程思政融入信息技术基础类课程的研究与实践 [J].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23,28(S01):66-69.

[3] 杨志清 . 立德树人视域下“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路径研究 [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3,36(24):110-113.

[4] 张大良 . 课程思政 : 新时期立德树人的根本遵循 [J]. 中国高教研究 ,2021(01):5-9.

[5] 尹玉辉 , 靳瑾 , 宗诚 .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现状、困境与推进策略——基于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发展的调研报告 [J]. 职教论坛 ,2025,41(01):31-38.

[6] 高宁 , 王喜忠 . 全面把握《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理论性、整体性和系统性 [J]. 中国大学教学 ,2020(09):17-22.

[7] 蒲清平 , 何丽玲 . 高校课程思政改革的趋势、堵点、痛点、难点与应对策略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2(05):105-114.

[8] 罗仲尤 , 段丽 , 陈辉 . 高校专业课教师推进课程思政的实践逻辑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9(11):138-143.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 2024 年度陕西省“十四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一体两翼’背景下煤炭类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与探索”（SGH24Y3213）。

（作者系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产教融合背景下“AI+ 思政课”教学模式创新与学生参与度提升策略

马　力

摘要：在产教融合纵深推进与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发展的双重背景下，高校思政课面临着教学模式创新与学生参与度提升的双重命题。本研究立足《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的政策语境，聚焦 AI 技术与思政教育教学的深度耦合，旨在构建产教融合导向的“AI+ 思政课”创新框架并探索参与度提升路径。研究首先从产业升级对价值观培育的新要求、传统教学模式的结构性矛盾出发，阐明 AI 技术赋能思政课改革的逻辑起点，继而基于技术接受模型（TAM）拓展，从学生、教师、智能化资源、产教融合评价机制等维度解构参与度影响因素，最终提出“教学流程重构—产教资源整合—参与激励机制”三维协同策略体系。

关键词：产教融合；AI 技术；思政课教学；学生参与度

一、引言

《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的大力实施，产业升级对人才培育提出了“价值导向与职业技能并重”的新要求，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在案例更新的及时性、互动机制的有效性、评估指标的合理性等方面存在不足，导致其难以适应产教融合背景下“课程思政与专业教学互相促进”的育人需求。智能交互技术、人工智能手段，就如大数据分析与虚拟仿真的实践，为解决挑战开拓了创新之路[1]。在这样的背景下，本研究理论层面的贡献是超出传统教育理论的范畴，采用产教协同的双重视角方式，再度构建起“AI + 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体系，详细探析人工智能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间的集成运行机理。从实践意义角度看，本研究计划为高校探索一条从“技术应用”到“流程再造”，再到“评价创新”的恰当路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教学模式的革新并非简单地用技术替代传统教学活动，而是依靠数据驱动来达成精准教学、通过场景模拟构建沉浸式体验，目的是消除思政教育与产业实践之间的藩篱，以此推动学习者从被动获取知识转变为主动积极地融入其中。这是数字时代思政课程革新的必然趋势，也是在产教融合背景下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着力点。

二、思政课教学模式创新的必要性

（一）产业升级对思政教育的新诉求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持续深入推进，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提出了既突出价值观导向又具备技术操作能力的双重需求。处于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发展的背景之下，学生除了要掌握先进的技术技能，还需造就契合产业伦理的道德素养、面对技术变动的创新观念，以及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担当意识，这成为产教融合模式下思政教育的关键目标。在“课程思政与专业教育同步前行”的育人机制下，思政课程应跨越学科的边界，积极契合产业实际情形，于教学过程中融入产业发展的价值取向要点，犹如在智能制造领域凸显绿色生产原则，该举动的目的是推动从单纯知识传播到产业价值观培育的转变。值得注意的是，新兴需求不只是体现在对人才培养目标的更新换代里，还体现在教学实践中需要形成一种深度融合“思想政治教育元素与专业应用场景”的内容框架，以应对产业升级转型对综合、复合型人才的多样化需求。

（二）传统思政课教学模式的结构性矛盾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教学模式，在产教融合的背景下所面临的适应性挑战，主要体现在教学供给层面、学生需求层面以及产教对接层面的冲突之中。从教学供给角度看，教材内容未能及时跟上产业实践的演变步伐，特别是新兴领域的典型事例和前瞻话题难以即时融入教学材料，从而造成了理论教学与产业实际之间的脱节。针对学生需求，Z 世代数字化原生代对传统的单向传授和标准化教学模式的兴趣日益减弱，他们偏好通过深度沉浸式的体验和个性化的互动

来获取知识。在产教融合环节，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与企业的合作育人机制尚显薄弱，企业导师在课程规划与实践教学中的参与度有限，难以将企业一线的实际问题转化为富有活力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复杂的矛盾交织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在产教融合过程中面临着“育人效能下降”的风险，亟需通过教学模式的革新来重塑“供给—需求—对接”的动态均衡体系。

（三）AI 技术赋能教学模式创新的逻辑起点

毋庸置疑，AI 技术充当了教学方式的创新驱动力，引领思政课程从传统“经验依赖”转向“数据驱动”，并促成动态构建的转变，为解决产教融合中教学适应性问题开辟了技术路径 [2]。AI 技术扮演了教学方式革命性变革的角色，促进了思政课由传统“经验主导”转向“数据驱动”，并促成了“动态互动”模式的升级，为解决产教融合中教学适应性问题开辟了创新路径，提供了关键的技术解决方案。AI 技术充当了教学方式革新的引领者，有力地促成了思政课程从传统的“经验导向”转向“数据驱动”，以及从“单向传递”转向“动态构建”的转变，为解决产教融合中教学适应性问题开辟了创新路径。AI 技术在教学领域扮演着创新驱动力的角色，促进了思政课由传统的“经验导向”转向“数据驱动”，并实现了从“单向传递”到“互动构建”的转变，为解决产教融合中教学适应性问题提供了关键的技术路径。

三、影响学生思政课参与度的核心因素

（一）学生主体维度

基于技术接受模型（TAM）的视角，学生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认知评价是其参与行为的理论开端。在认知维度上，学生对于“人工智能能否增强学习效果”的主观评价显著影响其对技术的接纳倾向——若学生认为 AI 能借助智能学情评估为其量身定制个性化的学习路线，他们通常会表现出更高的课堂互动积极性；相反，如果他们感知到技术手段过于侧重“工具理性”，可能会压抑内在的“价值理性”，从而导致学习参与度下降。在情感维度上，技术使用焦虑源于数字鸿沟，显著妨碍了学习过程：某些学生由于缺乏对智能设备的操作实践或是对算法逻辑的认知不足，在虚拟仿真实验室环境中常感挫败，从而形成一种情感反应链“技术抗拒—内容抵触”，这进一步降低了他们的参与积极性。在价值认同维度下，思政教育的独特性得以彰显：唯有当学生认识到思政元素（如行业道德、职业态度）与其职业生涯的紧密联系时，人工智能驱动的教学环境方能激发深度参与，否则这种技术应用可能被学生视作表面化的任务。

（二）教学主体维度

在教学流程中，教师充当核心角色，其技术能力及其互动技巧组成了影响学生参与度的核心要素，AI 应用技能与思想政治教育策略的整合程度，直接作用于技术增强的实际效能——如果教师只把 AI 作为教学辅助手段的盲目堆砌，而未将其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逻辑，这有可能导致技术运用与培养目标出现脱节，由此使学生的参与热情降低 [3]。在研讨智能化背景下师生互动模式的发展走向时，面临一种“技术悖论”：虽然人工智能凭借其数据挖掘能力能对学生学习状况做出精确评估，但如果教育工作者过度依赖算法的决策结论，却忽视了跟学生当面交谈，可能会产生“情感疏离”的现象，造成互动过程只局限在知识的单向流转，而无法深入触及培养学生价值观这一更深层的需求。有效的交互要体现为“智能解析与情感共鸣”的融合体系，犹如在 AI 推动的产业伦理辩论场景里，教育者要敏锐地识别学生价值观上的疑惑，并采用即时回应手段来强化情感纽带。

（三）教学资源维度

智能教学资源的水平借助输入界面显著影响学生的参与动机，在内容供应层面，产业事例智能化转换速率显著决定着教育素材的价值与魅力：传统思政课程案例集的更新周期相当冗长，往往难以立刻捕捉到区块链、元宇宙等新兴行业的道德矛盾，而人工智能生成方法虽能快速识别行业焦点并转化为微型故事，然而要警惕算法偏差引发的案例内容失实风险。就技术支撑这一维度，学习平台的便利状况构成了参与度的隐性阻碍，诸如界面杂乱、互动反应迟滞等技术瑕疵会造成认知负担过重，就非数字原生的那部分人群而言，这些操作障碍或许会让他们选择降低投入程度甚至直接退出。内容与载体适配时应遵照“技术退隐”原则，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应作为“隐形的支架”，其目的为辅助意义构建，而不是通过炫耀性的展示手段，让学生降低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关注。

（四）评价机制维度

评价机制的延时现象构成了阻碍参与度进一步增长的根本障碍，从过程性评估这个维度，传统的思想政治课程爱采用课堂讨论、口头汇报等主观手段跟踪学生参与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学生对在虚拟现实模拟、人工智能辩论等现代教学活动中互动模式进行全面深入的把握。尽管人工智能行为分析可以及时收集交互频率、情绪变化等量化数据，把这些量化的信息合理转化为具备洞察力的定性评价，可以实现对学习进程的有效诊断，但当下亟需搭建一套既科学又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在产教融合所形成的背景下，多元评价机制缺失这一问题尤为明显，目前的评价体系主要聚焦于学校环境里的知识获取，却忽略了产业环境里价值观念与实践能力的评价，尤其是学生在 AI 虚拟实训环境里应对数据安全挑战的具体操作，此关键环节未被纳入评价范畴，评估存在偏差可能引发学生在“课堂参与”与“职业实践”之间形成认知断层，

进而降低他们对思想政治教育长期意义的认知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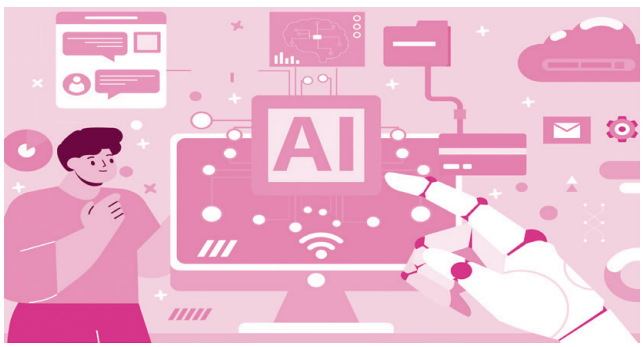
四、“AI+ 思政课”提升学生参与度的策略探究

（一）流程重构：从“单向灌输”到“智能交互”的全周期技术渗透

智能化改造教学流程，核心逻辑就是“数据全程通行”，目标是构建一个包含课前筹备、课堂开展以及课后反馈的闭环互动体系。在课前这个阶段，依靠AI学情诊断系统收集学生专业课程成绩、产业认知测试等方面的数据信息，采用机器学习算法构建个人“产业价值观肖像”。以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为对象，探究他们对算法伦理存在的认知偏差，将此作为教学设计的精准目标[4]。课堂教学实施“双境整合”这一策略，依靠VR技术构建虚拟产业思政教室空间，学生好似身临其境般地成为工程师，在模拟的智能化车间内讨论自动化生产线上关于劳工权利的决策事项；采用智能辩论平台，借助自然语言处理功能即时涌现像“人工智能创作物的所有权归属”等产业前沿话题，系统自动赋予对立观点，还给出数据分析，以此引导学生在辩论中进一步深化批判性思考。课后阶段，采用知识图谱技术，按照学生的课堂参与表现为其量身制作个性化学习资源，为财经专业的学生配备区块链金融领域的信用伦理案例集，力图实现从课堂互动到知识深化再到价值延伸的连贯教育成效。

（二）资源整合：“AI+ 行业”思政生态的三维建构路径

产教资源智能化整合聚焦“需求收集—内容创作—实践转化”这一流程，以搭建校企合作的资源整合机制。在内容生成领域，校企共同搭建基于AI的行业思想政治案例数据库，采用网络爬虫技术不停采集行业白皮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等相关文档，依靠主题模型算法识别关键思想教育要点，诸如数据安全、绿色生产等项。对某大数据标注公司出具的运营报告加以分析，摘出“数据隐私保护”的案例，并根据该案例制作出多样化教学资源。在双师协作模式中融入智能化教学辅助工具，该系统可实现行业指导师讲授内容的自动化转录以及思想政治要素的自动识别，可助力教师把企业导师讲的“跨境电商争端解决”实例拆分成诚信培育、法规认知等教学单元。在实践拓展板块，AI驱动的实训平台融入了隐形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在物流管理专业营造的仓库模拟环境里，采用“优先处理环保包装订单”的激励手段，以此引导学生在技能实践时接纳并内化绿色发展理念。



（三）保障实施：技术伦理与教学适配的动态平衡

为达成三维策略的成功实施，需建立起包含“技术实施—道德评估—成效调整”三个环节的保障架构。就技术实施维度而言，搭建一支由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行业资深专家以及人工智能开发者协同组成的设计团队，以保障产教融合背景下思政教学数字化场景构建的伦理合规性[5]。道德评估阶段，采用“算法透明度”的规范，为AI产出的教学实例以及评估成果设立人工复核阶段，以阻止数据偏差可能引起的价值观扭曲，为了达成效果优化目标，按时实施“产教融合参与度调查”，采集学生就技术工具操作是否便利和内容相关性的反馈数据。凭借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各项策略的影响强弱程度，恰当调整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深浅，一旦发觉某个专业群体在使用VR设备时遇到普遍的麻烦，会迅速改变途径提供AR的轻量级应用方案，意在提升技术效率与教育适用性之间找到最理想的平衡点。

五、结语

本文为新时代高校思政理论课的改革提供一个技术强化的实证模式，并提请学术界在科技变革的浪潮中，要始终以理性视角去审视教育本质，以保证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围绕“培养品德、造就人才”的基本目标开展服务。此研究为新时代高等教育思想政治课程改革提供技术驱动的实践借鉴，并鼓励学术界在技术革新中维持对教育核心价值的批判性思考。

参考文献

[1] 苏小红，苗启广，陈文宇. 基于AI赋能和产教融合提升程序设计能力的个性教学模式[J]. 中国大学教学，2023(06):4-9.

[2] 邢延，蔡述庭，肖明，等. 人工智能类课程产教融合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以广东工业大学-华为智能基座课程“模式识别”为例[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4(03):73-78.

[3] 陈东毅. 元宇宙视域下开放大学教育模式与教师素养分析[J]. 成人教育，2023, 43(03):55-60.

[4] 石伟平，范栖银. 从校企合作到产教融合：全面深化职业教育改革的现实挑战与突破路径[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58(03):46-56.

[5] 黄胜，刘国权，苏长青. 教育领域ChatGPT应用伦理困境与纾解对策[J]. 继续教育研究，2024(09):45-48.

（作者系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讲师）

基于“岗课赛证”模式下“液压与气动技术”课程的教学改革探索

徐春荣

摘要：基于“岗课赛证”融合模式的“液压与气动技术”课程教学，是将该课程的理论知识与就业岗位、技能竞赛及“1+X”考证所需的实践技能相结合并融入教学过程中。此教学模式，通过将“岗赛证”所需要考核掌握的技能点融入教学过程，可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积极作用，提升教学的质量，使学生能更好地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相融合，更加贴近岗位行业的要求；同时，将“岗课赛证”深入融于“液压与气动技术”课程教学实践，既有利于更好地完成该课程的教学任务，也有利于该课程的建设，更有利于实现新时代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培养。因此，在“岗课赛证”融合理念下，优化“液压与气压传动技术”课程的设计框架与实施路径，能助力学生实现对竞赛、考证和就业的需求。

关键词：岗课赛证；液压与气动技术；教学改革

一、引言

“液压与气动技术”作为职业院校机电类专业学生所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学生通过对该课程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实践训练，毕业后可从事常见液压与气动设备的安装、调试、维修和液压与气压系统分析、故障排除及机电产品管理等工作。学生未来主要面向机械工程师、液压设备维修工、液压与气动设备安装工等工作岗位。传统的“液压与气动技术”课程教学中常忽视“岗课赛证”内容的融合，使学生在学习中出现“为课而学”“为岗而学”“为证而学”“为赛而学”的重复性学习现象。这种学习方式既浪费了教学资源，也增加了教师和学生的压力，而改变上述现象的关键是实施“岗课赛证”融合式课程教学。将“岗课赛证”考核的要点内容及考评机制融入“液压与气动技术”课程教学，既可以使学生在课堂上学到贴合实际应用的理论知识，又可以培养学生与企业岗位需求相匹配的专业技能；同时，融合“岗课赛证”模式的“液压与气动技术”课程教学，既可以使该课程的教学任务更好地实施，也可以推动“液压与气动技术”课程的建设，更高效地实现新时代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培养。

二、“岗课赛证”融合模式下“液压与气动技术”课程教学现状

（一）课岗脱节，影响学生就业

目前，“液压与气动技术”课程的教学以理论为主、实操为辅的教学模式开展。在整个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比较注重对学生认知性和验证性理论知识的讲授，而实训课时安排较少，只占总课时的 1/3，较少涉及液压与气压传动的故障排除及典型液压与气动回路综合实训[1]。虽然很多院校也在积极开展“教学做一体化”的液压与气动技术教学改革，但大多还存在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动手参与实践不足的情况，使得学生在步入就业岗位后面对实际问题时，应用液压与气动技术知识能力及故障排查能力有所欠缺[2]。因此，对企业而言，新招聘的员工能否快速地适应工作岗位，会对企业的生产效能和时间成本产生影响；而对即将毕业的机电类专业学生来说，进入企业后仍需接受进一步的专业技能培训，这不仅延长学生对岗位的适应时间，还可能影响个人的职业发展。

（二）课证分离，无法满足学生工作的需求

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指出，“职业院校要加强与职业技能鉴定机构、行业企业的合作，积极推行‘双证书’制度”。现在各职业院校都在积极推进“1+X”证书的考取工作，但由于考证时对学生人数的限制，在“1+X”证书的获取上不能面向所有学生，使一部分有考证需求的学生不能及时学习相应的考证技能。这部分学生为了考取证书，只能参加社会上组织的考证培训，既占用上班时间，也因脱离学校时间过久导致知识遗忘、技能生疏而使获取证书变得困难。

（三）课赛脱节，教学质量提升缓慢

职业技能大赛的开展为职业教育搭建了展示的平

台，引导职业学校转变教育教学理念，推动职业教育改革。每年国家都会举办各级各类的职业技能大赛，利用技能竞赛，给优秀专业技术人员以鼓励，进而带动整个行业对高水平技能的认同，这对参赛选手的成长帮助尤为明显。但教育是一项面向全体性的教学活动，而竞赛只能优中选优选拔出一批适合竞赛的学生参与其中，所以个别学生技能的提升不代表全体学生技能的掌握[3]。在技能竞赛过程中，往往也最能体现行业的最新发展、技术的最新变革，这正是职业院校教学和培养学生的方向。如果竞赛与教学脱节，会使得大部分未参加竞赛的同学对新知识新技能的掌握不足，影响教育教学质量和育人成效。

为解决“液压与气动技术”课程教学发展现状的诸多不足，近年来我们也在探索“课赛”融合的教学模式，即以职业技能大赛为驱动，在课程教学过程中以“液压与气动系统装调与维护”竞赛项目为参考，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以 THPHDW 液压与气动综合实训平台为载体，通过校企合作，尝试融赛入课，引入竞赛实例和考评机制，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同时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促进教师提高实践教学能力，从而提升“液压与气动技术”课程的教学质量。

三、“岗课赛证”融合模式下的主要内容

在“岗课赛证”融合模式下，将通过以下三个阶段开展“液压与气动技术”课程教学研究。

（一）社会调研阶段

在调研过程中，以当地的机械加工企业生产要求和人才需求为主。这类企业对其招聘的机床操作工、液压维修工的岗位要求主要是熟悉液压系统的原理和设计，具备对常见液压气动系统故障分析和处理的能力，能够理解和应用相关新技术和工具等。因此，教师根据企业岗位能力需求，结合近年来学生参加技能大赛和考取“1+X”证书的实际情况，将企业的生产工艺流程和液压与气动技术的技能标准相结合，把课程考核和技能考核相贯通，及时地把新技术、新规范、新要求纳入教学过程，深入推动“液压与气动技术”课程的建设，并根据企业的生产要求和需求，确定授课内容的重点和方向；同时了解目前企业对招聘液压与气动技术方面员工专业素质的要求，包括对员工的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和职业道德等方面的要求，并在后续课程实施的实训环节对其进行针对性的训练和强化，促进教师将引岗入课应用于教学中，提高教学质量[4]。

（二）专业研讨阶段

通过前期社会调研结果的分析，结合“高等职业学校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教学标准”和“液压与气动技术课程标准”，分析“液压与气动技术”课程的工作任务，通过整合液压与气动技术岗位需求、《高等职业学校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教学标准》《液压与气动技术课程标准》，并根据学生的学习特点，从认知、情感和能力三个维度制定课程目标；同时分析“数控 1+X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初级 / 中级）”和“液压与气动系统装调与维护赛项”的评价标准，将与“液压与气压传动技术”课程相关的考试或竞赛内容挑选出来[5]。将挑选的内容对照“液压与气动技术”课程以模块化的形式进行组合；将划分的内容以知识点或案例的形式融入相应的教学模块。

（三）教学实施阶段

教师结合初级和中级“数控 1+X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考证要点、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液压与气动系统装调与维护赛项”中涉及“液压与气动技术”课程的内容，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和课程内容的特点来制定具体的学期计划及课时计划。

首先，结合“岗课赛证”融合模式，明确“液压与气动技术”课程的教学目标，包括岗位技能培养、课程内容优化、技能竞赛融入以及职业资格证书获取等；其次，明确划分课程中应知和应会的内容，目的是在不增加授课时数的情况下，充分利用现有的教学时间，通过课堂讲解、实训练习、模拟演练和课堂巩固等方式，合理地满足学生的岗位需求、职业资格证书考试要求和技能竞赛要求。然后，将教学内容整合重组，剔除和实践联系不大的高深理论推导，提高实践环节教学内容的比例，增加液压与气动故障诊断及维修部分的内容，同时注重不同学科之间知识的融会贯通。最后，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定期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估和反馈。通过课堂测试、课后拓展等方式，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教学效果；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教学计划和方法，确保教学质量和效果。

四、基于“岗课赛证”融合模式下“液压与气动技术”课程的教学实践研究要点

（一）岗课证赛融合，重构专业教学内容

基于对机电相关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岗位调研发现，专业教学内容需要在以下方面进行融合建构。一是现阶段的加工制造业逐步从简单产品的制造到高精尖产品的研发、生产，产品逐步迈向定制化生产，这就需要课程与岗位及时对接，要求在教学过程中，课程内容的选用要与学生毕业后所需要从事的岗位联系起来，及时将新技术、新规范、新要求及时融入；二是企业对专业技能人才的专业能力和素质要求在提高，企业用人不仅要求员工具备理解和分析液压系统原理的能力，更注重员工在工作过程中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调研对接职业岗位的需求，可以明确课程的培养目标，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强化实践教学，提高学生的专业技术能力和就业竞争力；三是企业对员工的个人素养（如沟通能力、团队协作、服务意识）等）方面的要求往往更加看重，提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培养学生扎实基本功，还要使学生具备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及独立工作能力，拥有良好的沟通及服务意识，具备对项目设计

进行总结、整理、归纳的书面表达及口头表达能力[6]。

（二）课赛融通，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国家级—自治区级—校级”各级各类技能竞赛的开展，目的是希望通过参加竞赛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技能水平和个人素养。从赛后表现及就业状况调查来看，参与过竞赛的学生不但在理论知识和职业技能方面都有显著的提升，而且还掌握了行业的最新技术及综合应用能力，并且学生在就业过程中竞争优势明显，深受广大用人企业的青睐[7]。但是一般情况下，能代表学校参加“液压与气动系统装调与维护”赛项的学生很少，只占整个年级学习者的1%~2%，为了通过竞赛调动更多同学参与其中，在课程的学习中会将往年的“液压与气动系统装调与维护”竞赛的内容及考评机制引入教学。第一，通过将自治区级的“液压与气动系统装调与维护”的竞赛任务拆解后融入日常教学实训过程。第二，在常规教学之余，组织未参与各级各类竞赛的学生通过观摩学生模拟竞赛过程，参与部分内容实践，让学生从竞赛的角度来感受液压与气动技术的发展；同时借助竞赛活动，也可以让学生对液压与气动技能操作的规范性、严谨性有进一步的认识，促进对机电液综合应用技术及技能的掌握，提升未参加竞赛学生学习本课程的兴趣。第三，通过选取区赛成绩优异的学生参与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及金砖国家职业技能大赛，不仅提升了学生的技能水平，也拓展了教师在教学方面对未来液压气动技术发展的视野。近年来学生参与各级组织的“液压与气动系统装调与维护赛项”，共获得国家职业技能大赛三等奖2项、金砖国家职业技能大赛国际总决赛三等奖1项，宁夏回族自治区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4项、三等奖4项，通过这些成绩的取得激发了更多学生学习“液压与气动技术”课程的学习兴趣。

（三）岗课赛证融合，丰富了课程教与学的方式

在“岗课赛证”要点内容融合的过程中，我们积极探索适合“液压与气动技术”课程的教学方式来促进学生对该课程内容的学习，比如尝试情景教学法、任务驱动法、师生共建共享视频库、线上模拟线下演练、引“赛场”入课堂等方式，从而达到人人参与、规范操作、个人素养提升的目的。

（四）融合证赛考评，规范学生技能操作，强化学生素养提升

传统的“液压与气动技术”课程考评大多是以理论考试为主、实操训练为辅，学生重在理论知识的理解与记忆，未能全面反映学生对液压与气动技术故障的排查能力及综合应用能力[8]。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将“液压与气动系统装调与维护”竞赛和中级“数控1+X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评价体系及指标嵌入课程考评全过程，既能够精准对接企业用人需求，又能促使学生扎实掌握液压与气动技术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个人素养。在整个考评过程中，考评成绩由四部分组成，分别是平时成绩、竞赛成绩、项目实训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其中，过程性考核的平时成绩及项目实训成绩可利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线上主要强化学生在理论基础知识和个人素养应知应会能力上的提升，线下主要加强学生对于融合岗课程的液压与气动技术要点的训练。融合“证赛”的考评机制，可以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助于学生巩固所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综合素养。

五、结语

“液压与气动技术”课程的学习，通过将“岗赛证”融入课堂教学，可以更好地将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结合起来，让学生通过贴近企业实际岗位化的情景教学，将“液压与气动系统装调与维护”竞赛项目及“数控1+X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考点内容及考评机制引入课堂教学，既增强了学生学习本门课程的热情与兴趣，也规范了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为学生走向工作岗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为接下来的课程教学提供了新的思路；再者，在“液压与气压传动技术”课程教学过程中将该课程所需的理论知识、技能要点和岗位竞赛考证融合起来，能更好地帮助学生提升其解决问题和分析问题的实际工作能力。

参考文献

[1] 吕明珠 . 立德树人视域下机电专业课程维度创新与优化——以“液气电控制技术”课程为例 [J]. 职业技术 ,2024,23(01):14-21.

[2] 王晓 . 液压传动课程的多模式混合教学改革 [J]. 时代汽车 ,2024(18):81-83.

[3] 李栋 , 张红卫 . 基于 CDIO 理念的机电一体化专业液压与气动课程实践教学改革研究 [J]. 造纸装备及材料 ,2023,52(12):185-187.

[4] 孙万宝 . 技工院校“液压传动与气动技术”课程改革的探索 [J]. 科技风 ,2023(29):143-145.

[5] 胡万强 , 葛瑜 , 王松涛 , 等 . 基于 OBE 理念的液压与气压传动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与持续改进 [J]. 许昌学院学报 ,2023,42(05):153-156.

[6] 李建松 , 黎少辉 , 孙金海 , 等 .《液压与气动技术》课程岗课融合路径探索 [J]. 天津职业大学学报 ,2023,32(04):61-65.

[7] 李振河 , 陈志新 , 张达响 , 等 .“液压传动与控制”课程多元教学改革与实践 [J]. 液压气动与密封 ,2023,43(08):76-79.

[8] 张伦戟 . 中职数控技术应用专业液压与气压传动教学研究 [J]. 现代商贸工业 ,2023,44(17):239-240.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2 年宁夏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教育教学研究项目“基于‘岗课赛证’融合模式下‘液压与气动技术’课程的教学实践研究”（NMYK202208）。

（作者系宁夏民族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新时代高校学生法律素养培育路径研究

柯友清

摘要：法律素养是高校学生融入社会、实现全面发展的基石，更是他们未来参与国家治理、推动社会进步的必备能力。在新时代，培育高校学生法律素养成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服务法治社会建设的关键。本文聚焦新形势下该工作的价值与实践路径展开探讨。其价值体现在三方面：于学生，是成长成才、养成法治思维与社会责任感的必要条件；于高校，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于国家和社会，是降低治理成本、推进法治建设的有效途径。当前高校学生存在法律意识薄弱、知识欠缺的问题，根源在于学生心理发展阶段制约与教学体系不完善。对此，需通过科学设置法律通识课程、将法治教育融入专业教学、强化师资法律素养培训、营造崇法尚法校园文化等路径，多维度提升学生法律素养，为个人全面发展、高校高质量发展与法治国家建设筑牢基础。

关键词：法律素养；高校教育；法治建设；培育路径

在新时代，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遵循与价值主线。而法律素养作为学生综合素质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德法兼修”时代新人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其培育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于 2025 年 11 月 1 日正式施行，青少年作为法治宣传教育的重点对象，其法治素养的培育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在当前高校环境中，部分大学生因法律知识不健全、法律意识淡薄而引发的问题屡见不鲜：有的学生在网络空间肆意发表不实言论或进行人身攻击，引发舆论风波，触碰法律红线；还有学生在兼职或求职过程中，因缺乏合同意识与辨别能力，陷入“校园贷”陷阱或遭遇实习协议欺诈，自身权益遭受严重侵害。这些现实挑战表明，高校已成为法律风险与社会舆论的潜在高发地。因此，我们必须将法律素养培育深度融入立德树人全过程，使其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保证高校学生能够进行合法与安全的社会交往活动，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筑牢法治根基。

一、高校学生法律素养培育的意义

（一）学生自身成长成才的必要条件

大学时期，是一个学生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养成的关键节点，而只有具备了良好的法律素养，才能使他们顺利走出校园，步入社会，日后成为一个对家庭、社会和国家有用的人才[1]。在网络媒体日益大众化的今天，有关高校各类安全事件的信息经常出现，对于高校有着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而究其原因，常常是学生法律知识的缺失、法律意识的淡薄。培养大学生的法律素养，可以使法律服务于生活，在校期间的各种行为，都有“法”可循，使其知道哪些行为是“可为”，哪些行为是“不可为”。有着良好法律素养的高校学生在校期间开展社会交往活动的过程中，能够准确地辨别自身的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有无严重后果，帮助学生明确自身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在校期间就引导学生树立社会责任感，降低他们触犯法规的概率。同时，良好的法律素养不仅仅对于规范学生在校期间行为有所帮助，还有助于学生走出校园后能够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培养学生的法治思维，更好地融入当前的法治社会[2]。

（二）高校谋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其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必然聚焦于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学生作为高校育人成果的直接载体，其整体素质水平与高校高质量发展成效呈现深度绑定的关系——学生的综合素养不仅是高校办学水平的直观体现，更是社会评价高校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指标。具备良好法律素养的学生，在校园生活中能自觉遵守校规校纪、规范自身行为；步入社会后，既能以法律为行为准则维护自身权益，也能

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成为彰显高校育人成效的“活名片”，显著提升学校的社会声誉与口碑。若学生缺乏基本法律意识，不仅可能出现校园内的违规违纪行为，甚至可能因法治观念淡薄引发社会层面的法律纠纷，给高校带来负面舆论压力[3]。这种负面影响会直接削弱高校的社会公信力，降低对优质生源、师资资源的吸引力，进而制约高校高质量发展的步伐。因此，培育学生法律素养绝非额外任务，而是高校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与必由之路，必须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为高校可持续发展筑牢法治根基。

（三）建设法治社会的有效途径

法治社会是法治国家的重要基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机制”，将全民法治素养提升列为核心任务。根据教育部《202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4846万人，涵盖普通本科、职业本科、高职（专科）等各类学生，这一规模庞大、具备较高知识水平的群体，既是未来职业市场核心力量，更是法治理念传播与践行的生力军，其法律素养直接关乎全社会法治生态质量。高校学生通过系统法治教育，能够对自身行为进行规范的同时还能够对他人的行为有着法律上的客观判断，还能树立正确权利义务观、规范自身行为，步入社会后更能在各行各业践行法治精神，运用法律化解矛盾，降低社会治理成本。同时，他们还能弥补基层法律服务资源短缺，为法治社会注入持续动力。因此，强化高校学生法律素养培育，是落实国家法治建设部署、以点带面提升全民法治素养、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有效途径。

二、当前高校学生法律素养现状

（一）学生特定心理发展阶段制约法律意识的健全

大学阶段是青年心理发展的关键时期，其特有的心理规律直接制约了法律意识的健全。首先，心理的波动性与认知的片面性埋下了行为失范的隐患。大学生心智尚未完全成熟，社会经验匮乏，辨别力较弱[4]。在脱离家庭直接监管后，高校的宽松环境使其易弱化自我约束。当他们观察到他人的不当行为未受到及时惩罚时，易因“破窗效应”而产生模仿冲动，低估行为的法律后果。其次，思维发展的矛盾性阻碍了法律知识的内化。此阶段学生自我意识增强，强调个人权利，但对义务的认识往往滞后。他们常将法律条文视为外部的、冰冷的限制，而非权利的保障。这导致其对法律的学习多停留在“工具”层面——仅为应付考试，出现了“知而不信”的现象。最终，上述因素共同导致了深刻的“知”与“行”的脱节。法律素养的关键在于将知识转化为行为选择与维权能力。然而，心理发展的不成熟使得大学生在实践中难以完成这一跃升。在校园的学习期间，他们可能会熟知理论，考试时取得较高的分数，但是却在兼职时不会审阅合同，或在网络争论中轻易发表侵权言论，出现“知法”但不知如何“守法”的情况。当面对真实纠纷或权益受损时，法律知识往往在关键时刻“缺席”，使其无法有效运用法律武器，从而削弱了法律教育的实效。

（二）教学不当导致学生法律知识有欠缺

对于非法学专业的高校学生来说，当前的法律课程主要是作为一门选修课程来开展的，所教授的内容较为宏观，与高校学生实际社交生活等脱离严重。其中存在一些专业的法律条文晦涩难懂的情况，学生对于法律课程的学习也仅仅停留在表面，并没有深入地去理解每个法律条文设置的原因和意义，学习法律课程的主要原因也仅仅是因为培养方案的要求或者学分的认定，最后的目标也是为了通过结业课程的考试，而不是真正地想去了解法律。其次，当前法律知识的教学方式是以大课堂学习为主，对于非法学专业的高校学生来说，教学的手段和内容对他们的吸引力都不够，这也就导致了很多高校学生的法律素养并不是很高[5]。最后，由于现在的就业升学竞争压力比较大，非法学专业的学生会投入绝大部分精力和时间去学习本专业的知识，对于法律知识的学习不够重视，法律素养和法律观念的树立较难在半学期或者是一学期学时内去完成。以上种种情况，都不同程度上反映出了在高校教学当中对于培养学生的法律素养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这也造成了当前高校学生群体法律知识乏欠缺和法律意识淡薄的现状。

三、培养高校学生法律素养的有效途径

（一）科学设置法律课程

对于非法学专业的高校学生来说，高校所开设的法律通识课程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可以培育起良好法律素养的途径。传统的法律教学内容以及教学形式在当前新形势下已经很难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从而导致学生既浪费了宝贵的学习时间又没有培育起良好的法律素养的状况。因此，在法律课程的设置阶段就要明确地把握学生的偏好，在教授好最基本的法律法规的同时要主动地往外拓展延伸，选取与高校学生社交生活最息息相关的一些领域展开法律教学。如可以教授刑法、民法、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与他们走出校园后的工作有所关联的法律法规，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让他们能够主动去学法、守法、用法[6]。同时还需要创新授课方式，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容易让学生产生疲惫感，教学质量转换率不高，可以采用组织学生去旁听法庭审理、进入社区开展普法活动等将法律理论与法律实践相结合的授课形式，使学生的法律素养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高。

（二）将法律素养融入教学活动

正如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的深度转型，高校法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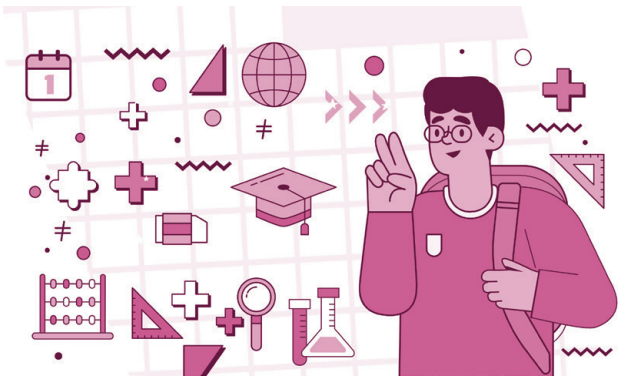
教育也需打破“课堂局限”与“课程壁垒”，实现从“单一授课”到“全域浸润”的转变。当前高校开设的法律基础课程，虽能传递法律知识，但难以覆盖不同专业学生的实践场景需求，更难以培育出适配职业发展的系统法律素养。因此，推动法律教育与专业课程的有机融合，成为提升培育实效的关键抓手。这种融合并非简单的“法律知识 + 专业内容”叠加，而是要立足专业特色，将习近平法治思想、法律规范与职业伦理深度嵌入教学环节。以财会专业为例，在进行专业知识教育时，可向学生讲述典型财务造假、审计造假案例，详细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企业会计准则》中关于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同样，在学科交叉大背景下，经济学专业可融入市场监管、反垄断等法律知识，计算机专业可结合数据安全、网络版权等法治内容。这种融入的优势在于，学生不仅能掌握与本专业强相关的法律规范，更能在具体专业场景中理解法治精神的核心要义，最终帮助学生形成“专业能力 + 法律素养”的双重竞争力，为其未来职业发展和社会参与筑牢法治根基。

（三）加强教师法律素养培养

在学生求学期间，与学生接触最多的便是我们高校的辅导员和专业课程教师。要想提升学生们的法律认知水平，树立法律理念，那么对于教师进行普法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学生在课堂之上所能学到的法律知识很难应用于高校生活中，而辅导员可以在日常的晚点评或者班会活动中开展对应的宣传与讲解，这便要求辅导员自身也要具备良好的法律专业素养[7]。同时学生在专业课程的学习过程中，专业教师要想合理地讲解专业相关的法律案例，也需要具备相应的法律知识与法律素养，这样才能加深学生对于相关法律的认知，也可以让他们在专业领域内不会触碰法律的底线。高校可以常态化地开展法学教师与非法学教师之间的交流活动，同时鼓励教师向校外法律专家请教学习，这样一来，便可以保证教师自身拥有过硬的法律素养。

（四）营造高校法律文化氛围

校园文化可彰显一所学校软实力，营造优良的校园文化，抵制糟粕思想是高校法治建设的重要一环。在校园文化的挖掘与传播过程中，可以加大法治宣传的力度，从而在高校中营造出一种崇法学法的浓厚氛围，可以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对于法律知识的兴趣，让法治理念在心中生根发芽[8]。除宏观层面的重视之外，高校还可以借助第二课堂等多种形式，来帮助学生了解法律，培育法律素养。可以开展与法律相关的社团活动，还可以定期举办专家讲座，介绍行业前沿问题或者是学生感兴趣的话题，不断地增进学生对于法律文化的理解，从而提高自身的法律素养。很多学生是在身边人遇到和法律有关的事情时，才切身感受



到掌握法律知识的重要性，所以还可以帮助他们挖掘身边同学的经历或经验等，让学生之间互相进行法律知识的学习，从而提升学习法律相关知识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四、结语

法律素养是高校学生融入社会、实现全面发展的基石，更是他们未来参与国家治理、推动社会进步的必备能力。在新形势下，高校必须承担起培育时代新人的重任，通过创新课程设置、深化教学改革、强化师资建设、营造法治文化等多维路径，将法律教育的种子播撒到学生学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培养出合格的守法公民，造就一大批具备法治精神、善于运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的栋梁之材，从而为高校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坚实的教育力量。

参考文献

[1] 滕召青 . 全面提升青年大学生法律素养的思考 [J]. 法制博览 ,2019(07):265-266.

[2] 李昱 . 浅谈新形势下高校学生法律素养的提升 [J]. 法制与社会 ,2019(07):195-196.

[3] 杨林 . 高校学生法律素养的现状及对策 [J]. 现代交际 ,2019(20):172-173.

[4] 覃章慧 . 提升高校学生法制素养的对策与途径研究 [J]. 长治学院学报 ,2023(02):125-128.

[5] 马婷 . 高校学生事务管理者法律素养的构建和提升 [J]. 科技视界 ,2016(23):304.

[6] 杨德新 , 李黎炜 . 提升高校学生法律素养路径探索 [J]. 法学文化 ,2021(07):160-162.

[7] 王利军 , 李芳涵 . 提升高校学生法律素养路径探析 [J]. 科技风 ,2020(03):195-196.

[8] 徐晓艺 . 当代高校学生法律素养的现状及培养 [J]. 法学教育 ,2021(04):187-188.

（作者单位：湖北经济学院）

产教融合视域下“5E”学习模式赋能基础护理技术实践教学的应用探索

马　瑞　王改琴　折　慧　邵玉娟　樊元利

摘要：随着职业教育改革不断推进，护理教育十分注重教育质量提升，但传统护理实践教学模式无法满足新时代护理教育教学需求。在产教融合视域下，为有效促进教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通过深化产教融合推动护理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护理实践教学中“5E”学习模式的创新。本文概述了“5E”学习模式的基本理论，结合产教融合对职业教育人才需求分析创新护理实践教学“5E”学习模式的新标向，然后从目标协同、资源整合、教学重构等三个维度提出护理实践教学“5E”学习模式的创新具体策略，以期为实现校企协同育人，破解传统护理实践教学与对接行业人才需求脱节问题提供帮助。

关键词：产教融合；护理；实践教学；“5E”学习模式；创新

一、引言

《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职业教育改革将从“教育”逐渐转向“产教”，通过深化产教融合有助于推动教育链与产业链的有机衔接[1]。新时代产教融合逐渐成为职业教育的基本特征与优势，而护理专业作为职业教育中的热门专业之一，教育教学改革应紧跟时代步伐。但护理专业作为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应用型学科，除了理论教学外，实践教学对培养护理人才质量有着重要影响，亟须创新实践教学模式[2]。“5E”学习模式是一种新型教学模式，在产教融合视域下，将“5E”学习模式运用在护理实践教学中对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创新人才具有重要价值，但需要结合产教融合对护理专业人才需求进行教学模式创新，破解传统护理实践教学中的教学与行业需求脱节、实践资源整合不足等困境，从而提升护理实践教学效率与质量，为护理行业培养更多技能型人才。

二、“5E”学习模式概述

（一）“5E”学习模式概念

“5E”是一种基于构建主义理论所创建的新型学习模式，最早起源于生物学科教学，由参与、探究、解释、拓展、评价5个环节构成，因为5个环节的英文均以“E”开头，所以被称为“5E”学习模式[3]。

（二）“5E”学习模式的主要内容

“5E”学习模式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主张学习者能够主动参与学习，在实践操作和反思总结中实现知识的迁移、内化。其中参与学习环节目标为吸引学生兴趣，类似于教学导入，教师需要采用新颖、有趣的导入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驱动学生主动参与学习，为后续探究做准备。探究环节是“5E”模式的中心环节，是帮助学生掌握技能技巧的关键环节，需要教师转换教学理念，以学生为主体，通过教师的有效引导帮助学生在探究过程中获得新技能[4]。解释环节旨在帮助学生能够迁移知识，通过巩固新旧知识的联系将所学知识内化为经验，在这一环节要求教师能够引导学生主动描述自己所学的知识或技能，从而进一步深入理解相关知识。拓展环节旨在帮助学生将所学知识与技能学以致用，并在实践中扩充新知识。评价环节旨在真实反馈学生学习情况，评价范围是综合性，更关注学生参与课堂探究的程度。

三、产教融合视域下护理实践教学育人新标向

（一）行业需求驱动的技能型人才培养转型

随着医疗行业不断发展，临床护理注重服务质量的提升，这对护理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下，老龄化加剧，我国护理岗位逐渐从临床基础护理朝着多元化护理发展，这包括专科护理、老年护理及社区护理等内容，需要护理人员在掌握护理知识的同时具备良好的临床决策能力、应急处理能力、“以患者为本”的人文关怀素养。但传统护理实践教学模式单一，

多以模拟操作为主，无法满足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需求，难以满足护理行业对复杂情景的处理能力需求。在产教融合视域下，护理实践教学应该结合行业动态创新教学模式，培养满足社会护理人才需求的专业人才。

（二）教学目标与行业需求的精准对接

产教融合有助于满足行业人才需求，使教育供给契合相关行业。传统护理实践中，教师设置的教学目标多以学生掌握相关知识为主，较少关注护理临床岗位对人才的技能需求，因此在学习护理实践技能时以统一的护理流程为主，但根据当前护理实践需求，应针对患者病情及其他相关情况选择制定适合的护理流程[5]。在产教融合视域下，应创新教学模式，通过创新“5E”学习模式，融入行业实践工作流程，确保教学与行业需求贴合，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确保教学与行业需求精准对接。

（三）校企协同深化教学资源整合

产教融合视域下，学校与企业协作有助于整合教育资源，实现资源的优势互补。在校企协同深化护理实践教学过程中，学校负责提供理论教学平台，医院作为实体产业负责为学生提供实践基地与真实的护理案例。学校与企业合作，企业负责提供智能教学设备，使“5E”教学模式更加贴近真实的实践护理操作，让学生置身于真实临床场景中，通过有经验的护士带领学生进行护理实践，解决教学资源不足的问题，为“5E”学习模式创新提供帮助。

四、产教融合视域下护理“5E”实践教学模式的创新策略

（一）构建目标协同的产教融合育人体系

1. 校企共研护理人才培养目标

产教融合视域下，护理实践教学应该加强顶层规划，及时成立产教融合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应由学校护理专业教师、医院护理部主任及企业技术专家共同组建，进入护理市场，了解相关护理岗位对人才知识、技能的需求，并结合我国护理事业未来发展趋势制定护理专业技能、职业素养及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目标，细化护理实践技能培养目标，包括不同人群的护理需求，例如老年人护理岗位培养目标应注意培养学生对老年综合征的评估能力，对老年人护理老化环境有一定的改造能力。针对慢性病护理岗位，应注意培养学生掌握相关慢性疾病知识、护理新技术与新技能，避免学生的知识储备与行业相关岗位需求脱节。

2. 基于护理岗位需求细化“5E”学习环节目标

教师运用“5E”学习模式时，每个学习环节目标设定应以护理实践岗位的需求与具体的工作流程为导向。在参与学习环节，教师应注意调动学生学习兴趣，让学生可以主动参与学习，所以教师学习目标应引入一些临床护理常见的敏感指标，例如压疮发生率、跌倒预防等，将敏感指标作为学习问题，通过导入环节，激发学生好奇心，让学生主动参与学习。在探究环节，教师需要立足于护理岗位实际，确定岗位核心任务，围绕着任务开展护理情景模拟，确定让学生在真实的护理情景中主动探究，在团队协作中获得新技能，学习新知识的学习目标。在解释学习环节中，需实现学生迁移知识，可以结合最新的护理行业指南，帮助学生深化知识理解。评价环节应重点评估学生岗位胜任力，契合护理应用型技能人才需求，并将过程性护理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

（二）打造资源整合的多元实践教学生态

1. 共建共享型实践教学基地

产教融合视域下，为充分发挥“5E”学习模式优势，应构建以学校、医院、企业为主的实践教学基地，学校安排护理教师为学生进行理论教学，并为学生护理实践提供实训场地，让学生在学校内学习完整的护理流程，为后续真实护理操作奠定基础[6]。医院开放临床教学病房，让学生进入真实的护理实践场景中，并进入专科护理门诊接触真实的护理流程与护理设备，在实际操作中将理论知识转化为护理实践技能，并逐渐形成护理思维。在护理实践中，医院发挥资源优势，将学生技能培训与人文素养培养结合，实现多方位提升学生的职业胜任力。企业可以为学生护理实践教学提供智能化教学设备，例如高仿真拟人，为学生模拟不同患者护理场景，让学生在真实护理环境中完成“5E”模式的探究与拓展环节，以此提升学生实践能力。优化基地管理，建立科学的教学基地管理制度，包括设备维护、安全管理、实践教学流程规范等，确保实践教学基地能够高效、有序地运行。

2. 整合教学资源

学校应整合多方资源，联合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不同类型的医疗机构，拓展实践教学基地的类型和数量，满足不同护理实践教学内容的需求。教师采用“5E”学习模式为契合行业人才需求，需要更多贴合护理教学实践的教学资源库，满足学生实践学习需求。通过收集护理典型案例将其制作为标准化护理教学视频，同时为学生提供护理实操模型，为学生探究学习环节与解释学习环节提供资源支持。在“5E”学习中，教师利用多媒体技术进行课前导入，调动学生兴趣，为学生展示护理科室特色，提升学生对护理职业认同感。在探索与拓展环节结合动画为学生展示疾病机制，让学生了解护理要点，利用教学资源丰富“5E”学习模式教学内容。此外，开展产学研合作，校企双方共同开展护理科研项目，将研究成果应用于临床实践和教学，同时企业为学校提供实习、就业岗位，学校为企业输送高素质护理人才形成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

（三）重构“5E”学习模式护理实践教学体系

1. 临床真实情境导入设计

参与学习环节，教师应帮助学生建立起对护理职业的认同感与职业荣誉感，所以在教学中教师应该让

学生了解真实的护理环境，结合多媒体教学资源为学生展示临床护理的重要性，对患者预后的影响，让学生认同护理专业，产生职业认同感，对培养学生护理实践兴趣有重要作用。教师可以在教学中为学生创设沉浸式教学情境，让学生观看真实的护理视频，引导学生在视频过程中主动发现问题，以此激发学生探究的欲望。

2. 项目式、任务驱动式教学实践

在探究学习环节，教师需要结合行业对护理应用型人才需求改变传统学习模式中单一的任务教学，而是需要基于护理岗位任务设计项目化学习任务，让学生能够在真实的护理任务中主动探究护理过程，积累护理技能，可以邀请合作医院带教教师进行指导，尤其是临床护理要点。例如在“社区糖尿病患者综合管理”项目中，以病例为依托，学生可以根据所学护理知识独立完成患者建档、血糖监测、用药指导，同时能够根据患者情况制定针对性饮食方案。在学生完成项目的过程中，教师需要给予学生实时指导，让学生面对不清楚的护理要点能够通过查阅文献、讨论找到解决方案，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

3. 校企双师联合指导机制

在解释学习环节，要帮助学生深化知识理解，在产教融合视域下，一方面，可以建立双师授课模式，学校选派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参与临床护理实践，提高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另一方面，企业选派经验丰富的护理专家到学校担任兼职教师，参与实践教学指导。校内教师侧重于护理实践理论知识梳理，护理专家则结合护理实际案例为学生讲解护理操作要点与护理行业规范。教学方式可以采用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等形式，为学生讲解不同疾病或技术操作的护理要点，在此过程中需注意帮助学生纠正错误概念，同时让学生运用自己的理解阐述护理相关概念的认知，加深学生对护理知识的理解。

4. 跨学科实践与创新能力培养

在迁移学习环节，需要学生对所学知识与技能进行扩充，并在实践中建立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在此环节，教师可以创新教学，开展跨学科实践项目，让学生在实践护理中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拓展对护理知识的理解，以此获得更多的信息与技能[7]。例如教师以“老年慢性病管理”作为跨学科实践项目主题，在护理实践中，学生需要调动护理学、营养学及康复医学等知识为患者设计针对性的护理方案。与此同时，学生为患者制定运动方案与饮食计划需要考虑胰岛素注射与饮食结构的关联，运动强度与血糖波动的关联，通过跨学科学习让学生将所学的护理基础知识迁移到护理实践场景中，以此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5. 多元主体参与的动态评价体系

在产教融合视域下，教学评价应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动态评价体系，参与教学评价主体应包括学生、学校教师、临床带教护士及企业导师和患者（模拟），根据反馈信息，对教学内容进行针对性调整。若发现某些护理技能操作在实践教学中难度过高或过低，及时优化。同时，改进教学方法，如果“5E”环节中的某一环节执行效果差，如探究环节学生参与度低，就要分析是引导不足还是问题设置不合理。完善评价体系，确保能准确衡量学生在实践教学中的综合能力提升情况，更好地促进产教融合下护理实践教学质量的提升。

五、结语

我国对应用型、技能型护理人才需求较大，传统护理实践教学无法满足教学需求，在产教融合视域下，教师在护理实践教学中创新“5E”学习模式对提升护理人才培养质量有重要作用。教师可以通过构建目标协同的育人体系、整合多元教学资源、重构“5E”学习模式护理实践教学体系解决传统护理实践教学与护理行业用人需求脱节的问题，为社会培养更多具有创新能力与实践素养的护理人才，同时为护理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

参考文献

[1] 周苔花，胡尧尧，陈潇潇，等.“5E”教学法联合迷你临床演练评估在护理本科生心内科临床实践教学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J]. 医药高职教育与现代护理，2025,8(02):115-119.

[2] 马蕊 .5E 教学模式对呼吸科临床护理教学的应用效果研究 [J].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教育科学，2025(03):119-122.

[3] 王敏，覃桂水，岳小林 . 慕课结合 5E 教学模式在临床实习护生中医护理教学中的应用 [J]. 全科护理，2023,21(16):2287-2290.

[4] 颜丽霞 .5E 教学环在《护理学基础》实训课程中的应用 [J].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29(01):95-97.

[5] 黄嘉文，贾明阳 .“5E”教学模式联合翻转课堂在手术室护理实习生带教中的运用与探讨 [J]. 智慧健康，2025,11(03):127-130.

[6] 刘善丽，祁俊菊，唐万珍，等 . 基于产教融合的老年护理实践教学“课证融通”探索与实践 [J]. 现代医药卫生，2023,39(04):693-697.

[7] 姚娟，沈荣，吴丽荣，等 .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背景下职业院校人文护理实践教学管理体系的研究 [J]. 全科护理，2020,18(32):4532-4535.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榆林职业技术学院校级教改项目“产教融合视域下护理实践教学中‘5E’学习模式的创新探索”（J202433）。

（作者：马瑞、王改琴、折慧，榆林职业技术学院；邵玉娟，榆林市第一医院；樊元利，榆林市星元医院）

红色文化融入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实践研究

杨怡可

摘要：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积淀的宝贵精神财富，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生动体现，与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具有内在的价值同源性与实践契合性。新时代背景下，将红色文化深度融入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既是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的时代要求，也是筑牢青年学生理想信念之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的新人的必然选择。本文从红色文化融入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价值意蕴出发，探索具体的实践路径，为新时代高校强化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提升思政教育实效提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红色文化；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实践路径

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对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发挥着关键作用。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积淀的精神财富，与马克思主义信仰有着内在的价值同源性和实践契合性，是高校开展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重要资源。新时代背景下，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需不断丰富教育内容、创新教育形式，红色文化的融入成为提升教育实效的重要路径。因此本文以红色文化融入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为研究对象，探析其融入的价值意蕴，探索具体实践路径，为新时代高校强化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筑牢大学生理想信念之基提供实践参考。

一、红色文化融入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价值意蕴

红色文化承载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是高校开展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鲜活教材与重要载体，其融入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具有多重维度的重要价值，为青年学生信仰的培育与塑造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滋养。

红色文化是深化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认知的启智钥匙。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建立，首先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与实践性的深刻理解。红色文化并非抽象的精神符号，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革命精神谱系，以及无数革命先辈的实践探索，都生动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如何成为指导中国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1]。通过红色文化的熏陶，大学生能够摆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抽象化、教条化认知，从历史实践中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明晰马克思主义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中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伟力，进而构建起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认知。

红色文化是增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认同的动力源泉。信仰的认同离不开情感的共鸣与价值的契合，红色文化所蕴含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无私奉献等价值理念，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核心要义高度契合。赵一曼、邱少云、方志敏等革命英雄的事迹，雷锋、孟泰等模范人物的实践，为大学生树立了可感可知的道德标杆，其身上彰显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能够激发大学生的情感共鸣，让大学生在榜样的引领中感悟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精神内涵。同时，红色文化的历史实践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现实力量，让大学生直观感受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而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情感认同与价值认同。

红色文化是强化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精神支柱。红色文化能够为大学生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帮助其在成长过程中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红色文化中蕴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艰苦奋斗精神，能够激励大学生在面对学习与生活中的困难挑战时，锤炼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同时，红色文化所传递的“为人民服务”“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等价值导向，能够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追求，将个人发展与国家

前途、民族命运紧密结合，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矢志不渝地追求崇高理想。

二、红色文化融入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实践路径

（一）构建红色文化融入的课程教学体系，夯实信仰教育的理论基础

课程教学是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主阵地，也是红色文化融入的核心渠道，需将红色文化全面融入高校课程体系，实现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协同发力，夯实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理论基础。

一方面，深化思政课程的红色文化融入，开发红色文化专题教学模块，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雷锋精神等革命精神谱系，以及各地域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思政课程。创新思政课堂教学模式，运用情境教学、案例教学、小组研讨等方式，将红色历史、英雄事迹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点进行深度结合，如在讲解“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时，结合淮海战役人民群众支前的红色案例，让抽象理论具象化[2]。同时，实施红色文化师资专项培育工程，组织思政教师深入红色文化资源地开展研学，邀请红色文化专家、革命旧址讲解员参与教学，打造专业化的红色教育师资队伍。

另一方面，推进课程思政的红色文化浸润，挖掘各专业课程中的红色文化元素，将红色文化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如工科专业融入共和国工业建设中的红色故事，讲述老一辈建设者攻坚克难、为国奉献的历程；文科专业融入红色文学、红色历史研究，解读红色作品中的精神内涵与时代价值；理科专业结合红色历史中的科技探索案例，展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科技报国的实践成果。通过全方位的课程渗透，让大学生在专业学习中潜移默化地感受红色文化的魅力，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理解与认同。

（二）创新红色文化的数字化传播范式，增强信仰教育的传播效能

新媒体时代，数字化传播是红色文化浸润大学生、增强信仰教育实效的重要途径，需顺应大学生的信息接收习惯，创新红色文化的数字化传播范式与媒介矩阵。

打造红色文化智能传播平台，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建设革命文物数字孪生数据库、红色文化资源库，实现红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存储与展示，让大学生能够随时随地通过网络平台接触红色文化。基于大数据分析为大学生推送个性化的红色文化内容，根据其专业背景、兴趣爱好精准匹配红色故事、红色影视、红色书籍等资源，提升传播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构建全媒体红色叙事传播体系，打造红色微电影、动漫、短视频等新型文化产品，设计符合 Z 世代特征的红色 IP 形象，让红色文化以生动、鲜活的形式呈现。充分利用抖音、B 站、小红书等大学生常用的新媒体平台，开设红色文化传播账号，发布具有趣味性、互动性的红色文化内容，如红色故事趣味解读、革命歌曲翻唱、红色景点打卡攻略等，打破红色文化传播的时空限制。

推动红色文化传播与新技术的融合，运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元宇宙等技术打造沉浸式红色教育场景，如构建“重走长征路”“探访革命旧址”等虚拟体验场景，让大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红色历史，增强红色文化的体验感与感染力。开发红色文化在线互动课程，设置线上答题、虚拟实践、小组讨论等环节，激发大学生的参与热情，让红色文化在互动传播中深入人心。

（三）打造红色文化的实践育人平台，推动信仰教育的知行合一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培育离不开实践的淬炼，需将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的实践活动，打造多元化的红色实践育人平台，推动大学生从红色文化认知向信仰践行转化[3]。

一是构建“行走的思政课”实践教学体系，整合校内外红色教育资源，设计红色研学路线，组织大学生走进红色场馆、革命旧址、历史纪念地开展实地研学。推行“菜单式”自选实践模式，让大学生根据自身兴趣选择红色短视频制作、革命题材情景剧表演、红色场馆讲解志愿服务等实践形式，提升实践参与的主动性。在研学过程中，通过现场讲解、实物观摩、情景体验等方式，让大学生近距离感受革命先辈的信仰力量与奋斗精神，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实践认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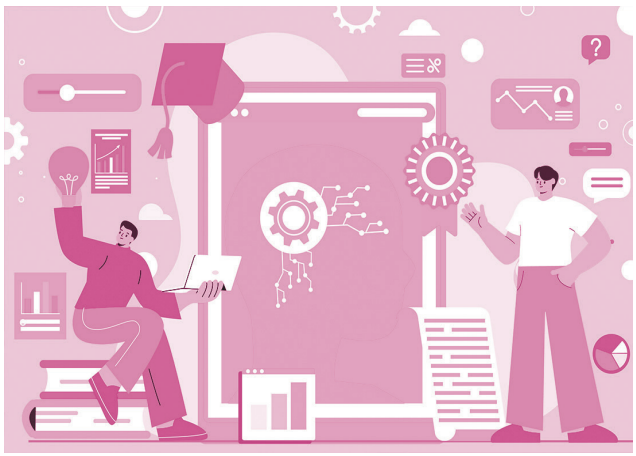
二是实施红色文化志愿服务品牌工程，组建大学生红色讲解员、红色宣讲团等志愿队伍，让大学生在为他人讲解红色故事、传播红色文化的过程中，深化自身对红色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理解。开展红色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红色经典诵读、红色歌曲传唱等校园文化活动，让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的日常生活。鼓励大学生利用寒暑假深入社区、乡村开展红色文化宣讲活动，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种子播撒到更广泛的社会领域。

三是深化校地合作，与地方红色教育基地、文旅部门、社区等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共建校外红色实践教育基地，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红色实践机会[4]。结合重要历史节点，如建党节、国庆节、烈士纪念日等，开展主题性红色实践活动，组织大学生参与纪念仪式、祭扫英烈、红色文化节等活动，强化大学生的红色记忆与信仰认同。

（四）完善“大思政”格局下的协同育人机制，凝聚信仰教育的整体合力

红色文化融入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需要打破校内校外、线上线下的壁垒，构建“大思政”格局下的协同育人机制，凝聚学校、家庭、社会的育人合力。

在校内层面，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各部门协同配



合的红色教育工作机制，将红色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如在校园景观设计中融入红色文化元素，打造红色走廊、红色书屋、红色广场等校园红色阵地；将红色文化融入党日、团日、班会等活动，形成全方位的校园红色文化氛围。加强各学科之间的协同合作，开展红色文化跨学科研究与教学，如文学学科研究红色文学作品、历史学科深挖红色历史内涵、艺术学科创作红色文化作品，形成红色文化育人的学科合力。

在家校社协同层面，搭建家校红色教育沟通平台，通过家长会、红色文化亲子活动等形式，引导家长重视红色文化的家庭熏陶，鼓励家长向孩子讲述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家风，形成家校教育合力；加强与社会各界的合作，整合社会红色文化资源，推动高校红色教育与社会红色文化传播相结合，邀请老党员、老战士进校园开展红色讲座，让大学生在社会大课堂中接受红色文化教育。

完善线上线下融合的教育机制，以线下实践体验为核心，以线上红色文化传播为补充，通过线上打卡、线上研讨、线上红色文化竞赛等形式，实现线上线下红色教育的相互衔接、相互促进。建立红色文化育人质量评估体系，从认知、情感、行为等维度设计评估指标，全面监测大学生的红色文化认同与马克思主义信仰培育情况，并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教育策略，提升育人实效。

（五）构建贴合大学生的红色话语体系，增强信仰教育的情感共鸣

话语体系是红色文化传播与信仰教育的重要载体，需立足大学生的认知特点与话语习惯，构建具有时代性、亲和力、感染力的红色话语体系[5]。

一方面，推动红色话语的生活化、年轻化转化，将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转化为大学生易于理解、乐于接受的网络语言、生活语言，摒弃刻板、生硬的官方话语表达。如运用“弹幕式”解读、互动式问答等形式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与红色文化内涵，让红色话语更具互动性与趣味性。结合大学生关注的社会热点、成长话题，将红色文化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用红色精神解读时代现象，让红色话语更具现实针对性。

另一方面，挖掘红色文化中的青春元素，讲好革命先辈的青年故事，将红色文化与大学生的成长成才、人生追求相结合。如讲述青年雷锋的成长故事、青年革命烈士的奋斗历程，让大学生从革命先辈的青年经历中找到情感共鸣与价值契合点，进而将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追求，转化为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自觉行动。鼓励大学生用自己的话语讲述红色故事、表达对红色文化的理解，通过校园新媒体平台展示大学生原创的红色文化作品，增强红色话语的感染力与传播力。

三、结语

红色文化是新时代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核心资源，为信仰培育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蕴与鲜活的实践素材。其与马克思主义信仰具有同源性的价值内核与实践逻辑，在大学生信仰塑造中发挥着根本性引领作用。通过构建课程融入体系、创新数字化传播范式、打造实践育人平台、完善协同育人机制、构建青年话语体系的综合路径，能够实现红色文化与信仰教育的深度融合，推动理论认知与情感认同、价值引领与实践践行、校内培育与社会浸润有机统一。

这一路径体系可促使大学生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知、增强信仰认同、坚定价值追求，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时代新人。未来需持续拓展红色文化融入的多元路径，优化育人体系，为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提质增效提供支撑，为民族复兴伟业培育信仰坚定的青年力量。

参考文献

[1] 戚杰强，秦丽萍．红色文化增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路径探析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5(10):48-51.

[2] 傅燕君．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价值与实现路径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为例 [J]. 中国军转民，2025(15):205-207.

[3] 殷福龙．辽宁红色文化融入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研究 [J].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7(04):248-252.

[4] 于世龙，崔云霄，刘友田．红色文化融入新时代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研究 [J]. 教育探索，2025(09):8-12.

[5] 王锐．教育数字化背景下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探究 [J].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25,44(05):64-69.

（作者单位：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五社联动”背景下的街道社工站建设研究
——以H市T街道社工站为例

孟　伟　乔志龙

摘要：在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过程中，“五社联动”已经逐渐成为整合社会力量、提升社区服务效能的关键路径之一。在此背景下，社工站为基层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目标提供了坚实保障。本文以H市T街道社工站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社工站的建设实践。研究发现，T街道社工站在发展过程中，通过构建“一站一品”特色服务品牌、建立“需求—服务—资源”三类清单、实施“八共一体”服务体系等重要举措，在专业服务供给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同时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制约了其进一步发展。本文基于T街道社工站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展开研究，结合其发展现状提出针对性的优化建议，有助于T街道社工站提升自身服务效能，同时也为其他地区社工站的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五社联动；社工站；社会服务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完善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激励政策，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联动机制”，“五社联动”机制正式成为我国推动基层治理的重要创新举措。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也陆续将“五社联动”试点与社工站的建设纳入政府发展规划中，以期通过社工站的建设，进一步整合多方可利用资源，从而破解基层治理中服务供给不足、资源分散等问题。

H市作为内蒙古自治区首府，随着近年来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居民服务需求的不断升级，基层治理面临着诸多挑战。因此，积极推进H市社工站的建设是解决当地基层治理问题、满足居民生活需求的现实需要。T街道位于H市老城区，下辖4个社区。据统计，T街道常住人口3.8万人，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占比23%，困境儿童及社会救助对象近200人，存在明显的老龄化程度高、困境群体集中的特点，对社会服务的需求度较高。

一、“五社联动”背景下H市T街道社工站建设实践

（一）H市T街道社工站建设背景

近年来，H市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先后出台《H市民政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H市“五社联动”社会工作服务试点工作实施方案（2021—2025年）》等政策文件，将“五社联动”试点与街道社工站建设列为重点任务，明确要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运营社工站，构建“区—街道—社区”的三级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及“民政部门指导、街道管理、机构运营、居民参与”的管理机制。在地方政府的政策推动下，H市民政局积极响应，通过设立专项经费、明确建设及运营标准等方式推动社工站的建设与发展，为T街道社工站的建设提供了政策依据与制度保障。

（二）H市T街道社工站建设现状

H市T街道社工站建于2021年，是H市第一批五社联动启动试点和首家建设成型社工站。自T街道社工站建成以来，坚持“助人自助”的理念，运用个案工作及社区工作等方式，为辖区内居民提供专业化服务。在党建引领下打造了“多元主体参与，补充基层治理服务短板”的服务模式，按照“活动项目化、项目组织化、组织公益化”的发展路径，依据H市实际情况与发展需求，开展服务平台建设，为整个辖区内的困难兜底群众以及有需要的居民排忧解难。目前，T街道社工站通过组织开展社区志愿活动，已逐渐融入辖区居民生活，在参与基层治理方面、提高居民生

活质量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

（三）H 市 T 街道简介社工站建设成效

1. 构建“一站一品”特色服务品牌

T 街道社工站构建了“一站一品”特色服务品牌，通过实行以社会工作者为核心的多向联动，对街道辖区内各个社区进行长期的需求调研和摸底排查，进一步将服务人群进行具体分类，服务人群涉及儿童、青少年、妇女、老年人、残疾人、退役军人、志愿者、社区社会组织等群体，同时围绕“一老一小”“社区治理”“社会救助”三个核心维度开展专业化、个别化、精细化社会工作服务，并在服务过程中凝练基层治理特色，打造街道社工站服务品牌，从社工站与社区网格联动、青少年事务、社会志愿服务三个方面形成“一站一品”特色，构建“青少年多元能力成长”“社工站与社区网格联动”“益动计划—青年志愿服务”三大社工站特色服务品牌。

2. 建立“需求—资源—服务”三类清单

为确保服务与居民实际需求的精准匹配，进一步推动基层服务效能升级，T 街道社工站建立了“需求—资源—服务”三类清单，并以需求清单为起点，由社工深入辖区内进行需求调研，倾听居民需求，构建需求清单，确保服务供给与居民的实际需求相对应，从而避免“大水漫灌”式的无效投入。服务清单是由前期社工深入辖区内整理的需求清单分析匹配后得到的，即将需求清单中涉及的居民群体和需求类型进行归纳整理，明确服务对象，制定服务目标，设计服务内容，并将清单进行归纳整理，为社工提供针对性的服务提供重要参考。资源清单是由社工结合街道、社区、社工站等多个维度，从志愿服务资源、场地资源、驻区单位资源、社区社会组织资源等层次进行整理归纳，为帮助服务对象链接社会资源提供支撑。

3. 实施“八共一体”服务体系

T 街道社工站构建了“共建、共育、共营、共享、共促、共帮、共助、共赢”八位一体基层治理创新服务体系，致力于打造一个五社为基、服务为民、任重道远的互联互动“共同体”。一是共建，建设完善社工站的标准规范，推进社工站提档升级为基层治理服务综合性服务平台；二是共育，提升社工站人员专业能力，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为社工提供专业培训，助力其服务技能提升；三是共营，结合节日、环境保护等主题开展社区活动，营造社区和谐氛围；四是共享，引导居民根据生活需求、兴趣爱好等成立社区组织，并指导社区组织开展各类文化体育类活动；五是共促，以青年作为志愿服务参与主体，建立近五百人的街道志愿服务队和社区志愿服务队；六是共帮，以困境儿童、孤寡老人为服务对象，建立常态化跟进服务工作小组，开展老年人康养提升、妇女减压增能等专项活动；七是共助，以居民需求为导向，提供个性化帮扶、救助工作，为居民提供多元化的慈善资源；八是共赢，以提升社区居民参与层次为先，提升社区治理水平为远，以公共治理议题作为长远提升目标，稳步促进服务发展。

二、“五社联动”背景下的 H 市 T 街道社工站的建设问题分析

（一）社会工作宣传不到位

目前，T 街道社工站面临宣传不到位的突出问题，导致辖区内的一些居民对社工站了解不足甚至完全没有了解。一方面，T 街道社工站目前主要通过社工站宣传栏内的文字对社工站服务内容进行介绍，内容没有融入居民的真实参与案例，缺乏感染性，无法有效地吸引居民关注。另一方面，现有的宣传方式对线上渠道的应用明显不足，没有通过社区微信群、本地短视频平台等线上方式传递社工站的服务信息，导致辖区内行动不便的老人及忙碌的中青年等群体难以获得社工站的相关信息，从而制约了社工站的发展。

（二）社会资源整合能力弱

目前，T 街道社工站在链接社会多方资源方面的能力相对较弱。在资金来源上，当前社工站还没有形成多元立体的资源网络，资源的获取主要依托社区内部及少部分的社会组织。在社区层面，资源的获得通常是由社工主动走访辖区内商户后，对商户可提供的闲置资源进行梳理，并帮助有资源需求的居民进行物资捐赠、场地支持及人力支援等资源对接。但这种渠道获取的资源相对有限，且长期可提供的稳定性相对较差。在社会组织层面，目前 T 街道社工站仅与本地的几家小型公益组织建立初步的合作交流，获取资源主要集中于义诊、义剪、义捐等较为基础的便民服务类型，无法覆盖大部分居民的多元化需求。

（三）社工专业能力不足

在 T 街道社工站的现有社工中，仅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员持有相关行业职业资格证书，其他人员均无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背景与职业资质，导致社工站人员在专业知识应用上存在明显短板。一方面，由于社工站人员缺乏对社会工作理论的系统性学习，对相关知识的理解仅停留在文字表面，因此在为居民提供实际服务时无法将理论有效地应用于实践。另一方面，由于一些社工对专业政策和相关标准的了解不足，导致提供的一些服务效率较低甚至不符合规范，制约了社工站服务效能的提升。如在居民关于医保报销、养老补贴等政策咨询时，一些社工对当地民生政策了解不足，需要长时间查询后才能给出居民答复，降低了居民对社工站的信任度。

（四）社会服务类型单一

目前，T 街道社工站组建了志愿者服务队、大学生公益支教团等服务组织，为辖区内居民提供服务。

同时，以组建太极拳队、舞蹈队、合唱团等形式，为社区的老年人群体提供了娱乐休闲的机会。但居民现有的需求不仅局限于此类基础服务，如一些老年人希望获得慢性病长期跟踪、康复指导等健康管理服务，一些家庭希望社工站能够定期举办专题活动帮助其子女进行抗挫折能力训练、培养兴趣特长等。但目前T街道社工站提供的服务类型仅聚焦于基础保障和老年人休闲娱乐两个方面，对辖区内居民深层需求的覆盖不足，导致居民参与热情较低，同时也影响了居民对社工站的认同度。

三、“五社联动”背景下的H市T街道社工站的优化路径

（一）多渠道加大社会工作宣传力度

T街道社工站应充分利用线上及线下多渠道协同的方式扩大社工站知名度。在线下宣传方面，可以在社区广场、菜市场等辖区内居民聚集较多的区域设置宣传点，发放印有社工站服务类型及案例介绍的宣传手册及印有社工站名称和标志的环保袋、围裙等家庭常用物品。定期组织专题类活动，邀请感兴趣的居民参与到活动中。联合社区网格员、党员志愿者开展入户宣传活动，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困境家庭等重点群体，上门讲解社工站服务，进一步减少宣传盲区。在线上宣传方面，T街道社工站应充分应用街道公众号、社区微信群等现代化方式，定期为居民推送社工站动态、社工站服务案例等内容，通过图文结合的方式让更多的居民了解社工站的服务内容。

（二）构建高效的社会资源整合机制

为更好地加强社会资源整合，从而实现有效的资源链接，T街道社工站应拓宽资源渠道，对接政府、社会组织、小型商户及居民，系统梳理包括场地、人才、资金、服务等多类型资源，建立并丰富社区资源储备库，通过购买、委托、支持、链接及融入等方式承接主体单位的资源，将分散的资源转化为可被居民应用的服务支撑[1-2]。形成由社工站牵头，社区、社会组织、志愿者、慈善资源主体共同参与的月度对接会议机制，各方主体通过认领需求、明确资源供给方案，形成需求—资源—执行的闭环对接模式，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同时，搭建“爱心商企联盟”平台，构建社区公益服务枢纽，为企业提供公益渠道的同时，也为社工站补充资金、物资及其他专业服务支撑。

（三）完善社工专业能力提升体系

社工的专业能力是保障社工站服务质量的重要基础。为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T街道社工站应建立并完善社工专业能力提升体系，为社工提供包括服务技能、沟通技巧、政策解读等在内的专业化培训，以确保社工在与辖区内居民的沟通过程中，能够精准识别居民需求，从而提供专业化的服务。T街道社工站可以与H市社会工作协会、高校建立合作机制，邀请行业专家担任社工站的培训讲师及长期督导，为社工提供专业化培训的同时，针对社工在服务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行逐一指导。在此基础上，建立培训效果评估机制，即在培训结束后通过构建虚拟场景考察社工对所学技能的应用情况，鼓励社工积极反馈应用效果，在开展丰富多元的服务中，通过不断提炼总结服务经验，从而促使社工站在社会服务方面更加专业化、规范化[3]。

（四）拓展多元化社会服务类型

服务是居民感知社工站价值的直接载体，不同群体对服务的需求存在差异。为提高服务效能，T街道社工站应在已建立三类清单的基础上进行细化分类，结合居民潜在需求增设特色服务项目。同时，对社区需要救助的困难群体按照困难程度及类型进行划分，建立一人一档的服务机制，运用社区、小组、个案等社会工作方法，开展特色化帮扶项目，定期进行调研探访，根据困难群体实际所需提供服务，从根本上解决居民需求[4]。按月度对服务进行评估，向接受过服务的居民采用匿名调查的方式收集意见，提高服务的针对性和满意度[5]。

四、结语

在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过程中，社工站承担着将“五社联动”从政策理念转化为治理实践的“桥梁纽带”角色，其效能直接关系到基层治理的精度与温度。因此，社工站应不断强化自身队伍建设，以居民所需为导向，不断整合各方可利用资源，拓展多元化服务类型，为居民提供精准化、专业化服务。

参考文献

[1] 何林娜，熊凌山.“五社联动”背景下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治理路径研究[J].社会科学前沿，2024,13(07):808-817.

[2] 黄晓星，房欣杨.统合治理与社会工作服务发展——以Y市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为例[J].社会建设，2025,12(02):75-98.

[3] 彭瑶，唐洁芳.小站点构建“四融合”为民服务大平台——以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街道社工站运营为例[J].中国社会工作，2024(06):41-42.

[4] 边荣蓓，王晓伟.“四力协同”赋能社工站提质增效[J].社会与公益，2023(09):78-80.

[5] 许斐，向琴，王磊.葵涌街道社工站：实施“1+3+10+N”模式打通“最后一米”[J].中国社会工作，2024(06):43-45.

（作者单位：内蒙古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基于网络化治理视角下社会治理的策略分析

付丽娟

摘要：为了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文章围绕网络化治理视角下社会治理的策略展开一系列分析，并提出网络化治理视角下社会治理的优化，应采取明确多元主体权责清单、搭建统一信息共享平台、完善网络治理规则体系、培育社会力量参与生态等策略。具体来说，就是要精准定位多元主体权责，准确划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角色边界，并且采用契约化管理手段，规避权责交叉或者空白的问题；将信息共享平台进行统一，突破各个部门之间数据的局限性，保证人口、民生、应急等数据的实时性和互通性；应用网络治理规则体系，侧重于灵活性和规范性，在保证线上治理效率的同时，预防算法滥用等风险；采用资金扶持、能力培训等手段，激发社区自治和支援服务团队的参与潜能。

关键词：网络化治理；社会治理；治理策略

伴随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结构面临着尤为深刻的变革，导致传统以政府主导、单项管理的社会治理模式，无法高效应对复杂的公共事务和多元诉求。而网络化治理形式侧重于多元主体协同、资源整合、动态互动的逻辑思维，助力现代社会治理突破困境。因此，如何在网络治理视角下提升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则是当下有关人员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以期提高治理效能和公共服务质量。

一、网络化治理视角下社会治理的重要意义

（一）提升社会治理整体效能

基于网络化的视角，社会治理整体效能的提升意义重大。首先，网络化治理突破了传统治理模式下政府单一主体的局限性，搭建跨部门和跨领域的协作网络，促进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实现资源互补和高效流动的效果，不仅能规避资源错配和低效消耗的问题，还能营造治理资源的整合效应，真正提升资源利用的效率。其次，搭建统一的信息交互平台，推动治理信息在多元主体之间实现实时共享和同步处理目标。尤其是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可以保证治理决策和实际需求的匹配度，规避信息不对称后产生的决策偏差问题，切实提高治理行动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最后，在网络化治理模式下，促进治理结构由金字塔式逐步转变为扁平化，显著减少治理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再加上精准定位网络阶段的权责界限后，尽可能规避了多头管理和责任推卸的问题，凸显出治理体系的灵活性和适应性特征，以第一时间响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

（二）增强公共服务供给精准度

公共服务供给精准度的强化，应紧密结合治理主体多元性、需求识别精准性、服务供给动态性。一是依托网络平台实时汇聚和交叉验证多元主体的需求信息，围绕公众需求创建立体画像，这样不仅能规避单一主体信息盲区后产生的需求误判，还能对不同群体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差异化需求精准识别，进而保证服务供给导向的准确性。二是精准区分多元主体的功能定位，逐步搭建涵盖政府主导规划、企业承接运营、社会组织落地实施的服务体系，尤其是在对服务内容和形式进行优化后，促使服务供给满足普惠性公共需求的同时，面向特殊群体提出个性化解决方案，进而保证服务供给和需求之间匹配的精准性。三是凭借网络平台服务效果实时反馈功能，可以在评价体系中融入公众、第三方机构等，在深度整合网络信息后，用于服务供给环节，促进多元主体对服务策略进行动态调整，最大程度上提高服务供给的精准度和公众的满意度[1]。

二、网络化治理视角下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

（一）多元主体权责边界模糊，协同治理存在结构性障碍

当前社会治理工作面临权责边界模糊的问题，进

而在协同治理层面产生结构性障碍。其一，传统治理模式仍沿用政策全能主义的路径，造成权责划分模糊的问题，当多元主体在复杂治理问题下，很容易陷入责任推诿的困境，严重影响了网络治理的协同效果。其二，缺少网络化治理下所需要的涵盖平等协商、分工协作、利益共享的机制，造成协同治理呈现形式化联合的特征，致使协作策略凸显政府意志，很难在整个治理过程中融入市场和社会主体的诉求，并且削弱多元主体参与协同治理的动能，导致网络协作过于表面化。其三，缺乏完善的法律框架和规则体系，完全不具备有效解决权责争议的途径。这样的治理环节中产生权责冲突问题，不仅缺少统一的评判标准，还缺少中立的第三方调节机构，仍严重依赖政府行政协调，使权责分配更加随意，加剧协同治理结构性障碍。

（二）信息共享机制尚不完善，数据壁垒阻碍治理联动

目前，社会治理中信息共享机制不完善和数据壁垒的问题突出，完全制约了治理网络的联动效能。一是在传统治理模式下，部门信息垄断的惯性和网络化治理所需要的信息开放共享要求存在差异，并未清晰划分信息产权的界限，这样就会使各方主体陷入共享的恐惧，害怕信息泄露或者是使用不合理，影响治理信息的跨主体流动效果。二是不同治理主体的信息系统通常参照独立需求进行开发，导致技术架构、数据标准、存储方式的差异显著，产生了技术异构性壁垒问题。再加上缺少信息共享协同机制，若发生治理事件后，很难实现信息互通和协同研判的目标，导致治理联动仅限于形式化响应的层面。三是现有数据安全法则面向信息共享的责任认定、风险分担不清晰，这样就会造成信息共享停滞在低层次、非核心的领域，很难助力治理网络完成精准研判和协同处置复杂问题的任务，制约网络化治理的联动效能[2]。

（三）网络治理规则体系落后，难以适配复杂治理场景

网络治理规则体系落后问题的出现，很难高度适配快速变化环境下的治理需求。首先，现有的治理规则侧重于单一主体和传统领域，无法科学规范网络化治理下的跨主体、跨领域的全新治理场景，限制网络治理协同性释放的效果。其次，当下规则强调以刚性条文为核心，并未综合考虑不同地域和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尤其是整个修订过程繁琐且周期较长，很难第一时间响应治理场景的变化。最后，目前的治理规则仅限于文本层面，并且缺少统一的规则执行评估标准，很难约束多元主体一同遵守的行为，当面临利益冲突现象时，更愿意打破规则的限制，造成网络治理陷入不规范的困境，无法高效应对复杂场景下的利益协调和行动整合需求。

（四）社会力量参与力度不足，治理合力形成存在短板

在社会治理层面，社会力量的参与力度明显不足，导致治理网络始终处于政府主导和社会依附的失衡状态。其一，现有制度设计环节，社会力量的参与仅限制于政策执行层面，并未赋能治理规划、资源分配等环节的话语权。特别是社会组织的准入标准、资金来源、活动范围仍然遭受行政管控，限制一些领域的治理参与权，压缩社会力量的参与空间，造成治理网络中的多元协同过于形式化。其二，目前社会组织面临规模小、资金短缺、专业人才匮乏等难题，无法完成复杂环境下的公共服务和治理任务，这样社会力量就不能在治理网络中和政府形成功能互补的优势。其三，当下激励机制的缺陷问题明显，严重影响了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动能，造成治理网络很难拥有持续且稳定的协同体，限制网络化治理效能的发挥[3]。

三、网络化治理视角下社会治理的具体策略

（一）明确多元主体权责清单，构建协同治理制度框架

多元主体权责清单的明确，可以搭建协同治理的制度框架，这样不仅能减少交易成本，还能高效配置资源，可以科学解决网络化治理中主体权责模糊的问题，逐步由被动配合转向主动协同层面，进而保证治理网络运行的良性效果。

以“未来社区”建设中的多元协同治理为例，凸显出了权责清单和制度框架提升协同效能的价值，并且还搭建了“三级制度框架”。一是在权责清单层面，精准定位了政府、社会组织、物业企业、居民主体的核心权责。二是在协作机制层面，推出了“月度联席会议”制度，街道带头组织物业、社会组织、居民代表一同参与会议，围绕服务改进、资金使用层面达成共识后，设计出了具体行动方案。三是在保障机制层面，依托固化清单的效能，明确规定了违约惩戒的措施，物业如连续多次没有达标，就会被取消服务资格；社会组织出现私自挪用服务资金的情况，将会被划分到诚信黑名单；政府若过于干扰企业的运营，需要向有关部门备案说明。实践证明，权责清单和制度框架的实施，能凝聚治理的合力，显著提升协同效能，促进网络化治理由理念转变成实效，以此保障多元主体清单的精准性。

（二）搭建统一信息共享平台，破除跨域治理数据壁垒

在网络化治理层面，统一信息共享平台的搭建，不仅突破了跨域治理数据的局限性，还能实现信息流转的高效性和协同联动目标，切实提升网络化治理的精准性和时效性[4]。

以“数字政府”改革搭建的跨域信息协同子平台为例，其中增设了“三级破除壁垒机制”。首先，平台面向数据采集制定了统一标准，要求各部门将业务信息，如资源状态、行为记录、事务处理结果等，参照统一标识、时间节点、事项类别的格式进行存储，并且依托 API 接口实时同步到平台中。其次，平台依据主体权责设置了访问权限，其中省级管理部门有查看全省数据的权限，市级部门则能获取当地和相关联的数据，基层工作人员只能查看其管辖范围内的相关信息及行为记录，以实现跨区域业务数据互联互通的目标。最后，平台中 AI 算法的渗透，能将多项业务数据自动比对与分析，尤其是面向特定风险情形自动标识后，实时推送至相关责任单位。自信息共享平台统一后，凭借标准化共享、分级共享、智能联动的功能，能完全突破数据的局限性，促进网络化治理的信息协同由理论可能转变成为实践可行的局面，从而突破跨域治理数据的局限性。

（三）完善网络治理规则体系，提升动态治理响应能力

为了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治理场景，只有将网络治理规则体系进行完善，才能大幅提升动态治理的响应能力，逐步由被动应对升级至主动预判的治理层面。

以“网络直播营销治理”规则体系为例，全方位展现了动态规则响应复杂治理场景的能力。其一，推出了《网络直播营销活动合规指引》，精准定位了直播平台、主播、MCN 机构、市场监管部门主体的权责。其二，面向虚假流量、私下交易等全新的问题，增设了《直播营销数据合规补充规定》，要求平台对直播间在线人数、交易数据进行实时检测，若产生异常波动数据后，需要自动标记且留存证据，并且要求主播不要脱离平台进行交易，限制缩短规则修订周期。其三，针对当前明星主播偷税漏税、伪劣商品突发舆情等事件的出现，制定了《直播营销应急处置细则》，且针对不同场景预先设置了响应机制。因此，自完善的动态规则体系实施以来，不仅能精准匹配复杂治理场景的需求，还能推动网络化治理由规则落后转向实时响应，真正提升了动态治理响应能力。

（四）培育社会力量参与生态，强化治理主体协同效能

社会力量参与生态的大力培育，能显著增强治理主体的协同效能，这对于网络化治理点燃社会活力、构建多元共治格局意义重大，在多方主体协同发力后，可以在社会力量、政府、企业协力之下，形成功能互补的治理网络，进而大幅度提升整体协同效能 [5]。

以“社区微治理”中社会力量参与生态的培育实践为例，完全凸显了在主体协同效能强化层面的积极作用。首先，创设了“社会组织孵化中心”，参考社区治理需求后，组织开展可涵盖协商技巧、项目策划、执行等内容的专项培训活动。其次，制定了“三级议事平台”，由社区党委带头组织开展“治理联席会”、楼栋长组成的“微协商会”、线上“云议事厅”，这相较于以往政府单一推动的效率有了明显提升 [6]。最后，增设“社区治理创新基金”，定期评选出多个社会力量参与项目，并且创建“风险共担机制”，如社会组织在客观原因后产生项目不达标的问题，政府将会承担一部分的资金损失风险，这样就会减少其参与的顾虑。事实证明，在对社会力量参与生态系统性培育后，可以助力多元主体形成目标一致和优势互补的治理合力，进而促进网络化治理逐步由政府主导转向多元共治局面 [7]。

四、结语

综上所述，网络化治理模式的出现，在高效应对复杂社会问题的同时，还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全新发展机遇。而网络化治理的深化，需要系统性变革治理理念、制度设计、实践模式，要求政府由全能管理转变为制定和协作规则的角色，市场和社会力量从被动参与者升级成为主动治理者，逐步形成各尽其责、协同公职的生态格局。展望未来，伴随信息技术持续更新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仍需要不断探索优化网络化治理模式的途径，从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参考文献

[1] 何继新，李天一，侯宇. 基层治理共同体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一个网络化治理视角 [J]. 治理现代化研究，2023,39(02):71-80.

[2] 王华. 网络化治理视阈下大庆社会治理的难点与对策研究 [J]. 大庆社会科学，2020(03):100-103.

[3] 陈亮，熊竞. 棘手问题治理的复合困境、可行路径与理论反思——基于网络化治理的视角 [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9(01):64-72.

[4] 范莉莉. 网络化治理视角下中国社会治理的策略 [J]. 社会科学家，2017(12):48-52.

[5] 陈亮. 走向网络化治理：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治理的复合困境及破解之道——基于“理念—主体—客体—介体”的系统分析视角 [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7,38(03):21-28.

[6] 邬亚琪. 社会工作参与“村改居”社区治理研究 [D]. 包头：内蒙古科技大学，2024.

[7] 冯雪艳. 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乡村治理现代化研究 [D]. 北京：中国地质大学，2024.

（作者单位：北京政法职业学院）

党建赋能与专业协同的社会工作调适机制研究
——山东省微山县 W 社区为例

周子钰

摘要：在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大背景下，本研究以山东省微山县 W 社区为案例，深入且系统地剖析了党组织引领下“党建逻辑与专业逻辑协同”的治理创新路径。该社区通过构建“365”党建工作法与“网格 + 社区合伙人”共治模式，打造出“党建引领—专业支撑—居民参与”的三维联动社会工作调适机制，形成了“需求收集—资源整合—精准服务—效能评估”的完整治理闭环。研究表明，这一机制有效整合了多元主体，将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切实转化为治理效能，成功破解了资源碎片化、服务供需错位等难题，为城乡接合部社区治理提供了“党建赋能与专业协同共生”的创新范本。

关键词：党建赋能；社区治理；专业协同；社会工作调适机制；城乡接合部社区

我国社会治理正从传统社会管理向党建引领下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转型，社会工作的角色与功能也随之发生深刻变革。这一转型的核心是从单向行政管控转向党组织领导的多元参与、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社会工作既需充当政府与群众之间的桥梁，更要成为基层治理的专业化力量，打破行政辅助定位，通过动态调适机制发挥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作用[1]。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其社会工作调适逻辑与实践路径尤为关键。

一、城市基层治理转型与 W 社区研究背景

（一）基层治理转型的时代要求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基层呈现出人口流动加速、需求多元化、资源碎片化等特征，传统科层制在老旧小区治理等领域暴露出权责模糊、专业能力不足、居民参与率低等问题，推动治理模式向多元协同转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推动社会力量参与”，这就需要构建政党引领、社会协同、专业赋能的格局[2]。社会工作机制调整是衔接党建与社会协同的核心枢纽，山东微山县 W 社区以此为契机探索适配路径，为同类社区提供了有益借鉴。

（二）W 社区治理困境

作为城乡接合部社区（面积 1.2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1.8 万，60 岁以上人口占 21%，包含 19 个老旧小区），W 社区原来面临三重挑战，这些挑战直指社会工作机制的适配性问题：

协同失灵。社区党组织仅能整合 30% 的辖区资源，驻社区单位等主体与社区联动不足、参与缺位，社工难以跨领域整合资源，公共服务呈现行政主导、专业边缘化的特征。

专业失能。社工持证率仅 12%，对 21 名困境儿童、69 名失能老人等群体的专业服务覆盖率不足 25%，专业方法未能常态化应用，导致服务与需求错位。2023 年前，4 名社工 80% 的时间用于报表填写，职能严重弱化。

参与度低。通过对 300 份问卷的分析，仅 18% 的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在“政府干、群众看”的惯性下，社工缺乏激活居民主体意识的平台，服务与需求之间存在“最后一公里”障碍。

这些问题体现了城乡接合部社区行政与社会资源的结构性错配，亟须通过社会工作机制调适实现组织重构、资源重组、动能重塑。

（三）研究价值

社会工作涵盖个人支持、资源整合、政策倡导等多个层面，形成了从微观个案到宏观社会行政的系统服务体系[3]。这凸显了 W 社区在专业服务碎片化背景下，通过党建赋能与专业协同重构社会工作调适机制的必要性。

1. 理论框架

本研究中的“社会工作调适机制”指在党建引领下，社会工作动态调整角色、方法和资源配置，协调多元主体以适配治理需求的系统方式。其核心要素包括：调适主体（党组织、社工机构等）、调适对象（资源分配、

服务流程等）、触发条件（需求变化、协同不畅等）。

协同治理理论提供了互动规则框架，资源依赖理论揭示了党组织整合资源的路径，二者共同支撑“党组织整合 + 社会组织服务 + 居民激活”的三角机制，为基层治理理论补充了党建与专业协同的视角。

2. 实践价值

W 社区突破“党建 + 治理”的单向模式，构建了政治引领与专业共生机制。通过“365”党建工作法（整合六类资源，建立五项调适机制）与“社区合伙人”制度（42 家签约），资源整合效率提升 40%，需求响应速度提升 55%。“网格吹哨—专业报到—居民参与”构成了联动体系，为城乡接合部社区治理提供了参考经验。

二、W 社区组织结构与治理现状分析

（一）组织架构与人员配置

W 社区以党组织为核心，构建了“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三级体系，有效破解了组织统筹缺位的问题：7 名“两委”成员交叉任职组成社区党委，5 个党支部覆盖 11 个网格，106 名党员联系住户（覆盖率 92%），驻社区单位资源整合率从 30% 提升至 65%，实现了需求的精准对接。

人员配置呈现“专职 + 专业 + 志愿”模式，社工角色调适明显：8 名网格员负责巡查上报；4 名社工在 2024 年调整后，转向需求评估、项目设计等专业职能，60% 的工作时间用于专业事务；28 名公益岗保障基础服务。同时，培育了 12 支志愿服务队，500 余名居民参与其中，形成了政府主导、专业支撑、居民自治的格局。

依托架构创新，深化“网格 +”功能。通过“社区合伙人”整合 23 家社会力量，形成“网格员发现—社工评估—合伙人服务”链条，特殊群体服务覆盖率从 25% 提升至 82%，解决了专业服务失能问题。

（二）“365”党建工作法与网格化管理

W 社区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引，实施“365”党建工作法，通过“一中心统筹、一平台调度、六阵地支撑、六机制保障”，融合党建与网格化管理。基于协同治理理论，明确主体权责，组建网格议事会，协商效率提升 40%，破解了资源碎片化问题。

机制创新聚焦网格议事会和“需求—资源—项目”三张清单。党组织确定服务优先级，社工评估需求，协同合作使项目落地效率提高 30%，形成“方向把控—专业执行”的互补模式。例如，在老旧小区改造中，网格议事会平衡各方利益，保障了设施升级与文化特色的兼顾；三张清单匹配资源，孵化 15 个项目，实现了供需精准对接。

推行“双网融合”，将党组织网络与治理网格嵌合。网格党支部以“党员责任区”组织联户服务（党员参与率 85%），提升了居民认同度。在特殊群体服务中，形成“网格员关怀 + 社工介入”模式，建立“党员 + 社工”联动机制，将个案管理纳入党组织服务范畴，满意度达 95%，体现了二者深度嵌合的调适效果。

搭建积分激励机制，合伙人凭借积分兑换资源。党组织制定制度，社工量化成效，商户参与率从 45% 提高至 78%，促进了良性互动。2025 年对 320 份样本的调查显示，问题响应速度提升 60%，纠纷化解率达 92%，居民满意度从 78% 提升至 91%。

三、党建赋能的社区治理路径创新

（一）组织功能强化机制

基于资源依赖与协同治理理论，W 社区以党组织为核心，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网络，推动治理系统化转型。106 名党员嵌入 11 个网格，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三级联动，实现“支部建在网格上、服务到家门”，解决了信息滞后、资源分散的问题。

在资源整合过程中，社区党委用“三张清单”进行动态管理，社工专业介入提升了效能：党员走访形成初版需求清单后，社工分层评估使识别准确率提高 40%；整合 42 家单位“资源清单”时，社工负责匹配度分析；最终生成的服务清单明确了各方权责。例如，在老年服务中，党组织统筹资源，社工设计“健康 + 文化”阶梯方案，让党员联系户与个案管理形成互补，及时掌握群体动态。

1052 平方米的党群服务中心被重构为一站式平台，社工参与规划（如健康区设在一层、儿童区采用圆角家具），工作效率提升 30%。形成“群众点单—组织派单—党员接单—社工督单”的服务链条：老年学堂每年举办 48 场讲座，服务 6000 人次，社工小组活动使老年人服药依从性提升 28%；儿童汇服务 300 余人，“防欺凌工作坊”增强了儿童自保意识。

（二）资源整合与阵地升级模式

W 社区以党建为纽带，创新“资源整合—阵地升级—服务提质”模式，实现资源集约高效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实行“错时开放 + 全年无休”，按照共享空间理论改造成全龄平台，社工参与设施标准制定（如可调节扶手），2025 年对 150 个样本的测评显示，老年人满意度达 92%。

资源整合呈现“三维嵌入”，凸显党建与专业协同：

一是服务资源。在“社区合伙人”项目中，党组织推动专业机构入驻率从 35% 升至 80%；“健康小屋”服务 800 人次，社工建立档案并进行干预；“爱心理发”由社工评估，精准惠及 200 名对象。

二是管理资源。积分兑换激励合伙人，社工设计标准，累计兑换 5000 余分，增强了合伙人黏性。

三是资金资源。公益基金两年筹集 4 万元，社工牵头管理，“失能老人照护计划”效率提升 25%。

运作形成“党委统筹—网格执行—社会协同”体系，如儿童看护项目，网格员摸排需求，社工机构设计课程，

教育机构提供师资，培养青少年志愿者 120 名。

四、专业协同的社区调适机制构建

（一）志愿服务调适路径

社会工作引入社区治理，核心是通过专业方法提升效能，以社区及居民为对象，解决或预防问题，培养自助与参与能力 [4]。基于社会工作系统理论，W 社区以党组织引领为核心，构建“需求识别—服务优化—资源整合”的志愿服务调适体系，破解“参与失灵”“服务失能”困境。

需求评估专业化。在党组织统筹下，社工结合定量与定性调研。“党员联户”确保 92% 的被访率，社工建立“个人—家庭—社区”评估框架，精准识别老年群体 8 类数字需求，服务精准度提升 40%。例如，在“夕夕相伴”项目中，“银龄数字课堂”使 82% 的老人掌握智能设备技能。

服务模式协同化。形成“党建 + 专业督导 + 志愿服务”机制，社工为 12 支志愿服务队提供全流程支持。党组织通过“党员责任区”链接资源，使队伍稳定性提升 50%。在青少年服务中，党员志愿者担任骨干，社工督导实现价值与服务的统一。

资源整合系统化。社工绘制志愿服务资源图谱，党组织统筹辖区资源，社工通过能力矩阵匹配合伙人与志愿者。在“安全成长计划”中，联动多领域力量，特殊儿童心理问题识别率从 35% 提升至 78%。

（二）“社区合伙人”模式的协同效能

志愿服务与“社区合伙人”模式作为专业协同的两大支柱，分别从不同维度推动调适机制落地。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需从外部获取资源以弥补短板 [5]。W 社区以党组织领导、社工为纽带，推动“社区合伙人”从资源叠加向深度协同转变，解决了整合碎片化问题。

资源整合的党建和专业联动。社工分析合伙人需求，构建“三张清单”匹配机制。党组织搭建平台凝聚共识，社工以规范协议明确权责、开展培训。例如，某商户以 20 余次爱心理发换取宣传资源，实现了资源双向流动。

服务协同创新。党组织确定优先级，社工设计跨领域流程。在健康管理中，统筹医疗机构等建立“筛查—干预—跟踪”链条，使老年慢性病复发率下降 22%；青少年服务联动家校社，共享日志系统，不良行为发生率从 15% 降至 6%（2025 年基于 200 名样本）。

治理协同长效机制。社工以“激励—反馈—改进”机制，设计“积分 + 表彰”体系。针对商户积极性波动，党组织强化引导，社工优化积分规则，使续约率从 65% 提升至 90%。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党组织牵头议事会，社工引导制定停车方案，车位利用率上升 40%，投诉率下降 70%。

此外，志愿服务侧重提升非专业主体（如居民志愿者）的服务能力，“社区合伙人”侧重协调专业主体（如商户、机构）的权责关系，二者共同构成多元共治的完整体系。

五、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经验启示与未来展望

（一）经验启示

党建引领。基于嵌入性理论，以三级架构实现党组织对治理网络的系统性嵌入 [6]。“书记带头学专业”等制度破解了党建与专业服务脱节问题；“365”党建工作法与“三张清单”将政治优势转化为资源整合力，印证了党建破解碎片化治理的有效性。

专业协同。引入社工力量，以生态系统理论重构服务逻辑。社工在需求评估、项目设计中发挥枢纽作用，形成“专业 + 群众”模式。党组织通过“权威认证 + 资源链接”提供保障，如“参与式决策”实现 85% 的居民参与率，契合社工嵌入性发展特点。

机制创新。“社区合伙人”模式以协同治理理论为基础，通过积分激励、契约管理构建利益共同体。其核心是“党建协调—专业设计”弹性机制，能够动态适配不同场景，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提供了样本。

（二）未来展望

未来可结合数字治理理论搭建数字化平台，推动“智慧 + 调适”机制融合，以大数据驱动治理从经验型向数据型转型；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培育专业社会组织，构建“党建 + 专业”双轨体系，推动社工从服务执行者向机制设计者转型，持续提升服务专业性；还可借鉴制度经济学观点，健全社工职业发展体系，将党建政策理解与调适机制设计能力纳入考核，设立专项基金支持机制创新并优化考核评价体系，促进治理模式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周梦佳 . 社会工作部组建背景下专业社会工作转型研究 [N]. 松原日报 ,2025-04-29(06).

[2]《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辅导读本编写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辅导读本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24:235-242.

[3] 王素月 , 柴瑜 . 社会工作在社区服务中的作用与未来发展 [J]. 大陆桥视野 ,2025(05):59-61.

[4] 潘琳 . 社会工作、社区工作与物业管理的协同发展路线探析 [J]. 住宅与房地产 ,2025(16):42-44.

[5] 于洋 , 潘雨亭 , 杜奕能 . 资源依赖理论视域下教师交流轮岗的困境与突围 [J]. 教学与管理 ,2025(12):41-46.

[6] 王思斌 . 中国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 [J]. 社会科学战线 ,2011(02):206-222.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江西省 2024 年度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从排斥到融入’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的调适”（YC2024-S458）。

（作者系华东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

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的内涵及路径

马　奥

摘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作为优化文化供给的重要举措。本文从理论层面界定了优质文化资源在内容、形式、传播、参与四个维度的内涵特征，并基于此，提出了以精准供给机制破解内容错配、以数字化融合机制创新形式载体、以协同化配送机制疏通传播梗阻、以在地化共创共享机制激发基层文化内生动力的系统化解决方案。研究表明，构建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需要实现从单向输送到双向互动、从行政主导到多元协同、从标准化供给到差异化适配的范式转变，推动资源从“物理下沉”到“价值释放”，使优质文化资源真正在基层生根发芽，从而助力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关键词：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机制建构

一、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进一步明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全面部署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与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任务，提出“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健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机制”[1]等多项重要改革举措，“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是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的具体安排，是对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2]的深化和发展，对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精神生活的新期待和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十四五”已收官，文化资源下沉的顶层设计不断完善。面向“十五五”，需要在新时代、新使命与高质量的形势与主题下，重点解决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好不好”“基层到没到”和“机制顺不顺”的瓶颈问题，确保优质文化资源真正惠及基层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

二、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的内涵

（一）优质文化资源的内涵界定

资源是人类生产活动可资利用的材料。人类生产活动是人的类本质即自由自觉的对象化活动的集中表现。对象化活动、对象世界和自我意识三者以人为中介同时创生，而这一中介在创生之际即作为有自我意识的类存在，被称为人。人通过自由自觉的对象化活动将无机界创造为烙印着其自由的目的尺度的对象世界，对象世界作为“镜中自我”，使呈现为自我意识的人得以确证自身的类存在，并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3]。文化则是这种使人之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有目的的对象化活动的产物及其过程本身，是将其综合把握后形成的范畴。人类创造的包括工具、语言、艺术、制度、科学在内的一切文化产物，都是自身内在情感、目的、思想、智慧、能力和理想的对象化，即内在精神世界的外部实现，是人超越直接实用目的，按照真、善、美等内在标准对外部自然和自身自然进行能动地、创造性地改造，是人进行自我确证、超越与解放并实现其类本质的能动性场域。

文化资源即凝结了人类无差别劳动成果的精华和丰富思想活动的物质和精神的产品或者活动[4]，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扩展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所创造、积累并传承下来的，具有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的物质与非物质要素的总和。优质文化资源则是文化资源中具有更高价值与效能的子集。在内容尺度上，优质文化资源首先必须具备价值深度与精神感召力，并呈现为思想上的深刻性与先进性、审美上的典范性与创造性、情感上的共鸣力与亲和性的有机统一；在形式尺度上，优质文化资源必须实现载体与内容的合理契合，并具备高度的吸引力和可接受度，具体表现为对技术介质的娴熟运用和对受众体验的准确观照；在传播尺度上，优质文化资源的标志就在于其

可及性与普惠性，旨在实现文化资源的公平配置，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有效消弭数字鸿沟和社会隔阂；在参与尺度上，优质文化资源的核心价值就在于激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其从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和共创者，这决定了文化资源是否真正对基层群众有益，同时也是衡量文化资源是否送达基层的根本标准。

（二）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的内在要求

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是要素结构、运行机制的系统集成，即以静态的基本要素构成四梁八柱，以动态的运行机制释放直达效能，把握其内在要求的关键在于对“机制”和“直达”的具体指向和内在规定性的准确厘定。

“机制”是指一个系统或过程中，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协调运作的规则、方式和路径，旨在实现特定的目标。它强调动态的运作逻辑，而非静态的结构，其核心不在于“实现什么”，而在于“如何实现”，即通过有序的组织和流程设计，确保系统或行为按照预期运行。

“直达”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中并非简单的物理空间抵达，而是强调文化资源输送链条的精准性、效率性和参与性，其核心是突破传统层级式文化供给的中间损耗，建立需求响应、技术赋能、权责明确的直接连通模式。

基于此，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的本质就是通过塑造机制这种稳定的、可重复的运行模式，引导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协调运行，实现资源高效触达、需求精准匹配和服务可持续供给。其终极目标不是机械化地送下去，而是使优质文化资源直接送达并真正惠及基层组织和群众，激发基层的文化内生动力。

三、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的建构路径

（一）构建精准供给机制，破解内容供需的结构性错配

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中的文化资源往往呈现封闭、静态的特征，与基层文化创造的鲜活实践形成结构性张力。均质化的文化资源供给模式难以回应不同地区基层文化场域、代际审美偏好、文化再生产实践活动的异质性。

文化资源作为内容生产要素的集合体，其价值实现必须通过基层文化生产创造活动这一中介环节才能完成。当前优质文化资源的供给困境本质上反映了基层文化资源内容生产与再生产环节的断裂，必须根本扭转其内容供给逻辑，才能破解基层文化资源供需的结构性错配。首先，要重新界定优质文化资源的三大属性：一是可再创造性，即文化资源本身具有开放性的文本和意义结构，能为基层创作提供再阐释空间；二是可连接性，即其内容要素能与地方性文化和知识系统产生意义关联；三是可转化性，即能够通过适当的符号转换融入日常生活叙事。其次，要充分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优势，依托各级公共文化云平台，系统开展用户行为数据的深度挖掘与动态分析，并配合社区调研、居民议事会、问卷调查等方式，对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特征与演变趋势进行立体化把握。最后，应推动“菜单式”供给与“订单式”生产相结合，建立常态化需求响应机制，使资源分配由机构主导转向需求驱动，确保文化内容真正贴近基层群众生活。同时，要使文化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不仅是资源中转站，更承担起文化资源内容在地化转译与文化资源效能创造性提升的职能，不断增强公共文化服务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认同度，使文化服务真正融入基层、深入人心。

（二）创新数字化融合机制，革除形式载体的功能性滞后

许多旨在惠民的文化资源，在抵达基层时仍保持着陈旧单一的面貌，与数字化时代基层群众普遍的互动式、沉浸式、碎片化获取信息的方式形成巨大反差。即使进行了数字化转化，也往往仅是对线下资源的简单搬运，缺乏针对移动端交互特性的深度设计和呈现。同时，许多基层文化设施功能单一、环境陈旧，难以承担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功能。这种形式与内容脱节、形式与时代需求脱节大大削弱了优质文化资源应有的生命力和感召力。

推动文化资源供给形式的现代化转型，必须构建以科技为支撑的多元化、融合化呈现机制。首先，要运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动漫、短视频等新兴前沿技术和新媒体语言进行创造性转译，开发互动式数字展览、沉浸式历史场景体验、系列化知识短视频[5]，并利用高精度扫描、三维建模等技术对珍贵文献、文物、非遗项目进行数字化保存，加强对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与活化利用，促进文化繁荣发展。其次，要大力推进基层公共文化空间的融合化改造，从空间布局、视觉呈现到互动流程，将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村（社区）文化中心升级为集阅读、展览、教育、文创、社交等功能于一体且有温度、有品质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最后，做强国家及地方公共文化云平台，优化手机 App、小程序的用户体验，支持文化资源离线下载，让优质数字文化资源突破时空限制，对实体文化服务进行有效补位，形成非对称优势。

（三）完善协同化配送机制，疏通传播网络的系统性梗阻

文化资源有再优质的内容与形式，倘若无法有效触达目标群众，其价值便无从实现。我国现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但文化资源在纵向传导和横向流动中仍存在系统性梗阻。在纵向维度上，尽管各级文化机构间已普遍建立总分馆制并完成物理层面的整合，但在资源配置、人才培养、资金

使用等关键环节仍未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高效统筹；在横向维度上，文化系统内部以及与教育、体育、旅游、广电等部门之间仍存在壁垒，制约了资源整合与服务创新的潜在空间。

疏通文化资源传播渠道的关键在于构建一个多元主体协同、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配送网络。首先，要深化总分馆制改革，推动其从形式整合向实质统筹转变，建立人、财、物、业务一体化管理机制。其次，要推进基层文化岗位专职化改革，实施文化骨干专业素养提升计划，培育一批既精通文化服务业务又了解基层群众需求的复合型人才，为基层文化服务注入持续活力。再次，要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明确政府“保基本、把方向、强监管”的职能定位。通过公开招标、项目补贴、公益创投等多元化方式，积极引导企业、社会组织、文化机构和文艺工作者等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文化设施运营、活动开展与内容创作，构建开放包容、竞争有序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生态。同时，要打破行业壁垒，推进文化与相关领域的深度融合。具体而言，可深化文教结合，将优质文化资源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促进文旅融合，开发具有更优质文化内涵的旅游产品和业态；加强文体互动，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体验性和吸引力，扩大服务覆盖面。最后，要构建线上线下一体的全媒体传播矩阵，充分利用互联网、移动终端、社交媒体等平台，并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群众画像，实现智能推送，满足个性化、分众化的文化需求。

（四）构建在地化共创共享机制，化解基层文化发展的内生性矛盾

当前文化资源下沉模式整体上仍呈现为单向灌输，尚未形成一套明确、有效的模式以廓清基层文化发展的实际。这种对基层文化实践样态、历史进程、发展规律的混沌感知，从根本上导致文化资源价值和文化服务效能无法充分释放。

若把优质文化资源比作一粒包括特定内在规定性的种子，其是否能在基层生根发芽，关键就在于它是否与基层具体的土壤、气候等环境要素的总和相适宜。在地化共创共享机制的构建，就是把握基层文化发展实践中各要素总和的前提和抓手。首先，通过搭建低门槛、便捷化的公共文化服务平台，让基层群众直接参与资源选择、内容生产、活动策划和空间管理，根据自身参与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需求和体验，进行积极的、自发的二次改造与创新，从而形成多样化、个性化和在地性的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多元主体共创格局[6]。其次，要充分发挥“群星奖”等奖项的鼓励示范作用，推动创作更多有力量、有筋骨、有温度的群众文艺精品，健全支持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机制[7]。着力发现和认证基层文化能人、民间艺术家、热心志愿者，给予其合理资助、专业培训和展示机会，由其牵头组织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化活动，并对活跃的文化社群进行登记备案、给予资源倾斜，形成基于本土特色和群众兴趣的文化共同体。最后，要建立以公众满意度为核心的评价反馈机制，改革考核体系，增加资源使用率、活动参与度、居民好评率等衡量标准的权重，并将此作为优化服务的重要依据。同时，引入第三方评估，将结果与预算安排、人员激励挂钩，形成持续优化机制，真正实现文化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

四、结语

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是新时代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实现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本文通过构建内容、形式、传播、参与的四维分析框架，系统阐述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的内涵与建构路径。研究表明，这一机制的完善需要实现公共文化资源供给逻辑的根本转变：在内容层面，要从标准化供给转向需求导向的精准匹配；在形式层面，要从传统单一形态转向数字化融合呈现；在传播层面，要从层级式分发转向网络化协同配送；在参与层面，要从单向输送转向共创共享的生态构建。通过构建精准高效、协同开放、充满活力的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不仅能够有效破解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难题，更能够激活基层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这一机制的不断完善将推动形成优质文化资源充分涌流、基层文化创造竞相迸发的生动局面，从而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奠定深厚的文化根基。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N]. 人民日报 ,2024-07-22(10).

[2] 习近平 .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22:20.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1 卷 [M].2 版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02:273.

[4] 王晨 , 王媛 . 文化资源学 [M]. 北京 :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1.

[5] 季正聚 , 赵学琳 . 人工智能赋能文化治理 : 价值意蕴、问题表征、实践理路 [J]. 中国编辑 ,2024(12):4-13.

[6] 姜照君 . 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数字创新生态系统 : 内在结构、运行机制与建构路径 [J]. 求索 ,2025(03):70-78.

[7] 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EB/OL].(2021-03-08)[2026-01-18].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3/23/content_5595153.htm.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

超凡魅力型社区书记的生成与可持续机制研究

——基于R社区治理实践的个案分析

高宪军　马志强

摘要：本文以C市R社区书记为研究对象，借助韦伯魅力型权威理论及其延伸框架分析其治理实践，研究发现：社区书记通过“危机处置—情感互动—技术应用—制度创新”的连续策略，构建起兼具人格化与制度化的复合权威形态。其核心机制在于：1. 通过危机解决建立初始信用；2. 借助身体在场与记忆政治深化情感联结；3. 利用数字技术实现权威日常化展演；4. 创建社区企业实现治理经验制度化。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理解中国情境下超凡魅力权威的持续机制提供了别样的分析视角，也为基层社区治理实践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参考。

关键词：社区治理；社区书记；信用积累；情感劳动；数字展演

一、书记、居民与社区

在已有对社区书记的社区治理实践的研究中，把影响书记对社区治理的因素主要分为社区书记的个人素质与能力、居民期望、制度支持和政策保障三类：社区书记的个人素质与能力、居民期望、制度支持与政策保障。第一，社区书记具备一定的经济贡献和道德威望，能够赢得内部居民的尊重和信任[1]；拥有丰富职业经历和较强组织能力的社区书记，能够更好地整合外部资源，做好社区治理工作[2]。第二，村民对社区书记的期望过高，但社区书记难以满足这些期望，导致信任度下降[3]。第三，社区书记的有效履职离不开明确的制度与政策支持，包括资金扶持、工作流程规范、权责边界明晰等。只有在制度健全的前提下，社区书记才能更好地统筹居民意见、组织社区治理活动；政策得以有效落实，减少不必要的会议与形式主义负担，社区书记才能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实际工作中，进而提升治理成效。尽管社区书记在经济贡献和道德建设上付出努力，但缺乏有效的制度支持，难以通过合法途径获得资源与权力，仍会导致治理能力不足[4]。同理，过量的工作任务与会议亦会对社区书记的工作效能产生负面影响。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剖析会议负担作为一项工作要求对基层干部情绪衰竭及工作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过重的会议负担会耗费基层干部的时间与精力资源，引发情绪衰竭，进而抑制其积极主动的工作行为[5]。

综合既有关于社区书记个人素养与能力、居民预期、制度支撑以及政策保障的研究成果，本文从社区书记的实践切入，以其在治理过程中获取正当性地位与权威的路径为核心，阐释社区书记如何通过实际行动树立自身形象、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创新实践以扩大影响力。在形成个人魅力并获得社区群众和街道领导的双向认可后，社区书记依托这种魅力持续扩大影响力、拓宽资源获取渠道，最终实现魅力的再生产与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双重目标。

二、权威信用积累：解决困难与破除危局

超凡魅力权威的形成需要获得正当性，这种正当性既可以来自追随者的认可与追随，也可通过相应的仪式来获得[6]。回顾我国以往社区治理实践，权威形成的关键往往在于党建引领和社区精英的互动，在党建引领下，社区精英形成骨干团队，共同推动身躯实现良性治理。这些社区治理的案例在形成权威的过程中有成功的部分，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在本文所论述的社区治理实践中，社区书记在上层政府的监管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下，通过解决长期困扰社区居民的问题，积累在社区居民心目中的正面形象并获得权威认同。这些问题既包括集体性的公共难题，也涵盖针对社区居民个人的重大困境。

（一）破解危机局面

超凡魅力权威的形成离不开特定情境的支撑，R

社区 R1 区域为公租房，其设立初衷在于帮扶生活困难群体。公共卫生事件期间，长时间封控致使一名精神疾病患者病情发作，危及家人生命安全。社区书记获知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并报警，及时遏制了事态恶化。在这一事件处理过程中社区书记先安抚，再救助，经过进一步治疗与帮扶，患者得以回归正常生活。此次危机妥善解决后，该户居民及周边居民感受到了社区书记的权威，进而在日常事务中对其产生信任。

（二）出行困难解决

私域问题的解决能够为社区书记积累部分权威认同，而公域问题的妥善处理则会带来更广泛的权威认可。由于 R 社区一地到二地之间道路崎岖，雨季容易积水，冬季积雪也会影响居民日常出行。社区成立以来，这一难题一直困扰着社区居民。社区书记利用自身社会资本，以服务社区居民为出发点，积极协调资源，填平道路。社区居民在雨雪天气不会身陷泥泞之中，居民走在这条道路上，获得新的行走体验时，便会增加书记的信用权威。在此基础之上，延长公交路线，便利居民出行。这一惠民工程，将社区书记的良好形象深植于社区居民心中，进一步巩固了其权威基础。

三、情感浸润：具身化的在地行动

本文所研究的 R 社区是一个以保障性住房和公租房为主的社区，该社区老年人占比较大，拥有相同生活背景的人较多，在一定群体内易产生情感互动，从而形成良性的邻里关系。社区书记在进行社区治理时，结合自身所具备的社会工作知识，抓住了这一工作重点，遵循社会工作的情感劳动方法，在初始阶段，工作者通过尊重和真诚与案主建立信任关系；在评估阶段，工作者运用积极倾听和同理心获取案主信息；在计划及合约阶段，工作者鼓励案主参与，发挥其积极性；在工作介入阶段，工作者给予案主支持和正面回馈，协助其解决实际困难 [7]。

（一）牢记基本信息

社区书记精准掌握信访人员和重点关注人群的信息，定期与他们沟通对接，保障其基本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对重点人群进行照护，需要书记投入更多情感，实现从“事后管控”向“事前预防”的转变，有效避免危机再次发生。社区的稳定是长治久安的基础，是实现社区善治的根本保障，也是社区书记权威形象维持的“核心前提”。

由于 R 社区地理位置相对偏僻，日常获取基本生活物资较为困难。公共卫生事件封控期间，社区书记在做好自身防护的情况下，亲自参与社区防护和物资补给，帮助社区居民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困难，让社区居民能够在封控期间，仍能维持日常生活所需；同时，为患病居民提供药品，以保证其渡过难关，为有应考需求的学生提供笔记本电脑，保障其学习需求。在社区书记的统筹协调下，R 社区平稳应对了公共卫生事件的挑战，而两名获得电脑支持的考生也成功考上了理想的大学。社区书记的这些暖心举措深深感染了社区全体居民，居民们自发录制了加油视频表达感谢。这一行为不仅体现了社区居民对社区书记的高度认可，也彰显了权威感召下居民的主动参与，进一步强化了书记的魅力权威。

（二）在地情感互动

在地性的情感劳动，能够帮助社区书记从居民和上级街道领导处获得双重情感认同，进而强化居民对超凡魅力型社区书记的认可。超凡魅力的效力，关键在于服从权威的人们是否承认，而这种承认来自“奇迹”。已有研究表明，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社会工作者在“后场”发挥着重要的托底作用，例如通过情感劳动介入援鄂抗疫医护人员家庭，帮助其应对家庭资源主要提供者暂时缺位带来的次生风险 [8]。社区书记由街道直接任命，接受街道的管理和考核，而社区稳定是考核的重要指标。当街道人员进入社区开展考核时，看到社区居民展现出良好的精神状态，会直接提升对社区书记的考核评分；而考核人员对社区的正面评价，也会给社区居民传递正向暗示，进一步强化居民对街道及社区书记的认可。这种双向情感劳动，有效促进了社区书记权威认同的积累。在我国政治制度背景下，基层社区书记的权威正当性部分来源于层级机构的自上而下的传导。而街道与居民的双重认可，进一步夯实了社区书记权威的正当性基础。

四、技术应用：展演魅力形象

借力数字化手段，能够帮助社区书记打造更加丰满的权威形象。超凡魅力的维持需要追随者持续认可，在传统模式下，这种认可会随着超凡魅力型人物不在场而逐渐淡化。但随着互联网科技发展，社区居民可通过线上社区实现互动，持续关注社区书记的治理实践，为魅力权威的维持提供了新路径。已有研究表明，银发网红通过身份符号塑造、构建共通意义空间，形成与青年粉丝的互动体系，并通过前台展示、互动共情等方式实现“圈粉”效应；在微信视频号中，通过持续分享实践经验与观点，能够让内容更具感染力与传播力 [9]。社区书记若能充分利用这一传播工具，拓宽自己的“前台”展示场景，增加线上互动频次，既能让更多居民了解身边的善举与真实治理案例，也能为同行提供可借鉴的社区工作经验，促进经验交流借鉴，同时还能吸引公益人士关注，更高效地整合各类资源。

（一）展示治理能力

微信视频号平台的治理叙事创新，本质上构成了基层治理的“数字公共领域”重构。传统社区传播受限于物理边界，形成闭合的地方性知识系统；而视频号技术的介入，以单中心星状互动模式 [10]。打破了哈

贝马斯所述“交往理性”的时空约束，使社区治理实践转化为可迁移的媒介文本。这种数字化转型创造三重治理增值：其一，通过“治理故事”的影像化生产，构建起“居民—空间—权力”的新型视觉政治关系，摄像机镜头下的社区改造对比画面，构成具象化的治理合法性证明；其二，打破社区治理的物理边界，扩大治理实践的传播范围；其三，实现治理经验的可视化呈现，便于经验的复制与推广。朋友圈和视频号是社区书记展现工作的重要线上平台。书记将自己的手机号及微信号张贴在社区公告栏，方便居民添加，进一步扩大受众。魅力权威的日常化，在一张张照片、一段段视频中逐步呈现，既接受群众监督，也进一步增强了对其治理能力的认可。

（二）解答各界问题

当社区书记通过微信公众号平台发起“问题征集—公开应答”的传播实践时，实则建构了一个多主体对话场域：社区居民、高校师生及跨社区工作者在此形成互动仪式链。这种参与式传播策略具有三重社会学意涵：其一，视频媒介将传统科层制下的单向政策传达，重构为可见性政治展演，使权威认同在“提问—回应”的符号交换中完成再生产；其二，差异化受众的卷入实现了社会资本的类型学拓展——居民诉求对应在地治理资本、高校资源对接知识资本、同业交流培育组织资本；其三，问答内容的生产实质是治理能力的剧场化呈现，通过将碎片化的社区事务处理经验转化为系统化的问题解决框架，构建起“实践智慧—制度理性”交织的新型治理知识体系。

五、制度构建：向内沉淀和向外链接

超凡魅力的形成往往会打破原有经济基础，其可持续延续则需建立新经济基础。R 社区以低收入群体为主，本身经济基础薄弱，若能在现有基础上增加困难群体的经济收入，就能获得受益群体的持续性认可。通过介绍工作可帮助到个别群体增收，但要实现更广泛的增收目标，最好的方式则是在社区内建成社区企业。社会企业是以实现社会效益为优先目标的新兴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通过创新商业模式提供社会服务，借助协同治理机制解决社会问题 [11]。但社区的发展终究不能局限于自身，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与外部建立切实可行、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其中，与当地高校建立深度合作是重要路径之一。高校作为地方政府重大决策的智囊团，地方经济发展的服务者，地方文化建设的引领者 [12]。能够为社区发展建言献策，同时为社区人才队伍建设输送源源不断的人才。

（一）建设社区企业

打造坚实的社区经济基础，核心举措是成立社区企业。R 社区在社区书记带领下建设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社区企业。传统模式的社区企业以政府购买服务为基础，由外来社工主导，带有浓重项目制色彩，易在项目结束后陷入倒闭困境 [13]。而 R 社区的社区企业由社区书记担任法人，社区能人运营，虽在资金上依赖政府支持，但这种模式为社区内就业困难者——即超凡魅力的追随者提供就业机会，为其持续认可书记的魅力权威提供了长期保障。该社区企业主要开展惠及社区居民的相关业务，员工在劳动过程中不自觉地融入超凡魅力共同体，自觉提升自身行为标准，推动企业良性运转，进而形成“企业发展—居民增收—权威巩固”的良性循环。

（二）促成校社合作

社区书记依托个人优良素质与资源整合能力，积极推动校社合作落地。书记善于学习、博览群书，这不仅为其高效解决信访问题提供了助力，也为其与外部建立良好关系奠定了基础。高校师生需要稳定的社会实践场地与鲜活的社区治理案例，而这正是社区书记能够提供的资源；同时，高校师生所拥有的专业知识，也是社区书记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支撑。高校学生未来若计划步入基层参与社区治理，选择“追随”社区书记开展实践是理性选择——既能为学业完成提供真实的实践素材，也能为未来择业拓宽道路。社区书记积极为高校学生提供实践场地，毫无保留地分享治理经验，为社区治理队伍培育后备人才，在“交心”式互动中打造共建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参考文献

[1] 程平源 . 青天·村霸·能人 : 农民上访与抗争中的三个关键词 [J]. 青年研究 ,2012(02):58-68,95.

[2] 王海宇 . 有限度的自主——当前社区治理中的社区干部 [J]. 青年研究 ,2018(02):67-76,96.

[3] 王露璐 . 经济能人·政治权威·道德权威——以 H H 村为个案的苏南村庄领袖权威获得与延续之实证研究 [J]. 道德与文明 ,2010(02):125-130.

[4] 张平 , 贾晨阳 , 赵晶 . 城市社区协商议事的推进难题分析——基于 35 名社区书记的深度访谈调查 [J]. 东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8,20(02):170-176.

[5] 胡威 , 唐醒 . 我国基层会议减负效果的实证研究——基于 A 省 780 名社区党支部书记的调查 [J]. 中国行政管理 ,2021(01):85-90.

[6] 马克斯·韦伯 . 经济与社会：第 2 卷 [M]. 阎克文 , 译 .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1114–1130.

[7] 孟宪红 . 社会工作——作为一项情感劳动的再探讨 [J].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2015,29(05):69-73.

[8] 杨发祥 , 李安琪 . 社会工作介入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研究——基于情感劳动的视角 [J]. 学海 ,2021(03):86-92.

[9] 李豪 , 赵红艳 . 符号互动论视角下银发网红在青年群体中圈粉现象分析 [J]. 新闻爱好者 ,2022(03):110-112.

[10] 唐魁玉 , 唐金杰 . 微信朋友圈的人际互动分析——兼论微生活方式的兴起及治理 [J]. 江 （下转 178 页）

新时代发挥思政工作在宿州基层治理的作用

陈　草

摘要：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与百姓切身利益直接相关，与社会和谐稳定直接相关。宿州市在推进基层治理过程中，注重发挥思政工作的引领作用，通过不断创新模式和完善机制，推动思政工作深入基层、融入治理，成为推动基层治理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本文旨在探讨发挥思政工作在宿州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及其以后如何积极有效发挥思政工作的举措。思政工作在宿州基层治理中，不仅树立正确观念，凝聚基层群众的共识，还通过开展多样化的思想教育与文化活动，充实民众精神世界，提升民众的聚合度与向心性，激发他们参与基层治理的热忱。

关键词：基层治理；思政工作；举措

一、思政工作在宿州基层治理中的重要性

（一）树立正确观念，凝聚共识

思政工作可引导基层群众去理解和支持党的各项决策部署，以此实现政策的平稳实施，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思政工作带动基层群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升他们对党的认可与信赖，在思想与行动层面构建共同价值取向与实践指引[1]。

思政工作能推动群众凝聚起共识，为治理工作打造了扎实的思想后盾，在宿州基层治理层面，思政工作者不只是把目光放在群众物质需求上，更聚焦于他们的精神需求，他们借助开展多样化思想教育与文化活动充实群众精神世界，文化底蕴、道德涵养得到升华，既提升了民众的聚合度与向心性，还唤起了投身基层治理的热忱与主动性。

思政工作在基层群众公民意识及责任意识培育上作用重大，经由教育劝引，推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样貌，让群众懂得自己是社会的一分子，必须承担起相应的社会义务与职责，对维护社会的安宁与和谐有利。

（二）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在基层治理相关工作开展时，诸多矛盾及问题接连不断，为高效消解这些矛盾、稳固社会秩序，思想政治工作显得极为关键，以深入百姓群体、知晓民需，及时探知问题，并采取针对性措施以解决。以宿州市为例，本市在思想政治工作模式上有所创新，构建“人群说事、律师说法、干部析理”等多样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该机制切实提高了工作效率水平，还较好地减少了矛盾升级的潜在危机，同时推动群众踊跃说出自己的诉求与烦扰，让律师以法律维度为群众消除疑惑，干部借助列举实例、阐明事理的途径，与群众开展深度的沟通对话，这种互动让群众真切感受到被尊重和体谅，使干部更清晰地洞察群众的真实想法与诉求。

（三）提升治理能力，促进发展

思想政治工作对治理能力提升与发展推进起到关键效用，并非仅聚焦思想维度，也聚焦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宿州市借助深化基层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提升

（上接 177 页）

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6(01):79-87.

[11] 朱耀垠 , 尔古玛玛 , 夏璇 . 发挥社区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作用——基于成都市社区社会企业的案例分析 [J]. 社会治理 ,2022(06):86-94.

[12] 何根海 , 张勇 . 校地合作共建视野中政府与高校的角色定位研究 [J]. 中国高教研究 ,2009(09):62-64.

[13] 朱健刚 , 陈安娜 . 嵌入中的专业社会工作与街区权力关系——对一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个案分析 [J]. 社会学研究 ,2013,28(01):43-64,242.

（作者：高宪军，长春工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马志强，长春工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了其政策执行水平与群众工作实操能力，助力基层治理朝着科学规范方向迈进。思想政治工作推动基层群众自治、依法治国与德治相结合，增进了基层治理成效，具体表示为：其一为强化思想政治方面的教育，定时安排党员干部研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利用教育培养手段，拔高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及政策理论层次，保证其在工作阶段能够正确理解并全面执行党的决策部署；其二是提升政策实施效力，强化对党员干部的业务训练，增强其处理实际难题的本领，搭建并强化考核评价机制，促使党员干部勇于挑担、积极付诸行动，推动各项政策行动落地实施；其三是增强群众工作能力，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及时反映群众的合理诉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提高服务群众的质量和效率，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其四是推进基层群众自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通过健全基层民主制度、保障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加强法治建设、引导群众遵法守法用法、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良好社会风尚、促进文明和谐社会环境等，提高基层干部法律素养；其五是优化基层治理制度，基层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理顺权责关系，基层治理效能得到提升，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在基层治理中得到充分发挥，整合各类资源，形成基层齐抓共管、齐抓共管的治理格局；其六是强化督查问责，建立健全监督机制，监督检查基层党员干部履行职责情况，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延伸到基层[2]。

二、宿州基层治理中的思政工作实践

（一）创新思政工作模式

宿州市开展思政工作期间，依靠一整套创新办法，为基层治理工作注入活力，砀山县将思政工作融入基层党建、社会治理等，采用“梨都网格化”“老书记调解室”治理模式，实现矛盾于基层消解，问题于源头之处攻克。该县采用“红色说事场”“百姓说事亭”等类型的平台，强化了干群间的沟通互动，让治理效果更上一层楼。这些举措不仅提升基层思政工作的实际功效，也推动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为和谐社会构建添砖加瓦。

“梨邑网格化”治理体系，为宿州市思政工作添亮色，把思政工作嵌入基层党建、社会治理等多个领域，实现各网格员深入群众、摸清民态，把党的声音传播至每个地方，把党的关切送到每一位群众心上，达成思政工作全方位覆盖与深度实施。

“老书记调解室”是宿州市处理基层矛盾纠纷的创新行动，老书记们凭借丰富经验及良好群众根基，成为化解矛盾、处理难题的专门人才，他们耐心倾听群众的各类诉求，精准剖析矛盾源头，耐心消弭矛盾冲突，促使不少难题迎刃而解。此平台的组建，成功处理了基层的矛盾，提高了群众的满意程度与幸福体验。

宿州市也借助“红色说事场”“百姓说事亭”等平台，推动干群互动进一步加强，带动治理效果上扬，这些平台为群众表达心声营造了广阔舞台，也为政府倾听民众诉求、体察民意打造了便捷渠道，拉近了政府跟民众的距离感，沟通互动更显顺畅。搭建平台的举措，既使政府透明度得以提升，又增强公信力，并且为政府制定更科学、合理的政策补充了有价值的民意数据。

宿州市创新思政工作模式，在提升基层工作实效的同时，也为全社会营造出和谐平稳、昂扬向上的有利氛围，创新成为强大的动力，助力思政工作不断迈向新的台阶。

（二）丰富思政工作内容

通过文艺展演、宣讲会等形式把党的理论、方针与群众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宿州市把思想政治教育与思想政治理论紧密结合，在思政工作中注重内容的丰富性与针对性，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加接地气。例如游集镇打造的“文化夜宵”栏目，邀请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乡村文艺爱好者等参与，将思政元素融入文艺展演中，实现了寓教于乐的效果。这样做法既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又增强了思政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让更多的人乐于参与进来，共同营造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3]。

在宿州思政工作开展期间，不仅是理论的灌输、政策的宣讲，更是情感的交融、心灵的共鸣，不管是台上宣讲的人员，还是台下的听讲人，皆被思政魅力所感染，共同开拓出一片充满爱与希望的地带。

（三）加强政治工作队伍建设

宿州市围绕强化思政工作队伍建设采用了一系列方法。为提高工作人员综合素质及业务能力，宿州市借助系统培训及实战磨炼，造就了一支政治素养高的工作队伍，拥有过硬政治素养，业务水平高超，该类培训涵盖理论知识剖析、实践技能塑造等方面，助力工作人员更有效地适应新时代思政工作要求；宿州市强化了与学校、社会志愿群体等多元主体的合作联系，共同促进思政工作在基层深入实施，协同格局，对各方资源整合有极大促进，促进思政工作形成联合之力，扩大覆盖范围，对增强实际成效起到显著推动作用[4]，也增进了各领域彼此的交流和学习进程，为思政工作者拓展出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宿州市强化思政工作队伍建设，成效十分显著，借助持续增强工作人员的政治素养与业务水平，加强跟其他团体的协作配合，本市有力促进思政工作在基层深度拓展，对达成和谐社会目标起到积极作用。

三、进一步发挥思政工作在宿州基层治理中的作用的举措

（一）加强组织领导，确保思政工作落地见效

为有效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在宿州基层治理中的作用，需强化组织引领，实现相关工作切实起效的结果，各级党委、政府需清晰认识思想政治工作在基层治理中的关键意义，赋予高度关注，切实强化组织管控，保证思想政治工作任务切实达成。一是建立健全体制机制。通过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有效促进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明确责任分工，做到各环节有专人负责，形成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二是强化督查考核。定期不定期地对思想政治工作进行督促检查，及时发现问题，督促整改，同时把思想政治工作情况纳入绩效考核体系，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激发广大干部搞好思想政治工作的热情和主动性。三是注意培养一支思想政治工作的高素质队伍。强化对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培训和教育，以提升他们的理论素养和专业能力，选拔一批具备较高政治素质和专业技能的人才充实到思想政治岗位，为新时代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坚实的支持[5]。

（二）创新方式方法，提高思想政治工作吸引力

思想政治工作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需要不断创新方式方法，使之更贴近实际、更贴近生活、更贴近群众，以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一是利用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新媒体平台，拓展思想政治工作的传播渠道和覆盖范围。通过制作生动有趣的内容，如短视频、微信公众号文章等，吸引用户的关注和参与，让思想政治教育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进行。二是采用情景剧、小品等艺术形式，将思政元素融入其中。如通过创作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小品，让观众在欣赏表演的同时，在思想上受到启发和教育。三是注重发挥群众主体作用，鼓励群众参政议政，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通过组织各种形式的座谈会、讨论会，让广大市民各抒己见，形成互动交流的良好局面，为宿州的发展进步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召力、感染力。

（三）班子建设有待加强，政治思想水平有待提升

增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是提升思政工作能力和水平的重要举措。首先，从提高职工的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为重点，在保证职工政治信念坚定、道德情操高尚的基础上，认真开展政治思想政治教育；其次，通过举办培训班、座谈会等形式，加强培训实践锻炼，鼓励职工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实践活动、增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不断更新知识体系，掌握最新理论成果和工作方法；再次，建立健全选拔任用机制、考核评价制度和激励机制，为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促进队伍建设的规范化、制度化；最后，重视职工的职业发展和心理健康，为职工投身思想政治工作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和心理支持，为宿州基层治理工作献计出力、建功立业。

（四）加强宣传教育，营造良好氛围

一是强化媒体宣传。充分发挥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各种媒体资源，加强先进典型事迹宣传报道、激励广大市民学习榜样、争当先锋，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正气，传播正能量。二是教育引导工作不断深化。通过主题班会、团队活动等形式，在教育系统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学生良好的品德、行为习惯。三是增强文化活动的丰富性。定期举办文艺演出、书画展览、诗歌朗诵会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在满足市民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为人处世。四是加大环境整治力度。加大环境卫生整治力度，改善城市面貌，为市民创造整洁优美的生活环境，既提升了城市形象，又有利于培养市民的环保意识和公共责任感。五是完善基础设施。公园、广场、健身路径等公共设施的投资建设，为市民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也使市民在感受城市温暖和关爱的同时，享受生活。六是加大监督管理力度。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对不文明行为进行严格管理，通过设立曝光台、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等方式，约束不良行为，维护社会秩序。

四、结语

思政工作在宿州基层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创新思政工作模式、丰富思政工作内容、强化思政工作队伍建设等措施，宿州市在基层治理中取得了显著成效，未来应继续加强思政工作组织领导、创新方式方法、强化队伍建设并加大宣传教育力度，进一步发挥思政工作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推动宿州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龙立军，沈雪莉．中国治理理论研究范式综述[J]. 学理论，2019(05):36-38.

[2] 刘晋飞．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东莞市基层多元共治经验探讨[J]. 中共珠海市委党校珠海市行政学院学报，2018(02):56-62.

[3] 尹鸿飞，苏娟娟．基于新媒体的思政教育模式研究与实践[J]. 新闻研究导刊，2024,15(11):166-168.

[4] 熊化忠．现代新闻传媒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路径创新研究[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9(02):66-67.

[5] 汪勇．论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J].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论丛，2022(01):169-191.

（作者系中共宿州市埇桥区委党校讲师）

社会工作视角下社区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多元激励机制研究

姚楷强

摘要：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社区居民参与是提升治理效能的核心支撑，但当前激励机制存在内容与需求脱节、方式与能力不匹配、节奏与场景错位等问题，直接限制居民参与的广度与深度。社会工作聚焦人的需求满足与能力提升，基于供需适配状况，开展居民需求分层分类调研，建立激励内容动态更新机制，完善供给内容，设计阶梯式方案，搭建能力提升平台，创新实施方式，锚定日常与专项场景调试供给节奏，构建多元协同的激励体系。这样的机制能够精准响应居民差异化诉求，锻造参与本领，夯实激励与治理场景的适配基础，充分激活居民参与内生动力，为基层治理凝聚多元合力，在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构筑和谐有序的社区治理格局方面彰显重要实践价值。

关键词：社会工作；基层治理；居民参与；激励机制；供需适配

基层治理现代化是新发展理念在社会领域的重要实践，社区居民的深度参与是激发治理活力的关键所在。在当前基层治理中，激励机制的供需适配失衡问题愈发凸显，直接导致居民参与热情不足、治理效能难以提升。社会工作以专业视角聚焦人的发展与资源整合，为摆脱这一困境提供有效路径，立足多元激励机制构建，衔接居民需求、参与能力与治理场景，凭借系统性优化实现激励效能最大化，既能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更能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格局筑牢基础。

一、社区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基础背景及社会工作介入价值

基层治理现代化推进过程中，社区居民的深度参与是提升治理效能、凝聚社会共识的核心支撑，参与质量直接关乎公共事务运转效率与社区凝聚力。当前居民参与存在广度不足、持续性偏弱等现实问题，急需科学机制加以引导[1]。社会工作秉持以人为本的核心导向，聚焦个体需求满足与能力培育，依托专业的需求识别、资源整合与沟通协调路径，精准对接居民多元诉求，建立居民与社区的互动纽带，为激励机制赋予专业性与适配属性，介入实践既能激活居民参与的内生驱动能量，更能推动基层治理从单向管理转向多元协同，为构筑高效有序的社区治理格局夯实根基。

二、社会工作视角下基层治理激励机制的供需适配困境

（一）激励内容与居民差异化需求存在偏差

当前基层治理激励内容多采用“一刀切”模式，缺乏对居民年龄、职业、生活场景等维度的精准考量，难以满足多元诉求。年轻群体更关注职业技能提升、社交资源拓展等成长性需求，却常面临以生活用品兑换为主的激励供给，老年人群体对健康服务、文化娱乐的需求强烈，现有激励多侧重物质补贴，忽视精神层面的关怀与满足。部分激励内容与居民实际利益关联度低，未呼应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核心诉求，也未兼顾个体与集体的差异化偏好，致使激励措施难以触动居民参与意愿，无法形成持续的参与动力。

（二）激励方式与居民参与能力不匹配

激励方式的设计未充分考量居民在时间、技能、数字素养等方面的能力差异，与居民参与能力不匹配。部分激励需依托复杂线上平台操作完成积分累计与兑换，老年群体因数字技能不足难以参与，一些实践类激励项目对组织协调、沟通表达等能力要求较高，缺乏基础技能的居民往往望而却步。激励方式缺乏阶梯性设计，既未为初次参与者提供低门槛的入门路径，也未为长期参与者设置进阶式的能力提升引导，能力较弱的居民难以获得成就感，能力较强的居民缺乏持续参与的挑战性，最终制约激励机制的覆盖范围与实际效用。

（三）激励供给节奏与居民参与场景脱节

激励供给的时间安排未能与基层治理的实际参与场景有效衔接，影响激励的即时性与针对性。在日常社区事务中，常态化环境维护、邻里矛盾调解等工作缺乏稳定的激励反馈机制，居民的零散参与行为难以得到及时认可，而在专项治理任务中，集中式文明创建、大型社区活动筹备等事项的激励供给多集中在任务结束后，与参与过程中的即时需求脱节，无法实时调动居民积极性[2]。激励兑现周期过长，部分积分兑换、荣誉表彰等流程烦琐，从参与到获得奖励的时间间隔过久，削弱激励对居民参与行为的即时引导作用，难以形成“参与—反馈—再参与”的良性循环。

三、社会工作赋能基层治理激励机制的供需适配优化路径

（一）基于居民需求调研优化激励内容供给

1. 开展居民需求分层分类调研

调研需兼顾个体与集体需求，从年龄、职业、生活状态、参与经历维度分层，针对青少年、中青年、老年群体划定差异化调研重点，青少年聚焦实践体验与成长赋能需求，中青年侧重职业资源对接与时间灵活化参与需求，老年群体围绕健康服务、文化娱乐与情感陪伴需求推进。结合社区治理实际场景，分类厘清公共事务参与、志愿服务、矛盾调解等参与类型的需求差异，依托入户走访、小组座谈、线上问卷结合线下议事会等多元形式，深入挖掘居民显性需求与潜在诉求。调研过程中注重与居民建立信任联结，运用倾听、共情等沟通技巧探寻真实需求倾向，构建涵盖需求优先级、满意度权重的调研数据库，为激励内容的差异化设计提供坚实支撑，避免激励供给与居民需求脱节的现象。

2. 建立激励内容动态更新机制

依托需求调研数据库，构建灵活适配的激励内容动态调整体系，保障激励措施的持续性与有效性。结合社区治理阶段性目标与居民需求变化，设定定期评估周期，通过居民反馈座谈、参与行为数据分析、激励成效跟踪，实时掌握激励内容适配情况。针对不同群体需求变化，及时优化调整激励清单，如根据年轻群体职业发展需求新增技能培训、行业交流，针对老年群体健康需求拓展体检服务、养生讲座等奖励形式。整合社区内外部资源，联动社会组织、企业等多元主体丰富激励供给，将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动态结合，既保留积分兑换、费用减免等基础激励，又新增荣誉认证、参与成果展示、公共事务决策话语权等进阶激励。建立激励内容公示与意见征集渠道，通过社区公告栏、线上平台及时公开调整情况，吸纳居民建议持续完善，确保激励内容始终贴合居民需求与社区治理实际，形成“需求调研—内容设计—实施反馈—优化调整”的闭环机制，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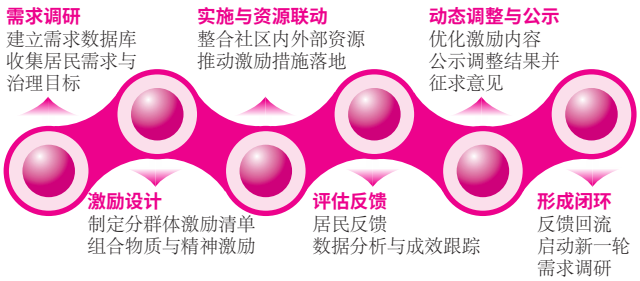


图 1 社区治理激励动态优化闭环机制

（二）结合居民能力特征创新激励实施方式

1. 设计阶梯式能力适配激励方案

入门层级聚焦低门槛参与行为，针对初次参与者或能力较弱群体，设置信息反馈、简单志愿劳动等基础任务，配套积分兑换生活用品、参与证明等即时性激励，降低参与门槛；进阶层级面向有一定参与经验的居民，设计社区事务协商、小型活动组织等任务，提供技能培训名额、公共服务优先选择权等激励，引导其提升综合能力；高阶层级瞄准参与能力强、积极性高的居民，设置治理项目牵头、矛盾调解骨干等挑战性任务，赋予荣誉称号、社区决策话语权、年度表彰等重磅激励，强化其引领作用。各层级间建立灵活晋升通道，居民可根据参与表现与能力提升自主进阶，激励方案既兼顾能力短板群体的参与意愿，又为能力突出者提供价值实现平台，形成“参与—提升—进阶—再参与”的良性循环，全面扩大激励机制的覆盖范围并提升实效。

2. 搭建参与能力提升辅助平台

针对数字技能不足的群体，开设线上操作实操培训班，安排专业人员一对一指导社区 App 使用、积分兑换流程，同步搭建线下辅助窗口，确保老年群体等不熟悉数字化工具的居民便捷参与。围绕沟通协调、活动组织、矛盾调解等核心参与能力，组建专题兴趣小组与实战训练营，通过情景模拟、案例研讨、经验分享等形式，由社会工作者与资深参与者共同授课，提升居民专业技能[3]。构建居民互助学习网络，鼓励能力强的居民担任“参与导师”，与新手居民结成帮扶对子，在实际参与过程中传帮带。整合社区公共空间、社会组织资源，为居民提供实践演练平台，让居民在筹备社区文化活动、开展环境整治等实操场景中锤炼能力，实现激励参与和能力提升的双向赋能，为激励机制的有效落地筑牢能力基础。

（三）贴合参与场景动态调整激励供给节奏

1. 匹配日常治理场景的常态化激励

紧扣社区日常治理的高频场景，构建稳定、即时的常态化激励体系，让居民零散参与行为得到持续认可与正向引导。针对日常环境维护、邻里矛盾调解、社区公共设施巡查、便民服务值守等常规事务，设定明确的参与量化标准，居民完成相应任务后，通过数字化平台实时记录并累计积分，积分可灵活兑换生活

用品、社区公共服务折扣等即时奖励[4]。融入精神激励元素，每月评选“社区日常参与之星”，在社区公告栏、线上社群进行事迹展示，增强居民参与的荣誉感。建立日常参与反馈机制，社会工作者定期与参与者沟通，及时回应参与过程中的疑问与诉求，优化参与流程。常态化激励注重低门槛、广覆盖，既保障老年群体、全职妈妈等时间碎片化人群的参与可行性，又通过持续的激励反馈，让居民在日常参与中养成自觉习惯，将个体行为转化为社区治理的长效动力，推动日常治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参与”转变。

2. 对应专项治理任务的阶段性激励

围绕集中式文明创建、社区环境集中整治、大型文化活动筹备、突发公共服务保障等专项治理任务，构建针对性强、节奏适配的阶段性激励机制。任务启动阶段，通过发布专项激励公告、召开动员大会等形式，明确任务目标、参与方式及专属奖励，如颁发专项荣誉证书、优先参与社区重点项目等，充分激发居民参与热情；在实施过程中，设置阶段性节点奖励，对完成关键任务、表现突出的个人或团队予以即时表彰与物资补贴，实时调动积极性；任务结束后，开展专项成果评选与总结表彰，为贡献突出者授予“专项治理先锋”等荣誉称号，纳入社区年度表彰体系，将其参与经历同步记入个人社区信用档案，作为后续各类资源分配的重要参考依据。阶段性激励紧扣专项任务的时间节点与工作重点，以“事前动员—事中激励—事后表彰”全流程设计，实现激励供给与参与场景同频共振，高效凝聚专项治理所需的人力与合力。

四、基层治理激励机制适配优化的实践效能与应用延伸

（一）激励内容优化后的居民需求响应效能

激励内容经过分层分类调研与动态更新，精准对接居民多元诉求，显著提升需求响应的针对性与有效性。不同年龄、职业群体的核心需求得到充分关照——青少年的成长赋能需求、中青年的职业发展与灵活参与需求、老年群体的健康服务与情感陪伴需求，均能在激励清单中找到对应落点[5]。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的动态结合，既满足了居民的即时性利益诉求，又回应了其对价值认同与社会尊重的深层需求。正因为激励内容与自身需求高度契合，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明显增强，参与意愿实现从被动动员到主动参与的转变，参与人群的覆盖面也持续扩大，原本参与意愿较低的群体逐步融入治理进程，让激励机制真正成为激活居民参与热情、凝聚社区治理合力的有效载体。

（二）激励方式创新对居民参与能力的提升作用

阶梯式能力适配激励方案与参与能力提升辅助平台的搭建，有效破解了居民参与能力与激励要求不匹配的难题，推动居民参与能力实现系统性提升。低门槛的入门级激励为能力较弱的居民提供参与契机，使其在基础任务中积累经验、建立信心；进阶与高阶层级的激励设计，则引导居民主动提升组织协调、沟通表达等综合能力。能力提升辅助平台通过实操培训、实战演练、互助帮扶等多元形式，为居民补足参与所需技能，数字技能不足、缺乏治理经验等参与障碍被逐步破除。居民在参与过程中不仅获得激励回报，更实现自我成长，部分居民从普通参与者转变为治理骨干，具备牵头项目、调解矛盾的专业能力，为基层治理注入可持续的人才动力。

（三）激励节奏调整与参与场景的融合应用效果

激励供给节奏与日常治理、专项治理场景的精准适配，构建起“参与—反馈—再参与”的良性循环，大幅提升激励机制的实践效能。常态化激励让居民的日常零散参与行为得到及时认可，积分实时累计、月度表彰等形式强化参与的即时反馈，推动居民养成自觉参与日常治理的习惯，使社区环境维护、公共设施巡查等常规事务获得稳定人力支撑。阶段性激励与专项任务全流程深度融合，事前动员激发参与热情，事中节点奖励维持参与动力，事后表彰巩固参与成效，有效凝聚专项治理所需的集中力量，确保文明创建、大型活动筹备等任务高效推进。激励节奏的动态调整既保障不同场景下的治理需求，又让居民切实感受到参与价值，进一步增强其对社区的归属感与责任感，推动基层治理效能持续提升。

五、结语

基层治理的高效推进离不开居民的深度参与，多元激励机制是激活参与动力的关键支撑。社会工作视角下的激励机制优化，通过精准对接居民需求、适配参与能力、贴合治理场景，构建起兼具针对性与操作性的实践体系。这一机制有效破解供需适配难题，既提升居民参与的主动性与持续性，又强化基层治理的协同效能。未来需持续呼应居民需求与治理环境的动态变化，深化多主体资源整合，让激励机制更具灵活性与生命力，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持久保障。

参考文献

[1] 齐喜玫 . 社会工作介入社区基层治理的模式与路径研究 [J]. 社会与公益 ,2025(22):184-187.

[2] 陈文文 . 基于社会工作视角对城市社区现代化治理的路径优化 [J]. 未来城市设计与运营 ,2024(06):41-45.

[3] 冯钰鑫 . “五社联动”模式下社会工作参与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实务研究 [D]. 吉安 : 井冈山大学 ,2024.

[4] 李诗谣 . 嵌入性理论视角下社区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区治理研究 [D]. 成都 : 电子科技大学 ,2024.

[5] 孙静琴 . 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促进策略 : 一个社会工作的视角 [J]. 行政科学论坛 ,2022,9(07):50-53.

（作者单位：中共喀什地委党校）

社会工作介入家政工劳动权益保护的五维策略

徐　佳

摘要：我国当前“一老一小”照料需求使得家政服务业发展迅速，成为乡村振兴、扩大就业和提振消费的重要力量。然而，作为新的城市建设者，家政工的权益保护问题日益凸显。体现为劳动边界模糊，游离于“主体论”之外；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维权意识淡薄；劳动合同流于形式，诸多权益无法覆盖；群体支持力度不足，维权途径较少等现实困境。基于此，文章从个体赋权、群体支持、社区融入、组织互动和政策支撑五个维度提出以赋能与联结为核心的介入策略，以期将家政工劳动权益保护研究拓展至社会工作领域。同时，探究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新路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消除社会矛盾，促进共同富裕。

关键词：社会工作；基层治理；家政工；劳动权益；五维一体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回顾

在当前“银发浪潮”和“托育刚需”背景下，家政工群体日渐增多，悄然成为城市运转的柔韧力量。但值得关注的是：一方面市场对家政工的需求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其劳动权益难以得到全面有效保护。2022 年国际劳工组织报告显示：全世界仅 6% 的家政工能获得较全面的社会保障 [1]。这意味着家政工权益保护问题不只限于中国，而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难题。

学界对家政工研究融合性别、阶层、种族等诸多视角，聚焦身份认同、劳动关系和情感劳动等方面。其总体状况是权益保护方面的研究基础：从身份认同看，呈现为疏离农村，但尚未建立对城市社区的归属意识 [2]；在劳动关系上，由于与雇主间特殊的“雇佣关系”[3] 而陷入“亲密陌生人”困境。家政雇佣关系看似劳动关系，但非典型，很难得到劳动法保护 [4]；在情感劳动方面，从霍克希尔德 [5] 首次提出服务型工作中的“情感劳动”，到“资—客—劳”三元主体分析框架 [6]，学界已从借助劳动过程理论，开始探索基于我国熟人社会的家政工本土化情感劳动模式。

目前，家政工权益保护研究大多基于法学和管理学领域，公认其劳动权益维护发展艰难 [7]。在社会工作领域，此议题研究是妇女社会工作的重要组成，从第一代农民工的研究阶段就已受到关注。理论视角日渐多元、实务实践逐步丰富：其中可见优势视角、赋权理论、社会性别理论等学理支撑；可见城市适应、自助组织、职业认同等诸多议题。现有研究可拓展之处在于：一是对家政工实际工作场景的深入分析不足，亟须将制度层面的法律保护落实到实际情境中；二是其理论深度和实证广度亟待拓展。基于社会工作的诠释视野，探索家政工劳动权益保护的介入策略，为其建构更加全面合理的具体路径，将法律保护转化为实际保护，是家政工权益保护的关键一步。

二、家政工劳动权益保护的现状与困境

（一）劳动边界模糊，游离于“主体论”之外

家政劳动有两大特点：一是照料劳动，二是非正规就业。传统“主体论”实则源于家政工独特的劳动过程，“主体论”认为劳动关系应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之基础上，私人雇佣关系不属于劳动法律关系，因而剥夺了家政工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资格 [8]。日常实践中，大部分雇主和部分家政工也并未认同“家政工”是真正意义上的“雇工”，这在无形中加重了她们在结构化劳动力市场中的劣势。“家庭”这一私人领域的家政劳动，其边界的模糊性，很容易形成在劳动过程中延长工作时间、过劳而无加班费用补偿等问题。平日里遵照雇主提出的“家庭规则”，介于“雇工”和“拟血亲”之间的两难境地，这种基于人情关系的灵活性迁就，也使得家政工在处理劳动纠纷时难以在“市场规范”和“家庭规则”中做出选择。

（二）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维权意识淡薄

预计 2026 年，家政服务业市场规模将突破 13000 亿元，从业人员超过 3000 万人 [9]，其中女性从业者占

比高达 95.5%。家政工的平均年龄 50 岁左右，主要由农村流动女性和城市再就业女性构成，80% 以上为农村户籍。家政工的人力资本水平普遍较低，70% 以上为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家政工的工作时间长且不稳定，收入水平参差不齐、内部分化显著，一部分家政工的收入甚至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拖欠工资时有发生。家政工维权意识淡薄，突出表现在不主动签订劳动合同，在遇到劳动纠纷时，缺乏基本的法律保护。她们甚至不清楚究竟能享有哪些法律权利和保障。即使知道自身的权利，也常因为错误认知导致维权行为的偏差。

（三）劳动合同流于形式，诸多权益无法覆盖

即便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内容的不完善以及执行不力也是家政工权益保护的重要问题，如劳动培训、工伤赔偿和纠纷解决方式等重要条款在家政工的劳动合同中普及率较低。在社会保险参与方面，虽然大部分家政工购买了医疗保险，但其他类型的社会保险，如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的参与度相对较低。社会保险的不充分参与，使得家政工在面临工伤、疾病等风险时缺乏必要的保障，增加了她们生活的不稳定性。更重要的是，无法得到有效保护的劳动权益反之又对其劳动过程产生负面影响，容易形成恶性循环。在家庭这个私人领域，家政工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习得保护人身安全的本领也至关重要。家政工人身安全受到侵害的事件时有发生，对其安全培训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四）群体支持力度不足，维权途径较少

处理劳动争议是家政工劳动权益保护的关键环节，以农村女性为主体的家政工，大部分背井离乡，自身资源稀少，导致其维权途径也少。在遇到劳动争议和纠纷时，她们更倾向于向自己的老乡求助，或者找中介机构，而非第一时间想到向主管部门或法律机构寻求咨询或保护，这反映出家政工在维权途径上社会支持及资源利用方面的不足。此外，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和群体支持力度不足使得家政工在与中介机构及雇主的博弈过程中处于劣势。同时，缺少群体支持也在另一个层面削弱或剥夺了家政工集体谈判的权利。因而，社会工作者为其链接资源，形成群体和组织性的支持，使之在维权时不孤立无援，也为其维护劳动权益建构一个切实可行的公共空间。

三、社会工作介入家政工劳动权益保护的五维策略

新时代社会工作担当新使命，完善家政工劳动权益保护机制需要从多层面入手，充分发挥贴近弱势群体的工作优势，全方位探索介入家政工劳动权益保护的具体路径。主要包括个体层面、群体层面、社区层面、组织层面和政策层面五个维度，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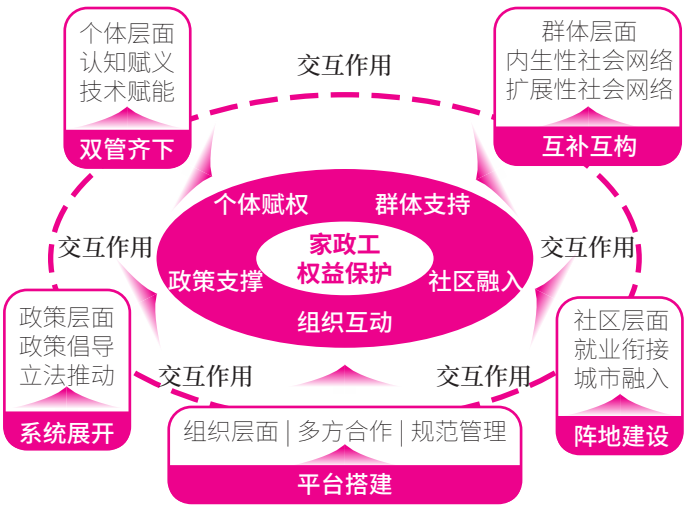


图 1 社会工作介入家政工劳动权益保护的五维策略

（一）个体赋权：认知赋义与技术赋能双管齐下

首先，运用认知重建策略，增强家政工维权意识。在法律知识普及与权益教育方面，社会工作者可定期开展法律知识普及活动，通过开展教育小组、支持小组和成长小组等实务，向家政工传授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障法等相关法律知识，增强家政工的维权意识。培养家政工的自我倡导能力，使他们能够在面对权益侵害时，有意识、有能力，敢于并善于自我维权。运用认知重建策略，纠正其因错误认知导致的维权行为偏差，树立正确的维权理念。

其次，通过技术赋能，提升家政工的人力资本水平，实现家政工的自我赋权。在职业规划与技能提升方面，社会工作者为家政工提供职业规划指导，“量身定制”针对个人的职业发展方向。通过组织培训和工作坊，提升家政工的职业技能和专业水平，增强其维权议价能力和职业竞争力。帮助家政工通过技术赋能，实现自我赋权。同时鼓励家政工参加继续教育，增强维权意识。

（二）群体支持：内生性与扩展性社会网络互补联结

家政工的内生性社会网络植根于“亲缘”“地缘”等社会关系，扩展性社会网络更多生发于“业缘”关系。构建群体性社会网络的优势尤其体现在拓展家政工社会支持、维护其心理健康、适应城乡差异等方面，社会工作者可通过夯实其内生性社会网络、搭建其扩展性网络，从而提供心理咨询和情感支持，使两类社会网络互补联结，从而切实成为家政工维权的双重后盾。

社会网络的意义在于增强社会资本，使得家政工的社会资源实际运作起来。建设家政工自助组织，提升群体能力，也可以提高其议价能力，改善劳动条件和工作待遇等。鼓励和帮助家政工之间建立互助网络，通过经验分享、情感支持，增强个体抵御风险的能力，

为拓宽其权益保护的渠道提供支持。

（三）社区融入：就业衔接与城市融入阵地建设

家政工多为流动到城市或县域内的农村女性，城市融入的首要依托应为社区融入。依托社区空间，建立社工驿站，开展法律咨询和援助等服务；结合教育性小组为新入职家政工提供职业培训和维权支持。社工在社区内倡导家政工参与社区活动，并通过社区服务和志愿活动等，挖掘其参与社区、服务社区的潜能，使之更好地融入社区，并获得社区资源和多方面支持。

社区是家政工权益保护的重要阵地，家政工所居住的社区，除了依靠其内生性社会网络之外，流动至北京、上海等地的家政工大多有集中的居住地，也就形成了独特的社区。社工可通过深入调研，了解此类社区各方面需求，提供切实的服务。可以整合社区资源，加大宣传力度，倡导家政工的立法保护，有针对性地帮助零工等劳动权益受到侵害的重点群体，做好社区嵌入式可持续基本就业公共服务。

（四）组织互动：多方联结与规范管理平台搭建

与群体支持不同，促进组织互动的目标是搭建沟通平台，家政工通常需要面对雇主家庭和家政公司，此二者也是维护其劳动权益的直接对象。社会工作者可从中创建家政工与雇主家庭、家政公司之间的沟通桥梁，促进双方的理解与合作，化解劳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矛盾。员工制家政公司可鼓励和支持家政工参与公司决策，建立以尊重和支持为特征的组织文化，倡导雇主家庭和员工之间相互谅解，提升家政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忠诚度。

社会工作者可在家政工群体中培养权益代表和积极分子，学习掌握劳动法相关知识，运用合理方式与雇主家庭或家政公司进行协商，维护家政工的集体合法权益。社工可通过大力倡导与建议，推动家政服务行业标准的完善和实施，规范行业行为，提升服务质量。同时，代表家政工群体，尤其是女性家政工，向政府、雇主和家政服务公司等利益相关方进行权益倡导，争取平等的工作机会、合理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

（五）政策支撑：政策倡导与立法推动系统展开

首先，倡导完善家政工的行业薪酬和权益保障。社会工作者可利用相关研究成果，积极向立法机构和政府部门提出政策建议，倡导制定和完善家政工劳动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如最低工资标准、工作时间、休息日、社会保险和福利等，为家政工争取更有利的法律保障。同时还可参与到立法推动与政策制定过程中，确保家政工的视角和需求被充分考虑，包括参与公开听证会、政策咨询小组或工作组，推动家政工权益保护的立法进程。

其次，对政策执行进行监督。社会工作者通过监督政策的实施情况，确保家政工权益保护政策得到有效实施，包括跟踪调查政策变化对家政工生活的实际影响，及时反馈政策效果。同时社会工作者还可开展关于家政工劳动条件、工资待遇和工作满意度等方面的研究，收集和分析相关数据，为检验政策执行效果提供依据。

四、小结

家政工大多是勇于改变自身和家庭命运的劳动妇女，她们的体面劳动与权益保护是许多家庭乃至整个社会都需要的。这不仅涉及性别平等，也关乎社会保障和社会公正，更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目前，家政工群体分层显著并呈现出新特征，这些新变化是我们研究其权益保护问题的新基础。高质量服务弱势群体、化解社会矛盾，是新时代社会工作的责任，需要倡导多方参与、联结合作，从而构建更加完善的家政工劳动权益保护体系。

参考文献

[1] 国际劳工组织：只有 6% 的家政工人享有全面的社会保障 [EB/OL].(2022-06-16)[2026-03-04].https://news.un.org/zh/story/2022/06/1104662.

[2] 王春光 .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 [J]. 社会学研究 ,2001(03):63-76.

[3]COSER L A.Servants: The obsolescence of an occupational role[J].Social Fo-rces,1973,52(01):31-40.

[4] 谢增毅 . 超越雇佣合同与劳动合同规则——家政工保护的立法理念与制度建构 [J]. 清华法学 ,2012,6(06):71-80.

[5]HIRSCHHORN L.The post-industrial economy: Labour, skills and the new mode of production[J].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1988,8(01):19-38.

[6] 苏熠慧 . 控制与抵抗：雇主与家政工在家务劳动过程中的博弈 [J]. 社会 ,2011,31(06): 178-205.

[7] 郑尚元 . 家政工职业化与城市居家养老社会化 [J]. 财经法学 ,2021(01):61-74.

[8] 刘明辉 . 家政工获得劳动保障权利的障碍及路径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1,32(05):120-124.

[9] 艾媒咨询 .2023-2024 年中国家政服务行业发展剖析及行业投资机遇分析报告 [EB/OL].(2023-10-17)[2025-09-17].https://k.sina.com.cn/article_1850460740_6e4bca44019010u4a.html.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1 年度江西省社会科学“十四五”基金项目“照料经济学视域下家政工的劳动过程与权益保护研究”（21SH05）。

（作者系江西财经大学社会与人文学院硕士生导师）

数字技术驱动乡村生态振兴的实践路径

任苗雨

摘要：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成为驱动乡村生态振兴的关键力量。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为乡村生态环境的智慧治理、生态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以及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然而，当前数字技术赋能乡村生态振兴的实践仍面临诸多制约：乡村数字基础设施覆盖不足且质量参差不齐，乡村生态数字化人才储备匮乏，数字化监管体系尚不健全等。鉴于此，应当着力推进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提质升级，构建多层次数字人才培养体系，完善数字化环境监管机制，搭建集成化的生态治理平台，以此深化数字技术与乡村生态建设的融合互促，助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数字技术；乡村生态振兴；智慧生态治理

“建设美丽中国是新时代的奋斗目标”[1]，要“让美丽乡村成为现代化强国的标志、美丽中国的底色”[2]238。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这一重要部署将美丽乡村建设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凸显了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基础地位。在乡村振兴总体布局中，生态振兴发挥着关键支撑作用。随着国家信息化战略的深入推进，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为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注入强大动能。将数字技术融入乡村生态振兴，能够精准赋能生态监测、科学支撑治理决策、高效促进资源利用，为系统推进乡村生态振兴提供机制保障，助力实现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协同提升。

一、数字技术驱动乡村生态振兴的价值意蕴

数字技术凭借智能、精准、高效的特点，可以满足乡村生态发展的多种需求。它给乡村生态建设带来了新的发展活力，在乡村生态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驱动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效能跃升

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占据核心地位，既是实现生态振兴的关键路径，又与农民生活质量提升及乡村可持续发展紧密关联。近年来，伴随数字经济发展，各地以数字化基建为核心，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与生态治理深度融合。这种融合重构了传统治理模式，通过数据精准赋能，实现了从经验驱动向数据智能支撑的转变，在提升污染源识别精度、优化监管时效性、增强决策科学性等方面优势显著，为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可行路径与可持续支撑。

在乡村生态保护工作中，数字技术能够从多个层面发挥推动作用。借助智慧监测平台，可对各类环境要素进行实时监测、动态分析和风险预警，依靠数据支撑提升环境监测的可靠性与决策的科学性，进而提高生态环境保护精细化水平。互联网技术与环境监测工作相结合，形成了新的治理方式，有助于更早发现生态风险并及时预警，推动环境治理从传统粗放管理转向精准化、智能化管理。通过整合物联网监测网络，可以对污水排放、大气污染物扩散以及治污设施运行状况进行全过程跟踪，形成连续完整的数据支撑，为日常环境评估和突发环境事件处置提供依据。利用数据分析能够提前预判环境质量变化趋势，精准追溯污染来源，并制定针对性治理措施。数字技术的应用，让生态治理从以往依靠经验判断，转向依靠数据开展工作，既提高了污染源识别精度，也缩短了监管响应时间，提升了资源利用效率。数据资源与传统治理模式相互融合，为构建现代化生态治理体系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二）引领乡村生态产业智能化变革

生态产业的价值在于统筹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它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也是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抓手。推动生态产业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不仅能提升生态治理水平，也能推动产业提质升级。在农业领域，数字技术通过精准采集数据、全程监控生产过程、智能分析农事动态，让田间管理更精细，

土地产出效率和资源循环利用率也随之提升。大数据与智能农机设备的结合应用，正在推动农业生产不断向智能化、自动化方向升级，逐步构建起以数据为支撑、以科学管理为核心、以绿色发展为目标的新型生产模式。在乡村工业发展中，借助数字传感与数据分析技术，企业能够更准确地把握资源使用情况，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智能设备的运用则进一步优化生产工艺，促进绿色生产方式不断创新。在乡村旅游领域，数字化服务让游客在信息查询、行程安排以及个性化需求满足上更加便捷高效。同时，各类数字化平台也在持续传播生态旅游理念，增强社会公众的生态保护意识，助力旅游产业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总体而言，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为生态产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这种融合有效提升了生态治理的精准程度，优化了资源配置方式，增强了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产业支撑与可行的发展思路。

（三）促进乡村生态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

乡村生态公共服务是满足农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需求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其数字化建设，对打造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具有重要意义。在实际工作中，搭建数字化服务平台可以畅通政府与村民之间的信息沟通渠道，提高服务公开度，让村民及时了解环保政策、生态治理进展和资源利用情况，增强生态保护意识，提升参与监督的积极性。在垃圾处理方面，推广智能分类设施可以降低村民使用难度，利用图像识别等技术提高垃圾分类准确率，结合实时监测数据优化垃圾收运与处理流程，有效改善“垃圾围村”现象，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在生态空间管理上，通过高清监控、卫星遥感等技术手段，可以实时掌握乡村绿化情况，为绿化规划和植被保护提供数据支撑，推动优化绿化布局，提高植被覆盖率和生态系统质量，切实改善村民生活环境。数字技术从整体上重构了乡村生态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实现了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相统一，在提高治理效率、合理配置资源、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形成协同作用，为建设生态宜居乡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

二、数字技术驱动乡村生态振兴的现实困境

数字技术为乡村生态振兴提供了重要支撑，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二者融合仍面临诸多制约，驱动效果未能充分显现，具体问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当前我国乡村地区普遍存在数字基础薄弱的问题，成为制约生态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首要瓶颈。尽管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农村网络覆盖工程，实现了大部分乡村的宽带接入和基础网络覆盖，但偏远山区、丘陵地带等生态资源丰富的区域，仍面临网络信号弱、稳定性差、5G 普及度低的问题，无法满足生态环境监测、污染源实时追踪、自然资源数据传输等对网络速率和稳定性的高要求。同时，乡村生态治理专用的数字化设备配置严重不足，智能水质监测仪、空气传感器、林地火情监控设备、土壤墒情检测系统等硬件设施普及率极低，多数村庄仍依靠人工巡查、人工观测等传统方式开展生态保护工作，难以精准捕捉生态环境的细微变化。此外，一些乡村现有数字基础设施还存在“重建设、轻维护”的现象，部分已安装的数字设备因缺乏专业运维、资金支持不足，长期处于闲置或故障状态，再加上生态领域数字化平台建设滞后，数据采集、整合、分析功能不完善，无法形成完整的生态数据链条，导致数字技术难以真正融入乡村生态保护、污染治理、资源可持续利用等核心工作，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在生态振兴领域进一步凸显。

（二）乡村生态数字化专业人才短缺

人才是数字技术与乡村生态振兴深度融合的关键支撑，当前乡村数字专业人才严重匮乏的问题，直接阻碍了生态治理数字化、智能化的推进步伐。从人才结构来看，乡村地区既懂生态环境保护专业知识，又精通大数据、物联网、智能设备操作等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稀缺，本地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向城市流动，留守的中老年群体数字素养普遍偏低，不仅难以操作生态监测数字设备，更无法完成生态数据的分析、解读与应用。高校和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与乡村实际需求存在脱节现象，一些学校开设的数字技术、生态治理专业大多聚焦城市场景，很少针对乡村生态特点设置课程，培养出的专业人才扎根乡村意愿不强，导致乡村生态数字化治理人才供给严重不足。基层从事生态工作的村干部、农技人员，大多未接受过系统的数字技能培训，仅能完成简单的设备操作、数据记录等基础工作，无法胜任数字平台运维、数据模型构建、生态问题数字化研判等核心工作。同时，乡村缺乏完善的人才引育留用机制，薪资待遇、发展空间、生活配套等条件远不如城市，难以吸引外部专业数字人才入驻，也无法培育本土数字化生态治理队伍，使得数字技术在乡村生态振兴中的应用停留在表面，无法发挥其精准治理、高效监管的核心作用。

（三）乡村生态数字监管体系亟须完善

完善的数字监管模式是保障数字技术规范应用、推动乡村生态振兴长效发展的关键。当前乡村生态领域数字监管模式缺失，严重制约数字技术赋能效果，甚至带来新的治理难题。一方面，数字化监管缺乏统一制度框架与标准规范，生态数据采集、存储、共享、使用及设备运维、执法监管等缺少明确制度约束。各地区、各部门各自为政，数据标准不统一、共享壁垒突出，农业、环保、林业等数据难以互通，形成大量“信息孤岛”，难以实现全域生态环境一体化监管。另一

方面，数字化监管机制不健全，仍以传统人工监管为主，缺少智能化、全流程监管体系，对乡村面源污染、林地破坏、水资源浪费等问题难以做到实时预警、全程追溯和精准执法，监管效率低且存在明显盲区。同时，多元协同监管机制缺位，政府、企业、农户、社会组织职责划分不清，公众参与监督渠道不畅，缺少便捷的线上举报平台。加之基层监管能力不足，对数据失真、违规应用等问题处置不及时，使得数字技术难以在生态监管中落地见效，高效、精准、全覆盖的数字化治理体系尚未形成。

三、数字技术驱动乡村生态振兴的实践路径

（一）补齐建设短板，夯实乡村生态振兴数字根基

针对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这一制约数字技术赋能乡村生态振兴的突出短板，必须立足乡村生态治理的现实需求与区域差异，坚持统筹规划、重点倾斜、建管并重，系统性推进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提档升级。要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导向，统筹推进城乡数字基础设施一体化规划、一体化建设、一体化运维，将资金投入、项目布局重点向偏远山区、生态功能区、传统村落等薄弱区域倾斜，加快补齐乡村网络设施短板，全面完善乡村 5G 网络、宽带光纤、物联网基站、卫星接收终端等基础网络设施，着力提升网络信号的稳定性、传输速率与覆盖深度，切实满足生态环境实时监测、数据高效传输、远程智能管控的基础运行需求。同时，持续加大乡村生态专用数字化设备投入力度，按区域、分批次配备水质、土壤、空气、噪声等智能环境监测终端，在林地、农田、水源地、自然保护区等重点生态功能区搭建全域智能监控感知节点，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的生态环境监测感知网络。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数字基础设施长效运维管护机制，有效整合政府财政资金、企业社会资本与村级组织自治力量，明确管护主体、压实管护责任，配备专职或兼职人员开展设备检修、网络维护、系统升级，坚决避免设施建而不用、用而失管、闲置浪费等现象。此外，加快构建统一高效、开放共享的乡村生态数字化综合管理平台，整合生态数据采集、智能分析、预警预报、协同处置等核心功能，打通部门间、区域间、层级间的数据传输壁垒与信息孤岛，为数字技术全面赋能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生态产业发展与生态公共服务提升筑牢坚实的硬件支撑与平台基础。

（二）强化引育并举，壮大乡村生态数字化专业人才队伍

“要着力抓好招才引智，促进各路人才上山下乡投身乡村振兴。”[2]242 破解乡村生态数字化专业人才短缺难题，需坚持人才引进与本土培育双向发力，一方面完善乡村人才引育政策，优化薪资待遇、生活保障、职业发展等配套条件，出台专项激励措施，吸引具备生态保护与数字技术双重素养的复合型人才、专业技术团队返乡扎根，鼓励高校数字技术、生态环境相关专业毕业生到基层生态治理岗位就业，弥补人才供给缺口。另一方面立足本土开展针对性数字技能培训，面向村干部、基层农技人员、生态管护员开展生态监测设备操作、数据平台运用、数字化生态研判等专题培训，提升基层工作人员数字化实操能力，同时针对乡村留守群体开展基础数字素养普及教学，帮助其掌握简单的生态信息上报、设备使用方法，还要推动高校与乡村、企业合作，开设贴合乡村生态治理需求的定制化课程，建立实训基地，培育一批懂乡村、懂生态、懂技术的本土数字化人才，打造稳定的乡村生态数字化治理队伍[3]。

（三）健全数字监管体系，保障乡村生态数字治理规范高效

数字环境监管体系是乡村生态振兴的重要保障，目前，一些县级行政区数字环境监管机制的发展还不是很完善，难以实现全过程、全领域、全覆盖[4]。围绕乡村生态数字化监管体系尚未健全的短板，要加快构建系统化、规范化的数字监管机制，首先制定统一的乡村生态数字化监管制度与标准规范，明确生态数据采集、存储、使用、共享的流程准则，规范数字监测设备运维、数字化生态执法等工作要求，打破各部门数据壁垒，推动农业、环保、林业等部门生态数据互联互通，消除信息孤岛，实现全域生态环境一体化监管[5]。其次创新数字化监管模式，依托大数据、物联网技术搭建生态问题智能预警系统，对乡村面源污染、林地破坏、水资源污染等问题实现实时监测、自动预警、全程追溯，替代传统人工监管模式，填补监管盲区，同时明确政府、企业、农户、社会组织等多方监管职责，搭建公众参与的数字监督举报平台，畅通群众生态问题反馈渠道，提升基层监管部门数字监管能力，及时处置数字技术应用中的违规行为与数据失真问题，构建全方位、高效率、协同化的乡村生态数字监管体系，保障数字技术在乡村生态振兴中规范落地、发挥实效。

参考文献

[1] 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230.

[2] 论“三农”工作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238,242.

[3] 周笑梅，王畅 . 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振兴：作用机理、现实挑战和路径选择 [J]. 农业经济，2025(12):111-112.

[4] 尚庭 .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生态振兴的路径探析 [J]. 广西农学报，2023(38):95.

[5] 杨奇维，朱玉知，张瀚，等 .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经济发展的实践路径 [J]. 新农民，2025(35):22-24.

（作者系内蒙古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社工站介入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与实践路径研究

张生元　孙媛媛

摘要：我国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是我国社会治理改革的关键环节，也是推动乡村社会与时俱进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乡镇社工站的建设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重建提供了全新的实践思路，通过构建“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市场—社会工作者”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的框架，能够充分发挥各方优势，整合资源，形成合力，满足农村发展和民生改善的需求，有助于重建乡村社会资本和社会秩序，推动乡村社会建设，改变因城市化发展而造成的农村衰落的局面，为乡村振兴提供有效的路径。

关键词：社工站；乡村治理；实践路径

一、社工站介入乡村治理的现状

（一）社工站介入乡村治理的动力与机遇分析

1. 国家政策的推动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强调“推动各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设置基层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岗位、引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和志愿者等方式”为农村边缘弱势人群提供服务。社会工作强调协调和协商，以服务困难群众、困境人群为本，以及强调过程目标和结果目标相结合的特点与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之间具有极高契合度。社会工作服务不仅是具有计划性的实践，更是一种致力于动员与协调多元主体以实现善治的系统性行动，能够有效推动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1]。

2. 乡村治理的现实需要

乡村治理的改革面临多方困境，一是乡村弱势群体存在需求。目前农村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农村养老问题突出，并且乡村存在各类特殊群体，例如留守儿童、妇女、失独家庭的需求得不到解决。二是治理呈现内卷化状态。农业税费改革后，部分乡镇政府难以满足农村基本服务需求，国家为乡村提供的社会资源未能有效转化为公共福祉[2]。

（二）社工站介入乡村治理的角色定位

1. 关系协调者

（1）加强乡村党建引领

乡村社会治理工作离不开基层党建强有力的引领，社工站的介入，一方面壮大了乡村党组织的人才队伍，为乡村社会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另一方面，能够加强乡村党建力量，有助于乡村社会各项服务的开展，促进群众与党组织之间的联结。加强乡村党组织引领社会发展、联系群众以及开展各项服务的力量，为实现良好的乡村治理格局提供强有力的引导。

（2）提升主体合作意识

当前乡村治理涉及基层党组织、政府、社会组织等多元力量，需要在党的领导下进一步强化统筹协调机制。社工站作为专业服务力量介入到乡村治理中，在党建引领下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协助明确各参与主体的功能定位，促进村“两委”与多元主体间的有效联动。同时，社工站在政府的背景下通过搭建跨部门、跨领域的合作平台，推动形成党组织统一领导、各方之间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建构具有共同行动力的利益联结共同体[3]。

2. 政策倡导者

（1）充分贯彻落实政府政策

乡镇社工站的建立对于政府政策的传递和实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当前国家各项政策保障范围呈现愈加广泛的趋势，村支两委在各项行政事务中占据主导地位，难以将一些细致的政策落到实处，造成有些村民应享而未享。乡镇社工站通过专业技能和方法，将政策转化为具体的服务和福利，为政府政策的落实提供了宝贵的支持和帮助，提高了群众的获得感，实现了与民政部门的紧密合作，为打通政策“最后一米”作出了积极贡献。

（2）依据实际需求提出政策建议

乡镇社工站作为基层组织，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农村地区的困难群众，因此能够充分发掘和了解服务对

象的需求尤其是政策需求，并将这些信息进行整合分析，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实际可行性的政策建议，在与政府的具体职能部门的沟通交流中促进政策的完善，依据各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推动有关政策的完善，为乡村治理和社会发展提供助力。

3. 资源盘活者

（1）盘活乡村现有资源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各类基础设施日渐完善，乡村公共服务中心、社区文化站等公共活动中心设施配备齐全，但当前一些乡村存在服务阵地和设施利用率低的问题，或是场地闲置、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或是文化站等公共活动中心被村委上锁，只有上级检查时才开门。村支两委人力有限，难以分出时间和精力对各类场所进行有效的管理，开展公共服务的意识也不强，导致资源浪费的现场发生。乡镇社工站的进驻，能够有针对性地发挥各类现有资源的效用，通过盘点各类资源，在不同的场所开展相应的服务活动，从而将闲置的资源“活”起来，充分发挥各类资源服务村民的效用。

（2）引入外部社会资源

乡村社会具有其独特的发展资源，但当前部分农村与城市之间还存在割裂的情况，乡村资源难以开发，外部资源引进通道不畅，导致乡村治理动力不足。乡镇社工站立足于优势视角理论，充分发掘乡村特有的资源，将其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治理优势。乡村社工站积极链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高校等资源，对各类资源进行整合，探索建立乡村社会的利益联结与共享机制[4]。

二、社工站介入乡村治理的困境

（一）面临复杂的乡村治理情况

1. 多元主体协同机制有待完善

乡村治理涉及乡镇政府、农村基层党组织、村民自治委员会、社会组织、乡村精英及市场企业等多元力量，在党的领导下各主体目标总体一致，但由于职责边界不够清晰、沟通渠道不够畅通，存在协同效率不高、资源整合不足的情况。部分主体间缺乏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和常态化协商平台，导致治理合力尚未充分形成，出现“联而不动、协而不同”的现象，影响了治理共同体整体效能的发挥。

2. 乡村治理问题具有交织性

乡村社会的复杂性为社工站介入乡村治理带来挑战。在政府层面，部分乡镇政府时有“越位”和“错位”现象发生，呈现出“悬浮”状态，乡村治理陷入内卷化，村民自治权利未真正落实[5]。在社会层面，治理主体缺位、人口外流与“空心化”现象加剧，致使乡村自组织发展不足，社会管理秩序处于失衡状态。在村民层面，基层自治组织能力弱化，村民的主体责任缺失，加之乡村的治理理念落后，对公共服务供给重视程度不够，民主协商与法治机制不健全等。

（二）发展体制不完善

1. 资金保障机制不完善

乡镇社工站的建设和推广需要一定的专项资金支持，社工站自身的运行所需开支包括人员工资支出，以及人员专业培训、基础设备的购置、开展服务所需的经费和场地建设经费等。社工站的高效运行离不开一定的人员配备和各类基础设备，而资金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社工站是否具有资金决定了社工站能否启动工作，资金的多少决定了社工站开展服务的范围以及服务的效果，资金能否专项化、长效化决定了社工站工作的开展能否持久有效。

2. 人才引进机制不健全

一是专业人才配备不足。笔者通过走访山东省 B 市多个乡镇社工站发现，尽管站内工作人员符合社工站建站方案规定的至少有 1 名持证社工的要求，但是多个站内的社工并非是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基本都是跨专业工作，而且从事专业社会工作的时间较短，实务经验较少，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很难展现出专业社会工作的优势，对专业方法的掌握也仅仅局限于书面知识，无法在实践中加以运用，面对突发问题时显得手足无措。二是人才招聘机制不健全。笔者通过调研访问发现，B 市各乡镇社工站工作人员，均是由承接服务的各社会组织机构在项目中标之后才招聘的，并没有从自身机构中选任工作人员进驻社工站。

（三）乡镇社工站运行存在的不足之处

1. 专业服务水平待提升

服务内容与社工站定位有差距；开展的活动以服务居民为主，与社区服务的内容有较多重合；开展活动缺乏针对性；服务活动缺乏系统性；较少涉及乡村治理服务。

2. 专业督导模式待完善

目前山东省 B 市社工站督导主要是聘请的第三方督导团队，由某大学相关专业团队承接，专业性有一定的保证。但是笔者通过调研发现，该市社工站仅仅依靠一个专业督导团队，承接该市各乡镇社工站建设的社会组织基本不会提供专业的督导，一些社会组织机构本身的专业性存在不足，难以为社工站提供专业的督导，社工站内的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也是由第三方督导团队来做，但这应当是承接各社工站建设的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

3. 链接资源能力欠缺

笔者通过调研走访山东省 W 市乡镇社工站发现，社工站链接资源的多少与承接该市社工站建设的社会组织的能力有着高度的关联性。山东省 B 市社工站由于建设时间不长，在建设投标时对承接社工站建设的社会组织资金审查标准较低，因此多个社会组织自身的发展时间较短，积累的资源也比较有限，难以为社工站的发展提供相关的资源支持。

三、社工站介入乡村治理的对策与建议

（一）促进乡镇社工站发展，提高服务能力

1. 给予资金支持

针对社工站发展资金匮乏的问题，一方面，政府需在年度财政规划时及时为社工站的发展预留相应资金。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与社会慈善机构、社会组织等其他机构合作拓宽资金来源渠道。社工站自身也应开拓思路、集思广益，积极利用自身的资源促进各类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与互动，节约活动资金，提高服务质量。

2. 建立健全人才激励机制

人才是制约当前社工站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一是要建立健全社会工作发展制度和专业人才制度，与高校开展合作，吸纳专业人才。二是要强化激励制度，建立相应的奖励制度，对社工站中有较强工作能力并作出较大贡献的人才给予一定的奖励。加快制定针对乡镇社工人才的专项支持和保障政策，以此不断激发社工机构组织活力。

3. 提升专业服务能力

各地乡镇社工站的优秀成功实践经验要积极地予以推广。一方面，社工站应为社工提供专业学习机会，如系统的培训、研学与交流平台等。另一方面，社工站工作人员要定期学习和更新相关理论知识以及实践方法，接受专业督导，持续提升专业服务能力，以有效应对乡村治理中复杂多样的问题。

（二）党建引领，实现政策与基层良性互动

1. 发挥党建的引领作用

社工推动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时，必须坚持基层党组织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构建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以村民为主体、以乡村新治理力量为依托的制度化平台。推动乡村治理共同体实现价值导向、主体协同、“三治”并进、技术赋能。

2. 打通政策服务“最后一米”

广大农民群众最迫切的需求是好政策，乡镇社工站在具体实践中，应当全面摸排辖区内存在政策需求的群体，将实际情况积极反馈给政府部门，协助政策的完善与实施。同时，将国家宏观战略与基层治理制度最大限度地落实到乡村，让政策真正发挥作用。

（三）增强村民主体意识，激活基层治理潜能

1. 培育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自觉性

充分挖掘乡村原有的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制定村规民约，开展新时代乡风文明建设、恢复宗族祭拜等活动，增强村民对乡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充分激活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主体意识，常态化举办“乡村治理活动日”，营造良好的活动氛围。定期召开民主议事大会，激发村民的“主人翁”意识，培育其参与公共事务的自觉性，激发乡村活力[6]。

2. 激活乡村自组织的治理潜能

社工站可以与村民委员会开展合作治理，为乡村自组织的建立提供专业性的指导，激活各类乡村自组织的治理潜能，并将其纳入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框架中，增强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主体意识。

（四）实现主体耦合，激发治理内生动力

1. 打造公共空间，形成乡村治理合力

社工站通过协助乡村搭建合作治理的公共空间与参与平台，听民声、尊民意，切实地帮助解决村民的实际问题，从而形成高质量的社区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网络。实现多元主体（政府、社会组织、村民等）之间的良性互动，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建立持久有效的合作机制，推动乡村治理迈向规范化与可持续化。

2. 明确主体责任，促进多元治理主体协同

首先，政府应适当放权，积极下派驻村干部。其次，乡村精英也应当承担起为村民解决问题、推动乡村发展、参与乡村治理的责任。最后，专业社会工作在嵌入乡村行政系统时，必须坚守其专业角色，充分发挥社工站的枢纽作用，对上有效承接政策与资源，对下整合乡村各方资源。同时，培育村民的自治意识，尊重并保障村民的主体地位。

四、结语

乡村治理共同体是推动乡村社会能够进入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状态的重要力量，是实现多元主体协调互动，基于自治、法治、德治融合的具有良好社会治理运行机制的制度共同体。本文为社工站介入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提供针对性对策建议，助力乡村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

参考文献

[1] 王思斌 . 社会工作在创新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一种基础—服务型社会治理 [J]. 社会工作 ,2014(01):3-10,150.

[2] 张生元 , 孙媛媛 , 张娟 , 等 . 社工站介入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理论基础及实践路径 [J]. 山东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2,38(06):48-53.

[3] 黄泓 , 黎春娴 . 乡镇社工站助力乡村振兴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J]. 中国社会工作 ,2022(16):27-28.

[4] 田培杰 . 协同治理：理论研究框架与分析模型 [D]. 上海 : 上海交通大学 ,2013.

[5] 伍娟 , 姜萍 . 多重增能 : 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与专业反思 [J]. 怀化学院学报 ,2019,38(04):20-22.

[6] 伍娟 , 姜萍 . 多重增能 : 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与专业反思 [J]. 怀化学院学报 ,2019,38(04):20-22.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2 年淄博市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社工站介入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与实践路径研究”（22ZBSKB030）。

（作者：张生元，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孙媛媛，胶州市民政局科员）

六尺巷调解法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运用与启示

章　鹏

摘要：六尺巷调解法属于传统文化在基层治理中的创新实践，将“礼让为先、以和为贵”的文化精神与现代调解机制融合，为破解基层矛盾纠纷赋予了有效途径。本文通过对六尺巷文化内涵特征的分析，研究其在邻里纠纷调解中的运用情况，探究该调解方法所具有的减少矛盾对抗性、促进多元共治、提高治理效能的独特作用。经过研究发现，六尺巷调解法以“听、辨、劝、借、让、和”六步工作法为途径，实现情理法的有机融合，既传承了传统德治的智慧，又符合现代法治的精神，为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有文化内涵且可行的创新思路。

关键词：六尺巷调解法；基层社会治理；邻里纠纷；情理法融合；文化传承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邻里纠纷、宅基地争议等矛盾的有效化解同社区和谐、社会稳定密切相关。传统调解文化中包含着很多治理的智慧，怎样将其创造性地转化成当下的治理资源，是提高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课题。六尺巷调解法来源于安徽桐城六尺巷“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的历史典故，以礼让精神作为主导，结合规范化的调解程序，将传统的德治理念与现代法治手段融合，塑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基层调解模式。本文以桐城市实际调解案例为切入点，对六尺巷调解法的文化内涵、实践运用及其为基层社会治理带来的启示意义进行系统的分析。

一、六尺巷调解法的文化内涵与时代意义

（一）六尺巷典故的历史价值与文化精神

六尺巷典故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中“和合”思想的丰富内涵，以及用礼让化解矛盾、用包容促进和谐的处世智慧。清代文华殿大学士张英在处理家族宅基地纠纷的时候，用“让他三尺又何妨”的胸怀来促使双方各自让出三尺，从而形成了六尺巷，成为邻里和睦的千古佳话。典故有三种文化价值，第一种是“和为贵”的秩序追求，即以最小的成本来维持社区的和谐；第二种是“守规矩”的规则意识，即对公认的权威和共同准则的尊重；第三种是“修齐治平”的德治理想，即精英示范在社会治理中的引领作用。六尺巷精神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利益让渡，更深层次上它是用道德自觉来支撑、以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的文化自信，为当下基层治理提供重要的传统智慧资源[1]。

（二）六尺巷调解法对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意义

六尺巷调解法符合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具有诸多现实意义。首先，它可以降低矛盾的对抗性，用文化符号的感召力引导当事人跳出非赢即输的思维定势，唤醒道德自觉，促进矛盾的柔性化解，比单纯的法律告知更容易被接受，也更能实现案结事了人和的良好效果。其次六尺巷调解法促使治理理念由单向的管理变成多元的共治，用礼让的精神激发居民的参与动力，建立起政府、社区和居民平等协商的治理格局。六尺巷调解法把法律的刚性与德治的柔性结合起来，在法律框架内加入情理的考虑，既保持规则的权威性，又达成情感的和解，使基层治理有力度、有温度，为破解“法律管不了、道德约束难”的治理难题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2]。

（三）传统调解智慧的现代转化价值

传统调解智慧的现代转化，是文化创新的重要命题。六尺巷调解法用制度化设计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一方面把个体礼让升华为规范化的协商机制，创建“百姓评理说事点”“邻里议事角”等层级化平台，采用“提出议题—确定参与方—现场沟通—让步协商—达成共识—跟踪落实”六步协商法，为多元主体提供有场所、有流程、有保障的参与渠道。另一方面把情感感化的经验转化为可以复制的标准化调解模式，通过调解员的“双能培训”和“三段式调解步骤”，使感性沟通与理性依法相统一。转化不但保

存了传统文化的精华，也赋予其现代治理形式，把历史文化智慧作为解决当代社会管理难题的工具，体现的是文化自信与制度创新的完美结合[3]。

二、六尺巷调解法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实践运用

（一）邻里纠纷调解中的礼让精神应用

六尺巷调解法在邻里纠纷的化解中很好地起到了礼让精神的引导作用。以桐城市新渡镇汪某建房纠纷为例，因建房而使邻里关系不断恶化，三方虽然签订了三份协议但是矛盾却越来越严重，最后发生肢体冲突。调解员在运用六尺巷调解法进行调解的时候，首先讲述六尺巷典故，以其承载的文化精神感染当事人，劝导各方“对标先贤，互谅互让，强者先让”，倡导“以礼为先、以让为贤、以和为贵”的邻里关系。通过上述引导，原来各执一词的当事人逐渐放下了对抗的心态，汪某主动做出恢复邻居后门、清运建筑垃圾、拆掉监控设备并赔偿损失的决定，表现出“强者先让”的道德自觉。礼让精神的应用不是简单的道德说教，而是用具体的文化符号激发当事人的情感认同，把个人利益诉求导向维护社区整体和谐的层面，从而打破僵局、促成和解。这说明传统文化资源可以成为现实的调解动力，为邻里纠纷调解赋予了特有的文化途径，以文化为媒介的调解方式不仅解决了眼前的矛盾，还在社区中树立了礼让的典范，为其他居民提供了一个行为上的榜样[4]。

（二）矛盾化解过程中的情理法融合

六尺巷调解法的核心特点就是把情、理、法三者有机融合，形成了“三段式调解步骤”。在新渡镇的调解案例中，调解员按照“情理解锁、道理分析、依法兜底”的顺序来工作。在第一步的“听”与“辨”环节中，调解员充分听取了各方的诉求之后，根据民法典中关于建房不得妨碍相邻采光、合同履行的规定，确定了法律边界，明确了汪某未履行协议是矛盾的主要原因，体现了法律的规范作用。在第二步的“劝”“借”“让”环节中，调解员引用六尺巷典故并结合乡土人情进行情感引导，对汪某某要求退还已建成的房屋的不合理之处、程某某提出的道路硬化应由村委会统一实施的合理理由进行了分析。此种“情理兼修”的方式缓解了双方的矛盾情绪。在第三步“和”的环节中，调解员在情理铺垫的基础上，引导各方在法律框架内达成具体的协议，既包含民事赔偿的法律责任，也包含恢复原状、和睦相处的道德约束。这种融合方式适应了基层纠纷情感因素浓厚、法律边界不清的特点，既保证了法律的权威性，又实现了情感和解，调解过程既有法理基础又有温情温度，体现了情理法相辅相成的治理智慧。三段式的调解模式成功应用于基层调解工作，为基层调解工作探索出了一条情感先行、道理铺垫、法律兜底的标准化路径[5]。

（三）基层调解工作机制的创新实践

六尺巷调解法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系统化的工作机制创新。一是建立层级化调解平台，以社区为单位建立“六尺巷调解室”，以楼栋为单位设立“邻里议事角”，形成基层矛盾就近化解的调解网络。二是规范调解程序，新渡镇调解委员会收到案件后首先进行实地勘验取证、走访当事人，然后组织职能部门、调解员、村干部和律师共同分析案情，提出调解方案，最后按“听、辨、劝、借、让、和”六步法进行调解，各环节职责分明、程序清晰。三是加强调解员队伍建设，推行“双能培训”，提高调解员情理沟通能力、法律运用能力，要求调解员既能够讲好六尺巷的故事、理解乡土人情，又能够熟练掌握民法典、人民调解法的相关条款，保证调解既有文化感染力也有法律说服力。四是健全保障机制，把调解结果归入社区治理档案，对履行协议的给予“礼让积分”奖励，对违反约定的进行约谈教育，政府对协商结果予以支持，给予资金补贴等，形成激励约束并重的制度体系。这些机制创新使六尺巷调解法由个案经验上升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模式，为基层调解工作提供制度保障，经过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的机制创建，六尺巷调解法完成了由“人治”向“法治”，由“经验”向“制度”的转变，为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积累丰富经验。

三、六尺巷调解法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启示

（一）构建和谐邻里关系的文化引领

六尺巷调解法的实践证明文化引领是建立和谐邻里关系的内在力量。传统的基层治理依靠行政手段来化解矛盾，缺少文化认同的情感纽带，不能实现长效治理。六尺巷文化属于本土文化符号，天然就具备情感亲近性以及价值认同感，可以从根本上培育居民的邻里和谐意识。一方面通过创建“六尺巷文化角”、举办“礼让传承，文化铸魂”主题活动等形式把抽象的礼让理念转化为可以感知、可以理解的文化场景，潜移默化地影响居民的行为习惯。在桐城部分社区，居民参加六尺巷文化活动之后，主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明显提高，邻里矛盾发生率明显下降，说明文化浸润具有长效作用。另一方面，文化引领可以把个人的利益诉求提升为集体的价值认同，当居民接受“以和为贵”的文化理念之后，在面对利益冲突的时候，就会更多地考虑他人、做出让步，由原来的“各扫门前雪”变为考虑整个社区的利益。汪某最后愿意主动承担赔偿、恢复原状，就是文化感召激发道德自觉的结果。文化引领还可以为基层治理提供价值判断的标准，在法律界限模糊的地方可以用道德标准引导人们的行为，弥补法律规范的不足。基层治理不能单靠制度来约束，还要依靠文化的熏陶，挖掘出本地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建立普遍认同的价值体系，才能

从根本上减少矛盾，促进和谐，实现治理的内生驱动。

（二）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路径选择

六尺巷调解法为提高基层治理效能提供了多种途径的启示。其一就是推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现代化要求打破政府单一主体的局限，创建多元共治的格局。六尺巷调解法依靠文化认同激发居民参与的动力，新渡镇案例中调解员、村干部、律师、退休党员等人员参与到调解工作中来，共同组建起一个专业力量与群众力量相结合的治理网络。以文化认同为参与基础的方式减轻了行政负担，也提高了治理的公信力，因为调解员大多为本地有威望的人，他们的意见更容易被居民所接受。这为基层治理带来的启示是要选拔新乡贤、退休干部等组成“六尺巷新乡贤理事会”，让他们参与到社区决策、矛盾调解当中来，发挥“身边人调解身边事”的作用。其二，推动治理手段精细化。六尺巷调解法把文化手段转化为“六尺巷调解室”“礼让积分制”等具体的载体，调解室用文化氛围营造柔性调解的场景，积分制把礼让行为量化为可兑换公共服务的积分，引导居民主动践行礼让。精细化工具贴合基层实际情况，可以避免运动式治理的弊端，达到治理效果长效化的目的。这为基层治理带来的启示是应当充实治理工具箱，把文化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结合起来。第三，促使治理流程规范化。“听、辨、劝、借、让、和”六步法与“提出议题、确定参与方、现场沟通、让步协商、达成共识、跟踪落实”的协商流程为调解工作提供操作指引，保证程序正义、提高工作效率。这为基层治理带来的启示是要建立标准的调解规范，通过调解员培训、案例库建设等方式将成功的经验固定下来，把调解能力转化为可供借鉴的专业技能，从而提高基层治理的专业化、规范化水平。

（三）为传承与创新传统调解文化指明方向

六尺巷调解法的成功经验为传统调解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指明了方向。首先就是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不能简单地复古，而应该提取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为它赋予现代治理的形式。六尺巷调解法把个体的礼让上升为制度化的协商机制，把情理感化转变为标准化的调解模式，就是创造性转化的典范。这就意味着在挖掘其他传统文化资源的时候，应该重视把文化精神同现代治理的需求联系起来，使传统智慧成为解决当代问题的手段。其次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建设。文化只有借助于可以感知的载体才能发挥作用，六尺巷文化依靠调解室、文化角、主题活动等物质与活动载体，把抽象的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实践。因此可加强文化阵地建设，编撰出《六尺巷式调解案例集》、打造文化展品、开展文化培训，以多种方式将传统文化融入居民的生活中。再次是推动文化传承的主体培育。文化传承要依靠“文化传播者”，六尺巷调解法通过调解员“双能培训”，培养出了一批既懂传统文化又懂现代法律的复合型人才。由此可知，要建立起传统文化传承人的队伍，通过系统培训使基层工作者成为文化的宣传者、实践者，并发挥党员干部所具有的“现代张英”的示范引领功能，带头践行传统美德。最后要始终坚持守正创新的基本原则。守正是守护住核心的文化内涵，比如“和谐为贵”“礼让优先”等基本精神；创新是根据时代需求调整表现形式与实践方法，如引入法律程序、建立数字化管理等。六尺巷调解法继承了传统德治思想，又加入了现代法治精神，传统与现代有机融合，为其他地区传承创新传统调解文化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经验模式。

四、结语

六尺巷调解法以传统文化为基础，以制度创新为手段，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之路。以礼让精神涵养乡风文明，情理法相统一，多元主体齐抓共管较好地解决了邻里纠纷等基层矛盾，提高治理效能。经过实践证明，传统文化同现代治理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相得益彰的。六尺巷调解法的成功经验为各地因地制宜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提供有益的借鉴。未来应该挖掘更多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促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注入更多的文化智慧和实践方案，使传统美德在新时代焕发生机活力。

参考文献

[1] 梁利华 . 秩序与规范 : 法律社会学视野下基层社会的法治化建设 [J]. 贵州社会科学 ,2024(08):51-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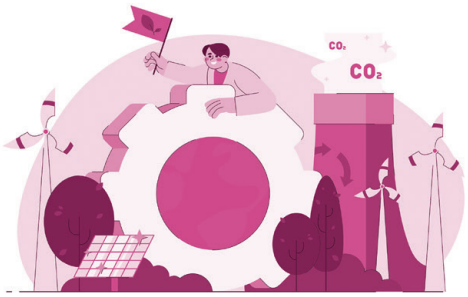
[2] 张浩淼 , 高晨 . 迈向社会融入 : 基层社会救助的路径探索与理念优化 [J]. 东岳论丛 ,2025, 46(02):124-130.

[3] 桂晓伟 . 以“三治融合”促进基层治理 : 基于村庄社会差异的分析 [J]. 甘肃社会科学 ,2024(01):105-113.

[4] 吴磊 , 刘子瑞 . 行政嵌入与社会联结 : 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新内源发展模式——以“枫桥经验”实践为例 [J]. 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 ,2025,18(06):735-746.

[5] 姚怡帆 , 姜韩 . 基层社会治理价值共创何以可能与如何有效 ?——基于 X 市 L 社区的经验考察 [J]. 现代城市研究 ,2025(04):84-91.

（作者单位：桐城市司法局）



党建引领基层网格化治理效能提升路径研究

袁培文

摘要：新时代背景下，加强党建引领基层网格化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网格化治理模式依托网格事件“一键上报”实现诉求响应便捷化，通过问题处置“一站分派”提升任务流转高效化，凭借办理流程“一网闭环”保障服务管理规范化，切实打通了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本文从三个维度系统梳理了网格化治理模式的内在逻辑，从政治层面助力巩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从技术层面推动治理模式数字化转型，从组织层面激发多元协同治理效能。在此基础上，从加强顶层设计、聚焦人才强基、健全制度保障、完善网络设施等方面提出优化路径，为构建专业化、规范化、智能化的基层治理体系提供参考。

关键词：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网格化；治理效能

一、加强党建引领基层网格化治理的必要性

（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网格是基层治理的基础单元，它直接联系群众、关乎民心。在党建引领下强化基层网格化治理，可以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网格化模式不仅联动了社区居民，还联动各个行政部门、执法部门等共同参与，充分发挥“一张网”管理模式的作用，实现不同治理主体之间协同合作，凝聚强大的治理合力，让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从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的关键性举措

网格化治理模式将党的群众路线延伸到基层，成为回应民生关切、破解治理难题的关键性举措。坚持科学精细划分治理网格，做到“民情民意在网格内掌握、矛盾纠纷在网格内化解、发展合力在网格内汇聚、群众满意在网格内实现”，让“小网格”成为服务群众的“大平台”[1]。因此，通过聚焦群众身边的每一件小事，保障高效响应、精准服务，将治理效能转化为群众可感知的幸福体验，让“小网格”持续托起群众“大幸福”。

二、党建引领基层网格化治理的内在逻辑与鲜明特征

（一）党建引领基层网格化治理的内在逻辑

1. 政治逻辑：巩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

网格作为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其高效运转尤其依赖于党组织的有力引领。实施党建引领基层网格化治理模式，构建起线上线下融会贯通的党组织体系、党员动态管理平台，从而为网格化治理增添了“智能内核”，确保网格治理始终沿着正确轨道有序推进。因此，只有稳固党建这一“核心架构”，治理的“千条线”方能精准穿透网格这一“终端针眼”，以“小网格”铸就基层党建“大格局”[2]。

2. 技术逻辑：推动治理模式数字化转型

一方面，传统的数据信息统计不仅耗费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而且难以保证数据的准确性。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通过使用先进的传感器、物联网等智能设备，并借助高效的数据分析模型，揭示数据背后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推动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还能增强风险防控的前瞻性，为社会治理筑牢安全屏障。利用数字化技术构建风险预警模型，对重点领域的数据变动实时监测，一旦数据异常及时触发预警系统，网格员会在第一时间解决，力求将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3]。

3. 组织逻辑：激发多元协同治理效能

组织逻辑的最终目标是激发每一个治理细胞的活力。以网格党支部为主抓手，以专职网格员为主体，整合各方人员力量，推动基层治理从“单兵作战”向“多元协同”升级。在社会治理中，要充分引导社区、物业企业、志愿者等多元力量参与，通过深入挖掘和激发“能人效应”，动员多元主体参与，让居民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将“治理对象”转化为“治理力量”，从“听我说”到“让居民说”，形成基层治理的强大合力[4]。

（二）党建引领基层网格化治理的鲜明特征

1. 网格事件“一键上报”便捷化

党建引领下的基层网格化治理，其最直观、最鲜明的特征之一，便是实现了网格事件“一键上报”便捷化。基层网格员与居民可依托手机 App、微信等便捷渠道，将日常发现的安全隐患、邻里纠纷等事件上传至党建平台，操作界面无需复杂流程，仅需点击“上报”功能按钮，事件相关音视频、现场图片等关键信息便可同步上传至后台。相较于传统线下登记、层层转达的模式，这种“指尖上的网格”机制不仅节约了大量时间，还通过系统自动关联网格归属、分类标签，减少人工填报的信息偏差。

2. 问题处置“一站分派”高效化

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以技术平台为载体，构建起“一站分派”处置机制，实现事件任务的智能识别、迅速分配和全程跟踪，显著提升了问题处置的精准性和响应效率。各地区基于历史沿革、便于管理、全域覆盖等原则，因地制宜划分网格。平台接收到网格事件上报的信息后，根据问题类型、地点和严重程度等因素，自动将任务智能分派给相应责任部门，提高了问题处置效率。此外，“一站分派”机制还具备监督反馈功能，平台实时记录任务处置全过程，包括接单时间、处理进度和结果等信息，并及时向当事人如实反馈。基层党组织可对处置过程进行全程监督，对未按时完成或群众评价较低的任务预警和督办，确保每一项事件“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3. 办理流程“一网闭环”规范化

党建引领基层网格化治理的又一显著特征，是实现了办理流程“一网闭环”规范化运行，推动基层治理从“零散应对”向“系统闭环”转变，使群众问题有效解决，实现“一屏观全市、一网治全域”。通过建立高素质“专职网格员 + 志愿者辅助网格员”队伍，整个治理流程在党建平台上全程记录和监控，保证治理过程公开透明，形成“接收—研判—处置—反馈—评估”全流程闭环，实现多源事件汇集和事件处置五级闭环，让问题分层分级解决在基层。当问题处理结束后，责任部门需将结果反馈到平台，提醒上报人进行满意度评价。若群众对处理结果不满意，系统将自动重启办理流程，进行二次处置，直到问题彻底解决。

三、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网格化治理的有效路径

（一）加强顶层设计，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1. 拓展升级智慧党建平台功能

目前，要重点开发党建与网格化管理深度融合的专用模块，通过嵌入党员先锋岗在线认领、志愿服务实时调度等功能，实现党组织活动与网格服务管理的精准对接，确保红色治理力量精准渗透到基层网格的“神经末梢”。为实现对基层治理工作动态化管理，平台可以嵌入 AI 智能分析模块，依据党员活动参与频次、网格服务贡献度、群众评价等信息构建分析模型。平台也应拓展“云激励”功能，参与网格化治理可不断累积“红能量”，用于兑换扶贫农产品、办公文具、书籍等[5]。

2. 构建全域数据信息共享枢纽

当前，要构建跨系统、跨层级、跨领域的信息共享枢纽，充分整合党建、民政、城管、卫健等多部门数据资源，将这些数据资源转化为治理资源，从而节约时间和减少重复性劳动，推动网格化治理提质增效。一方面，要增强大数据分析与可视化能力，对网格内人口结构、群众诉求、风险隐患等数据多维度研判。另一方面，要建立以网格为基本单位的综合数据库，动态掌握网格内特殊群体、公共设施状态等重要情报，形成一个实时更新的信息共享枢纽。此外，还应建立严格的数据安全管理系统，明确数据使用边界与责任主体，在保障数据安全与个人隐私的前提下，推动数据资源有序共享和高效利用[6]。

3. 设置公开透明民主决策专栏

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增强网格化治理中居民的参与感和满意度，应在党建平台显著位置设立“民主决策”专栏，以党建引领激活居民参与动能。在功能设计上，该专栏应公开与网格内居民切身相关的重大事项、公共服务项目、专项经费使用等情况，并提供线上意见征集、投票表决、结果公示等功能。由基层党组织牵头组建“党员 + 居民代表”决策监督小组，对专栏收集的意见分类梳理，确保决策能更体现民情民意。治理决策形成后，专栏可以依托党建平台同步更新有关基层治理的决策情况，及时公开决议内容、实施主体、进度安排，接受群众实时监督。这一举措不仅能增强网格化治理的透明度，更通过党建引领凝聚共识，激发居民的主人翁意识。

（二）聚焦人才强基，助推网格化治理专业化

1. 实施三阶递进式系统化培训

当前，应积极联合各高校及相关业务部门，共同构建“初任培训—在岗提升—专项强化”的三阶递进式培训体系。初任培训以基础能力塑造为核心，内容主要涵盖网格化治理理念、相关政策法规等，通过“理

论授课 + 场景模拟”方式，使网格员掌握基本技能。在岗提升阶段侧重于实战能力强化，采取“师徒制”和定期轮训相结合，由当地经验丰富的优秀网格员担任导师，在日常网格工作过程中实战带教，定期组织案例研讨或业务竞赛。专项强化则面向表现突出的骨干网格员，开设数据分析、心理疏导等高阶课程，组织实地参观“智慧平台”功能展示区，直观掌握操作流程。

2. 提高网格员福利待遇

首先，设置稳定的薪酬保障。通过优化薪酬结构，包括基本工资、绩效奖金、岗位津贴和年限补贴等部分构成，其中绩效奖金应与事件处置效率、群众满意度等考核结果紧密挂钩。其次，要畅通网格员晋升通道，提高网格员的职业发展空间，将网格员岗位作为培养村、社区干部的核心储备池，通过基层党组织推荐、社区居民投票等合法程序，积极推动优秀的网格员职位晋升。最后，还应设立网格员关爱基金，对遭遇重大疾病的网格员家庭给予组织关怀和经济援助，让他们能够安心、安身、安业于基层治理一线。

3. 搭建多维人才交流成长平台

一是搭建内部交流平台。每月线下组织“网格治理经验分享会”，邀请优秀网格员分享矛盾调解、服务群众的典型案例；同时，在线上也开设交流群，方便网格员随时探讨工作难题、共享实用技巧。二是拓展外部联动平台。推动网格员与职能部门之间常态化对接，定期组织网格员到民政、城管等部门跟班学习，提升网格员与各部门协作的效率。三是打造跨界学习创新平台。通过和当地高校合作开设“基层治理研修班”，给网格员提供系统的理论学习机会，为网格化治理培育高素质人才队伍 [7]。

（三）健全制度保障，助推网格化管理规范化

1. 完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首先，要建立全面的矛盾纠纷排查网络。网格员利用党建平台收集和整理矛盾纠纷信息，根据矛盾性质、涉及范围、复杂程度可分为“简易、一般、疑难”三级，实现矛盾纠纷及早发现和处理。其次，要整合基层调解资源，利用智慧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和协同工作，提高矛盾纠纷化解的效率和质量。最后，还应加强对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的监督与评估。通过建立健全调解回访机制，确保矛盾纠纷真正得到解决，防止矛盾的反复升级，从而提升网格化治理的规范化水平。

2. 健全群众反馈响应机制

一方面，要拓宽“线上线下融合”的群众反馈渠道，依托党建平台打造居民诉求专属模块，同时增添多渠道线下反馈方式，确保群众能够快捷地表达诉求，更好地倾听群众声音。另一方面，要建立快速响应机制，明确反馈信息的处理流程和时间节点，确保群众反馈的问题得到及时处理。此外，还应加强对群众反馈信息的分析和应用，对群众反馈的热点问题和共性问题全面分析，为基层治理决策提供参考依据，从而推动网格化治理朝向规范化发展。

3. 优化考核评价监督机制

首先，要明确考核评价标准。结合当地实际需求，制定科学合理的考核指标体系，从工作完成效率、解决方式、工作态度等多角度立体化考核，确保考核评价的客观性。其次，要建立动态考核评价机制。利用党建平台对网格化治理工作全程监督和动态评估，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调整和改进。最后，建立健全反馈处理满意度评价机制，将考核评价结果与网格员的绩效奖励、职务晋升等挂钩，激励网格员积极履行职责，提高其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完善网络设施，助推网格化治理智能化

1. 扩建全域智能感知网络体系

首先，结合城乡治理需求差异，分类施策搭建感知网络。在城市社区，通过安装智能摄像头、传感器等设备，实现对社区环境、交通流量、公共设施等信息的实时感知 [8]。在农村地区，灵活运用无人机、卫星遥感等技术，对农村的生态环境、农业生产等情况进行监测。其次，要加强对感知数据的全域整合和智能分析，通过党建平台实现数据的互联互通，为基层治理提供准确的信息。最后，还应重视智能感知网络的安全防护，健全技术防护体系，确保感知数据的安全可靠。

2. 普及终端设备智能应用范围

一方面，要为网格员配备具有多重功能的智能终端设备，使其能随时随地获取和处理网格化治理信息。同时，需要对网格员进行系统化培训，提高他们对智能终端设备的使用能力。另一方面，要开发方便群众使用的智能终端应用，如社区服务 App、政务服务平台等，提高群众的参与度和满意度。创新运用“空中网格员”，通过启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头，构建起“空中 + 地面”立体巡查网络，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有效守护辖区安全 [9]。

3. 打造物联互通数据中枢平台

首先，要打破部门壁垒，打通数据孤岛，将基层治理的各类数据集中存储和管理，包括人口、房屋、公共服务信息等，实现数据的共享共用，构建一个全面的数据库。其次，要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加强对数据的深度挖掘与分析，为基层治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最后，还应注重数据中枢平台的安全防护，建立健全数据安全管理制度，确保数据的保密性、完整性。

四、结语

党建引领基层网格化治理，是基层治理模式适应新时代需求的重要创新。本研究通过强化（下转 199 页）

课程思政视域下小学英语教育专业学生翻译能力的培养
——内涵、原则与路径

秦　军

摘要：作为未来小学英语教育实践的中坚力量，小学英语教育专业学生的翻译能力是其综合语言素养与教学履职能力的核心构成部分，该群体翻译能力的系统性培养已成为外语教育领域的关注焦点。本文立足课程思政与外语教学深度融合的时代要求，分析了该专业学生翻译能力的内涵与课程思政视域下翻译能力培养的原则，并探讨了学生翻译能力的培养路径，以期实现翻译教学中语言能力提升与价值观念塑造的协同推进，充分发挥其“育才”与“育人”的双重功能。

关键词：课程思政；翻译能力；逻辑；原则；路径

课程思政是一种教育教学理念，也是一种教育实践活动，它依托通识课程教学、专业课程教学及其他课程教学，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有机统一，彰显价值观的重要性。翻译教学自带思政育人基因[1]，其首要任务在于帮助学生构建正确的翻译价值观，深刻认识翻译在语言革新、社会发展、文化交流、精神塑造和思想创新等方面所具有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2]，同时“翻译能力是翻译教学实践与研究的核心”[3]。因此，翻译能力培养与课程思政的隐性融合是自然的、更具针对性和效能的过程。本文的翻译能力指小学英语教育专业学生的笔译能力，但学界系统性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少，翻译能力培养尚未得到足够重视。本文尝试提出培养该专业学生翻译能力的原则与路径，探索在教学活动过程中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与翻译能力培

（上接 198 页）

党建引领作用、健全人才梯队与制度保障、完善网络基础设施，这些举措相互关联、协同推进，推动网格化治理朝向专业化、规范化、智能化发展，为探索“党建 + 网格”治理新模式提供有益参考。

参考文献

[1] 姜晓萍，焦艳．从“网格化管理”到“网格化治理”的内涵式提升 [J]. 理论探讨，2015(06):139-143.

[2] 程熙．嵌入式治理：社会网络中的执政党领导力及其实现 [J].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4(01):50-56.

[3] 沈迁．党建嵌入社区网格化治理：实践形态、运行机制与内在逻辑 [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22(01):63-73.

[4] 唐皇凤．新时代网格化管理的核心逻辑 [J]. 人民论坛，2020(20):17-19.

[5] 向春玲．“红色网格”：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新探索 [J]. 科学社会主义，2018(05):107-113.

[6] 伊庆山．基层治理中网格化服务管理的实践经验与问题破解 [J]. 领导科学，2022(02):92-97.

[7] 李志强，许峰．整体智治与网络融合：智慧社区应急治理机制及路径——基于浙江的实践探索 [J]. 电子政务，2022(09):27-38.

[8] 邵新哲，计国君．城市网格化管理与智慧社区协同运作机制研究——以四川省 S 市社区网格化管理为例 [J]. 软科学，2021(02):137-144.

[9] 陶振．城市网格化管理：运行架构、功能限度与优化路径——以上海为例 [J]. 青海社会科学，2015(02):78-85.

（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养相统一，充分实现翻译教学育人育德的隐性功能。

一、小学英语教育专业学生翻译能力的内涵

德国学者 Wilss 最早使用“翻译能力”这一概念，他认为译者必须具备三种能力：源语接收能力、目的语再现能力及超能力[4]。翻译能力不等同于双语能力，它是“译者解决翻译问题时使用的所有语言资源”[5]。

作为翻译能力培养的主要场域，翻译教学要关注培养对象的认知水平，深入发掘翻译能力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凸显翻译能力在不同阶段的重要性，并采取相应的策略、方法。

笔者以小学英语教育专业学生的翻译能力及其培养为研究对象，梳理了近 25 年来的教学文件、大纲。自 2001 年秋季起，教育部在全国城市和县城小学逐步开设英语课程，次年推广到乡镇小学。主要承担小学新师资培养的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将该方向的学生定位为毕业后能承担教学、教研及管理工作的小学英语老师，同时也是能从事外事、旅游等与英语有关的应用型人才。这些学校一般会设置“英译汉”“汉译英”两门笔译课程，也会设置少量翻译选修课，如文学翻译、民俗翻译等。在《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中，笔译能力的构成要素包括双语交际能力、翻译策略能力、翻译知识、百科知识、心理生理主观因素、工具使用与研究能力六个子能力维度[6]，这为国内学生译者翻译能力的培养与评估确立了一定的标准。2025 年 2 月教育部印发了《小学英语教育专业教学标准（高等职业教育专科）》，该标准明确指出该专业学生要“具有良好的英语听、说、读、写、译综合应用能力”，并且“在校内外进行……英语听、说、读、写、译各类语言应用综合训练”。这意味着与翻译专业学生相比，小学英语教育专业学生的翻译能力有其独特特点，它是一种初级的应用翻译能力，定位于有限的、特定的工作场景中。他们在学校的翻译训练以普遍性为宜（如句法规范训练、思维逻辑训练、文化辨析能力培养），不宜过于专业化。

在上述翻译能力框架下，结合学生实际认知水平、翻译教学实践要求及未来跨文化社会交流需求，笔者提出小学英语教育专业学生翻译能力应该包括双语转换、翻译知识、跨文化理解、批判性思维、使用翻译工具等子能力。具体来说，也就是在笔译实践过程中，学生以双语转换为核心任务，发挥自己的跨文化意识，综合运用各类翻译知识，采用批判性思维方法，借助一定的翻译工具解决问题，在相关文类（主要是教育、文化、旅游、时政）范围内最终生成具备一定文体特征，语言具有一定美感与流畅度，翻译质量较高的译文。

二、课程思政视域下翻译能力培养的原则

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就是要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是人才培养的应有之义[7]。基于小学英语教育专业翻译类课程特点、师范生培养目标与认知特点，翻译能力的培养要确立一定原则，即主体中心、融合共生、创新发展。

（一）翻译能力培养的主体中心原则

主体中心指学生作为翻译能力培养的主体，而非被动的受教者，翻译教学与实践应以他们的翻译能力发展为中心；教师应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和认知发展规律，关注学生的学习需要和成长诉求。

翻译教学最大、最基本的价值在于“翻译的教学思想应该反映时代的特征，体现翻译所肩负的重大使命”[8]。承担翻译课程的教师应以亲和的态度、润物无声的方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文化、职业理想与职业道德教育等课程思政元素充分融入翻译能力培养的诸多环节，有效激发学生的翻译学习动力，鼓励他们参与各类翻译实践活动，提高他们的实际操作能力。

翻译能力培养过程中，学生接受翻译知识，参与翻译实践的步骤并非机械的、固定不变的，他们需要主动参与翻译学习与实践，积极与社会、文化进行互动，加深对翻译知识的理解与应用，逐渐提高深层认知与高阶思维能力。这就意味着在翻译教师的教学引导下，学生需要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去思考，去实践。例如，在公示语翻译一节中，笔者以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英语译文 Self-discipline Social Commitment 为例，指导学生从词汇选择、修辞手法、文化内涵、情感色彩等维度出发，思考翻译实践中做出相关选择的深层次原因，诸如文化因子、意识形态、翻译情境、翻译目的等，从语言表达形式到翻译客观因素的制约逐一分析，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积极探究，充分发挥他们的翻译主体性，提升他们的翻译综合能力。

（二）翻译能力培养的融合共生原则

融合共生指教师在培养学生翻译能力的过程中，利用翻译的跨学科性，发挥学生的思辨能力，加工、重构、应用翻译知识，同时运用批判性思维，引导学生认知中外文化的异同点，实现语言、文化、知识的融合共生。

翻译的复杂性决定了翻译知识的丰富性和学科体系的开放性，翻译知识包括语言知识、文化知识、策略知识、专业知识、技术知识等。“翻译内化为认知过程，外化为社会过程”[9]，翻译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善于发掘学生潜能，创设认知情境让他们逐步了解并初步掌握语言的转换规律、文化的内在特征、翻译策略的合理运用，学会研判具体案例，找到适中的翻译方法，提升他们的思辨水平。同时，对于学生来说，他们在翻译活动过程中（译前、译中、译后）要依托原有翻译的知识储备，解构、阐释、分析面临的各类翻译问

题，构成一个多种翻译知识相互作用的翻译思维空间，并基于翻译交际情境和自身的经验，加工、重建相关翻译知识体系，在译文中实现语言、文化从形式、内容到意义等多个层面的融入，实现知识的世界性转化。此种情况下，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构成了课程思政与翻译能力培养的内在联通机制，有利于培养具有一定翻译水平、兼具家国情怀与跨文化素养的英语教育专业学生。

（三）翻译能力培养的创新发展原则

创新发展指的是在数智化时代，AI 赋能翻译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促进翻译教学的智能化与个性化发展，助力提升学生的翻译能力。翻译教学过程中，教师利用语料库、多（超）媒体、互联网、大语言模型等现代教育技术改进翻译教学模式，促使翻译教学资源多维化多模态化，创设直观、形象的教学场景，模拟真实的工作环境，以此激发学生的翻译动机，调动学生参与翻译活动的积极性，为他们提供全面丰富的学习体验，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同时智能化教育翻译技术能识别学生弱点与强项，分析学生的学习数据，量身定制相关学习内容，实现个性化翻译学习，契合小学英语教育专业学生的认知特点与发展需求。

小学英语教育专业学生的数字素养要求其学会操作一定数量的翻译软件，在一定前提下使用大语言模型（如 DeepSeek, ChatGPT ）来进行译文的生成、评判、修改。学生可以将自己的译文与翻译工具生成的译文进行对比，发现不足，从而找到更加有效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同时他们也可以观察翻译工具给出的多种翻译答案，以此提高语言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教育数字化是以人的发展为目的”[10]，教师培养学生使用数字技术探究和解决翻译问题的能力，这也是对学生创新能力的检验，符合当代英语教育专业学生的培养标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

三、课程思政视域下翻译能力的培养路径

与课程思政视域下的翻译能力培养原则相呼应的是培养路径，要充分调动教师群体全方位全过程育人的主动性，立足小学英语教育专业学生的认知特点与培养目标，根据小学英语教育专业学生的特点采取多种措施，具体路径如下所述。

（一）激发教师课程思政的主动性，落实翻译能力培养的理念

教师是助力学生构建正确翻译价值观的灵魂人物，是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生力军。为此，本文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引导教师积极参与翻译课程思政教学，落实学生翻译能力培养的理念。

其一，翻译教师应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与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出发，充分认识到翻译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知识传授相融合的现实意义，树立正确的翻译价值观。在培养学生翻译能力的过程中，教师可以从语言学、交际学、文化学等角度分析翻译价值的意义所在与具体的实现途径，比如以交际学的视角来阐释译文的可接受性与传播效果，加深学生对中国文化“走出去”重要性的认识，有意识地实现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功能层面的语言相通，提升他们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责任意识与批判性思维，逐渐养成一种正确的译者责任感与家国情怀。

其二，翻译教师是培养学生翻译能力的责任人，是教学目标设定、课程流程设计、教学内容创新、实践实训等育人过程的中坚力量。教师应积极投入翻译（教学）理论的研究，参加相关研讨会，追踪翻译领域的前沿问题和热点事件，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与思政教学能力同时教师要提供情感支持，增强学生翻译过程中的自我效能感：教师不仅仅局限于提供翻译的参考译文，更要鼓励学生积极探索译文的生成原因，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

（二）优化翻译教学方法，强化翻译能力的培养

基于小学英语教育专业学生翻译能力的实践性特征，教师可以采用项目式翻译教学法，培养学生在一定翻译专题与情景下解决翻译问题的能力，有效缩短与实际工作情境的距离。教师根据教学安排与学生的兴趣，选择实践性较强的真实翻译项目，制定翻译实践计划，以学生小组为单位来完成实践任务，增强学生参与翻译活动的积极性，培养他们的团队意识与沟通能力，同时渗透职业素养教育。

同时，教师应启发学生多思考，善于分析，在翻译活动过程中发现问题，找出问题症结所在，充分挖掘翻译问题中的元素及其关联度，评估拟用翻译策略与方法的适切性，得出最终的解决措施。例如，引导学生分析外交话语源文“对于美方各种花式‘甩锅’，对不起，我们不想接，也不能接”。及其英译文“The US wants to make China a scapegoat. But so sorry, we don't want to be one. And don't even think of making us one”时，教师应让学生观察、理解从“甩锅”到“scapegoat”这种归化的翻译策略在呈现文化意象、实现交际功能上的作用，用英语读者熟知的 scapegoat，有力地体现出当时我外交部发言人的鲜明立场，坚决反对美方抹黑中国的丑陋行径。

（三）优化现有教学材料，开发有利于本专业学生翻译能力培养的教材

不同于翻译专业，需要优化现有教学材料，开发合适的翻译教材，以契合小学英语教育专业学生的群体特点（学习需求、知识水平等），为翻译教学提供有力支撑，最大程度地发挥翻译教学的育人功能。

英语教育专业学生的翻译能力是实践性能力，是一种初级阶段的翻译能力，翻译技能训练始终作为翻译教学的主线任务，而富有现实意义的翻译实践任务

是实现价值塑造和知识传授的重要载体。因此，优化现有翻译教学材料或开发新的翻译教材时应注重新颖性、学理性、功能性，将双语对比、典型文类、翻译理论、翻译技巧或一些翻译热门话题巧妙地糅合在一起。一方面，教材可以从时下翻译热点中找到代表性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兰花的英文与中国兰花及新加坡国花胡姬花的命名、韩国泡菜的英文与中文译名“辛奇”，这些术语的双语转化或多语转化是社会文化认知的产物，容易引起学生的好奇心与探究欲。另一方面，教材分层次通过实例从单句—句群—篇章—语篇解析其内在的多重主题、逻辑关系、信息布局等要素，探究源文、译文的文体风格、修辞手段等，讲解汉英语言、文化差异，提供翻译策略与方法，提升学生的翻译认知与思维水平。最后，智能化翻译教材的研发也值得关注：此类教材以学生译者为中心，由主教材、在线课程、电子课件等构成，有利于实现师生在翻译教学过程中的互动与资源共享，提高教学效率，同时融入思政素材，实现育人与育才的协同推进。

（四）引导学生理性使用翻译技术、翻译工具

“数据驱动、人技结合、跨界开放的教育生态，为学习者提供全面和丰富的学习体验。”[11] 对于翻译能力尚在形成阶段的英语教育专业学生而言，他们必须重视基于一定文类与相关主题的翻译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双语语言也必须有一定功底，而大数据、智能化翻译工具是辅助手段。

教师可以充当智能化翻译工具、大数据资源的提供者，为学生提供主题领域知识、地道的英文表达和专题术语，同时让他们观察翻译工具的优势与局限性，明确翻译工具的适用性，避免养成过度依赖翻译工具的习惯。另外，教师应启发学生在使用翻译工具及数据资源的过程中，鼓励他们发挥自主学习和判断的能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为翻译问题总是与真实语境相关联：善于观察、分析语言的使用环境，不能仅仅关注语言信息的转换，还要考虑交际环境。例如生态文明、文明城市、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等术语都含有“文明”二字，在转化为英语的过程中，有必要考虑术语的认知概念、语言结构、交际传播等三个维度，而不是简单地脱离语境用翻译工具解决问题。需要指出的是，使用境外大语言模型进行翻译，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察觉英语语言呈现出来的意识形态问题。比如当前 ChatGPT 模型的预训练语料主要基于欧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可能含有原创者强烈的意识偏见；学生将该大语言模型应用于中国时政文本的英译过程时，要充分关注其英语文本中核心词汇、短语或文化负载词体现的意识形态，确保英语译本价值观的正确性，自觉践行文化自信，自觉维护国家形象、民族尊严。

四、结语

培养小学英语教育专业学生的翻译能力，核心是培养他们以双语转换为核心任务，综合运用翻译知识，采用批判性思维方法，充分发挥学生译者的主体性，借助翻译工具完成相关文类文本的翻译任务。承担翻译类课程的教师以课程思政为引领，融价值塑造、知识传授、翻译能力培养于一体，这应该是教师们的共识与自觉行为；在此基础上，依据翻译能力培养的客观规律，探究学生的认知特点、行为特征、情感态度，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充分挖掘现有教学材料的教学效用，指导学生掌握使用翻译工具的科学方法，持之以恒地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最终实现学生综合素养的全面提升，服务于国家的发展，服务于社会与行业的需求，服务于学生自身素养的提升。

参考文献

[1] 祁芝红，李智．翻译教学思政育人新路向——基于韦斯特利 - 麦克莱恩传播模式的探索 [J]. 外语研究，2024(06):4.

[2] 刘云虹，曹丹红．“理解当代中国”翻译类教材使用研究——以《汉法翻译教程》为例 [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24(02):41-42.

[3] 穆雷，梁伟玲．翻译教学研究的现状与前路（2007-2022）[J]. 中国翻译，2023(06):54.

[4]WILSS W.Perspectives and limitations of a didactic framework for the teaching of translation.In R.W. Spielmann & R.W. Brislin(eds.).Translation: Applications and Research[M].New York: Gardner Press,1976:120.

[5]SHUTTLEWORTH M,M COWIE.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M].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14:26.

[6] 白玲，冯莉，严明．中国英语笔译能力等级量表的构念与原则 [J]. 现代外语，2018(01):103-104.

[7] 孙有中，张莲，陈法春．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目标、原则与路径 [J]. 外语界，2024(02):3.

[8] 刘宓庆．翻译教学：实务与理论 [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13.

[9] 李瑞林．译学知识生产的建构性反思 [J]. 中国翻译，2020(04):25.

[10] 袁振国．数字化转型视野下的教育治理 [J]. 中国教育学刊，2022(08):5.

[11] 杨宗凯．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内涵、阶段与实施路径 [J]. 中国高等教育，2023(02):16.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3 年广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新媒体语境下外宣翻译与广西海外形象建构研究”（23FYY025）。

（作者单位：桂林师范学院外语与旅游学院）

课程思政视域下高校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融合的机制构建

杨　淼

摘要：在课程思政与高校“三全育人”战略背景下，当前高校专业教学普遍存在“重知识传授、轻价值引领”失衡问题，理工科忽视科学精神培育、文科弱化家国情怀引导等现象突出，与立德树人要求存在差距。本文围绕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融合的背景价值、核心维度（目标协同、内容契合、方法创新）、构建路径（协同联动、元素转化、立体教学、多元评价）及保障体系（制度、师资、资源）展开研究，旨在建立系统协同的融合机制，为提升专业课程育人实效、完善高校育人体系提供支撑。

关键词：课程思政；高校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融合机制

新时代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德才兼备”新要求，当前高校专业教学常存在“重知识传授、轻价值引领”的问题，如理工科课程多聚焦技术原理，忽视科学精神与家国情怀培育，这种失衡易导致学生素养发展片面，与课程思政立德树人要求存在差距。随着《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意见》的推进，推动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成为破解上述问题的关键。本文结合高校教学实际，探索二者的融合有效机制，助力高校摆脱育人困境、推动“三全育人”战略落地[1]。

一、高校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融合的背景阐释与价值定位

近年来，课程思政已成为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核心抓手，《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意见》等相关政策明确要求，推动各类专业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行、协同育人，这既是应对新时代人才培养需求的时代诉求，也是教育领域落实国家战略的必然导向[2]。在高校“三全育人”体系构建中，专业课程作为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的主阵地，其承载的价值引领使命日益凸显，需突破“唯技能”“唯知识”的教学局限，实现育人功能的回归。但当前融合实践中，仍存在专业教师思政意识薄弱、思政元素挖掘碎片化、融合路径缺乏系统性等现实困境，导致育人实效大打折扣。这些困境背后，反映了教学理念、资源配置与评价标准等多层次、系统性的问题。因此，构建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的融合机制，不仅有助于破解上述难题，更能推动专业教学与价值引领深度耦合，为培养兼具专业素养与家国情怀的新时代人才提供制度保障，彰显高校育人体系的系统性与协同性。

二、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融合的核心维度与逻辑关联

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的融合，需以目标协同为先导、以内容契合为基础。从目标维度看，专业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并非对立关系，而是需实现协同统一——如工科专业培养工程技术人才时，既要强化其技术研发、项目实践能力，也要通过工程伦理教育树立责任意识；文科专业传授理论知识时，需同步培育学生的家国情怀与社会担当，避免“重技能轻素养”的失衡。

从内容维度看，专业知识体系与思政元素存在内在契合性，绝非生硬叠加、牵强附会：理工科可通过我国科技突破史诠释创新报国理念，文科可依托传统文化典籍传递文化自信，这种内在关联为融合提供了天然载体，避免思政教育沦为“附加题”[3]。

方法维度则是连接目标与内容的关键桥梁，需推动专业教学模式与思政教育路径有机融合。传统讲授式教学难以承载思政育人功能，而项目式学习、案例教学、实践实训等模式可成为融合突破口：如商科专业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案例研讨，将思政引导融入商业决策分析；理工科专业在实验教学中强调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在实习实践中渗透行业规范与职业操守。

三、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融合的机制构建路径

（一）协同联动机制：构建思政教师 + 专业教师 + 管理人员跨主体协作网络

协同联动机制的核心是打破高校内部“思政教师单打独斗、专业教师被动参与、管理人员缺乏统筹”的屏障，通过明确三方角色定位与协作流程，形成育人合力[4]。其中，思政教师负责提供思政理论支撑与元素挖掘指导，帮助专业教师精准把握价值引领方向；专业教师依托学科优势，将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深度绑定，避免思政教育“空泛化”；管理人员则承担资源协调、流程监督职责，保障协作落地——这一机制有助于解决当前部分高校专业教师“想融不会融”、思政元素与专业教学“两张皮”的现实问题，为确保协作常态化、制度化，应建立定期的联合教研活动、共建共享资源库以及清晰的责任清单与沟通反馈渠道。

比如，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于 2021 年入选为校级课程思政领航学院。学院于 2022 年成立课程思政专项教研组，由学院班子成员任组长、副组长，成员由专业负责人、骨干教师、学工团队组成，统筹推进“一专业一特色”建设。制定《经济与管理学院课程思政工作细则》，将思政元素纳入教学大纲修订、教材选用、教案评价全流程。例如，学院围绕国际商务、电子商务、信用管理等核心专业，建成 3—5 门示范课程，推动思政教育与专业知识的深度融合，同时依托校企合作与劳动教育基地，建设多门实践类示范课程，如“茶文化节实践课程”“乡村振兴实践”等，将课程思政延伸至实践教学。

（二）元素挖掘与转化机制：建立专业课程思政元素的“识别—提炼—转化—应用”流程

元素挖掘与转化机制需遵循“从专业中来、到教学中去”的逻辑，通过“识别—提炼—转化—应用”四步流程破解思政元素碎片化、适配性差的问题。识别环节聚焦专业知识体系中的思政切入点，如学科发展史、行业典范、伦理规范等；提炼环节需去粗取精，筛选与课程目标契合的核心元素，避免泛化；转化环节将抽象思政元素转化为具象教学素材，如案例、习题、实训任务；应用环节则把素材嵌入课堂教学各环节，实现与专业内容的自然融合，此流程应是一个动态循环、持续优化的过程，需根据学生的反馈和教学效果对元素与转化形式进行迭代更新，防止僵化。

金陵科技学院“工程化学”课程秉持“以生为本、立德树人”的理念，从“个人修养，职业素养，社会责任”三层面挖掘课程的思政元素，将校本内容与思政元素、第二课堂、技能大赛、学科前沿和社会服务相融合。通过开学第一课、辩论赛、开放实验、安全演练等活动，有机融入绿色环保、安全意识、科学精神、工匠精神、创新精神等思政元素，培育学生实事求是的态度、严谨规范的作风与团队协作能力，厚植文化自信与爱国情怀。

（三）教学实施机制：形成“课堂主阵地 + 实践延伸 + 线上拓展”立体化教学体系

该机制打破传统课堂的时空局限，以课堂为核心夯实知识与思政的融合基础，以实践为载体强化认知转化，以线上为延伸拓展育人边界。课堂主阵地通过案例教学、情境互动等方式融入思政课，避免“说教式”灌输；实践延伸依托实习实训、社会服务等场景，让学生在实操中践行价值理念；线上拓展则利用数字化资源，实现思政教育的常态化覆盖，三者协同形成认知—体验—内化的育人闭环。

该机制下，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打造商科课程思政数字化范式，构建“平台 + 资源 + 指标”三位一体数字化体系，开发集成案例库、虚拟实训的高访问量数字化平台，为师生提供便捷的教学资源。在“市场营销学”课程中，课堂主阵地围绕前沿行业案例库中的案例，在讲解营销策略的同时传递价值理念；在实践延伸环节依托乡村振兴等实践基地，将课程思政与创新创业教育、社会责任教育有机衔接，组织学生参与实践活动；线上拓展则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思政教育的常态化覆盖。

（四）评价反馈机制：构建过程性评价 + 结果性评价 + 育人成效评价的多维度考核体系

该机制打破传统“以分数定优劣”的单一评价模式，通过三维度协同实现“教—学—育”的闭环反馈。过程性评价聚焦教学全程，记录教师思政元素融入频次、学生课堂互动与实践参与情况；结果性评价兼顾专业知识掌握与思政认知，避免“重技能轻素养”；育人成效评价则通过长效跟踪，检测学生价值理念内化效果，三者相互补充，为融合优化提供精准依据。

金陵科技学院会计学专业构建了人才培养链与思想价值链、产业需求链、个人发展链“四链共振”的“一引领、两发展”应用型会计本科人才培养体系，从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法治意识、道德修养等方面重点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给。在评价反馈方面，注重过程性评价、结果性评价与育人成效评价相结合，例如过程性评价关注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的态度、参与度等，结果性评价兼顾专业知识掌握与思政认知，育人成效评价则通过跟踪学生毕业后的职业发展情况等，评估其价值理念内化效果。

四、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融合机制的保障体系

（一）制度保障：完善课程思政建设的激励机制、考核机制与管理制度

制度保障是融合机制落地的“压舱石”，需通过激励、考核、管理三机制协同，破解教师参与动力不足、融合流程不规范等问题[5]。激励机制侧重调动积极性，通过评优评先、科研支持等方式，让主动参与融合的

教师获得实际收益；考核机制聚焦责任压实，将思政融入成效纳入教师教学评价，避免重形式轻实效；管理制度则负责统筹协调，明确各部门职责，规范融合流程，确保建设有序推进，三者共同构成愿融、必融、善融的制度闭环。

华中科技大学的实践形成了良好的制度参考范本：学校出台专项实施办法，在激励机制上，将课程思政优秀案例、教案纳入教学成果认定范畴，对开发者给予额外教学工作量核算，并在省级以上教学竞赛申报中予以优先推荐；在考核机制上，明确将思政教育融入成效占专业教师年度教学考核权重的 15%，且作为职称评聘的核心参考指标之一，对未达标者实行“一票否决”，暂停当年评聘资格；在管理制度上，成立由教务处、马克思主义学院及各院系负责人组成的课程思政建设专班，建立“双月研讨、季度督查、年度评估”的全流程管理模式，及时破解实践中的协同壁垒。

（二）师资保障：构建专业教师思政素养与教学能力的常态化培养培训体系

师资是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融合的核心主体，其思政素养不足、融合教学能力欠缺是当前融合实践的主要瓶颈，因此需构建“素养提升 + 能力强化”双轮驱动的常态化培养培训体系。该体系需突破“一次性培训”的局限，通过定期化、分层化、实践化的培训，既强化教师对家国情怀、行业伦理等思政内涵的理解，又提升其将思政元素自然融入专业教学的实操能力，避免培训与教学实际脱节。

清华大学的分层培养体系具有典型示范意义：学校针对工科、文科、医科等不同学科专业教师，实施“定制化”培训方案。每月组织一次“思政理论大讲堂”，邀请马克思主义学院专家解读“科技报国”“文化自信”等学科适配性主题；每季度开展“课程思政工作坊”，由机械工程系、人文学院等院系的优秀教师分享“大国重器中的工程伦理”“经典文献中的价值传承”等实操经验；建立“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专业院系教师”结对帮扶机制，全校 231 名思政骨干与 49 个院系的专业教师精准对接，一对一指导教案打磨与课堂设计。

（三）资源保障：建设专业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库与数字化支撑平台

资源保障是破解专业教师“素材短缺、整合困难”的关键，需通过“资源库储备 + 数字化赋能”，为融合教学提供可直接使用、便捷获取的素材支撑。专业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库需按学科分类建设，涵盖案例、课件、视频、习题等多元形式，聚焦行业典范、家国情怀、伦理规范等核心思政主题，避免资源碎片化；数字化支撑平台则须具备智能检索、在线更新、互动分享功能，实现资源的高效流转与迭代，让教师无需“从零开始”，降低融合教学的时间与精力成本。

延安大学的“数字 + 红色”资源建设实践极具创新价值：学校立足红色文化基因，按文、理、工、医四大门类建成特色课程思政资源库——文科库收录《红色中华》报数字化文献及延安时期文艺作品等 1.1 万余条素材，理工科库整合“延安时期军工技术发展史”等视频资源，医科库汇集陕北地区基层医疗奉献案例；同步搭建“红色思政资源共享平台”，开发“专业 + 思政主题 + 资源类型”三维检索功能，教师可精准获取适配素材，平台实行“月更新、季扩容”机制，年均新增优质资源 1200 余条。

五、反思与总结

本文系统梳理了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融合的核心内容：背景层面剖析了当前教学中重技能轻价值的现实困境；核心维度明确目标、内容、方法的内在逻辑；构建路径提出四大机制；保障体系从三方面提供支撑，且各环节均结合高校实践案例，确保研究落地。核心观点在于，融合机制并非单一环节叠加，而是兼具系统性（各机制相互支撑）协同性（跨主体联动）与实践性（贴合专业教学实际）的有机整体，能有效支撑高校“三全育人”体系落地，助力破解育人失衡问题。

同时，本文也需正视自身研究局限：构建的融合机制与文科、医科等应用型专业适配性较强，但对纯理论理工科的思政元素挖掘、融合路径设计指导不足，且动态调整机制滞后于行业发展。未来可通过深化跨学科协作、强化数字化赋能和完善长效迭代机制等，定期调研师生需求并优化标准，进一步提升融合机制的适配性与生命力，推动高校育人质量持续提升 [6]。

参考文献

[1] 李伟伟，俞霁璨，陈瑞志．“三全育人”视角下高校思政课一体化教学模式的构建 [J].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5,24(03):116-121.

[2] 宋梅．高校体育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现状、困境与推进路径 [J]. 百色学院学报 ,2025,38(01):124-135.

[3] 白雪莲，李佳，毕长春．应用型高校专业思政—课程思政一体化建设研究 [J]. 教育教学论坛 ,2025(34):53-56.

[4] 孙晓玲．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与专业教育协同融合的策略 [J]. 公关世界 ,2025(01):94-96.

[5] 汪刘送，许海峰，崔琳，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学院“课程思政”与“专业教育”融合发展机制研究 [J]. 宿州学院学报 ,2023,38(03):68-71.

[6] 刘艳艳，顾润国．高职医学院校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库建设实践 [J]. 职业技术教育 ,2021,42(02):64-68.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

“思政铸安，应急启智”安全与应急类专业思政育人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高　飞　滕弋非　齐消寒　张逸龙　赵书茂

摘要：本文基于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及相关政策要求，紧扣安全与应急类专业“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核心特质，系统探讨了思政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路径。针对当前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不深、知行脱节、学以致用不足等问题，以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思政铸安，应急启智”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为案例，深入分析其通过顶层设计思政培养体系、组建“专业＋思政＋企业”三方导师团队、构建特色课程思政资源库、深化实践与志愿服务、依托科研与培训平台辐射育人等关键举措，实现了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的有机融合、同频共振。中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围绕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了“课程思政—第二课堂—劳动实践—研学培训”四位一体育人模式，有效提升了学生社会责任感、职业素养、应急担当及家国情怀，破解了专业思政建设中的同质化、形式化难题，为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可借鉴、可推广的实践经验与示范样本。

关键词：专业思政；课程示范中心；安全工程；应急技术与管理；育人模式

2020 年，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将思想政治教育全方位、无死角地渗透到整个人才培养体系，解决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两张皮”问题，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次年，教育部办公厅进一步发布了《关于开展课程思政示范项目建设工作的通知》，引导全国高校聚焦专业特色，开展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的创新性探索与实践。课程思政建设的核心要义，在于以专业知识点为载体，深入挖掘课程内容中蕴含的价值引领要素、思想育人效能，提炼其中的政治认同、道德培育、文化传承与责任担当等核心教育价值，将价值引导融入专业技能传授和能力培养全过程，充分发挥每门课程的育人功能，助力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近年来，高校专业类课程的课程思政教学虽逐步丰富完善，但结合安全与应急类专业特色的深度实践仍存在短板，核心问题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1]。

一是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协同不足，传道与传技未能有机结合。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仍主要依托传统思政课程开展，尚未与各学科专业课程教学形成深度融合。如何基于不同专业的培养目标及核心能力指标，系统构建具有专业适配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实现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教育内容与行业需求的契合匹配，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学校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实现价值引领与专业教育的有机统一还有待深入研究 [2]。

二是思政教育知行脱节、学习成效不显著。当前关于实践教学的研究主要围绕专业技能展开（如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校企合作协同育人等），而课程思政研究大多集中在理论课程上，立足于实践教学课程思政建设的研究较少。且思政课程的实践内容大多聚焦于红色文化和相关资源，立足专业特色和课程育人特点开展的课程思政教学实践建设很少 [3]。

《安全应急管理人才蓝皮书》显示，全国安全应急人才总需求约为 1600 万人，而现有人才数量仅有 1050 万人，缺口高达 550 万人，且全国高校每年相关专业的毕业生仅 1.6 万人。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立足国家战略需求、回应时代命题，已累计培养安全工程专业本科生 3000 余人，并于 2018 年获批设立国家首批应急技术与管理专业。安全与应急专业强调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与思政教育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一致，均以培养社会责任感和公共精神为核心，与思政教育具有内在契合性 [4]。基于此，学院成立“思政铸安，应急启智”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专门负责设计和优化安全与应急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一、中心的发展定位和主要职责

中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紧扣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立足安全与应急类专业特色，建成思政教育全覆盖的专业课程体系；打造专业教师、思政教师、企业导师深度融合的大思政育人队伍，培养信念坚定、本领过硬、勇于担当，能够保障人民利益、维护人民安全的高素质安全与应急技术和管理人才；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弘扬安全文化，打造国内有影响力的安全与应急类专业思政示范阵地。

中心负责设计和优化安全与应急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指导课程思政教学团队建设，引导和提升广大教师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意识和能力；开展第二课堂和志愿服务活动，负责思政教学资源库和社会实践体系建设；依托科研平台和科研成果，提供研学服务与安全培训。

二、顶层设计思政培养体系，组建三方导师团队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始终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立足“太阳石精神”育人传统，将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具有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的应用创新型人才作为核心目标。为精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和行业发展趋势，该中心立足学校总体人才培养定位，系统推进思政培养体系顶层设计与三方导师团队建设，为专业思政落地见效提供坚实支撑。

在思政培养体系构建方面，中心基于安全工程、应急技术与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和行业需求，科学制定人才培养标准与能力规格，实现学校办学定位、专业人才培养与行业需求的有机衔接。明确安全和应急专业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培养保障人民利益和维护人民安全的技术和管理人才”为目标，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职业安全与健康理念和应急管理与救援技能的应用创新型一流人才。同时，中心基于安全与应急专业特点，系统构建了思想政治核心素养的培养体系，将政治认同、科学精神、职业伦理、创新思维等关键素质培养目标科学融入专业培养方案的四大课程模块：以通识课程强化价值引领，在专业基础课中渗透科学精神，依托核心专业课培养职业操守，借助实践教学锤炼应急担当。同步完善教学质量保障机制，在教学规范、师资队伍、教学条件等各环节提供质量保障，实现价值塑造、能力培养与知识传授的三维统一[5]。

在导师团队建设方面，该中心深刻认识到课程思政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构建党支部、思政教师以及企业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工作格局[6]。中心采取“党委全面统筹协调、行政教学双线并进、职能部门协同配合、教学团队具体实施”的联动机制，与学校基础教学部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组建由专业教师、思政教师和企业导师共同组成的课程思政教学团队，汲取思政教师丰富的育人经验，切实发挥好“三方导师”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三方导师”在确保核心价值传导一致性的前提下，对课程教学体系中内容、方法等进行全面梳理，完善教学大纲、嵌入思政教学设计百余门次，确保思政元素经过教师消化、加工能有效使用；将课程思政内容系统化整合，并基于学科培养目标和教学实践需求，对思想政治教育要素实施精准化筛选与差异化运用，形成各具特色的教学实施路径，从而避免教学内容同质化现象，实现思政教育个性化呈现与专业化表达的有机统一；以专业认证模式为基础，建立各门课程思政和专业思政教育的评价机制和支撑矩阵，采用内部评价与外部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实施质量保障及评价，确保思政目标的有效达成。

三、丰富课程思政资源库，打造“沉浸式”思政课堂

开展课程思政资源库建设是深化专业思政、推动课程思政落地的重要举措，能够为专业教学提供丰富的思政素材，助力实现思政教育从“灌输式”向“沉浸式”“共鸣式”转变，使其更加鲜活[7]。中心立足安全与应急类专业特色，紧扣“思政铸安”核心，聚焦行业实践，系统推进课程思政资源库建设，打造兼具专业性与思政性的“沉浸式”思政课堂。

结合教育部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指标体系中关于开展“行业企业课程资源库”“真实项目案例库”和“教育教学案例库”（以下简称“三库”）建设要求，聚焦行业实践，以专业教师牵头，企业导师辅助，建设了《安全与应急管理》《特种设备安全》《危险化学品安全》等多门课程真实项目案例库，包含真实项目案例 150 余个。并结合课程思政元素设计了多元化研讨主题，引导学生依据案例分析其中存在的安全隐患、管理漏洞及事故根本原因，并通过自主分析、小组讨论等多种方式，深入挖掘各类事故案例背后的安全意识、职业道德等思政内涵。

同时，该中心不断丰富第二课堂思政资源，举行“赓续雷锋精神，奋斗成就梦想”开学第一课主题报告会等活动，引导学生在学雷锋实践中汲取发展动力，为强国建设和辽宁振兴新突破作出更大贡献；积极与企事业单位、优秀校友等建立联系，将企事业单位先进事迹以及先进科研成果引入第二课堂，从未来工作角度助力学生体悟伟大建党精神，塑造优秀品格，现有密切联系企业专家 50 余人；开展“校友引领我成长，千名校友进班级”等主题教育活动，通过专题讲座、实习等机会，把每个杰出人物的光辉事迹都变成最生动的思政教材，为在校学生建设丰富的思政资源库；由专业教师持续举办“致远讲堂”“渤海涛声”系列

报告，聚焦安全应急行业发展、前沿技术突破、行业人物事迹等内容，既拓宽学生专业视野，又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培育家国情怀，营造勤学善思、笃行致远的良好学风。

四、激活实践和志愿服务，在实践中增强责任感

思政课堂不应仅仅局限于一方教室、一块黑板，实践活动是将思政知识转化为实际行动、培养主观能动性的广阔舞台[8]。中心打破传统教学边界，积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动教育的重要指示、论述，与校区公安保卫处、所在街道社区等 10 余家机关单位建立紧密合作关系，近年来组织学生在校内外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20 余次，包括协助公安保卫处开展校区消防综合应急演练、校园安全教育月等校内实践活动，以及保障葫芦岛市全民运动会等校外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在社会服务中感知社情民意。

中心目前建立有长期稳定合作关系的实习基地达 30 余个，其中与国家矿山应急救援沈阳队建立深度合作，学生与救援队员同吃同住，开展体能训练、技能培训及模拟演练等实战内容；联合葫芦岛市创安应急救援服务公司开展装备展示、创伤包扎与心肺复苏等实操；与葫芦岛市中心医院合作开发应急医学教学库，开展“理论 + 实操 + 考核”急救技能实训。以上实训不仅提升了学生对应急救援全流程的认知，同时也是一堂堂“行走的思政课”，为思政教育注入鲜活的生命力，让学生在实践和志愿服务中领悟“思政铸安，应急启智”的深刻内涵，提升思政教育引领力。

五、依托科研和培训平台，形成专业思政和课程思政的示范引领效应

为扩大中心的辐射范围，中心在培养专业学生的同时，将科技创新一线转化为公共育人场域，为其他专业学生、中小学生及一线工人提供安全与应急教育，在真实场景中拓宽学员知识面，厚植思政价值情怀，使专业思政教育切实发挥铸魂育人功能。中心所在安全学院建有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安全工程辽宁省本科实验室虚拟仿真教学中心、煤矿安全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实验教学中心，以及矿山热动力灾害与防治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省部级平台，拥有仪器设备 4200 余台套，设备原值总计 1.2 亿元。

中心践行国家“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防灾减灾日主题，联合葫芦岛市应急局、葫芦岛市红十字会、葫芦岛市中心医院、兴城市消防救援大队、葫芦岛市创安救援队、葫芦岛市北斗救援队等队伍开展地震、消防综合演练，校区参与师生达 5000 余人次，给全校师生上了一堂生动、专业的安全与应急实践教育课，活动得到了人民视频、《葫芦岛日报》等多家官方媒体的报道，影响广泛。

同时，依托安全监管监察学院，积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组织中心教师为全国煤炭行业从业人员提供高质量培训服务。现已完成培训 22 次，参与培训人员达千余人。依托矿山热动力灾害与防治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承办省市内中小学校科技研学以及校内教师交流参观等主题活动 20 余次，努力把每一个实验室都变成思政教育的最好课堂，让中小学生在真实的体验与深入的思考中不断丰富思政认知，为培养具有高尚品德、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的时代新人奠定坚实基础。

六、结语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思政铸安，应急启智”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以立德树人为核心，以红色基因为主线，紧扣安全与应急类专业“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核心特质，围绕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专业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师团队、育人资源、实践劳动和社会服务进行了系统性探索，构建了“课程思政—第二课堂—劳动实践—研学培训”四位一体育人模式，有效破解了专业思政与专业教育融合不深、知行脱节等难题，实现了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的和谐共振，切实提升了学生的思想境界、职业素养和家国情怀，为安全与应急类专业人才培养注入了思政力量。当前，高校专业思政建设仍处于持续深化阶段，关于校级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建设工作的一系列探索还有很大的填补空间，中心将继续着力培育课程思政优秀教学成果，树立更多可借鉴、可推广的示范典型，并总结成熟有效的建设经验。

参考文献

[1] 韩宪洲 . 专业思政 : 深化课程思政的逻辑遵循与实践要求 [J]. 中国高等教育 ,2023(05):33-36.

[2] 孙静 . 会计专业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建设的框架和机制研究 [C]// 新课程研究杂志社 . 新课改背景下课程理论与实践探究论文集（十）.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徐州财经分院 ,2023:20-22.

[3] 李节 , 马珂 , 龙程鹏 . 湖湘红色基因与高校设计专业思政建设的融合路径研究 [J]. 家具与室内装饰 ,2025,32(03):135-139.

[4] 张嬿妮 , 杨丹 , 舒盼 . 应急安全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内涵及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J]. 科学咨询 ,2023(23):232-234.

[5] 何平 , 何克奎 , 黎明军 , 等 . 应急安全类专业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 [J]. 现代职业教育 ,2021(47):1-3.

[6] 秦文莉 , 马增岭 . 新高考背景下传统文化融入大学化学课程思政教学的思考与实践——以《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为例 [J]. 才智 ,2025(19):13-16.

（下转 209 页）

高职学生孝道观念类型的潜在剖面分析及教育启示

陈　盈　梁　燕　沈光银 *

摘要：采用《双元孝道信念量表》和《代际支持意愿问卷》，对 869 名高职院校在校学生进行调查，探讨高职学生孝道观念的潜在类型及在代际支持意愿上的特征。结果显示：（1）高职学生的孝道观念可分为四类：高认同型（24.86%）、互惠型（29.57%）、中认同型（34.41%）与低认同权威型（11.16%）；（2）在对父母的经济支持意愿方面，四种孝道观念类型群体差异并不显著；在情感和生活支持意愿方面，高认同型与互惠型得分最高，中认同型次之，低认同权威型最低。研究结果启示高职院校在进行孝道德育实践时，要精准实施分类指导的教育策略、充分挖掘情理交融的教育资源、积极构建家校协同的育人机制，切实提升孝道德育实效。

关键词：孝道观念；代际支持；高职学生；潜在剖面分析

一、前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古语有云，“百善孝为先，百德孝为首，百教孝为始。”孝，是中华传统美德之首，是中国人家庭文化的核心，孝德培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双全人才的重要途径。在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青年一代对孝道文化的当代实践，不仅能够切实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情感慰藉需求与生活照料依赖，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为家庭养老模式提供文化支撑和伦理基础，缓解社会养老问题[1]，而且对青年群体自身的心理健康和生活幸福同样重要[2]。

孝道，作为一套规范子女对待父母行为的价值体系与实践准则，涵盖感恩、敬爱、尊重、顺从等情感态度，以及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等具体行为方式。根据双元孝道模型，孝道观念被划分为两个核心维度：相互性孝道与权威性孝道[3][5]36-37。其中，相互性孝道源于儒家“亲亲”原则，强调的是子女与父母在人际互动过程中自然生成的情感联结以及子女对父母养育恩情的感念与回报，体现情感互动的平等性与自主性，其基本特征包括“父慈子孝”“爱亲养亲”“天伦之乐”等。而权威性孝道观念则基于儒家“尊尊”原则，更侧重于家庭伦理与等级秩序，强调子女对父母的顺从与服从及其对个人家庭角色责任的履行，其典型要求包括“传宗接代”“子承父业”“光耀门楣”等[4]216[5]36-37。根据个体在相互性孝道观念与权威性孝道观念上的认同程度，双元孝道模型进一步从理论上划分了四种可能的孝道观念模式：（1）“高相互性 + 高权威性”的平衡模式；（2）“高相互性 + 低权威性”的互惠模式；（3）“低相互性 + 高权威性”的权威模式；（4）“低相互性 + 低权威性”的非孝模式，并且认为不同模式的个体在孝道行为的心理动机、孝道践行形式及与父母的

（上接 208 页）

[7] 谷海青，尹余萌，高强 . 高校院级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的建设与实践 [J]. 中国轻工教育，2024,27(04):8-13.

[8] 徐祚卉，朱建芳，马辉，等 . 立德树人视域下大学生安全与应急课程思政教学路径探究 [J]. 安全，2025,46(03):77-80.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揭榜挂帅”项目“新质生产力驱动下安全与应急学科‘科教融汇’育人模式的改革与实践”（LNTUJY20240106）。

（作者单位：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

互动模式等方面均表现出不同的特点[6-7]。双元孝道模型从理论上较为充分地揭示了孝道观念的结构性差异，为理解现代社会中个体孝道观念的多样性和异质性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随着当前社会价值多元化的发展和传统家庭结构的改变，青年群体的孝道观念呈现出显著的代际差异和多元分化的特征[8]，这也预示着不同青年群体之间存在着群体特异性，有待进一步研究。然而，在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背景下，高职院校在校学生人数规模不断扩大，作为青年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研究多聚焦普通高校学生[9]，对高职院校学生群体的孝道观念特征关注不足。鉴于此，本研究以高职院校学生为研究对象，对其孝道观念的异质性与类型特征进行系统考察，同时，为了验证潜在剖面分析结果的有效性，本研究拟进一步考察不同孝道观念类型学生在对父母的代际支持意愿上的差异，以期能为深入理解当代青年孝道观念的多样性提供实证证据，为高职学生孝道观念的培育与教育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启示，为新时代孝道文化在青年一代中的创新性发展与传承提供有力参考。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广东省茂名市某高职院校发放调查问卷，由于大三年级学生全部离校实习，共有 1000 名高职大一、大二年级学生参与本研究的问卷调查。删除 2 道测谎题任意一题不通过的被试问卷后，有效问卷 869 份，有效率为 86.90%。其中，大一年级 498 人（男 360 名，女 138 名），大二年级 371 人（男 190 名，女 181 名）；家庭所在地为农村 486 人、城镇 383 人。样本结构合理，能够较好地反映高职大一、大二学生的整体特征，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提供了基础。

（二）研究工具

1. 双元孝道信念量表

采用 Yeh 等编制[4]219、后经李启明[10]修订的双元孝道信念量表进行测量。该量表包含相互性孝道信念与权威性道信念两个维度，共 16 个项目，采用 6 点计分（1= 完全不认同，6= 完全认同），得分越高，表示对该维度的孝道信念越认同。本次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2，信度良好，符合心理测量学标准，可用于本研究的测量。

2. 代际支持意愿调查问卷

通过“给予金钱和物质赡养以回报父母”“料理家务和照顾双亲以回报父母”“陪伴慰藉和情感支持以回报父母”三个题项评估对父母的经济、生活和情感支持意愿，请被试者按照 1“完全不重要”到 5“非常重要”进行评分，得分越高，表示被试越看重该类型的代际支持。该问卷题项设计简洁明了，贴合代际支持的核心维度，能够有效反映被试的代际支持意愿。

（三）数据处理

采用 SPSS23.0 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以及方差分析；采用 Mplus8.0 软件进行潜在剖面分析，所有数据处理过程严格遵循统计学规范，确保分析结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三、研究结果

（一）高职大学生孝道观念的潜在剖面分析

为探究高职大学生孝道观念的潜在类别，本研究以被试在双元孝道信念中的 16 个条目上的得分作为观测指标，进行 2—5 个类别的模型拟合，模型拟合指数如表 1 所示。随着模型类别数目的增加，AIC、BIC 和 aBIC 的值逐渐减少（值越小，表示模型拟合得越好），BLRT 显著性结果表明分类个数的增加可能会改善模型结果，但是 LMR 显著性检验表明 5 类别模型并不优于 4 类别的模型，因此，排除 5 类别模型。在 2—4 类别模型中，4 类别模型 AIC、BIC、aBIC 值最小，LMR 和 BLRT 均显著，同时 Entropy 值大于 0.80，各类别所占比例合理，分类效果较好。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和参考双元孝道模型 4 个类别的分类，最终确定 4 类别模型为最优模型。

表 1　不同潜在剖面模型的拟合适配度比较

模型	AIC	BIC	aBIC	Entropy	LMR	BLRT	类别比例（%）
1 类别	40913.94	41066.49	40964.87				
2 类别	38637.74	38871.34	38715.73	0.88	<0.001	<0.001	34.52/65.48
3 类别	37726.85	38041.50	37831.90	0.83	0.011	<0.001	36.59/29.58/33.83
4 类别	37134.51	37530.20	37266.61	0.86	0.019	<0.001	24.86/29.57/34.41/11.16
5 类别	36771.66	37248.40	36930.82	0.86	0.300	<0.001	9.55/15.53/30.61/23.01/21.30

4 个类别在 16 个条目上的得分见图 1，条目 C1—C8 归属相互性孝道观念维度，条目 C9—C16 归属权威性孝道观念维度。

类别 1 对相互性孝道和权威性孝道都表现出较高的认同程度，符合双元孝道模型理论当中的“高相互性 + 高权威性”的高认同模式的特征，将其命名为“高认同型”，该组别共有学生 216 人，占总体学生的 24.86%。

类别 2 对相互性孝道观念表现出较高的认同程度，对权威性孝道的认同程度较低，符合双元孝道模型理论当中的“高相互性 + 低权威性”的互惠模式的特征，故而命名“互惠型”，该组别共有学生 257 人，占总体学生的 29.57%。

类别 3 在相互性孝道和权威性孝道上的得分均处于中等水平，虽然“中相互性 + 中权威性”的孝道模

式在双元孝道模型理论当中未曾被描述，但在现实生活中该组别的学生人数却最多，共有 299 人，占总体的 34.41%，因此将其命名为“中认同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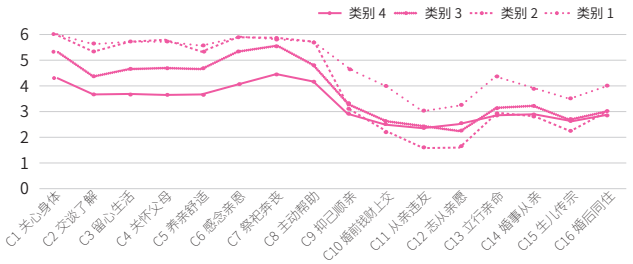


图 1 高职学生孝道观念的 4 类别潜在剖面图

类别 4 在相互性孝道维度上的得分最低，在权威性孝道观念维度上的得分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低相互性 + 中下权威性”的孝道模式在双元孝道模型理论当中也未曾被描述，鉴于其总体认同水平在四类学生当中处于最低水平，且权威性孝道观念相对而言有一定优势，故而，将其命名为“低认同权威型”。该类型学生人数最少，共 97 人，占总体的 11.16%。

（二）不同孝道观念亚类型高职学生的代际支持意愿的方差分析

在经济回报意愿上，低认同权威型得分均值为 4.00±0.82 分、中认同型为 4.15±0.82 分、互惠型为 4.15±0.89 分、高认同型为 4.22±0.88 分；在生活回报意愿上，低认同权威型得分均值为 3.84±0.89 分、中认同型为 4.28±0.81 分、互惠型为 4.68±0.59 分、高认同型为 4.75±0.53；在情感回报意愿上，低认同权威型得分均值为 4.10±0.91、中认同型为 4.56±0.69、互惠型为 4.95±0.22、高认同型为 4.91±0.35。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四个孝道观念类型学生在生活回报意愿和情感回报意愿上的得分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F=53.73，p<0.001；F=73.13，p<0.001），而在经济回报意愿上的得分不存在统计学差异（F=1.50，p=0.21）。LSD 事后多重检验结果显示，在生活回报意愿和情感回报意愿上，低认同权威型得分均属最低，中认同型居中，高认同型和互惠型均为最高，二者之间不存在统计学差异。

四、讨论

（一）高职学生孝道观念亚类型特征

本研究基于双元孝道模型理论探讨高职学生孝道观念的异质性，发现了四类具有不同特征的亚类别，分别为：“高相互性 + 高权威性”的高认同型、“高相互性 + 低权威性”的互惠型、“中相互性 + 中权威性”的中认同型以及“低相互性 + 中下权威性”的低认同权威型。其中，孝道观念认同型学生数量最多，超过总体的三分之一，其对父母的代际支持意愿也处于中等水平。其次，对相互性孝道认同最高的互惠型（对权威性孝道认同最低，总占比 29.57%）和高认同型（对权威性孝道认同最高，总占比 24.86%）的学生总数过半，并且两种孝道观念类型学生对父母的生活支持与情感支持意愿均处于最高水平。低认同权威型对父母的代际支持意愿水平最低，该类学生人数也最少，为 11.16%。上述结果表明，在高职学生群体中，大多数学生具有较为积极的孝道观念，然而，依然有部分学生的孝道观念尚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且有少部分学生亟须进一步的价值观念引导与孝道教育干预。

双元孝道模型理论所界定的“高相互性 + 高权威性”的高认同模式与“高相互性 + 低权威性”的互惠模式在本研究中得到了验证，表明这两类孝道模式可能具有较为广泛的现实基础。然而，理论中预设的“低相互性 + 高权威性”的权威模式和“低相互性 + 低权威性”的非孝模式在本研究中并未发现，取而代之的，是“中相互性 + 中权威性”的中认同型和“低相互性 + 中下权威性”的低认同权威型。中认同型的发现提示双元孝道模型在类型划分上存在一定局限，该模型仅将人们孝道观念进行“高认同”“低认同”两极分类，忽略了在现实中广泛存在的中等认同群体。本研究补充并扩展了该模型，有助于完善人们对孝道观念多样性的理解。此外，低认同权威型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青年尤其是高职学生对孝道观念的心理认知转型及其群体特征。相较于社会上的一般成年群体而言，高职学生接受了高等教育，具备良好的道德认知水平，因此极端非孝型在该群体中难以出现。其次，当代青年整体上对权威性孝道观念的认同逐渐弱化，若缺乏对相互性孝道观念的高度认同作为心理基础，也难以形成对权威性孝道的强烈接纳。因此，在对相互性孝道观念低认同的背景下更可能出现的是中下水平的权威性认同，从而形成当前所见的低认同权威型。

（二）教育启示

1. 精准实施分类指导的教育策略：基于孝道观念类型特征，开展差异化德育措施

高职学生孝道观念具有异质性，本研究识别了四类具有不同特征的亚类别，因此在开展孝道教育时，应针对不同孝道观念类型的心理与行为特征，采取差异化的教育策略。例如，对于高认同型学生，应引导其理性认识“孝”与“顺”的关系，发展其独立思考的能力与自主人格，避免盲从和愚孝行为；对于互惠型学生，要强化其责任意识与道德义务认知，帮助其理解孝道中的伦理规范，降低因权威较低而产生的代际冲突风险；对于中认同型学生，应加强价值引导，增强感恩意识，激发内在的敬亲爱亲的情感动机，逐步提升孝道认同；对于低认同权威型学生，需先修复亲子关系，通过情感支持与心理辅导增强其亲子沟通能力和理性解决冲突的智慧，逐步引导其树立正确的

孝道观念，提升孝道认同水平。

2. 充分挖掘情理交融的教育资源：注重强化情感体验，同步提升家庭责任

本研究还发现，高职学生普遍表现出对基于亲子情感的互惠性孝道观念的认同度更高，而对根植于伦理道德的权威性孝道的认同程度较低。这一现象折射出当代高职学生价值观的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情感导向的价值取向日益凸显，二是对传统文化价值内核及家庭伦理责任的认知有待深化。因此，高职院校在开展孝道教育时，一方面需通过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着力培养学生的感恩意识，深化亲子情感联结，另一方面，也要充分挖掘传统文化中的孝道伦理教育资源，将孝道伦理、家庭责任与现代价值观念有机融合，强化学生的家庭伦理与责任担当意识，最终形成情感体验与价值认知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3. 积极构建家校协同的育人机制：推进家庭教育指导，化解代际孝道观念冲突

与传统强调“权威、服从”的孝道观念不同，当代高职学生更重视亲子之间的情感互惠、平等沟通与个性表达。这种观念差异若未被家长理解与接纳，则容易引发矛盾冲突，进而损害家庭功能与子女心理健康[11]。因此，学校应系统推进家庭教育指导工作，通过家长课堂普及新时代学生孝道观念特征、代际差异的成因等内容，引导家长采用积极、支持性教养方式，同时通过各类亲子活动，增强亲子代际对话，促进双向理解，从而共同促进学生孝道观念的健康发展，构建以尊重与协商为核心的新型家庭关系。

参考文献

[1] 赵清，王明生．新时代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道路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46(02):185-193.

[2] 邵宝文，王雪芹．孝文化对大学生身心健康影响的实证研究 [J]. 湖北工程学院学报，2025,45(01):29-34,122.

[3]YEH K H,BEDFORD O.Filial belief and parent—child conflict[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2004,39(02):132-144.

[4]YEH K H,BEDFORD O.A test of the dual filial piety model[J].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2003,6(03):215-228.

[5] 叶光辉，曹惟纯．从华人文化脉络反思台湾高龄社会下的老人福祉 [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1(03):30-46.

[6]TSAO W C,YEH K H.Indigenous implications and global applications of the dual filial piety model:a psychological re-conceptualization of ‘xiao’ [J]. Asian indigenous psychologies in the global context,2019:195-219.

[7] 傅绪荣，汪凤炎，陈翔，等．孝道：理论、测量、变迁及与相关变量的关系 [J]. 心理科学进展，2016,24(02):293-304.

[8] 钟涨宝，李飞，冯华超．“衰落”还是“未衰落”？孝道在当代社会的自适应变迁 [J]. 学习与实践，2017(11):89-97.

[9] 郭德君．社会治理视角下 00 后为主型大学生孝道现状及重塑的实证研究——基于重庆市 6 所高校 1101 份问卷调查 [J].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0(06):102-115.

[10] 李启明．孝道的代际传递及其对老人的积极效应 [D].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4.

[11] 郭筱琳，张艺凡，关岳琳，等．亲子孝道观念冲突与青少年子女抑郁的关系 [J]. 心理学报，2025,57(01):58-70.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新时代高职大学生的不同孝道观念类型、心理特征及教育策略研究”（2024GXJK804）；2024 年度广东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题“有留守经历高职学生孝道观念的现状特点与发展趋势研究”（2024GXSZ220）；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2024 年校级科研资金资助项目“高职大学生孝道观念类型、特点及教育策略研究”（茂职院〔2025〕11 号）；2024 年度茂名职业技术学院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培育项目“心理健康教育”（茂职院〔2024〕107 号）。

（作者：陈盈，茂名职业技术学院讲师、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梁燕，茂名职业技术学院讲师；通信作者沈光银，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课程思政”融入开放大学“合同法”课程的实践研究

王楠楠

摘要：立德树人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对于主要面向成人开展远程开放教育的开放大学而言，将“课程思政”有机融入专业课程教学，是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关键路径。本文以开放大学法学专业核心课程“合同法”为例，探讨“课程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程的教学实践。首先界定了“课程思政”与“教学设计”两个核心概念，并分析“合同法”课程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以混合式教学模式为依托，贯穿“课前自主学习—课中互动探究—课后实践拓展—多元综合评价”四个环节的教学设计方案，并选取“要约制度”作为典型案例进行了教学实践展示。

关键词：开放大学；课程思政；合同法；教学设计；混合式教学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核心概念界定：课程思政

近年来，“课程思政”已经成为研究热点，相关专家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其内涵进行了深入探讨与分析，形成了不同的界定。本质上，课程思政是一种综合教育理念，旨在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推动各类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协同发力，将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落到实处。

从字面构成看，“课程思政”包含“课程”与“思政”两个核心要素。“课程”指以课堂教学为主渠道，依据教学目标选用教材，在教师指导下学生获取知识的系统化过程。广义上涵盖理论课、实践课、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等所有教学形态。当“课程”与“思政”结合时，其核心指向“学科德育”的理念，即在各学科专业教学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思政”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简称，与德育、育人等概念密切相关。因此，课程思政是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三全育人”目标的重要路径[1]。

从本质要求看，201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强调“把思想价值引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和各环节”，构建教学、科研、实践、管理、服务、文化、组织育人的长效机制。课程思政正是落实这一要求的关键举措，旨在有效强化思想政治教育与价值引领功能。当前，仅依靠开放大学专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很难实现对学生进行德育的任务。因此，深入挖掘各学科专业蕴含的思政元素，促使其与思政课程形成协同效应，对实现育人目标至关重要。

综上，课程思政并非简单叠加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而是将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入学科教学的全过程与各环节，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巧妙渗透德育元素。教师在此过程中承担着教书育人的双重责任，需在各学科教学中自觉践行“思政教育”，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二）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也称“教学系统设计”，其理论体系最早是由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加涅提出的，并于 20 世纪 80 年代引入国内。关于教学设计的定义，学者给出了多种见解，如肯普的“计划说”、赖格卢特的“方法说”、乌美娜的“方案说”，以及“技术说”“程序操作说”等。其中较为权威的定义是：教学设计是运用系统方法分析教学问题和确定教学目标，建立解决教学问题的策略方案、试行解决方案、评价试行结果和对方案进行修改的过程。

从宏观层面看，教学设计旨在系统规划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教学过程等核心要素，为教师备课提供规范化框架。从微观层面而言，它要求教师针对特定学科、具体教学内容、实际教学环境以及教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潜在问题，精心策划教学活动中的各个环节，以解决实际面临的教学问题[2]。

二、“合同法”“课程思政”建设的可行性

在国家开放大学，法学的学生占很大比例，如何

在法学专业课中有效开展“课程思政”教育，既面临挑战，也蕴含机遇。基于“合同法”课程的性质与特点，分析其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行性如下：

（一）课程蕴含丰富的思政元素

“合同法”课程蕴含丰富的思政元素，其大部分教学内容均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素材。在教学过程中，可结合合同法的历史演进与具体制度的变迁，引导学生系统掌握我国合同法的基本内容，同时深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国家思想政治制度对合同法建构与发展的引领作用，从而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结合合同的定义、特征及种类等基础内容，可同步渗透平等、公平、诚信等价值理念，让学生在掌握法律知识的同时，深化对法治精神的理解。

（二）课程性质与思政教育目标存在共性

“合同法”课程是法学专业体系中的一门应用性学科，其目标是培养具备合同法学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并能熟练运用相关法律规范的专业人才。分析认为，“合同法”的课程性质与思政教育目标具有高度一致性：第一，道德属性的共通性。法律、思政教育都和道德息息相关，可以说法律、思政都具有道德的属性，在当今社会，法律和道德逐渐出现融合的趋势。第二，人格塑造的契合性。法律教育与思政教育都致力于塑造学生的健全人格与优良品性。“合同法”教学要承载起对法学专业人才基本素养与品格的导引功能。第三，方法指引的相似性。法学教育与思政教育在内容上都提供了一种方法上的指引[3]。

由此可见，“合同法”课程的课程性质及培养目标与思政教育目标具有较高的契合度。因此，专业教师应积极看待思政元素的融入。在实践路径上，一方面应注重有机融合，避免机械附加；另一方面，应立足中国实际，在阐释法律体系、规则与精神的过程中，引导学生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确保学生在法学专业学习的初始阶段即能形成正确的法治价值观[4]。

（三）课程特点与思想政治教育协同效应强

“合同法”课程是国家开放大学开放教育法学专业的必修课，同时也是教育部认定的法学专业核心课程之一。该课程多数内容天然具备思想政治教育属性，能够成为思政教育的有效素材。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合同法”课程教学，有助于以潜移默化、持续渗透的方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法治理念和制度认同，体现出专业课程在思政育人方面的独特优势，实现法律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协同推进。

三、“课程思政”融入开放大学“合同法”课程的教学设计

对于开放大学的成人学生而言，学习“合同法”不仅是为了获取学分、掌握法律技能，更是为了在其工作岗位和社会生活中更好地恪守诚信、履行承诺、维护公平。这内在要求“合同法”的教学必须超越单纯的法条释义和案例分析，深入挖掘其蕴含的契约精神、诚信原则、公平理念、社会责任等丰富的思政元素。然而，传统的单向灌输式教学难以有效实现这一目标，将“课程思政”元素通过“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为“课程思政”的融入提供了全新的载体和更为广阔的空间。该模式既强调线上资源的有效利用，又注重线下教学的深度互动，为“课程思政”的融入创造了有利条件[5]。“课程思政”融入开放大学“合同法”课程的教学设计主要包含课前自主学习、课中互动探究、课后实践拓展以及多元评价四个环节，全过程渗透课程思政元素[6]。

（一）课前自主学习阶段

在课前准备环节，教师设计了蕴含思政元素的微课资源。例如，以“契约精神”为主题，制作“中国古代契约文化”“现代诚信体系建设”等微课视频，上传至课程平台，学生在课程平台上进行学习然后完成任务。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仅要掌握要约、承诺等基本概念，还要通过案例分析体会诚信缔约的社会价值。教师通过分析平台数据，了解学生学习情况，整理学生线上提出的共性问题，特别关注学生在价值观层面的困惑，为课堂深度互动做准备。可以看出，课前自主学习阶段是需要教师与学生的相互配合，只有教师与学生配合好了，才能够完成任务。这一阶段着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价值认知能力，实现思政元素的前置浸润。

（二）课中讲授答疑互动阶段

课堂教学是价值引领的关键环节，结合开放大学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特点，兼顾远程学生与线下学生的参与度。教师根据课前反馈，设计融合知识传授与价值塑造的教学活动，避免单向灌输，突出互动性与实践性。

在新课导入环节，教师选取典型法治案例，如“诚信履约模范企业”或“合同欺诈警示案例”，设置由易到难的探究任务，引导学生合作探索。通过对比分析引导学生讨论契约精神的社会意义，结合日常生活中的合同案例，拉近法律与生活的距离，引发学生共鸣。采用情景模拟方式，让通过学生角色扮演的方式了解合同缔约过程，切身感受诚信缔约的重要性，强化价值认同。

在讲授互动环节，教师采用案例驱动教学法，设置具有道德启示的教学案例。例如，通过分析格式条款中的公平性问题，培养学生的公平意识；通过讨论不可抗力情形下的合同履行问题，引导学生理解诚实信用原则的实际应用。在每个知识点的讲解中，注重挖掘其蕴含的法治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案例分析环节是对本节课知识的强化巩固，通过对合同法案例的分析，引导学生主动回顾并运用本节课所学的合同法知识，从而加深理解，并将知识应用于生活实践。

（三）课后实践拓展阶段

课后环节注重知行合一。教师设计分层实践任务，教师根据学生的个性，制定出最低的学习任务，基础层面要求学生分析日常生活中的合同案例，识别其中的法律问题和道德因素；提高层面组织学生开展“合同审查志愿服务”，为社区居民提供简单的合同咨询。通过实践任务，促进学生将法律知识、契约精神和职业道德内化为行为准则。教师要引导学生主动参与课后实践，并多对学生进行监督。

（四）多元评价体系

建立融合知识掌握与价值认同的评价体系。在课前通过问卷测评学生的初始价值观；课中观察记录学生在案例讨论中展现的价值判断；课后通过实践报告考核学生的价值内化程度，同时采用学生自评、互评等方式，引导学生反思学习过程中的成长与收获。评价结果作为改进教学的重要依据，旨在实现“合同法”课程思政实施效果的持续优化，真正实现“以评促学、以评促教”。

四、“课程思政”融入开放大学“合同法”课程的教学实践

在“课程思政”融入开放大学“合同法”课程的教学实践中，教师选取“合同法”第二章第二节“要约制度”作为典型案例，将课程思政元素有机融入教学全过程。教学实践分为课前浸润、课堂内化、课后践行和综合评价四个环节，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深度融合。

（一）课前浸润：价值认知的初步构建

课前学习是价值引领的起点，适配开放大学远程自主学习模式。教师提前三天在课程平台上传设计的教学资源，首先发布微课《合同法学课堂——要约制度》，微课的主要内容是对合同法的要约制度进行讲解，之后上传《一诺千金：中华传统契约文化中的诚信精神》思政专题微课，该微课通过古今案例对比，阐释要约制度背后蕴含的诚信价值。同时发布的学习任务清单中，专门设置价值辨析题，要求学生观看微课后，不仅掌握要约的含义和构成要件等基础知识，还要在讨论区提交学习感悟，特别要反思案例中的价值冲突问题，初步构建对契约精神的认知[7]。

（二）课堂内化：价值冲突的深度辨析

课堂教学是价值内化的关键环节。第一，价值引领导入。在课程最开始的地方，我们先回顾一下知识点，重点展示课前讨论中学生在价值观层面的典型困惑，引出“诚信缔约”的核心主题，强化学生的情感认同。第二，深度互动探究。教师设计层层递进的教学活动。首先，开展小组合作学习，分析“艺术家赠三层楼”“好意施惠”等案例，引导学生在讨论中体会意思表示的真实性与诚信原则的重要性。随后，教师在精讲知识点时，着重剖析要约不可撤销制度所体现的“保护合理信赖”原则，强调其维护交易安全、制裁背信行为的价值导向。最后，通过“格式条款中的公平问题”等生活化案例，组织学生小组讨论，让学生深刻理解合同法追求实质公平、保护弱势群体的社会功能，培养其公平意识和正义感[8]。

（三）课后践行：价值理念的行动转化

课后环节注重知行合一。教师布置分层实践任务，基础层完成形考任务中的练习题；提高层分析一个反映诚信缺失的真实案例并撰写评析报告；创新层参与“合同审查志愿服务”或设计一份“诚信缔约倡议书”。同时，教师上传拓展微课《要约的消灭与违约责任中的诚信考量》，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合同全生命周期中的道德要求。通过实践任务，促进学生将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和内在品格。

（四）综合评价：价值塑造的效果评估

建立多元综合评价体系，将价值认知、知识掌握与实践能力纳入考核范围，适配开放大学混合式教学评价需求。线上评价（40%）包括微课完成度、讨论区发言的价值倾向性、课后实践作业体现的价值理念；线下评价（40%）包括课堂讨论中的价值判断、案例分析的深度、模拟实践的表现；思政素养专项评价（20%）通过学生的反思报告、实践成果中展现的诚信意识、公平观念、社会责任感等进行质性评价。同时，通过问卷和访谈，全面了解学生价值观的变化，结合学生的职业需求优化教学内容与方式，为持续改进教学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1] 杨薇 . 课程思政背景下中职英语教学策略研究 [D]. 重庆 : 西南大学 ,2021.

[2] 林宪生 . 教学设计的概念、对象和理论基础 [J]. 电化教育研究 ,2000(04):3-6.

[3] 刘言强 , 王雪晴 .“微课”应用于职业教育的思考 [J]. 山西青年 ,2020(07):193.

[4] 胡紫薇 . 微课在初中信息技术课程教学中的设计与应用研究 [D]. 武汉 : 华中师范大学 ,2017.

[5] 王玉杰 . 微课在中职数学课堂教学导入中的应用研究 [D]. 济南 : 山东师范大学 ,2016.

[6] 贝宇婷 . 基于微课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初中物理实验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D]. 天津 : 天津大学 ,2020.

[7] 黄丽 . 基于微课的混合式教学在中职的应用研究 [D]. 贵阳 : 贵州师范大学 ,2019.

[8] 林旭阳 . 基于微课的中职《计算机组装与维护》混合式教学实践研究 [D].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 ,2021.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开放与远程教育专业委员会科研课题“‘课程思政’融入开放大学《合同法》课程的实践研究”（KYKFYB25003）。

（作者单位：丹东开放大学）

传统文化在辅导员思政教育工作中的渗透与育人效果研究

谢晓旭　孙　涛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思政教育资源，是传承民族精神、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辅导员作为高校思政教育的一线力量，其工作与学生成长紧密相关，将传统文化渗透其中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本文立足辅导员工作实际，深入探讨传统文化渗透的价值意蕴，系统分析当前存在的辅导员素养不足、渗透方式单一、协同机制不完善等现实问题，构建多维度渗透路径，阐述其在增强学生文化认同、优化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育人成效，并提出针对性优化策略，为提升高校思政教育质量、培养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新时代青年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关键词：传统文化；辅导员；思政教育；渗透路径；育人效果

一、引言

在全球化深入推进、多元文化交织碰撞的时代背景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青年一代文化自信，成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支撑。高校作为文化传承与人才培养的核心阵地，肩负着培育具有深厚文化底蕴与正确价值导向时代新人的使命。辅导员作为高校思政教育的一线执行者，兼具思想政治引导与日常管理服务职能，与学生联系紧密、互动频繁，是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的关键纽带。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家国情怀、道德准则、人文精神等核心内涵，与思政教育的价值导向高度契合，能够有效丰富教育内容、提升教育感染力。当前，传统文化在渗透过程中仍面临辅导员素养不足、方式创新欠缺、协同机制不完善等现实问题。本文聚焦这一课题，探索科学可行的渗透路径与优化策略，为提升高校思政教育质量提供实践指引。

二、传统文化在辅导员思政教育中渗透的价值意蕴

（一）丰富教育内容，增强思政教育实效性

当前部分思政教育工作存在内容抽象、形式单一等问题，难以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大量鲜活素材，为思政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内容支撑。从儒家“仁爱”“诚信”的道德准则，到道家“道法自然”“修身养性”的人生智慧；从历史名人的家国担当，到民间故事的价值导向，这些内容能够使思政教育从抽象理论走向具体实践，变得更加生动鲜活、贴近生活[1]。辅导员将这些元素融入日常思政教育，能够有效弥补传统思政教育的不足，提升教育的吸引力与感染力，让学生在文化浸润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价值引领，切实增强思政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二）营造校园文化氛围，构建和谐育人环境

辅导员在思政教育工作中渗透传统文化，能够丰富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营造出和谐向上的育人氛围。通过组织传统节日庆祝活动、传统文化主题讲座、非遗体验等活动，让学生在校园中随时随地感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在辅导员的工作中，也会通过引导学生成立汉服社、书法社、戏曲社等文化社团，来进一步激发学生参与传统文化传播的积极性，形成“人人传承文化、处处浸润文化”的校园氛围。这种文化氛围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思想行为，促进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良性互动，构建和谐融洽的育人环境。

（三）培育学生道德品质，夯实价值认同根基

传统文化中包含系统的道德规范与价值理念，是学生品德养成的重要资源。辅导员将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内容融入思政教育，能够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认知，规范自身行为。通过学习传统文化中的修身理念、处世原则与责任意识，学生能够逐步形成良好的道德习惯与人格素养，自觉践行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对国家、民族及文化的认同感不断强化，为其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奠定坚实基础。

（四）提升学生文化素养，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传统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与历史智慧，是提升学生综合素养的重要载体。辅导员在思政教育中渗透传统文化，能够帮助学生系统了解中华历史、文学艺术、传统习俗等内容，拓宽知识视野，提升文

化底蕴。学生在学习与实践中深刻认识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与时代意义，能够增强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自觉承担起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成长为具有坚定文化立场、深厚文化素养的新时代青年。

三、传统文化在辅导员思政教育中渗透的现实问题

（一）辅导员传统文化素养有待提升

一般情况下辅导员都是来自不同专业、不同地区的优秀教育工作者，往往拥有较少的传统文化学习经历，对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历史渊源与时代价值理解通常不够深入准确。在开展思政教育工作时，很多都只能简单提及传统文化的表面元素，难以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思想精髓与育人价值，导致传统文化渗透流于形式[2]。同时，一些辅导员缺乏将传统文化与思政教育有机结合的能力，无法根据教育目标与学生特点选择合适的渗透内容与方式，从而影响渗透效果。辅导员在授课过程中也会存在内容零散、缺乏规划的问题。部分辅导员仅根据个人兴趣或节日节点随意选择渗透内容，没有形成完整的内容体系，导致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碎片化。并且在渗透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未能充分结合学生的专业特点、认知水平与成长需求，缺乏系统性与针对性，难以实现精准渗透。

（二）渗透方式创新不足，缺乏吸引力

在渗透方式上，多数辅导员仍以传统的讲授、宣传为主，形式较为单一，缺乏互动性与体验性。这种单向的传播方式很难满足新时代学生的学习需求，无法充分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虽然部分辅导员尝试组织传统文化活动，但组织的活动形式往往与之前的活动未能有所区别，很难与现代学生的生活方式、兴趣爱好相结合，导致学生参与度不高，传统文化渗透工作难以达到预期育人效果[3]。

（三）协同育人机制不完善，渗透合力不足

传统文化在思政教育中的渗透需要学校、家庭、社会等多方力量的协同配合，但当前缺乏完善的协同育人机制。在校内，辅导员、思政课教师及专业教师经常进行独自教学与提升，彼此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协作，未能形成育人合力。在校外，学校与家庭、社会文化机构的联系不够紧密，他们未能认识到传统文化对于学生发展的影响，经常会忽视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在数字化资源快速发展的进程中，未能充分将两者进行有效融合，严重制约了育人效果的最大化。

（四）评价反馈机制缺失，难以持续优化

当前传统文化的渗透工作缺乏科学完善的评价反馈机制，无法全面准确地评估渗透效果。评价内容往往侧重于学生参与活动的次数、知识掌握的程度等数量指标，忽视了学生在情感态度、价值观念、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心理变化与思想上的变化，往往缺乏多元化的评估手段[4]。同时，对评价结果的应用也不够充分，未能根据评价反馈及时调整渗透策略、优化渗透内容与方式，导致传统文化渗透工作难以持续改进与提升。

四、传统文化在辅导员思政教育中渗透的育人效果

（一）学生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显著增强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而深入的浸润中，学生群体对这一文化体系的理解程度呈现出显著提升，不仅全面把握了其深厚的思想精髓，更深刻地意识到了其在当代社会的独特意义。他们逐渐将自身角色从传统文化的受容者转变为积极的传播者，积极参与各类文化实践，自觉承担起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进而增强了其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这种深层次的文化认同最终转化为坚定的文化自信心，使他们在面对多元化的文化影响时，能够保持独立思考，坚持独特的民族文化立场，并主动投身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事业中。

（二）学生道德品质与价值观念不断优化

传统文化的道德理念和价值取向对学生起着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使学生道德素质得到提高，在日常生活中自觉遵守诚信友善、尊老爱幼、团结互助等传统准则，表现出尊重他人、关爱他人的真挚情感，进而显著增强社会责任感和爱心。

（三）学生综合能力与人文素养全面提升

传统文化的有效渗透，为学生综合能力与人文素养的全面提升提供了一条重要的途径。学生通过参与文化主题班会策划、传统节日庆典组织、非遗社会实践等各类活动，在实践活动当中持续锻炼组织协调、沟通表达和团队协作能力；通过书法绘画学习、传统手工艺制作、传统文化主题作品创作等实践，审美情趣与创新能力得到显著提升[5]。

（四）校园文化氛围更加和谐浓厚

传统文化在校园内得到广泛应用，使校园文化内涵更加丰富，表现形式更加多样，逐步形成了具有独特识别度的文化品牌。依托校园文化长廊、校报专栏、校园广播等多元化的传播渠道，对传统智慧和精髓进行系统性的传播，每月定期开展文化研讨活动，每季度组织一次非遗实践活动，在节日里举办特色文化表演，共同构筑起一个层次分明的校园文化体系。这样一种体系化的实践，使学生一直处在深厚的文化情境之中，进而达到精神上的深刻塑造。同时，积极的文化交流有助于促进学生思想进步、增强集体认同感，改善师生、同伴关系，构建和谐互助的校园生态。这一过程既充实了校园的文化内涵与艺术气息，又强化了学生的归属感与团队意识，为思政教育工作开展筑牢根基，塑造起“润物无声、知行合一”的教育格局。

五、传统文化在辅导员思政教育中渗透的优化策略

（一）完善内容筛选机制，增强渗透针对性

构建科学的传统文化内容筛选机制，坚持思想性、

时代性、针对性相统一的原则。结合思政教育目标与学生成长需求，筛选出能够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传统文化内容；根据学生的专业特点、认知水平与兴趣爱好，分类设计渗透内容，增强内容的针对性与适用性。同时，注重传统文化的时代转化，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发展相结合，挖掘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使传统文化能够更好地适应新时代学生的需求，真正融入学生的学习与生活。

（二）创新渗透模式，提升渗透吸引力

不断创新传统文化渗透的方式，丰富渗透的形式，提高互动性、体验性。除传统课堂教学、主题活动之外，积极探索传统文化与新媒体、实践体验、学科融合的新型渗透方式。将传统文化与专业课程相结合，在理工科专业中加入传统工匠精神，在文科专业中深化传统文化经典解读；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项目，让学生亲身感受传统文化魅力；鼓励学生自主创新，开展传统文化主题设计、文创产品开发等实践活动，充分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和创新活力。

依托短视频平台、校园直播、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途径，定时发布传统文化科普短视频、非遗技艺展示、经典诵读打卡等信息，打破时空束缚，拓展渗透覆盖范围，联合地方文化馆、非遗传承基地开展研学实践活动，带领学生亲身体验传统技艺、调研文化遗产保护情况，在艺术类专业课程中加入传统书画、戏曲元素，在经管类专业课程中剖析传统文化产业经营与革新事例，让不同专业的学生找到文化共情点，切实提升渗透的精准度和吸引力。

（三）构建协同育人体系，形成渗透合力

建立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体系，整合各方资源，形成传统文化渗透的合力。在校内，加强辅导员与思政课教师、专业教师、行政管理人员之间的沟通协作，明确各方职责，统筹规划传统文化教育工作，实现教育资源共享；在校外，加强与家庭的联系，通过家长会、家校微信群等渠道向家长宣传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引导家长重视家庭文化教育，与学校形成育人合力；积极整合社会资源，与博物馆、文化馆、非遗保护中心等文化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学习机会，拓展传统文化渗透的空间与渠道。

（四）建立科学评价机制，促进持续优化

构建科学完善的传统文化渗透评价机制，全面评估渗透效果。评价内容应涵盖学生的文化认知、情感态度、行为实践等多个层面，既包括传统文化知识的掌握情况，也包括学生道德品质、价值观念的变化以及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等；文化认知可细化为经典文献了解程度、传统技艺掌握情况，以情感态度明确文化认同度与传承意愿，行为实践纳入日常践行传统美德的具体表现。评价方式应多样化，采用问卷调查、访谈、观察、作品分析等多种手段，结合月度数据统计、学期综合评定全面收集评价信息；建立评价反馈机制，成立专项小组分析结果，及时将评价信息反馈给辅导员与相关部门，针对内容适配性、形式吸引力等问题，及时调整渗透策略，优化渗透内容与方式，持续提升传统文化渗透工作的质量与水平。

六、结论

本研究系统探讨了传统文化在辅导员思政教育中的渗透价值、现实问题、育人效果及优化策略，得出核心结论：传统文化中家国情怀、道德规范等元素与思政教育目标高度契合，其有效渗透能显著增强学生文化自信、优化价值观念、提升综合素养并营造和谐校园氛围。当前渗透工作面临辅导员素养不足、方式创新欠缺、协同机制不完善、评价反馈缺失等现实问题。构建完善内容筛选、创新渗透模式、构建协同体系、建立科学评价的优化路径，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与实践指导价值。未来仍需在传统文化时代转化、跨主体深度协同等方面持续发力，本研究成果对提升高校思政教育质量、培养新时代文化自信青年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 杨国丽 . 高校辅导员视角下传统节日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路径探析 [J]. 公关世界 ,2025(09):187-189.

[2] 胡唯唯 . 高校辅导员工作室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的三重维度与实践创新——基于河南三大文化遗产研修的探索 [J]. 河南教育 (高教),2025(09):62-63.

[3] 陈蕾 , 严聪蓉 , 宋雨婷 .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辅导员思政教育的标准化路径研究 [J]. 中国标准化 ,2025(20):248-251.

[4] 李思蕾 . 基于人工智能与传统文化融合的高职院校辅导员谈心谈话实效性提升研究 [J]. 鹿城学刊 ,2025,37(03):85-88,96.

[5] 张永媛 , 徐天福 . 高校辅导员开展优秀传统文化育人的实践路径研究 [J]. 中原文化与旅游 ,2025(11):222-224.

（作者单位：张家口学院）

新媒体时代下某 App 对高校思政教育实效性的影响

李秉轩

摘要：传统的思政教育模式难以满足“00 后”大学生多样化的需求。新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信息传播模式，某 App 作为短视频领域的标杆平台，以其简单、快捷、高互动性、高沉浸的传播特点，深度融入了“00 后”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本文立足高校思政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系统地分析了某 App 对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双重影响，并结合当前教育中的实际困境，从四个维度提出了优化的途径：内容创新、平台建设、队伍建设与机制改善，为提高高校思政教育实效性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某 App；高校思政教育实效性

一、核心概念

（一）新媒体时代

新媒体时代是一个信息传播的时代，其特点是互动性、多样性、即时性。其优势是打破传统媒体的时空壁垒，实现信息的快速传播，形成一个多样化的传播生态系统，并对社会生产生活的所有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思政教育实效性

高校思政教育实效性是指在思政教育活动中实现立德树人目标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具体表现为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水平的提升、积极价值观的形成以及自觉实践道德行为的认知。评价的主要方面是教育内容的吸引力、教学方法的适用性、价值管理的渗透性、学习者作为主体的参与积极性等。

（三）某 App 的传播特性

某 App 作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短视频平台，其传播特性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内容简洁。时长集中在几秒钟到几分钟，在短时间内呈现核心信息，符合碎片化阅读习惯。第二，传播即时性。基于移动互联网，内容可以快速分发，允许随时随地查看和共享。第三，深化互动。建立多向交互机制，通过点赞、评论、分享和合拍功能来提高用户的参与度和沉浸感。第四，算法个性化。根据用户的兴趣推送内容，提升信息传播的精准性，这也导致了信息的同质化和认知固化。

二、某 App 对高校思政教育实效性的积极影响

（一）创新教育传播渠道，突破时空局限

传统的思政教育主要依靠课堂教学，形式较为单一，同时会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某 App 构建了“指尖上的思政课堂”，打破了传统教育的时空壁垒，使思政教育从“固定课堂”延伸至“移动场景”。高校可以通过某 App 账号发布思政类短视频，平台将党史故事、理论解读、榜样事迹等内容推送给学生，学生可利用课余碎片时间随时学习，实现“时时可学、处处可学”的教育愿景。例如，上海交通大学开设的首批高校思政类建设账号，不仅推出微短剧《无名汇单》传递感恩精神，还通过账号讲述教授坚守科研岗位的故事，将思政教育与科研精神、校园文化深度融合，多篇原创内容获评思政类“十佳”作品。

（二）丰富教育内容供给，增强吸引力

传统思政教育的内容主要是理论文本，其表现形式较为单一、抽象，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某 App 可以提供音频、视频、动画、文字、图像等不同形式的内容，将抽象的思想政治理论转化为具体的视听资料。高校可以通过再现革命历史场面、采访先进人物、进行政策解读、红色文化宣讲，制作思想政治教育短片。罗青的研究表明，《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的 App，正能量内容得以广泛传播，为高校意识形态和政治内容创作提供了有效指导[1]。与此同时，某 App 平台拥有大量高质量的思想政治资源，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库，有效弥补了传统教育资源的不足。

（三）优化教育互动模式，强化主体参与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采用“教师讲、学生听”的单一模式，学生的参与程度较低。某 App 具备“教师和学生”互动功能，形成了一个多方位的互动教育生态系统，学生可以在评论区发表意见和提问，老师给予回应和解答，形成了平等的对话和交流氛围。学生

可以从“被动接收者”转变为“主动接收者”，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创作和传播，不仅增强了学生的主动意识，而且通过观点的碰撞和融合，使思想政治理论内化于心，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例如，高校发起的“红色故事我来讲”话题挑战，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与学习主动性[2]。

（四）降低教育成本，提升资源利用率

某 App 的低门槛特性为高校思政教育提供了优势。在视频制作方面，一部智能手机和剪辑软件即可完成视频的拍摄和剪辑，不需要复杂的设备和大量投资，还有免费的交流渠道，可以使全国各高校的教师一起交流探讨，使得大家互相学习。在视频传播方面，某 App 通过算法可以精准推流，高校可以通过官方账号将视频内容精准地推送给学生，实现教育资源共享，从而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有效实现教育低成本高效益的目标，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思政教育的实效性[3]。

（五）打造沉浸式育人场景，深化学生价值情感认同

某 App 支持视频、虚拟仿真、全景影像等多元媒介形式的融合呈现，能够将宏大的思政主题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的沉浸式教育场景[4]。高校可通过该平台制作红色历史场景还原、“时代楷模”事迹实景拍摄、国家发展成就全景展示等短视频内容，让学生突破传统课堂的平面化认知局限，以“第一视角”感受革命历史的艰辛、时代发展的成就与榜样精神的力量[5]。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模式，打破了思政教育中理论与现实的间隔，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推动其从对思政理论的理性认知向情感认同与价值信仰的深度转化，相较于传统的文本讲授模式，更能让主流价值观在学生心中落地生根。

（六）链接社会思政资源，拓展大思政育人场域

某 App 作为开放式的新媒体平台，突破了高校思政教育的校园边界，实现了校园思政资源和社会思政资源的深度链接与融合。高校可通过该平台与社会各界合作，邀请一线劳动者、“时代楷模”、基层党员等社会群体参与思政短视频创作，将田间地头、工厂车间、边防哨所的真实故事与价值追求融入教育内容；同时，平台汇聚的全国范围内的优质思政资源，如各地红色纪念馆的线上讲解、主流媒体的时政解读、高校的精品思政课程等，也为学生提供了跨地域、跨领域的学习素材[6]。这一模式推动了高校思政教育从“校园小课堂”走向“社会大课堂”，构建起校社协同的大思政育人格局，丰富了教育内涵与实践场域。

三、某 App 对高校思政教育发挥实效性需要注意避免的问题

（一）知识碎片化传播，阻碍系统认知

某 App 的一大特点就是其呈现的视频内容较为碎片化，因而思政类短视频往往只能聚焦某一个知识点，难以对复杂思想进行深度解读和系统梳理。大学生长期接触碎片化内容，容易形成“浅尝辄止”的学习习惯，满足于获取零散的信息，缺乏对理论体系的整体把握，难以理解核心概念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例如，有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短视频，只介绍某一视角，而忽略其产生的历史背景、理论联系和实践意义，容易使学生形成片面的认知。这种碎片化学习不仅削弱了思想理论的深度，还会使学生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认识，阻碍其对主流价值观的系统理解和认同。

（二）算法推荐陷阱，加剧“信息茧房”

某 App 的推流算法是基于用户的兴趣标签进行推送，容易让使用者陷入“信息茧房”的困境。使用者可以主观地点击“喜欢”与“不感兴趣”，从而使观看到的视频都是自己喜欢的、相似的内容，长此以往便会陷入“信息茧房”效应[7]。教育部 2024 年专项调研显示，23% 的学生出现“娱乐化认知”倾向[8]。大学生若长期关注某一类思政内容，算法会持续推送相关信息，导致其信息接触面狭窄，难以接触到多元视角与不同观点，逐渐形成思维固化[9]。这种“信息茧房”不仅限制了大学生认识的视野，妨碍了辩证思考能力的培养，还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覆盖面与穿透力[10]。

四、某 App 赋能高校思政教育实效性提升的优化路径

（一）深耕优质内容，构建精品化思政资源库

1. 坚持内容为王，突出思想性。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史国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核心内容，制作具有思想深度的短视频，避免内容浅表化与娱乐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11]。借鉴《人民日报》某平台账号的内容创作经验，将理论解读与社会热点结合，通过案例分析、情景演绎等形式，阐释理论的现实意义。

2. 创新呈现形式，增强吸引力。融合动画、微电影、访谈、数据可视化等多种形式，将抽象理论转化为具象化内容，提升内容的视听体验。发挥不同专业学生的特长，打造兼具专业性与思想性的思政短视频，如文史类专业学生解读红色经典、艺术类专业学生创作思政文创作品等，实现“专业 + 思政”的深度融合。

3. 搭建内容矩阵，实现系统化传播。针对知识碎片化问题，构建“核心理论 + 分支知识点 + 实践案例”的内容体系，通过系列化短视频呈现完整的理论框架。例如，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制作理论解读、实践成就、青年担当等系列视频，引导学生形成系统认知。

（二）优化平台建设，打造立体化育人阵地

1. 构建官方新媒体矩阵。整合某平台账号、微信

视频号、微博等平台资源，建立高校思政官方账号矩阵，实现内容的多平台同步传播。在某平台打造特色思政品牌栏目，如“思政微课堂”“榜样面对面”等，形成稳定的内容输出机制，增强用户黏性。

2. 强化算法正向引导。与平台方合作，优化算法推荐机制，在学生兴趣标签基础上，主动推送优质思政内容，打破“信息茧房”。教育部《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2023 年版）》明确要求，要创新思政教育传播渠道，提升主流价值观的触达率。设置思政内容专题专区，方便学生检索学习，提升优质内容的触达率，确保思政教育内容在学生信息接收中占据重要比重。

3. 完善互动机制。建立“教师—学生”“学生—学生”双向互动平台，教师通过某 App 评论区、直播等形式，及时回应学生疑问，开展线上讨论。定期发起思政话题挑战、短视频创作大赛等活动，鼓励学生参与内容创作与传播，增强主体参与感，形成良性互动的育人氛围 [12]。

（三）强化队伍建设，培育复合型思政育人力量

1. 提升教师数字素养。开展新媒体技术培训，使思政课教师掌握短视频拍摄、编辑、运营等技能，具备独立创作优质思政短视频的能力。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提升教师对网络信息的辨别能力、舆情应对能力与价值引导能力，适应数字时代思政教育的需求。

2. 组建跨学科育人团队。整合思政课教师、传播学专家、计算机技术人员、专业课程教师等多方力量，形成跨学科创新团队，共同参与思政内容策划、制作与传播，提升内容的专业性与传播效果。建立校企联动的“双师型”培养机制，联合互联网企业开发智能备课系统，自动生成融合时政热点的教学案例库。

3. 打造思政教师 IP 品牌。鼓励思政课教师以个人身份开设 App 账号，打造个性化思政 IP，通过亲切、接地气的风格与学生互动交流，增强思政教育的亲和力。发起思政短视频创作大赛，提供 AI 脚本助手和素材模板库协助学生创作，鼓励学生用 Vlog 记录红色地标。还可将某 App 内容作为翻转课堂预习素材，配套影评沙龙等活动，形成“观看—互动—创作”的育人闭环。

（四）健全协同机制，构建长效化育人体系

1. 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打破校园界限，整合高校、家庭、社会三方资源，形成育人合力。通过家长微信群、线上家校互动平台，及时沟通学生思想动态；校级主打品牌活动，院系挖掘专业特色，班级凝聚榜样力量；运用某 App 算法，发起“我的入党故事”等话题，以第一人称叙事触发推荐机制；选拔学生骨干培育红色传播社群，形成“平台—内容—社群”的传播格局；与主流媒体、地方政府合作，挖掘社会中的思政教育资源，制作优质短视频，拓展思政教育的实践场域。

2. 建立舆情预警与管控机制。利用大数据技术构建舆情监测平台，实时跟踪某 App 平台上与高校、学生相关的舆情信息，及时识别潜在风险。创建基于深度学习的敏感信息识别模型，实现错误思潮信息的实时拦截，制定舆情应对预案，对负面舆情快速响应、有效引导，营造健康的网络育人环境。

3. 优化教育评价机制。将学生在某 App 平台的思政内容学习时长（如红色理论短视频观看、思政专题直播参与时长）、互动参与度（含点赞评论、话题讨论、答题闯关完成度等）、创作成果（包括原创思政 Vlog、理论解读短视频、红色主题表情包等）系统纳入思政教育考核体系。明确各项指标的量化权重，构建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的多元评价模式，通过实时记录学习轨迹、动态反馈参与情况、客观评定创作质量，充分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引导其从被动接收转向主动参与、深度思考，进而提升思政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五、结语

某 App 作为新媒体时代的重要传播载体，对高校思政教育实效性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其创新了教育渠道、丰富了内容供给、优化了互动模式、降低了教育成本，为思政教育的守正创新提供了新机遇；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知识碎片化、内容泛娱乐化、信息茧房、舆情管控难度加大等挑战，制约了思政教育实效性的提升。高校要充分发挥某 App 的技术优势，规避潜在风险，通过深耕优质内容、优化平台建设、强化队伍建设、健全协同机制等路径，推动某 App 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

参考文献

[1] 罗青 . 主流媒体短视频内容生产与传播策略——以人民日报某 App 号为例 [J]. 传媒 ,2020(22):44-46.

[2] 王萌苏 . 逻辑、困境与提升 : 短视频热潮下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探析 [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21,37(01):124-128.

[3] 陈永福 , 王小梅 . 提升主旋律短视频国际传播力研究 [J]. 理论与评论 ,2021(03):91-96.

[4] 求是网评论员 . 抢占短视频思政育人的新阵地 [J]. 求是 ,2026(04):78-82.

[5] 高娟 . 融媒体场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交互模式的运行策略研究 [J].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44(03):88-95.

[6] 杜昀 . 融媒视阈下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融合创新研究 [J]. 传媒 ,2022(03):80-82.

[7] 李凯林 . 谣言、信息茧房与群体极化 : 短视频平台网络暴力的治理 [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23(03):106-113.

[8] 教育部高校思政司 .2025 中国新媒体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蓝皮书 [M]. 北京 :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5.

[9] 张少元 , 权晓晨 . 困境与破解 : 信息茧房效应下当代青年精神生活的审视 [J]. 山西青年职业学 （下转 222 页）

基于思政引领的高职生创新创业与就业公司孵化机制研究

冯国峰　谭晓宇　陈尔雷　简俊岭

摘要：将思政教育融入高职学生的创业就业指导体系中，有助于学生塑造较合理的创业思维，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担当意识，从而提升其整体素养以及职场适应能力。本文基于思政引领，聚焦高职生创新创业与就业公司孵化机制，明晰思政融入的价值逻辑，从机制构建维度，深入剖析思政赋能、流程运转、协同联动等环节，提出思政课程浸润、孵化流程思政嵌入、校政企协同育人等策略，为高职双创教育及就业生态优化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助力培育兼具专业能力与家国情怀的高素质创业人才。

关键词：高职生；孵化机制；思政引领；创新创业；职业教育改革

职业院校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核心阵地，肩负输送创新创业型人才的使命。创新创业教育不仅是缓解就业压力的有效措施，更是培育具有创新精神以及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的关键。而在当前产业发展新形势下，随着技术更新迭代、产业转型升级的加速推进，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内涵也随之改变[1-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把创新创业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推进协同育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3]。江苏省《关于做好2024年职业院校学生创新培育计划项目申报和2023年立项项目结项的通知》（苏教职函〔2024〕27号）强调：“深化双创教育改革，释放职业院校双创活力，引导学生开展创业实践。”[4] 探究思政引领的高职生创新创业与就业公司孵化机制，既是响应政策、深化职教改革的必然选择，也能为高职生创业与公司孵化提供支撑，推动职教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一、思政引领下高职生创新创业与就业公司孵化机制的内涵阐释

（一）机制的构成要素

高职教育在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并重、专业设置对接产业需求、教育教学改革深入推进的进程中，面临着就业压力增大、就业结构矛盾突出以及创新创业成为新趋势的复杂形势。从政策导向来看，需求主导的劳动力市场下扩大就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仍是当前和未来公共就业政策调整的主要方向。正是基于对职业教育价值的重新认知，随着国家陆续出台各种与教育相关的政策，人们逐渐意识到许多职业院校毕业的学生也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5-7]。高职院校作为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的主要阵地，不仅要求学生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还要求学生具有较高的职业素养和思想政治水平[8]。基于这一培养目标，思政引领下的高职生创新创业与就业公司孵化机制，以价值引领、流程运转、协同保障为核心要素，共同构建完整体系。价值引领作为机制的灵魂，依托思政教育，将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感等精神内核融入高职生创新创业理念，为创业方向与就业公司发展确定服务社会、推动行业进步的价值坐标。流程运转聚焦就业公司从创意萌发到实体运营的全周期，在创意挖掘、筹备落地、持续运营各环节，融入思政考核、伦理监督等内容，保障孵化过程既具备专业商业逻辑，又饱含社会价值追求。协同保障作为机制运行的支撑骨架，依托校政企三方资源，搭

（上接221页）

院学报,2023,36(04):14-19.

[10] 陶飞燕，程程，张倩倩.短视频“信息茧房”现象研究——以大学生受众为例[J].新闻研究导刊，2020,11(20):42-43.

[11] 习近平.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J].求是,2016(19):3-8.

[12] 高家军.主旋律短视频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机理与优化路径[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3(05):143-149.

（作者单位：佳木斯大学）

建思政教育、双创实践、企业需求衔接的协同网络，汇聚育人合力，为机制高效运转提供资源与环境保障。三者相互关联、协同作用，推动孵化机制有序运行。

（二）机制的运行逻辑

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指引下，高职院校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与提升显得尤为重要。复合型、创新型的人才需求对高职院校的创新创业教育提出了高要求和新挑战[9-10]。而思政引领下的高职生创新创业与就业公司孵化机制，正是以思政教育为思想引擎，驱动高职生创新创业意识觉醒。思政教育传递家国责任与社会需求认知，引导学生从社会发展痛点，如特定行业人才短缺、服务空白等方面挖掘创业机会，以聚焦安全管理人才缺口衍生就业公司创业方向为例，实现思政启思、发现需求、锚定方向的初始链路。进入孵化流程后，思政元素贯穿始终。筹备阶段明确社会服务使命，让就业公司从诞生就具备价值底色。运营阶段以责任共识化解管理矛盾，将思政力量转化为团队协作与抗风险动力。验收阶段以社会价值为评价标尺，倒逼公司坚守初心，形成思政融入、流程赋能、价值坚守的运转闭环。同时，校政企协同作为动力齿轮，学校输出兼具思政与双创素养的学生，为机制提供人才原料。企业提供实践场景与市场反馈，反哺教学优化。政府以政策资金引导，激活三方联动活力，最终构建思政引领、流程驱动、协同保障的闭环逻辑，推动机制持续高效运转。

二、基于思政引领的高职生创新创业与就业公司孵化机制构建策略

（一）思政课程浸润机制：筑牢双创思想根基

创新创业教育是根植于中华大地的、培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因而要融入课程思政教育[11]。例如可结合高职教育“产教融合”特色，在课程开篇便以“大国工匠的创业初心”为切入点，通过讲述航天领域技能人才攻坚克难、助力国家科技发展的创业故事，让学生直观感受创新创业与国家需求的紧密关联。基于这一理念，高职院校构建“思政＋双创”课程体系，需从教学内容重塑与教学方法创新双向推进。在教学内容上，教师整合思政元素与双创知识，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中“推进协同育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融入创新创业基础课程，讲解政策对创新创业人才的价值期许。教师引入红色创业案例，如老一辈创业者扎根实业、报国为民的事迹，阐释创新创业的社会价值，厚植学生家国情怀。同时，教师结合江苏省职业院校创新创业培育计划，分析本地新能源、智能制造等重点产业的双创政策导向，引导学生思考创业如何服务地方发展。在教学方法上，高职院校运用案例教学、情景模拟等多元形式，设置“创业方案设计＋社会价值论证”双任务，让学生在规划商业路径时，同步阐述“创业如何解决社会问题、创造公共价值”，促使思政要求内化为创业思维。高职院校还可开展“思政双创辩论会”，围绕“创业逐利与社会担当能否兼顾”等话题研讨，深化学生对思政引领双创的认知，让课程成为思政赋能双创的主阵地，为就业公司孵化筑牢思想根基。此外，高职院校还可进一步推动“实践育人”，通过组织学生参与乡村振兴、社区服务等真实创业项目，使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自觉体认社会责任与时代使命，实现思政教育从课堂认知到行动以及实践的升华，真正塑造兼具创新精神与家国情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二）孵化流程思政嵌入机制：塑造责任型创业实体

目前部分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具体实施过程中，偏重理论教学，而实践教学环节相对薄弱。创新创业教育注重实践教学，通过参与创业项目、模拟公司经营等活动，学生不仅提升了实践能力，还学会了如何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操作[12-13]。为破解这一问题，高职院校打造“全流程思政”的就业公司孵化路径，需细化各阶段思政融入举措，实现价值培育与创业实践深度融合。在筹备阶段，高职院校建立“创业伦理审核机制”，要求学生提交“社会价值承诺书”，明确就业公司使命。以安全管理类公司为例，创业学生团队需承诺保障人才培养质量、助力行业安全发展，从源头锚定公司社会价值方向。高职院校设置伦理答辩环节，由思政教师、行业专家组成评审团，围绕“创业是否符合公序良俗、能否解决社会痛点”提问，筛选兼具商业潜力与责任担当的项目。运营阶段，高职院校开展“思政赋能运营”系列活动，如“思政下午茶”，组织创业学生团队分享行业正能量故事、探讨运营中的责任难题。高职院校举办“责任故事会”，邀请优秀创业者讲述“以担当促发展”的经历，引导创业学生团队以协作、奉献精神化解管理冲突，将思政共识转化为运营动力。高职院校还可设置“社会价值积分制”，对就业公司参与公益培训、行业帮扶等行为积分，作为后续资源支持依据。验收阶段，高职院校构建“多维社会价值评价体系”，从人才输送社会效益、行业贡献度等维度考核就业公司，引入企业、社区、行业协会等多元评价主体，替代单一经济效益评估，推动就业公司从“逐利”向“价值创造”转型，让思政元素成为孵化流程的内生基因，塑造有担当的创业实体。在此基础上，高职院校还需要进一步建立“思政嵌入长效追踪机制”，对已孵化公司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进行持续评估与反馈，将其作为典型案例反哺课堂教学，形成“实践—评价—反馈—优化”的育人闭环，使高职生在创业的过程中，不仅能巩固孵化成果，还能通过推动“责任型创业”文化的持续积淀与传承，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注入源源不断的高素质创业力量。

（三）校政企协同育人机制：凝聚思政双创合力场

搭建校政企协同平台，校政企三方需构建“三位一体”育人网络，明确三方职责与协同路径。学校层面，高职院校成立“思政双创研究院”，整合思政教师、双创导师资源，开发协同育人课程。思政教师聚焦价值引领，传授家国情怀、责任担当等内容。双创导师侧重专业指导，讲解商业运营、市场开拓技巧，共同打造“思政 + 双创”模块化课程。同时，高职院校建立“教师企业实践流动站”，选派教师到合作企业挂职，了解行业思政需求与真实创业场景，反哺教学内容更新。企业层面，合作企业设立“思政实践基地”，提供真实创业场景，选派行业导师开展“思政 + 实操”指导。行业导师在指导学生运营就业公司时，融入行业责任、职业伦理教育，强调安全管理公司对员工、企业、社会的安全责任传递。合作企业还可开放企业真实项目，让学生参与“安全管理方案优化”等实践，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深化思政认知与专业能力。政府层面，地方政府出台“协同育人补贴政策”，对参与校政企协同的企业给予资金、场地支持，对学校优秀思政双创项目给予孵化经费补贴。地方政府搭建“政校企信息对接平台”，发布政策解读、企业需求、项目成果等信息，促进三方资源精准匹配。校政企三方协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设计就业公司孵化项目，如安全管理人才输送项目，高职院校负责人才思政与专业培养，合作企业提供实践场景与市场验证，地方政府保障政策资金支持，实现思政教育、双创实践、企业需求深度融合，凝聚育人合力。做好高职院校毕业生创业就业跟踪服务，为毕业生创业就业中遇到的问题提供及时的服务，是高职院校应承担的社会职责，提高毕业生创业就业成功率，是党和国家对高职院校教育者的新要求 [14]。而校政企协同平台恰好能为跟踪服务提供支撑，高职院校依托平台掌握毕业生创业就业动态，为企业提供行业资源协助解决实际难题，政府联动政策资源给予帮扶，让跟踪服务落到实处，进一步强化协同育人成效，让协同平台成为机制运转的动力源。此外，还应当积极尝试建立校政企三方协同育人质量评估与反馈机制，定期对平台运行成效、资源整合效率、学生成长质量等进行系统评估，结合评估结果优化未来的协同路径，并灵活调整资源配置，以打造良性提升的协同工作循环，持续增强平台的生命力与适应性，为培养符合新时代要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供坚实保障。

三、结语

思政引领的高职生创新创业与就业公司孵化机制，是职业教育回应时代需求的创新探索。通过构建思政课程浸润、流程嵌入、协同育人机制，可激活高职生双创潜能，培育兼具专业能力与社会担当的创业人才，推动就业公司孵化从“单一实践”向“价值创造”升级。未来需持续深化机制实践，让思政引领的双创活力，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经济社会创新驱动注入持久动能，助力培养更多“有温度、有深度、有担当”的高职创业先锋。

参考文献

[1] 轩贵平，李天平，石英，等. 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一三一六”模式构建研究 [J]. 现代职业教育，2025(23):52-55.

[2] 张琳 . 高职院校创新创业精神培育研究 [J]. 现代职业教育，2024(29):9-12.

[3]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 [EB/OL].(2015-05-14)[2025-08-26].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1505/t20150514_188069.html.

[4] 江苏省教育厅 . 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4 年职业院校学生创新创业培育计划项目申报和 2023 年立项项目结项工作的通知 [EB/OL].(2024-09-12)[2025-08-26].http://jyt.jiangsu.gov.cn/art/2024/9/12/art_58320_11362015.html.

[5] 杨平，丁瑞静 . 高职创新创业教育对学生就业观念转变的影响及引导策略 [J]. 大学，2025(S1):28-30.

[6] 陈晨 . 高职院校创业孵化基地就业缓冲区建设与管理 [J]. 当代经济，2022,39(08):107-112.

[7] 蒋钦 . 思政教育工作与高职生就业创业教育的融合 [J]. 就业与保障，2021(18):92-93.

[8] 谢菊花 . 思政引领下高职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与岗位胜任力协同发展路径探究 [J]. 大众文艺，2025(13):205-207.

[9] 赵宜涛，侯喜军 . 思政引领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院校学生创新创业路径研究 [J]. 才智，2025(07):41-44.

[10] 王会 .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路径探究 [J].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4,23(04):6-9.

[11] 董敏杰 . 课程思政视域下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研究 [J]. 现代职业教育，2020(30):44-45.

[12] 张珍 . 数字时代高职院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变革研究 [J]. 中国电子商情，2025(16):118-120.

[13] 门传开 . 基于创新创业背景的高职院校学生就业实践 [J].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5,42(01):58-60,78.

[14] 黄春平 . 高职院校学生创新创业跟踪服务制度研究 [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5,38(01):14-16.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江苏省职业院校学生创新创业培育计划项目（GY-2024-0161）；2023 年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校级科研项目“红色基因与职业教育现代化耦合下德育工作分层滴灌研究”（14589202316）。

（作者单位：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高职院校党建工作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推动作用研究

吴建华

摘要：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度融合的新时代背景下，高职院校党建工作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引领力量，其战略价值与实践意义日益凸显。高职院校党建工作通过强化政治引领、健全育人机制、创新实践载体、建强师资队伍等多元路径，在筑牢学生理想信念根基，培育职业精神与社会责任感，塑造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本文系统阐释高职院校党建工作推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维度与优化路径，旨在为新时代高职院校深化党建与思政教育融合、提升育人实效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关键词：高职院校；党建工作；思想政治教育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为职业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高职院校作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主战场，不但肩负着传授专业技能的重任，更承担着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的政治责任。思想政治教育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核心载体，其成果会直接关系到职业教育的育人质量与国家产业人才的培养方向。党建工作是高职院校办学治校的“根”与“魂”，更是引领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现阶段，高职生群体展现出思想活跃、实践导向强、职业诉求鲜明等优点，传统思政教育模式面临内容和专业结合不紧密、形式与学生需求不匹配等挑战[1]。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入探究高职院校党建工作对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推动作用，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育人优势，既是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高校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也是摆脱高职思政教育现实困境、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路径。

二、高职院校党建工作推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维度

（一）政治引领维度：筑牢理想信念根基

理想信念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而党建工作是强化理想信念教育的根本途径。高职院校党组织深入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活动，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的核心内容融入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学生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党组织通过规范“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等制度性安排，为学生提供常态化的理论学习平台。针对高职院校学生特性，创新学习方式，采用“微党课”“理论宣讲团”“线上学习平台”等载体，将抽象化的理论转化成通俗易懂的内容，提升学生的参与度和归属感。与此同时，通过开展红色文化传承等活动，正确引导学生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精神力量，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党建工作根据明确的政治导向，协助高职院校学生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树立正确的价值判断标准，抵御各种错误思潮的侵蚀[2]。在专业学习和职业规划中，正确引导学生将个人理想融进国家发展大局，把职业追求与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相结合，培养“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远大志向。

（二）机制保障维度：健全协同育人体系

高职院校党建工作根据构建完善的育人机制，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系统化保障，破解了思政教育“碎片化”“边缘化”等问题。党组织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建立起“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职能部门各负其责、院系具体落实、全社会协同参与”

的思政教育工作格局，实现了育人资源的统筹整合与高效利用[3]。在学校方面，党委将思想政治教育纳入学校发展整体规划，与教学、科研、管理等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通过“四同”机制压实育人责任。创建党建工作与思政教育融合的考核评价体系，将思政教育成效作为党组织考核、院系评估、教师评优的重要指标，形成“人人有责、事事育人”的鲜明导向。在院系方面，党支部建在教研室、党小组设在班级，将思政教育融入专业教学、学生管理、实习实训等各个环节，实现“党建＋专业＋思政”的深度融合。党组织根据完善制度建设，标准思政教育内容、方式与标准，保证思政教育的连续性和实效性。比如，制定学生思想政治素质评价办法，将理想信念、道德品行、社会责任等纳入评价体系，正确引导学生全方位发展；建立党员教师联系学生制度，让党员教师在学业指导、职业规划、思想引导等方面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实现“一对一”精准育人。

（三）实践育人维度：丰富思政教育载体

实践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高职院校党建工作通过创新实践育人载体，将思政教育从课堂延伸至实践场景，实现“知行合一”的育人目标。党组织立足于高职教育产教融合的鲜明特色，将党建实践与专业实践、社会实践有机结合，打造了一批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思政实践平台[4]。在校内，依托实训车间、大师工作室、创新创业中心等场所，设立“党员先锋岗”“技术攻关党小组”“技能传承红色驿站”等，让学生在专业技能训练中接受党性教育，培养敬业专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开展“党建＋志愿服务”“党建＋学风建设”“党建＋宿舍文明创建”等活动，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学生日常生活，引导学生在实践中锤炼品格、提升素养。在校外，党组织大力开拓实践基地，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纪念场馆、先进企事业单位、乡村振兴示范点等共建党建实践教育基地，打造“行走的思政课”“场馆里的思政课”。组织学生开展红色研学、社会调研、科技助农、社区服务等实践活动，让学生深入基层、了解国情，在实践中深化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同时，党组织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打造“云端＋实地”双课堂，通过官方公众号、视频号、思政专题网站等平台，推出“思政微课堂”“大学生讲党课”等数字化内容，让思政教育突破时空限制，实现随时随地学习，增强教育的吸引力并扩大覆盖面。

（四）队伍建设维度：强化育人骨干力量

教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力量，高职院校党建工作建强师资队伍，为思政教育提供人才支撑。党组织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实施思政教师和专业教师“双培育”工程，打造了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情怀深厚的育人骨干队伍。在思政教师队伍建设层面，党组织将政治标准摆在首位，严格选拔任用机制，通过“传帮带”“教学大练兵”“科研攻关”等方式，提高思政教师的政治素养和教学能力。激励思政教师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将最新理论成果融进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打造思政“金课”。与此同时，支持思政教师参加社会实践和学术交流，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专业教师队伍建设层面，党组织通过党建引领，强化专业教师的育人责任，推动“课程思政”建设。开展“立德树人、廉洁从教”主题教育，引导专业教师树立“人人都是思政教师、各门课程都是思政课程”的理念，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程教学全过程。设立“党员教学先锋岗”“课程思政示范岗”，发挥党员教师在课程思政建设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全体教师参与思政教育，形成育人合力。除此之外，党组织注重培养学生骨干团队，选拔优秀学生党员、入党积极分子担任班级思政委员、理论宣讲员等，充分发挥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作用。经过培训和实践锻炼，让学生骨干变成思政教育的“宣传员”“调解员”“服务员”，在同学中传递正能量，营造良好的育人氛围。

（五）文化浸润维度：营造优良育人氛围

校园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院校党建工作根据推动校园文化建设，营造了浓厚的红色育人氛围，完成了文化浸润与思想引领的有机统一。党组织将红色文化、职业文化、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形成具有党建特色和高职特点的校园文化品牌[5]。通过建立校史馆、红色文化长廊、党建主题公园等文化阵地，让学生在耳濡目睹中接受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开展“红色歌曲传唱”“红色故事演讲”“党史知识竞赛”等文化活动，丰富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对党的情感与认同。与此同时，融合高职教育特点，弘扬工匠精神、劳动精神、创新精神，通过技能大赛、劳模进校园、优秀校友分享等活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和价值观。党组织引领校风、教风、学风建设，倡导“艰苦创业、奋进图强”的校园精神，营造风清气正、团结奋进的育人环境。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将师德作为教师考核的重要内容，引导教师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用高尚的道德品行感染学生。通过党建引领的校园文化建设，使思想政治教育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认同”，从“外在要求”转变为“内在追求”，实现了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三、高职院校党建工作推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化路径

（一）强化理论武装，提升教育针对性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为核心，深化理论学习内容与形式创新，提升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针对高职院校学生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特性，制定差异化的理论学习方案：低年级侧重理想信念教育和党史国史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中高年级侧重职业精神教育和社会责任教育，引导学生将个人发展与国家需求相结合。创新理论学习形式，采用“理论＋案例”“线上＋线下”“学习＋实践”的模式，将抽象的理论与专业实践、职业场景相结合，让学生感受到党的创新理论的实践伟力。运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新技术，打造出沉浸式理论学习情境，增强学习的趣味性和感染力。建立理论学习效果评价机制，通过知识测试、心得体会、实践表现等多维度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效，确保理论学习入脑入心。

（二）强化融合创新，破解育人协同难题

进一步推动党建工作与思政教育、专业教育、实践教育的深度融合，破解“两张皮”难题。在课程建设层面，将党建元素和思政元素系统融进专业课程标准、教学内容和考核评价中，开发设计一批“党建＋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在实践教学方面，深化产教融合背景下的党建育人创新，与企业党组织共建实践基地和育人项目，将企业的党建文化、工匠精神、行业规范融入思政教育，让学生在实习实训中接受思想淬炼和职业熏陶。建立党建与思政教育融合的协同机制，定期召开党建与思政教育工作联席会议，统筹解决融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形成工作合力。

（三）创新载体方法，增强教育吸引力

适应新时代青年学生的特点，不断创新党建引领思政教育的载体与方法，增强文化教育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打造数字化党建思政平台，整合线上学习资源、实践活动报名、思想动态反馈等功能，完成精准化育人服务。利用短视频、直播、动漫等青年喜闻乐见的形式，创作一批接地气、有温度、正能量的党建思政内容，让思政教育更具时代感和亲和力。丰富实践活动形式，开展“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红色创新创业大赛”“乡村振兴志愿服务”等特色活动，给学生提供多元化的实践平台。注重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宣传优秀党员教师、学生党员、行业劳模的先进事迹，用身边人、身边事教育引导学生，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四）健全保障机制，夯实育人基础

健全党建引领思政教育的保障机制，为工作进行提供有力保障。加强组织保障，选优配强基层党组织书记和思政工作队伍，确保党建与思政教育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有人干。增加经费投入，开设党建与思政教育融合专项资金，用于课题研究、教师培训、实践基地建设等多个方面，确保工作顺利开展。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将党建引领思政教育的效果纳入学校党建工作考核、院系工作评估、教师绩效考核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形成“正向激励、反向约束”的考核体系。完善长效机制，将党建引领思政教育作为一项系统项目，持续推进、不断完善，确保工作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发展。

四、结论

高职院校党建工作对于学生思政教育具备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这种作用来源于二者在目标、内容、路径上的内在统一性，体现于政治引领、机制保障、实践育人、队伍建设、文化浸润等多个维度。高职院校务必进一步深化对党建思政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逐步完善融合路径、创新育人载体、健全保障机制，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充分转化为育人优势。进一步推进党建与思政教育紧密结合，培养更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具有坚定理想信念、过硬专业技能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参考文献

[1] 米剑各 . 高职院校学生党建工作引领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 [J]. 成才之路 ,2024(23):41-44.

[2] 韦柳宁 . 高职院校党建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发展研究 [J]. 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 ,2024(08):196-198.

[3] 楼锦涛 . 以党建工作引领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探讨 [J]. 山海经：教育前沿 ,2021(33):328.

[4] 许晓月 . 以创新精神引领高职院校党建与思政工作 [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21(41):94.

[5] 庄泽红 . 家校协同促进初中生道德修养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D]. 广州 : 广州大学 ,2024.

（作者单位：吉林通用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滇缅公路蕴含的中国精神融入高校课程思政路径探究

李顺毕

摘要：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解决立德树人的关键问题，也是当前高校课程思政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滇缅公路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项伟大工程，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象征，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内涵，契合立德树人的目标，为高校课程思政提供鲜活案例和深厚滋养。将滇缅公路这一伟大工程中孕育的中国精神融入高校课程教学是课程思政取得实际效果的一个重要途径。要找准其中蕴含的中国精神与课程思政的内在契合的，助推高校课程思政效能提升。

关键词：滇缅公路；中国精神；高校课程思政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立德树人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多次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并强调“德对于个人、对于社会都有基础性意义，是整个国家、民族、社会向上向善的力量。”滇缅公路这一伟大工程，是在日本企图灭亡中国、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以及大量壮丁已经参军的情况下，滇缅沿线近 30 个县的各族群众，其中包含大量的老人、妇女和儿童，用鲜血和生命铺就的伟大公路。它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四个与共”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国精神的具体体现。将其深度融入高校课程思政，深度挖掘育人资源，能够适应不同的课程，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1]。

一、滇缅公路与滇缅公路中蕴含的中国精神

（一）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危机下的滇缅公路

1931 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东三省；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并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这一系列侵略行径绝非偶然，而是近代以来日本对外侵略扩张、企图灭亡中华民族的险恶用心的集中暴露和必然延续。中华民族奋起抵抗，在大量援华物资的持续输入和帮助下，彻底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从 1938 年起，日军沿着中国的海岸线进行封锁作战，国内外物资运输通道几乎被完全切断。在此紧要关头，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提出了修建滇缅公路计划。这样，来自海外的援华物资能够通过相对安全的途径运到西南大后方基地，为抗日战争起到“输血”的作用。

“滇缅公路通车后，同盟国援华物资通过滇缅公路源源不断而来，每月货运达 1000 吨左右。”[2] 从 1938 年到 1945 年抗战结束，从滇缅公路运入中国的物资共 49 万余吨。滇缅公路作为中华民族在至暗时刻建设的国际战略运输生命线，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滇缅公路蕴含的中国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顽强生存和不断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中华民族在近代遭受的苦难、耻辱和挑战，是近代农业文明遭受工业文明冲击的缩影。很多国家、民族和文明就此在西方殖民化中消亡，唯有中华民族克服了这个危机，从耻辱中走出，并走在复兴的道路上。“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3]

1. 伟大创造精神的彰显

滇缅公路是中华民族在生死存亡中积极创造奇迹的见证，是中华儿女在绝境中团结一心、迎难而上的生动写照，传递着民族不屈的信念与希望。它承载着民族不屈的信念与希望，彰显着各民族群众舍生忘死、向死而生的民族血性。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自强不息、众志成城、积极应变，是国家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中国人民应对挑战、开创未来的重要支撑，更是伟大创

造精神的集中体现。

2. 伟大奋斗精神的彰显

中华民族有着不屈不挠、生生不息、顽强奋斗的精神。滇缅公路的修筑，是 20 万滇西儿女用血肉之躯打通的生命通道。这种不畏艰险、众志成城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断复兴的内在动力。各民族群众自强不息，以血肉之躯筑路救国的壮举，展现了中华民族面对绝境时团结一心、共赴国难的集体意志；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巨大牺牲，战胜自然灾害，战胜侵略者，是伟大奋斗精神的彰显。

3. 伟大团结精神的彰显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团结至关重要。历史和经验表明，民族团结一荣俱荣，在面临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许多壮丁加入地方自卫队，滇缅公路沿线近 30 个县的汉、彝、白、傣、苗、傈僳、景颇、阿昌、德昂、回族等各民族群众，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走出家门组成世界筑路史上极为特殊的一支筑路大军。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守望相助、浴血奋战，共同捍卫了民族的独立、尊严和自由，共同书写了中华民族保卫祖国、抵御外侮的壮丽史诗，所爆发出的无坚不摧的力量正是伟大团结精神的彰显。

4. 伟大梦想精神的彰显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志气的民族。近代以来，在侵略者的铁蹄下，中华大地山河破碎，但中国人民从未屈服，宁死不做亡国奴，各族人民坚信希望还在，独立和自由就一定会实现，现实再黑暗，只要团结一心，就能重见光明。“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自强不息，从未放弃对美好梦想的向往和追求。”以不屈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一步步走向伟大复兴。这正是伟大梦想精神的彰显 [4]。

滇缅公路蕴含的中国精神承载着深厚的家国情怀，体现了个体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价值追求，为高校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提供了生动教材。在高校教育中，滇缅公路所承载的精神力量应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桥梁。将这一精神融入课程思政，有助于引导学生从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能够增强学生对历史的认知，激发其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意识，增强育人效果。

二、滇缅公路蕴含的中国精神与课程思政的内在统一

中国精神是兴国强国之魂，历史川流不息，精神需要代代相传。只有把中国精神传承下去，中华民族才能够长久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课程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主渠道，学校是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培养什么样的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滇缅公路中蕴含的中国精神与高校课程思政在教育任务、价值、目标上有内在统一性，有助于高校在课程思政中回答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

（一）统一于培养什么人的方向

在教学中，所有课程都指向“培养什么人”这一首要问题。我们的教育必须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方向，培养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对中华民族的存续和发展有用的人。滇缅公路的修筑深刻地回答了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先辈们是如何发扬伟大的团结、奋斗、创造精神，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国家中发挥主动精神的问题，如何担当建设者和接班人。时代在变，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竞争和合作关系却一直存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透过历史，审视古今，今天高校的学生要始终认识到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并不断深化自己的精神内涵。

（二）统一于为谁培养人的立场

滇缅公路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交通线，更是民族精神的象征，承载着千千万万民众的希望，这是中华民族摆脱被侵略、压迫、奴役的希望。这种伟大的梦想精神跨越时空，始终激荡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成为今天青年一代砥砺初心、勇担使命的重要滋养。

滇缅公路是千千万万中国人用血肉之躯为中华民族的存续铺就的生命线，有效地印证了在最危急关头，靠得住的永远只能是中华民族，而不是其他民族。是中华民族的存续和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有效明证。在各门课程中如何坚守人民立场、如何回应国家和民族需要，以国家利益为导向是我们今天的教育要求。

（三）统一于怎样培养人的启示

滇缅公路这一伟大工程，是中华民族爱国情怀与民族担当的集中彰显。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妇女、老人和儿童展现出的强大力量，正是爱国情怀、民族担当与伟大中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这种爱国情怀和民族担当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无畏前行。“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这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学生是人民中最活跃的群体，他们的素质和面貌决定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和希望，在学校各门课程的教育中，应当通过学校这个主阵地，将这种精神通过各门课程这个主渠道融入青年血脉之中，让青年成为投身强国建设的不竭动力。让青年以实际行动传承这份赤诚与担当，将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复兴伟业，将滇缅公路这一伟大工程所展现出的精神化作新时代奋斗的底色，让人生在为祖国、为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奉献中焕发光彩 [5]。

三、滇缅公路中蕴含的中国精神融入课程思政的路径

滇缅公路蕴含的中国精神融入课程思政的路径，在于实现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的同频共振。通过将滇

缅公路这一伟大工程融入教学设计，增强学生对历史的深度理解，在情感共鸣中实现价值观的自然引导，使中国精神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青年成长成才的精神底色。

（一）以课程目标为导向

育人的最终目的是形成高尚的人格，培养国家和民族所需要的人。课程教学以课程目标为导向，要坚持人格形成这一关键。滇缅公路这一伟大工程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鲜明的时代价值，激励青年以家国情怀砥砺前行，作为青年投身强国伟业的精神坐标，可以帮助青年以先辈热血校准人生航向。将滇缅公路事迹融入课堂教学，应依托丰富的历史资源，增强课程的感染力与说服力。

将滇缅公路这一伟大工程融入课程目标、教学内容与评价体系，确保精神传承有载体、教学实施有支撑、育人成效看得见。依托地方红色资源，打造滇缅公路主题教学案例库、教学资源库，开发示范课，利用好“互联网 +”形成示范效应。

（二）与祖国和人民的奋斗同向同行

滇缅公路这一伟大工程与高校课程思政在价值导向上高度契合，均指向培育青年学生的家国情怀、责任担当和奉献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阐释滇缅公路这一伟大工程的时代价值，切实推动红色基因融入血脉、铸魂育人。

“越是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敌对势力越会在遏制与裂解中华民族上大做文章，妄图阻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6] 将滇缅公路这一伟大工程深度融入课程思政，强化青年学生对历史的认知与尊重，激发其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的使命意识与行动自觉。通过讲好滇缅公路这一既具有地域特色又具有普遍意义的红色故事，让青年在感悟先辈奋斗历程中厚植家国情怀，增强文化自信与历史自觉，提升育人实效。

（三）充分发挥教师主导、学生主体作用

以学生为主体，通过系统整合滇缅公路这一伟大工程与课程思政要素，构建协同育人机制，推动红色文化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引导学生完成从感知到想象的过程，依托社团载体开展主题创作、情景剧展演、口述史调研等特色活动，实现从理论认同到实践践行的转化。结合重要时间节点组织纪念活动，强化仪式教育，提升情感共鸣。在社会实践中学思践悟，将红色基因转化为实际行动，持续涵养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

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育人生态，使青年在潜移默化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真正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栋梁之材。以滇缅公路这一伟大工程为载体，推动红色文化深度融入课程体系与教学实践，将精神内涵转化为可感知、可践行的教育内容，引导青年在知行合一中锤炼品格。

（四）以“两个大局”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个人命运、民族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高校课程要不断回答时代之问和人民之问，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崇高理想信念，弘扬中国精神。让历史照亮前行之路，以精神火炬指引未来。

滇缅公路这一伟大工程不仅是一段峥嵘岁月的记忆，更是一种跨越时空的精神召唤。通过这一段记忆，激励当代青年以坚定信念回应时代挑战，启迪当代青年勇担时代重任，从红色基因中汲取信仰力量，增强历史责任感与时代使命感。通过深化专业课程的思政化改革，培养学生的国家意识，引导学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引导青年以先辈为镜，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中奉献担当，在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中贡献智慧。传承不是简单的记忆延续，而是要在时代语境下实现精神的再生长。以滇缅公路这一伟大工程为纽带，连接历史与当下，激发青年始终对时代有清醒的认知，能够应对时代变化，始终以党、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前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编写组 .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 [M]. 北京 :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2] 陈光俊 . 滇缅公路——血肉铸成抗战路 [M].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9.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 第 1 卷 [M]. 北京 : 外文出版社 ,2014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 第 2 卷 [M]. 北京 : 外文出版社 ,2017.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 第 3 卷 [M]. 北京 : 外文出版社 ,2020.

[6]《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编写组 .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 [M]. 北京 :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3.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3 年度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对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引导研究”（2023J1700）。

（作者单位：德宏师范学院）

英模精神在基层民警思政引领中的价值转化研究

姜妍婷

摘要：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英模精神承载着公安队伍的忠诚底色，是滋养基层民警思政建设的精神养分。基层民警常年扎根一线、默默守护群众安宁，其思想政治素养直接关乎公安工作的实际成效与队伍建设的坚实根基。当前基层民警思政引领存在场景融入不深、转化路径固化的突出问题。推动英模精神从被动学习向主动践行、从精神传承向实践赋能转变，正是筑牢基层民警思想根基、凝聚队伍力量的关键所在。本文立足基层公安思政工作实际，深入挖掘英模精神的时代价值，找准其与基层民警思政引领的结合点，突破形式化学习局限，探索贴合基层警务实际、实用且具有新意的精神转化方式，为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基层公安队伍夯实思想基础。

关键词：英模精神；基层民警；思政引领；价值转化

一、引言

基层公安队伍的政治素养和履职能力直接影响公安工作高质量推进，思政引领作为队伍建设“生命线”，其关键在于将英模精神——无数公安英模在一线履职中沉淀的价值追求，蕴含忠诚履职、为民奉献内核的价值追求，转化为滋养警心、铸牢警魂的具体指引，避免流于形式化学习，方能凝聚基层民警的奋进斗志[1]。面对新时代基层公安工作新形势新任务，深入挖掘英模精神的时代价值，推动这种承载忠诚与奉献的精神力量在基层民警思政引领中落地转化，这既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英模精神的必然要求，也是夯实队伍根基、提升思政实效、打造忠诚干净担当公安铁军的关键。

二、英模精神的时代内涵与基层民警思政引领的需求适配

（一）英模精神的新时代内涵

新时代公安英模精神传承并升华了传统英模精神内核，“忠诚、为民、担当、奉献”四大核心维度，既凝聚着公安队伍的初心使命，也与新时代公安工作守护平安、服务群众、护航发展的核心任务高度契合，是基层民警履职尽责的坚实精神指引[2]。英模精神的灵魂是忠诚，是基层民警坚定拥护党的绝对领导、坚守政治立场、将党和人民利益置于首位的信念，核心是为民，是他们扎根群众、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赤诚，加之迎难而上的履职勇气、不计得失扎根岗位的无私奉献，共同构成基层民警思政引领最鲜活的内核。

新时代英模精神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质与时代印记，并非空洞理论，而是扎根基层公安工作、可感可学可践行的行为指引，蕴藏在基层民警日常执勤的坚守、服务群众的热忱、应急处置的果敢中，滋养基层民警思政建设，指引其坚守初心、履职尽责[3]。

（二）基层民警思政引领的核心需求

基层民警常年坚守公安工作前沿，日常面临繁杂具体的工作任务、执法突发情况及持续工作压力等实际难题，这就决定了其思政引领工作需摒弃形式化、突出针对性，核心在于抓好“铸魂”强信念、“赋能”提能力、“凝心”聚合力三大关键，三者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唯有统筹兼顾，才能切实发挥思政引领实效。“铸魂”的核心是筑牢基层民警的政治忠诚，围绕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其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指引其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赋能”是借助思政引领，培育基层民警责任担当与职业素养，破解畏难情绪、缓解职业倦怠，调动工作主动性；“凝心”则凝聚队伍合力，通过营造崇尚先进、争先创优的氛围，提升基层公安队伍的凝聚力与战斗力。

（三）英模精神与基层民警思政引领的内在契合性

英模精神与基层民警思政引领的契合点，在于其精神滋养精准匹配基层民警的实践需求，将英模精神

融入思政引领，以英模真实事迹为载体，摒弃抽象晦涩的理论宣讲，让基层民警在崇尚英模、践行英模精神的过程中，潜移默化接受思想锤炼、筑牢政治忠诚根基，有效破解思政引领流于形式、内容空洞的现实难题；基层民警思政引领是英模精神价值落地的重要实践载体，英模精神的传承发展不能局限于理论宣讲，关键在于基层民警在日常履职中躬身践行、主动传递，将其融入执法执勤、服务群众的每一处细节，这既是对英模精神最真切的传承，也是思政引领成效最直观的体现，这种深度契合为英模精神在基层民警思政引领中的价值转化筑牢了基础[4]。

三、英模精神在基层民警思政引领中的价值转化实践成效

近年来，各地公安机关立足基层民警思政引领实际需求，聚焦工作难点，积极探索英模精神向思政引领实效转化的路径，结合本地公安工作特色与优势，打造一批兼具实用性与推广性的实践模式，取得显著实效，为后续深化英模精神价值转化、提升基层民警思政引领质效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典型引领模式，筑牢忠诚警魂

多地公安机关秉持“选树典型、以点带面”思路，深入挖掘基层一线英模事迹、提炼其精神内核，通过面对面宣讲、沉浸式事迹分享、岗位践诺等多元形式，引导基层民警真切感悟英模忠诚履职的坚守与无私奉献的担当，推动英模精神入脑入心、融入日常，促使民警将精神力量转化为扎根岗位、履职尽责、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筑牢政治忠诚根基[5]。

（二）场景融合模式，推动学用结合

各地公安机关打破英模学习固有模式，摒弃单一理论宣讲，将英模精神融入基层民警执勤值守、矛盾化解、便民服务等日常警务工作，创新打造“思政课堂＋警务现场”融合模式，设立“英模示范岗”，引导民警在实操中践行英模理念，将英模的责任担当与服务初心，转化为扎根岗位、为民服务的具体行动，推动英模精神在一线警务中落地见效。开展“师徒结对、岗位带训”活动，邀请警务战线先进典型担任导师，结合一线履职经历传授方法、分享感悟，让英模精神转化为岗位指引，通过一对一“传帮带”，传承精神、提升民警履职能力与为民服务质效。

（三）载体创新模式，增强传播实效

各地公安机关聚焦英模精神传播实效，摒弃传统传播模式，整合文化资源，结合基层民警熟悉的英模事迹，制作影视、情景剧等作品，通过新媒体推送，让英模精神鲜活接地气、浸润民警心灵；同时打造特色党建载体，将英模精神融入派出所文化建设，设置文化墙、宣传栏营造崇模氛围，并将其纳入新警入警、民警晋职培训，以沉浸式学习和座谈交流推动英模精神常态化传承[6]。

（四）机制保障模式，强化长效引领

一些地区公安机关健全相关机制，为英模精神落地转化筑牢保障，推动英模精神对基层民警的思政引领常态化、长效化，搭建先进典型培育全链条管理模式，覆盖选树、培养、宣传、激励各环节，对践行英模精神成效突出的民警及时表彰宣传，充分调动基层民警学习英模、争当英模的积极性[7]。推进专业化思政工作机制建设，组建兼具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的思政工作队伍，做好英模精神精准解读，开展思政引领能力专项培训，将英模精神践行情况纳入民警绩效考核，明确“学英模、践英模、争先进”导向，推动英模精神价值转化工作扎实落地、取得实效。

四、英模精神在基层民警思政引领中的价值转化优化路径

结合新时代基层民警思政引领实际需求，依托各地公安一线实践经验，针对英模精神价值转化中的实际困难与突出问题，从深化认知、创新路径、优化载体、强化保障四方面，探索兼具创新性与可操作性的转化方法，推动英模精神浸润民警思想、融入日常履职，切实提升基层民警思政引领工作质效[8]。

（一）强化认知引领，筑牢价值转化思想根基

英模精神落地转化的关键是基层公安机关及民警的认知到位，唯有深化对转化工作的认知，才能让英模精神浸润心灵、落到实处。基层公安需将英模精神转化纳入民警思政引领总体规划，明确目标、分工与推进步骤，摒弃形式主义，推动英模精神学习与一线公安工作深度融合，实现从宣传学习到实践践行的转变。需进一步深化基层民警对英模精神的认知，既要解读英模精神核心内涵，也要分享英模成长轨迹与履职故事，破除民警“英模高不可攀”的认知误区，让民警明确英模精神蕴藏在上门办证、纠纷调解、日常巡逻等平凡履职细节中，真切感受其可学可践性，再通过主题讨论引导民警对照英模检视自身短板、激发内生学习动力。

（二）创新转化路径，实现学用结合知行合一

结合基层民警工作实际与学习习惯，突破传统转化路径的刻板局限，创新贴合民警日常的多元化、场景化方式，推动英模精神与基层民警思政引领深度融合[9]。线下依托英模事迹馆、党性教育基地打造沉浸式学习场景，开展座谈交流、事迹宣讲等活动；线上搭建专属学习平台，推送英模事迹相关素材，借助新媒体打造“指尖上的英模课堂”，保障基层民警便捷学习、浸润思想。要通过“场景化＋实践化”，摒弃形式主义，将英模精神深度融入基层民警日常执勤、服务群众、应急处置等具体工作。可同步开展“英模岗”“示范岗”创建，通过“师徒结对、岗位带训”

模式，由先进典型传授实战经验与履职方法，引导民警在一线实践中感悟、践行英模精神，将其转化为扎根岗位、服务群众、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英模精神转化需坚持分层分类、精准施策，摒弃“一刀切”模式，结合新入职民警、青年民警、老民警的岗位特质与思想需求制定个性化引导方案。对新入职民警侧重英模精神入门引导，筑牢其正确从警理念；对青年民警聚焦实践培育，激发其责任担当；强化老民警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年轻民警践行英模精神、传递公安正能量。

（三）丰富转化载体，增强价值转化感染力

英模精神融入基层民警思政引领的关键在于载体创新，需打破仅依赖文字、图片宣传的单一模式。结合基层民警扎根执法一线、工作节奏快、注重实践体验的特点，设计贴合其工作生活、兼具代入感与感染力的传播形式，让英模精神成为基层民警可感知、可学习、可践行的精神指引。结合基层民警接受习惯，采用短视频、纪录片、情景剧、诗歌朗诵等多元形式，生动呈现英模事迹细节与精神内核；同时挖掘本地英模资源、打造专属英模品牌，拉近英模与基层民警的心理距离，构建贴合基层实际、可长效运行的英模精神传承载体。常态化开展“英模结对”、英模宣讲团进基层活动，邀请英模深入派出所、执勤点，与民警面对面分享履职实操技巧、初心感悟及成长心得。同时将英模精神纳入民警培训体系，明确作为新入职民警岗前培训、民警晋职晋升的必修内容，让英模精神在日常传承中浸润民警思想、筑牢履职根基。基层英模精神传递需贴合民警工作场景，在基层派出所布置英模文化墙与宣传栏，以直观易懂的形式营造崇尚英模、学习英模、争当英模的浓厚氛围，常态化开展英模事迹演讲、英模精神征文等主题活动，引导民警主动参与，深刻领会英模精神内核，将其内化为履职尽责的行动自觉。

（四）完善保障机制，强化价值转化长效性

英模精神的落地与长效推进，离不开完善的保障机制，需从考核、队伍、资源三大维度统筹构建。将民警英模精神践行情况纳入绩效考核、评优评先及晋职晋升范畴，明确具体考核指标，对践行成效突出的民警与集体予以表彰奖励，充分调动民警积极性、树立鲜明导向，让履职尽责、践行英模精神的集体和个人获得认可，营造“学先进、赶先进、当先进”的浓厚氛围。思政引领队伍建设的关键是打造专业且贴合基层的队伍，需组建专业思政工作队伍，定期开展思政理论与英模精神解读专项培训，夯实其专业素养与宣讲能力；同时吸纳英模及优秀基层民警加入，借助其执法履职真实经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增强思政引领的针对性与感染力，推动英模精神落地见效、思政引领提质增效。强化资源保障，合理加大经费投入，重点用于英模精神宣传、学习及实践活动，完善英模事迹馆、线上学习平台等载体建设；同时加强各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整合宣传、培训、党建等优质资源，凝聚工作合力，确保英模精神学习践行与价值转化工作扎实深入、长效推进。

五、结论

英模精神是基层民警思政引领的重要滋养，对凝聚队伍力量、筑牢政治忠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价值转化成效直接关系基层公安队伍建设质量与思政引领落地实效。新时代推动英模精神价值转化，既是强化队伍凝聚力、提升思政引领实效的关键，也有助于激发民警干事创业劲头，切实提升基层公安工作整体水平。当前，英模精神在基层民警思政引领中的价值转化仍存在一定短板，未能充分释放其铸魂赋能的核心效能，唯有精准聚焦这些突出问题，以走心式引导筑牢思想根基、以创新思路拓宽转化路径、以多元载体增强传播活力、以完善机制强化支撑保障，才能让英模精神真正突破口头宣传的局限，转化为基层民警履职尽责的内生动力，实现从被动接受向主动践行的深度转变。

参考文献

[1] 侯健 . 新时代英模精神涵育青年民警职业认同的实践路径探讨 [J].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25,24(24):70-72.

[2] 范妮妮 . 公安英模精神融入公安院校思政课的价值意蕴、现实问题与优化路径 [J]. 山西警察学院学报 ,2025,33(04):122-128.

[3] 周立秋 . 公安英模精神铸牢忠诚警魂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路径 [J]. 铁道警察学院学报 ,2024,34(05):119-124.

[4] 肖浩 , 宣懿玲 . 公安英模精神锻造“四铁”公安铁军的着力点 [J]. 办公室业务 ,2024(18):171-174.

[5] 荣燕 , 刘凯凤 , 岑世桔 . 新时代公安英模精神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J].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学报 ,2022,38(11):47-52.

[6] 曹英 . 公安英模精神培育形成的内在逻辑论析 [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0(01):110-119.

[7] 赵晨阳 . 公安英烈精神融入预备警官忠诚警魂培育路径探析 [J]. 北京警察学院学报 ,2024(03):119-124.

[8] 胡训玉 , 唐文胜 . 践行伟大建党精神铸造忠诚警魂 ——以公安院校忠诚警魂教育为视角 [J]. 四川警察学院学报 ,2021,33(05):121-129.

[9] 方玉杰 . 新时代公安英模形象的塑造与传播研究——基于十八大以来涌现出的公安英模群像 [J]. 公安研究 ,2022(06):10-18.

（作者系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硕士研究生）

课程思政融入机械技能大赛备赛与训练过程的实践探索

朱佳珺

摘要：当前机械类技能大赛备赛中，部分师生过度关注技术指标而忽视职业道德塑造，导致训练过程枯燥乏味、团队凝聚力不足、抗压能力薄弱，甚至出现违规操作等失范行为。本研究旨在破解此难题，通过系统梳理备赛全流程，挖掘机械专业特有的思政元素，构建价值引领、技能精进、人格塑造三位一体的备赛育人模式。研究有助于提升参赛队伍的综合实力，实现以赛促教、以赛促学的良性循环，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可复制的实践范式。

关键词：课程思政；机械技能大赛；备赛训练；工匠精神；职业素养

在制造强国战略纵深推进的宏大背景下，《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明确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与此同时，以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为代表的各类顶级赛事正经历深刻变革，评价标准大幅提升了职业素养、团队合作、创新创意及安全规范等维度的权重。2025 年大赛新规程更是把“工匠精神”与“职业操守”作为重要评分项，这标志着思政元素已成为决定竞赛成败的重要变量。

一、课程思政融入机械技能大赛备赛全过程的总体设计

（一）总体目标构建

课程思政融入机械技能大赛备赛全过程的总体目标旨在突破传统的狭隘视野，构建起德技并修、知行合一的高技能人才培育新范式，其核心在于把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象化为备赛训练中的每一个微小动作与每一次价值抉择。此目标体系力求在提升学生精密加工、数控编程等硬核技能的同时，同步塑造学生具备家国情怀的宏大格局、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团结协作的集体意识以及严守规范的职业操守。我们期望通过系统的备赛实践，使参赛选手既能成为在世界舞台上摘金夺银的技术能手，也要成长为懂得为何而学、为谁而战的新时代大国工匠预备队，让学生在攻克“卡脖子”技术难题时能激发出科技报国的使命担当，在团队磨合的阵痛中学会包容奉献，让大赛奖杯不仅闪耀着技艺的光芒，更折射出人格的光辉。

（二）融入原则

在推进课程思政与机械技能大赛备赛深度融合的实践中，必须严格遵循隐性渗透、全程贯穿与知行互促三大原则，以确保育人实效的持久深化。隐性渗透原则要求摒弃生硬的说教与标签化的政治宣讲，转而把思政元素融入图纸分析、工艺制定、设备操作及故障排查等专业环节之中，让学生在专注解决技术痛点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感悟职业道德，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学目标。全程贯穿原则强调思政育人不能有断点与盲区，要从选拔组队时的初心确立，到方案设计时的创新思维激发，再到高强度实操训练中的意志磨砺，直至赛前心理调适与赛后复盘总结，构建起一条环环相扣的时间轴线，保证价值引领伴随备赛周期的每一分每一秒；知行互促原则主张理论认知与实践行为的辩证统一，既要通过讲述大国工匠故事、剖析行业典型案例筑牢学生的思想根基，更要引导学生在日复一日枯燥单调的切削打磨中将抽象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具体的行动自觉，让每一次规范的装夹、每一次精准的测量、每一次有序的现场整理都成为践行工匠精神的生动注脚。

二、机械技能大赛备赛阶段的课程思政实施路径

（一）选拔组队阶段

选拔组队是备赛征程的起点，此阶段的思政实施重点在于重构评价标尺，彻底扭转以往“唯分数论”“唯技术论”的单一选人导向[1]。在组建集训队的过程中，我们要把思想品德、心理素质、责任担当以及团队协

作意识纳入核心考核指标体系，通过无领导小组讨论、压力面试以及日常行为观察等多维视角，确保入选者具备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与正直诚信的道德底色。入队仪式被赋予庄重的教育意义，可以做一场关于使命与荣誉的宣誓大典，通过重温中国制造业从跟跑到并跑乃至领跑的奋斗历程，讲述历代大国工匠在平凡岗位上创造非凡业绩的感人故事，激发学生对机械行业的职业认同感，引导学生立下技能报国的宏伟志向。同时，团队文化的初步构建同步启动，队员们共同制定包含考勤纪律、工具管理、互助机制在内的团队公约，在公约上郑重签字承诺，把外在的规章制度内化为集体的心理契约，让每一位成员在入队之初就在源头上培育出风清气正、团结向上的备赛心态，为后续高强度的训练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训练规划阶段

训练规划阶段的思政实施路径侧重于在技术方案的顶层设计中植入文化自信，让每一张图纸、每一个工艺路线都承载着价值追求[2]。指导教师在引导学生制定备赛技术方案时，要有意识地把绿色制造理念、可持续发展观融入其中，鼓励学生在工艺设计时充分考量材料利用率、能源消耗以及切削液的环保处理，培养学生作为未来工程师的社会担当。在理论培训中，要大量引入国产高端装备如五轴联动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的研发突破案例，深入剖析中国工程师如何打破国外技术封锁、实现自主可控的奋斗史，以此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激励学生在面对高难度赛题时敢于挑战权威、勇于自主创新。另外，规划阶段也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全局观，引导学生跳出单一工序的局限，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角度审视加工过程，理解个人技能在产业链中的价值，从而在宏观视野下确立精益求精的职业追求。

（三）技能强化阶段

技能强化阶段是备赛周期中最漫长、最艰苦的时期，也是工匠精神磨砺的场域，思政实施在此阶段聚焦于把抽象的价值理念转化为行为习惯。在日复一日枯燥单调的切削、打磨、测量中，指导教师善于捕捉每一个技术细节背后的育人契机，当学生沮丧时，引导学生正视失败、反思不足，把挫折转化为磨砺心性的磨刀石，培养其执着专注、一丝不苟的意志品质；当学生因重复动作而懈怠时，通过讲述“一生只做一件事”的工匠故事，激发学生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的定力。7S 管理（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节约）被提升为不可逾越的红线，工具摆放的整齐度、设备维护的及时性、现场环境的整洁度均成为日常考核的硬指标，通过反复的高标准严要求，让学生把规范操作内化为无需提醒的自觉，形成职业本能[3]。同伴互助机制在此阶段发挥着重要作用，高年级选手以身作则传授技艺作风，低年级选手在协助后勤与观摩学习中感悟，团队成员在相互纠错、共同攻关中建立起深厚的战友情谊。

（四）模拟实战阶段

模拟实战阶段是检验备赛成果的试金石，思政实施重点在于培养高压环境下的抗压能力。通过全真模拟比赛场景，设置设备突发故障、刀具意外崩刃、时间极度压缩等极端变量，刻意制造紧张氛围，考验学生在危急时刻的应急处理能力，引导学生在慌乱中坚守操作规程，不因求快而牺牲安全，不因焦虑而放弃规范，培养临危不乱、处变不惊的大将风范。诚信应考教育在此阶段被反复强化，通过警示案例宣讲、签订诚信承诺书等形式，筑牢思想防线，确保学生以干净纯洁的心态迎接挑战，守住职业道德的底线。心理辅导团队介入开展针对性的疏导工作，帮助学生正确看待输赢得失，树立“过程比结果更重要”“超越自我即胜利”的健康胜负观，引导学生将比赛视为展示风采、交流学习的平台而非唯一的命运赌注，培养胜不骄、败不馁的豁达胸怀。赛前动员会则要让每一位选手带着自信、从容与担当走上赛场，无论最终成绩如何，都能收获一段无悔的青春记忆。

三、训练过程中的思政元素挖掘与具体做法

（一）围绕安全生产开展责任教育

在训练现场，我们推行“安全一票否决制”，无论加工精度多高、速度多快，只要出现一次未戴护目镜、一次未停机测量或一次工具乱摆放，即刻叫停训练并让学生进行深刻反思，这种近乎苛刻的要求旨在培养学生的谨慎态度与责任意识。通过将 7S 管理中的“安全”与“素养”要素细化为具体的行为清单，让学生在日复一日的重复操作中形成肌肉记忆，使规范操作成为一种无需思考的本能反应，进而领悟到遵守规则不仅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队友、对设备、对社会负责的职业道德体现，最终塑造出具备高度责任感与自律精神的现代工匠。

（二）围绕精益求精开展质量教育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是备赛训练中最核心的价值追求[4]。在实操训练中，我们要确立“零缺陷”的质量目标，当工件尺寸出现 0.01 毫米的偏差时，不轻易放过，从刀具磨损、热变形、装夹力度等细微处寻找原因，把每一次失误都转化为磨砺心性的契机，培养学生在枯燥重复中坚守极致、在困难面前永不放弃的执着品质。通过引入行业顶尖标准，让学生明白真正的工匠除了要有娴熟的手艺，更要有对完美近乎偏执的追求，鼓励学生在看似完美的工件上继续寻找提升空间。教师以身作则，展示对每一个倒角、每一条纹路的精心打磨，用无声的行动诠释“匠心”，让学生在模仿与实践中感悟到质量背后所承载的信誉，懂得手中的零件也是未来中国制造的名片，从而把追求卓

越的质量意识融入血液，铸就严谨治学、精工细作的职业灵魂。

（三）围绕团队协作开展集体主义教育

在双人或多人赛项的训练中，要刻意设置需要高度默契才能完成的复杂任务，如一人编程一人操作、一人粗加工一人精修，迫使学生在频繁的交流中学会倾听、理解与包容，深刻体悟“独行快、众行远”的真谛[5]。导师也要建立互助纠错机制，鼓励队员之间毫无保留地分享技巧、直言不讳地指出问题，在共同攻克难关的过程中建立起深厚的战友情谊，让每一位成员都意识到个人的成功离不开团队的支撑，团队的荣誉高于个人的得失。当团队出现矛盾或成绩波动时，及时开展谈心谈话与团队建设活动，引导学生换位思考，学会在冲突中寻求共识，在挫折中相互扶持。通过模拟赛场上的突发状况，训练团队在压力下的应急协同能力，让成员明白在重要时刻敢于担当、甘于奉献才是团队精神的最高体现，从而培养出具有大局观、协作力与凝聚力的优秀团队，让集体主义精神在并肩作战的汗水中熠熠生辉。

（四）围绕创新突破开展使命担当教育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面对世界技能大赛中日益增多的创新创意赛题，我们要把创新突破教育与科技报国的使命担当紧密相连，激发学生的时代责任感。在技术攻关环节，教师要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制造业面临的技术难题，讲述中国工程师自力更生、突破封锁的奋斗故事，把个人的技能训练上升到为国家争光、为民族复兴而战的高度。教师应鼓励学生在工艺优化、工装设计、程序算法上大胆尝试、勇于突破，不设限、不守旧，对于失败的创新尝试给予包容，营造敢为人先、宽容失败的创新氛围，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

四、实践成效分析

（一）学生综合素养显著提升

经过课程思政深度融入备赛全过程的系统锤炼，参赛学生的综合素养发生了质的飞跃。在技能层面，学生们掌握了精湛的机械加工技艺，加工精度稳定性与一次合格率大幅攀升，在世界级赛场上屡创佳绩，用硬核实力证明了中国青年的技术水平。更为可贵的是精神层面的蜕变，曾经部分学生存在的浮躁功利、畏难情绪被坚韧不拔、沉着冷静的心理素质所取代，面对赛场突发故障能从容应对，面对高强度训练能甘之如饴，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担当。毕业生跟踪调查显示，这些经过大赛洗礼的学生在企业中迅速成长为技术骨干，其高度的责任感、卓越的执行力与优秀的团队协作能力深受用人单位赞誉，生动诠释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职业教育领域的落地生根。

（二）教师育人能力不断增强

课程思政融入备赛过程的实践探索，既成就了学生，也赋能了指导教师队伍。教师在挖掘思政元素、设计育人路径的过程中，深入钻研行业文化、工匠精神内涵及国家发展战略，极大地丰富了自身的理论素养，通过与学生朝夕相处的备赛历程，教师们学会了在技术指导中渗透价值引领，在解决专业难题时同步疏导学生的心理困惑，在团队磨合中巧妙化解学生的人际矛盾，育人技巧与沟通能力得到实质性提升。双导师制的实施更是促进了专业教师与思政教师的深度融合，双方在碰撞中更新教育理念，在协作中创新育人方法，形成了一支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复合型师资队伍。

（三）形成可推广的融合模式

本项目的成功实践，提炼并固化了一套具有鲜明机械专业特色的课程思政融合模式，为同类院校及赛项提供了宝贵的范式参考。该模式明确了各阶段的育人目标与具体实施策略，形成的典型案例库、思政元素挖掘指南及标准化操作规程，已被多所院校借鉴应用，在区域乃至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辐射效应，带动了更多赛项开展思政育人探索。

五、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构建的“价值引领、技能精进、人格塑造”三位一体育人模式，成功打破了技能训练与思想教育的壁垒，从而把工匠精神、家国情怀、团队协作与创新意识深度植入备赛全链条。实践证明，此融合路径显著提升了学生的综合职业素养，更锻造了一支德技并修的“大国工匠”预备队，实现了教师育人能力与竞赛成绩的双重飞跃。未来，我们应进一步借助数字化手段拓展思政育人新场景，推动这一实践范式在更广泛的领域落地开花。

参考文献

[1] 韩雄伟，丁天霞，周远非．以技能大赛为载体培养机械专业高端技能人才的研究 [J]. 装备制造技术，2025(11):83-85.

[2] 白宗炀，阮昌乐．人工智能技能竞赛“岗课赛证”融合育人模式的系统化构建与实践成效研究——以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金牌项目为例 [J]. 学周刊，2025(35):28-30.

[3] 赖楠．基于技能大赛试题分析的机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优化研究 [J]. 模具制造，2025,25(11):100-102.

[4] 覃如琼．职业技能大赛背景下“课赛思政”融通的路径探索与实践研究 [J]. 现代职业教育，2025(26):113-116.

[5] 滕士雷，孔喜梅．装备制造类专业“岗课赛证”与课程思政综合育人体系研究实践——以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为例 [J]. 天津职业大学学报，2025,34(02):78-84.

（作者单位：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校校合作共同体”下师范生培养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进路

孙宏伟

摘要：“校校合作共同体”是由多元主体所构成的目标趋同、利益互惠、分工明确、有效协同的共生共建共治共享组织。“校校合作共同体”对培养师范生有着重要意义，即打破资源壁垒、变革人才培养模式、激活教育生态、提升专业胜任力。基于“校校合作共同体”，从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机制，强化制度保障；搭建资源共享与互通平台，促进优势互补；创新实践导向的教学模式，提高培养质量；完善动态评价与反馈体系，实现全过程质量监控等方面探索师范生培养的实践路径，以期为地方师范院校培养基础教育优质教师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校校合作；共同体；师范生培养

2017 年师范类专业认证全面推行，师范专业认证指标体系中包含了师范院校在课程与教学、合作与实践、师资队伍、支持条件等诸多方面与基础教育学校合作的指标点，在规范师范生培养过程的同时细化了校校合作的内容。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强“校校合作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对于打破校校合作发展的瓶颈、满足师范生培养要求、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校校合作共同体”的理论内涵

共同体强调成员间的有机联结与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认同、互动合作机制、资源整合共享是其核心特征，“校校合作共同体”则是由多元主体所构成的目标趋同、利益互惠、分工明确、有效协同的共生共建共治共享组织。

（一）“校校合作共同体”是目标趋同的共生组织

“共同体是一个协作系统，而真正的协作是在人们追求共同目标中产生的。”[1] 以白城师范学院、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松原职业技术学院、白城职业技术学院与白城市人民政府、松原市人民政府共同发起成立的“吉林西部校地协同创新联盟”为例，联盟成立之初就确立了优化学科结构、实现专业动态调整、培养适应吉林西部地区发展需要的复合型人才的宗旨。相似的教育理念和趋同的价值目标是场域疏离的不同成员建立合作关系的基础。这种共生性有助于区域内院校迅速共享资源，在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体系构建、实践基地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二）“校校合作共同体”是利益互惠的共享组织

利益整合、互利互惠往往成为不同类别学校合作的动力之源。如何化解资源困境是部分院校高质量发展中面临的首要问题，而通过互补性资源交换则可以实现不同类别院校之间的互利共赢，促进教育系统整体功能的发挥，从而快速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缩小城乡和校际差距[2]。优质校和薄弱校可通过深度合作实现信息资源共通、优质课程共享、智慧平台共用、资深教师跨校流动，最终形成资源互换型的利益共同体。此外，降低成本、风险与投入也是共同体的利处之一，共同体成员可共同采购智慧教育平台节省独自采购的费用，也可通过内部成员逐步开放的专业实验室和特色空间降低成本。利益整合是共同体成员之间建立信任、减少摩擦、深度融合的重要路径。

（三）“校校合作共同体”是责任共担的共治组织

“责任是共同体运行规则与操作规范的内涵所在”，共同体成员在实现利益互惠的同时共担责任[3]。共同体成员通过明确的责任分工形成协同育人的责任体系，才能使“校校合作共同体”得到有效维系。共同体成员要支持学科共建、教师联合教研、人才联合培养等活动，组建专门领导机构并对其负责，遵守合作协议，接受第三方有效监督。价值共识—资源共享—利益互惠—责任共担—区域协同是异质学校从个体走向共同体要经历的完整生态环节；责任共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异质学校过度逐利而落入功利化陷阱，是异质学校从利益联合走向真正共同体的关键环节。

（四）“校校合作共同体”是区域协同的共建组织

“校校合作共同体”打破了异质学校、教育行政部门的物理边界，以区域为单位建立起资源互联互通的平台。一方面，“校校合作共同体”要求异质学校实现空间整合与资源共享，比如共建区域性教育实践基地、搭建区域教研云平台、建立区域内教师流动机制与“双师型”人才库；另一方面，“校校合作共同体”的形成还需要政策驱动与制度协同，这意味着地方政府要参与制定共同体建设实施方案、设立区域专项基金、构建区域统一的师范生培养质量评价标准等活动。“校校合作共同体”作为区域内有效协同的共建组织，意味着“三位一体”协同机制的实现，即政府统筹并搭建合作框架、高校进行理论指导并予以科研支持、中小学提供实践场景并反馈评价。真正的“校校合作共同体”以区域教育协同发展为依托，构建地方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增强人才培养的地方适应性和社会服务能力。

二、“校校合作共同体”下师范生培养的价值意蕴

“校校合作共同体”以其有效的深度融合模式对于解决校际资源存在壁垒、人才培养模式长期固化、专业胜任力提升困难、教育生态不够均衡的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打破校际资源壁垒，拓展培养维度

“校校合作共同体”成员可以打破资源壁垒，实现教师、基地、设备、信息等教育要素在社会系统内部的自由流动与协调发展[4]。一方面，理论资源与实践场景的互补。高校提供前沿教育理论与研究方法，中小学提供一线教学经验和实践平台，职业学校则可贡献技能型教育经验。多方资源整合可以形成“理论—实践—技能”的闭环，通过这一闭环，师范生能够接触多元教育场景，养成适应不同教育需求的综合能力。另一方面，人力资源共享与能力共生。高校教师与中小学名师共同担任导师，形成“学术指导 + 实践指导”的双轨机制。双轨机制下，高校导师帮助师范生构建理论框架，中小学的一线教师传授课堂管理技巧，二者结合助力师范生成长为“能研究、会教学”的复合型教师。师范生作为“桥梁”，可以通过顶岗实习、支教服务等将高校的创新理念（如 STEAM 教育、跨学科融合等理念）带入中小学课堂，并将基层教育需求反馈至高校，增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推动人才供给与基础教育教师需求的精准对接。

（二）变革人才培养模式，增强实践能力

依靠“校校合作共同体”有助于推动课程体系重构，联合开发实践导向课程。师范院校通过共同体共建实践基地、设计实践课程模块，利用真实教育场景可以帮助师范生完成课堂教学、班级管理等任务，积累实践经验；通过共同体洞察基础教育改革需求，动态调整课程内容，保证师范生所学的理论知识与中小学实际需求相适应；通过共同体创新课程实施方式，高校教师与中小学教师为师范生共同授课，满足知识与技能的双重需要。依靠“校校合作共同体”有助于推动教学模式创新，交叉使用案例教学法、情境模拟法、项目式学习法。师范生可通过对真实案例的分析增强解决问题的能力，依靠虚拟仿真技术提前适应教学情境，完成校本课程开发与教学设计等任务，增强创新能力。依靠共同体有助于推动评价机制转型，高校导师、中小学导师、同行师范生、学生家长成为多元评价主体，协同记录师范生的实践过程，最终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增值性评价。“校校合作共同体”打破了传统师范教育中“重理论、轻实践”的局限，形成实践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确保了师范生能力的“落地生根”。

（三）锻造专业胜任力，强化职业认同感

“校校合作共同体”下的校校合作有助于提升师范生的专业胜任力，强化师范生的职业认同感。校校合作通过整合多元资源、创设真实情境，帮助师范生突破传统培养模式中“知易行难”的困境，实现关键能力的系统性提升。这种能力的提升主要表现为通过直接参与中小学课堂备课、授课、评课等环节增强教学能力，通过运用教育学、心理学知识解决课堂管理、学生心理辅导等复杂问题的能力，通过使用中小学智慧课堂、虚拟教研平台辅助教学，增强数字化教学工具的应用能力。校校合作在赋能师范生能力成长的同时，通过沉浸式体验和价值观引导，帮助师范生超越“职业生存”层面，形成对教师角色的深度认同与价值追求。师范生在教学实践中与学生建立情感联结，将增强立德树人的责任感；师范生所在的实践基地中优秀的中小学教师带来的榜样示范效应使师范生直观理解教师职业的价值内核，强化使命担当意识。“校校合作共同体”下不同层级、不同类别的学校通过深度融合，涌现出的“会教书”“懂育人”“有情怀”的教育者，为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提供了人才保障。

“校校合作共同体”通过资源整合、模式创新、能力锻造与价值引领，提升了师范生的专业胜任力与职业认同感，更以协同机制回应了时代挑战、促进了教育公平。其价值意蕴在于构建“个体能力成长”与“教育系统优化”共生的教育生态，为新时代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可持续的人才支撑。

三、“校校合作共同体”下师范生培养的实践进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5]为基础教育培养优质教师是地方师范院校的根本使命，而部分地方师范院校在师范生培养中往往面临着主体间合作不畅、培养资源短缺、专业实践不足、缺少动态评价与反馈的困境。具有价值共识、利益共享、资源共通、责任共担特点的“校校合作共同体”是强化校校合作、整合优化资源、转变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路径。

（一）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机制，强化制度保障

“校校合作共同体”模式下，政府、高校、中小学等多主体协同参与机制的构建对师范生培养至关重要。一要联合地方师范院校、中小学、教育行政部门等多元主体，明确其在师范生培养中的职责，确保各方目标一致，为提升师范生培养质量共同发力，实现目标与职能的高度联动[6]。师范院校作为培养主体应负责专业课程体系建设，合理安排理论与实践学时；中小学提供实践基地，安排一线优秀教师指导师范生实习、见习；教育行政部门牵头制定合作章程、协调资源分配、监督执行进程，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师范生联合培养项目。二要制定系列规章制度。建立定期协调的沟通制度，定期召开多元主体参与的研讨会，商讨师范生培养过程中的问题并形成解决方案；设立联合机构对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资源共享、教学质量监督等相关工作进行管理；建立奖励机制，对在师范生培养工作中具有突出表现的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对未履行职责的行为进行相应问责。

（二）搭建资源共享与互通平台，促进优势互补

整合共同体成员资源，构建“虚实结合”的资源共享网络，搭建全方位的资源共享与互通平台。一要共建共享实践基地，联合建设区域性教育实践基地，覆盖城乡学校、特殊教育机构等不同类型的学校，为师范生提供全学段多类型的教学体验。共创数据平台，建立区域教育大数据中心，整合师范生成长档案、毕业生就业跟踪、中小学需求反馈等信息，通过全程跟踪记录为精准培养提供依据。二要实现课程资源互通与师资共享。开发“线上 + 线下”共享课程库，高校提供理论课程，中小学上传课堂管理案例集等实践资源，形成“学分互认”机制。落实“双导师制”，高校教师担任学科导师，中小学名师担任实践导师，定期开展联合教研活动。此外，共创数据平台，建立区域教育大数据中心，整合师范生成长档案、毕业生就业跟踪、中小学需求反馈等信息，通过全程跟踪记录为精准培养提供依据。

（三）创新实践导向的教学模式，提高培养质量

以真实教育问题为导向，重构“学用结合”的教学体系，提升师范生核心能力。推动课程体系改革，开发模块化实践课程，如“乡村教育振兴专题”“跨学科课程设计”，融入中小学真实案例。贯通教育见习、教育实习、教育研习“三习”环节，建设“三习”智能管理平台，进行信息化、全程化质量监管；要求师范生必须参与中小学课堂观察与助教活动以提升其教学技能。推动职前职后一体化，建立“师范生—新手教师—骨干教师”成长共同体，组织师范生参与中小学教研活动，提前融入职业生态。例如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就尤为重视职前教育与在职发展的有机对接。基于三方合作模式，建立了职前教育实习模式；通过各类教育实践项目为师范生提供与成熟教师对话的机会，以推动师范生的情感、价值观和教学技能的共同发展[7]。

（四）完善动态评价与反馈体系，实现全过程质量监控

构建“多元参与、过程导向、持续改进”的评价机制，保障培养质量。推动评价主体实现多元化，引入高校导师、中小学教师、同行师范生、学生家长、第三方专家等多元评价主体，形成 360 度评价矩阵。例如，师范院校教师对师范生学习情况进行过程评价，中小学教师对师范生的课堂表现进行量化评分，家长通过问卷反馈其家校沟通能力，师范生之间进行互评和自评。推动评价内容过程化，采用电子“成长档案袋”记录师范生从入学到毕业的关键能力发展轨迹，包括教学设计、课堂录像、学生评价、反思日志等材料。实施阶段性能力认证，如通过“微格教学考核”“教育问题诊断答辩”等环节，分步骤检验实践能力。形成反馈与改进闭环，建立“评价—反馈—优化”动态机制，将中小学对师范生的能力短板反馈至高校课程设置环节，高校通过不断完善各专业知识图谱和能力图谱，优化人才培养方案。

四、结语

通过制度协同、资源共享、模式创新与评价优化，“校校合作共同体”能够有效破解传统师范生培养中理论与实践脱节、资源分散等难题，为新时代基础教育输送“下得去、教得好、留得住”的高素质教师。

参考文献

[1] 张志旻，赵世奎，任之光，等 . 共同体的界定、内涵及其生成——共同体研究综述 [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0(10):14-20.

[2] 刘佳 . 教育共同体建设的现实样态与优化路向 [J]. 教学与管理 ,2025(04):11-15.

[3] 毛维准 .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的责任共同体构建 [J]. 国际展望 ,2022(04):21-38.

[4] 赵运兵，贾旻 . 职业教育共同体构建路径：何以可能？何以可为？[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3(30):79-86.

[5]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致慰问信 [EB/OL].(2013-09-09)[2025-11-28].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9/09/c_117294186.htm.

[6] 王管 .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构建的逻辑理路与实践创新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4(11):131-136.

[7] 陆道坤，丁春云 .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的教师教育模式 [J]. 高教探索 ,2018(09):79-85.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2 年度吉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一般课题“师范类专业认证背景下师范院校与基础教育‘“校校合作共同体”’构建研究”（GH22531）；2024 年度白城师范学院教育教学研究课题重点课题“创变、融合、数字：基础教育新质教师‘三维一体’能力结构及培育路径研究”（ZD202405）。

（作者单位：白城师范学院）

团体沙盘干预对大学生社交焦虑的疗效及机制：一项混合方法研究

王　婷

摘要：本研究采用混合方法，旨在探究团体沙盘干预对大学生社交焦虑的干预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选取某高校 20 名社交焦虑水平较高的大学生，随机分为干预组与对照组，干预组接受为期 6 周的限制性团体沙盘干预。量化结果显示：时间与组别的交互作用显著（p=0.039），表明干预对社交焦虑具有积极影响。简单效应分析显示，干预组社交焦虑得分呈下降趋势（边缘显著，p=0.098，d=0.58），而对照组略有上升；团体氛围中的投入维度逐步改善，冲突维度在中期出现阶段性上升后回落。质性分析发现，参与者在干预后主要呈现“心理成长”与“社交适应”两方面的积极变化，具体体现在表达勇气提升、自我接纳增强、社交心态更从容等方面。改变机制主要来源于“沙盘的安全性表达空间”与“团体互动中的支持性反馈”。研究初步指出，团体沙盘干预对缓解大学生社交焦虑具有积极效果，其作用机制与沙盘特有的象征表达、非评判氛围及团体动力密切相关。本研究为高校开展心理团体干预提供了实践参考，也拓展了表达性艺术治疗在社交焦虑干预中的应用范围。

关键词：社交焦虑；团体沙盘干预；团体氛围

一、引言

社交焦虑在大学生群体中较为普遍，不仅影响个体的学业表现与人际交往，也可能进一步发展为社交焦虑障碍（Spence&Rapee，2016）[1]。以往针对社交焦虑的干预多以认知行为疗法为主，虽然有效，但对部分不擅言语表达或情绪内隐的学生而言，参与动机和干预效果可能受限（Kashdan&Farmer，2014）[2]。近年来，表达性艺术治疗因其非语言、体验式等特点，逐渐被应用于情绪与人际干预中，其中团体沙盘（箱庭）作为一种象征性、创造性的团体辅导形式，强调通过沙具摆放、场景构建进行潜意识表达与情绪外化（张日昇，2006）[3]，在安全且支持性的团体氛围中促进参与者自我觉察与社会互动。

然而，目前国内针对团体沙盘干预大学生社交焦虑的实证研究仍相对较少，尤其缺乏对其干预机制的系统探讨。多数研究仅关注干预前后量表得分的变化，未能深入揭示“为什么有效”以及“如何起效”的过程机制（张日昇等，2008）[4]。因此，本研究采用“量化—质性”混合研究设计，旨在检验团体沙盘干预对大学生社交焦虑的干预效果，并通过过程性团体氛围数据与干预后访谈，深入分析改变发生的心理与互动机制，以期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更具操作性的实践依据。

二、方法

（一）被试

在某高校通过扫描微信二维码随机发放问卷 334 份，筛选满足以下条件的参与者进行研究：（a）LSAS 社交焦虑量表 >60 分；（b）未诊断过任何精神障碍；（c）干预期间不接受其他心理咨询及心理活动。最终纳入学生 20 人。将 20 名参与者随机分为两组（干预组 10 人、对照组 10 人）。

（二）干预方案

研究采用混合实验设计，2（组别：干预组、对照组）* 2（时间：前测、后测）。为保障干预效果，将干预组的 10 名同学分为两组，每组 5 人，进行为期 6 周的团体沙盘干预。团体沙盘干预方案采用限制性团体箱庭制作，见表 1。对照组不做干预。在干预前后一周内对干预组和对照组进行社交焦虑的施测。同时对干预组在每周活动后进行团体氛围量表的测量。

（三）测量工具

1. 利博维茨社交焦虑量表（Liebowitz Social Anxiety Scale, LSAS）由 Liebowitz（1987）编制[5]，总共有 24 道题，每道题分别评估受测者在社交场景中的恐惧和回避程度，单选 4 点计分。它包含了两个分量表，分别为恐惧、回避。信度良好，总分和两个分量表的

重测信度分别为 0.779、0.802、0.749。

表 1　限制性团体箱庭制作流程

步骤	内容	具体规则
第一步	感受沙子阶段	邀请成员使用双手触摸沙子，感受沙子带来的内在感受
第二步	决定制作顺序	小组通过随机方式决定由谁第一个开始创作
第三步	团队共创阶段	由第一个成员开始按顺时针完成 6 轮创作，成员每轮只能完成一个动作（放置一个沙具、拿走一个沙具、移动一个沙具或挖一条河，同类沙具一模一样的一次拿 2—3 件可视为一个动作）
第四步	讨论分享阶段	小组成员按顺序分享自己每一轮的操作以及思考过程
第五步	移动调整阶段	分享结束后，小组有一次调整沙盘的机会。按照制作顺序，由第一个创作的成员开始，每人只能完成一个动作或者选择弃权
第六步	作品取名阶段	小组成员为沙盘取名（个人作品和整体作品）
第七步	拍照留影阶段	小组成员选择自己喜欢的角度为沙盘拍照留念
第八步	拆除阶段	每位成员将自己拿的沙具放回原位

2. 团体氛围量表（Group Climate Questionnaire-Short，GCQ-S）该量表是一个自陈量表，由 MacKenzie 在 1983 年开发，用来测量团体成员对团体治疗环境的感知，包含投入、回避和冲突三个维度。贾烜（2017）对其中文版进行了修订 [6]。删除回避维度后，量表还剩 9 个题目，采用李克特 7 点记分，“0 分”代表完全不正确，“6 分”代表完全正确。最终结果显示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856。

（四）数据分析

采用 JASP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干预组和对照组的前测资料进行差异性检验。使用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和简单效应分析考察干预效果。对干预组在每周活动后团体氛围进行描述性过程评估。采用 Nvivol 软件对 6 次干预活动过程性资料与干预后访谈进行主题分析。

三、结果

（一）基线比较

对干预组和对照组前测资料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两组在各测量维度上没有显著差异，说明两组在干预前基本同质。

（二）干预组和对照组前后测差异的显著性检验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见表 2），时间与组别在社交焦虑分数上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F=4.98，P=0.039）。这表明两组参与者的社交焦虑随时间变化的模式不同。

表 2　两因素方差分析

变量	干预组（n=10）				对照组（n=10）				F	p
	前测		后测		前测		后测			
	M	SD	M	SD	M	SD	M	SD		
社交焦虑	65.30	15.99	55.30	20.90	55.50	21.85	61.30	20.90	4.98	0.039*

注：F= 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交互作用的 Greenhouse−Geisser 结果（时间 × 组别）。*P<0.05，**P<0.01，***P<0.001。

简单效应分析进一步揭示了这种差异的具体模式。干预组社交焦虑分数从前测（M=65.30, SD=15.99）到后测（M=55.30, SD=20.90）有所下降，尽管这一变化在统计上仅呈现边缘显著性，t(9)=1.85, p=0.098, Cohen′ s d=0.58。对照组社交焦虑从前测（M=55.50, SD=21.85）到后测（M=61.30, SD=20.90）略有上升，这一变化未达到统计显著性，t(9)=-1.27, p=0.236。在后测时点上，干预组与对照组的社交焦虑分数差异未达到统计显著性，t(18)=0.64, p=0.529。

（三）团体氛围的描述性过程评估

6 次团体沙盘干预中团体氛围的变化结果如图 1 所示。由图可知，干预组成员在投入维度、冲突维度和团体氛围总分上呈逐步提升趋势。其中，投入维度整体呈缓慢上升趋势，表明成员对团体的参与感和归属感逐步增强。冲突维度在第 3 次干预时有一个明显上升，随后在第 4-6 次逐渐回落，表明成员在建立初步信任后开始表达分歧与异议，随后在安全氛围中化解冲突、达成新的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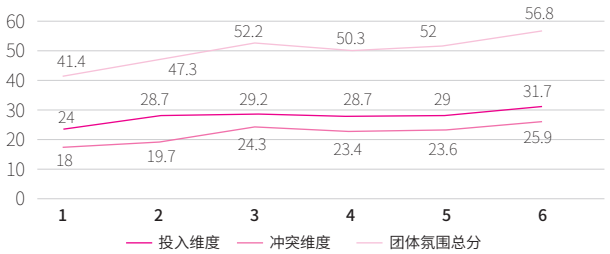


图 1 团体氛围变化

（四）干预体验的质性分析主题

1. 干预前后的变化的质性分析

研究通过对干预组 10 份沙盘活动后访谈文本进行系统分析，共编码到 42 个原始意义单元。经过对各意义单元反复比较、归纳与提炼，最终形成表达的权利、自由感获得等 6 个次级主题。进一步聚类分析后，这些改变可归纳为心理成长和社交适应两个核心维度。

心理成长包含：表达的权利，如成员 A“我现在能够意识到表达自己的想法是正当的”；情绪的舒放，如成员 H“从第一次的紧张到后来的期待，每次活动结束都感到开心”；自由感获得，如成员 C“感受到了无与伦比的自由，可以随意按照自己的想法选择沙具”三个方面。

社交适应包含：沉默到主动，如成员 F“从害怕否定到愿意主动表达，哪怕想法不同也会和平交流”；单向到互动，如成员 E“敢于对别人的选择发出疑问，以交流为目的而不是争对错”；协作意识增强，如成员 F“通过沙具的互相配合与补充，体验到被团队托住的温暖”三个方面。

2. 改变发生机制的质性分析

通过对访谈材料的深入解析，共提取 37 个关于改变原因的意义单元，归纳形成沙具媒介、非语言沟通等 7 个次级主题。进一步整合后，这些因素可以归结为媒介环境特性与团体过程要素两大作用机制。

媒介环境因素包括：象征性表达，如成员 F“沙具的摆放让我能用具象方式传递情绪，不用组织语言”；安全的氛围，如成员 C“感受到自由，不用担心被否定”；非语言沟通，如成员 E“通过沙具实现无声交流，是思维交融的具象化体现”；心理外化，如成员 H“将内心模糊的情绪直观展现出来”四个方面。

团体过程因素包括：积极的反馈，如成员 B“同伴认真倾听并点头认可，让我感到被接纳”；思维个性化，如成员 A“看到同一个主题下大家的不同思维层次和深度”；协作性共创，如成员 E“通过延续他人的创意，体验团队配合的默契”三个方面。

四、讨论

本研究通过混合方法发现，团体沙盘干预对大学生社交焦虑具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且干预起效的机制与以往纯认知或暴露性干预有所不同。量化结果显示，干预组社交焦虑得分呈下降趋势，且效应量达到中等水平（d=0.58），说明干预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与此同时，对照组社交焦虑得分略有上升，可能反映未经干预的高焦虑大学生在学期中因学业、社交任务增多而焦虑自然攀升的趋势，这也从侧面凸显了干预的缓冲作用。

结合质性资料与过程性团体氛围数据，本研究发现干预可能通过以下机制起效：第一，沙盘媒介提供安全的表达空间。多位参与者提到“不用组织语言就能表达情绪”（F）、“怎么摆都可以，没有对错”（H）。这种非语言、象征性的表达方式降低了对说错话、被评价的恐惧，使社交焦虑个体更易启动情感表达与自我呈现，与张雯（2009）提出的“沙盘作为自由与受保护的空间”观点一致[7]。第二，团体互动提供被看见与被认可的正性体验。访谈中频繁出现“被认真倾听”“我的选择被延续”等叙述，这与团体氛围量表中投入维度逐步上升的结果相呼应。这种在团体中获得的接纳感与归属感，有助于缓解社交焦虑中常见的负面评价恐惧（Weeks et al,2016）进而促进社交自我效能感的提升[8]。第三，冲突的出现与处理反映团体真实互动进展。值得注意的是，团体氛围中冲突维度在第 3 次干预时出现明显上升，这可能并非消极信号，而是团体进入风暴阶段的表现。部分参与者在访谈中提及“面对分歧时学会理性应对”，说明在安全氛围下经历并处理轻度人际张力，本身即一种暴露与学习，有助于提升社交应对能力。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首先，样本量较小，干预组与对照组后测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未来需要扩大样本进一步验证；其次，缺乏追踪数据，无法判断干预效果的长期稳定性。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沙盘干预对社交焦虑各维度的差异作用。

本研究为高校心理工作提供以下借鉴：第一，对于社交焦虑学生，可优先选择体验式团体形式，减少言语表达压力；第二，在团体过程中，带领者应注意营造安全、非评判的氛围，促进成员间的积极反馈与支持；第三，适时处理团体中出现的冲突或张力，将其转化为学习社交和应对技巧的机会。

五、结语

本研究初步表明，团体沙盘干预对缓解大学生社交焦虑具有潜在的积极效果。其作用机制不仅来源于沙盘本身的象征表达与情绪外化功能，也源于团体互动中提供的接纳性、支持性人际关系体验。未来可通过更严谨的大样本研究进一步验证其效果，以更有效地服务于大学生社交焦虑的预防与干预工作。

参考文献

[1]SPENCE S H,RAPEE R M.The etiology of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An evidence-based model[J].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2016(86):50-67.

[2]KASHDAN T B,FARMER A S.Differentiating emotions across contexts: Comparing adults with and without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using random, social interaction, and daily experience sampling[J].Emotion,2014,14(03):629-638.

[3] 张日昇 . 箱庭疗法 [M]. 北京 :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6.

[4] 张日昇 , 徐洁 , 张雯 . 心理咨询与治疗研究中的质性研究 [J]. 心理科学 ,2008(03):681-684.

[5]LIEBOWITZ M R.Social phobia[J].Modern Problems of Pharmacopsychiatry,1987(22):141-173.

[6] 贾烜 . 团体辅导中凝聚力的测量 : GCQ—S 与 GEM 的修订 [J]. 许昌学院学报 ,2017,36(06):137-140.

[7] 张雯 , 张日昇 , 徐洁 . 强迫思维女大学生的箱庭疗法个案研究 [J]. 心理科学 ,2009,32(04):886-890.

[8]WEEKS J W,HEIMBERG R G,HEUER R.Exploring the role of behavioral submissiveness in social anxiety[J].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2016,35(06):449-474.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西京学院 2025 年辅导员科研项目“大学生社交焦虑的团体沙盘干预研究”（XJXKT2511）。

（作者单位：西京学院）

社会认同与智能手机成瘾对大学生学习方式的影响

宋　锐　韩玲玲 *

摘要： 目的：探究智能手机成瘾倾向在社会认同与大学生表面学习、深度学习两种学习方式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社会认同问卷、智能手机成瘾倾向量表和学习过程量表对 510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1）社会认同与智能手机成瘾呈显著负相关，与表面学习和深度学习分别呈显著负相关和显著正相关；智能手机成瘾与表面学习和深度学习分别呈显著正相关和显著负相关；（2）智能手机成瘾在社会认同与表面学习中起完全中介效应。结论：社会认同完全通过智能手机成瘾的中介作用预测大学生的表面学习方式。

关键词： 社会认同；智能手机成瘾；表面学习；深度学习；大学生

科技快速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促进学生高质量学习”成为信息化时代亟待研究的教育议题，也是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关键。学习方式是学习者参与学习任务而形成的学习过程，是个体认知加工策略与学习动机的有机结合，深度学习和表面学习两分法构成了学习方式的两极 [1]。深度学习是指通过设置高阶性的掌握目标，对特定领域的持续性研究，其核心在于内化知识的本质，达成对学习内容深层价值与意义的领悟 [2]。深度学习状态下的学生具有主观能动性，主动对知识进行意义建构，有助于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有效提升并获得学业成功。而表面学习则是在分数、奖励甚至避免惩罚等外在驱动下，通过设置表现目标，采用简单的类别知觉、机械复述等浅表策略，最终形成的被动与应付的知识习得模式 [3]。对大学生群体进行调查，结果表明获得优异学业成就的学生无一例外都是深度学习的方式 [4]。不恰当的学习方式不仅影响大学生的学业成绩，也可能引发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因此，有必要对大学生的学习方式进行深入研究。

社会认同（social-identity）指个体内化其特定社会群体成员身份，并认同该身份带来的价值和情感意义，构成自我概念的一部分，会对个体的社会态度和行为产生影响 [5]183-190。根据社会认同理论，为了维护自尊，个体存在积极自我评价的需求，使其对自己所属团体的行为和态度产生偏好。然而，学业压力大、就业困境等因素影响，大学生对所属群体的自豪感正在减退，必然会引发社会认同困惑。为了解决社会认同困惑，部分大学生开始寻找有利于积极自尊形成的环境，即网络虚拟环境。相比于基础教育阶段，大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参与玩网络游戏、网上聊天等网络社交活动。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大学生群体早已成为网络使用者的主力军。随着智能手机已深度融入了人们的生活中，过多的卷入式使用行为必然增加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的风险。智能手机成瘾是一种个体无法控制地滥用智能手机的行为模式，核心特征是对手机处于深度痴迷状态，并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和正常的社会功能，是一种成瘾行为 [6]。有研究表明，过度使用手机达到成瘾状态不仅影响心理健康，更会对人际交往和学业造成消极影响 [7]。大学生将大量时间投入智能手机的社交与娱乐功能，这可能减少了其进行深度学习所需的认知投入，转而倾向更为浅显的表面学习 [8]。有研究表明，深度学习与智能手机成瘾负相关，表面学习与智能手机成瘾正相关 [9]。一部分大学生把网络社交作为逃避现实和真实身份的媒介，这种动机会导致问题网络使用。如果考虑大学生的发展特点，认同是影响其问题网络使用的重要因素，网络聊天和游戏被认为是社会认同困惑的重要预测源 [10]。有研究结果指出，个体对所属群体的社会地位评价与自身的社交广度有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个体对自己所在社会群体的社会地位评价越低，越会倾向于在网上结交更多的朋友 [11]。另有研究表明，问题网络使用与社会认同存在显著负相关 [12]。自我建构假说提出，低权力感会诱发个体形成依存型的自我建构方式。这一方式使个体在人际互动中体验到更多的消极情绪与更低的人际关系质量，外在表现为更多的回避性社交策略。智能手机带来的虚拟网络世界，不仅可以回避个体不认同的社会群体人际交往，还可以给个体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和愉悦情绪 [13]。综上所述，社

会认同感低的个体，学习方式倾向于表面学习，智能手机成瘾倾向越高；社会认同感高的个体，学习方式倾向于深度学习，智能手机成瘾倾向越低。因此，本研究旨在检验智能手机成瘾在社会认同与大学生学习方式之间的中介作用，为缓解大学生学习压力并提高学习效率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一、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本研究采取方便取样的方式，在哈尔滨市两所高校随机抽取 510 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有效问卷 466 份，有效率 91.37%。其中女生 287 人（61.59%），男生 179 人（38.41%）。

（二）工具

1. 社会认同问卷

采用艾里默、柯特卡斯和沃夫克编制的社会认同问卷 [5]183-190，包括群体自尊、自我分类和群体承诺 3 个维度，共 10 个条目。问卷采用 Likert-7 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社会认同感越强。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9。

2. 智能手机成瘾量表

采用苏双等编制的智能手机成瘾量表 [14]，共 22 个条目，包括戒断行为、突显行为等 6 个维度。量表采用 Likert-5 点计分，得分越高，代表个体的成瘾水平越高。此样本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2。

3. 学习过程量表

采用付亦宁修订的学习过程量表 [15]，旨在考查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具体学习方式，包含表面学习动机、表面学习策略、深度学习动机、深度学习策略 4 个维度，共 16 个条目。量表采用 Likert-5 点计分，表面学习与深度学习，均体现在动机与策略两个维度的高分特征上，并形成了不同的学习模式。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8。

（三）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工具为 SPSS 25.0（用于基础统计分析）与 Amos21.0 软件（用于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二、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子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 [16]。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共 15 个，其中首个因子的变异解释量为 31.88%，未超出 40% 的临界标准，表明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社会认同得分与智能手机成瘾和表面学习得分均呈显著负相关，智能手机成瘾得分与表面学习得分呈显著正相关，社会认同得分与深度学习得分呈显著正相关，智能手机成瘾得分与深度学习得分呈显著负相关，结果见表 1。

表 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n=466）

	M ± SD	1	2	3	4
1 社会认同	4.85 ± 0.83	1			
2 智能手机成瘾	2.82 ± 0.66	–0.20**	1		
3 表面学习	3.05 ± 0.60	–0.11*	0.37**	1	
4 深度学习	3.29 ± 0.71	0.27**	–0.12*	0.13**	1

注：*p < 0.05,**p < 0.01,***p < 0.001。

（三）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将社会认同作为自变量，表面学习得分作为因变量，智能手机成瘾得分作为中介变量进行结构建模分析。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标为 χ2/df=4.91，GFI=0.93，IFI=0.92，CFI=0.91，RMSEA=0.08，均符合统计学要求，模型拟合良好，模型如图 1 所示。基于模型拟合结果，运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法检验中介效应并估计置信区间 [17]1086-1090。结果表明，社会认同对表面学习的间接效应显著，其 95% 的置信区间为［-0.51, -0.17］，置信区间内不包含 0，可以认为智能手机成瘾的中介效应成立。在加入中介变量后，社会认同对表面学习的直接效应不再显著，置信区间为［-0.20, 0.01］，置信区间包含 0，说明智能手机成瘾在社会认同与表面学习关系中起完全中介效应。而智能手机成瘾在社会认同与深度学习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0.03, 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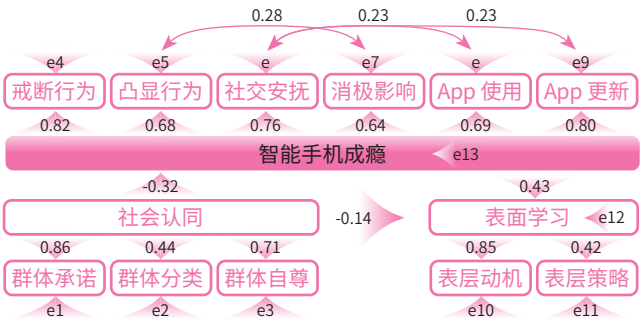


图 1 智能手机成瘾在社会认同与表面学习之间的中介效应模型

三、讨论

社会认同与表面学习呈显著负相关，与深度学习呈显著正相关，说明大学生的社会认同感与其学习方式显著相关。社会认同感较高的大学生，目标设置具有长远性和计划性，能够专注于正在进行的学习任务，使用较高水平的认知策略，运用更有效的学习方法，易进入高阶思维学习阶段，实现深度学习。而社会认同感低的大学生对所在群体的社会地位评价较低，不认同自我的当前身份。学习是为了做给别人看或向别人证明自己的能力，更关心是否成功而不是自我成长，常常采取一些投机取巧的方法进行表面学习，从而证明自我。

智能手机成瘾与表面学习呈显著正相关，与深度

学习呈显著负相关。表面学习者的状态是“我需要学习”，而深度学习者是“我想学习”。进入网络时代，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在课堂中频繁使用智能手机而无心向学，课后更是将刷短视频、浏览网页等使用手机行为视作休闲活动。大学生虽未完全沉迷于智能手机，但被智能手机“绑架”，成为潜在的智能手机成瘾者。学习过程被以智能手机为载体的社交娱乐信息打断，学习时间被碎片化，不能集中精力进行深入思考，是为了应对作业或考试的“我需要学习”[17]1086-1090。那些能够合理使用智能手机的大学生，有连续的时间建立知识连接，成为积极的思考者，达成“我想学习”的深度学习状态[18]。

智能手机成瘾在社会认同与表面学习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说明社会认同完全通过手机成瘾对表面学习产生影响。埃里克森的理论将大学生群体定位为青少年晚期发展阶段，其核心调整就是社会认同感的获得。这一过程涉及对自我身份、社会归属及人生目标的持续探索和承诺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个体社会认同的发展是一种社会化过程，是在人与环境相互作用下形成的，较差的社会认同状况会影响到个体的自我价值的评估。低社会认同者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拥有良好的人际交往，互联网起到了功能性补偿的作用。他们在虚拟世界中能够实现现实难以完成的社会功能，通过获得认可与赞同提升自我价值感[19]，更愿意在网络、智能手机上消耗时间和精力，促使智能手机成瘾倾向和行为明显增加。社会认同水平制约着学习客体对信息的认知程度，进而影响个体在表面学习至深度学习的连续谱系中所处的状态。从心理机能的角度而言，深度学习的发生依赖于个体的认知发展向意义获得与社会认同这两个维度并行推进[20]。个体确立自己在共同体中的身份和价值感，实现深度学习。而社会认同水平低者则趋于相反方向，走向表面学习。“认同危机”的顺利解决，标志着个体的人格成熟，自我完善[21]。因此可以通过提高个体的社会认同感，降低个体的智能手机成瘾倾向，改善表面学习状态，将学习者从表面学习状态引向深度学习。

对学习方式的研究可以促进学生高质量学习，是教育教学改革实践关注的焦点。以往研究多从学生学习发生过程入手，通过指导教师创设真实性的学习情境、组织高认知复杂性的学习活动、开展发展性的教学评价等教学手段干预学生的学习方式[22]。本研究基于社会认知理论的框架，从心理、行为发展视角探讨个体对自己所属团体的自我评价、智能手机使用行为和学习方式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丰富了学习方式的相关研究。根据研究结果，学校教育应该提升学生的社会认同感，重视智能手机成瘾的危害性，有利于学生形成以高阶认知能力提升为目标的深度学习，为促进大学生深度学习的形成提供了心理干预框架。

同时，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研究采取横断面调查模式，只能获得社会认同、智能手机成瘾和大学生学习方式的关系，无法得出个体动态发展过程和发展轨迹。因此，在未来研究中，可选用纵向研究方法进一步探讨变量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史秋衡，孙昕妍. 大学生学习方式的理实之路——基于“国家大学生学情调查”（NCSS）追踪研究 [J]. 教育科学，2024,40(02):1-8.

[2] 郭华. 深度学习及其意义 [J]. 课程·教材·教法，2016,36(11):25-32.

[3] 沈霞娟，张宝辉，曾宁. 国外近十年深度学习实证研究综述——主题、情境、方法及结果 [J]. 电化教育研究，2019,40(05):111-119.

[4] 朱莲花，张聪，杨连生. 大学生感知的课堂环境、学习方式对学习成果的影响研究 [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0(05):114-120.

[5] 杨欣欣，刘勤学，周宗奎. 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对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感恩和社会认同的作用 [J]. 心理发展与教育，2017,33(02):183-190.

[6] 刘勤学，杨燕，林悦，等. 智能手机成瘾：概念、测量及影响因素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7,25(01):82-87.

[7] 张琰，孙亮. 手机成瘾对大学生人际交往的影响 [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7(51):158-160.

[8] 韩玲玲，刘爱书，肖曼曼. 大学生错失恐惧对手机成瘾倾向的影响：学习方式的中介作用 [J]. 中国特殊教育，2019(12):78-82.

[9] 方超，黄斌. 信息技术促进了学生的学业表现吗？——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J]. 开放教育研究，2018,24(06):88-99.

[10] 陈虹，秦静，李静，等. 互联网使用对中国城市居民人际交往的影响：社会认同的中介效应 [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23(09):40-51,127.

[11] 阴良. 孤独感、社会认同与 SNS 使用之研究——以人人网为例 [J]. 新闻大学，2010(04):8-18.

[12] 叶映华. 大学生认同困惑与问题网络使用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 [J]. 教育研究，2015,36(06):103-109,159.

[13] 黄霞，丁芳，左晓扬，等. 父母心理控制对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的影响 [J]. 心理研究，2025,18(01):71-78.

[14] 苏双，潘婷婷，刘勤学，等. 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量表的初步编制 [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4,28(05):392-397.

[15] 付亦宁. 本科生深层学习过程及其教学策略研究 [D]. 苏州：苏州大学，2014.

[16] 周浩，龙立荣.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 [J]. 心理科学进展，2004(06):942-950.

[17] 张玥，张冬静，熊琳，等. 手机成瘾与大学生抑郁、焦虑的关系：中介与调节效应分析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8,26(06):1086-1090.

（下转 246 页）

大学生综合素质测评体系构建与完善

王　肖

摘要：构建并完善科学规范、导向清晰的大学生综合素质测评体系，是深入贯彻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抓手。该体系坚持育人为本、全面发展的核心理念，围绕品德修养、学业发展、身心素质、审美素养与劳动实践五大维度，形成系统化、可操作的评价内容。在实践推进中，通过科学优化指标权重、多元拓展评价主体与测评渠道、健全过程性评价及结果反馈机制，不断提升测评的客观性与实效性，为高校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提高育人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关键词：大学生；综合素质测评体系；构建；完善；教育评价

202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要“强化过程性评价，探索增值性评价，健全综合评价”，这为高校学生评价体系改革指明了方向。部分高校的综合素质测评体系仍存在诸多不足，比如测评指标偏重智育成绩而忽视其他维度发展，测评方法简单粗放缺乏动态调整，测评结果应用与人才培养目标衔接不够紧密等问题，导致测评体系难以充分发挥引导学生全面发展的作用。基于此，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完善路径以期为高校优化学生评价机制、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

一、构建与完善大学生综合素质测评体系的意义

（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

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立德树人，大学生综合素质测评体系将德育置于首位，通过明确的思想品德测评维度，引导学生在学习生活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正确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这与《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中“坚持以德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要求相契合，能够从评价层面强化育人导向，确保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到实处。

（二）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要举措

当前部分高校在人才培养中存在评价标准单一、重分数轻能力等问题制约了教育质量的提升。构建与完善大学生综合素质测评体系能够通过多维度、全方位的评价指标，全面反映学生的成长状况，为高校调整培养方案、优化课程设置、改进教学方法提供依据。同时，借助测评过程中收集的各类数据，高校可以精准把握教育教学中的短板，推动教育资源合理配置，从而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跃升。

（三）助力大学生成长成才的现实需要

大学生正处于成长发展的关键时期，综合素质测评体系如同一个“导航仪”，既为学生提供了清晰的发展目标，也让他们知晓在德、智、体、美、劳各方面应达到的标准[1]。学生根据测评反馈针对性地弥补短板、发挥特长，主动参与社会实践、文体活动等，在全面发展中提升自身竞争力。这种自我认知与主动

（上接 245 页）

[18] 连帅磊，刘庆奇，孙晓军，等 . 手机成瘾与大学生拖延行为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J]. 心理发展与教育，2018,34(05):595-604.

[19] 杨欣欣，刘勤学，周宗奎 . 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对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感恩和社会认同的作用 [J]. 心理发展与教育，2017,33(02):183-190.

[20] 张静，陈佑清 . 学习科学视域中面向深度学习的信息化教学方式变革 [J]. 中国电化教育，2013(04):20-24.

[21] 邓志强 . 网络时代青年的社会认同困境及应对策略 [J]. 中国青年研究，2014(02):68-73.

[22] 王胜兰，彭双，钟燕兰 . 深度学习的发生过程新解及教学干预框架 [J]. 教学与管理，2025(06):20-26.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1 年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发展资源和压力风险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研究”（21SHE341）；2025 年度西南医科大学：四川医院管理和发展研究中心资助“发展资源与压力风险对医务人员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及干预模式研究”（SCYG2025-7）。

（作者：宋锐，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讲师；通信作者韩玲玲，哈尔滨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

提升的过程能够激发学生的内在成长动力，让他们在大学期间实现更有质量的成长。

二、构建与完善大学生综合素质测评体系的原则

（一）坚持育人为本，凸显综合素质导向

构建与完善大学生综合素质测评体系的核心目的在于更好地服务于人才培养，始终把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要求坚持育人为本，凸显综合素质导向。一是不能将测评仅仅视为一种简单的考核手段，而要让它成为引导学生成长的“指挥棒”，通过设置涵盖德、智、体、美、劳等多个维度的测评内容让学生明白全面发展的重要性。二是在测评过程中，要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个性发展，不能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所有学生，要发展自己的特长和优势让每个学生都能在测评中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向。

（二）坚持科学规范，确保测评客观公正

科学规范是保证大学生综合素质测评体系有效运行的基础，确保测评结果的客观公正。一是在测评指标的设定上，要进行深入的调研和论证，确保每个指标都具有明确的内涵和可操作性。同时，要合理划分各个指标的层级和范围，让测评内容更加条理清晰。二是在测评方法的选择上，采用多种方式相结合的办法，既有定量的考核，也有定性的评价，避免单一方法带来的局限性。在数据采集过程中，要建立严格的数据审核机制防止出现数据造假等问题。三是制定规范的测评流程明确各个环节的责任主体和操作要求，确保测评工作有序进行。

（三）坚持动态调整，适应时代发展需求

时代在不断发展变化，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在持续更新，大学生综合素质测评体系必须坚持动态调整的原则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一是密切关注社会发展趋势和教育改革方向，及时了解新时代对大学生素质提出的新要求[2]。二是定期对测评体系的运行效果进行评估，广泛收集学生、教师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根据评估结果和实际需求对测评指标、权重分配和测评方法等进行调整和完善。

三、大学生综合素质测评体系的构建内容

（一）以德育为魂，明确思想品德测评维度

德育是大学生综合素质的灵魂所在，决定着人才培养的方向。在“认知”层面，主要考查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的掌握程度，将“思想道德与法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思政课程成绩纳入测评，同时关注学生对党的理论、方针政策的理解和认同情况。在“实践”层面，聚焦学生的日常行为表现，包括政治态度、法纪观念、集体观念、社会公德和个人品德等方面。

政治态度上考查学生是否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否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在法纪观念层面看学生是否遵守宪法法律和校纪校规；在集体观念上，关注学生参与集体活动、维护集体利益的表现；在社会公德层面考量学生在公共场所的行为规范和对公共利益的维护；个人品德层面以诚实守信、尊敬师长、团结同学等为评价要点。

（二）以智育为基，完善学业水平测评指标

智育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基础，学业水平测评指标的完善需兼顾基础知识掌握与实践能力提升。一方面，将人才培养方案中规定的公共必修课、学科基础课、专业必修课等课程成绩作为核心指标，通过学分绩点来量化学生的学习成果，这部分成绩能直观反映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另一方面，拓展测评范围，在学科竞赛方面，依据获奖等级给予不同分值；在科学研究上，鼓励学生参与课题研究、发表学术论文或申请专利，以此衡量其科研潜力；技能证书包括英语等级证书、计算机等级证书以及各类职业资格证书,体现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

（三）以体育为翼，健全身心素质测评内容

体育是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的重要途径，身心素质测评内容应兼顾身体机能与心理状态的全面发展。在身体机能方面，将体育课程成绩作为基础指标，包括大一、大二的体育选修课成绩和大三的体质健康测试成绩，同时把军训表现纳入测评范围，鼓励学生参与校院级运动会、体育比赛等各类体育活动，根据参与情况和获奖等级给予加分，以此激发学生的运动热情。在心理素质测评方面，将心理健康课程成绩纳入测评，同时关注学生参与心理健康讲座、心理素质拓展活动的表现。通过这些测评内容不仅能考查学生的身体素质是否达标，更能了解其心理调适能力。

（四）以美育为韵，丰富人文素养测评项目

美育能提升大学生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丰富人文素养测评项目需融合“课程学习”与“实践体验”。在课程学习方面，将美育类课程和艺术类文化素质课程的成绩纳入测评，如“艺术鉴赏”“音乐基础”“茶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课程。实践体验则包括文艺活动参与、艺术创作和审美实践等内容。学生参与校院级文艺汇演、书画展览、手抄报活动、黑板报设计、摄影比赛等活动，并根据表现给予相应分值；发表文学作品、艺术创作或在媒体上发布优质文化内容的也可获得加分；担任文艺类社团干部或参与美育志愿服务同样计入测评范围。通过这些多元化的测评项目既能让学生在学习中提升审美素养，又能在实践中感受美、创造美，实现以美育人、以美化人的目标。

（五）以劳育为根，构建实践能力测评体系

劳育是培养大学生劳动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关键，实践能力测评体系应涵盖“劳动课程”与“劳动实践”两大板块。在劳动课程方面，将劳动教育课程、创新创业实践课程以及各类实习课程的成绩纳入测评，考查学生对劳动知识和技能的掌握情况。劳动实践分为

生产性劳动、服务性劳动和日常生活劳动：生产性劳动包括参与专业相关的生产实践、创新创业项目等，依据项目成果给予评价；服务性劳动涵盖“三下乡”社会实践、校园志愿服务、勤工助学等以参与时长和表现作为测评依据；日常生活劳动关注学生的宿舍卫生、个人物品整理、垃圾分类等日常行为[3]。通过构建这样的测评体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在劳动中学会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真正做到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

四、大学生综合素质测评体系的完善路径

（一）优化测评指标权重，增强体系科学性

测评指标权重的合理分配是确保综合素质测评体系科学有效的核心，权重设置失衡会导致测评导向偏离全面发展目标。当前部分高校的测评体系中，智育指标权重过高，挤占了德、体、美、劳等维度的评价空间，难以真正体现“五育并举”的育人理念。优化指标权重需以《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为指导，结合学校办学定位和专业特色进行动态调整。一是确立“五育”均衡发展的基本框架确保德育的引领地位，智育的基础作用，以及体、美、劳育的支撑作用，避免某一维度权重过高或过低。二是采用德尔菲法等科学方法征求教育专家、一线教师、学生代表和用人单位的意见，通过多轮论证确定各指标的具体权重。三是针对不同专业设置差异化权重，让权重分配既符合教育规律又贴合培养需求

（二）拓宽测评主体渠道，提升结果公信力

单一的测评主体容易导致评价视角局限，影响测评结果的客观性和公信力，当前多数高校仍以辅导员和任课教师为主要测评主体，学生自身及其他相关方的参与度较低。拓宽测评主体渠道需构建“多元参与、协同评价”的机制，让不同主体从各自视角提供评价意见形成全方位的测评反馈。

在教师层面，除辅导员和专业课教师外，纳入思政课教师、体育美育教师和劳动实践指导教师，分别从不同教育维度给出评价；在学生层面，组织同班同学进行互评，同时鼓励学生开展自我评价，促进自我认知与反思；在社会层面，引入实习单位、志愿服务组织等第三方机构的评价，将学生在社会实践中的表现纳入测评范围[4]。通过这种“教师评、同学评、自己评、社会评”的多主体模式，既能避免单一评价的片面性，又能增强测评过程的透明度。

（三）健全测评反馈机制，促进学生持续发展

测评结果的有效反馈是推动学生改进不足、实现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当前部分高校重测评、轻反馈，学生不明确具体优势与短板难以针对性地提升自我。健全反馈机制需建立“及时、具体、个性化”的反馈体系让测评结果真正成为学生成长的“指南针”。一方面，在每学期测评结束后，通过班级会议、个别谈话等方式向学生反馈详细结果，更要具体说明在德、智、体、美、劳各维度的表现，指出哪些方面做得好、哪些方面需要改进；另一方面，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发展建议，结合其专业特点和兴趣特长引导制定下一阶段的提升计划。同时，由辅导员定期跟进学生的改进情况，形成“测评—反馈—改进—再测评”的闭环，让测评真正服务于学生的成长成才。

（四）强化测评结果应用，衔接人才培养目标

测评结果的应用是连接测评体系与人才培养目标的桥梁，如果应用范围狭窄、与培养目标脱节会削弱测评的导向作用。当前测评结果多仅用于奖学金评定和评优评先，没有充分发挥其在人才培养中的诊断和改进功能。强化结果应用需拓宽应用场景让测评与培养全过程深度融合。在学生发展层面，将测评结果作为保研推免、就业推荐的重要参考，不仅看学业成绩更注重综合素质表现，引导学生全面发展；在培养方案优化层面，通过分析测评数据找出学生在某一维度的普遍短板，据此调整课程设置和实践环节；在教育质量监控层面，将测评结果作为衡量学院和专业育人成效的指标之一，督促各教学单位重视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确保人才培养目标落到实处，实现测评与育人的良性互动[5]。

五、结语

综上所述，构建与完善大学生综合素质测评体系，为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提供了制度支撑，为高校落实“五育并举”育人理念搭建了实践平台。这一体系既为科学评价学生综合素质提供了客观依据，为学生自我提升指明了方向，也为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改进提供了数据支撑，为用人单位选才提供多元参考。随着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持续推进，应不断优化大学生综合素质测评体系，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参考文献

[1] 黄鹤，陈俏，罗娟 . 高职大学生“5+X”综合素质测评体系探究 [J]. 山西青年 ,2025(02):21-23.

[2] 李智俊 .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大学生综合素质测评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J]. 电脑知识与技术 ,2024,20(31):54-57.

[3] 唐星星，施晓蓉，徐粤宇，等 . 新时代高校“五育并举”大学生综合素质测评体系构建——以湖南工程学院为例 [J]. 湖南工程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3,33(03):113-118.

[4] 刘璇，姚翔予，肖胜利 . 书院制背景下完善大学生综合素质测评体系的路径研究 [J]. 北京教育 (德育),2022(10):81-84.

[5] 苏基协 . 基于“三全育人”的大学生综合素质测评体系优化研究 [J]. 现代职业教育 ,2021(13):120-121.

（作者系天门职业学院讲师）

民族地区高职专业群特色发展实施路径探析

蔺　坤　杨庆益　杨蔺皓宇

摘要：专业群建设是推进高等职业学校提质增效的重大制度设计，其目的是整合共享资源、适应产业升级、增强学校服务区域经济的能力，培养符合产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民族地区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要以“学校—学生—文化”内部需求做支撑，确定“内外需求相匹配”为特色发展实施路径的逻辑起点；基于组织管理理论，结合民族地区实际，通过适配性组织设计与多主体协同，明晰民族地区高职院校专业群特色发展的实施路径，进一步提高其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

关键词：民族地区；专业群建设；特色发展；组织管理

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政策体系围绕服务国家战略和产业升级需求，构建了多层次、立体化的改革框架。从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教20条）到2022年《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再到2023年《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政策设计呈现出从顶层设计到精准落地的递进逻辑，推动职业教育从规模扩张向内涵式发展转型。在民族地区，高职教育作为“特色产业的赋能者”“乡村振兴的衔接点”“民族团结与文化传承的纽带”，承载着特殊的时代使命与责任，因此，以民族区域为视角，探讨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的差异化发展路径，为民族地区的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寻找新的突破口，同时为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特色发展、实现内涵式增长提供了新的逻辑支点。

一、民族地区高职院校专业群特色发展实施的逻辑起点

民族地区受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基础薄弱等因素影响，发展滞后于其他地区[1]。近年来，国家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通过系统性政策设计与资源倾斜，持续加大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基础设施建设，逐步破解民族地区产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与此同时，对高技能人才和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

为适应当地产业发展，近年来，民族地区高职院校不断探索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但面临诸多问题，张建强[2]认为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缺乏人才支撑，但大部分高职院校没有充分利用民族地区特色资源，在生源竞争中处于恶性循环的劣势。杨如安[3]指出部分民族地区高职教育与地方需求的适配性不高，符合民族区域文化和建设的特色人才培养不足。诸多因素制约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特色化、高质量发展。

民族地区高职院校专业群的特色发展，其实施的逻辑起点植根于对“内外需求”的精准把握与有效契合，核心在于内外需求的矛盾聚焦与契合点识别，落地于以“需求共生”的价值锚定。以此精准定位专业群人才培养目标，科学确定专业群的特色发展路径。

（一）民族地区高职院校专业群内外需求的内涵解构

林克松[4]提出专业群产生于产业集群化、岗位群聚化的时代，是想要通过结合当前时代发展背景，拓宽培养口径，促进宽专结合，推动学生职业技能的交叉融合和能力素养的复合协作，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以促进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发展需求侧结构要素的全方位融合。民族地区高职院校与内地高职院校在专业群的内外部需求上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源于民族地区独特的自然禀赋、产业结构、文化传统、政策导向及社会发展阶段。具体差异可从外部需求和内部需求两个维度展开分析，其内部需求是“学校—学生—文化”需求，学校需突破资源不足，形成差异化办学优势的需求；学生既需掌握就业技能，也需增强文化认同的需求；文化传承，承担民族文化的活态传承需求。外部需求是国家对民族地区的战略定位需求、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的转型需求、区域民生改善需求，形成“宏观战略—中观产业—微观市场”需求的多层

嵌套。由此，民族地区高职院校专业群的“内外需求”除了要考虑“产业—教育”二元框架外，还需纳入民族地区的战略属性、区域属性和文化属性。

（二）民族地区高职院校专业群内外需求的矛盾与契合点识别

民族地区高职院校专业群发展的核心矛盾，在于外部需求与内部资源约束的不匹配，以及技能培养与民族地区特殊需求的不吻合，找到矛盾背后的核心契合点尤为重要。国家战略在民族地区的落地，要求专业群既要对接国家战略和产业升级的共性要求，又要融入民族地区的个性情况，需要“战略落地—本土扎根”的契合；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的竞争力，不仅在于技术升级，更在于文化附加值，专业群需突破传统技术技能培养，构建“技术＋文化”的复合能力体系，需要“产业升级—文化赋能”的契合；民族地区人才流失问题突出，主要在于民族地区留才措施同质化严重，竞争力不强，吸引力不大，同质化的留才措施不仅降低政策的执行力度，而且降低政策的理想效果，导致机制僵化，留才不力[5]。考虑选择建群专业为“本地就业适配性”的相关专业，开设民族文化必修课、组建民族技艺社团提升文化归属感相结合，让学生愿意留、留得住，需要“学生发展—区域留才”的契合。

（三）民族地区高职院校专业群以“需求共生”的价值锚定

民族地区高职院校专业群不应照搬发达地区自上而下的单向设计或跟随短期市场热点自下而上的盲目跟风专业群模式，而应以“内外需求相匹配”为特色发展的逻辑起点，锚定“国家战略—区域产业—民族文化—学生发展”的协同需求，将精准分析需求与动态匹配作为专业群建设的第一准则。通过系统调研和分析民族地区的特殊性需求，将外部要求转化为内部发展动能，将文化资源转化为专业特色优势，最终实现“专业群建设—区域发展—文化传承—学生成长”的共生增值，形成“人无我有、人有我特”的竞争力，成为支撑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引擎与文化纽带。

二、民族地区高职院校专业群特色发展技术路线

高等职业学校为确保专业群建设能够精准对接市场需求，需要界定专业群的核心概念，进而明晰专业群组建的技术路线，从而提高专业群建设对培养目标的达成度[6]27。

（一）专业群核心概念

专业群并不是把相似的专业合并成群，目前学界对专业群的概念还没有形成统一。曾亭[7]将高职专业群定义为由一个或多个围绕某一技术领域或产业发展的核心专业或相关专业，根据院校办学优势和服务面向，按照行业基础、技术基础相同或相近的原则形成的专业集合体。王志[8]将专业群定义为由一个或数个竞争力强、办学水平高及特色优势凸显的重点专业为核心专业及若干个技术领域相通或专业学科基础相近的有关专业齐集而成的一个聚合体。宗诚[6]21-27提出专业群并非简单多个专业的集合，而是统筹两个以上、具有某种共性或内在联系的专业形态，这种共性或内在联系既体现在外部需求和服务面向上，又体现在内部人才培养规律和教育教学资源方面。

综上，专业群是围绕区域产业链，由优势专业和专业学科基础相近的专业组成的集合体，通过共享教育教学资源，实现教育教学资源的高效利用，达到培养适合区域产业需求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的目标。

（二）民族地区高职院校专业群特色发展的技术路线

周柯[9]提出专业群的建设要面向产业发展，要树立特色的建设理念。结合专业群的概念内涵，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在组建专业群的过程中，可遵循以下技术路线。

一是调研所在民族地区产业链现状，解决好“组群专业”这个问题。陈友力[10]提出要对国家和区域的重点产业进行充分调研，对产业规模、市场对人才的需求等做专业群建设可行性论证，即深入探究区域产业链的结构和形态，突出特色、共享和创新。首先，通过大数据系统分析，结合国家、民族地区政策动态，了解所在民族地区的经济情况、特色产业现状和未来发展愿景；对民族地区市场进行实地调研，从多个维度综合分析当前产业链现状，找出未来民族地区重点发展，且对高技能人才需求量较大的特色产业，了解其上、中、下游产业现状；结合行业趋势与岗位特性，深入解析岗位群各岗位的核心特点及能力要求。通过深入调研分析所在民族地区产业链现状，为专业群遴选和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市场基础。

二是围绕民族地区重点发展的产业链，分析岗位群能力要素，解决好“培养规格”的问题。确定产业链对应岗位群的各岗位，例如特色农业包括种植、加工、销售等岗位，生物医药涉及研发、生产、服务等岗位；对岗位群所需具备的知识、能力、素养进行解构分析，综合考虑数字化转型、民族地区的特殊性，产业链岗位之间的协同性、绿色化发展等因素，系统整合并结构化回答民族地区产业需求，为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提供方向。

三是重构民族地区发展所需的专业群。围绕民族地区产业特点、文化特色和重点发展方向，将原有的专业进行解构或申报新专业，根据岗位群的能力要素重建专业群。专业群由 1 个牵头专业和 3—4 个协同专业共同构成，面向区域核心产业场景、民族特色资源转化需求、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及区域协同发展任务，形成“核心引领、协同支撑”的功能闭环。学生根据不同的兴趣和特长，选择专业群中不同方向的专业，

便于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能力进行深入学习，进而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三、民族地区高职院校专业群特色发展的实施路径

除了明晰民族地区高职院校专业群特色发展的技术路线，高职教育专业群建设还可基于组织管理理论和组织设计视角分析专业群的组织管理模式，找出民族地区高职院校专业群特色发展的实施路径，提高专业群建设对民族地区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度。

（一）民族地区高职院校专业群组织管理模式

在组织结构设计上，民族地区高职院校专业群可采用“矩阵式 + 网络化”的混合组织结构，构建纵向专业管理与横向资源协同的双维运行体系。纵向维度上，以专业群设立专业群建设委员会，统筹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与师资配置，确保专业方向与区域民族产业需求精准对接。横向维度上，打破传统院系壁垒，动态组建跨专业教学团队、联合企业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共建产业学院或大师工作室，形成多元协同网络。

在运行机制设计上，民族地区高职院校专业群可构建“四维驱动”体系。通过“政—行—企—校—族”五方联动激发多元主体参与的动力机制；实施教育链、产业链与文化链融合，推行企业技师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双导师制”协同育人机制；完善民族特色课程、技艺发展的制度保障机制；促进传统技艺的现代化转化的创新机制。建立动态调整的“需求监测—资源整合—质量评估”闭环系统，形成具有民族文化适应性的可持续发展机制，最终实现专业群与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的共生共长。

在文化系统设计上，民族地区高职院校专业群应构建特色文化生态。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专业群核心价值观，形成“职业精神 + 民族文化认同”的精神文化体系；制定民族文化、技艺传承的学分置换制度文化体系；打造“民族技艺工坊 + 现代实训中心”的融合空间，开发“民族文化元素 + 专业课程”的特色教材，最终形成专业群建设与民族文化传承相互滋养的良性循环。

（二）民族地区高职院校专业群特色发展组织设计路径

一是构建“专业 + 技术 + 文化”融合式课程体系。改变传统学科知识体系作为课程的做法，以职业能力为核心、以文化传承为特色、以技术创新为支撑，建立立体化课程架构。以学生为中心，按照岗位群的人才培养目标层层分解，确定民族地区产业各岗位所应具备的能力，不同能力对应相应的模块化课程体系，采用“基础 + 核心 + 拓展”的模块化课程设计，形成基于基础共通、专业核心分开、拓展模块互选的课程体系。将民族文化、技艺植入各模块化课程，开发活页式、工作手册式特色教材，推行“课堂 + 工坊 + 村寨”的实景化教学，强化学生对民族地区的文化认同、技能培养、创新创业能力。

二是打造“技术 + 文化”双师型团队。在专业群带头人带领下，由专业群教学指导委员会统筹规划专业群师资团队培养，实施“引培结合”的策略，通过组织专业教师深入民族村寨开展文化研修，参与民族技艺培训，培养既掌握专业技能又了解民族文化特色的本土化双师；创新考核激励机制，将民族文化教学能力纳入教师评价体系，鼓励教师开发特色课程资源。最终形成行业大师引领、以专业群带头人为核心、骨干教师支撑、专兼职互为补充的结构合理的“双师”教师团队，合力开展科研和教学创新活动[11]。

参考文献

[1] 彭敏 . 后扶贫时代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转型与推进策略 [J]. 民族教育研究，2021(01):89-94.

[2] 张建强，王晓政，邹德智 .“产城教融合”视域下民族地区高职专业动态调整机制研究——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 [J]. 牡丹江大学学报 ,2024,33(08):93-100.

[3] 杨如安，赖昀 . 民族地区产城教融合的内在逻辑及其实现：基于三螺旋理论的分析 [J]. 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9(04):77-86.

[4] 林克松，许丽丽 .“双高”时代高职专业群建设与治理体系改革的共同演进 [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20(05):134-139,164.

[5] 丰智超 . 新时代背景下西部民族地区人才引进问题及对策研究 [D]. 南宁 : 南宁师范大学 .2022.

[6] 宗诚 . 教育强国背景下高等职业学校专业群优化实施路径探析 [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5(07):21-27.

[7] 曾亭 . 基于 CIPP 模型的高职专业群建设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D]. 重庆 : 西南大学 .2024.

[8] 王志 . 天津市“双高计划”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研究 [D]. 武汉 : 湖北大学 .2024.

[9] 周柯 . 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模式研究 [D]. 天津 : 天津大学 .2021.

[10] 陈友力，叶赋桂 .“双高计划”建设项目特征与遴选机制分析 [J]. 中国高教研究 ,2020(02):103-108.

[11] 周岩 . 新发展理念视域下西部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现状与策略研究 [D]. 天津 :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2023.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3 年度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课题“民族医药文化对德宏高职中医学专业群特色发展的个案研究”（2023J1876）。

（作者：蔺坤，德宏职业学院教授；杨庆益，德宏职业学院副教授；杨蔺皓宇，宁夏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学生）

包头市高校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张雅婷

摘要：包头市高校在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工作中，已形成品牌化教育基础，部分院校获各级示范单位称号，但仍存在显著认知分层，不同身份、年级、专业及地域背景的学生意识水平差异明显，同时面临体制机制协同不足、教育载体吸引力欠缺、环境浸润不充分等问题。对此，高校需从组织保障、课程体系、载体矩阵、育人环境四个维度推进工作，通过多元协同机制整合资源，以三维融合课程强化课堂效能，借助线上线下载体提升教育活力，营造浸润式环境深化情感认同，最终实现大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度认同，为边疆地区民族工作与国家发展提供理想信念支撑。

关键词：新时代；包头市；高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新时代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复兴的重要战略任务。高校作为人才培养与思想引领的主阵地，尤其是地处边疆多民族地区的包头市高校，肩负着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民族观、强化“五个认同”的关键使命。当前，边疆地区民族交往交融日益频繁和加深，青年学生的思想观念呈现多元特征，如何通过系统性工作帮助大学生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消除认知偏差与交往隔阂，成为包头市高校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在此背景下，梳理高校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状，探索科学有效的推进方向，对夯实边疆民族地区团结基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新时代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基础

新时代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深厚且多元的理论根基，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维度来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强调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发展，认为民族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这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根本的理论遵循。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工人没有祖国”但“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的思想，与我国追求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目标高度契合，为我们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凝聚民族合力提供了科学指引。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维度而言，中华文明历来秉持“大一统”思想，倡导“天下一家”“协和万邦”的理念，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这种文化基因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厚文化土壤。历史上，无论是秦汉的“书同文、车同轨”，还是隋唐的“胡汉一家”，都体现了各民族对团结统一的共同追求，这些文化积淀为新时代凝聚民族共识、增强民族认同感提供了精神纽带。

二、包头市高校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现状分析

（一）教育实践初见成效，品牌化建设形成基础支撑

高校在党委统筹下已构建起多元化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体系，通过打造特色育人品牌、组建专项工作室等方式推进实践落地。部分高校设立少数民族学生学业帮扶班，建立“一对一”学业帮扶机制，同时依托本地文化资源打造教育实践基地，将民族团结教育与实践育人深度融合。问卷调查显示，超过半数学生对所在高校的相关教育工作表示“非常满意”，在“五个认同”核心要义的认知测试中，多数学生能准确表述其内涵。此外，高校积极参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部分院校已荣获省级乃至国家级示范单位称号，为后续教育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可复制推

广的教育模式。这种以实践促认同的教育路径，有效提升了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归属感。

（二）认知水平存在分层，群体差异呈现明显特征

不同群体学生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情感与意志维度存在显著差异，呈现出多维分层特征。从身份维度看，党员学生虽在理论学习参与度上更高，但仍有近 20% 的党员对“民族团结奋斗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存在理解偏差，普通群众学生中“不了解”相关概念的比例达 8.86%。从年级分布看，低年级学生因刚接受系统入学教育，意识水平整体高于高年级学生，随着学业压力增加，高年级学生对相关教育活动的参与度明显下降。从专业差异看，文科类学生因课程中思政元素融入较多，认知深度优于理工科学生，而农林、水利等专业学生的意识水平得分显著低于医药卫生等专业。

（三）体制机制尚不健全，协同育人格局有待形成

当前高校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工作中存在明显的机制性短板，主要表现为权责划分模糊与协同效能不足。多数高校将相关工作片面划归统战部门与学工部门负责，教务、科研、宣传等部门参与度极低，未建立跨部门的统筹协调机制，导致教育资源分散，难以形成育人合力。在责任落实层面，缺乏明确的工作指导意见与考核评价体系，部分领导干部与教师对民族工作的特殊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存在“重形式、轻效果”的现象。从制度衔接看，未能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全面融入办学治校各环节，存在与日常教育管理脱节的问题，尤其在课程体系设计中，尚未形成“思政课程 + 课程思政”的全覆盖格局，制度保障的缺失直接影响了教育工作的常态化推进 [1]。

（四）教育载体吸引力不足，资源整合有待加强

高校现有教育载体与资源未能充分满足学生需求，呈现出内容生硬、形式单一、关联度低的突出问题。在课堂教学方面，49.51% 的学生认为教学内容“脱离实际、过于生硬”，49.31% 的学生反映课堂教学方式“传统古板”，思政课程仍以理论讲授为主，缺乏案例分析、情景模拟等互动形式。在课外实践方面，活动设计与学生日常生活关联度低，多以主题讲座、知识竞赛等传统形式开展，学生参与积极性不高，57.35% 的学生认为“引导方式缺乏吸引力”。从资源整合看，未能有效利用网络新媒体平台开展教育，线上教育资源碎片化，缺乏系统性设计；同时对本地红色文化、民族交融历史等特色资源挖掘不够，未能将其转化为具象化的教育载体 [2]。

三、包头市高校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化路径

（一）构建“多元协同”机制，夯实组织保障根基

高校需打破部门壁垒，建立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多部门联动参与的“大思政”工作格局，从制度设计、责任落实、资源整合三个层面夯实保障根基。首先，在顶层设计上，成立由校党委书记任组长、分管副校长任副组长，统战、学工、教务、科研、宣传、团委、后勤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学校“十四五”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要点及校园文化建设总体规划，制定《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各部门职责清单：统战部门负责统筹校内外民族工作资源，对接地方民族事务部门与兄弟院校交流合作；教务部门负责将共同体意识融入课程体系与教学改革；学工部门负责学生日常教育管理与实践活动组织；宣传部门负责校园氛围营造与典型案例宣传；科研部门负责支持相关领域课题研究。通过清晰的权责划分，避免出现“多头管理”或“责任真空”现象 [3]。其次，在责任落实层面，建立“月调度、季督查、年考核”的闭环工作机制。每月由领导小组召开工作推进会，梳理进展、解决问题；每季度组织专项督查组，通过查阅资料、师生访谈、实地调研等方式，检查各院系、各部门工作落实情况；每年将相关工作成效纳入院系领导班子年度考核、教师职称评审与评优评先的重要指标，设置“民族团结教育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等荣誉，给予专项奖励，对落实不力、敷衍塞责的单位与个人进行约谈问责，倒逼责任层层传导、落地见效。最后，将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纳入新入职教师培训与在岗教师继续教育内容，通过专题讲座、案例研讨等形式，提升教师对民族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确保教育者先受教育。

（二）创新“三维融合”课程体系，强化课堂主阵地作用

课堂教学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载体，需从“思政课程深耕、课程思政挖掘、实践课程拓展”三个维度发力，构建全覆盖、多层次、重实效的课程体系，让共同体意识在课堂中落地生根。在思政课程深耕方面，重构“思想道德与法治”“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课程的教学内容，增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史”“民族团结进步案例分析”“边疆地区民族工作政策解读”三个专题模块，每个模块设置 4~6 课时。采用案例教学法，结合北方边疆地区多民族共生的历史与当代民族团结先进事迹设计教学案例，例如讲解“各民族共同缔造中华文明”时，引入本地出土的多民族文化交融文物史料；讲解“民族团结实践”时，邀请学校民族团结标兵学生分享成长故事，让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具象的情感共鸣，提升教学感染力。在课程思政挖掘方面，出台“课程思政建设指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项’”，按学科门类制定差异化的融入方案：历史文化类专业聚焦“各民族共同书写中国历

史”，在“中国古代史”“北方民族史”等课程中，重点讲解匈奴、鲜卑、蒙古等民族与中原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凸显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文学艺术类专业围绕“各民族文化交融之美”，在“民间文学”“艺术概论”等课程中，分析蒙古族长调、回族花儿、汉族民歌的相互影响，组织学生创作反映多民族团结的文学作品或艺术设计；理工科专业结合“各民族共同建设祖国”，在“工程实践”“区域发展规划”等课程中，引入“西气东输”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中各民族协作的案例，展现团结奋斗的实践价值[4]。在实践课程拓展方面，将民族团结实践纳入学生必修学分（1~2学分），构建“校内实践 + 校外研学 + 社会服务”三维实践体系。校内实践依托“民族文化工作室”，组织学生开展“民族服饰制作”“传统手工艺体验”等活动，每月至少开展两次；校外研学与本地实践基地合作，每学期组织学生赴多民族聚居乡村、红色教育基地开展“民族历史文化调研”，要求学生撰写调研报告并进行班级分享；社会服务结合“三下乡”暑期实践、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学生组建“民族团结志愿服务队”，为少数民族聚居社区提供政策宣传、学业辅导、科技助农等服务。

（三）打造“线上 + 线下”载体矩阵，提升教育吸引力

针对当前载体单一、吸引力不足的问题，需创新打造多元化载体，满足不同学生群体的需求。线上，构建“新媒体 + 数字资源”平台，在学校官网、微信公众号开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专栏，定期推送民族政策解读、民族文化科普短视频、民族团结人物专访等内容，例如制作“一分钟了解蒙古族那达慕”“各民族传统节日习俗”等系列短视频，利用抖音、快手等平台扩大传播范围。同时，开发“中华民族共同体知识在线学习平台”，设置在线答题、虚拟展馆等功能，学生可通过平台学习民族历史文化知识，参与线上知识竞赛，竞赛成绩纳入第二课堂学分，激发学习积极性。线下，丰富活动形式，举办“民族文化节”“跨民族才艺展演”“民族团结主题辩论赛”等活动，鼓励学生身着各民族传统服饰参与，展示各民族文化特色；开展“‘手拉手’结对帮扶”活动，组织不同民族学生结成学习伙伴，共同参与志愿服务、科研项目，在合作中增进情感交流。此外，依托学校社团资源，支持“民族文化研究社”“边疆发展协会”等社团开展活动，例如组织社团成员编排反映多民族团结的话剧、举办民族文化专题讲座，让载体更贴近学生兴趣，实现“寓教于乐”。

（四）营造“浸润式”育人环境，深化情感认同

环境对学生意识培育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需从物理空间、文化氛围、生活交往三个层面构建浸润式环境。在物理空间建设上，对校园广场、教学楼走廊、图书馆等公共区域进行文化改造，设置“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长廊”，展示从古代丝绸之路各民族贸易往来，到近代各民族共同抵御外侮，再到当代共同建设祖国的历史图片与文字资料；在宿舍区悬挂各民族优秀文化作品、民族团结标语，打造“民族团结示范宿舍”，让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感受民族文化交融的氛围。在文化氛围营造上，利用重要时间节点开展主题教育活动，例如在国庆节、中秋节组织“共庆佳节”活动，邀请不同民族学生共同制作传统美食、赏月谈心；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期间，举办升国旗、唱红歌、民族团结主题演讲等活动，强化学生的国家认同感与民族归属感。在生活交往方面，全面推行“混合住宿”“混合编班”制度，打破民族界限，确保每个宿舍、每个班级都有不同民族的学生；建立“师生结对”帮扶机制，教师定期与少数民族学生谈心谈话，了解其学习生活困难，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同时鼓励学生参与校园文化活动、志愿服务，在共同生活与实践中消除隔阂，增强“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情感认同，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真正融入学生日常[5]。

四、结语

包头市高校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是边疆地区教育事业与民族工作深度融合的重要实践。从现状来看，既有品牌化建设的成效，也面临认知、机制、载体等层面的挑战，而构建多元协同机制、创新课程体系、打造载体矩阵、营造浸润环境的路径，为破解问题提供了可行方向。

参考文献

[1] 孟凡丽，王国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 [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9(04):59-66.

[2] 陆永耀．牢固树立正确党史观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J]. 今日民族，2021(04):1-3.

[3] 龙金菊．论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政治心理生成机制 [J]. 民族教育研究，2023,34(03):80-88.

[4] 董原，邓博文．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现状与培养路径——以兰州市四所高校为例 [J]. 黑龙江民族丛刊，2022(05):22-29.

[5] 保虎．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程及经验启示 [J]. 民族学刊，2022,13(12):49-58,151.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内蒙古科技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项目“新时代包头市高校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ZLKT2413）。

（作者系内蒙古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职业教育赋能“双碳”目标社会共识建构的角色探讨

陈安琪

摘要：“双碳”战略不只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目标，更是重构社会契约关系的核心要素。职业教育在其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既通过人才培养与技能转化推动绿色产业发展，也凭借价值传递与责任观念塑造促进社会共识的形成。本文重点探讨职业教育在“双碳”目标社会共识建构中的角色定位、实现机制与保障措施，指出其既是绿色发展的战略支撑，也是价值共识的传播者，更是产业转型的关键桥梁。研究表明，通过人才培养、课程创新和产教融合等途径，职业教育有助于推动国家战略与社会实践的深度融合，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职业教育；“双碳”；社会共识；角色探讨；绿色转型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标志着中国进入绿色低碳发展的新阶段，同时也对社会治理、产业转型及教育系统提出系统性要求。职业教育作为国家政策与产业发展的衔接环节，其重要作用日益凸显。通过制度化的教育实践，将绿色观念融入社会共识，使绿色技能成为产业发展的驱动力，有助于推动“双碳”目标从战略规划走向具体实践。因此，深入研究职业教育在“双碳”目标社会共识建构中的定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职业教育赋能“双碳”目标社会共识建构的角色定位

（一）绿色发展背景下的国家战略支撑者

在“双碳”战略目标整体规划中，国家明确通过能源结构优化、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实现减排目标。政策与战略的落地，关键在于具备足够数量与高质量的技术技能人才。职业教育作为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技能人才培养的主责，直接支持国家战略。首先，职业教育为绿色产业链建设提供核心支撑，伴随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循环经济等新兴产业快速崛起，市场对高素养技能人才的需求愈发迫切；职业教育设置契合绿色产业的专业与课程，向国家战略持续输送人才。其次，职业教育是推动技术革新与应用的核心力量，受“双碳”目标推动，众多低碳新技术需从实验室迈向产业化，此过程依赖技能人才实操与工艺优化，职业院校学生常常身处生产现场，可把先进科研成果转变为可复制的工艺程序，以此加快绿色技术的扩散推广。最后，职业教育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充当战略实施的关键承接者，既是政策传播的通道，也是战略落地的支撑点，通过教育培训实现战略目标与社会实践的有效对接。

（二）社会共识的价值传播者

“双碳”目标社会共识的核心要义，是政府、企业和公众就低碳发展形成的价值共识与责任认同，职业教育不只是技能教授的场域，还是价值传递的关键途径，职业教育借由课程体系把低碳、绿色与可持续发展观念融入日常教学，培育学生的环境伦理意识和担当精神。以建筑工程、机械制造等专业教学为例，既要着重施工技能与工艺规程，还需引领学生领会绿色建材运用及节能减排的价值，职业教育对青年思想塑造影响深远，青年学子作为未来社会生产与生活的核心群体，其价值观念对社会契约的代际延续起着直接的决定性作用。职业教育依靠思想政治方面的教育、校园文化营造以及社会实践活动，使青年学生从内心认同“双碳”理念，促使社会在更大范围形成价值共识[1]；职业教育可借助多层面传播渠道，实现社会认同的扩散成效；校企协作、实习实训、社会服务等多元途径，均可助力学生于真实情境中体会绿色理念的价值，通过行动向更广泛的群体传递。

（三）产业转型升级的支撑与链接者

为达成“双碳”目标，必定要推进传统产业的绿色改造进程，同时还需推动新兴产业迅速壮大，在这一进程中，职业教育成为产业和社会共识衔接的关键纽带。第一，职业教育扮演着绿色技术与产业技能转换桥梁的角色，众多绿色技术于初始推广时期面临应用壁垒高、专业人才少的状况，借助职业教育手段，先进的绿色工艺可被拆分、转变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技能模块，加速其在企业中的推广，如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动力电池检查与维护技能，借助职业教育课程规划，能造就大量熟练掌握该技术的技能型从业者，以此促进产业转型加速。第二，职业教育在职业标准制定与推广中起到连接作用，伴随绿色职业持续出现，建构科学恰当的职业标准体系成为社会契约的关键部分，凭借将绿色职业标准纳入课程设计及评价体系，可让职业教育在产业领域落实社会契约的责任和义务。第三，从宏观视角看，职业教育仍是社会各主体沟通的桥梁，它既助力国家战略实施，又面向企业需求，应对市场变动，并且对公众观念产生作用，推行环保理念，因此，职业教育在产业升级转型中发挥了独特的桥梁功效，推动“双碳”目标社会共识从价值认同迈向产业实践。

二、职业教育赋能“双碳”目标社会共识建构的实现机制

（一）课程体系与绿色技能的深度融合

职业教育课程体系朝绿色方向转变是达成社会契约建立的基础机制之一，职业教育课程设置要与“双碳”目标相契合。以往的职业教育课程普遍以岗位技能为目标，侧重于操作水平与实践能力，而处于“双碳”战略背景下，该技能导向要融入绿色维度。以机械制造专业为例，要把节能设备操作、再生材料利用、碳排放评估等相关模块加入课程体系；对于建筑工程专业，要着重优化绿色建筑设计、低碳施工技术、可再生能源利用相关课程内容，使得学生既能习得岗位技能，还能够在日常工作中自觉贯彻绿色理念。

课程融合离不开跨学科的协同合作，实现碳中和并非仅为能源范畴的工作，而是全产业链的系统工作，要求职业教育破除学科界限，使生态学、环境科学、信息技术等知识与专业技能相互结合，就电气自动化专业而言，要添加碳排放监测和控制方面的知识板块，助力学生在操作环节达成节能减耗目标[2]；在农业职业教学中，需引领学生掌握智慧农业、低碳种植之类的方式，促成农业碳汇达成。另外，绿色课程实施应实现标准化与系统化，国家需建构以“双碳”为导向的职业教育课程标准框架，确定绿色技能关键指标与学习目的，如制定绿色职业能力规范，涉及能源利用效率、污染物排放管控、碳足迹计算等范畴，通过课程考试和职业资格认定保障学生学习成果。

（二）产教协同与绿色产业的对接机制

职业教育是落实“双碳”战略的又一核心方式，是依托产教协同打造绿色产业链对接模式。第一，校企携手可加快绿色技术落地，大量绿色技术在实验室已达到成熟水平，然而企业推广需要大量有实践技能的人才，职业院校与绿色企业合作搭建实训基地，把先进低碳技术转变为教学单元，助力学生在学习中掌握并运用前沿技术。第二，产业与教育的协同能够达成二者的双循环，处于传统模式里，产业和职业教育信息不匹配，造成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脱钩，处于“双碳”战略背景下，这种脱节大概率会对绿色转型形成阻碍，依靠产教合作，职业教育可在绿色产业链建设初期就参与其中，依照产业发展趋向调整课程内容和人才培养方案[3]。比如，风电行业不同阶段所需技能从设备制造逐步转变为运维服务，职业教育能按照企业反馈快速对课程作出调整，促成教育与产业动态契合。第三，产学研合作可助力区域绿色产业生态搭建，职业教育并非仅为单个企业服务，还能借助于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协作，构建区域化产教融合共同体，该共同体围绕绿色产业展开，以职业教育作为桥梁，达成教育资源、企业诉求与政府策略的深度契合。

（三）社会契约理念的教育渗透机制

实现“双碳”目标社会共识，需要技能维度的支撑，还需对理念与价值深度认同，职业教育在理念传输上有独特长处，可借助多样教育手段培育学生的责任观念与契约精神；“双碳”议题引入思想政治教育是渗透机制的关键所在，职业教育思政课着重突出国家发展战略与社会责任，而“双碳”战略属于典型的国家议题范畴。在思政课程中融入绿色发展事例，如新能源基地搭建、碳交易市场运营等，让学生领悟国家战略并提升责任感，理念渗透的关键渠道还包括通识教育，职业院校可在公共课程中增添环保、生态理念、可持续发展相关内容，借知识传播与价值引领，促使学生形成绿色生活的习惯。另外，应设置有关低碳生活方式的课程，推动学生在校园落实节能减排，而后让行为模式拓展到社会，社团活动与校园文化建设同样是教育渗透的有效途径，以设立“绿色社团”“碳中和实验班”等机构为途径，激励学生投身绿色实践活动，如垃圾归类、节能优化、绿色创新工程等，此类活动强化了学生的责任感，又催生了契约认可的群体效应。

三、职业教育赋能“双碳”目标社会共识建构的保障措施

（一）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的政策保障

职业教育能否在“双碳”目标社会共识建构中起

到重要功效，首要因素是政策方面的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一方面，政策支持需明晰职业教育的战略地位，基于“双碳”目标的整体框架，要把职业教育设定为绿色转型关键支柱，使其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共同构成国家低碳发展核心支撑力量[4]。比如可在国家“双碳”战略行动方案中单独设立职业教育相关章节，系统阐释职业教育对绿色人才塑造、社会责任培养以及产业扶持的战略价值；另一方面，政策保障需制定成体系的战略规划，职业教育与“双碳”战略的融合不应仅停留在政策口号层面，要转变为可实施的路线图，如拟订《职业教育绿色转型发展规划》，详细界定各阶段人才培养指标、学科专业设置与资源配置准则，并明确考核机制。另外，政策保障要求多维度联动，中央承担整体部署与宏观指引职责，地方要结合区域产业特性拟定配套措施，促使职业教育适配地方绿色经济发展。针对风能、光伏等产业聚集的区域，地方政府可推动职业院校设置关联专业，构建“政策—产业—教育”一体化模式，此类多层面政策协同，为职业教育发挥重要作用筑牢了制度基础。

（二）多元投入与资源配置的资金保障

职业教育赋能“双碳”目标社会共识建构，需要大量资金来推进课程设置、实训基地建设与师资队伍培养，为此构建多样化投入机制与合理的资源分配体系，是保障工作的核心要点，政府资金投入是根本支撑，职业教育呈现显著的公共产品特性，其向绿色方向转变对国家“双碳”战略的达成影响重大。政府需增加专项财政资金投入，如设置“‘双碳’职业教育发展专项基金”，以此助力绿色专业搭建、课程革新与教学设备更新；社会资本的投入是关键补充项，绿色转变不但是国家层面的战略举措，也是市场领域的发展契机，推动企业借助校企协作、设立基金、建设实训基地等途径投资职业教育，达成教育与产业的互利局面。由新能源企业出资建设的“校企共建实验室”，既给企业搭建了人才储备的平台，又为职业院校提供了资金与技术方面的支撑。绿色金融的投入有着创新的意义，可借助绿色债券、绿色基金之类的金融手段，为职业教育项目提供融资方面的扶持；职业院校进行绿色校园建设和绿色课程发展时，可借助发行绿色债券获取低成本资金，以达成可持续发展。资金配置上需兼顾均衡与突出重点，一方面，要保障各区域职业院校能得到基础资金扶持，防止因资源差距扩大造成绿色教育发展失衡；另一方面需聚焦扶持重点产业与院校开展绿色教育工作，起到示范引导作用，产生扩散效应。

（三）教师队伍与能力建设的人才保障

教师团队作为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其绿色转变能力会对“双碳”目标社会共识的建构产生直接作用，需借助体系化的教师团队打造与能力增强来实现人才支撑。第一，以推进教师“双碳”知识培训为根本，职业教育师资不但要掌握专业技能，还应熟知绿色发展理念与“双碳”战略有关知识；教师绿色知识储备可借助国家级培训、行业协会研讨班、国际交流活动等多元途径得以提升。第二，打造产教融合式“双师型”师资团队是关键[5]，伴随“双碳”战略的推进，众多绿色技术迭代迅速，仅依靠学术型教师无法达成教学要求，要激励企业工程师和技术专家前往职业院校授课，与专职教师一起组建“双师型”教学团队，该机制既增强了教学的实际效用，助力绿色技术迅速融入课堂。第三，需建立教师能力考评与激励体系，教师在绿色课程研发、绿色科研课题及社会服务等领域的贡献，需纳入考核与晋升机制，借此激励教师不断提高自身本领，可通过设立“绿色教育优秀教师奖”等举措，强化教师的职业荣誉感，催生推动绿色教育进步的内在驱动力。

四、结语

“双碳”目标社会共识，不仅关系到国家战略目标能否达成，更是社会多样主体责任共担与价值认同的集中展现，职业教育在该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既作为绿色发展的战略支撑力量，又充当契约认同价值的传播者，更是产业升级的衔接环节。未来，应在顶层设计、资金投入、师资培养与开放合作等方面持续优化，使职业教育真正成为推动“双碳”目标社会共识建构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1] 明朗 .“双碳”背景下职业院校助力绿色发展的角色与担当 [J]. 大学 ,2025(S1):46-48.

[2] 陆宇正 , 赵浩宇 , 王雨馨 .“双碳”目标下绿色职业教育的实践逻辑与推进策略 [J]. 职业技术教育 ,2025,46(19):34-39.

[3] 张宇 . 双碳人才培养的路径探究与建议 [J]. 上海节能 ,2025(06):919-925.

[4] 赵珂欣 .“双碳”视域下天津市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策略研究 [D]. 天津 :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2024.

[5] 陈鹏 . 职业教育赋能“双碳”社会契约建构的角色与路径 [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22,34(06):73-81,111.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协会高校重点课题“职业教育赋能‘双碳’社会契约建构的育人路径研究”（XJKX24A022）。

（作者单位：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教育强国视域下应用型高校法治教育研究

夏婷婷　魏贤威　蔺义博

摘要：在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背景下，应用型高校作为培养实践型、技能型人才的重要阵地，其法治教育质量直接关系到高素质法治人才供给与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全面依法治国与教育强国建设的双重战略叠加，赋予了应用型高校法治教育新的使命与担当。本文从课程重构、方法创新、师资强化、平台搭建、机制保障五个维度提出具有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的优化路径，为应用型高校构建“思政引领、专业融合、实践导向、数字赋能”的法治教育体系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范式，助力培养兼具法治思想、优良品格与专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夯实教育强国与法治中国建设的人才根基。

关键词：教育强国；应用型高校；法治教育；思政融合；协同育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将法治建设提升至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2025 年 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加强宪法法治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 的战略要求，将法治教育纳入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维度。应用型高校作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主阵地，其法治教育水平直接影响学生的规则意识、权利义务观念和职业素养，关乎教育强国建设的根基。

本文将梳理应用型高校法治教育的现状与存在问题，提出系统优化策略，推动其从“知识传授”向“素养培育”、从“理论脱离实践”向“知行合一”、从“单一化教学”向“协同化育人”转型，为教育强国与法治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一、我国应用型高校法治教育建设现状

应用型高校占我国高校总数的 60% 以上，“以就业为导向，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强化实践教学，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2]，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在国家政策推动与高校自身努力下，应用型高校法治教育取得一定进展，学生法治意识增强，但仍难以满足教育强国建设与学生的成长需求。

（一）教育定位偏差

1. 工具理性倾向明显，法治教育地位边缘化

我国部分应用型高校在人才培养中，过于强调专业技能培养，而忽视法治教育，从而大幅压缩法律类课程学时。例如，“思想道德与法治”中的“法律基础”模块仅占据总学时的 1/4，致使教师难以深入讲解，学生无法形成完整的法治知识体系。

2. 课程体系与专业需求脱节，针对性不强

部分应用型高校课程体系未结合专业与年级特点，缺乏针对性与实用性。课程内容同质化，课程设置无层次性，低年级与高年级内容重复率高，难以实现从基础到专业应用的递进。

3. 价值引领功能弱化，“德法兼修”难以实现

部分应用型高校法治教育过于侧重法律知识传授与技能训练，忽视法治精神与价值理念的培育。教学内容多以法条解读为主，缺乏对法律背后价值理念、道德内涵的深入阐释；思政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不够深入，二者处于“两张皮”状态，难以实现“德法兼修”的育人目标。

（二）教育方法单一

1. 以理论灌输为主，互动性与吸引力不足

传统法治教育课堂大多以教师解读法条作为教学方法，该“讲授法”侧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缺乏实践案例，学生无法将所学法律知识与实际生活相结合，难以形成运用法治思维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 实践教学环节薄弱，知行转化不足

实践教学是提升学生法治素养的关键，多数应用型高校因实践资源匮乏，导致学生难以接触真实法律场景，难以通过真实案件提升应用能力，难以适应职业与社会治理需求。

3. 数字技术应用不足，教学模式创新滞后

数字技术推动在线教育、智慧教学发展，但应用型高校由于数字教学资源的不足，缺少高质量在线课程、虚拟仿真实训项目，数字技术与教学融合不深，对数字技术应用仍处于初级阶段。

（三）师资队伍力量薄弱

1. 专职法治教育教师数量不足，专业结构不合理

多数应用型高校专职法治教师数量不足，法治教

育公共基础课覆盖面广、课时量大，因此安排思政教师、辅导员或其他专业教师兼职，难以保障教学质量。同时，专职教师鲜有行业背景与实践经验的教师，在讲解行业法律法规与案例时，难以深入剖析，影响教学效果。

2. 辅导员法治素养不够，法治育人能力不足

辅导员作为学生日常事务管理者，在学生成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辅导员因所学专业各不相同，在处理校纪校规与法律衔接相关问题时，容易出现“重行政手段、轻法律程序”等现象 。

研究显示，仅有 51% 的辅导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管理规定》等与学生管理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比较了解 [3]。这就导致在面对复杂的学生矛盾和问题时，容易采取简单的行政手段，从而引发法律争议，因此，提升辅导员法治素养和能力刻不容缓。

3. 师资培训机制不完善，持续发展能力不足

应用型高校的法治教育师资培训机制不完善，培训内容无针对性与系统性，培训形式单一，且培训无长效机制，教师的法治素养与教学能力难以持续提升。

（四）保障机制不健全

1. 校内协同机制不完善，部门联动不足

法治教育是系统工程，需要高校内部多部门协同配合。当前多数应用型高校校内协同机制不完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沟通与联动，导致资源分散，难以形成育人合力，难以实现“三全育人”。

2. 校地协同机制不健全，实践平台匮乏

应用型高校法治教育实践导向需加强与校外司法机关、政府部门等合作，但多数高校因校地协同机制不健全，合作形式单一，内容浅薄，缺少有效利益联结与沟通协调机制，导致校地合作“一头热”，实践平台难以发挥作用。

3. 评价考核机制不合理，导向性不强

科学评价考核是提升法治教育质量的保障，当前应用型高校对学生评价侧重知识记忆，缺乏法治思维和应用能力考核；对教师评价侧重教学工作量与科研成果，缺乏育人实效、思政融合能力的评价，且未建立法治教育整体质量评价机制，难全面评估成效，无法为改革提供依据。

二、应用型高校法治教育提升创新策略

（一）构建专业适配、“德法兼修”的课程体系

1. 确立“基础 + 专业 + 拓展”的课程结构

《纲要》明确提出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背景下，国家既需要高水平司法人才，更需要大量“专业 + 法治”复合型应用人才。与研究型高校侧重理论研究与体系构建不同，应用型高校法治教育更强调融合应用，培养具有规则意识、法律技能、责任担当的人才，因此应用型高校需要强化基础法治课程建设。以“思想道德与法治”为核心，优化“法律基础”模块内容，培养学生基本法治素养与权利义务观念。同时，将宪法法治教育、国家安全教育融入基础课程，增强学生国家安全意识与法治观念。增设专业法治课程，根据不同专业职业特点与行业需求，开设针对性强的专业法治课程或模块。拓展法治选修课，满足学生多样化学习需求 [4]93。

2. 推动思政教育与法治教育深度融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道德是法治精神的重要滋养。”法治教育与思政教育同属“固本铸魂”育人体系，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在教育强国视域下，应用型高校法治教育需构建“思政为魂、法治为基”的课程体系，将思政教育贯穿法治教育全过程，挖掘思政课程中的法治元素。在专业课程中设置“思政 + 法治”模块，将行业法律法规与职业伦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开设跨学科融合课程，系统阐释法治与道德、党的领导与法治建设的内在逻辑关系，提升学生的法治理论水平与价值判断力，让学生既“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又理解法律背后的价值理念与道德内涵，实现法治精神内化与道德追求外化。

（二）打造实践导向、数字赋能的教学模式

1. 推广案例教学法与项目式学习

精选与专业相关的真实典型案例，引导学生运用法治思维分析案例、解决问题。以真实的法治实践项目为载体，组织学生开展小组合作学习，在过程中提升法治素养与实践能力。

2. 强化实践教学环节

“产教融合、知行合一”是应用型高校的核心办学特色，构建“一二三”课堂三位一体实践教学体系，实现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的有机结合。优化第一课堂实践教学，丰富第二课堂实践活动，拓展第三课堂实践平台。使学生实现从“知法”到“会用法”的转变。

3. 推进数字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教育强国建设要求高校培养具备数字素养与技术应用能力的新时代人才。应用型高校需利用数字技术创新教学模式，提升法治教育质量与效率。一是实现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依托在线教学平台，使学生自主学习，线下课堂侧重案例分析、实践实训。二是建设 VR 调解实训室等现代化实训空间，利用技术构建虚拟法律实践场景，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提升实践能力。

（三）建设专兼结合、素养过硬的师资队伍

1. 优化专职师资队伍结构

足额配备具有法学背景、实践经验专职教师，满足“专业 + 法治”教学；加强科研能力建设，鼓励教师围绕应用型高校法治教育、行业法治开展科研，将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

2. 提升辅导员法治素养

辅导员作为学生日常管理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线工作者，作为高校法治教育的骨干，其职业素养和职业技能的提升显得尤为重要[4]94。其法治素养直接影响学生法治观念的形成。将法治教育纳入辅导员培训，通过讲座、案例研讨，提升辅导员法治思维与实践能力，明确辅导员法治教育职责，使其成为学生法治实践的引路人。

3. 构建“专兼结合”的师资队伍

充分整合校内外资源，构建“专职教师＋兼职教师＋实务专家”的专兼结合师资队伍。构建“双导师制”，推行“法律学者＋科技专家”“高校教师＋企业专家”模式，共同授课、指导学生实践，实现“校企双导、产教协同”。

（四）建设校地协同、资源共享的实践平台

1. 建设校内实训平台

打造综合性法治实训中心，整合资源，配备先进设备与资源；建设法治教育工作室，搭建校园法治文化平台，营造法治氛围。

2. 拓展校外实践基地

加强与司法机关、企事业单位、律师事务所等机构的合作，建立稳定的校外实践基地，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3. 构建校地协同育人机制

成立校地协同育人领导小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开发课程、编教材、建立案例库，共享资源，互派人员交流；建立利益共享机制，通过联合科研、人才输送，提高校外单位参与积极性，形成育人合力。

（五）健全协同高效、长效运行的保障体系

1. 加强制度建设

随着依法治国战略深入实施，我国高等教育法治建设已形成基本制度框架[5]19，应用型高校需结合自身办学定位与人才培养目标，制定法治教育发展规划，为法治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顶层设计。制定法治课程建设标准、教学质量标准等制度，规范考核评价等环节，保障教学质量。制定专职教师招聘、考核，兼职教师选聘、管理等制度，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完善学生管理制度，修订学生违纪处分、申诉处理办法等制度，严格遵循法定程序处理学生事务，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同时将法治素养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引导学生重视法治学习与实践[5]23。

2. 加大经费投入

将法治教育经费纳入年度预算，设立专项经费，用于课程建设、师资培训、实践平台建设等方面。积极争取政府部门、基金会等外部支持，用于法治教育改革与创新项目。建立经费使用管理制度，加强对经费使用的监督与审计，确保经费专款专用、合理高效使用。

3. 完善评价考核机制

构建“知识、能力、素养”三位一体学生评价体系，采用多样性评价方式，注重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同时构建“教学、科研、育人”三位一体教师评价体系，多维度全面评估教师的教学水平与育人实效。另外，将法治教育工作成效与教师的职称晋升、评优评先等挂钩，构建校地协同育人评价机制。

三、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

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应用型高校法治教育需聚焦“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实践导向的法治育人体系。

为了解决当前应用型高校法治教育存在的问题，需要构建专业适配、德法融合的课程体系，打造实践导向、数字赋能的教学模式，建设专兼结合、素养过硬师资队伍，搭建校地协同、资源共享实践平台，健全协同高效、长效运行保障体系，才能有效推动应用型高校法治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培养复合型人才。通过挖掘思政课中法治元素、专业课融入思政与法治能够实现“德法兼修”育人目标，使学生不仅能“知法、懂法、守法、用法”，更能树立正确的法治信仰与实现道德自觉，成为符合教育强国与法治中国建设要求的新时代青年。

（二）未来展望

当前教育强国与法治中国建设不断深入推进，应用型高校法治教育机遇与挑战并存。着眼未来，应用型高校应持续深化改革，聚焦新兴领域的法治教育。深入融合数字技术与法治教育，积极开展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强化基层法治育人的阵地建设，积极发挥辅导员工作室微阵地作用。完善法治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提升法治教育规范化水平。

总之，应用型高校法治教育改革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应用型高校需立足自身定位，跟随时代脚步，持续深化改革创新，不断提升法治教育质量，为教育强国与法治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与智力保障。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EB/OL].(2025-01-19)[2025-03-22].https://www.gov.cn/gongbao/2025/issue_11846/202502/content_7002799.html.

[2] 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 [EB/OL].(2015-11-13)[2025-04-16].http://www.moe.gov.cn/srcsite/A03/moe_1892/moe_630/201511/t20151113_218942.html.

[3] 赵梓名 . 高校辅导员法治精神培育研究 [D]. 长春 : 东北师范大学 ,2022.

[4] 余婧靓 , 王净杰 . 高校辅导员法治思维提升策略 [J]. 华章 ,2025(03):93-95.

[5] 肖京林 , 王靖 . 中国式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 : 内涵、语境与路径 [J]. 苏州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2023,11(01):18-26.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新时代妇联开展女大学生工作的对策研究

孙雅萍　李欢萍　徐天翊　吴一亢

摘要：新时代背景下，高校育人工作面临全新要求。2020 年以来，妇联系统全面推进高校妇联建设。在此形势下，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开展女大学生工作，成为高校妇联的重要职责。如何创新工作方法、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对策，需持续探索与稳步推进。其中，强化调查研究、完善顶层设计、推动女大学生工作与日常育人深度融合，是开展此项工作的关键方法；而从密切联系女大学生到提供就业创业指导等各项对策，均需将政治引领贯穿始终，以助力女大学生成长为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求的新时代女性。

关键词：高校妇联；女大学生；立德树人；工作对策；政治引领

新时代呼唤巾帼力量，广大女性是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与推动者，妇女事业高质量发展是国家发展的重要组成。自 2020 年浙江省妇联率先举办高校妇联工作培训班以来，全国高校妇联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系统化，朝着服务女大学生成长成才的目标扎实推进。女大学生作为青年女性中的重要群体，应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以“做伟大事业的建设者、做文明风尚的倡导者、做敢于追梦的奋斗者”为方向，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展现青春担当。

一、明确一个根本任务——立德树人

2015 年，党中央召开党的历史上首次群团工作会议，明确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党员干部带头示范、群团履职尽责”的工作格局，将妇女事业纳入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将妇联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为妇女工作与妇女事业发展开辟了新阶段。

2020 年，浙江全面推行高校妇联全覆盖，标志着高校女大学生工作进入专业化推进阶段。作为高校学生工作的重要分支与高校妇联的核心职能，女大学生工作承载着为国家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接班人的重要使命。新时代加强高校妇联工作，本质上是强化党对妇联工作的领导与指引。而“立德树人”作为高校的根本任务，决定了高校妇联开展女大学生工作必须始终围绕这一核心，将价值引领、能力培养、人格塑造融入工作各环节，确保女大学生在思想上、行动上与党和国家发展同向同行。

二、处理好两种关系

（一）专与兼

高校妇联开展女大学生工作与学生工作部门开展学生工作既有共同点又有很大的差异。文件要求高校应设置妇联专职工作人员，专职人员有利于妇联工作的高效推进，同时妇联在开展女大学生工作时需要得到各级学生工作部门的支持，也需要兼职人员协同配合。从更有效领导和协调来看，妇联主席人选应由校级女性领导或校级重要中层岗位负责人担任；妇联对女大学生工作的关键岗位，如副主席候选人等可由学生工作或团委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兼任，妇联对女大学生工作的重要岗位，如办公室负责人安排专职工作人员；二级学院基层妇联工作人员可与教研室、学工办等人员融合开展工作。做好专职和兼职工作人员的选配是有效开展高校女大学生工作的前提条件。

（二）合与分

高校学生工作是人才培养工作中的重要一环。作为学生工作的职能行政部门有学生处，党委相关部门有学生工作部，研究生也有相关的行政主管部门。同时，学校团委在组织、引领、服务工作中对学生的成长成才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学生发展有利的教育活动，妇联要针对女性的特点，提出专项活动方案。与此同时，与学校相关部门时刻保持联系，有分有合，共同做好育人工作。

三、掌握三大科学工作方法

（一）以调查研究和谈心谈话把握一线动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

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调查研究不仅是工作方法，更是践行群众路线、了解真实需求的关键路径。高校妇联开展女大学生工作，必须将调查研究贯穿始终。在制定年度或阶段性工作计划和活动方案时，通过妇联执委和妇女代表传达到基层，广泛征求意见。深入基层是做好工作的关键，调查研究和谈心谈话都有利于掌握第一手资料，也是做好女大学生工作的关键。

（二）以顶层设计与组织建设夯实工作基础

1. 完善组织机构与经费保障。近几年，高校妇联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得到了大力加强。从校级到院（系）的妇联组织机构不断健全，日常工作的开展中，在经费预算中要为妇联设立专项经费，对于承担妇联女大学生工作的老师要给予育人工作量的计算。

2. 建立考核与评优机制。重视妇联工作就应当把女大学生工作成效纳入各部门各基层系院工作考核要求，对于表现优秀的系院、部门和个人进行评优表彰。

3. 融入团委与学生会组织架构。妇联对女大学生的组织和引领需要依靠大量的教育活动开展。在学生活动中，团委和学生会的工作经验丰富，方式方法多样，与学生的联系紧密，设立专门针对女生开展工作的团队组织架构与日常的学生活动融为一体，有利于组织保障和工作落实。

4. 推动女大学生参与妇联建设。校妇联有学生执委，具体开展工作时要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体现。让女大学生参与到妇联工作的组织和日常会议决策过程中，增强主人翁意识。

5. 搭建挂职交流平台。选派女大学生任校妇联的干部助理或到地方基层妇联开展兼职和见习工作，了解和紧跟社会发展，锻炼才干。

（三）以合作开展与单独举办强化政治引领

妇联在开展对女大学生的教育工作时，在相关活动中的身份可以是主办、承办、合办，形式上可以是理论宣讲，也可以是沙龙或是社会实践，线上和线下相结合，或是成立社团和协会，要善于借力和融合。例如女大学生工作与党建工作相融合，党建带妇联引领女大学生工作，避免把党建工作与妇联工作合并，要找到结合点，挖掘协作育人合力，展示政治引领和女性风采。

四、推进六项具体工作对策

（一）强化妇联宣传，营造成长氛围

1. 畅通联系。让女大学生“知妇联、找妇联、信妇联”，是开展工作的基础。大力宣传校妇联的各类联系方式，更加有效地面对面联系最广大的女生。在妇联开展活动的过程中，将妇联标识体现在细节中，使参加者看到实物就联想到妇联的关爱和活动，强调和强化妇联的影响。通过以上措施让女生在有需要时能及时找到组织，有效提升妇联在校内的影响力。

2. 节日营造。“三八”妇女节是女性专属节日，“六一”国际儿童节则是“童心未泯”快乐教育的契机；节日是开展家庭教育的好时机，比如“读书节”是开展“好书推荐”等阅读推广活动的重要机会。将女性主题教育融入相关节日庆祝活动中，营造专属氛围。

3. 展示风采。通过学校官网、微信公众号、校园广播等平台，开设优秀女大学生专栏“女校友故事汇”，宣传在校优秀女大学生（如学业标兵、志愿服务先进个人、创业典型）、毕业女校友（如行业领军人物、基层服务模范）的事迹，用身边榜样激发女大学生的奋斗动力。

（二）组建个性化团队，丰富服务内容

1. 成立巾帼志愿服务队。在志愿服务的过程中，通过组织女大学生积极参加志愿服务，设立单项荣誉称号评选，促进女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锻炼才干，培养社会责任感，提高综合素质。

2. 成立专业与兴趣服务团队。选拔和培训招募女大学生共同参加为全校女生服务的心理咨询、法律咨询、留学咨询、普通话水平提升、美食制作、手工制作等能满足各类需求的服务。结合专业发展和兴趣拓展，通过日常的服务深入师生，可以成为“三全育人”的重要载体。

3. 成立学生社区建设助力队。工作中发现一些男生寝室卫生状况不尽如人意，这些寝室有些是缺乏生活能力，也有些是态度不端正屡教不改。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指导女生们加入生活指导老师的行列，进行一对一帮扶。在女性特色帮扶下，相信男同学们更能有所改善。

（三）搭建师生桥梁，强化榜样引领

要更好地发挥校妇联女执委的工作表率和引领作用，和其他优秀女教职工在女教师和学生之间建立长期沟通的桥梁，共塑“师生 + 朋友 + 导师”关系。

1. 组建导师团与宣讲队。每个学期制定宣讲计划，开展系列活动。鼓励和支持有特长的老师指导女大学生成立女性社团。

2. 开展“师生结对”活动。举办女教职工与女生寝室结对活动，近距离了解需求解决困难，通过结对子搭建优秀女教职工和女大学生的沟通桥梁。

3. 举办“成长之约”面对面活动。在全面开展“三全育人”的氛围中，围绕“大思政课”建设，搭建师生面对面活动的载体，发挥校内优秀女性的榜样引领作用。

（四）健全权益保护机制，加强特殊关爱

1. 法律与安全教育。通过专题讲座（邀请律师、法官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反家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与女性相关的条款）、案例研讨、情景模拟等形式，提升女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定期开展安全知识宣传，筑牢安

全防线。

2. 生理健康与心理健康服务。青年时期的健康生活对今后的家庭生活具有基础意义。女大学生仍处于青春期，对于女性相关的生理现象和注意事项关系到她们今后的身体健康。可采取小范围沙龙和网上学习打卡的形式来进行生理健康科普，联合校医院、心理中心开展心理健康筛查与咨询服务。

3. 寝室人际关系指导。女生宿舍是宿舍矛盾事件的易发地，女生宿舍人际关系与男生相比，往往更为敏感、更为复杂，宿舍矛盾出现后，也更难以调解[1]。从高校育人职能视角，建议加强对女大学生人际价值观的教育和引导，帮助她们优化人际交往认知、提高综合素质，为营造良好的校园人际氛围和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奠定基础[2]。高校妇联可在女生人际交往技巧指导等方面，开展寝室生活主题指导。

4. 审美教育与自我修养提升。娄利杰提出审美不仅仅是个人修养问题，还是社会价值观的风向标。但是，面对文化多元、价值观多元的冲击，部分女大学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审美表现[3]。妇联应主动从女生审美课程开设、日常礼仪妆容指导等自我修养提升等方面积极协助或主动承担相关教育内容，共同做好育人工作。

5. 婚恋观与家风教育。一项研究表明“高等教育的当代女性所推崇的婚姻态度，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婚姻观念，更加追求自由、平等、开放。‘00 后’女大学生的婚姻态度并不是有问题的，而是其接受的教育与生活经历带给女性不同角度的思考”[4]。要从正面加以引导，培养正确的恋爱观和家庭责任感。

（五）开展专项就业创业指导，助力职业发展

就整体而言，女生对就业形势的认知、就业地点倾向与薪资期望与男生有很大的差别；但本科毕业后发展方向没有显著性别差异，直接就业、攻读研究生 / 出国、考公务员 / 事业编制位居前列[5]。女大学生就业创业有其自身特点，可以通过以下方面来开展指导。

1. 就业权益保护教育。工作精准度不够、高校女大学生就业法律教育缺失、社会传统观念限制以及女大学生自身原因，使现今社会女大学生就业法律保障缺失[6]。国家从法律和政策层面对女大学生的就业创业进行保护，但社会对女大学生就业创业还是存在偏见，相关法律知识的学习仍然是维护权益的最重要途径。

2. 榜样引领与经验分享。优秀的行业女性骨干宣讲可以很好地为在校学生提供榜样学习和经验指导的途径。

3. 举办专项“就创业”竞赛活动。在开展相关比赛时可以设立一个女大学生的单项奖，这样既能融合又体现女性特点。

（六）组织特色社会实践，提升社会适应能力

1.“巾帼助力乡村振兴”实践。组织女大学生团队走进乡村，开展电商助农（帮助农户销售特色农产品）、乡村教育帮扶（为农村女童辅导功课）、乡村文化建设（挖掘整理乡村女性故事、助力乡村文旅发展）等活动，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实现自我价值。

2.“女性发展现状调研”实践。指导女大学生团队围绕“职场女性发展、农村女性权益保障、女大学生就业创业环境”等主题开展社会调研，形成调研报告，为相关政策制定、工作优化提供参考，同时提升女大学生的调研能力与社会洞察力。

3.“企业见习”实践。与女性员工集中、重视女性发展的企业合作，建立女大学生见习基地，为其提供岗位见习机会，帮助其了解职场环境、积累工作经验，为未来就业奠定基础。

此外，上级妇联组织还可以组织妇联工作人员、高校教师围绕“女大学生思想动态与价值引领、“女大学生就业创业影响因素、新时代女性成长规律”等主题开展研究，形成论文、调研报告、工作案例等成果，为高校妇联工作的优化升级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理论和方法通过具体工作对策落实到女大学生工作实践中。从宣传到队伍建设，再到涵盖女大学生特点的各项具体工作途径，以及开展相关科研工作，全方位提升妇联对女大学生的工作内涵。既开展素质能力提升，也进行权益保护，同时还彰显巾帼风采，为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贡献巾帼力量。

参考文献

[1] 申小军，孟禄超，杨丽娜，等. 高校辅导员调解女大学生宿舍矛盾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J]. 办公室业务，2022(04):83-84.

[2] 张爱莲，付佳艺，解金鋆. 女大学生人际价值观中的友伴选择标准 [J]. 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9(01):105-112.

[3] 娄利杰. 新疆高校促进女大学生审美健康的几点思考 [J].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22,41(02):36-42.

[4] 刘晓晴，张昕 .00 后女大学生婚姻态度研究——以某驻烟高校为例 [J]. 爱情婚姻家庭（中旬），2020(11):51.

[5] 邓子鹃. 地方高校女大学生就业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1,33(02):84-93.

[6] 胡兰，高燕. 高校女大学生就业法律保障缺失问题探讨 [J]. 黄山学院学报，2020,22(04):34-37.

（作者：孙雅萍，同济大学浙江学院讲师、校学生工作部处长、校妇联主席；李欢萍，同济大学浙江学院助教、经济与管理系辅导员；徐天翊，同济大学浙江学院讲师、会计系党总支副书记；吴一元，同济大学浙江学院实习研究员、校教务处实践科科长、校妇联副主席）

微时代高职院校大学生生命教育的现实境遇

许秀静

摘要：微时代的信息传播变革重塑了高职院校大学生的生存语境与认知模式，对生命教育的开展产生了深远且复杂的影响。本研究以 3783 名高职院校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分析，系统探究微时代高职院校生命教育的现实境遇。研究发现，微时代既为生命教育带来资源共享、形式创新、精准靶向、渠道拓宽等发展机遇，也面临教育者主导地位弱化、学生身心健康风险加剧、人际交往异化等现实挑战。本研究为精准把握微时代高职生命教育发展态势、优化教育实践提供实证依据与理论参考。

关键词：微时代；高职院校；大学生；生命教育

一、研究背景

生命是教育的本源与核心，教育的本质是唤醒个体对生命意义的认知，促进生命全面发展与价值实现。高职院校作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主阵地，生源为微媒体环境下成长的“ 00 后”，其思维活跃、实践导向强，却心理抗压弱，三观尚未成型，易受外界影响。大学生自杀、校园欺凌等极端事件频发，暴露高职生命教育的滞后性。微媒体凭借独特传播特性成为学生生活主要载体，却带来价值碎片化、网络沉迷、人际异化等问题，对其生命认知与身心健康形成双重影响。剖析此背景下高职生命教育的机遇与挑战，成为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

二、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本研究基于微时代特征与高职教育规律，通过大样本实证调查，构建微媒体使用与生命教育境遇的分析框架，填补了微时代背景下高职院校生命教育专项实证研究的薄弱环节，丰富了生命教育与媒介融合的研究成果，为生命教育学科的时代化发展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与数据支撑 [1]。

（二）实践意义

精准呈现微时代高职生命教育的机遇与挑战，能够为高职院校调整生命教育策略、创新教育形式、规避潜在风险提供明确指引，助力引导学生正确应对微媒体影响，树立科学生命观，促进身心健康发展，为和谐校园与社会建设注入青春动能。

三、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

性别分布：男生 1629 人，占 43.1%；女生 2154 人，占 56.9%，女生占比略高，与部分高职院校学前教育、护理等专业的性别倾向一致。

年级分布：一年级 1137 人，占 30.1%；二年级 1123 人，占 29.7%；三年级 928 人，占 24.5%；四年级 452 人，占 12.0%；五年级 143 人，占 3.8%，样本覆盖各年级，分布相对均匀。

专业分布：将专业归类为文史类与理工类，其中文史类 2015 人，占 53.3%；理工类 1768 人，占 46.7%，涵盖学前教育、机械制造、护理、计算机等多个专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四、微时代高职院校大学生生命教育的现实境遇

（一）发展机遇

1. 教育资源共享突破时空限制

微媒体打破了信息传播的时空壁垒，实现了教育资源的共时性共享，为生命教育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支撑。微媒体平台承载着海量信息，涵盖学术研究、社会实践、心理健康、应急避险等多个领域，能够为生命教育工作者提供多样化的教学素材，有效解决传统生命教育内容单一的难题 [2]。微媒体的时效性特征赋予生命教育鲜明的时代特色。高校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平台发布积极向上的校园资讯、生命励志故事、社会实践成果等内容，学生可按需筛选、即时获取，还能通过转发分享实现二次传播，扩大生命教育的覆盖面。调查显示，18.1% 未参加专门生命教育课程学习的学生，通过微媒体主动学习相关内容，其中 72.3% 的学生表示微媒体上的生命教育资源实用且易懂，证明微媒体已成为生命教育资源共享的重要载体。

表 1　研究样本基本特征分布表

项目		频率	百分比
性别	男		11.2
	女		88.8
年级	一年级	1137	30.1
	二年级	1123	29.7
	三年级	928	24.5
	四年级	452	11.9
	五年级	143	3.8
专业	理工类	6	0.2
	教育类	3108	82.2
	经济、管理类	32	0.8
	文学、艺术类	632	16.7
	哲学、史学类	2	0.1
	农学、医学类	3	0.1

表 2　高职院校专门生命教育课程开设情况调查

是否开设专门生命教育课程	占比（%）
是（开设）	81.9
否（未开设）	18.1

2. 教育形式得以丰富创新

传统生命教育形式多以课堂讲授、专题讲座、辅导员谈心谈话为主，受时空限制明显，形式单一枯燥，难以激发学生兴趣。微时代各种微媒体层出不穷，将微媒体与生命教育结合，能够打破外在条件限制，丰富教育载体与形式。教师可将抽象的生命教育知识通过图片、声音、短视频等形式演绎，使静态内容变为动态内容、平面内容变为立体内容，提升教育的吸引力。例如，通过抖音推送 3—5 分钟的生命教育短视频，结合情景再现与专家解读，让学生直观理解生命意义；利用微信公众号发布图文并茂的生命感悟文章、心理疏导技巧；借助 VR 技术让学生体验生命历程，感受从出生到成长的责任与美好；组织学生参与微公益活动，让学生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体悟生命价值 [3]。微媒体的灵活性使学生能够随时随地学习，不再局限于课堂。调查显示，68.4% 的学生更愿意通过短视频形式接受生命教育，52.7% 的学生希望参与线上互动讨论，这种“线上 + 线下”的融合模式显著提高了生命教育的实效性。

3. 教育实施更具精准靶向性

微媒体为教育者精准把握学生需求、开展针对性教学提供了有效途径。一方面，微媒体信息更新速度快、分类便捷，教育者通过检索大学生生命问题、高职生心理困惑、就业压力疏导等关键词，能够快速获取大量即时、可靠的信息，通过综合分析可清晰掌握当前生命教育的突出问题与学生的整体需求趋势 [4]。调查显示，高职生关注的生命教育话题中，“心理压力疏导”占比 42.3%，“职业规划与生命价值”占比 31.5%，“人际交往技巧”占比 26.2%，这些数据为制定科学的教育方案提供了明确支撑。

另一方面，微媒体的线上交流功能为师生平等沟通搭建了桥梁。部分学生因性格内向、羞涩等原因，面对面交流时难以敞开心扉，而线上交流的私密性与匿名性让他们更愿意主动倾诉困惑。教育者可根据学生的个性化问题，实施因材施教，精准解决不同学生的生命认知难题。

表 3　关注的生命教育话题

关注的生命教育话题	占比（%）
心理压力疏导	42.3
职业规划与生命价值	31.5
人际交往技巧	26.2

4. 教育渠道得以拓宽延伸

传统生命教育中，教师了解学生的渠道主要是课堂互动、课后谈心、心理咨询等，信息收集渠道狭窄，易受外界因素干扰。微时代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拓宽了生命教育的信息传播与互动渠道。高职生习惯在微信朋友圈、微博、抖音等平台记录生活、抒发情感，教师通过关注这些动态，能够初步掌握学生的心理状况与思想动态。微媒体的匿名性让学生可以毫无顾虑地与教师沟通，帮助教师深层次了解学生的真实困惑，打通通往学生内心的通道。此外，微媒体让家庭、学校、社会三方的日常沟通更加便捷，打破了教育资源的校际壁垒与家校隔阂，有助于整合各方力量，搭建全方位、多元化的生命教育平台，形成协同育人的强大合力。

（二）现实挑战

1. 教育者主导地位弱化

传统生命教育中，教师凭借丰富的理论知识、充足的教育资源以及对教学内容的熟练掌握，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拥有强大的话语权，深受学生信任。而微媒体的去中心化传播特性，彻底打破了这种权威格局。微媒体以“短、快、新、奇”为信息传播特点，让信息获取变得便捷高效，高职生作为数字原住民，熟练运用各类微媒体，能够绕过教师直接获取所需信息。随着学生信息获取渠道的多元化，教师的知识优势逐渐减弱，话语权被不断稀释，主导地位受到严重挑战。调查显示，47.3% 的学生认为“通过网络获取的生命教育知识更实用”，32.6% 的学生表示“遇到困惑时更倾向于咨询网络博主而非老师”，20.1% 的学生甚至对教师的教育内容产生质疑，认为其脱离现实、不够新颖。

同时，微时代对生命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还需及时掌握海量信息、熟练运用微媒体技术开展教学。然而，部分教师缺乏微媒体使用技能，难以运用短视频、直播等形式开展教学；还有部分教师对网络信息的甄别能力不足，无法及时回应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若教师不能及时更新知识储备、提升媒介运用能力，其教育权威将进

一步弱化，难以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

表 4　高职学生对教师教育内容的态度调查

调查维度	学生态度 / 选择	占比（%）
对网络生命教育知识的评价	认为通过网络获取的生命教育知识更实用	47.3
困惑解决的咨询倾向	遇到困惑时更倾向于咨询网络博主而非老师	32.6
对教师教育内容的看法	对教师的教育内容产生质疑，认为其“脱离现实”“不够新颖”	20.1

2. 学生身心健康面临多重风险

微时代信息传播的开放性与无障碍性，使得各类不良信息有机可乘[5]。由于网络监管机制尚不完善，虚假信息、诈骗信息、反社会言论、暴力色情内容等充斥网络，这些内容不仅威胁学生的财产与生命安全，更严重冲击着他们尚未完全成熟的生命观。调查显示，38.6% 的学生在微媒体上接触过不良信息，其中 12.3% 的学生表示“这些内容让自己对生命意义产生怀疑”，22.94% 的学生表示蔑视生命的事件会对自己产生影响，甚至有 1.82% 的学生认为轻生“可以理解”。

表 5　微媒体不良信息接触及学生反映占比表

项目	占比（%）
在微媒体上接触过不良信息	38.6
接触不良信息后对生命意义产生怀疑	12.3
接触不良信息后受蔑视生命事件影响	22.94
接触不良信息后认为轻生“可以理解”	1.82

碎片化的信息传播模式还导致学生价值选择的碎片化，使其难以做出理性的价值判断，影响身心健康发展。此外，微媒体平台丰富的娱乐节目与网络游戏，对自控力较弱的高职生极具吸引力。网络生活的娱乐性与超现实性，能让学生获得短暂的精神满足，但长期沉迷其中会导致严重后果。调查显示，11.9% 的学生每日上网时长超过 5 小时，其中 63.5% 的学生表示“上网是为了逃避现实压力”。部分学生因缺乏合理的课余时间规划，沉迷网络无法自拔，不仅荒废了学业，还出现精神萎靡、心理压力过大、视力下降、身体素质变差等问题，长期缺乏体育锻炼进一步损害了身体健康。盐城某高职院校学生的心理咨询数据显示，2024 年因网络沉迷引发的心理问题占比达 28.7%，较 2023 年增长了 15.3 个百分点，严重威胁学生的身心健康。

3. 人际交往出现异化与疏离

微媒体线上交流的便捷性，致使部分高职学生现实人际交往能力弱化，线上互动频繁与线下交流匮乏的反差显著。调查显示，70.6% 的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微媒体依赖，43.5% 的学生线上交流时长超过线下，线下沦为“低头族”的现象普遍，面对面沟通的缺失，让人际交流失去亲身体验与人情味，逐渐造成情感弱化、关系冷淡。部分学生深陷微媒体交往的愉悦感，对现实交往产生抵触，沉迷虚拟世界并逃避现实社交，甚至形成排他心理。加之网络交往的匿名性，使学生可随意变换身份，长期易导致人格扭曲，难以建立真诚的现实人际关系。调研数据显示，27.3% 的学生坦言现实中难以建立亲密关系，18.6% 的学生存在社交回避行为，人际交往异化的负面影响已显现，严重阻碍学生社会生命的健康发展。

表 6　日常微媒体使用时长频率统计表

日常微媒体（QQ/ 微信 / 微博 / 抖音 / 快手）使用时长	频率（人）	占比（%）
1 小时以内	1135	30.0
1—5 小时	2282	60.3
5 小时以上	366	9.7
合计	3783	100.0

五、总结

微时代高职院校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开展，需契合微媒体传播特点与高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构建多元协同育人体系，化挑战为发展机遇。教育工作者要主动提升媒介素养，将短视频、直播等微媒体形式融入教学，重塑教育话语权，依托微平台捕捉学生思想动态，开展个性化生命教育引导。高校需完善生命教育课程体系，融入死亡教育、媒介素养培育、心理抗压疏导等内容，结合微公益、VR 生命体验等实践活动，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敬畏生命、体悟价值。同时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以微媒体搭建沟通桥梁，引导家长重视生命教育，联合社会力量净化网络生态，筑牢不良信息防护屏障。建立学生网络行为引导机制，规范微媒体使用时长，通过线上线下互动化解人际交往异化问题，引导学生理性看待网络与现实，助力其树立科学生命观，在微时代中守护生命、实现价值提升。

参考文献

[1] 周瑞法，王小民 . 研究式信息交流 : 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应有之法 [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3(05):90.

[2] 李燕燕 . 网络时代大学生生命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J]. 中国校外教育 ,2014(18):8,12.

[3] 肖行 . 生命哲学视阈下的生命教育研究 [M]. 厦门 :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4.

[4] 谢海光 . 互联网与思想政治工作概论 [M]. 上海 :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5] 叶华松 . 大学生生命教育 [M]. 杭州 :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1 年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思政专项）资助“反思与建构：微时代高职院校大学生生命教育的优化研究”（2021SJB1063）。

（作者单位：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高职护生教育氛围感知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李继乐　佘程宏　刘跃

摘要：目的：了解高职护生教育氛围感知现状并探讨其影响因素，为提升高职护生教育氛围感、保障高职护生护理教育质量、改进教育氛围策略提供依据。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乐山市某高职院校护生324人，通过一般资料调查表、师生关系问卷、自我效能感量表、教育氛围量表进行横断面调查。结果：高职护生教育氛围感总分为（56.94±9.02）分；护生教育氛围感与师生关系呈正相关（P＜0.01）。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是否自愿选择护理专业、自我效能感及师生关系是高职护生教育氛围感的主要影响因素，共解释总变异的73.5%。结论：高职护生教育氛围感处于中等水平，未来护理教育者可针对相关影响因素采取措施，以提高护生教育氛围感水平，确保护理教育质量稳步提升。

关键词：高职护生；自我效能感；师生关系；教育氛围感

护理工作关乎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持续加剧，2024年末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2亿，占总人口的15.6%，且慢性病防控需求不断攀升，慢性病导致的死亡占总死亡的90.1%。在双重因素影响下，我国医疗卫生人力资源的供需状况正面临严峻挑战，现有配置已难以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医疗照护需求[1]。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最新预测，到2030年全球注册护士的需求量将超过900万人[2]。因此，如何培养既能满足临床需求，又能适应我国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的高素质护士，护理人才培养就显得尤为重要。教育氛围是教育环境的核心要素，教育环境包括院校风气、教学指导思想以及价值引领等要素。教育氛围能够直接影响学生学习成绩、学习成就感以及最终的学习效果，如消极的教育氛围感，就会导致学生内驱力不足不可避免地加重其学习倦怠感[3]，间接降低高职护生对临床护理工作的从业意愿，长远来看势必损害护生的心理健康与护理人才的培养。高职护生作为未来基层临床护理、养老护理及社区康养护理工作的主力军，了解其教育氛围水平，能够为护理教育者进一步提升高职护理教育水平、保障人才培养质量提供重要参考。查阅文献发现，现有研究多使用教育环境调查表（Dundee Ready Education Environment Measure，DREEM）从侧面了解教育氛围，难以深入探究教育氛围的导向特征。本研究旨在了解高职护生的教育氛围感知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对提高高职护生学习兴趣、保障护生的学习质量和身心健康、促进护理队伍更加稳步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一、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本研究采用便利取样的方法，使用“问卷星”调查乐山市某高职院校324名在校护理专业全日制大专生。纳入标准：①护理专业在读大专生；②全日制大专1~2年级学生；③知情同意并自愿参与本研究。在回归分析中，样本量的确定通常为研究因素个数的10~20倍[4]，考虑到无效样本的情况，故额外增加了20%的样本量，以确保研究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本研究纳入14个条目，内容包括年龄、性别、民族、是否独生子女、是否自愿选择护理专业、户籍所在地等6个一般资料项目，以及教育氛围量表、师生关系问卷及自我效能感量表，样本量为168~336人，最终获得有效问卷324份。

（二）研究工具

1. 一般资料调查表

一般资料调查表，在阅读相关文献后采用问卷星自行编制，调查内容包括性别、年龄、民族、户籍所在地、是否自愿选择护理专业、是否独生子女等。

2. 教育氛围感知量表

中文版由郎茜[5]等学者汉化和修订，包括3个维度、18个条目，其中注重成长与彼此尊重（10个条目）、争强好胜（5个条目）、被动学习（3个条目）。量表条目均采用四级评分，从“完全不认同”（1分）至“完全认同”（4分），总得分区间为18~72分。得分越高，反映受试者体验到的教育支持氛围越浓厚。该研究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54。

3. 自我效能感量表

该测量工具是由王才康等[6]学者编制汉化和修订的量表，包含10个测量条目且采用单维度结构。每个条目设置四级评价标准，形成从“完全不正确”到“完全正确”的连续评价梯度。累计得分区间为10~40分，得分水平与护理专业学生的自我效能感知强度存在正向关联。在本项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达到0.95。本研究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5。

4. 师生关系问卷

由 Pianta（1994）编制经王耘等学者（2002）修订[7], 共包含 23 个条目、4 个维度，分别为亲密性、冲突性、支持性以及满意度。通过 Likert 5 级评分法，从“完全不同意”至“完全同意”计 1~5 分，其中冲突性维度属于负向师生关系，反向计分依次记为 5~1 分，其中反向计分题目为第 12、16、19 题。亲密性、支持性和满意度维度属于正向师生关系。总分 23~115 分，得分越高，说明护生的师生关系越融洽。本研究中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21。

（三）调查方法

本研究依托“问卷星”平台构建数字化问卷，经辅导员审核同意后将二维码转发班级群，以同学自愿扫码参与原则实施匿名化数据采集。问卷设计包含标准化前置说明模块，在问卷对象启动作答流程前自动呈现研究主旨与作答规范。通过技术手段设置每个 IP 地址仅限作答一次，调查结束后对存在规律性作答特征（如连续选择相同选项）或内在逻辑矛盾的问卷予以剔除。最终从总回收量 349 份中甄别出 324 份有效样本，对应有效回收率达 92.84%。

（四）数据处理方法

统计学方法本研究采用 Excel 2016 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以均值（$\bar{x}$ ±s）标准差；频数和百分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和方差分析。单因素分析将有意义的变量作为自变量采用独立样本进行组间差异比较，变量间的关联性分析通过 Pearson 相关分析，多因素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统计结果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一）高职护生基本资料

本研究入选高职护生 324 人，其中男生 47 人（14.51%），女生 277 人（85.49%）；年龄＜18 岁的 8 人（2.47%），18~25 岁的 316 人（97.53%）；独生子女 46 人（14.20%），非独生子女 278 人（85.80%）；自愿选择护理专业 54 人（16.67%），非自愿选择护理专业 270 人（83.33%）；城镇户籍 65 人（20.06%），农村户籍 259 人（79.94%）；少数民族 186 人（57.41%），非少数民族 138 人（42.59%）。

（二）高职护生教育氛围感、师生关系、自我效能感得分情况

高职护生教育氛围感、师生关系、自我效能感得分情况见表 1。

（三）高职护生自我效能感、师生关系满意度与教育氛围感的单因素分析

高职护生教育氛围感水平的单因素分析结果见表 2。

（四）高职护生自我效能感、师生关系满意度与教育氛围感的相关性分析

高职护生自我效能感、师生关系与教育氛围感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 3。

表 1　高职护士教育氛围感、师生关系、自我效能感得分（n=324）

项目	总分	条目均分（$\bar{x}$ ±s）
教育氛围感	56.94 ± 9.02	3.16 ± 0.50
注重成长与彼此尊重	41.43 ± 5.28	3.14 ± 0.53
争强好胜	16.25 ± 3.01	3.25 ± 0.60
被动学习	9.26 ± 1.64	3.09 ± 0.55
师生关系	69.06 ± 12.93	3.00 ± 0.56
亲密性	22.43 ± 5.10	3.20 ± 0.73
冲突性	16.63 ± 5.84	2.38 ± 0.83
支持性	17.19 ± 2.78	3.44 ± 0.56
满意度	12.81 ± 2.33	3.20 ± 0.58
自我效能感	26.41 ± 6.66	2.64 ± 0.66

表 2　高职护生教育氛围感水平的单因素分析结果

项目	人数	均分（$\bar{x}$ ±s）	t	P
性别				
男	47	3.12 ± 0.56	–0.704	0.482
女	277	97.09 ± 16.48		
年龄（岁）				
<18	8	3.10 ± 0.62	–0.338	0.735
18~25	316	3.16 ± 0.50		
民族（汉族）				
是	186	3.16 ± 0.49	–0.300	0.675
否	138	3.17 ± 0.52		
是否为独生子女				
是	46	3.23 ± 0.51	0.948	0.344
否	278	3.15 ± 0.50		
户籍所在地				
城镇	65	3.13 ± 0.54	–0.587	0.558
农村	259	3.17 ± 0.49		
是否自愿选择护理专业				
是	54	2.22 ± 0.19	–27.861	0.000
否	270	3.35 ± 0.28		

表 3　高职护生自我效能感、师生关系与教育氛围感相关性分析结果

项目	注重成长与彼此尊重	争强好胜	被动学习	教育氛围感总分
自我效能	0.419	0.215	0.258	0.364
师生关系	0.383	0.220	0.308	0.354

注：均 $P<0.01$。

（五）高职护生教育氛围感影响因素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以高职护生教育氛围感为因变量，将是否自愿选择护理专业、自我效能感及师生关系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4。

三、讨论

（一）高职护生教育氛围感现状

分析数据结果显示，高职护生教育氛围感总分为（56.94±9.02）分，各维度均分为（3.16±0.50）分，处于中等水平。在 3 个维度中，得分最低的维度是被动学习维度 [（9.26±1.64）分]。分析原因，一方面，可能是护生在学习解剖、内外科等课程时，因为有大量的知识点需要记忆和理解，所以容易让学生产生被动学习的感受；

而病理、生理等相关课程内容比较抽象、理解难度大，学生更易产生困惑和无助感，其被动学习的感受也更强烈。再加上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过于强调知识的接收和死记硬背，导致学生缺乏主动探索和思考的机会。另一方面，学习成绩一直是评价专科护生的主要依据，这进一步强化了护生被动学习的感受。因此，教学管理者应积极采取措施营造高职护生的教育氛围，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保障护生的学习质量和身心健康。

表 4　高职护生教育氛围感影响因素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β	SE	β′	t	P
常数	0.730	0.095	—	7.679	0.000
是否自愿选择护理专业	1.060	0.040	0.790	26.457	0.000
自我效能感	0.068	0.026	0.090	2.570	0.011
师生关系	0.104	0.031	0.117	3.337	0.001

注：R^2=0.738，调整 R^2=0.735;F=300.223,P ＜ 0.001。

（二）高职护生教育氛围感的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高职护生教育氛围感的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是否自愿选择护理专业、自我效能感及师生关系三个变量进入回归模型，是影响高职护生教育氛围感知现状的主要影响因素。总体变异的解释力达 73.5%

1. 是否自愿选择护理专业

研究调查发现，是否自愿选择护理专业是教育氛围感的影响因素。自愿选择护理专业的护生，教育氛围感显著高于非自愿选择的护生。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教育氛围感低的护生，绝大多数是家人建议选择护理专业的，这类护生易产生心理抵抗、学业倦怠，对教育氛围感知较弱。再加上部分护生由于自身学习能力不足，由临床医学专业被迫转为医学相关的护理专业，从而降低高职教育氛围感知。相反，自愿选择的护生因内在动力驱动的影响，如职业兴趣、职业认同、教育环境感知等，容易形成“动机—认同—环境”的正反馈。因此，教育者需通过个性化引导（如强化专业认知教育、优化课程设计）弥合志愿差异导致的心理感知分化。

2. 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是高职护生教育氛围感知的重要影响因素，与周文霞 [8] 等学者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护生的自我效能感反映了个体对自身具备完成任务所需知识和能力的坚定信心，以及为服务对象提供高质量照护的主观意愿 [9]。本研究数据分析显示，作为影响护生教育氛围感的重要因素，自我效能感与教育氛围感水平呈正相关（P ＜ 0.01）。分析原因，可能为自我效能感高的护生在专业学习、临床实践和团队合作中展现出更强信心。在临床实践中，护士如能有效处理各种复杂情况，并持续反思与总结经验，其学习适应能力将获得显著提高。这一过程不仅能够有力地促进其专业技能的发展，反之，所取得的专业进步亦能进一步提升其自我效能感，并加深其对学习本质的感性与理性理解，进而塑造积极的学习认知模式。此种良性循环可以让护生在学习中更主动、在实践中更自信，对于构建积极的学习环境、优化护生的教育体验具有重要作用。

3. 师生关系

研究结果显示，护生的师生关系对教育氛围感影响较大，良好的师生关系对营造积极高效的教育氛围至关重要，与欧冬梅等 [10] 学者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护生的师生关系与教育氛围感呈正相关，说明提高护生的师生关系能够提高教育氛围感知水平 [11]。师生关系作为教育生态中的核心要素，质量高低对教育氛围感的塑造具有深远影响。师生关系是高职学校里最核心的、最主要的人际关系。良好的师生关系能够促进有效沟通与知识传递，进而提升教育氛围感；并且，和谐的师生关系，有助于营造相互尊重、彼此信任的教育氛围，从而构建支持性学习环境，激发学生学习动机，提高学习投入度。教师既是知识的传授者，也是学生成长的引导者与支持者。师生间应建立相互尊重、信任与理解的桥梁，让课堂成为互动交流的空间，使学生更主动地参与讨论、提出疑问，迸发思维活力；教师能敏锐捕捉学生需求，及时调整教学策略。良好的师生互动，能够有效提升学习效率、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有助于形成良好学风。

四、结论

通过对乐山某高职院校 324 名高职护生的研究结果显示，高职护生的教育氛围处于中等水平，是否自愿选择护理专业、自我效能感及师生关系是其重要的影响因素。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样本的地理分布和年级构成上。调查仅在四川省乐山市的一所高职院校内进行，且调查对象以大一和大二护生为主，这可能会对研究结果的代表性和外推性产生一定影响。为了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高职护生教育氛围的现状，未来的研究应扩大样本量，采用多中心、跨省市的抽样方式，进行更大规模的调查，这将有助于获取更具普遍性的数据，从而为后续开展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更可靠的参考依据。

五、结语

本研究以四川省乐山某高职院校 324 名高职护生为调查对象，探究了教育氛围感、自我效能感、师生关系间的因果关系，弥补了过往研究多聚焦初高中生、本科生，较少关注高职护生这一特殊群体的空白。研究发现，高职护生教育氛围处于中等水平，是否自愿选择护理专业、自我效能感及师生关系是关键影响因素。但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样本量偏少且仅来自乐山一所院校，调查对象以大一大二为主，影响结果代表性；同时未全面覆盖教育氛围感的所有影响因素。（下转 270 页）

新时代高校心理育人的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研究

鲁玉银

摘要：心理育人是高校育人工作当中的重要一环，也是新时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要举措。目前，我国高校心理育人普遍存在育人主体上育人力量分散、育人内容上供需错位、育人机制上协同不足以及育人保障上资源匮乏等多方面的现实困境。为破除以上困境，首先，要加强专兼职队伍建设，铸牢全员育人意识。其次，要推动心理育人内容改革与创新。再次，要破除协同机制壁垒，形成多方合力。最后，要落实资源保障，技术赋能心理育人。如此，不断提升高校心理育人水平，为塑造“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时代新人打好基础。

关键词：心理育人；现实困境；实现路径

近年来，我国高校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呈现出复杂多样的趋势。《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3—2024）》显示，近年来，大学生遭遇情绪和行为问题的比例明显上升。然而，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得到有效心理干预的比例仍较少。针对这一严峻形势，国家也先后发布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表明了国家对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视。然而，高校心理育人在实践中仍面临多重矛盾。在此背景下，探索符合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心理育人路径，已成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迫切命题。

一、高校心理育人的现实困境

在全面推进“时代新人”铸魂工程的背景下，高校心理育人工作仍面临着供需结构失衡、协同机制不畅，以及精准干预能力不足等现实挑战。如何将心理育人从应急式的“修补”转化为发展性的“滋养”，打通育人“最后一公里”，已成为当前亟待破解的关键难题。

（一）主体层面：育人力量不足且缺乏质量

首先，我国高校心理育人专业队伍建设不够扎实。我国高校在心理育人工作方面开始时间较晚。心理相关专业队伍数量上不足的同时，经验上也显得较为不

（上接 269 页）

未来可扩大样本量，采用多中心、跨省市抽样，并纳入更多影响因素开展研究，为制定针对性干预措施提供更可靠的依据。

参考文献

[1] 周录玲，刘素珍，李航．四川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状况及居家医疗服务开展现状调查 [J]. 中国全科医学，2024,27(04):433-439.

[2] 余程宏，鞠梅，朱小霞，等．临床护士职业尊重感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J]. 护理学杂志，2022,37(07):55-57.

[3] 康文委，张燕，杨士来．实习前期高职护生学习倦怠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J]. 中国医药科学，2024,14(14):117-120.

[4] 倪平，陈京立，刘娜．护理研究中量性研究的样本量估计 [J]. 中华护理杂志，2010,45(04):378-380.

[5] 郎茜，居丹丹，曾铁英．教育氛围量表的汉化及信效度检验 [J]. 护理研究，2023,37(23):4182-4186.

[6] 王才康，胡中锋，刘勇．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研究 [J]. 应用心理学，2001,7(01):37-40.

[7] 王耘．小学生师生关系特点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D].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2.

[8] 周文霞，郭桂萍．自我效能感：概念、理论和应用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01):91-97.

[9] 徐霞，周珊，徐铭，等．本科实习护生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动机、带教老师胜任力的相关性研究 [J].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24(11):31-33.

[10] 欧冬梅．中职生情绪智力、应对方式与师生关系的关系研究 [D].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7.

[11] 叶映华，高婷婷．高等学校师生关系的结构与影响机制 [J]. 教育研究，2021,42(11):96-106.

（作者：李继乐，乐山职业技术学院副主任护师；余程宏，乐山职业技术学院助教；刘跃，乐山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足。这些不足使得目前的高校心理育人专业队伍并不能满足当下心理育人工作的需要。虽然大部分高校都设置了心理咨询中心或者心理健康教育机构。但是，这些机构主要的工作仍然是开展心理咨询以及心理干预。由于人手紧缺、经验不足等原因，虽然很多高校积极开展多种心理健康活动，但普遍性地提升高校学生心理素质的工作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成效。

其次，高校辅导员心理育人工作成效难以保障。我国高校心理育人的工作主要实施者目前仍然是辅导员。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一线工作人员，辅导员对高校心理育人工作的影响最为直接。但是，辅导员工作繁多且琐碎，需要直接管理学生，除此之外，也要担任学生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等相关课程教学。同时，辅导员还要进行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除辅导员九大职责，现实中辅导员可能还要承担很多其他事务性工作。繁杂且困难的工作，极大削减了辅导员参与心理育人的积极性，也难以取得相应的工作成效。与此同时，部分高校辅导员虽然参与过心理相关培训，但并未接受过相对系统的培训，育人能力相对不足。

再次，全员育人意识在高校心理育人工作中并未体现。近年来，虽然“三全育人”的教育理念已经逐渐深入人心。但在实际工作中，全员育人的落实仍存在不足。“高校在心理问题处置过程中，仍以心理咨询教师和辅导员为主，主体队伍的不全面会直接影响对学生心理问题痛点的准确定位，不利于及时、有效、稳妥地解决问题。”[1] 部分专业课教师认为学生的心理健康与其本职工作不相关，并不愿意积极参与心理育人工作。“部分管理与服务部门”更是“出现心理育人‘真空’地带。”[2]

最后，家长作为重要的育人主体在高校心理育人工作中的作用尚未凸显。“良好的家庭支持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具有重要促进作用，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学习和生活的挑战，增强他们应对压力的能力。”[3]82 目前，部分家长不关注学生心理健康，更多关注学业、就业等问题。有部分家长虽然已经意识到心理健康很重要，但无法敏锐察觉自己孩子的心理健康状况变化。

（二）内容层面：供需错位与时代脱节

目前，我国高校心理育人的内容存在供需错位的情况。具体表现为心理健康课程内容设计与形式载体不符合高校学生实际需求和全媒体时代的育人要求的矛盾。

我国高校心理育人内容重在“堵”而不在“疏”。很多高校将心理育人的相关资源重点放在危机干预，处于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被动局面。在心理课程设置方面，相比其他专业课程，很多学校的心理类课程开设较少。另外，这些心理课程的讲授方式也往往是传统模式，即老师讲学生听的方式。这种模式让很多学生对心理课程丧失兴趣，甚至到课率不高。与此同时，这些心理必修课的教材选用的大多是西方的相关理论，缺乏符合中国特色的理论融入。

另外，我国高校的心理育人内容不足以及时响应新时代学生发展需求。举例来说，对于处在数字时代的大学生来说，网络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短视频。然而，过度使用短视频已经对大学生心理健康造成了不良影响。“超两成青少年、三成左右大学生和逾四成成年人因长时间使用短视频对睡眠或学习工作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3]144 网络成瘾已经成为较为普遍的问题。伴随而来的，还有过度依赖网络导致的社交能力退化等一系列问题。但是，目前极少有高校对此开设了相关课程或者展开有效的行动。

（三）机制层面：协同壁垒与评价缺位

高校心理育人工作中，各部门协同性仍显不足。同时，高校也普遍缺乏相应的评价激励机制。

就高校内部而言，高校心理育人工作直接涉及心理中心、学工、教务等多个部门，需要各部门紧密协同。然而，在实际工作当中，各部门的协同性仍然不够。对于很多高校来说，心理中心组织心理普查之后，学生心理问题的发现大多依赖于辅导员的观察和学生的自查，其他部门往往在这个过程中参与不足。另外，部分高校教务部门对于心理实践活动的认定存在差异，这也导致很多学生对心理相关活动参与度下降。

此外，家校协同机制并没有完全落到实处。高校心理育人工作中，一个很大的难点在于缺乏有效的家校联动。部分家长在家已经发现学生出现心理问题苗头，但没有及时与学校取得联系。同时，部分学校也只会在学生出现紧急干预情况时才会与家长取得联系。另外，大多数地区的城市社区以及农村村委会都还没有设立学生心理服务中心，这就导致很多学生在校状态已经趋于稳定，然而，回家后没有得到相应的支持，很容易前功尽弃。另外，医校合作机制较为流于表面。很多高校与精神卫生机构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转诊通道。同时，部分高校转介到医院的患者也并未得到及时的反馈。

最后，高校心理育人工作缺乏相应的评价和激励机制。对于部分高校而言，心理育人并未纳入高校评估体系，也因此，心理育人资源分配也往往被挤压。同时，对于部分高校辅导员而言，心理育人工作也不计入职称评审成果。这无疑对高校心理育人工作的开展带来负面影响。

（四）保障层面：资源匮乏与技术掌握不足

首先，很多高校对心理育人基础设施资源投入不足。很多高校仍不具备先进的心理实验室和高效的心理辅导设备。甚至有部分高校的心理中心缺乏最基础的心理筛查设备。这对于高校心理育人工作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其次，高校心理育人工作中，教师的培养和发展仍不能适应需求。对于高校辅导员而言，心理方面的培训多是碎片化的，系统性培训较为缺乏。与此同时，

心理教师的晋升途径也较为狭窄，打击了部分心理教师的积极性，不利于高校心理育人工作发展。

最后，部分高校心理系统独立于学工、教务系统之外，各个系统之间不互通，缺乏及时有效的数据交换。这导致很多学生的心理危机信号未能及时被发现，阻碍了高校心理育人的发展。

二、高校心理育人的实现路径

高校心理育人现实困境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我国心理健康教育起步较晚，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与此同时，教育功利主义一直存在。升学率和就业率是考核重点，而心理健康教育常常是被边缘化的。另外，仍有很多人认为接受心理咨询甚至到心理科或者精神科挂号就是“精神不正常”。针对以上心理育人的现实困境及成因，本文尝试提出以下实现路径。

（一）加强专兼职队伍建设，铸牢全员育人意识

专业教师队伍建设是高校心理育人工作发展的重要一环。首先，应当严格落实教育部关于高校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师生比不低于 1 ∶ 4000 且每校至少配备 2 名的刚性要求。与此同时，严把入口关，招聘时坚持选拔具有专业背景以及专业能力的专职教师。另外，要注重队伍结构优化，引进心理咨询、心理评估、危机干预等各个方向的专业人才，形成年龄、学历、专业互补的队伍结构。

构建分层分类的辅导员心理培训体系，推动培训内容从“碎片化”向“系统化”转型。针对当前辅导员心理培训存在的片段式、随机性及流于形式等问题，应着力打造岗前培训、日常进阶与专题研修相结合的课程模块。内容设计上需涵盖心理危机识别与干预、谈心谈话技巧、情绪疏导及自我关怀等维度，形式上融合案例研讨、情景模拟与督导实践，确保培训真正落地见效，切实提升辅导员队伍的心理育人胜任力。

筑牢“全员育人”责任链，激活管理服务岗位的隐性育人价值。高校需打破心理育人仅是学工队伍或心理中心职责的认知藩篱，引导行政管理人员、后勤服务人员等树立“管理者亦是教育者”的角色意识。通过明确岗位育人职责清单、建立协同联动机制，推动其在与学生的日常接触中传递人文关怀，实现管理与服务的柔性浸润，最终形成心理教师专业引领、辅导员骨干支撑、管理服务人员协同支持的全员心理育人新格局。

建立好“学校—院系—班级—宿舍 / 个人”四级预警网络，尤其充分发挥朋辈互助支持的育人作用。“同龄人之间的鸿沟小，共通性大，互动性高，朋辈就更容易建立起友谊与信赖关系。”[4] 因此，若能充分发挥朋辈辅导的作用，心理育人成效也会更加突出。

（二）推动心理育人内容改革与创新

进入新时代，高校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呈现出新的特点。高校心理育人的内容理应随之改革创新。

课程设置上，要在保障心理健康必修课的基础上，适当开设符合学生需求的心理选修课。另外，教学形式上要不断创新。这就要求心理健康课程教师不断更新教学手段，多尝试学生喜闻乐见的教学方式。与此同时，教学内容应不断更新。目前，我国心理健康课运用的理论大多是西方心理理论。“尽管西方心理理论成果丰富，但只有根植本土文化，适合我国大学生心理特点，适应我国独特社会制度、文化特点的理论，才能更加有效推动心理育人的实现。”[5] 这就需要我们在借鉴西方理论成果的同时，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其融入心理理论当中。

另外，新时代高校学生有其独特的心理特点。例如，当下的高校学生是网络原住民，网络成瘾问题较为普遍。同时，过度依赖网络导致的社交障碍等问题也是近些年出现的新议题。心理育人工作者应当在了解学生新特点的基础上，不断更新心理育人内容。

（三）破除协同机制壁垒，形成多方合力

高校心理育人发展进步的关键在于破除协同机制壁垒，形成多方合力。目前，无论是高校内部协作育人方面还是校家社协同联动方面，都有待进一步深化。

对于高校内部来说，心理健康中心与学工部门在直接承担心理育人工作基础上，教务以及其他管理和服务部门都要联合起来，共同承担心理育人责任。教务在教学设置上应将心理育人融入主课堂当中，不断提升学生的心理健康知识水平。各管理和服务部门应积极解决学生遇到的实际困难，减轻学生各方面的压力。一旦发现学生有心理危机信号，应及时与学工部门以及心理中心对接。

推动校家社协同联动是实现高校心理育人的重要一步。高校应与精神卫生专科医院或者综合医院的精神或心理科协同，构建绿色通道；另外，高校要构建落实好家校协同机制，与家长常态化沟通，并引导家长一起维护学生心理健康。加强与各地民政部门、街道社区等合作，共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及时化解潜在危机。

（四）落实资源保障，技术赋能心理育人

落实资源保障，加大对心理育人的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要确保各高校有开展心理育人的场所以及基础设备。另外，还可以积极打造符合学生需求的互动体验平台等。师资保障方面，要逐渐建立起专业背景强、经验丰富的师资队伍。同时畅通心理教师发展渠道，设立心理育人奖励机制，提高心理育人积极性。

把握信息化发展机遇，运用信息化技术赋能心理育人。首先是建立更精准普查、咨询、指导的平台，让高校师生能更便捷地获取心理健康服务；其次是建立更加完善的心理健康宣传平台，更加精准推送、个性化定制心理健康知识；最后可以借助技术手段构建心理实践基地，通过实践更好地提升高校心理育人成效。

（下转 273 页）

以工匠精神培育高职院校学生自信心

陆晓云

摘要：智能制造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地位显著，高职院校学生作为未来智能制造的主力军却自信心不足，因此，培养和增强这些学生的自信心关乎国家的战略目标实现。高职院校思政理论教学中，用大国工匠精神激励学生的爱国情感，稳定专业思想，提升职业目标。通过对工匠精神的价值剖析，让高职院校学生树立爱国主义理想，养成卓尔不凡的人生品格，获得强大的忍耐力与意志力，提升创新能力、合作能力，充满人文情怀。通过工匠精神的培养，既能提高学生的工作能力，又为将来高质量的家庭生活打下基础，从而让高职学生充满自信面对未来，承担起智能制造主力军的重任。

关键词：大国工匠；工匠精神；高职院校学生；爱国主义；自信心

智能制造被列入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作为未来智能制造主力军的高职院校学生必须具备足够的自信心才能承担重任，因而高职院校对学生自信心的培养直接关乎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一、激发学生成为大国工匠的理想与信心

如何激励高职院校的学生成为未来智能制造领域顶尖能手或专家呢?

（一）通过政策宣传树立学生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信心是成功的重要因素，充满信心的学生才能扎根企业钻研技术。某校是以水上交通专业为主的高职类院校，包括港口类、船舶与海上平台制造、海上运输等是主干专业，由于专业工作苦累脏，一些学生专业思想不稳定。对此，应从专业在国家发展规划中的战略地位角度激发学生专业自豪感与崇高感。如介绍《中国制造 2025》等，让学生认识本专业在国家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了解今后的工作环境，从而改变对专业的态度，主动积极提高自身素质。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我国外贸业务量大幅度增长，而该校的专业发展与此紧密相关，港口、海洋运输、智能制造、船舶与海洋工程等专业在国际国内都有影响力与知名度，这些信息会增强学生对专业的信心。

此外，针对应届高校毕业生各地优惠政策（如公租房、人才安置房政策，企业就业的大学生住房补贴规定等），应当及早让毕业生获悉，且教师应当引导学生分析市场的技术人员缺口、人才成长空间等，树立学生对行业发展的信心。

（二）引导学生确立与国家发展前景吻合的职业规划

引导学生确立与国家发展前景紧密结合的职业规划，提升人生价值。结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公报提出的“到二〇三五年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1]，与学生探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如何发挥技术工人的作用，充分认识技术工人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用中美技术力量对比来激发学生创新创造的内生力量。

尽管我国已在各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离现代化强国尚有距离，重振国威的重任责无旁贷落到当今青年的肩上。“只有弘扬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持续改进产品，才有可能突破中国制造的‘困境’，推动我国工业产品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为经济

（上接 272 页）

参考文献

[1] 许继亮 . 高校建立健全心理育人机制论析 [J]. 思想理论教育 ,2022(12):109.

[2] 吴艳 , 韩君华 .“三全育人”背景下高校心理育人工作的路径选择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0(06):77.

[3] 孙向红 , 蒋毅 .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3~2024）[M].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5:82,144.

[4] 梅萍 . 论新时代高校全员心理育人模式的建构与实施 [J]. 思想理论教育 ,2019(12):104.

[5] 章少哨 .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育人功能实现的实然困境与应然路径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0(06):82.

（作者系南华大学助教）

社会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2] 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将是未来国家制造业的主力军，港口设备制造、航海平台制造、智能制造等专业直接影响着国家海洋强国梦想的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也对青年人寄语，“青年强，则国家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青年群体融入社会发展进程，将个人价值与国家战略目标统一，既能拓宽认知边界，亦可重构奋斗导向。这种主体性嵌入可超越个体狭隘性，促使其在技术实践中形成持久专注力，通过专业技能积累与职业认同强化，最终成长为具备“大国工匠”精神的技术精英，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贡献的统一。

（三）结合专业特点探讨学生成才方向

一些航海类专业学生认为，随着船舶智能化发展，船员需求将逐渐减少。轮机专业学生若能精通修理与制造，在专业领域成为大国工匠不难，但驾驶及其他专业学生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关键在于厘清大国工匠称号与“工匠精神”的关系——并非人人能获此殊荣，但均可践行工匠精神。如驾驶专业人员，在职业生涯中避免人为海难与责任事故，即为工匠精神的体现；海乘人员，提升服务质量、创新服务内容，以专业态度赢得客户认可；港口设备管理人员，在自动化背景下，确保设备稳定运行，杜绝重大操作失误；船舶与海洋工程人员，推动机电国产化，助力中国制造业升级；智能制造人员，作为一线技术工人应探索创新，推动技术迭代。可见，工匠精神的核心在于专业专注、精益求精、持续改进而非仅局限于特定头衔，各专业学生均可通过职业实践，在各自领域诠释这一精神。

二、工匠精神培养对提升学生职业素养的促进作用

工匠精神的培养不仅有助于提升个体的职业素养，也对其生活质量的优化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具有显著影响。具备工匠精神的个体，因其高度的责任感、坚韧性及追求卓越的价值观，往往能在工作与生活场域中实现良性互动。

工匠精神所蕴含的责任伦理能有效降低家庭冲突频率，其忍耐力与问题解决导向可促进矛盾的非对抗性处理；人文关怀及精益求精的态度能够延伸至家庭互动，使成员感受到持续性关爱，从而强化家庭凝聚力；品质追求与生活美学则有利于家居环境优化与仪式感营造，从而提升家庭生活品质；技术迁移能力（家具组装、水电维修等技能）可降低生活成本并增强自我效能感；系统性思维则能将职业训练中的标准化与协作意识应用于家庭分工，从而提高家务处理效率。

工匠精神的培养本质上是价值观内化过程，其通过责任伦理、实践理性与美学追求的三重维度，同步优化职业表现与家庭生活质量。对高职院校而言，需在技能训练中嵌入工匠精神教育，以实现“职业—生活”协同发展范式。

三、通过价值赋能培养学生工匠精神

新时代的青年人，对 5G、云计算、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新技术应用关注度较高，追求精神层面的价值，如果将他们的行为赋予崇高感，更能激发他们的激情。针对这些特点，对工匠精神进行价值赋能，“做到将知识、技能和价值观完整融合，形成系统的职业观念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3] 让他们接纳与认可自己能成为大国工匠，并能成为工匠精神的传承者与传播者。

（一）工匠精神中凝聚着爱国主义精神

1. 促进民族复兴

中华民族历史上有过辉煌也有过屈辱，民族复兴是新时代的奋斗目标之一，但民族复兴用口号无法实现，应当通过先进的生产力来重振中华民族雄风。因此，作为技术工人，应当有创新创造精神，通过提供优质精美的产品、细致体贴的服务，去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2. 让人民生活安康

一个对自己的国家、人民有深厚感情的人，应体现在行动中。制造的产品能让国人用起来得心应手、安全、愉悦，从消费者角度从事制造业，处处以自己的同胞身心健康为出发点制造产品。具备工匠精神的人投入工作中当以对他人负责为重，全身心沉浸在工作中达到浑然忘我的境界。如果在谈判生意时需要考虑成本与收益，那么在制作过程中，必须考虑的是质量与安全，摒弃唯利是图才可能确保产品的安全，而技术工人是源头保证质量的重要一环。

3. 为生态环境作贡献

贸易越发达，制造的产品越多，环境保护的责任就越大。节能减排不仅要靠设备，更离不开技术工人的技能。同样的产品由于安装的技能不一样导致产品的质量有较大差距，良好的技术技能可以延长产品的使用期限，提高产品的质量，从而减少对环境的压力。2060 年前能否实现碳中和，制造业是关键，而具备工匠精神的技术工人则是今后节能减排的主力军。

（二）工匠精神体现了卓尔不凡的人生品格

与普通工人的人生态度不同，具备工匠精神的工人视工作为人生价值的实现途径。在工匠精神的驱使下，产品质量提升、技术的改进没有止境，他们不断挑战新高度，让工作、生活过得更有意义、更精彩。有自我超越精神、超越他人精神的人，精致是其重要的标志之一，他们做什么事都不会迁就，总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三）工匠精神显示了强大的忍耐力与意志力

1. 工匠精神促使人钻研

追求卓越需要长期坚持，“台上一分钟，台下十

年功”体现了工匠精神，浮躁者难成大器，精湛技艺源于持久磨炼、潜心钻研和不懈奋斗，工匠必须具备强大耐力和坚定意志。急功近利、贪图安逸的思想会让员工频繁跳槽，这既不利于企业发展，也阻碍个人成长，只有持续历练才能提升技能。工匠精神意味着坚守岗位，与企业共同成长。企业愿意培养忠诚敬业的员工，但前提是员工对企业有足够忠诚度。成长必经磨砺，工匠精神的核心是坚韧不拔的毅力，在困境中砥砺前行。

2. 工匠精神使人具有定力

网络社会在给人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游戏成瘾是当前社会的痼疾，很多年轻人沉湎于游戏，工作成了副业而游戏成了生活的主导。工匠精神则让人在工作中获得远胜于游戏的快乐，因为每个人都要通过成功来体现自身价值，沉湎于游戏的人在现实中成功的事太少，因此在游戏中获得了成功带来的快乐，而有工匠精神的人在现实中获得了太多的成功，并因此体验到了获得社会认可的快乐，因此更坚定了价值目标，他们会将事情做得越来越好。所以坚定的意志让工匠精神的实践者形成了良性循环，从而可以摆脱网络的负面影响。

3. 工匠精神能够坚定理想目标

外在的诱惑容易使人丧失自我，新时代丰富的物质生活让年轻人迷失了方向。在薪酬跟不上时代变迁的情况下怎样才能坚守大国工匠的目标？某飞机制造公司的一位高级技工道出了答案：兴趣。能沉浸在自己热爱的工作中获得精神上的满足远非其他物质享受能替代，因此，尽管这位高级技工在其他行业获得比飞机制造更高的薪酬，但自豪感与兴趣又促使他回到了飞机制造行业。正是按自己的兴趣与爱好追求工作乐趣，他才在飞机制造方面达到了常人无法企及的高度。“工匠精神中包含着浓烈的兴趣与爱好，因此，工匠精神能排除一切干扰，在既定的目标上走得远飞得高。通过工匠精神的培育磨炼高职院校大学生的意志，提升技能，让他们从单纯的专业学习到热爱自己的专业，并持之以恒地投入其中。”[4]

（四）工匠精神展现了独特的创新能力

具备工匠精神的人会追求持续改进与创新，他们视工作为事业，注重细节，关注行业动态，重视用户反馈，不断优化工艺。传统观念以为设计与生产不可能是同一批人，一线工人只会机械执行指令，缺乏创造性。智能化时代技术工人不仅是生产主力，也是设计参与者。具有工匠精神的工人，凭借责任感、使命感和专业兴趣，在生产中思考工艺改进，并与设计人员沟通，推动产品创新，在实践与理论结合时产生创新性正是工匠精神的精髓。

（五）工匠精神包含合作能力

现代化生产需要团队协作，任何环节的瑕疵都会影响产品质量。仅靠个人追求完美不够，必须整个团队都具备工匠精神。

如何培养团队的工匠精神？关键在于少数工匠的示范引领——用行动带动、用情感感染、用沟通激励、用榜样促进，让更多人向高标准看齐。但工匠精神也要注重团队和谐。如果荣誉总集中于少数人，可能引发团队内部矛盾。真正的工匠应遵循“美美与共”原则，必要时与团队成员分享荣誉，让团队成员共同成长。这样才能带动更多人成为工匠，实现真正的卓越。

（六）工匠精神体现了浓厚的人文情怀

具备工匠精神的人在服务与制造产品中不会把自己与顾客对立，而是能设身处地为顾客着想，根据不同种类顾客的要求，不断完善与改进，尤其是通过细节的处理，去满足顾客的要求。随着社会进入新时代，社会整体的需求发生了改变，当代人品位上升、对产品与服务的质量要求更高，因此，制造业在考虑物品实用性的同时应注重外观设计、功能便捷方便，还需满足智能化、物联网的特点。用起来得心应手的产品既体现了设计与制造者的良苦用心，更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

四、结语

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有助于高职院校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念，清晰地进行个人职业定位和职业发展规划，从而使学生能够将个人发展目标和学习目标进行相互融合，全面提高自身的学习效果[5]，通过工匠精神的培养，树立高职生的自信心。在一个价值观多元的时代，高职院校毕业生凭借工匠精神魅力，不仅会受到更多职场的青睐，也可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 [EB/OL].(2025-10-23)[2026-01-14].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10/content_7045444.htm.

[2] 李芳，何强 . 工匠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探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2(16):65-67.

[3] 康卉 . 工匠精神与思政教育有机结合的路径研究 [J]. 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22(02):62-64.

[4] 刘洋 . 工匠精神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与路径研究 [D]. 长春 : 东北师范大学 ,2017.

[5] 张红 . 基于思政教育模式工匠精神的探索研究 [J]. 高教论坛 ,2018(07):8-10.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2 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题项目“新时代‘工匠精神’融入高职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路径研究”（2022SJSZ0889）。

（作者系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困境和路径优化
——基于“三全育人”框架的实证分析

温蕊旭　胡西塔尔江·吾拉木

摘要：本文立足于“三全育人”理念，探究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通过构建理论模型，结合对5000余名高校学生的问卷调查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当前高校培育工作已形成良好基础，但在“全员”协同深度、“全过程”衔接精度、“全方位”覆盖效度上仍有提升空间。本文据此提出系统化优化路径：全员育人上构建“管理—教学—服务—家校”多元主体协同机制；全过程育人上设计“情感融入—理性建构—使命践行”阶梯化引导体系；全方位育人上打造“课程—文化—实践—网络”四维一体育人生态圈，为推动铸牢工作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深化提供参考。

关键词：“三全育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1. 研究背景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1]。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创造性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原创性论断，并将其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2]。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是推动青年一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场域[3]。

少数民族学生是高校学生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融入大学集体生活、建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过程中，既面临共性的大学生成长课题，也遭遇一些特殊的挑战。他们能否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关系到个人的成长成才，更关系到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长治久安。

“三全育人”工作体系中“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核心理念为破解当前铸牢工作中可能存在的碎片化、表层化问题提供了根本遵循。如何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于学生教育管理的全过程，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三全育人”路径，已成为一项亟待深入研究的重大现实课题。

2. 研究意义

将“三全育人”理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工作深度融合具有重要价值。从理论上看，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三全育人”这一现代教育理念相结合，有助于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规律的认识，推动民族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交叉融合。从实践上看，本研究基于对5480份问卷数据的分析，精准把脉现状，所提出的路径对策可服务于高校相关部门以及一线辅导员的工作实践，提升育人工作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二）研究现状与目标

1. 研究现状

国内学界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已形成丰硕成果，主要集中在内涵阐释、意义论述与路径探索等方面[4]。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可拓展的空间。首先，从研究对象看，以少数民族学生为重点进行系统、深入剖析的专项研究相对不足。其次，从研究视角看，多数研究或侧重于宏观政策解读，或局限于思政课单一渠道，从“三全育人”这一系统性视角进行贯通式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最后，从研究方法看，理论思辨居多，基于大规模实证调查进行量化分析与质性研究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有待加强。

2. 研究目标

本研究旨在从“三全育人”的独特视角，以实证调查数据为支撑，厘清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工作现状，分析学生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中的发展特点，把握高校工作的薄弱环节，并提出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校“三全育人”的对策。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研究遵循“理论构建—现状剖析—路径探索”

的逻辑脉络。首先，夯实理论基础，清晰界定核心概念，确立“三全育人”分析框架。其次，运用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等方法，呈现当前“三全育人”三个维度上高校培育工作的现状、成效与问题。最后，针对发现的问题，系统构建路径优化体系。

研究方法上，采用文献分析法、问卷调查法和跨学科研究法，立足于基础理论与现实问题相结合。

二、理论阐释与概念界定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历史客观存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心理意识。其核心内涵可以从四个维度理解：一是历史共同体认同，即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历史产物，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二是文化共同体认同，即深刻认识到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晶，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三是命运共同体认同，即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四是政治共同体认同，即深刻认识到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自觉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5]。

（二）“三全育人”

“三全育人”涵盖“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三层面。全员育人强调育人主体的广泛性，动员学校内外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形成人人关心、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大思政”格局。全过程育人强调育人时间的连续性，要求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整个成长周期，根据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认知特点，设计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教育内容与方法。全方位育人强调育人空间的广延性，要求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构建多维立体的育人空间。

（三）“三全育人”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关联

“三全育人”理念为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最佳的实现路径和操作框架，二者的目标统一于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方法契合于系统化、科学化。

“全员育人”与主体协同逻辑对应，通过构建多元协同体系，使学生在一致场域中获得正向信息与情感体验。“全过程育人”与阶段递进逻辑契合，要求遵循学生成长规律，实现育人内容的有效衔接与目标的螺旋上升。“全方位育人”与空间融合逻辑一致，通过整合各类载体，构建多维育人生态，实现全面覆盖与价值引领[6]。

三、高校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状——基于问卷调查

（一）调查样本情况

本研究面向不同省份高校学生开展问卷调查，共收取有效样本 5480 份。年级覆盖大一至大四，民族构成上汉族学生占 55%，其他少数民族学生占 45%，学科门类齐全，生源地覆盖西部地区、中部和东部地区。

（二）总体成效与积极态势

问卷数据表明，当前高校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总体态势积极向好。

1. 认知认同度高

超过 95% 的学生对“我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而感到自豪”等核心观点表示高度认同。

2. 主渠道作用显著

84.14% 的学生认为“思政课对我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帮助”，82.01% 的学生认可专业课教师能自然进行价值引领。

3. 文化活动受欢迎

90.69% 的学生认为“民族团结月、文化节等活动促进了不同民族同学的交往”；85.11% 的学生认同校园文化环境营造了民族团结氛围。

（三）可持续优化空间

尽管成效显著，但数据也反映出 “三全育人”视角下相关工作可持续优化的空间。

1. 全员育人主体协同持续深化

教书与育人的融合不断推进。专业课教师的价值引领获得高度认同，开放题中“理论讲解可更生动”的建议，为“课程思政”从“有”向“优”、从“硬融入”向“软生成”的进一步优化提供了清晰方向。

管理服务部门的育人功能稳步增强。后勤、行政等“非一线”部门的育人理念正逐步融入工作细节，全员育人的“最后一公里”正在不断延伸拓展。

家校社联动机制持续健全。家校联动的育人作用日益显现，朋辈活动也在积极探索从“组织化”向“生活化”的深层交融。

2. 全过程育人阶段衔接持续加强

教育设计的递进性不断提升。在情感认同普遍较高的基础上，“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基本含义”一项中有部分学生选择“一般”，为进一步加强从“情感共鸣”到“理论确信”的转化，特别是在学业压力增大、思想深度拓展的大二、大三阶段，提供了精准的发力点。

教育效果的常态保障持续完善。活动在“民族团结月”等重点时段成效显著的同时，常态化机制建设不断推进，“润物细无声”的持续浸润效果正日益显现。

3. 全方位育人领域覆盖持续拓展

实践育人深度不断挖掘。“社会实践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国情”一题为优化实践育人模式、回应学生“多开展不同民族学生共同参与的实践活动”“沉浸式体验”

等期待，明确了提升方向。

网络育人吸引力持续增强。78.72% 的学生认可学校官方媒体，网络阵地育人功能在保持优势的基础上，正着力对标文化活动吸引力，实现持续提升。

心理融入与深度交往支持持续加强。开放题反馈为进一步关注学生心理融入、促进民族间深度交往提供了精准的优化着力点。

育人载体间联动持续强化。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社会实践等载体之间的协同机制正不断完善，育人合力稳步提升。

四、“三全育人”视角下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化路径

基于理论框架与实证诊断，本研究提出以下系统化的路径优化方案。

（一）强化主体协同，打造“管理—教学—服务—家校”全员育人共同体

1. 强化顶层设计，明确责任清单

学校党委层面应出台专门责任清单，将培育成效纳入学院、部门及教师的考核评价体系，从制度上保障“全员”落地。

2. 深化课程思政，提升教师队伍综合素养

推动思政课教学改革，增强吸引力与说服力；鼓励专业老师开展“课程思政”专项培训，挖掘各学科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元素；提升辅导员民族理论政策水平和谈心谈话技巧。

3. 延伸育人半径，健全全员育人协同机制

联合后勤、安保、图书馆等窗口单位开展“暖心工程”；建立“家校关怀共同体”，通过内派教师、线上家长会等形式与少数民族学生家庭深度沟通；邀请优秀校友、行业楷模来校作报告，形成育人合力。

4. 活化朋辈教育，培育传帮带内生动力

系统实施“朋辈引领者计划”，培训学生骨干，组织“中华民族我的家”等常态化朋辈交流活动，促进自发交融。

（二）注重阶段引导，构建“情感融入—理性建构—使命践行”全过程引导体系

1. 大一阶段：强化情感融入与规则认同

重点通过新生入学教育、校史校情教育、“民族团结一家亲”师生结对等活动，营造温暖包容的集体氛围，建立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初步归属感和规则意识。大力推广“混合住宿”。

2. 大二、大三阶段：聚焦“理性建构”与“能力赋能”

此阶段是意识形态攻坚克难的关键期。可开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进阶课程、举办主题研讨会，鼓励学生进行学术性思考；组织跨学科、各民族学生共同参与的科研竞赛、社会调研（如赴民族地区开展乡村振兴实践）；深入开展“三进两联一交友”活动，促进各族学生深度交往[7]；持续开展学业帮扶与普通话提升计划。

3. 大四阶段：强化“使命践行”与“担当作为”

针对毕业年级，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与就业指导、职业生涯规划紧密结合，鼓励学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

（三）整合多元载体，拓展“课程—文化—实践—网络”全方位生态圈

1. 课程阵地“固本强基”

在坚持思政课主渠道地位的同时，大力推进案例式、情景模拟式教学改革，让理论讲授“活”起来。打造一批“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和教学团队。

2. 文化阵地“浸润人心”

大力推动文化活动从“观赏型”向“共创型”升级，鼓励各民族学生混合组队成立文化交流协会、艺术社团等，在合作创造中深化情感连接与文化认同。在校园景观、宣传栏中巧妙融入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

3. 实践阵地“提质增效”

设计一批具有思想性、挑战性的实践项目，如“各民族共同守望祖国边疆”主题调研、“民族团结故事”寻访等，并要求不同专业、不同民族的学生混合组队。建立实践成果分享与转化机制，让实践经历成为滋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活水源泉。

4. 网络阵地“破壁出圈”

组建学生主导的网络文创团队，建设集宣传、教育、互动于一体的主题网上家园。鼓励师生创作新媒体产品，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述民族团结故事。重点培养网络意见领袖，让官方平台成为能与学生互动、共鸣的“朋友圈”，牢牢掌握网络育人主动权。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以“三全育人”为理论基础，对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进行了系统探究。研究表明，当前高校此项工作虽然成效显著，但仍在育人主体的协同性、育人过程的连续性、育人领域的渗透性上面临挑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项植根历史、关乎未来、久久为功的战略工程。在未来的工作中，高校必须持续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坚定不移地贯彻“三全育人”理念。以更加系统的规划、更加精准的举措、更加深厚的感情，将这项工作落细、落小、落实，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 余翠娟 . 国家安全视域下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路径研究 [D].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 ,2022.

[2] 李志农 , 周丽梅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课程从课堂走向田野——以云南扎根式援藏干部口述史实践教学为例 [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2(02):164-170.

[3] 杨虎得 , 韩喜玉 . 高校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教学的思考 [J]. 青藏高原论 （下转 279 页）

安身与立命：当代青年大学生生命教育探究

陈雨佳　徐斯雄

摘要：高校青年大学生生命教育在民族复兴人才培养体系中至关重要。加强这一教育，既是回应青年成长需求，助其应对学业、人际等挑战，建立对生命的敬畏，培育健全人格，也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要求，更是补齐传统教育短板、破解部分学生生命意义感模糊等问题的实际需要。推进生命教育，需立足大学生思维活跃、价值多元的特点，强调个性化引导；聚焦生命认知、情感、价值这三大核心维度构建内容体系；打破单一说教，融入思政课、专业课，创新主题班会等载体；同时发挥科研育人作用，推动家校社协同形成教育合力，助力大学生成长为栋梁之材，为民族复兴注入持久动力。

关键词：青年大学生；生命教育；大学教育

教育是助力个体生命力发展的行动之一。在“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下，生命是教育之根本，唯有回归生命，教育方能展现其魅力与影响力。民族复兴伟业需要一代代青年接续奋斗才会实现。当前我国在校青年大学生人数众多，要积极挖掘各类教育资源，加强对青年大学生的生命教育，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

一、大学生生命教育的价值意蕴

青年大学生生命教育，是针对青年大学生这一群体开展的，立足于青年大学生身心发展特点，遵循青年大学生生命成长的规律而进行的与生命相关的教育活动。青年大学生生命教育旨在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让青年大学生在生存和成长中彰显生命的活力，从而实现其个体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有效地提升生命质量。

（一）促进青年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就大学生群体而言，生命教育是其提升生命质量、健全自身人格、实现精神独立的必由之路。”[1]一个接受过生命教育的人，能体会到生命的独特和价值，会对其人生目标更加明确，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作为青年大学生由学校生活走向社会生活的重要历程，大学教育阶段对青年大学生的成长尤为关键。相对于青年大学生生理发育而言，其心理发育并不是同步的，而是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当面对生活和学习的压力时，一些青年大学生心理状态容易失衡，甚至会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产生困惑和怀疑。因此，大学必须正视这一问题，及时开展生命教育活动，保障青年大学生对生命具有正确的认识和理解，实现青年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二）大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效方式

培养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合格青年大学生，不仅事关大学教育改革发展的成败，更关系党和国家发展的大局。大学要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其前提就是要帮助大学生理解自己、他人乃至自然界众多生命的意义，热爱、珍惜个体生命，激发生命潜能，不断提升生命品质，在生活、学习和今后的工作中实现生命价值。大学要实现立德树人，必然要培育个性突出、内在丰满的生命个体。

“教育的本质是生命教育。”教育源自人的生命延续和发展的需要，教育本质上是对生命的关注与回应。“大学开展生命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给大学生普及生命教育的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切实提高大

（上接 278 页）

坛 ,2023,11(03):1-5.

[4] 阿米娜·艾海提 . 新疆高校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D]. 乌鲁木齐 : 新疆大学 ,2020.

[5] 李玲玲 . 新疆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目标及构建研究 [D]. 乌鲁木齐 : 新疆大学 ,2023.

[6] 杨红燕 .“三全育人”视域下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研究 [J].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5,24(02):56-61.

[7] 黄和平 . 南疆地区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 [D]. 喀什 : 喀什大学 ,2017.

（作者 : 温蕊旭 , 河北师范大学 ; 胡西塔尔江·吾拉木 , 新疆科技学院）

学生对生命价值的认识、领悟，改变大学生固有思想意识中的负面价值观，进而引导大学生珍惜生命、热爱生命，最终树立正确的生命价值意识、选取正确的人生道路，从而健康成长成才。”[2] 因此，为保证青年大学生实现全面发展的目标，实现大学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必须加强对青年大学生的生命教育。

（三）当代教育发展的现实需要

当前，信息技术已成为大学教育教学推行的关键技术。“技术为创新教学方式提供了条件，也为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提供了可能。”信息多样化的传播途径，在激发青年大学生主体意识、化解他们在生命成长过程中所遇到的困惑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人的生命本质上是一种相互联系、彼此依存的主体间性存在。将主体间性的哲学观点融入青年大学生的生命教育中，旨在让学生具备独立的主体性，达成教师与学生之间平等、自由地交流的目标。

网络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为青年大学生生命教育开辟了新的路径。一方面，青年大学生的主体意识日益增强，他们愈发渴望主动展现自我，在各类教育活动中尽情彰显生命的独特个性。另一方面，网络信息技术具备迅捷、即时的特性，为青年大学生生命教育提供了个性化和全方位的服务支持。高校应当充分利用这些优势，不断完善和创新生命教育的模式和方法，助力青年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3]。

二、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实践要求

（一）把握对象的特殊性

开展青年大学生生命教育，要把握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当今的青年大学生在家庭的呵护下，人生历程相对顺遂，尽管有一部分青年大学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现实的社会生活的担忧和不安，但是他们都有寻求安全和保护的趋势，竭力做好对自身及他人生命安全的保护工作。

青年大学生群体呈现出鲜明的个性化特征，他们在身心发展程度、生活经验积累、学习能力高低、家庭成长环境方面亦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因素相互交织，不仅塑造了学生们独特的心理素质，还使他们在看待事物的视角、处理问题的方式上各具特色，进而催生出差异化的生命教育需求。面对青年大学生在生命认知与实践中的多元表现，教育工作者需要深刻把握学生身心发展的独特规律，充分考量学生所处地域的文化氛围、现实中面临的境遇挑战、家庭经济与教育条件，以及动态变化的思想状态等实际因素。通过因材施教的方式，在教育引导过程中逐步深化学生对生命本质的理解，帮助他们在探索中明晰生命价值，追寻生命意义，从而实现精神层面的成长与升华[4]。

（二）运用方式的灵活性

青年大学生生命教育，要求教育方式体现出灵活性。简单地使用一种教育方式，无法适应大学生的多样性变化，不仅会影响生命教育的效果，还有可能适得其反。“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由于教育时间、现代教育技术和教育环境等众多因素的变化，生命教育的形式也逐渐呈现多样化的态势。这就要求在开展青年大学生生命教育时，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促使青年大学生对生命价值有正确的认识，从而能够做出恰当的行为选择。要根据青年大学生所处的不同环境、条件的实际情况，运用合理的教育方式加以解决。

从当前各高校的教学实际来看，“线上线下融合”已成为主流教育模式。通过线上网络平台，教师和学生可以随时开展“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的互动交流，而教师则可以通过网络数据分析，了解青年大学生掌握生命知识的情况，以便于及时调整教学方式。在线下，学生则通过独立思考、志愿活动、参与社会服务等多种方式体验生命、承担社会责任，展现生命的魅力。由此可见，时代的变化，要求教师会用活用巧用各种教育方式，从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出发，让生命教育的理念深入青年大学生的心灵。

（三）教育内容的综合性

生命教育的内容来源于生活，是人们对于生命经验的总结和凝练，它综合了多方面的关于生命的知识和体验。当前，青年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内容逐渐丰富，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但还应当挖掘各方面的生命教育的素材，及时更新并补充到生命教育之中，这也体现出生命教育内容回归生活和与时俱进的特征。

对青年大学生进行生命教育应当围绕健康生活习惯、珍惜关爱生命、生命责任担当等方面展开，让每位学生都能理解和掌握这些内容，并不断内化为生命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要注重生命教育内容的系统性，依据生命教育的特点，根据社会发展状况和学生的学习需求，科学规划设计生命教育的内容，体现出阶段性和长期性的统一。

三、青年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实施路径

（一）明确生命教育的核心内容

生命教育的内容要面向学生现实的生活，和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境遇紧密相连。突发安全事件的应对教育、无私奉献的生命价值教育、坚守岗位的生命责任教育、转瞬即逝的生命与死亡教育、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教育，都应当被及时纳入生命教育的范围。这些内容既相对独立，又存在一定的关联，从不同角度和层面聚焦于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要把握青年大学生迫切需要的生命教育内容，把一些实时性的必要内容纳入教育的范围，从不同角度来开展生命教育，引发大学生生命意识的觉醒，促使他们在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努力提升生命的质量，彰显生命安全的价值和意义[5]。

（二）强化课程教育主导作用

当前我国大学生生命教育在教学方式、课程设置等方面都处于起步探索阶段，还没有统一明确的标准和要求，绝大多数都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涉及部分相关内容。因此，要将青年大学生生命教育融合到大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之中，提供精神支撑，增强生命教育的力度。在依托思想政治理论课开展生命教育的同时，要尽量拓宽生命教育的课程渠道，发挥课程思政的重要作用，将生命教育的相关知识融入大学的各个学科、各类课程之中，努力挖掘各学科中的生命教育资源，要将课程思政的理念融入到所有课程之中，在课程中展现生命教育的作用与魅力。

要从理论知识层面融合哲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医学、艺术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让青年大学生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得系统的生命知识。要从教育理念层面把生命教育的基本观点、核心内容融入到其他学科的教学中，适应新形势下的大学教育的需求。生命教育与其他学科存在着较多的交叉和联系，因此，要鼓励其他专业学科教师积极参与生命教育工作，让他们注重发挥在专业学科教学方面的优势，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去理解生命、感悟生命。

（三）采用科学有效的教育方式

青年大学生生命教育能否真正落到实处而不流于形式，教育方式是关键。开展青年大学生生命教育，应当综合运用多种教育方式。当前，青年大学生普遍通过网络、手机等途径获取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教师讲授的知识不再是学生获取生命教育知识的唯一来源，而传统的讲授方式也逐渐失去对学生的吸引力。这就要求教师在选用教育方式时，要将多种多样的方式进行分析比较，综合考虑学生的理解接受能力、心理状态、兴趣爱好、学习习惯等因素，将生命教育的内容和价值准确地传递给他们。要强化课堂设计，不能仅仅是生命知识的传授，更要融合网络技术手段实现对生命的体验交流，在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学生之间的讨论中，潜移默化地转变学生的生命观念，达到生命教育的预期效果[6]。

青年大学生生命教育方式的选择，要注重选取典型人物和先进事例，加强对青年大学生生命价值的引领。通过这些具体生动的人和事例有效地去感染学生，让他们认识到生命的价值和责任，激发青年大学生的生命感情。通过援助、慈善、助困等志愿服务来无私服务社会，使他者感受到社会给予的温暖，帮助他者走出生命困境，重获热爱生活的态度。让学生在严格保护自身的同时发挥志愿服务的力量，让他们感知到生命的活力和价值在于奉献。

（四）构建生命教育的合力

“生命教育是人类一项崇高的事业，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广大公众的共同关注和积极参与，这是生命教育成功推进的基础和前提。”大学需要全力创造有利于开展生命教育的优良环境和充分条件。利用网络平台、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以及大力推进校园文化建设等手段，为青年大学生的生命教育提供适度且持续的动力。积极引导学生开展自主学习，尤其是要运用网络上丰富多样的生命教育资源和别具一格的体验方式，进而有力促进生命教育效果的显著提升[7]。

在家庭教育方面，树立良好的家风是重中之重。应当积极传递生命的正能量，着力培养学生科学且健康的生活习惯，引导他们学会在社会中生存，用心去感受生命的美好与无尽乐趣。要了解青年大学生内心深处的困惑与迷茫，营造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帮助他们以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心态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使他们得以健康成长。

社会方面对青年大学生生命教育的支持与配合，主要体现在切实加强对舆论的正确引导、营造充满活力的生命教育氛围。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从政策层面给予全面深入的指导和支持，统筹生命教育资源，构建起全社会支持生命教育的宏大格局。

四、结语

总之，开展青年大学生生命教育势在必行且大有可为。大学应当把握时机，明确青年大学生生命教育的重点内容，采用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强化课程思政的主导作用，形成大学、家庭与社会相互协同构建的生命教育体系，帮助青年大学生用正确的生命价值观指引人生前进的方向，为未来的生命成长和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陈燕 . 大学生生命教育的立体审视与构建研究 [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5(08):104-106.

[2] 顾明远 . 教育的本质是生命教育 [J]. 教育与教学研究 ,2020,34(11):1-2.

[3] 赵迎华 . 新时期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内容、现状及策略探析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4(09):136-138.

[4] 刘革平 , 刘选 . 抗疫保教 : 教育技术的责任与担当 [J]. 教育与教学研究 ,2020,34(03):20-26.

[5] 邓小平文选 : 第 2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94:112.

[6] 张洪彬 , 张澍军 . 生命实践的视界：作为一种德性形式的志愿精神 [J]. 思想教育研究 ,2011(03):25-29.

[7] 康玲玲 , 周建超 . 生态文明视阈下生命教育的转向及其实践路径 [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18,37(04):113-118.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 :2024 年度四川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新建院校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项目“宜宾学院目标考核评价体系研究”（XJYX2024B06）。

（作者：陈雨佳，宜宾学院发展规划处；徐斯雄，宜宾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大数据背景下大学生就业测量工具的开发研究

徐　创　畅　雅　程晓军

摘要：当今时代，大数据技术的高速发展，为人类社会作出重要贡献，但其弊端也不容忽视。因此，在重要的领域，需要更为精准的数据作为决策的依据。大学生就业关乎民生和国家发展，在决策时需要参考其精准数据。本研究在充分梳理当前大学生就业数据统计路径的基础上，针对大学生就业研究导向中内外因素融合研究数据不足的情况，通过文献综述和结构化访谈，提炼出问卷的初始题项，并经过问卷施测、数据收集和结果分析，编制出《大学生求职投入度问卷》和《大学生深造投入度问卷》，最终汇总为《大学生就业投入度问卷》。该问卷的编制为就业内外因素融合研究数据的收集提供工具支持，为就业指导导向数据测量提供标准化量表，并为后续就业相关测量研究奠定基础。

关键词：大数据；就业投入度；问卷；深造

一、引言

当今时代，大数据技术高速发展，其快速、种类繁多的海量数据为人类社会作出重要贡献，但是大数据也是一把“双刃剑”，其隐藏的弊端也不容忽视[1]。首先，数据的有效性欠缺。大数据收集过程的不严谨，会导致数据不完整、不一致乃至具有虚假性，从而使数据的可靠性大大降低。其次，数据的价值性不足。大数据的快速响应，使得数据呈几何倍翻涌而至，海量数据使人应接不暇，如何从庞大的信息中筛选有价值的信息是重要命题。最后，数据算法的固化性显著。数据的训练依赖于历史数据，对于新生数据采集不足，容易形成“信息茧房”和“数字鸿沟”，造成判断滞后与决策失误的问题。因此，在一些重要领域，还需要更为精准的数据作为决策的依据。

近年来，随着外部环境复杂性凸显、国内经济结构深度调整，高校毕业生人数攀升与用人单位需求锐减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就业市场竞争激烈异常。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作为就业的最大主体，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大学生就业，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2]，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专门提及“强化促进青年就业政策举措”[3]。大学生就业领域研究决策关乎党和国家发展大计，需要谨慎对待。

二、大学生就业数据统计路径

结果导向的数据统计。结果导向的就业数据统计聚焦于大学生就业的最终结果，包括就业率、就业地区、行业分布、薪酬水平等，这类数据有助于决策者了解大学生就业现状，并根据结果反馈制定相应的政策。主要统计源有国家级大学生就业服务网站、各省建立的智慧就业服务平台，以及阶段性的就业情况调查等。结果导向的统计数据有其优势：第一，数据量庞大，数据通常覆盖全国或全省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更加宏观地了解就业整体状况。第二，数据信息丰富，数据不仅包含就业主体个人信息，还包含用人单位信息，为多角度分析提供可能性。第三，数据均来源于官方平台和渠道，采集过程正规，并经过审核，数据可靠性较高。但同时，结果导向的数据存在重结果轻过程的弊端，对于就业主体求职过程中的动态信息采集不足，难以对单一个体进行精准化分析和指导。

就业指导导向的数据测量。就业指导导向的数据测量，目的是通过标准化的就业评估量表，帮助就业主体深化自我认知，从而更加科学有效地进行职业规划与探索，一般由就业主体通过填写专业的量表得出，可以客观反映主体的性格、兴趣、价值观、能力优势等特点，属于为就业主体赋能的数据。主要的量表有MBTI职业性格测试、霍兰德职业兴趣测试、九型人格测试等。这类数据的优势在于其针对性较强，直接针对就业主体个人特质，为主体提供个性化的分析报告和就业建议。同时，数据准确性高，测量量表均经过信效度检测，并经过长时间的反复验证。但规模化测

量受限是其显著的问题，标准化问卷通常需要专业人士进行专业解读，使得其难以同时大规模推广应用。此外，规模化采集就业主体的性格、兴趣等数据，虽然能描绘出就业主体的整体性画像，但难以转化为具体、可实施的就业推进政策，实践意义不大。

研究导向的数据收集。此类数据是研究者为了了解和提升就业质量而进行的抽样调查，希望通过量化的指标反映出特定范围内存在的就业问题，主要集中在影响就业的内外部因素两个方面。就业外部因素研究，指影响就业的外部客观因素，包括地域、性别、就业指导、政策支持等方面，如欧晓玉（2022）从毕业去向、专业相关度、薪酬状况等方面统计了2013—2021届河南大学硕士研究生的就业情况，从多个角度描述大学生就业现状[4]。就业主体内部因素研究，指就业主体自身状态对就业产生的影响，一般包括就业意愿、胜任感、能动性等方面，如邢成建等人（2023）发现一般自我效能感在专业承诺和就业焦虑中起部分中介作用[5]。研究导向的数据虽不如国家或省级平台收集的数据量大，但因其种类繁多，且可转化为具体可落实的就业措施，成为就业决策中重要的参考依据。

综上所述，结果导向数据指向宏观层面，就业指导导向数据偏重个体赋能，而研究导向的数据是连接宏观与微观的中间地带，是就业数据版图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查阅文献可见，当前研究导向数据尚有很大缺口，且相关研究侧重于外部环境或内部心理单一维度，缺乏将就业内外因素融合研究的综合性数据，因此，进一步研究很有必要。

三、大学生就业投入度问卷的开发研究

在就业工作中，内外因素相互配合，协同发力，同频共振，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就业主体需将积极的意愿转化为能动、可控、稳定的因素，持续作用于外部因素，并有效利用、整合、创造外部资源达成结果。基于此，研究拟将就业主体的自发且能动的意识行为过程称为“就业投入度”，并拟定自测题项形成量表，通过开展测量学检验与优化，结合实证研究数据进行模型拟合分析，最终开发出具有针对性的大学生就业投入度专用测评量表，为研究导向数据的收集提供便利。

（一）量表设计

本研究以杨梅（2020）研发的针对大学生学习投入度评估框架为依据[6]，提炼就业投入度的认知、情感、行为及资源维度，针对性设计4项标准化问题，对常州科教城本专科院校近三年的毕业生进行结构化访谈。访谈共抽取8人，其中硕士毕业生3人，本科毕业生3人，专科毕业生2人，访谈对象包含入职企事业单位人员和继续学习深造人员。将访谈稿分类整理，提取共性内容，编制成问卷相应题项，最后形成《大学生求职投入度问卷》和《大学生深造投入度问卷》，问卷均有4个维度，题项分别为20题和21题。

（二）数据收集与分析

研究者采用方便取样，在常州科教城本专科院校中发放问卷400份，经过对无效问卷的筛查剔除，共获得有效问卷337份。其中，研究生101人（29.97%），本科生111人（32.94%），专科生125人（37.09%）；求职问卷199人（59.05%），继续深造问卷138人（40.95%）。

（三）研究结果

采用IBM SPSS 25.0对问卷数据进行项目分析、相关性分析、内部一致性信度检验以及探索性因素分析。

1. 项目分析及相关性分析

采用极端组检验法和题总相关法对问卷的题项是否适当进行检验。根据问卷项目总分排序，得分前27%的被试属于高分组，得分后27%的被试属于低分组，将两组数据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

大学生求职投入度问卷的分析结果显示，临界比（t值）均介于5.126—13.922之间，P<0.001，差异显著，表明题目具有良好的鉴别度，可以区分不同水平的被试。通过分析问卷题目与问卷总分的相关性发现，各题项得分和总分的相关性均大于0.5，P<0.001，说明题目能够反映所要测量的求职投入度水平。

大学生深造投入度问卷项目的分析结果显示，临界比（t值）均介于6.073—11.784之间，P<0.001，差异达到显著性，各题项得分和总分的相关性也均大于0.5，P<0.001，说明题项有良好的区分度和相关性。

2. 内部一致性信度检验

检验结果显示，大学生求职投入度总分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57，其中认知分维度为0.876，情感分维度为0.874，行动分维度为0.881，社会资源分维度为0.856，系数均高于0.85；大学生深造投入度总分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73，其中认知分维度为0.887，情感分维度为0.937，行动分维度为0.898，社会资源分维度为0.929，系数也均高于0.85，说明两份问卷及其各维度的信度良好，可靠性较高。

3. 探索性因素分析

对问卷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经过KMO计算和Bartlett球形检验，大学生求职投入度的KMO值为0.931，近似卡方值为3083.721，自由度为190，在0.001水平上达到显著；大学生深造投入度的KMO值为0.947，近似卡方值为3032.447，自由度为210，在0.001水平上也达到显著，说明两个分问卷均适合进行下一步的探索性因素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设置因子数量为4，经过最大变异法旋转后删除了负荷值小于0.45以及归类不当

或不易解释题项，形成新的问卷项目，然后对各项目再次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将项目归为相应主成分。

其中《大学生求职投入度问卷》题项经过旋转后，C4（0.779）、C1（0.693）、C2（0.693）、C5（0.579）归为成分 1，B2（0.820）、B5（0.767）、B4（0.693）、B3（0.602）归为成分 2，A2（0.860）、A4（0.694）、A3（0.628）、A1（0.601）归为成分 3，D1（0.819）、D2（0.645）归为成分 4。《大学生深造投入度问卷》题项经过旋转后，B1（0.838）、B3（0.783）、B5（0.778）归为成分 1，D1（0.753）、D6（0.725）、D2（0.607）、D3（0.558）归为成分 2，C1（0.598）、C2（0.345）归为成分 3，A1（0.889）、A5（0.496）归为成分 4。

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并结合文献综述内容，《大学生求职投入度问卷》中，我们将成分 1 命名为求职行动投入度，成分 2 命名为求职情感投入度，成分 3 命名为求职认知投入度，成分 4 命名为求职社会资源投入度；《大学生深造投入度问卷》中，我们将成分 1 命名为深造情感投入度，成分 2 命名为深造社会资源投入度，成分 3 命名为深造行动投入度，成分 4 命名为深造认知投入度。

研究严格按照问卷编制标准，参照学习投入度研究的评价框架，结合结构化访谈结果，初步确定大学生求职投入度问卷和大学生深造投入度问卷的具体题项。其次，以常州科教城各校专、本、硕学生为研究被试，对收集的数据分别进行项目分析、相关性分析、内部一致性信度检验以及探索性因素分析等，分析得出两个分问卷的结构和内容，其中《大学生求职投入度问卷》共保留 14 个题项，认知、情感和行动投入维度各 4 项，社会资源投入维度 2 项；《大学生深造投入度问卷》共保留 11 个题项，认知投入维度 2 项、情感投入维度 3 项、行动投入维度 2 项，社会资源投入维度 4 项。《大学生求职投入度问卷》和《大学生深造投入度问卷》共同组成大学生就业投入度问卷。

四、大数据背景下大学生就业投入度问卷的价值和意义

为就业内外因素融合研究数据的收集提供工具支持。本研究旨在针对现阶段就业内外因素融合研究的数据明显不足的现状，开发出一套系统的测量工具，以支持该领域的深入研究。研究从就业的内外因素融合机制入手，深入剖析就业投入度的内涵和外延，通过大量访谈内容和数据，明确了大学生就业投入度的测量结构，进一步丰富了大学生就业研究的测评工具，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支持。

为就业指导导向数据测量提供标准化量表。本问卷严格遵循标准化量表开发流程编制，并通过了系统的信度和效度检验，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特性。该工具有助于大学生在就业准备过程中进行自我评估，对于学生探索其深层次的就业心理特质具有指导作用。同时标准化问卷收集的数据也可为就业相关部门开展就业教育引导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

为后续就业相关测量研究奠定基础。尽管研究在问卷开发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科学严谨的方法来确保问卷的信效度，但问卷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大学生求职投入度问卷中社会资源投入维度、大学生深造投入度问卷中认知投入维度和行动投入维度题项被删除较多，总题项偏少，这主要是因为初始问卷的相关题项数偏少，部分题项表述区分度不够，导致题项不能针对性测量出本维度内容，可以在后续研究中提取更多具有代表性的题项进行补充研究。

五、结语

综上所述，大数据背景下，海量数据的弊端正影响着重要领域的决策判断。大学生就业作为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民生工程和战略任务，其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学、精准的数据支持。结合当前大学生就业数据统计路径，就业内外因素融合研究的数据亟待补充，编制标准化的《大学生就业投入度问卷》，为未来就业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 张定福 . 关于大数据技术弊端及其改进的研究 [J]. 中国新通信 ,2023,25(02):39-41.

[2] 赵小云 , 唐丽娜 . 计划行为理论视域下高校毕业生“慢就业”现象的形成机理与应对 [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26,44(02):149-155.

[3] 郝力晓 , 李萌 , 杨忠秀 , 等 . 利己—利他视角下大学生积极就业前因组态研究 [J].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5,25(03):23-30.

[4] 欧晓玉 . 河南大学出版硕士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报告（2013 届 -2021 届）[D]. 郑州：河南大学 ,2022.

[5] 邢成建 , 郑岚戈 , 李益智 , 等 . 大学生就业心理影响因素：一般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23,31(03):413-417.

[6] 杨梅 . 在线学习环境中大学生学习投入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D]. 武汉 : 华中师范大学 ,2020.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自我决定理论视域下大学生就业投入度提升研究”（2024SJSZ0535）；2023 年常州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研究课题“自我决定理论视域下研究生深造投入度提升研究”（YJK2023016）。

（作者单位：常州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社工人
一键服务机

把复杂的线下世界，简化为一个按键

设备键盘上预设**社工**、**跑腿**、**外卖**、**打车**等实体快捷键。

每个按键背后连接的，不是未知的客服，而是平台认证的**本地社区社工**、**商家**或**服务人员**。

老人只需按一个键，需求直接发布至**社工人平台**，由平台调度本地资源响应。

同时具备一键 **SOS**、**健康监测**、**防走失定位**、**日常通信**等全方位功能。

咨询电话：010—68300355/356

线下服务
一键直达

广告

社工人
有困难 找社工
社工人数字化平台

有困难 找社工

聚焦急难愁盼
助力基层治理
共享美好生活

ISSN 1674-9758
9 771674 975260 06

公益广告

邮发代号：82-579　定价：40.00 元